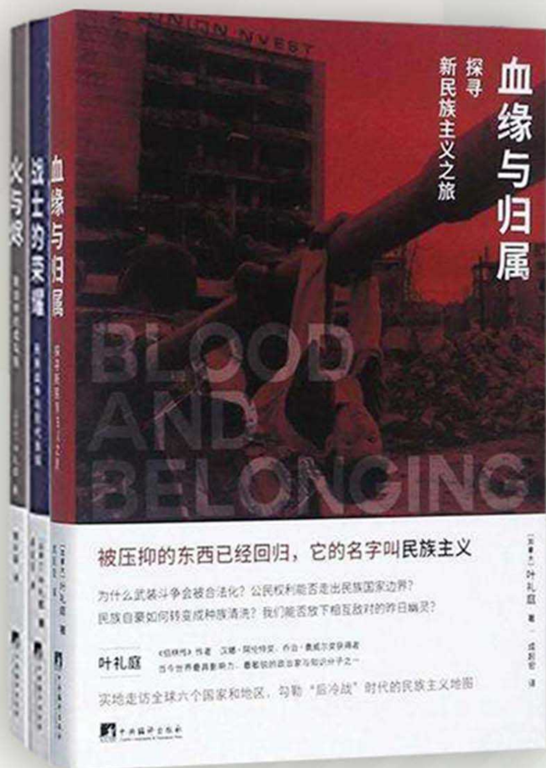
《叶礼庭作品集》

（套装共3册）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叶礼庭作品集

（套装共3册）

[加]叶礼庭 著
成起宏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血缘与归属

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

火与烬：政治中的成与败

血缘与归属

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加拿大] 叶礼庭 著
MICHAEL IGNATIEFF
成起宏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血缘与归属

[加]叶礼庭 著
成起宏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目录

导读：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

导论：最后的避难所

军阀

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

归属

世界主义与特权

六次旅程

1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旧秩序

微小差异的自恋

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

亚塞诺瓦茨

哭吧，女孩，哭吧

军阀

武科瓦尔

贝尔格莱德

吉拉斯

铁托之墓

老人的皮夹

2 德国

实验
相册
卡尔·马克思广场
卡巴莱
民族会战的记忆
生活于民主之下
做一个好德国人
利奥和里希
德国民族主义历史的间歇期
美杜莎餐馆和伏尔泰咖啡馆
故乡
最后的思考
3 乌克兰
酒瓶和香皂
美元区
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
总统
雕像和洞穴
家族墓地
利沃夫
克里米亚
鞑靼人
金刚
束缚

4 魁北克
法国佬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和联邦主义
国家和民族
民族主义和落后的民俗学
在两个小丑咖啡馆
两次谈话
部落和民族
权利和生存
谁属于这个民族？
加拿大的冰球之夜

5 库尔德斯坦
边界
自由斗士
恐惧共和国
大屠杀
游击队员
和雪貂一起

6 北爱尔兰
镜子，镜子
汤米·多伊尔
兰博格鼓

拉斯库尔男孩
迪街篝火
原野
船货崇拜
饥饿和餍足
延伸阅读
致谢
版权页

导读：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

王前 [1]

2014年3月，笔者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参加关于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研讨会。来自欧美的专家在为期两天半的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伯林跟启蒙运动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伯林创建并担任首任院长的学院里，与会学者大多对伯林关于启蒙的研究颇有意见，有的炮火之猛烈让我这个也研究点儿伯林的外来者很是吃惊：如果搞不清状况，你会疑惑被讨论的这位哲学家是否还有讨论的价值。

记得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后一个多小时，我才赶到会场，因不想在别人发言时闯进去打扰，于是就上了二楼，站在走廊跟坐席之间光线很暗的过道上听。没多久，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走了过来，他打开门正要进去。我定睛一看，眼前的不正是伯林传记的作者叶礼庭吗？的确是2012年夏天我在首尔参加伯林的自由主义研讨会时见过的那个人，于是就打了个招呼。简短的寒暄后他进去了，我也就尾随而入，坐在二楼的座位上继续听。这天叶礼庭有主题发言，他反驳了时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德隆（Jeremy Waldron）对伯林的严厉批判。沃尔德隆主要批评伯林忘记了立宪启蒙主义的重要性，具体内容就不在此赘述了。[2]

当时印象很深的是，这位伯林晚辈中唯一曾在政坛居高位、跟加拿大总理宝座擦肩而过的学者真是能言善辩，对当今法哲学重镇执牛耳者沃尔德隆反驳起来毫不客气，似乎成了场内为伯林辩护的最强音。遗憾那天他参加完会议就离开了，我没有机会请

教。一晃三年过去，因缘凑泊，这次有机会阅读他的三本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读完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以前只是仔细读过他那本伯林传记——那是本难得的关于哲学家的传记佳作——其他的除了访谈外基本上没有读过。这次通读三本书有许多新的发现，尤其对他深入兵荒马乱的纷争之地，了解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真相的努力肃然起敬：他是位典型的行动型知识人。

《血缘与归属》《火与烬》和《战士的荣耀》各有特色，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三部曲。《血缘与归属》谈新民族主义，《火与烬》写从政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对他的从政经历的总结，而《战士的荣耀》则是一部谈论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若干当今世界重要问题的评论集。三本合在一起正好反映了叶礼庭这些年来的人生轨迹和他最关心的问题。我想先来谈一下给我很大震撼的《血缘与归属》。

在此书中，作者写了他的六次关于新民族主义的旅程，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开始，经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再到北爱尔兰。通过这些旅程，叶礼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当今新民族主义的灰色甚至是血腥的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世界各地的新民族主义倾向是如何导致冲突，甚至残酷战争的。比如，说到克罗地亚跟塞尔维亚的冲突，我们这些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外国人，除了看报纸电视上的报道，实在搞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何从原来和睦相处的邻居，昼夜之间就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给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概念》又提供了一个绝佳样本。叶礼庭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冲突的地区进行实际调查，就是想要搞清楚双方冲突的根源。许多时候死亡如影随形，光凭这点就令人对这位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另眼相看。随着调查

进一步深入，我们这些遥远的东方人也就渐渐明白冲突的起因和问题的复杂性了，远非一句塞尔维亚人对异族进行种族清洗就可以解释完毕的。

记得我当时是从西方的媒体上得知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后来才知道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有其他事件，比如“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民族独立组织乌斯塔沙（Ustashe）加入轴心国阵营，残杀过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等异族，最后被铁托击溃。作者到底是历史学出身，对事件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做了很细致的调查，所以他能够对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做出比较独立的判断，对当年西方政府几乎一边倒的措施也能提出批评。他还去了铁托故居，去了解这位作为南斯拉夫象征的政治家在民族问题中起到的作用。原来铁托是克罗地亚人，他在建立了南斯拉夫之后，并没有真正处理好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矛盾，而是通过遮蔽和向前看的方法处理这个很敏感的问题。这种方法在铁托那样的铁腕人物在世的时候可以起作用，一旦他去世，原来被掩盖起来的问题就渐渐露出水面，后继者既然没有前任那样的权威，掌控不了局面，再加上立场偏颇，终于酿成一场巨大冲突，使原来和平相处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从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邻居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一些老人甚至说“二战”时候都没有杀得那么凶，这也让我们见识了新民族主义的巨大破坏性和残酷性。作者还采访了当过铁托副总统的一位老政治家，他俩关于历史和现状的对话也极有意思。

作者写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民族矛盾的那一章也很吸引人，因为这里面有他的寻根旅程。叶礼庭的《伯林传》出来后，我读过一些人对作者的访谈。里面他谈到自己的身份。他的曾祖父是沙皇时代的内务大臣，参与过沙皇时代的排犹决策，而他的祖父则

是沙皇时代末期的一位教育大臣，“十月革命”后举家流亡，最后定居加拿大。在去乌克兰采访的旅途中，他参拜了曾祖父母的墓地，见到了了解自己家族情况的年长的乌克兰人，虽非叶落归根，但这颇有回乡意味的旅途让作者感慨万千。毕竟他是流亡者的后代，所以他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尖锐民族矛盾有跟纯粹局外人不一样的视角和感受。作者在采访黑海舰队时所了解到的情况真是极好地体现了原属一个大国的若干民族在国家解体后面临的困境：你的忠诚对象究竟是谁？书里面提到住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到俄国去竟然要护照，原先非常平常的国内旅行一变成国际旅行，身份认同也变得尴尬起来了。

叶礼庭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到英国寻求发展，不但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做过不少很精彩的节目，而且为伯林那样在整个西方都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写了颇受称赞的传记，英国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了。但即便他熟知英国，在调查北爱尔兰问题时还是对英国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自己被英国的世界主义给“骗”了——英国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传统的。联想到不久前的脱欧公投，我们也就能理解英国独特的民族主义了：英国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变成世界主义式的，它虽然没有狭隘的岛国根性，但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这些“发现”都是作者的功劳：帮助我们打开视界，改变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知。

如果说叶礼庭的传记对象伯林是20世纪对民族主义最有见解的思想家之一，那么三本书中最厚的这本《血缘与归属》则给我们提供了新民族主义的各种范例。它们的本质都很相似，只不过是换了时代和环境，上演的剧本没有本质的差异。伯林在谈到民族主义时，既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也分析和批判了其残酷暴力

的一面。伯林说19世纪的思想大家们几乎没有一个重视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大多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主义会逐渐式微，所以那些大家几乎都没有预料到民族主义会在20世纪勃然兴起，甚至主导了很多政治运动。不管左翼右翼，如果没有跟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可能无法取得胜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礼庭的这本书几乎是在为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提供了一连串有意思的解释和注脚。

伯林在思考自己的犹太民族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时，虽然并非完全没有萨义德（Edward W.Said）所批评的袒护以色列的一面，但他还是提出了双方应该妥协的建议。巴以冲突里有的特征，你都可以在叶礼庭所记录的六次旅程里找到类似的对应。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处理民族问题的准则呢？通过叶礼庭深入冲突现场的考察，我们虽然被那些鲜血和暴力震撼，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让本来深陷民族冲突的各方和平相处的原则。当然，这绝不是喊几句世界主义的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需要倾听各自的声音，通过理性的对话来寻找一条共生的道路，否则只会是无止境的、没有意思的冲突罢了。叶礼庭对比了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笔者也倾向于认同公民民族主义，因为既然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都已几乎不可能是由单纯的同一个民族组成的，那么公民民族主义也就是唯一的选择了，这点跟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读完沾有血腥味和戾气的《血缘与归属》之后读《火与烬》，会觉得很有趣味——这样说对在做加拿大自由党党魁时落败的作者来说也许有点失礼。这本书是一位在近耳顺之年投入政坛的人物（即叶礼庭自己）的从政记录，对我们了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有不少帮助。笔者很喜欢看BBC转播的英国下院的

论战，原以为欧美的议会大概都是差不多，哪里知道在作者的笔下，加拿大的议会运作并不精彩，有意思的演讲讨论也不多，纳税人也不是很关心自己国家议会的运转情况，跟英联邦的龙头老大西敏寺大本钟下的议员们比起来似乎差远了。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叶礼庭写他如何从政坛菜鸟逐步迅速进入角色，临危受命成为加拿大最大在野党——自由党——的党魁，并进而挑战当时的哈珀总理，却终因是空降政治家和若干失言导致落败的过程。从作者坦诚的叙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英美等国工作30年左右，然后应忧心自由党前途的若干政治家的请求回国从政，这本身就给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在选举中对手始终可以拿这点来攻击他，而事实上加拿大的保守党正是做样做的，这让叶礼庭有口莫辩。毕竟作者大半生都在媒体和学界工作，做的是职业知识人而非职业政治家，要完成从学人到政治家的转身，时间还是太短了。他在选举过程中的失败经历正好说明他是政坛的菜鸟，跟那些年纪轻轻就出来在政坛打滚的职业政治家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不过他从谈政治的学人、战地记者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转到政治家的行业，从书桌上的“空论”到身体力行，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也是这本书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在《火与烬》中，他为我们考察当今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样本。加拿大的政治文化我们一般都不太熟悉，它的国土那么辽阔却似乎一直生活在南边那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下。通过作者这位前自由党党魁的描述，我们会发觉，不管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特朗普上台，引起这些巨变的要素在加拿大这个民主制度运转基本上算是很成功的大国也存在。比如移民问题，比如政策如何反映民意，等等。在去年美国的大选中，建制派精英饱受攻击，某种民粹主义占了上风，这当然是

跟美国国内存在的矛盾分不开的。叶礼庭本人是作为“空降兵”进入加拿大政界的典型精英，当然会遭遇巨大障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跟选民打交道，让他们认识你、接受你，他都在书里有很详细的描述，让你觉得要当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实在不容易。当然，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叶礼庭落选后没几年，自由党又重新执政，当今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正是叶礼庭年轻时助选过的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的儿子，而这位加拿大的官二代从政阅历并不比叶礼庭丰富到哪里去，看来毕竟还是拥有父辈的人脉，加上更“接地气”吧。

《战士的荣耀》作为一本评论集，是叶礼庭对包括新民族主义在内的当今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汇总，里面也有很多令我们读了深思的内容。如果说《血缘与归属》是以报道为主，这本则是他对那些问题较为理论化的探讨。作者在此书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电视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微小的差异如何导致民族冲突、红十字会在现代社会里的使命和局限，以及转型社会和民族冲突地区的和解问题。在讨论为何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样的差异极小的民族会发生激烈冲突时，叶礼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做了梳理，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再有，讨论和解问题的《我们想要从中醒来的噩梦》也写得非常有深度，反映了他所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很多问题一经他的阐述，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的很不简单，远非采用“理中客”的态度就能处理好的。比如这篇文章里讲到和解中如何处理真相问题。我们知道南非有真相委员会，其在南非的国家和解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作用，战后西德对历史的反省做得也颇受称赞，但如果看一看内部情况，其实并不简单，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努力，有时是迫于外界压力。叶礼庭最后总结道：“和解建立在互相道歉的基础上，承认历史不是命运，承认历史不应

受到谴责；也不应谴责文化或传统——历史必须谴责的只是特定个体。和解的最后一个维度（即哀悼死者）在于对和平的热望必须战胜复仇的渴望。除非和解尊重仇恨背后的情感，除非和解让曾陷入战争的共同体学会共同悼念死者的仪式，以之取代包含的对逝者的敬意，否则它不会有消除仇恨的机会。和解必须触及死亡民主的共享遗产，告诉人们所有终结于杀戮的争斗都毫无作用，所有想要报复那些不再存在的人的所有努力都是无止境的徒劳。因为杀戮不会让死者复活，这是最基本的一项确定性。这是一种可以共享的遗产，当它得以共享的时候，一个人从梦中醒来时或许才会获得这种深刻的认知。”这是在观察了新民族主义冲突的现场，对历史上和当代的种族冲突进行深刻思考后得出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对我们思考自己的历史也是有启示的。每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都会有各种复杂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读完这三部著作，笔者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为了写作伯林传记，跟着伯林在伦敦坐巴士的那个40岁左右的俄裔加拿大学人。叶礼庭写作的《伯林传》也是给20世纪留下一个记录，他在自己正值壮年的一段时期跟伯林的人生产生了交集，他所尊敬的这位哲学家思考的很多20世纪最重要的问题自然也给了他不少影响，那些思考也不时出现在这三部著作里。叶礼庭的从政生涯虽然没有结出硕果，但他对政治的思考，对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重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因为他从政失败而失去意义。恰恰相反，这三本书是一位不满足于坐而论道，有付诸行动的勇气的知识人的人生记录和理论反思，在这个价值观有错位的时代里提供了很清醒的判断，对我们理解时代和政治大有裨益。

笔者在写这篇导论的时候，看英国的《卫报》等媒体报道说如今担任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校长的叶礼庭正在进行着一场

保卫大学的战斗。作为行动的知识人，他正在捍卫学术自由，在书写他人生的新篇章，而此时他已入古稀之年。我们当然无法说作为政治家的叶礼庭获得了成功，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败选后在电视上用英语和法语发表败选感言时的落寞眼光。据说西塞罗很喜欢说不应该根据成就来评价一个人，而是应该根据他为了某个目标而做的奋斗来判断，用这句话来评价叶礼庭，也许非常合适。在民粹主义再度沉渣泛起的年代里，叶礼庭的思索会给我们很多启迪。他不可能提供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是会刺激我们思考那些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的“真问题”。我相信各位读者读完他的这些著作后，会有类似的感触。

---

[1] 王前，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东亚教养教育创新组织特任副教授，专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在日本出版《中国是如何阅读西方思想的？》、《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合著）、《现代中国与市民社会》（合著）等多本著作，另在《知识分子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思想》等学术类杂志发表若干论文、随笔。

[2] 关于叶礼庭具体的发言内容，可参见笔者发表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思想》第二十六期上的文章。

导论：最后的避难所

军阀

这个联合国检查站是一座堆着沙袋的活动房屋，有两个加拿大士兵守卫着克罗地亚中部帕克拉茨（Pakrac）的克族人控制区和塞族人 [1] 控制区之间的路障。通往检查站的道路蜿蜒曲折，两边的小平房已被夷为平地，车辆翻倒在壕沟里，废弃的花园中杂草齐腰。当我们接近检查站的时候，透过杂草可以看到两个十几岁的克罗地亚人，用望远镜警惕地注视着塞尔维亚人一方。

离开联合国检查站，刚进入塞族人控制区，十五个武装的塞族准军事人员马上围住我们的面包车。他们刚刚在村里的婚礼上喝过酒。醉得最厉害的那个人双眼呆滞、满脸汗珠，强迫我们打开车门，爬上了车。“我们看着你们，”他用双手做出望远镜的样子，“你们告诉那些乌斯塔沙（Ustashe） [2] ，”他指着来路上藏在草丛中的克罗地亚人，然后从腰带间掏出手枪，“你们这些该死的间谍。”他用枪口逼迫司机下车，接过方向盘，开始重新发动引擎。他后面座位上的摄影师抱怨说：“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拍下来？”面包车后部一个声音幽幽传来：“因为他会开枪打死你。”

那个塞族人将面包车挂上挡，车子慢慢启动，这时一个联合国士兵猛地拉开车门，抓住钥匙，熄了火。“我们会自己开的。”联合国士兵喘着粗气说，半拉半哄地把塞族人从司机座位上拖下来。另一个全副武装的塞族年轻人挤进面包车里，摇了摇头：“我是警察，你们被捕了，跟我走。”

在我追寻新民族主义的旅途中，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开始理解新世界秩序的真实景象是什么样的：喝多了梅子白兰地的武装分子，种族狂热，隔着废弃土地互相射击；一个设在他们中间的检查站，高傲地摆在那儿，被称为“国际社会”，但实际上只不过配备了两个焦躁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时不时地担心他们能否活着离开的摄影团队。

“国际社会”的法令只限于联合国检查站两侧150米以内。超出此范围，枪炮就是法律。武装人员把我们带到村里的警察局，局长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的翻译的祖父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克尔克岛（Krk），所以他一定是个克罗地亚间谍。但随后来了个电话，指示局长释放我们。没有人会说是谁下的命令。看上去，应该是当地的塞族军阀。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军阀的权势，但不是最后一次。

我是“冷战”时代的孩子。我出生于1947年，柏林空运[3]的那一年。关于不顾一切后果的政治，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一天所感受到的极度恐怖。现在回头来看，我发现自己经历了最后一个帝国时代，最后一个世界上各民族国家被划入两大截然对立势力范围的时代，最后一个恐怖制造和平的时代。现在，恐怖似乎只能制造更多的恐怖。

如果21世纪已经开始——像某些人说的那样[4]——那么它开始于1989年。当柏林墙轰然倒下，当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站在布拉格的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的阳台上，和人群一同欢呼，像许多人一样，我认为自己见证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几乎顺从地觉得自己将在“冷战”的恐惧麻痹中终老。突然，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到黑海，从塔林（Tallinn）[5]到柏林，从布拉格到布达佩

斯、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一个自由民族的新秩序开始成形。1991年8月，当莫斯科人民捍卫俄罗斯议会、对抗坦克时，我们相信，那拖垮了20世纪最后一个帝国的公民的勇气可能强大到足以支持俄罗斯向民主转型。甚至，我们一度相信，东方的民主洪流可能横扫我们西方自身已经疲惫不堪的寡头政治。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错得有多厉害。因为承继最后一个帝国时代的，是一个暴力的新时代。新世界秩序的关键叙事是民族国家瓦解、陷入种族内战，这个新秩序最重要的建筑师是军阀；我们时代的关键语言是种族民族主义。

伴随无忧无虑的乐观思想，我们认定世界无可避免地前进，超越民族主义，超越部族制，超越我们护照上限定的狭隘的身份，走向一个全球化市场的文化，那将是我们新的家园。但回溯过去，我们不过是在黑暗中吹着口哨，为自己壮胆。被压抑的东西已经回归，它的名字叫民族主义。

---

[1] 克族人，即生活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塞族人，即生活在此处的塞尔维亚人。1992—1995年的波黑战争即围绕此二族人以及穆斯林的矛盾展开。——编者注（若无特别注明，后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2] 乌斯塔沙为“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民族独立组织，目标是建立纯粹克罗地亚人的国家。“二战”中乌斯塔沙政权加入轴心国作战，残酷屠杀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1945年被铁托击溃。

[3] 1948年，苏联封锁美、英、法三国占领的西柏林。为维持西柏林居民和驻军的生存，美英盟军组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空运，持续一年，直至1949年苏联解除封锁。

[4]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当时还未进入21世纪。

[5] 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

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

作为政治信条，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世上之人区分成各民族，其中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决权，或者以已有民族国家中的自治单位而存在，或者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

作为文化理念，民族主义是一个主张：尽管男人和女人们拥有许多身份，但为人们提供最重要的归属形式的，是民族。

作为道德理念，民族主义是一种伦理：英勇牺牲，为在保卫自己民族、对抗内外敌人中使用暴力提供正当性。

这些主张——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互为奥援，认为民族有权以武力或暴力捍卫自身的道德主张，依赖于文化上的主张，即满足安全和归属的需要是唯一重要的。认为所有民族都应当为国家地位而奋斗的政治理念，取决于认为只有民族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主张。文化理念反之也为那种如果没有自决这些需要就不可能满足的政治理念提供佐证。

所有这些主张都颇具争议性，没有哪一个是直观明白的。世界上有许多部族居民和少数民族不把自己看成民族，很多并不寻求建立自己的国家。此外，为什么民族身份应当是比其他任何个人身份都更为重要的因素，并非显而易见；为什么捍卫民族让使用暴力成为正当的，也非一望可知。

但现在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界定了在何种情形下，当人们的自决权受到威胁或者被拒绝承认时，他们起而自卫，武力或暴力能从中获得正当性。在这里，自决可能意味着民主式的自我治理，或是行使文化自主权，这取决于所讨论的民族团体是相信自

己能在一个已有的国家框架中达成目标，还是寻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

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将政治主权赋予“人民”——事实上“民族”这个词常被看作“人民”的同义词——但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能创立民主政体，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在界定其民族构成时都将全体人民纳入进来。

一种“公民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应当包括所有认同民族之政治信条的人，不管其人种、肤色、信念、性别、语言或种族如何划分。这种民族主义被冠以公民之名，因为它将民族视作一个平等的、权利共享的公民共同体，通过依附于一套共享的政治实践和价值之上的爱国主义而实现统一。这种民族主义必然是民主的，因为它将主权赋予全体人民。这一理念的某些要素首先在英国出现。到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是一个由四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英吉利人，维系这个国家的，是“公民身份”——而非“种族”——所界定的归属，亦即人民所共享的某些制度：王室、国会和法治。但直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直到法兰西和美利坚创建共和国，公民民族主义才开始征服世界。

这样一种理念更容易付诸实践，因为启蒙时代的诸社会在种族上是同质的，或至少在表现上它们像是同质的。那些不属于有政治选举权阶层——有产的男性白人——的人，如劳工、妇女、黑人奴隶、土著居民，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公民之外，进而被排除在民族之外。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早期，这些群体曾为获得公民身份而战。抗争的结果是，绝大多数西方民族国家现在都根据共同的公民身份而非共同的种族来界定其国家地位。德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拿破仑1806年对德意志诸公国的入侵和占领，激发了一波德意志的爱国怒潮以及反对法兰西民族国家理念的浪漫主义论战。德国浪漫派认为，不是如启蒙运动所相信的，国家创造了民族，而是民族及其人民创造了国家。赋予民族统一性、使其成为家园和激情依附之地的，不是权利分享这一冷冰冰的构想物，而是人们早已存在的种族特性：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人民”（Volk）意义上的民族早已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开始了其漫长多难的征途。19世纪所有在帝国统治下的欧洲民族，俄罗斯压迫下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人、土耳其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治下的克罗地亚人，在设想他们的自决权时，都关注着德国的种族民族主义理念。当德意志在1871年达成统一并崛起为世界强国之时，其成就向帝国主义欧洲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展示了种族民族主义的成功。

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中，公民民族主义更符合社会学现实论。绝大多数社会不是单一民族，即使是，共同种族也无法自我消除分歧，因为种族只是要求个体忠诚的众多因素之一。根据公民民族主义的信念，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根源，而是法律。通过认同一套民主程序和价值观，个体可以调和他们塑造自己生活的权利与他们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需要。反过来，这也表明民族归属可以成为一种理性依附的形式。

与此相反，种族民族主义宣称，个体最深层的依附是遗传的，不是选择的。民族共同体界定了个体，而非个体界定民族共同体。这种归属的心理学可能比公民民族主义的观点深刻得多，但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学则离现实甚远。例如，两个塞族人都具有塞尔维亚族身份，这一事实可能使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克罗地亚人，但要阻止他们为工作、配偶、稀缺资源等而互相争斗，这起

不到任何作用。共同种族自身并不创造社会凝聚力或共同体，当它在这方面失败时——失败是必然的——民族主义政权必然被迫转向以武力而非共识来维系统一。这是民族主义政权更多是威权式而非民主式的原因之一。

本质上，它们是一种以多数派种族的利益为主导的民主形式，这也可以证明其威权性。绝大多数“后冷战”时代的新民族国家都在口头上奉行公民平等社会的理念，并为少数种族的权利提供保护。在现实中，新的民族国家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罗的海诸国、亚洲各新兴共和国，都实行制度化的多数派种族统治。对于那些之前由得到帝国支持的少数族群俄罗斯族统治的多数民族，如波罗的海各民族和乌克兰人，种族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诱惑。

有人认为，只有在公民民族主义从未得以建立的地方，威权性的种族民族主义才能扎根。按照这种观点，种族民族主义在东欧的兴盛，是因为40年的一党统治有效地摧毁了曾经在这个地区存在过的任何公民的或民主的文化。如果是这样，那么情况应当是，在有广泛民主传统的社会中，种族民族主义不具有深厚根基。然而并非如此。欧洲的种族主义是一种白人种族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它是一种对公民民族主义的反叛，反叛的恰恰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种族身份的民族理念。在具有丰富的也许程度不同的民主经验的国家，如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这种反叛正在不断发展。

也有大量例子表明，在形式上承认公民民主的国家内部，种族民族主义日益盛行，如北爱尔兰、印度和加拿大这三个地方。在北爱尔兰，1920—1972年间，新教忠诚派的多数族群利用英国的议会制度，保持一种对天主教少数族群广泛的多数派暴政。

尽管深受英国民主和法律传统浸润，但北爱尔兰完全无法阻止忠诚派将民主扭曲为民族主义。在印度，45年的公民民主难以遏制种族和宗教民族主义，它们正将这个国家的联邦体制撕得四分五裂。在加拿大，景象要乐观一些，但分析要点是一样的：在联邦民主的框架内实行的完全包容没有能削弱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力量。

在所有这些地方，种族民族主义最基本的吸引力在于，作为多数派种族统治的一条基本原则，它让敌人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或者颠覆某种文化附庸的传统。在东欧各民族中，种族民族主义可以提供更多东西。当苏维埃帝国及其卫星国政权崩溃之时，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结构也随之瓦解，留下数以百计的族群彼此掣肘。因为这些群体都没有哪怕最低限度的、通过民主讨论来协调争端的经验，暴力或者武力成了他们的裁决者。民族主义的华丽辞藻像野火一样在这个地区蔓延，因为它能够给军阀和武装分子提供一套机会主义的、自证合法性的词汇。在席卷共产主义国家废墟的担忧和惊恐中，人们开始发问：现在，谁能够保护我？面对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局势，人们想知道谁可以信赖，谁是自己人。种族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直观明白的答案：只相信那些与你血缘相同的人。

归属

但如果民族主义要将其对血缘忠诚以及血缘牺牲的要求合法化，似乎只有诉诸人们更美好的天性而不仅仅是最坏的本能时，它才是有说服力的。杀戮不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行为，必须有某种原因，行凶者才能安之若素。如果暴力要合法化，它必须以人们心中至善的名义，有什么比他们对家园的热爱更美好呢？

民族主义者是高度感性的。“媚俗”（Kitsch）是一个种族“屠杀者”的自然美学。检查站两边的杀手，刚刚还在瞄准敌人射击，转眼间可以没有丝毫转折地哼唱思乡曲，甚或是背诵几行民族史诗。这种感性的潜在目的，是暗示人受到一种爱的控制，它的伟大超过理性、强大胜过意志，是一种与命运和定数紧密相关的爱。这样一种爱使人们相信，是命运而不是悲剧迫使你杀戮。

剥离掉诸如此类的感性，这种归属以及对归属的需求——民族主义似乎颇为成功地迎合了这种需求——还剩下什么？当民族主义宣称民族归属是所有归属身份中最重要的形式时，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民族保护你，其他任何归属形式——你的家庭、职业或者友人——都不会给你安全。这就是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正当理由之所在。没有民族的保护，个体所看重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是首要的防范暴力的手段。你属于哪里，哪里就是安全的；给你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归属的地方。如果民族主义的说服力是因为它为暴力授权，也可以说它的说服力来自为人们提供对暴力的防护。军阀是其民族的保护人，如果他杀戮，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捍卫最高贵的事业：保护无辜的人。

但归属也意味着被认可和被理解。正如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中所写的，当我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他们理解我，正如我理解他们；而这种理解在我心目中造成我是世界中的‘一个人’的感觉”[1] 。归属就是理解与你共同生活的人们的默契编码，是知道你不用为自己解释就会得到理解。简而言之，人们“说着你的语言”。附带地，这就是为什么保护和捍卫民族语言是如此饱含深情的民族主义事业，因为是语言而不是土地和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归属形式，即得到理解。当然，一个人可以从不同于其自身的语言和国度中得到理解，甚至能够在流亡中找到归属。但民族主义宣称，那种完全的归属，那种温暖的感觉——人们不只是理解你说出来的，更能理解你的言下之意——只有当你身处祖国、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才有可能得到。

---

[1] 译文转引自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

世界主义与特权

如果一个人的父亲生于俄罗斯，母亲生于英格兰，在美国接受教育，职业生涯在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度过，我们很难过多寄望他成为一个种族民族主义者。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那必定就是我。我希望自己能说更多种类的语言，我希望自己在更多的国家居住过，而且我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移居国外并不是流亡：它仅仅是那些选择自己的家园而不是继承家园的人们的归属。

多年来，我相信潮流的涌动会有利于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首先，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人。至少有十几个世界性城市——巨大的多种族的熔炉——为各种各样的移居者、流亡者、移民、短暂停留者提供家园。对这些大城市里的都市职业人群来说，一种后民族的国家意识不过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地方的人们不会困扰于一起工作或居住的人的护照问题，不关心所购买商品上的原产地标签是哪里。他们只是认为，可以借用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民族的风俗，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主义者为文化借鉴打造了一个正面的伦理结论：在文化上，混血优于同族，杂交胜过地方化。

这种世界主义的伦理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自从1700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几百年以来都是全球贸易中心。全球市场一直限制着民族国家运用其主权和自由，至少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先就此现象建立理论之后一直如此，那时民族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至少从启蒙时代的文化理想国（republic of letters）[1] 以来，全球市场就存在于各种理念和文化形式中。无根的世界主义作为一种社

会形态已经在帝国时代的大城市中存在了几百年。

然而，有两个特征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城市的世界主义与过往已经消逝的那种东西区别开来。首先是它在社会和种族方面的扩展。20世纪的民主体制和战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将世界主义的特权从一小部分富裕白人男性精英扩展到发达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大量少数群体。突然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出现，而我们想分享后民族主义意识的意愿，因廉价的航空旅行和通信手段而极大地得到了增强。

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全球市场不再受一个稳定的帝国体系支配。有两百年的时间，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相继而起的帝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二战”后苏联和美国的联合帝国——的领土野心和警察权威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1989年以来，我们第一次进入一个不存在帝国秩序框架的全球化世界主义时代。

20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有三次重大的秩序变化：1918年在凡尔赛，东欧的新国家诞生于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之上；1945年在雅尔塔，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将西欧和东欧的各民族国家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1989年到1991年，苏维埃帝国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第三次变化的不同在于，其发生不是经由任何帝国的安排。没有现存条约规定东欧各民族国家的领土统一与其境内各民族的自决权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的解决，即使以捷克式的文明分手方式，也一直存在许多武装冲突。根本原因一目了然：帝国警察没有了。

美国可能是唯一还存在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人拥有的不是一种帝国权力：他们的威权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专属国家利益，而不

是维持一个全球秩序的帝国体制。因此，非洲、东欧、原苏联的亚洲诸国、拉美和近东的大片区域不再处于明确界定的帝国或超级大国势力范围内。这意味着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以一种最为残酷的方式赢得了“自决权”：他们仅仅是被扔在那里，必须自己保护自己。毫不惊讶，他们的民族国家像索马里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一样正在崩溃。在世界上从前受到帝国高压统治的一些重要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各国——人们发现自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申诉的帝国式裁决者。那么毫不奇怪，脱离了强有力的控制之后，他们为了最终的解决——这曾被帝国的存在而长期抑制——而互相攻伐。

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主义只让那些有幸生活在富裕西方的世界主义者享有后民族主义的感觉。众多小民族太过弱小，无法建立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全球主义带来的是混乱和暴力。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例子，这个族群徒劳地求助于更强大的邻居来保护他们。萨拉热窝的人民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种族多样性的虔诚信徒，但身处竞争性的各种族之间，他们缺乏可以依赖的帝国保护者或一个自己的国家来确保和平。

在波斯尼亚发生的一切，让任何相信世界主义之美德的人们都必须停下来想一想。非常明显地，世界主义是那些将一个安全的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们的特权。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帝国时代，但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民族主义时代，而且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达到这一步。伦敦、洛杉矶、纽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的世界主义秩序，严重依赖于民族国家的规则执行能力。当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就像1992年在洛杉矶骚乱中所发生的那样，公民的、世界主义的多种族城市显然跟任何东欧国家一样，极有可能爆发种族战争。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并不超越民族；而一个世界主义的、后民族主义的精神最终将总是依赖于民族国家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单就此而言，我是一个公民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必须、公民也有责捍卫国家提供安全和权利的能力——为了过世界主义的生活，我们都需要的能力。至少，对于人们为赢得民族国家而战斗所体现的残忍，世界主义的蔑视和惊诧是一种错位。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拥有特权的世界主义者长期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战斗。

---

[1] 文化理想国，指启蒙时代欧洲主要通过通信方式联结在一起的文人、思想家群体，他们共同分享某些价值理念，打造一个想象中的文化理想国度。

六次旅程

总之，关于民族主义能说的就是这些。它不是一人千面，而是千人千面。民族主义原则在某一个地方可能造成惨痛的后果，在另一个地方造成的可能是无伤大雅的或积极的结果。环境决定一切。我想要尽可能多地看看民族主义的各种面目，但去哪些地方呢？

我选择的路线是个人化的，但我想不是任意的。我选择居住过的地方，所关心的地方，有足够了解、相信它们将展现特定的中心主题的地方。

我从南斯拉夫开始旅程，因为童年的时候，我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两年，对铁托（Tito）的全盛时期有足够的了解，那个臭名昭著的词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原本应当是在这里被创造出来。对我而言，铁托35年的统治似乎不仅仅是巴尔干地区无休止的种族战争历史中的短暂和平插曲。在我曾热爱的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比邻而居。那么，是什么将邻居变成了仇敌？民族主义的狂热是如何撕裂了跨种族的包容结构，从而产生了新的分隔秩序和种族同质的国家？

我的下一个旅程是去德国，这个国家曾在浪漫主义时期发明了种族民族主义，后来又在希特勒统治下使其蒙受羞辱，现在正在努力遏制种族民族主义的现代西欧形式：白人种族主义青年党。战后的德国认为自己是公民民主，但它的公民身份法律仍然是依据种族来定义。它是欧洲最挣扎和最彷徨的社会：选择屈服于种族民族主义的过去，还是建设一个公民民族主义的未来？

在苏联的15个后继国家中，乌克兰是最大的[1]：一个核超级大国，第一次获得民族独立的经验，同时又发现要脱离俄罗斯几个世纪的统治是多么困难。对于一趟深入原苏联废墟的旅程，它是当然要选择的目的地。但选择乌克兰有个人原因。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是俄罗斯地主，曾经在乌克兰拥有一块土地。我觉得，相比回到那块土地，去看一个新的国家如何纪念我的先祖，更好的方法是探索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身份是如何在深层次上相互渗透的。

同样的个人原因让我选择了魁北克，在这里，我的俄罗斯祖父母在流亡中走到生命的终点。我最熟悉的、30年来将我的国家加拿大撕裂的民族主义，是魁北克主义。它是一种在现代化、发达的民主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一种文化和语言自决的要求，它引发了一个（与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同样有关的）基本问题：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民族（nation），并且享有高度自治，为什么你还需要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state）？

由于民族主义经常被称为某种形式的部族主义，魁北克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机会：在克里人（the Cree）——魁北克北部的一个原住民民族——之中，部族和民族意识是如何互动的，他们采用民族自决的口号，对抗魁北克在北部的经济发展计划。那么，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者如何应对在自己的内部挑战他们的民族主义呢？

正如一个克里米亚的鞑靼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所告诉我的，没有母亲的人才知道母亲意味着什么。没有国家的人才知道民族国家意味着什么。在世界上许多没有国家的民族中——从克里米亚鞑靼人（Tartars）到巴勒斯坦人——最大的一个民族是库尔德人。海湾战争中的西方军队在伊拉克北部创立了一个库尔德人的

领地，让我可以观察有限独立和自治是如何改变一个从未拥有过自己家园的民族。在库尔德人为家园的奋斗中，他们必须对抗20世纪最致命的四种世俗和宗教民族主义：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ürk）的土耳其、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伊朗、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和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ssad）的叙利亚。他们的民族主义斗争最终能将库尔德人团结到一起吗？换句话问，民族主义能够创造一个民族吗？

最后一次旅行将我带回来，思考收留我的国家——英伦群岛——被压迫得支离破碎的民族身份。观察这种压力之下的身份，还有什么地方比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街头更好呢？75年来，那里的忠诚派新教徒族群一直捍卫他们做一个英国人的权利，对抗西欧最为暴力的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共和军。忠诚派到底忠于什么？它是一种英国式的船货崇拜（cargo-cult）[2]，还是一面镜子，让英国人从中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到底是谁的扭曲图像？来到强硬的阿尔斯特[3]英国性（Britishness of Ulster）的家乡，让我可以直面所有地方的尤其是英国的世界主义者所拥有的一种核心自负，它关乎摧毁了“冷战”世界固有标志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每一个他人都是狂热分子；除了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像萨缪尔·约翰逊[4]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那么后民族主义以及相伴随的对他人之民族主义感情的蔑视，可能是世界主义最后的避难所。

---

[1] 原文如此，苏联的15个后继国家中，国土面积最大的是俄罗斯，其次是哈萨克斯坦，之后才是乌克兰。——编者注

[2] 船货崇拜，指土著社会中对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外国货物的一种崇拜。

[3] 阿尔斯特，古爱尔兰省份，现分属爱尔兰共和国的阿尔斯特省和北爱尔兰的六个郡。阿尔斯特是古爱尔兰最后归服英国的地区，但归服之后受当地种植园

的吸引，许多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前来定居，导致后来新教徒在阿尔斯特占据多数，成为爱尔兰忠诚派的主要根据地。1921年《英爱条约》签订，阿尔斯特的六个郡组成北爱尔兰。

[4] 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文学家、评论家、诗人。

1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图1　亚塞诺瓦茨集中营，“乌斯塔沙”正在一个万人坑旁处决囚犯。1941—1945年间，克族人的“乌斯塔沙”组织在此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塞族人，塞族和克族在死亡人数上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图2　2015年4月，亚塞诺瓦茨博物馆“大屠杀”纪念碑前。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欧洲几国领导人聚集在亚塞诺瓦茨，为大屠杀死难者哀悼。而不过在二十多年前的1991年，该馆在波黑战争交战双方间几度易手，双方均对其做出破坏行为



图3　1993年，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一位妇女正从两军交火最严重的“狙击巷”穿行而过



图4　1993年，一位妇女清晨在战争死难者坟场中为一位死去的亲属哀悼，人们常常选择在清晨前往坟场，浓雾能为他们抵挡随时可能出现的扫射



图5　一个克族士兵在萨拉热窝市中心向街对面的塞族士兵开火，以保护周围的平民



图6　年轻时的米诺万·吉拉斯，右二。摄于1942年



图7　阿尔坎（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与他的“猛虎军”。1991年的克罗地

亚战争中，他们在东斯拉沃尼亚一路强奸劫掠，但他当选国会代表，并走私汽油

旧秩序

我记得，早餐时的野草莓是用银杯盛放端上来，然后是加了杏黄酱的热面包卷。餐厅面对着湖，窗户打开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山里的空气拂过水面，拂过白色的亚麻桌布，然后，拂过你的面庞。

宾馆名叫托普利斯（Toplice），位于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Lake Bled）畔。外交使团在这里度过夏天，守候居住在湖对岸的独裁者。我的父亲跟其他外交官一样，来这里收集小道消息和享受温泉。每天早晨，他在宾馆下面的热水池里洗浴。我打网球，吃野草莓，在湖上划船，还暗恋着一个难以接近的12岁瑞典女孩。这些就是我对“旧秩序”[1] 的回忆，它们来自共产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在我们餐厅的底层，听到后来的外交部长柯卡·波波维奇（Koča Popović）温文尔雅地用一个象牙烟嘴抽着烟说他的党的部门如何“清洗切特尼克（Chetniks）”——战争末期曾经站在希特勒一边作战的塞尔维亚人。在此之前，我从未听到过“清洗”这个词如此使用。

连我都能看出，共产党精英之所以赢得权力，显然不只是通过打败外国入侵者，还通过在残酷的内战中取胜。现实显而易见，铁托的国家是个警察国家。我们住在德丁谢（Dedinje），一个傍山的可以俯瞰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郊区，离铁托的住所只有几百米远。无论走在哪里，都有穿着便衣的人在附近游荡，或是小声地用对讲机说话。铁托自己是整个体制的隐形上帝。他有梳饰光滑的头发，长期晒成古铜色的皮肤，闪亮的丝质

西装，手指上戴着黑玛瑙戒指，我父亲说他和德国繁华南部的冰箱推销员再相像不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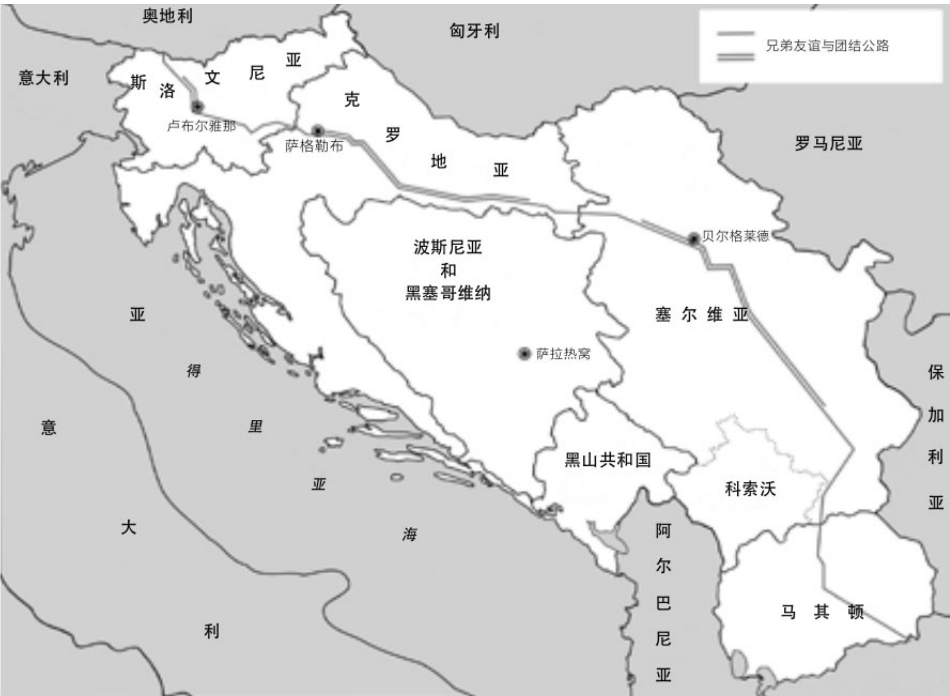
显然他比推销员有想象力得多，邪恶得多。我记得，在亚德里亚海的游船上，我的父母是如何躲着船员隐藏一本书的——锁进行李箱里面，藏在铺位底下。这本书原来是米诺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 ）。吉拉斯，铁托的亲密战友，因为谴责铁托的独裁倾向，当时仍被关在铁托的监狱里。

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走遍了南斯拉夫的每个地方：穿过波斯尼亚的山村，那里衣衫褴褛的赤脚孩子们围着汽车；去了萨拉热窝（Sarajevo）的大清真寺，我在那里脱了鞋子，跪下来，看老人们前额叩在地毯上诵念祈祷文；去了达尔玛提亚（Dalmatian）群岛和海滩，那时西方的游客还不曾访问那里；去了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塞尔维亚南部的部分地区、波斯尼亚中部和黑塞哥维那的西部是那么的贫穷，我们根本不知道普通人是如何生存的。与此对照，卢布尔雅那（Ljubljana）[2] 和萨格勒布（Zagreb）[3] 则是整洁、繁荣的奥匈帝国时代的城市，似乎与南斯拉夫中部贫瘠、荒凉的内陆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那个时候，所有经济上的不满和民族主义意识自身都处在铁托的压制之下。不管愿意不愿意，在“兄弟友谊和团结”的旗帜下，社会向前发展。如果将自己首先视为一个克罗地亚人或者塞尔维亚人，其次才是南斯拉夫人，有被作为民族主义者或者沙文主义者抓起来的风险。

我不知道，民族身份和南斯拉夫身份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么复杂和模糊。举个例子，我知道我在布莱德的网球教练米托德

（Metod）总是称自己首先是一个斯洛文尼亚人。我记得，他痛苦地说自己痛恨在南斯拉夫国防军中服役，因为他和他的兄弟都因为身为斯洛文尼亚人而被塞尔维亚人欺凌过。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地区示意图 [4]

那是唯一一次我看到裂缝将变成鸿沟吗？我想是的。在其他任何地方，我记得人们都快乐地告诉我，他们是南斯拉夫人。回想起来，我在那里时是当地最有希望的时候。铁托仍然因为使国家保持在斯大林的帝国之外而受到热捧，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初现端倪；很快接下来是放开旅行，让数百万南斯拉夫人出国工作，一时使南斯拉夫成为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最自由的。

先暂停我对“旧秩序”的回忆。现在每个人都说向地狱的坠落

不可避免。在那时，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的童年时代告诉我，一切并非无可避免：就是这一点，让发生的一切变成悲剧。

---

[1] 原文为法文Ancien Régime。

[2] 斯洛文尼亚首都。

[3] 克罗地亚首都。

[4] 本书共6幅地区示意图，均出自原书。——编者注

微小差异的自恋

正如巴尔干民族主义者所说，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命运。例如，克罗地亚人会解释说，巴尔干杀戮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本质上”是天主教，源于欧洲和奥匈帝国，而塞尔维亚人“本质上”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和斯拉夫，附加了一些土耳其人的凶残和怠惰。作为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分界线的萨瓦河和多瑙河，从前也是划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

如果一再强调这种历史的断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冲突就会被解读为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巴尔干地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过去如何指明现在，而是现在如何操纵过去。

弗洛伊德曾经提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实际差异越小，这种差异必定在他们的想象中显现得越大。他将此称为微小差异的自恋效应（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其结果必定是，敌人之间互相需要对方来提醒他们自己实际是谁。因此，一个克罗地亚人就是一个不是塞尔维亚人的人，一个塞尔维亚人就是一个不是克罗地亚人的人。没有对另一方的仇恨，就不能清晰地界定顶礼膜拜的民族自身。

在克罗地亚，弗洛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的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党（HDZ，Croatian Democratic Alliance）标榜自己是依照巴伐利亚基督教民主党（Bavarian Christian Democrats）模式建立的一个西方式政治运动。事实上，图季曼的政权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塞尔维亚政权的相似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方与西欧议会模式的一切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后共产主义的一党国家，民主只不过意味着其

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他们操控大众情绪的技巧。

局外人不会震惊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差异，而是会震惊于他们看上去多么相似。他们说同样的语言，只有几百个词汇的小差异，数百年以来保持相同的乡村生活方式。尽管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东正教，但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显著地减少了忏悔形式的差异程度。双方的民族主义政客接受了微小差异的自恋，将其转化成一个魔鬼寓言：自己的一方显然是不应谴责的受害者，另一方则是大屠杀的刽子手。所有的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沙刺客，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成了切特尼克野兽。不用说，这样的意识形态准备，是紧随其后的屠杀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

然而，对于巴尔干的悲剧，真正难以理解的仍然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谎言是如何成功落地生根的。因为一般人都知道它们是谎言：不是所有的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沙，不是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是切特尼克。即使人们使用这些词语，他们也知道不是真的。我们无须一再重复：这些人曾是邻居、朋友、配偶，不是不同种族星球的居民。

双方都有民族主义少数派研究他们相互深度纠结的共同过去，告诉所有人（包括局外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从远古时期就开始相互残杀。历史没有教授这样的课程。实际上，主角们在他们过去的大多数时候，是被分隔在各自的帝国和王国之中的。只是到了1928年，克罗地亚政客在贝尔格莱德议会被刺杀 [1] ，他们才开始在“二战”中陷入种族战争。尽管现在的冲突当然是1941—1945年内战的延续，但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在这之间有几乎50年的种族和平时期。那不仅仅是停战。即使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和平会被打破。

而且，将这次战争[2]或者1941—1945年的内战视为某种巴尔干特有的邪恶，也是错误的。所有将邻居变成敌人的妄想都是从西欧的源头输入的。现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可追溯到无可指责的、拜伦式的反抗土耳其人的民族起义。同样，19世纪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思想家安特·斯塔切维奇（Ante Starčević）间接从德国浪漫主义那里获得纯粹种族的克罗地亚国家理念。巴尔干地区的不幸部分在于一种想成为好欧洲人的悲伤渴望，那就是，输入西方残忍的时髦思想。这些时髦思想在巴尔干被证明是致命的，因为只有通过撕裂巴尔干乡村生活的多元组织——以粗暴的种族纯洁梦想的名义——民族统一才能实现。

同样，甚至巴尔干地区的大屠杀也不是地区特例，而是从宏大的西欧传统进口而来。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ć）在战争时期的乌斯塔沙政权如果没有德国纳粹政权的支持——更不用说高高在上的欧洲权威天主教会的暗中认可——连一天的统治也无法维持，而塞尔维亚人认定它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真实面目。

因此，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将巴尔干地区解读为一个顽固狂热的次理性区域，我们就是在为自己辩护。而且，如果我们断定地区性的民族仇恨根植于历史之中，必定会爆发民族暴力，我们将在应当开始追寻答案的时候止步。正相反，这些人必须从邻居转变成敌人。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许会理解南斯拉夫。亲身经历过宗教内战的霍布斯会说，当人们足够恐惧的时候，他们将无所不为。有一种恐惧比其他任何恐惧都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即当一个国家开始崩溃时的系统性恐惧。种族仇恨是合法性权威解体所导致恐惧的结果。

铁托实现南巴尔干地区六个主要民族中每一个民族的统一。他明白联邦国家是满足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抱负的唯一和平途径，每一个自行统一的共和国都不得不启动强迫性的人口迁移。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有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一直居住在他们的共和国边界之外。铁托创造了一种复杂的种族平衡，例如，减少塞尔维亚人在联邦体系的核心贝尔格莱德的影响力，同时推动塞族人进入克罗地亚的权力高层。

铁托对民族主义的遏制建立在个人独裁的基础之上，因而在他死后不可能延续。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的社会主义口号“兄弟友谊和团结”已经被置若罔闻。1974年，他与民族主义妥协，允许各共和国在新宪法下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到他统治末期，用来在各共和国精英之间平衡种族扈从关系的南共联盟自身也按照种族条线分裂了。

这一分裂不可避免地导致铁托未能令以公民为基础而非以种族为基础的多党竞争得以出现。如果铁托在60年代或70年代容许一种公民政治，一个非种族的政治归属原则或许会落地生根。铁托一直坚持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但最终，他的政权与东欧其他国家没什么区别。由于未能容许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文化走向成熟，铁托使其政权的垮台变成了整个国家结构的崩溃。在废墟之上，他的后裔和继承者们返回到最原始的政治动员原则以求得生存。

如果南斯拉夫不再保护你，也许你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或斯洛文尼亚伙伴会。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信念使得普通人变成不情愿的民族主义者。但大多数人都不想这样，大多数人知道，他们冲向自己族群寻求保护时有片刻退缩，他们的正常生活就会加速瓦解。

种族差异本身不对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出现的民族主义政治负责。只有当幸存下来的政治精英——首先从塞尔维亚开始——开始为掌握权力而操纵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种族差异意识才转变成民族仇恨。

这值得强调，因为大多数局外人认为，所有的巴尔干民族都根深蒂固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事实上，许多人痛心地哀悼南斯拉夫的消逝，恰恰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给予他们空间，令他们可以以非民族主义的方式界定自己。在一篇辛酸悲痛的文章《被民族性征服》（*Overcome by Nationhood* ）中，克罗地亚作家斯莱文卡·德古丽琪（Slavenka　Drakulić）描述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她还总是按照教育、职业、性别和个性界定自己。只是1991年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战争爆发之后，疯狂的气氛才最终将她所有的身份标志都剥离，只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而存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真实本质与乡村居民并无二致。精英的民族主义语言游戏似乎只是为他们的恐惧和自豪发声。事实上，民族主义最终令巴尔干地区的每个人都陷入“纯粹”种族身份的幻想中。那些拥有多重身份的人们，例如混合婚姻的人，被迫在先天遗传的家族和后天结合的家族中选择，也是在两种已经融入他们自身的因素中选择。

历史地看，民族主义和民主曾形影不离。毕竟，民族主义是一种信条，即一个民族有权治理自己，并且主权只在他们自身。巴尔干地区的悲剧在于，当民主最终可能之时，剩下来唯一能够动员民族参与一个共同社会之规划的语言，是种族差异的花言巧语。与种族对立的公民民主的任何可能性已经被扼杀在摇篮中。

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是第一个打破铁托禁令、以种族意识进行大众动员的南斯拉夫政客。米洛舍维奇将自己描

绘成既是对抗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分离主义野心、捍卫南斯拉夫的人，又是为同一个南斯拉夫对塞尔维亚所犯错误复仇的人。

米洛舍维奇的计划首先开始于1986年的塞尔维亚艺术科学院备忘录（Serb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Memorandum）[3]，其后始终如一，即在铁托的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如果其他的共和国不同意由塞尔维亚主宰的新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准备煽动科索沃、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少数族群叛乱，要求塞尔维亚的保护。这些少数族群充当了米洛舍维奇的“苏台德德意志人”角色，这是他扩张计划的借口和理由。

这些是显而易见的，更复杂的是米洛舍维奇的计划和塞尔维亚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塞尔维亚人妖魔化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米洛舍维奇只是对他们的种族狂热做出反应，事情会简单很多。现实远为复杂。尽管仍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因素，例如像切特尼克们仍沉浸在对铁托反对他们的战时领袖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jlović）之斗争的仇恨之中，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多数都市塞尔维亚人几乎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狂热，他们甚至对远在克宁（Knin）[4]、帕莱（Pale）[5]、科索沃（Kosovo）或西斯拉沃尼亚（Western Slavonia）的乡村同胞缺乏兴趣。

因此，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塞尔维亚普通民众对塞尔维亚问题的冷漠会转变成狂躁的焦虑：流散在外的塞尔维亚人将会被有种族灭绝倾向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消灭。当然米洛舍维奇是利用“塞尔维亚问题”为自己的煽动目的服务。但塞尔维亚问题不是米洛舍维奇的创造，它是随着铁托南斯拉夫的崩溃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旦多种族的国家解体，每一个

身处自己共和国境外的民族群体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身临险境的少数民族。随着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崛起，作为最大的一个此类族群，塞尔维亚人尤其感到脆弱。

尽管克罗地亚像斯洛文尼亚一样，宣称支持一个松散南斯拉夫联邦的出现，但事实上两个共和国都在80年代末期启动独立进程。导致民族自决的动力受到经济仇怨的推动。南斯拉夫在60年代和70年代扩张，随着其代价开始显现，外债增加，最富裕的两个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开始抱怨他们的经济成果被摘走，用于为发展迟缓的波斯尼亚和“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付账。铁托对1970年克罗地亚之春 [6] 的压制，以及米洛舍维奇的扩张主义行为——尤其是塞尔维亚吞并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Vojvodina）自治省——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确信，他们在南斯拉夫联邦内没有任何前途。地方知识界和共产党精英中出现了强烈的独立诉求：独立会让他们成为小地方的大人物。

克罗地亚人要求民族自决权，他们很快从新近统一的德国得到有力的支持。但德国或者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中没有人充分审慎地考虑克罗地亚的独立对于60万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的含义。

克罗地亚的独立宪法将自己表述为克罗地亚民族的国家，非克罗地亚族为受到保护的少数民族。尽管绝大多数克罗地亚人真诚地相信他们的国家为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提供完整的权利，但塞族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少数民族，而认为自己是受到宪法保护、与克族人平起平坐的民族。当克罗地亚人恢复红白方格盾牌的萨沃尼卡（Šahovnica）旗作为他们的新国旗时，塞族人第一眼看到就相信，乌斯塔沙回来了。萨沃尼卡既是纯正的克罗地亚

人传统徽章，也是“二战”时期政权的旗帜，这个政权处死了大批塞尔维亚人，具体数字至今未知。1990年夏秋之际，当塞族人从克罗地亚警察局和法院被遣散时，塞族少数民族断定他们将见证一个拥有大屠杀过去的种族国家的回归。

克罗地亚人一方的辩护者们坚持认为，这些恐惧受到了米洛舍维奇的操控。确实是这样，但身处跨种族的南斯拉夫国家崩溃的大环境下，塞族人有理由感到恐惧。战争是塞尔维亚扩张、克罗地亚独立和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的种族狂热共同交织之旋涡的结果。

战争最终爆发是在1991年夏季，由克罗地亚塞族聚居区试图控制当地武力（即警察局）的关键位置的争斗所引爆。在塞族村庄，比如西斯拉沃尼亚的博罗沃塞洛（Borovo Selo），当克罗地亚国家遣散当地的塞族警察时，他们继续保留武装，开始让自己成为暴徒。克罗地亚人试图恢复自己在塞族区的权力，但遭到枪击，塞族人在村庄入口设置了路障。克罗地亚人无法控制本国的塞族区域，南斯拉夫国防军介入，首先是恢复秩序，然后粉碎克罗地亚的独立。克罗地亚别无选择，只有为生存而战。经过六个月的顽强抵抗，1992年2月停火的时候，克罗地亚发现自己三分之一的国土被所谓塞尔维亚克拉伊纳（Krajina）共和国占领，通往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供给线被克宁的塞族民兵阻断。在散布于克罗地亚所有主要道路网的检查站，有2.5万名联合国部队将两方隔开。克罗地亚的战争平息下来，进入武装停战状态，但塞族和克族的小规模冲突在萨瓦河南岸肆虐，双方交战目的是以牺牲穆斯林为代价分割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1]　1928年8月8日，一名塞尔维亚激进党成员暗杀了克罗地亚最大党派克罗地亚农民党（HSS，Hrvatska Seljacka Stranka）的领袖，击伤另一名国会成员。

这次暗杀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党派之间的所有政治关系均中断。塞尔维亚国王于1929年1月6日宣布建立专制，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令，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改名为南斯拉夫。

[2] 指1990—1995年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

[3] 1986年，塞尔维亚艺术科学院公布一份备忘录，谴责南斯拉夫联邦老一代领导人的民族路线损害了塞尔维亚人的利益，提出全民公决等民族主义性质诉求。备忘录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4] 克宁（Knin），克罗地亚南部城镇，中世纪克罗地亚国家、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国曾以此为首都。

[5] 帕莱（Pale），波黑东部塞族聚居城镇。

[6] 1970年开始，克罗地亚出现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至1971年11月达到高潮，引发大学生罢课浪潮。铁托对运动强力压制，并对暗中支持运动的克罗地亚领导人进行大清洗。

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

在南斯拉夫开启我童年时代的每个夏季的地方——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之间的公路上，我开始我的旅程。这是我们曾经旅行的道路：坐着华丽的黑色别克车——带有许多尾鳍和镀铬的车——去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它曾被称为“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它的修建是典型铁托式的、真正的民族狂热和社会主义劳动的混合，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核心共和国的经济联结在一起。它有300英里 [1] 的路程与萨瓦河并驾齐驱，穿过斯拉沃尼亚平原，这是欧洲最为平坦、最为富饶的土地之一。

我在斯洛文尼亚边境下了“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首先参观铁托在库姆罗维克（Kumrovec）的出生地，那是在克罗地亚东北部的山区，以其白葡萄酒的辛辣和人民的好辩而著称。

库姆罗维克保持得很像我20世纪50年代在贝尔格莱德看过的社会主义新闻影片。阳光照耀，苹果花在春风中摇曳。农民们坐在干草拖车上驶过村庄。在涂成白色的农舍外面，有一座党的英雄铁托的青铜雕像，穿着大衣，沉思着大步向前。伟大领袖就诞生在这个房子里面，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完美的南斯拉夫出身）。我看到玉米填充的床垫，他也许曾经睡过；他在奥匈帝国一个学校里的成绩单；30年代他当共产国际特工时的照片；他曾在游击战争中使用的假瑞典护照；他的望远镜；他白色的党的豪华制服，缀有红色和金色的肩章；战争年代的作战地图，表明有多少游击战争是在现在波斯尼亚战争肆虐的地方进行的；他在战后作为不结盟运动领袖所做的“和平旅行”，访问过的每一个首都都标有一颗红星。有一些地方，比如开罗和新德里，每个城市有12颗红星，而遥远的地方，像智利的圣地亚

哥或者加拿大的渥太华则只有一颗。

当地学校的老师领着我参观，这是一个矮小、神情黯淡的男人，像个酒徒一样有红红的眼眶和暴突的静脉。我问他的名字，他紧张不安地微微鞠躬。

“伊万·布罗兹（Ivan Broz）。”

“那么你是他的亲戚？”铁托是个化名[2]，他的家族姓氏是布罗兹。

“一个远亲。”伊万面无表情地说。但后来，当给我展示元帅党的制服时，他悄声说：“有一次我们把它从展示柜里拿出来除灰，我试穿过。”他偷偷地看看周围，微笑着露出黄色的牙齿：“完全合身。”

他是否亲眼见过铁托呢？有过一次，他说，当时铁托带尼克松总统来看他在库姆罗维克的卑微起点。伊万那时候是个学生，被选中献花给尼克松夫人，而另外一个女孩被选中献花给美国总统。有好几周的时间，他们接受鞠躬和屈膝礼训练，然后，伟大的时刻到来，一瞬间就完成了。“后来，那个女孩收到了总统送的一套钢笔和一张签名照片。我什么也没得到。这就是生活。”

但铁托呢？

伊万记得铁托的眼睛盯着他。“他是一个政治家，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想知道人们是否还来这里参观。哦，是的，伊万给我肯定的回答。但这个地方空荡荡的。停车场里没有车子，公园里没有

家庭在野餐。除了我，没有人对着这些展品沉思。

在一个展示柜中，有一张铁托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照片，他坐在一个写有“南斯拉夫”的小牌子后面。不知道是谁粗暴地用圆珠笔把国家的名字涂抹掉了。

“为什么？”我问。伊万耸耸肩：“现在这个名字在克罗地亚不受欢迎。”他只敢说到这里。

“你对克罗地亚，是不是一直比对南斯拉夫更有感情？”我问他。“一直是。”铁托这位伤感的亲戚说。

回到“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上，很快我开始了解这是条多么奇怪的公路。首先，所有绿色的目的地指示牌都被涂抹掉了。我在其中一个牌子前面停下来，仔细察看。指示牌显示我正前往利波维奇（Lipovac），但我揭开上面利波维奇的标签时，贝尔格莱德字样出现在下面。公路确实仍然通往塞尔维亚首都，但就克罗地亚而言，那个目的地消失了。因此，正式地说，我是在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路上。

过了萨格勒布大约40多公里，克罗地亚的车流开始驶向出口，把这条公路留给我。很快我就是这条路上唯一的民用车辆了，此外还有联合国的吉普车和卡车从萨格勒布出来驶向沿途的检查站。一条四车道的豪华高速公路全归我所有。我停车，下车，穿过双向车道，再回来。没有一个人。然后我上车，将车子加速到115英里/小时[3]，感到充溢着青春的快意。我呼啸着冲向一个收费站，只见收费站的玻璃都被砸碎了，收费亭里空无一人，而危险警示灯仍在闪烁。我倒车，然后以全速冲过收费站。

除了鹰，我没有其他的同伴。它们在废弃的公路上方盘旋，

猎寻在杂草丛生的公路边缘潜行的田鼠和野猫。但时不时地，我可以感觉到望远镜反射的阳光闪过，那是克罗地亚的侦察小组潜伏在高速公路的出口斜坡上。他们一定奇怪一辆民用车为什么用这条被废弃的高速公路延伸段作为赛车车道。

我的车是奥地利车牌。如果用克罗地亚或是塞尔维亚车牌，我无法通过前方任何一个检查站。我还带有联合国维和部队（UNPROFOR）的通行证，那是我将要进入的联合国保护区的重要证件。车子行李厢里有几罐备用的汽油，帮助我通过塞族区，那儿已处于汽油禁运之下。汽油罐边上还有一件防弹衣。我穿过一次，马上就脱了。它笨重得可笑，而且事实上没什么用。穿上它，你能想到的全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暴露着。而且，汽油已经漏在防弹衣上，我敢保证如果我穿上它时被击中，我只会变成一团火苗。

在萨格勒布以东大约70公里的地方，我发现了第一个战争的迹象：中央隔离带的护栏被毁坏了，散落在一条车道上。然后我开始看到坦克和装甲运兵车通过之后在路面上留下的痕迹。再向前，路上布满了迫击炮轰击后的碎片和弹坑。在高速公路的一座桥梁上，我发现了第一条横幅标语，在四个角上各有四个斯拉夫大写字母“C”，代表塞尔维亚格言：“只有团结才能拯救塞尔维亚人。”[4] 在另一座公路桥上，我看到代表乌斯塔沙的“U”，还有方格旗萨沃尼卡。我的左边有一辆生锈的、燃烧殆尽的巴士，侧翻在出口匝道上，车顶被某种炮火掀掉了。我已经到达了交战区的边缘。

---

[1] 约483公里。——编者注

[2] 原文为法文nom de guerre。

[3] 约185公里/小时。——编者注

[4] 塞尔维亚国徽标志中心为带有四个“C”字的十字架，意为塞语“СамослогаСрбинаспасава”（Only unity Saves the Serbs，只有团结才能拯救塞尔维亚人）。

亚塞诺瓦茨

萨格勒布以东70公里，在诺夫斯卡（Novska）的约旦人指挥部，一辆联合国吉普车与我会合，引导着我的车经过一条遍布弹壳的匝道，越过一座浮桥，穿过塞族和克族的检查站，带我到达一座被轰炸过的建筑物残体，这里过去是亚塞诺瓦茨（Jasenovac）博物馆和纪念中心所在地。

1941—1945年间，火车停靠在铁路尽头的站台上，另一边是广阔、低缓的沼泽平原，向下倾斜到萨瓦河边。犹太人和塞族人、吉卜赛人和克罗地亚共产党人从密闭车厢中成群地被赶出来，推下站台，前往铁丝网后成排的营房。他们被送到砖瓦厂工作。当他们被榨取殆尽后，就被埋在砖窑里，或者从脑后被射杀，然后扔入萨瓦河中。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博物馆后面这片荒芜的旷野——曾经矗立着营房和铁丝网的地方——死去。塞族人和克族人竟然连这也不能达成一致。塞族人坚持认为数字是70万人，在克罗地亚中部，没有一个塞族村庄不曾在这里失去过人命。克族人坚持这个数字不会超过4万。独立研究人员把在亚塞诺瓦茨被处死的人的数字加总，得到的结果是大约25万人，但没有人能予以确定。

两族人甚至对两年前（1991年）战火燃烧到亚塞诺瓦茨时发生的事情都难以达成共识。因为我正走进一个被彻底摧毁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都被撕碎了扔在地上，每一个玻璃展柜都被砸碎，每一张图片都被涂过，每一份文件都被从抽屉中抽出来，每一张桌椅都被翻倒，所有的窗帘都被撕成碎条，所有的

窗户都被砸碎，所有的墙壁都被粪便和标语弄脏。做这些事情的人被某种奇妙的对过去的仇恨所驱使。通过摧毁博物馆，他们似乎希望能够摧毁对这里发生的事情的记忆。

1991年10月，数千名克族武装人员曾驻扎在博物馆，可能是他们摧残了这个地方，但墙上也有塞族人留下的涂鸦，他们炮轰了这个中心，从克族人手中将它夺回来。

我费力地穿过各个房间，在被撕碎的书本和图片中跋涉而过，我可以用它们艰难地拼凑出展览曾经的样子。地板上，有一张一群囚犯待在铁丝网后面的图片，边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她梳着辫子，倚在护栏边。再边上有一张高级教士和纳粹党卫军军官握手的照片，压在一堆被撕碎的囚犯档案的最上面。而在这旁边，是被撕成碎片的铁托肖像。南斯拉夫的整个历史似乎都躺在我脚下这堆散乱的玻璃和杂碎中。

我可以想见，孩子们要理解博物馆讲解员告诉他们的东西有多么困难。他们的画散落得到处都是：用明亮的水彩画的铁丝网、营房、警卫，在砖厂里行走的骷髅，这些就是从一个9岁大的孩子眼中去看、试图去理解的东西。

在一堆玻璃和石头的杂碎中，我找到一些胶片的碎片，是从博物馆电影院的放映机里扯出来的。蹲在这堆杂碎旁，我拿着胶片，透过天空穿过破碎窗户的光线看过去。在一卷胶片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老年男子哭泣的一帧接一帧的画面。另一卷上有一个饥饿的妇人在路上蹒跚而行。还有一卷胶片有18帧画面是一个无头的尸体。

光线从演剧院屋顶一个弹洞的缝隙穿过来，在烧焦的座位、

电影屏幕、墙板的残渣中，唯一仍然站立的是一个讲台。讲台前面有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的字，意思是：永志不忘。

我走到博物馆后面的原野，那里现在散落着炮弹壳体；走向铁路车厢，它们的通风管道被用铁丝网封住了。我问自己，这样一个地方是如何把空气抽出来，把里面的人毒死的？

1945年以后，铁托将集中营推平，希望塞族人和克族人能够忘却。后来，到60年代，铁托认为伤口已经愈合，开放了纪念中心。但即使有学校参观、演讲、放映电影等一切，南斯拉夫从未对这里发生的事情达成一致。过去仍然未被了解、未被原谅。

如果说1990年5月宣告成立的新的克罗地亚国在通向战争的道路上犯了一个核心错误的话，那就是它错误地公开否认乌斯塔沙国及其在亚塞诺瓦茨所做的一切。自由克罗地亚的总统弗洛尼奥·图季曼年轻时曾经作为游击队员与乌斯塔沙作战，但在独立的狂热中，他试图将所有克罗地亚的苦难过去统一成一个所谓的民族综合体（national synthesis）。所以他从未来过亚塞诺瓦茨。他从未下跪，像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奥斯维辛所做的那样。[1] 如果他这样做了，塞族人和克族人可能已经开启终结过去的进程，而不是一遍一遍地重温过去。因为图季曼没有来这里，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才会被贝尔格莱德和他们的地方领袖操纵，相信一个新的克罗地亚是法西斯乌斯塔沙的回归。

当说到图季曼应当为亚塞诺瓦茨赎罪的时候，塞族人嗤之以鼻。他们说："你疯了吗？"他的党受到来自国外如多伦多、墨尔本等地的克罗地亚人资助。他们是些什么人？老乌斯塔沙。

但直面过去的问题远比这个深刻得多。战时的乌斯塔沙国是

克罗地亚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第一次体验。要让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否认一个曾是法西斯的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相反，克罗地亚人集体逃避这个问题，要么将乌斯塔沙的暴行视为塞尔维亚的宣传，要么玩弄统计手法减少在这里死去的人的数量，将暴行淡化成一般罪行。最后，正如所示，一些克族人对付亚塞诺瓦茨的办法是试图摧毁它的遗迹。

人们常说，侵略开始于拒绝，而暴力起源于罪恶。一个不否认其法西斯过去的民族才有可能谴责自己走向法西斯的未来。确实如此。但还有另一个同样的禁闭机制在发挥作用。如果你的敌人们叫你法西斯的次数够多，你也会管自己叫法西斯，接受你的敌人的侮辱，把它变成一个自豪的徽章。此前几个星期，有多少次我在检查站碰到克罗地亚人说："他们叫我们乌斯塔沙，那好吧，我们就是乌斯塔沙。"塞族人也是这样。"你们叫我们切特尼克，那我们就是切特尼克。"双方在一个向下的旋涡中实现了共谋，互相作用，自我贬低。这个旋涡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太了解了，那是怯懦的最为普通的一种形式——对过去说谎。

但那还不是全部。亚塞诺瓦茨也不是压迫的全部真相。关于战时的克罗地亚，它不是可以提及的全部。如果克罗地亚人不能承受亚塞诺瓦茨，那不仅仅是因为以他们的名义所做过的一切，也是因为所纪念事物的片面性。在亚塞诺瓦茨，铁托的南斯拉夫只将克罗地亚人作为杀人者来记住，从未将其作为受害者。1945年5月，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向克罗地亚东北部和斯洛文尼亚进军之前，克罗地亚人在出逃时有成千上万人被屠杀，铁托从来没有在其中任何一个大屠杀墓地建立过一个纪念中心。亚塞诺瓦茨的罪恶变得不可承受，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沉重，也因为它的

不公平。在亚塞诺瓦茨，你开始认清，关于过去的谎言最终摧毁了铁托的南斯拉夫。谎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反抗德国占领的民族起义。事实上，它是南斯拉夫人之间的内战。战后的南斯拉夫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治愈战争的创伤。

亚塞诺瓦茨是一个沉思你所承继的自由主义虔诚的地方。在我童年时代的某些时候，我一定曾被教导说，说谎最终会让你生病。当瓦茨拉夫·哈维尔说人们需要生活在真实中，他也是在说，如果各民族不能就过去达成一个共同的、真实的版本，不要期望他们会凝聚成团。但有些民族的过去很难共享，他们需要几个世纪来忘记曾做过的事情。要寻求真相，寻求共同的真相，可能要求太高了。南斯拉夫可能就是一例。50年的时间不足以忘却。

不管情况如何，当你站在一座被摧残的博物馆中央，很难继续相信历史真相的治愈力量。某种比真相更强大的黑暗灵魂在这里起作用，它也在你开车离开亚塞诺瓦茨的道路上起作用。去诺夫斯卡，你经过一座又一座塞族人的房子，它们全都被炸毁了，旁边是毫发无损的克族人的房子和花园。当你转向里皮克（Lipik），轮到所有的克族人房子被炸毁或者被燃烧弹烧毁，紧邻着没被触动的塞族邻居。在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路上，种族清洗的致命逻辑展露出来；在一个又一个村里，他们揭开了共同伤口之上的疤痕。

---

[1] 原书如此，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在访问波兰期间于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而非在奥斯维辛。——编者注

哭吧，女孩，哭吧

我现在在克罗地亚中部，从前欧洲最复杂的多种族聚居区之一的核心，克罗地亚人为多数民族，塞尔维亚人为少数民族，此外还有几个其他群体：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1991年的战争将这些村庄撕裂，现在它们被区分成克族区和塞族区，中间是联合国的检查站。

从“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通向北部的所有道路上，不管在哪儿，你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毁灭地带。被削去屋顶的房子，小瀑布般倾泻下来的屋瓦和房梁散落在荒芜的、长满杂草的房间里；火烧过的窗户和门框，轮胎大小的弹坑穿透了砖墙。有些房子被那么多的自动武器火力洗劫过，以致灰泥完全脱落了，只剩下布满弹痕的砖，房子外面的树干仿佛穿着闪闪发亮的金属弹头的夹克。壕沟里躺着南斯拉夫的红旗牌（Zastava）小型轿车，上面布满了弹痕，或是被坦克压得弯曲成了生锈的雕塑。

一开始，破坏似乎毫无章法和原因。在一些村庄，剩下的墙壁没有一座不是布满了弹痕，而在其他一些村子里，几乎没有房子被动过。不一会儿，你开始像建筑学家一样工作，细细研究各种痕迹，辨识所发生的事情的模式。看上去有三种典型的破坏模式。最像外科手术式的是炸毁：房子被整齐地摧毁成堆，对于相邻的房子损害最小。家庭成员被他们的邻居或者武装民兵驱赶出来，然后炸掉他们的房子。这些被炸毁的残堆有许多似乎曾是大型的、最近修建的房子；它会让你惊奇男人或女人的生命能有多少年，就像一个德国汽车厂的外籍工人来到这房子，只看到它像一副纸牌一样倒下来。

破坏的第二种模式看上去是由炮兵火力完成的，南斯拉夫国防军的大炮在克罗地亚的村庄墙壁上轰出了圆形的、轮胎大小的洞。第三种模式的破坏是燃烧弹，所有的窗户都留下了燃烧的痕迹，这必定是双方大肆掠夺的民兵的杰作。

有一些房子被塞族画上了代表乌斯塔沙的“U”字标语，这是把它们作为种族清洗的标志。其他房子标有曾住在里面的人的名字，是潦草地急急忙忙喷涂上去的，仿佛这些房子被抛弃了，它们的居民希望提醒守卫者，他们属于同一阵营。喉咙里满是尘土，脚下有玻璃破碎的声音，我在这些废墟上逗留了几个小时，破解灾难情形的各种线索。

不要认为种族清洗只是失去了控制的种族仇恨，只是巴尔干的疯狂。它有其深层逻辑。在1990年，南斯拉夫的这一部分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这些村子里没有人能够确定谁会保护他们。如果他们是塞族，有人袭击他们，他们去找克罗地亚警察，克族人会保护他们吗？如果他们是克族，生活在塞族的村子里，他们会得到保护、避免遭受塞尔维亚民兵小组（常常由以前的警察带领）的夜间袭击吗？这是种族清洗能产生其逻辑之所在。如果你不能信任自己的邻居，将他们赶走；如果在他们中间你无法居住，就住到自己人那里去。仅此似乎就可以给人们提供安全，仅此就可以缓解像野火一样蔓延到一座座房子的恐惧。

对于取代南斯拉夫的小型国家正在出现的种族清洗趋势，西方必须下定决心。西方没有人想要宽恕种族清洗，但每一天、每个小时，平民们在逃离交战区，或者是被人用枪驱赶进入相对安全的他们自己种族的聚居区。种族隔离可能令人厌恶，但对于两百多万逃离或者被驱赶出自己家园的难民而言，隔离是他们唯一可以信任的安全保障。我们对种族营地的顾虑和苛责，这个地区

的平民受害者恰恰并不关心。因为西方未能拯救萨拉热窝，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在这里和平共处了许多世纪。相信普通的人们会逐渐回到他们抛于身后的多种族村子，是在要求不可能之事，仅仅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自由主义原则。

当你穿行在克罗地亚中部被破坏的地区，还会有某种坠入时间之洞的感觉，向后旋转回到过去。你不是在1993年，而是在1943年。在塞族村子里，老妇人们戴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羊毛裙，警惕地注视你经过；老头子们戴着“二战”时期的军便帽，赶着瘦弱的干草车经过。在他们的后花园里，女人们弯腰挥动锄头。在路上，身着塞尔维亚克拉伊纳（Krajina）红、白、蓝肩章的民兵从路边的防空壕中出来，让车子停下，搜查你。每个人都很警觉。几乎没有人说话。

在一个被毁坏的、之前克罗地亚人居住的农场，我遇到一对塞族老夫妇，住在农场附属建筑物的废墟里。他们80多岁，家住在40公里以北的达鲁瓦尔（Daruvar），克罗地亚人将他们赶了出来。老先生正在锯一截被烧焦的木头，用来烧炉子。老太太正在整理他们小小的房间，里面有床、被破坏的窗户、桌子、两个杯子、两张椅子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地板。他们自己修复了屋顶，靠从邻居和红十字会那里得到的东西维持生计。我们坐在废墟中间的树桩上，玻璃、砖块、烧过的房梁杂乱不堪。我问他们这次战争是否比上次更糟糕，老太太带着辛酸轻蔑地回答，这次比上次糟糕多了。“上一次战争中，我们一起跟德国人打仗。这一次，只有背叛。”邻居反对邻居，朋友反对朋友。你们还会再住在一起吗？他们都摇了摇头，转眼看向远方。

我问他们是如何成功生存下来的，他们突然恢复了精神。“上帝会安排一切。”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快乐地交换了一下

眼神，那一瞥一定穿透了50年的婚姻。当我起身离开，老先生抓住我的手，长时间紧紧地握着。他明亮的蓝色眼睛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真相和民族权利。那是我们想要的一切。真相和民族权利。”

一英里以外，穿过另一个检查站，这次是在里皮克的一个克罗地亚人村庄，我遇到一个男人正在帮助一个工作小组，小组有六个都穿着蓝色衣服的女人，她们从一座被夷平的房子的乱石堆中找到有用的砖，把它们堆起来。原来他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女人们是一个市政部门派过来修理被毁坏的房子的。

男人的名字叫托米斯雷夫·马勒科维奇（Tomislav Marekovic），朋友们叫他雅普（Yup）。雅普是当地医院的管理人，业余时间在当地的足球队做助理教练。我猜想（但不是很肯定），他也是克罗地亚当政的民主联盟党（HDZ）在当地的一位重要支持者。要不然，为什么他的房子是我在里皮克发现的唯一一栋由市政工作人员来清理的房子？

他带我看他的厨房原来是怎样的，电视机原来在哪儿，他的沙发放在哪儿。现在什么都没留下，只剩下地基和一大堆砖块，女人们把砖块上的灰泥削掉，然后堆叠起来。隔壁的房子毫发无损。为什么？我问道。他说，是塞族，我们一直来往的。他说现在他们在西德。那么再隔壁的房子呢？我父母的，他简洁地说。他突然指着大街上说道：“他们就把我父亲扔在那里，大街上，扔在那里三个星期，才有人把他埋了。而我母亲，他们把她带到一个谷仓里，扔到火海里。”

南斯拉夫军队的坦克曾进驻里皮克高处的山上，在当地塞族民兵的指示下炮轰小镇，目标对准克族的房子。当雅普的房子被

炮轰的时候，他和妻子跳上汽车，逃往萨格勒布，但他的父母拒绝走，认为他们是安全的。几天以后，他们被塞族民兵——也许来自同一个村子——从房子里拖了出来。他们被射杀，尸体被焚烧。雅普告诉我这一切，微微地叹息，停顿了一会儿，点燃一根香烟，忧郁地凝视着远方。女人们一直默默地在我们周围工作着，堆着砖。

雅普叫她们休息，在他小小的后花园里，我和女人们坐在一张搁板桌边。我想知道为什么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都大笑起来，眨着眼回答："因为女人是最棒的。"闭口不谈的事实是，那么多的克罗地亚男人都去军队服役了。我告诉她们，我注意到在塞族那一边没有进行重建，他们只是住在废墟上，枪炮对准克罗地亚人，等待着。一个女人淡淡地说："他们没有重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完蛋了。"有几个女人点头，其他人则沉默地低头对着桌子。

雅普说："你们中有三人是塞族人，对不对？"我旁边的三个女人点头，又转回去看着桌子。在这沉默当中，他们让我去猜想，为什么三个塞族女人会帮助重建一个克族人的房子。只能是因为她们嫁给了克族人，一生都居住在这里，现在发现她们自己被撕裂成两半，就像她们的村子一样。然后，我旁边的一个塞族女人缓缓地开始哭泣，沉寂笼罩了每一个人。桌子对面的克族女人平静地看着她，她将自己缩成一团。"哭吧，女孩，哭吧。"有人说，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

军阀

回到1989年，我们曾相信柏林墙的倒塌开启了将由哲学之王、异见英雄和船厂电工统治的新世界。我们期待一个从衰朽的苏联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的新民族国家秩序。我们认定，民族自决必定意味着自由，民族主义必定意味着民族建构。像往常一样，我们错了。我们期待秩序，得到的却是混乱。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数十个潜在的民族国家被无可挽回地粉碎了。在国家建构的名义下，我们令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回归到现代国家出现之前的前政治混乱中。

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现在被那些中世纪末期以来在欧洲就未曾见过的人物——军阀——统治。民族国家在哪里解体，他们就在哪里出现：在黎巴嫩、索马里、印度北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奥塞梯（Ossetia）[1]、柬埔寨、前南斯拉夫。他们拥有车载电话、传真机、精良的个人武装，看上去挺后现代，但实际上还在纯粹的中世纪早期。

他们选择的车辆是四轮驱动的大切诺基，车顶上有蓝色的警灯闪烁，加速通过检查站。他们佩带手枪，但不会挥舞手枪。他们将粗鲁的威吓留给吉普车后面的保镖，那些人戴墨镜、穿特制牛仔，装备有扎斯塔瓦（Zastava）机关枪。他们自己穿皮夹克，系花式领带，穿紧身的灯芯绒裤子——德国的电视制作人的最爱。离开“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一开始在路上的检查站我遇到的军阀都是矮个儿、粗壮的男人，在以前的生活中是不入流的混混，或者小镇上的警察，或者两者都是。跟他们待上一天，游历他们的世界，你很难发现他们大多数是杀人恶魔。

军阀不仅主宰着交战地区，他们还成功地进入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样一党统治国家的权力核心。

战争罪犯们在巴尔干地区地位显赫。他们在塞尔维亚国会拥有席位。其中一人，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自封为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公爵，他自己掌管的政党也是国会的正式成员。另一人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Željko Raznjatović），又称阿尔坎（Arkan），控制着被称为“猛虎”的准军事组织，拥有800名强悍成员，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中，他们在东斯拉沃尼亚一路强奸劫掠。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的一份通缉令证明这个臭名昭著的恶棍是瑞典一桩未遂谋杀案的在逃犯，但他是国会代表，并且经营许多破坏禁运的生意，获利巨大，包括在贝尔格莱德周围的加油站销售走私汽油，换取硬通货。身为曾经的后现代黑暗王子，阿尔坎开始经营自己的声望。在东斯拉沃尼亚的塞族农舍中，圣萨瓦（Saint Sava）[2] 画像的边上，你最有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大大的彩色挂历，一年中的每个月份都有一张不同的阿尔坎照片。

在旅途的末尾，我参加了贝尔格莱德的反米洛舍维奇示威，他本应躲在自己的大切诺基里穿过游行人群，但这个穿小羊皮夹克的杀人犯微笑着、温文尔雅地向左右两边挥手致意，显然陶醉于他对贝尔格莱德和平派之无能的挑衅。

克罗地亚人会告诉你，阿尔坎被允许在塞尔维亚国会中担任代表，这个事实证明塞尔维亚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并非如此。有反对派政党和报纸在发挥作用，而且事实上贝尔格莱德的民主和萨格勒布的一样多。吉拉斯对塞尔维亚政治的概括最完美地描绘了军阀们努力进入体制核心的方式：带有强盗主义味道的民主。

在克罗地亚一方也有军阀——如果在萨格勒布没有，那在前线的城镇如奥西耶克（Osijek）也是由镇议会主席和当地党魁布拉尼米尔·格拉瓦斯（Branimir Glavaš）所掌控。当你坐在格拉瓦斯的吉普车里游览该镇的时候，似乎像是与一个引人注目、颇受欢迎的政客在一个美国的小镇上。他碰到当地的一场婚礼，乐队为他演奏小夜曲。新郎请他亲吻新娘，参加派对的狂欢者递过酒瓶让他试试味道。很难想象这个人是格拉瓦斯组织的领导人，这个准军事组织不仅要为保卫奥西耶克负责，也要为对塞族村庄的清洗以及杀害试图与塞族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克罗地亚警察承担责任。

在警察检查点，格拉瓦斯出示了一个警察徽章，在前线则是军事通行证。他的权力范围模糊不清，却又无处不在。他将军阀的邪恶魅力转变成和平时期的权力，不过他打了个响指，向你保证，他可以在一夜之间将他的部队重新动员起来。穿过前线，在30公里以外由塞族控制的武科瓦尔（Vukovar），有格拉瓦斯先生的塞族对手科伊奇（Kojić）先生。同样的吉普车，同样的彬彬有礼，同样的枪炮。

军阀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信念没什么意思。他们是暴力的技术专家，不是理论家。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明白，种族民族主义已将巴尔干的普通人民传送回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在那里，像霍布斯所预测的，生活是险恶、残忍和短暂的。在自然状态中，拥有扎斯塔瓦机关枪和大切诺基的人是王者。因为他能够提供这里的每个人都渴望的两种物品：安全和复仇。

一旦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国家分裂为其各个组成民族的小块地方，关键问题很快就变成：如果我是塞族人，当地的克族警察会保护我吗？如果我的新老板是塞族人或者穆斯林，我还能保住肥

皂厂的工作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能。因为不再有国家能够确保旧有的种族间协商。结果，每个人都匆忙地、混乱地转向另一个可以得到保护的来源：军阀。

因为军阀不仅提供保护，他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告诉他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邻居，就必须将他们从我们当中赶出去。如果我们不能一起住在一个国家，就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纯净国家。种族清洗的逻辑不只是受民族主义仇恨驱使，清洗是军阀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之战争的冷冰冰的理性解决方法。军阀说，清除你的邻居，你就再也不必害怕他们。住在你自己的镇上，你就可以和平生活。有我和我的小伙子们保护你。

---

[1] 中亚高加索的一个地区。

[2] 圣萨瓦，11世纪末塞尔维亚开国君主斯蒂芬·奈马尼亚的幼子，主掌宗教事务，赴君士坦丁堡觐见东正教大牧首，设立塞尔维亚总教区，促进塞尔维亚统一，因而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贝尔格莱德有纪念他的圣萨瓦大教堂。

武科瓦尔

在武科瓦尔，天黑以后，汽车的灯光所及是道路两边满目疮痍的墙壁、没有房顶的废墟和碎石堆。你没有在被子弹击碎的停车指示牌前停下，因为十字路口没有车辆。一定有人住在这里，因为你偶尔可以看到一束孤独的灯光，在被轰炸过的塔式楼的百叶窗后面隐约闪现。但你看不到人，因为天黑以后，没有人敢出来冒险。老鼠在马路上来回窜过，在垃圾中觅食。远处，你可以偶尔听到有小型武器开火的声音。

这个鬼镇从前是哈布斯堡时期多瑙河大主教的驻地。1991年，它成为克罗地亚的斯大林格勒。在整个秋天，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守卫它直到最后一条街道，对抗欧洲自从1945年以来最猛烈的炮火袭击。当塞族民兵和南斯拉夫国防军在1991年11月最后“解放”这个城镇时，付出的代价是9000人的性命，没有任何东西留待解放，只有一座被摧毁的废墟。

自行成立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将其东部的总部设在武科瓦尔。“克拉伊纳”意为军事前线。塞尔维亚在克罗地亚的定居点开始于17世纪，奥匈帝国将其作为他们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缓冲区。作为受命在巴尔干地区保护欧洲文明、对抗土耳其人的捍卫者，塞族人始终保持武装。枪炮文化在这里世代相传。

在小镇的广场上，一条横幅挂在路边，从一座被摧毁的房子伸展到另一座，上面写着：“欢迎来到武科瓦尔，元年。”但进入该镇18个月后，塞族人没做任何事去重建它。它可能应当以这个样子保留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可以把它围起来，宣布它是欧洲文化遗产地。毕竟，还有什么比我们愚蠢的民

族主义战争传统更像欧洲的呢？

塞族人摘下克罗地亚的街道指示牌，用西里尔字母写的塞尔维亚语牌子取而代之，但克罗地亚牌子仍旧堆放在镇上被摧毁的博物馆的阁楼上，仿佛在下意识里，塞族人希望克罗地亚的牌子有一天会重新装回去。

也是在博物馆的阁楼上，还有一幕更为离奇的景象：在房屋的主梁下面躺着三尊青铜半身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它们是20世纪80年代被扔在这里的，现在炮火轰炸将屋瓦和隐藏房梁的吊顶掀开，它们才重见天日。这三尊青铜半身像是博物馆中唯一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完好无损的展品。

尽管武科瓦尔的毁灭责任完全在于南斯拉夫国防军的坦克和炮兵部队，他们在这里倾泻了15万发炮弹，但克罗地亚人在撤退的时候似乎也炸毁了它的一部分，因此塞族人的付出什么都没有得到，只有废墟。毁灭武科瓦尔毫无军事意义。我问一位塞族坦克指挥官，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耸耸肩："战争有许多这样的悲剧……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但这些都是带有军事目的的战役。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战争中，军事目标受到一种伤害、羞辱、惩罚的欲望驱使。南斯拉夫国防军（JNA）本可以绕开武科瓦尔，派遣其坦克纵队沿着"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直达萨格勒布。但它反而停在多瑙河的另一边，将武科瓦尔轰成了碎片，似乎在用每一颗飞出去的炮弹说："你们想要独立，是吗？这是你们要付出的代价，最终你们除了废墟什么也得不到。"

当你站在已成碎片的墓地、修道院、教堂和住房之上，很难想象，有谁可以从这所有的毁灭中获得深深的快乐。这些古代的墙壁，这些十字架、教堂钟塔、古石板屋顶，都被那些认为他们

是保卫神圣庄严的过去免受亵渎——这种观念一再重复——的人们毁灭了。某种程度上，炮火表达了一种本质上的虚无主义：关于为神圣祖国的命运而战，人们所谓的“说服”比所有民族主义的虔诚更为诚实。

某种相当难以控制的青春期渴望在这里发挥作用。坦克和炮兵指挥官看不到他们击中了什么。这完全像在电子游戏室玩游戏机一样的抽象和令人满足。甚至，大部分塞族指挥官对一个重大的数字也无动于衷，即被轰炸的人口中可能有多达20%的比例是塞族人。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长眠于城市郊外某一个荒芜无名的十字路口之下、万人坑之中。

塞族人接管了他们自己亲手造就的废墟。对于他们对这个城市所做的一切，一个人本应感到悔恨或羞耻，或者如果做不到这点，也可能有某种道德上的困惑状态。但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种难堪的沉默。

正是在武科瓦尔，我开始发现民族主义如何作为自我免责的道德言辞发挥作用。一切都由对方负责。在纯粹民族主义幻觉的道德宇宙中，一切行为都是被迫的，是必需的悲剧。城镇必须被摧毁，是为了解放它们，人质必须被打死，大屠杀必须进行。为什么？因为对方先开始的，因为对方是野兽，不会明白除了暴力和报复之外的任何语言，等等。民族主义战争中的每一个人都说着命运、被迫、放弃道德的词语。没有地方像武科瓦尔那样达到了一个最低点。拿着枪的暴徒，藏身在多瑙河旅馆的废墟里，跳出来威胁要杀死我的翻译，仅仅因为他是个匈牙利人；克拉伊纳情报部长的情报没有一条不是谎言；武科瓦尔市长在武科瓦尔医院里四处走动，把塞尔维亚旗帜交给那些将被截肢的人们。对于由于他们的原因导致自己城市毁灭的无情指控，这些生物中没有

一个表达过最轻微的羞耻、悔恨或迷惑。对于他们所有人而言，责任全在克族人。

塞尔维亚克拉伊纳自称国家，但它更像是一个由短命的军阀——称为某某副部长、某某最高指挥官，权力取决于他们能够征募多少汽车、武器和人员——统治的封建王国。你很快会发现，他们的命令通常在下一个检查站就会失效。

科伊奇先生是武科瓦尔镇以及该地区的安全首脑，他向你保证，他已将全镇置于控制之下。但他的帕萨特的防弹挡风玻璃上有三个弹击的密纹，是三天前跟当地匪徒交火留下的。到处都有枪：在骑车去村里检查站执勤的老人的背上，挂在镇子入口检查你的文件的民兵腰带上，当地酒吧的柜台后面。在克拉伊纳的每一个地方，暴力民主统治一切。

晚上，克拉伊纳的塞族人坐在村子入口的碉堡里，枪口指向空无一人的道路，等待克族人来袭击他们。这是村庄战争，前线经常正好处于两个后花园之间。一个下雨的夜晚，我前往武科瓦尔30公里以外的前线。温科夫齐（Vinkovci）的克族人阵地上的昏暗灯光清晰可见，我急速跑向塞族人的战壕，穿过晾衣服绳索，越过花园栏杆，经过被废弃的脸盆和刚刚开垦的蔬菜园。当我到达塞族碉堡的安全所，我可以听到另一方传来的克罗地亚音乐，混杂着隔壁的“塞族猪”之类的喃喃咒骂。

塞族人从自己的阵地上可以看到他们被迫逃离的家园，他们可以看到处于自己枪口之下的邻居们。有一个叫柯比·切特尼克（Chobi Chetnik）的民兵，战斗服上有一个标牌写着“塞尔维亚：自由或死亡”。凌晨两点，他在民用电台上嘲笑100米远的乌斯塔沙。这是一场曾一起上学、在同一家运输公司一起工作的敌

人们之间的战争，现在他们在民用电台上交谈、发笑、嘲弄、讲笑话。然后他们挂断，试图将对方列入自己的枪口范围。

就是这样，一夜一夜，既非和平，又非战争，双方互相较劲、嘲弄、试探，用小型武装交火互相探索阵地，偶尔发射一发迫击炮或者大炮。

塞族人的阵地由前南斯拉夫军官、“爸爸的部队”[1] 式的村庄志愿者和野蛮的切特尼克准军事组织守卫。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联合国，他们将很快取胜。从他们喝酒的方式，从碉堡里的冒险远去之后他们脸上悄悄呈现的百无聊赖的宿命般神情，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绝望。

我在奥西耶克访问的克族人前线离武科瓦尔30公里远，将两地放在一起看印象更为深刻。他们在一条被炸毁的高速公路后面挖掘战壕，而且他们似乎比塞族人更有纪律、更为好战。他们相信联合国得到许可永久占领他们国家的三分之一领土，他们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向塞族人一方挥舞扎斯塔瓦自动武器，告诉他们克族的旗帜将很快飘扬在武科瓦尔上空。这也许更多是火线上的虚张声势，但两方留给我的感觉都是，东斯拉沃尼亚的停火悬于一线。

碉堡里的塞族人有一个案例值得一听。在南斯拉夫，他们曾是一个得到宪法保护的民族。在独立的克罗地亚，他们退身为拥有种族屠杀历史的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塞族人一再重复，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面临再次灭绝。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战争，目的就是给他们这样一个国家，通过从塞尔维亚本土开辟一条陆地走廊，将克罗地亚的西部、中部和南部的塞族土地连接起来。没有这样一个走廊，克罗地亚的塞族知道他们将无法生存，除非这样

一个走廊得到保障，否则他们将一天天地生活在武装妄想中。在克拉伊纳，有货币，有国旗，但没有国家，只有丛林。他们没有可信的保护人。即使他们全力虚张声势，但他们知道不能指望米洛舍维奇。如果他们自卫的代价变得对塞尔维亚本土来说太高了，克拉伊纳人知道他们将会被出卖。

如果塞族人不那么坚持认为整个世界，尤其是外国记者都反对他们的话，他们的情况会更有说服力。在你的汽车被喝醉了的民兵强行征用，在你身处枪口之下、生命受到威胁之后，对他们事业的某种漠视悄悄地占据了你。

东斯拉沃尼亚的战区，尤其是武科瓦尔，给人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历史倒退印象。从前犹太人、鲁塞尼亚人（Ruthenes）、德意志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被埋在一起的墓地现在受到双方炮火的亵渎。奥匈帝国时代留下来的优雅的主教宫廷和修道院、精致的带拱廊的广场躺在废墟之中。这里的时间向后倒退了500年。欧洲曾经最富有、最文明的地区回到了中世纪末期的野蛮。这里的法律和秩序由军阀来管控。这里没有汽油，所以村庄都退回到汽车之前的时代。每个人都依靠步行四处走动。因为没有取暖用油，上了年纪的农妇在树林里寻找燃料。食品稀缺，因为人们忙于打仗，无暇照看田地。在被炸毁的高层公寓前面的废弃垃圾中，幸存者用锄头挖掘。每个男人都武装起来。没有人冒险走出村子。没有人相信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人。20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将欧洲大陆的一部分传送回民族国家之前的时代，回到封建内战末期的混乱之中。

在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度过的一周时间是如此全面地陷入民族主义狂热的一周，当你最终穿过最后一个塞族检查站，打开收音机，听到正在播放的普契尼咏叹调，望向窗外，看到雨中潮湿的

田野，你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绷紧的弹簧舒展开来，荒谬而惊讶地发现，一个天真美丽的世界依然还在。

---

[1] 《爸爸的部队》（Dad’s Army），BBC情景喜剧，反映“二战”时期英国国土自卫队的故事，于1968—1977年期间播出。

贝尔格莱德

在“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上，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实话，来自何方，想去哪里。在克族检查站，你只能说你将去下一个克罗地亚城镇。在塞族检查站，你微笑着，让他们搜查你的行李箱，仔细检查你行李里面的脏内衣裤，给他们万宝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你将投奔塞尔维亚母亲的怀抱。

在公路上塞族人的第一个收费站，你不必将在萨格勒布入口处拿到的收费卡递给他们。相反，你说你从塞尔维亚克拉伊纳过来，然后你为用德国马克付的过路费讨价还价。这是欧洲独一无二的收费站，你可以带着笑交换香烟，对他们准备收取的费用表示嘲笑怀疑，你可以把过路费的价格压低到一个合理的数目。

到贝尔格莱德大约还有24公里，你看到西方制裁之影响的第一个迹象：小红旗牌、菲亚特、雷诺5s排成的巨型长龙，从加油站沿着道路展开，许多人围聚在空油泵边，期待间或送来的油。他们玩牌、谈论政治、一起吹口琴打发时间，但当你走近去交谈时，他们发现你是一个西方作家，一群愤怒的人们很快就围住你。一个矮小、粗壮的男人，头上戴着猪肉馅饼帽，靴子上泥巴结成了硬壳，一双农夫的手戳到你的胸前，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对那些克族人？站在那里等着他们来割我们的喉咙吗？而你们做了什么？你们给我们禁运！你们管那叫公平？”他们就这样继续下去，主题不断变换，很快他们开始责怪丘吉尔和英国支持铁托而不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所以显然是英国的错，让南斯拉夫搞了50年的共产主义。

如果不是带有某种喜剧效果，他们的愤怒会更有威胁。长队

中的人们说他们不想和一个西方人有任何瓜葛，转过身去，让他们的朋友可以看到，他们做出了多么漂亮的挑衅姿态，然后他们转回来，开始交谈，停顿下来让你记笔记，从你的肩头窥视你是如何写他们的名字，等等。此前几天的经历让我明白，这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本身的仪式性风格的一部分。这种舞蹈拥有开放的四方格阵势：我们不说话，西方永远不会理解；我们蔑视你，你说的全是谎言；然后，他们开始说话并且滔滔不绝。问任何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得到的是那种讲故事式的回答："你得理解我们的历史……"20分钟以后，你还在听拉扎尔国王（King Lazar）[1]、土耳其人和科索沃战役。这种认为没有人理解他们的深层想法，与热烈地、不可遏制地为他们自己解释和辩护的渴望并驾齐驱，似乎定义了我在贝尔格莱德每一次谈话的风格。

第二天早晨，我访问在一个银行排队的人们的时候，同样的情形又重复了一次。人们粗暴地、激烈地拒绝交谈，只是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地为塞尔维亚做自我辩护，从他们反抗土耳其人的悠久斗争开始，到波斯尼亚塞族对抗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的自卫结束。沿着这条轨迹，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铁托的反塞尔维亚罪恶全都受到恶言谩骂，用词之污浊多变犹如春季的洪流。

跟加油站的长队一样，银行的长队也是贝尔格莱德生活的一个基本部分。经济处于加速超级通胀状态，每个月上涨200%。在饭店里，菜单上的价格标签隔夜就要更换。唯一可以信赖的抗通胀保值手段是拥有一个硬通货账户。有很多私人银行开业，承诺每月为这样的账户支付10%。他们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是个秘密，谣传这些私人银行与地下世界瓜葛很深：走私，从乌克兰非法进口石油，与俄罗斯进行武器贸易以及为西方毒品资金洗钱。有一些这样的银行已经破产，人们担心如果有更多的银行破产，

米洛舍维奇政权自身可能在随后的经济混乱中灰飞烟灭。

所以小储户担心他们账户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夜排起长龙，以确保能够把他们的硬通货取出来。这些队伍沿着街道延伸数百米长，推挤着的人们许多是受冻的、满怀愁虑的老人，领取养老金者，其中一些人虚弱而疲惫。

你也许认为这些长队中会充满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怨言。毕竟，贝尔格莱德从未投票选他，并且一直怨恨自己从铁托治下的不结盟运动世界首都，被贬低成一个孤立的、被禁运的巴尔干地方首府。然而再一次，所有本应指向米洛舍维奇的愤怒被导向西方，导向丘吉尔、撒切尔夫人，因为他们支持克族人；导向美国人，因为他们援助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如此等等。

---

[1] 拉扎尔国王，即拉扎尔·赫雷别利亚诺维奇（1329—1389），塞尔维亚大公，领导巴尔干诸国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1389年指挥著名的科索沃战役时战死，是塞尔维亚的传奇人物。

吉拉斯

在贝尔格莱德的公寓，他自己来开门。他的头发现在白了，岁月松弛了曾经锐利如鹰的容貌——我在他的《与斯大林对话》（*Conversation with Stalin* ）的封皮上见过。他82岁，驼背而虚弱，带我沿着走廊去他的书房。他让我坐一张低矮的绿色天鹅绒扶手椅，问我要茶还是饮料。我谢绝了，他笑起来，回忆起1944年他带领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俄国人给他们提供伏特加，当南斯拉夫人谢绝的时候，俄国人叫了起来："你们是些什么人啊？""我们是党员。"米诺万·吉拉斯带着淡淡的、警惕的微笑说。在他身体里面仍有一种清教徒式的党性。

在整个反抗德国占领者及其塞族和克族同伙的游击战争中，吉拉斯都与铁托在一起。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1993年的互相憎恨完全回退到了1941—1945年间南斯拉夫人之间的屠杀与反屠杀。作为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的伟大领导人，他是最后一个还记得南斯拉夫梦想的人，而下一代已经将其抛弃。

他跟我讲起1945年的夏天，作为新南斯拉夫的副总统，他坐在美国产的威利斯吉普车里，启程去确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界。"毕竟，我是黑山人，"他微笑着说，"所以人们认为我是中立的。"我问他，他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哪一个村子归克罗地亚，哪一个归塞尔维亚？"种族原则。"他说。然后他描述在决定哪些归克罗地亚、哪些归塞尔维亚之前，他是怎样沿着边界计算每一个村子的种族构成。这就是战争为之争吵不休的边界，直到今天，塞族民族主义者仍指责吉拉斯出卖塞尔维亚人的利益给可恶的克罗地亚人。

他既是战后南斯拉夫重要的缔造者和版图绘制者，又是东欧第一个共产党的异议者。他与铁托在1953年决裂，指责铁托背叛了党的运动的理想，让新的共产主义国家被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所占据。为此，铁托将他下狱9年。正是在监狱里，他学会了他那刻板、口音很重的英语，并使用一本词典把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 ）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我估计他会谴责宿敌铁托未能理解种族民族主义，但他猛力摇头。铁托对民族主义的处置没有错。他给每一个共和国正好足够的自治权以满足民族主义的需要，但不能危及南斯拉夫的统一。他的根本错误是他从未取得民主化的成功。他从未建立让民主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国家意识。共产党人开始分裂的那一刻，南斯拉夫本身也开始解体。

我问他，民主和民族主义是否相容。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一个民主体制有无可能将国家维系在一起？是的，他坚持认为，渐进的民主化，渐进地放松一党统治，可能产生一种民主的文化，将会让该地区的各种民族主义一起共享权力。为什么他不及时搞民主化？“因为他既是特权共产主义阶层的主人，又是其奴隶。”吉拉斯说，带有一种活着看到自己原来的异端邪说被事实所证明的意味。

由于未能及时民主化，铁托的所有成就都付诸东流。最终证明，共产党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绝不比奥匈帝国或者土耳其人成功。“我们共产党人，”他说，“是最后的帝国。”

他如何理解将南斯拉夫撕扯得四分五裂的民族主义呢？他的观点是，巴尔干的民族主义是进口的日耳曼意识形态，只是到19

世纪70年代才来到这里。它立即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将数百年来比邻而居、共同成长的各民族的种族复合体撕裂。他认为，民族主义仍旧不是一个固有的民间情感，而是一种异质病毒，是城市知识分子煽动未受过教育的人民、在悬崖之上成功地推行多种族试验的成果。我在贝尔格莱德几乎没有遇到人相信米洛舍维奇自己怀有任何深度的民族主义信念。他只知道，当他在台上叫喊“没有人能再次打败塞族人！”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欢呼响彻云霄。

吉拉斯随后说，西方最大的错误，是他们将塞族人“妖魔化”。这一观点令人惊讶，因为它来自一个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宣传中一直被贬低为塞尔维亚利益之叛徒的人。然而吉拉斯对此颇为坚持：在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和1993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中，西方都对塞族人施加不必要的谴责，从而将塞尔维亚人民拱手交给米洛舍维奇和民族主义者。

迄今为止，巴尔干术士米洛舍维奇将所有酝酿出来的仇恨转向西方，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制裁将整日排长队变成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政权似乎比以前更为巩固。尽管在去年秋天的选举中，贝尔格莱德自身投票反对米洛舍维奇，但反政权的街头游行几乎是一开始就遭到失败。反对党们虚弱而分裂，而且甚至比米洛舍维奇更民族主义化。总而言之，这种景象冷酷地证明了吉拉斯的基本观点：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充斥着分裂后的虚无，伴有被导向西方的受迫害狂倾向以及被导向他们的塞族同胞的宏大幻觉。

按照吉拉斯的观点，西方对塞族的“妖魔化”也使得克族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自称是无辜的受害者。考虑到围困萨拉热窝、占领四分之一的克罗地亚以及穆斯林集中营，他承认，对塞尔维

亚的制裁不可避免。但这只会让克族人和穆斯林相信，他们对塞族人的报复行为将不会受到国际制裁。

吉拉斯以一个老人的超脱看待这一切，但我们对话时，有一会儿工夫，他的超脱被打破了。“我们必定是欧洲唯一一个，”他带着冷冷的蔑视说，“积极复兴法西斯的合作者的国家。”他是指克罗地亚人的乌斯塔沙，但也包括塞族人合作者、与德国人一起作战的切特尼克。他曾为之战斗的一切都已经崩塌，50年前他奋力反对的一切重新恢复公众荣耀，这种想法让他的脸色一时黯淡下来。他看上去疲倦而沮丧。“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无论如何，在这里没有。”他叹了口气说。

铁托之墓

他喜欢温室，所以给自己建造了一座温室。他过去常在那里休息，置身于一品红和仙人掌之中，像是阳光之下的一只老蜥蜴。现在，他们把他埋在温室里，在他贝尔格莱德的住所前面。那儿有一块很大的白色大理石板，用青铜字刻着“约瑟夫·布罗兹·铁托，1892—1980”。

不再有许多人来参观，这个地方被遗忘了。我参观的那天下着雨，雨水从一扇破裂的天窗滴落到元帅的墓上。无人在意。

1945年他的生日，一群少年发起了一个接力赛，从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到贝尔格莱德，送给他一个接力棒。他统治期间，每一年南斯拉夫的“青年”都重演这个比赛，比赛最后他们将接力棒送给年迈的铁托。他的生日成了“青年节”。两万根接力棒现在保存于墓地旁边的博物馆里。再也没有人去参观这些接力棒。

权力的合法性耗竭得多么迅速！20年前，接力棒还不曾显得荒谬可笑，接力赛对人民意义重大。现在，它似乎属于某种消失的部落仪式。

人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独裁者没有继承人。克里斯玛（Charisma）[1] 是最不稳定的一种合法性。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民主呢？这里是否曾经确实有过民主的机会？老蜥蜴自己也许会说：绝不，如果你让他们有民主，他们只会把他们自己撕得粉碎。在那些死去暴君被发配去的地狱里，他也许正审视着在他身后的“地狱”。他也许会说：我告诉过你们的，必须有铁腕

统治，我是对的，吉拉斯错了，在我身后来的是滔滔洪水。

然而，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能证明独裁者是对的。需要的是更多的时间——让一个民族忘却的时间，让老人们死去、他们的记忆和耻辱一同死去的时间，让复仇变得荒谬的时间，让仇恨变得愚蠢的时间，让光荣和记忆的政治被利益政治所取代的时间。换而言之，迎来独裁者毕生所反对的、平庸的资产阶级政治的时间。

在一个从未有时间体验资产阶级之平庸政治的文化中，民族主义成为民主得以在南斯拉夫的废墟上生长的土壤。当然，那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受到操控的国民投票民主，用于认可一人的统治。在这种形式的民主中，民族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吸引力，一种持续狂热、永恒亢奋的政治。取代实际政治的平庸，取代直面现实——贫穷、落后、愚顽、不入流的巴尔干地区的日常现实——的政治世界，民族主义将心灵导向更高的事物。它提供关于身份和自我肯定的光荣政治。取代无止境的利益和调和政治，它有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要击退，有不朽的事业、过去和当今的殉道者让人们保持信仰。而它当然没能逃避犬儒和罪恶的注意，在这个有组织的、永恒亢奋的国家，如果套上“民族”“人民”“权利”和“自由”这些文质彬彬的词，所有的犬儒主义、犯罪、大大小小的暴行都可以被视为正当。

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呢？

远离灾难，我们才能看到，西方未能及时采取行动，是因为某种比疏忽、错误信息、受误导的好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政策背后的原则互相矛盾。在1989年的轻率狂热中，我们宣称支持民族自决的权利，支持现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却没有意识到前

一个原则与后一个原则矛盾。我们坚持边境线不可侵犯，却没有明确是否也包括像南斯拉夫这样的联邦国家内部的边境线。

最重要的是，我们听任对帝国时代历史的内疚引着我们逃避自己的责任：界定一个后帝国时代的和平秩序。要谴责一直处于帝国控制之下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后帝国时代的各国感到内疚。当“被奴役的民族”——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地区——要求自由的时候，我们没有停下来考虑一下后果。在凡尔赛和雅尔塔之后，欧洲最后一个帝国的崩溃第三次给我们提供了机会，界定欧洲的持久和平，创造一种新的民族秩序。我们本可以通过综合性的领土解决为“冷战”画上句号：划定边界、保障少数族群权益和在相冲突的自决权诉求间做出裁决。我们是如此关注于避免充当帝国警察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繁荣中我们是如此自私，听任每一个当地的后共产主义煽动家利用自决和民族权利的言辞实现自己的目的。前南斯拉夫被种族清洗的各国的恐怖新秩序，是我们的愚蠢的见证，对他们也是如此。

---

[1] 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意指神授的能力。是追随者用以形容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的用语。——编者注

老人的皮夹

我正好站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莫斯科宾馆的前面，在一队无精打采、逐渐散去的反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游行队伍当中。整个早晨，这个有几百人的群体一直在那儿，他们慢慢发现人数太少，不可能制造出任何事。人群中间有一个戴切特尼克帽的老人，我走近跟他交谈。他70多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和米哈伊洛维奇站在一起反对铁托。我问他是否有儿子，如果有，他们有没有看到这次战争？

他平静地掏出皮夹，给我看三张护照尺寸的彩照：每一张都是他的儿子，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两个死了，死在克罗地亚战争的前线。第三个在监狱里。为什么？老人带着一种残酷的满足感说，因为，他报了仇。他找到杀死其中一个兄弟的凶手，杀了他。然后老人拿出一小片折叠的新闻剪辑，来自克罗地亚的报纸，那上面有另一个年轻人的头像，护照尺寸的照片。“杀我儿子的杂种。但我们杀了他。我们杀了他。”他说着，熟练地把杀他儿子的凶手的照片叠好，放进皮夹，和他儿子的照片放在一起。

从父亲到儿子，从儿子再到儿子，这种形式的爱，这种在代与代之间保持复仇的信念，永无尽头。在这场村庄战争中，每个人都相互认识，一个老人将杀害儿子的凶手的照片和为他们都报了仇的儿子的照片放在一起。无休无止，当老人死去时，他知道也将会有人为他复仇，这带给他一种残酷的满足。

2　德国



图8　柏林墙开放几天后，一位柏林市民在墙上进行抛接杂耍



图9　1989年莱比锡的某次“周一游行”，超过7万人参与



图10　80年代以来起于英国、繁于德国、逐渐遍布西方国家的新纳粹组织——光头党





图11、图12　伏尔加德意志人（Wolgadeutsche），是生活在苏联伏尔加

河流域的德意志人。苏联解体后，统一的德国政府允许原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德裔以“德国人”的身份回国居住，但他们大多居住在难民营

实验

一对双胞胎，在出生时被分开，一个送到富裕、宽容的家庭，另一个则由贫穷、严厉的家庭收养。45年后，富有的兄弟找到贫穷的兄弟，邀请他去参观自己在郊区的家。一开始，他们为相互陪伴、为似乎重新找到失去的另一半而快乐欢欣。然而，过了个把小时，他们发现彼此的陪伴令人烦恼。穷兄弟被富兄弟的喧闹和咄咄逼人的笑声所折磨，富兄弟则为穷兄弟的顺从和充满怨恨的沉默而恼怒。对于父母为什么抛弃他们，当富兄弟诉说他那个版本的故事时，被告知另一个不同故事的穷兄弟生气地予以否认。很快，他们沉默无言地坐着，都在想如果他们从未遇到，也许会更好。除了碰巧拥有同一对粗心大意的父母，他们似乎毫无共同之处。

然后，富兄弟的妻子出现在这个郊区豪宅的草坪上，给她贫穷的小叔子带来饮料。他看到她和自己的妻子一样有红色的头发，有同样的对高跟鞋的偏好——可以展示涂成红色的闪亮的脚趾甲。随后他注意到，尽管自己的花园小很多，但与这儿完全一样，也有喷泉，水流从丘比特的嘴里喷出来，流进贝壳形的盆里。更让人迷惑的是，他注意到他的兄弟躺在一把草地椅上喝着啤酒，稀疏的沙黄色头发分开的方式完全和自己一样，从左耳掠到右边。最后，当富兄弟的儿子出来借车子钥匙时，穷兄弟发现自己和富兄弟给他们的儿子起了同样的名字。

设想一个民族，把它分成两个隔开的国家。确保这两个国家实行对立的哲学和社会组织形式。努力确保这个民族的居民被一

再告知，这个实验将是永久性的。在两个国家之间竖立一道墙，尽可能防止他们之间有任何交流。45年后，移除这道墙。告诉人们实验结束，因而他们又成为一个单一民族。他们还会是一个民族吗？

设计这样一个实验是想回答，是民族塑造国家，还是国家塑造民族？这问题类似于环境和遗传在个人塑造中的相对重要性。应当有可能询问接受实验的人们——就像问出生时就被分开的双胞胎一样——他们是否还能相互认得兄弟？他们应当能够告诉你答案。实验应当得出结论。



原东西德区域示意图

1989年11月，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正在澳大利亚荒漠中一个叫火鸡溪（Turkey Creek）的地方，消息传来，说柏林墙倒了。一开始他不相信这个消息，随之感到很

焦虑，是坦克推倒的吗？他觉得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必须得到一些这事确实发生了的证据。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必须看到照片。

火鸡溪的飞行医生正好有一台传真机，文德斯让柏林的一个朋友把所有在报纸上能够剪下来的照片都发给他。很快，照片开始在传真机上滚印出来，卷曲在电影导演的手里。在如此遥远的澳大利亚腹地，这些照片显得更有意义。它们使他想起了自己一个月前刚刚去世的父亲错失了这样一个似乎让德国两代人和解的时刻。电影导演记得，他落泪了，长久以来未曾有过的。他记得自己当时想："出错的世界修补（put together）好了，出错的我的内心修补好了。"

所有这些站在墙头的人流泪的面容。它们如此令人难忘。它们似乎比我们的脸更为真实，它们看上去就像40年代或者50年代电影里的脸庞。为什么更为真实？我真的不知道。苦难让人们变得真实。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经历了我们未曾经历的，是这让他们更为真实。

——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德国电影导演，1989年

我的成长过程中曾为德国感到羞耻。但这是一个我感觉到可能有些不一样的时刻。简单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德国人为了自由和解放承担某种风险的时候并不多见。

——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德国作家，1989年

在"冷战"的所有年月里，在其后所有充斥犬儒和苦涩的年月里，只有一个毫无顾忌的欢乐之夜：柏林墙倒下来的时候。人们

穿梭往来，不敢相信这一切，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却又发现不是在做梦。在欧洲战后的整个历史上，只有这样一个纯粹欢乐的夜晚。

自那之后，一切都未能如我们所愿，我们开始重写自己的情感历史。我们几乎忘却了那个夜晚，如果它还能重新回到记忆中，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用甚至只有一个夜晚的幻象来款待自己。为什么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拥有一丝希望？我们是多么愚蠢。

相册

1989年的德国革命以莱比锡（Leipzig）为中心，这个城市有200万人口，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DDR）东南角的萨克森州。那里举行了规模最大的反旧政权游行。游行静默而有序，在晚上开始，每个人都结束工作之后。成千上万的人集合起来，占领了整条整条的街道，向卡尔·马克思广场和歌剧院前进。一开始，在1989年9月末的时候，标语牌上只是要求“媒体自由”和“签证自由”。也有些胆小的标牌上写着“戈比 [1] 帮助我们”。

9月末，当局用高压水龙、大规模军警队伍、盾牌、警棍和警犬对付游行。游行者被抓起来，双手扭曲着反绑在身后，扔进人民警察（Volks Polizei）卡车的后车厢里。但游行继续，口号开始逐渐超出圣尼古拉教堂 [2] 的路德派秘密反抗中形成的谨慎要求。到1989年10月中旬，横幅上面写着“我们要改革！”“我们就是人民！”。

由于当局维系生存是通过让人们相信他们是孤立的，这些游行成为集体之自我发现的一种演习。一夜又一夜，人群聚集起来，人们四处张望，看从街道的一边延伸到另一边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人，他们尽可能远地向后、向前看。最后会有领导人准备冒点险：莱比锡歌剧院的导演、一些路德派的牧师、当地表演卡巴莱 [3] 的喜剧演员。其他城市仿效莱比锡的例子，市民们来到大街上。旧政权哄骗、引诱、咆哮、威吓，但一切似乎都不再管用。服从和逆来顺受神秘地消失了。当局在电视上呼吁保持秩序之后，更多的标语牌出现在人群中，写着“不要演讲！”“不要唧唧哇哇！”“不要粉饰太平！”“该动手术了！”。

10月下着雨，但人们继续在伞下游行。他们举行守夜，要求改革，把数千支蜡烛放置在教堂的墙上，蜡滴下来汇聚在一起，融入人行道上半透明的池子里。同时，摄影师们注意到警察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巡逻车前面摆出各种姿势拍照，警棍放入腰带里，而且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越来越不清楚是谁在负责。在莱比锡周围的学校，老师告诉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当学生不管不顾去参加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老师与他们并肩游行。第二天早晨，他们会在课堂上互相挤挤眼。

到10月末，卡尔·马克思广场上的标语牌写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属于人民，不属于党。"然后，当柏林墙在11月9日倒下，示威者们极为惊奇地发现，他们带来了一场革命，没有牺牲一条性命。这场革命的象征非常恰如其分，是我们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人群中也见到的怪异旗帜：锤子和镰刀被剪掉的那个旗帜，就像人们在床单上剪出两个眼洞，给孩子们做一件鬼怪服。

一个国旗上有洞的国家，是一个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国家。一些人挥舞这个旗帜，真的希望仍然保留红色，其他人仅仅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旗帜可以挥舞。但有一些人开始挥舞另一个德国的旗帜，柏林墙对面的旗帜。

柏林墙倒掉一个月后，在卡尔·马克思广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标语，首先是在一个潦草手写的牌子上，然后几十个牌子，然后上千个牌子："Deutschland，einig Vaterlan."（德意志，一个祖国。）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就是人民！"的呼喊变成了圣歌"我们是一个民族！"。

德意志，一个祖国。现在看，这个标语确实神秘。一个祖国。这到底意味什么？它是一个事实的宣告吗？一种愿望的表达

吗？还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在莱比锡老市政厅下面的拱廊，有一个商店，你可以在那里买到一个相册，它记录了从1989年9月到12月那段时间的几乎每一天。在相册中，最令人难忘的面庞是那些在人群中盯着摄像机看的人们。在每一张照片中，他们的面庞都恐惧而紧张。恐惧使他们的微笑半途凝结，让他们说出的话停留在嘴边，令他们的反抗姿态折断双翼。

恐惧不仅是担忧被捕，不仅是怀疑摄影师正在为警察工作。它是历史性的恐惧，是人们也许曾经在1848年的欧洲兵营中看到的那种恐惧，是一个民族将要抬脚步入未知并且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焦虑。如果所有的革命开始于迈入未知的那神秘一步，你在这些面庞上看到的恐惧会让人奇怪，他们如何敢于迈出那第一步。然而，当你翻动相册，当游行进入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你可以看到这种恐惧开始慢慢消失。面庞开始放松，姿态带着轻蔑，笑声变得洪亮。到11月，人们不再担心他们将走向何方。现在他们开始相信历史正与他们一起前进。成千上万莱比锡的人涌上大街，进入卡尔·马克思广场，对着摄像机欢笑挥手。

---

[1] 戈比（Gorbi），对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昵称，他在两德统一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 圣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莱比锡最著名的教堂，建于1165年，属于路德派教会。1989年，其每周一礼拜仪式后举行的和平游行最终导致两德统一。

[3] 卡巴莱（cabaret）是一种流行于欧洲，集喜剧、歌曲、跳舞及话剧等元素于一体的娱乐表演式样，兴起于19世纪末的法国，后传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度。

卡尔·马克思广场

一辆电车把我放在卡尔·马克思广场。道路清扫车在排水沟上扫过。雨水抽打在空荡荡的喷泉里的青铜马雕像上。我周围只有空无一人的、雨水扫过的人行道。在关于这个广场的旧纪录片中，这儿有更多的喷泉，有煤气灯和一个巨大的带有科林斯式柱廊的歌剧院，柱廊下面可以停靠四轮马车。在纪录片中，戴呢帽、腋下夹着报纸的人们正是在我站的这个电车站上上下下，有一个小姑娘卖紫罗兰，有一个手风琴演奏师，一个大胡子的乞丐向路人伸手乞讨，一个男人站在手推车后面，拿着报纸折成的装满了葵花子的圆筒。你几乎可以听到女人们的长裙拖曳在人行道上发出的沙沙声。那是1913年4月。

莱比锡的书店出售一本书，是莱比锡人在元年——1945年——的照片。盟军已轰炸了整个城市，数英亩的碎石堆在卡尔·马克思广场的每一个角落。照片上，清理广场残渣的“碎石女人”在工作间隙凝视着你，她们把砖块整齐地堆成一排排。她们的围裙是破旧的，头发上有厚厚的灰尘，穿着工作裤和工作靴。她们的耳朵后面夹着烟卷，粗糙的手紧握砖块和锤子。她们凝视着未来，仿佛可以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刻——在刚刚开始的零年，工人国家真的像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现在来看，似乎令人难以相信这儿一度有过梦想，每一个人都一度相信过它。早在1953年，工人国家就派出坦克对付柏林的工人。即使在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实际上什么样子，也是显而易见的。但碎石女人和退伍老兵想要信仰点什么，即使他们的领导人不相信，他们仍坚持到底，因为要轻易地怀疑你的整个一生都是在虚无中度过，太过痛苦，太过荒谬。

不相信的人和醒悟过来的人离开这里，去往西方，他们的离去留下的只有沉默，没有回响。大部分留下的人不抱有幻想，他们安慰自己，如果民主德国情况糟糕，波兰会更糟糕，匈牙利会更糟糕，俄国将无比糟糕。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负面比较带来的安慰。

在60年代，民主德国当局重建了广场，用的是粗野的混凝土，非常符合他们的政治风格。它炸毁了广场一角有300年历史的巴洛克式教堂，在废墟上建造了一座30层楼的钢铁摩天大楼。

卡尔·马克思广场仍然作为一个已消失政权心脏地带的公共荒漠保存下来。它是对民主德国加之于公共空间的恐惧和人类自发性的纪念碑：卖香肠的小贩、兜售小册子的人、艺术家、妓女、反叛少年，如果给予半点机会，他们就可能把它推翻。但人们确实在这个荒漠上献出生命。对于未完成的愿望，他们的效率很高：只要扼杀它们即可。在广场一端的现代音乐厅有很好的音乐会，在歌剧院里有相当好的演出，你可以告诉自己，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不管它的心脏如何冷酷，它确曾鼓舞了某种道德和美学的严肃性。

时间的冰河作用缓慢地创造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当然，有柏林墙，你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西德的图片。但是到80年代末，如果你还没有离开，你已经把你的孪生兄弟和姐妹的记忆从你的脑海中驱赶出去了。

一种必要的巨型架构——帝国式地划分欧洲——使这种遗忘相当容易。德国的分裂看上去将会永远持续。事实上，在墙的两边有两代人成长起来，他们真的担忧，如果被许可统一，他们的民族将会如何。一个统一德国的梦想不只是被抛弃了，它还受到

双方所追求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1] 的正式谴责。

所以，当帝国必需的伟大架构开始在他们的头顶颤抖、摇晃，当莱比锡的人们占领街头，他们从未有一刻会想到，他们将最终打倒一个国家，并且带来一个民族的统一。他们从未想到，如果他们全都一起挤靠被锁上的门，它也许会突然打开，让他们滚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1989年之后，卡尔·马克思广场恢复了1914年之前的旧名——奥古斯都广场。梅赛德斯—奔驰冷蓝色的霓虹灯光环飘浮在对面的保险大厦上。甚至有些方案想炸毁这个大楼，按照老照片和平面图纸，用石头一块一块重砌已消失的巴洛克式教堂。但某种不怀好意的幽灵继续使这些方案受到轻视。老莱比锡的其他每个地方都被扔到建筑商的手里，而卡尔·马克思广场仍然顽固地保持不变。在改造这个荒漠的任务面前，历史记忆仿佛退缩了。在通往大学建筑 [2] 的入口处，一群热烈工人的浮雕中间，卡尔·马克思乱蓬蓬犹如牛头一般的巨大青铜头像继续俯视着广场。某种程度上他仍是这个风掠之地的天才领袖。当游行者们用歌唱和横幅占领这里的时候，他收缩了自己的权威。现在这里又变成了荒漠，好像他的灵魂又收回了这个地方。

---

[1] 东方政策，西德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60年代提出的对东欧保持正常关系的政策。

[2] 指位于广场一侧的莱比锡大学，成立于1409年，仅次于海德堡大学，为德国第二历史悠久的大学。

卡巴莱

“它是伟大的。它是一场革命。有一个月的时间，革命是掌握在莱比锡人的手里。然后它结束了。而现在，制造革命的人民不拥有任何权力。但他们仍旧在那儿：商店售货员、图书馆员、教授。他们仍旧想要我所信仰的东西，”博恩克先生停顿了一下，看上去有点尴尬，厚实的手擦了擦前额，又往下捋了捋下垂的胡子，“谈到你信仰的东西，现在有点令人悲哀。但我说的是一个为了人民的德意志。”

从卡尔·马克思广场出发，沿着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在一个卡巴莱地下室里的酒吧，我找到了冈瑟·博恩克（Gunther Böhnke），他在酒吧后部的一个圆桌喝啤酒。博恩克先生是“学院派”（Academixer）卡巴莱 [1] 的明星，他跟我讲“冷战”时代东欧地区有板有眼、精确的英语，那种还没有受过本土接触影响的英语，那是完全从磁带里学的语言。白天，他在一家出版公司翻译儿童书籍。晚上，他是一位卡巴莱艺术家。过去，卡巴莱艺术家是威权国家持有执照的小丑。在15米深的地下，在小小的舞台上、褪色的灰丝绒幕布之前，卡巴莱是窃窃私语的地方，是不可说的东西可以说出来的地方。过去，剧院的票会提前10年卖光。一个卡巴莱艺术家可以把他自己分到的票当成钱用：有多少座位，从屠夫手里就可以换多少香肠。现在，票价太贵，当地人承受不起，座位都是被成群的西德人占据，他们来到这里，为那些嘲笑他们自己的笑话发出不自然的笑声。博恩克先生赋予“东德佬”（Ossi）以人性和讽刺性。他个子矮小，秃头，穿一件不合身的花呢夹克，系一条超大的东方式领带（East-bloc tie）。他的肚子凸起，将衬衫纽扣绷得紧紧的，忧郁的脸上交织着顺从

和精明。

在舞台上，他的固定套路是关于一个贫穷、呆傻的东德人寻找工作，一个西德的人事主管面试他。东德佬随口说他从未入过党，认为这是对方想要的，却只听到西德佬回复："你有什么毛病吗？你的积极性在哪里？"他所有的笑话都像这样，辛酸地反映一种本不应存在的分歧：一个人民，一个语言，一个民族，然而经历了45年的不同的国度之后，几乎无法认识彼此。

"他们都是好人，"莱比锡最古老餐馆的西德新店主在晚餐结束、卡巴莱开始之前对我说，"好人。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工作。我跟你发誓。我必须一切从头开始。教他们准时现身，正确地处理客人的账单，让他们的手不要伸进汤里。我不是在做饭店生意，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谈到他的德国同胞时带有的那种深情的傲慢，与英国殖民管理者在谈及坦噶尼喀人（Tanganyikans）时惯于使用的语气如出一辙。

统一不是失散的双胞胎在郊区草坪上惴惴不安的重逢，而是一种殖民占领。当你在莱比锡醒来，听到的声音是老建筑的内脏——机床、石膏、钉子、窗框、木板——被扔进长长的、带回响的塑料斜槽，滚进建筑商的废料桶的声音。建筑物的正面被保留下来——必须能把贝纳通的牌子钉在上面——但城市的内脏已经被去除了。

博恩克先生认为，当一个社会体制崩溃时，我们只能预计到，那些主要是体制受害者的人们会为体制的失败而受到谴责。世界就是这样，事实上拖垮了政权的人们，现在被当作爱发牢骚的乞丐给打发走，是被那些曾经坐在电视机前面为他们的公民勇气鼓掌的西德人打发了。

正如德国作家彼得·施耐德所说，柏林墙是面镜子。西德人问道：镜子，墙上的镜子，谁是所有人里最公正的？镜子一成不变地回答：是你。45年的时间，一个民族分裂成两个国家，双方都必须塑造对方的负面形象。为什么只因墙倒了，这种行为就应该结束呢？为什么只因每个人现在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这种行为就应该结束呢？

但是，在这个镜子的游戏中，有什么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革命之前，在西德，负面形象是民主德国这个国家自身和其令人憎恶的制度。现在负面形象是民族，是人民自身：他们的抱怨和消极。现在那个国家已经消失，人民自身——那个民族——为国家的曾经存在受到责备。

说来奇怪，这种责备经常来自东德一方。前东德人通过表达自己对从前的兄弟姐妹的憎恶而在西德混得好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前民主德国小说家莫妮卡·马龙（Monica Maron）说："我最不喜欢我的前东德同胞公民的地方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亏欠他们，尤其是亏欠他们尊严。他们似乎忘了，直到三年前，他们还没有真正摸到那种尊严。"东德精神病学家汉斯·约阿希姆·马茨（Hans Joachim Maatz）写了一本书，告诉西德公众，45年的极权主义制造了一种东德的人格结构，特征为"情感被压抑、无安全感、潜在进攻性"。他接着说：

在那个社会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保持自己、有自己意见、作为个体被理解和接受——毫无保障……在这个体制中能够安全生存的，只有那些调整和牺牲他们的自发活力、他们的诚实、他们的批判能力，过一种迟钝但是相对远离危险的顺从生活的人。

像所有陈腐的心理学形式一样，这对某些人是正确的。那么，那些不安的、神经质的、顺从的个体——像博恩克先生那样的人——是如何找到拖垮整个政权的勇气呢？东德的负面形象当然迎合了西德人的自恋情结，但它使统一的历史变得难以理解。

博恩克先生对于1989年以来国家命运的悲喜剧淡然处之："墙倒了以后，我们的人民去西德，他们带回来难以置信的故事。在那里，你可以在1月买到新鲜的莴苣和西红柿。你能想象吗？现在这里也有超市了，我们也能做到了。只是我们买不起，而且房租已经涨了五倍。"

他耸耸肩，笑了："当我们10月在莱比锡的雨中游行时，我们想要的只是多一点民主，多一点尊重。没人想要统一。"

统一了。

也没人想要卡巴莱消亡，但现在，博恩克先生说，你可以在德国电视上看到一切。那儿的讽刺更为尖锐，时效更为迅速。现在谁还想看卡巴莱呢？博恩克先生曾将他的演出带到西德，但效果并不好。太本地化，太萨克森化，太乡土了。他并不想回到旧时代，但环顾酒吧——他度过一生中最好时光的地方——烟熏过的黑色墙壁，看到从前演出的海报，看到桌子上方的吊灯（老斯塔西 [2] 过去经常在那儿藏麦克风："鲍里斯，你听得到吗？我的声音够大吗？"），很显然，藏有异议文化的玻璃罐——让他从前的生活产生意义，让他从前可以用卡巴莱票子从屠夫那儿换香肠——所有这一切也被"统一"掉了。

20世纪80年代，事情通常发生在"学院派"。现在，到了90

年代，场所转到了U-2，这是附近一座灰色石板办公楼地下室里的迪斯科舞厅。它的音乐来自慕尼黑，啤酒来自慕尼黑，迪斯科DJ来自慕尼黑，弹子机和干冰也是来自慕尼黑。那个地方天花板很低，墙壁随着声音震动，节奏透过脚底传上来，你发现自己陷入一种麻木状态。女孩子们在大喇叭上面跳独舞：甩动、摇摆、推伸、甩动、摇摆、推伸，她们闭着眼睛，在声音的洞穴中独自舞动。男孩子徘徊在弹球机之间，从一个电子游戏逛到另一个电子游戏，眼睛瞅着女孩子们。世界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迪斯科舞厅，但这个低矮的地下室过去是秘密警察的审讯室。每个人都知道此事，它不是十分秘密的事。吧台后的女孩子们会讲给你听，甚至指给你看，墙上有原来的囚犯画的壁画。三年前，这个组合难以抗拒：斯塔西的虐待狂魅力遇上慕尼黑迪斯科舞厅的色情狂魅力。引入U-2是以一笔代价打开了两个被禁闭的世界。但被禁的魅力已经完全消失，现在这里就是一个迪斯科舞厅，跟其他的地方没什么两样。酒吧的女孩在我的耳边喊："一切都很酷。"[3] 节拍震撼地板，频闪灯将她干净白皙的脸庞变成了一张蝴蝶面具，舞动着，飘浮在空中。

在整个民主德国，斯塔西拥有50万情报人员。从前，放置在像这样的建筑里的档案纸张数以亿计：咖啡馆里的窃窃私语的批评，公共汽车上的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同事言论——这是一个索引细致、收录全社会的恶意和抱怨的图书馆。但单个人能怎么样呢？如果他们不提供恶毒的流言蜚语，会让自己身陷囹圄。告密的圈子变得如此宽泛，以至于任何人能够重新找回公民的勇气都是个奇迹。但确实有些人做到了。那些没有做到的人，现在总是用他们的手做着令人厌倦、自我辩护的同样手势："那是我的世界。那是我知道的一切。"

什么能让人真正明白一个审讯中心变成迪斯科舞厅的事实呢？这儿是不是应该搞个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取而代之？音乐的声音如此喧闹，折磨着你已到中年的内心，充塞着内心每一个空虚的地方：

感觉节拍加速

那是激情之声

你可觉得，它弥漫空中？

放空思绪，加入我们

哦，哦，激情，哦，哦，激情你可觉得，它无处不在？

“与过去妥协”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严肃的解决，不是通过一种清晰的、有意识的行动来打破魔咒。毋宁说，它希望翻过这一页，并且，如果可能，从记忆中将其清除。

——T.阿多诺（T.Adorno），《与过去妥协意味着什么？》（1959）

问问你自己，那吧台里正调制鸡尾酒的女孩，或那头发锃亮、穿着贝纳通“世界之色彩”T恤的男孩，他们是否应当了解人们曾经在这里被殴打、被审讯的事实呢？摆出一副庄严的脸色吗？难道与强烈地渴望忘记所有过去相比，庄严是更为真实的“与过去妥协”？我不能问酒吧里坐我旁边的小两口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脸在频闪灯下犹如一对舞动的唱盘。怎么能期望他们了解我说的东西呢？昂纳克[4]对他们而言已经是久远的历史。当他的政权倒台时，这男孩和女孩13岁，也许更年轻。“那不是

我的问题，”我会听到他们说，“那不是我的过去。”

---

[1] 学院派俱乐部（Academixer Club），莱比锡一家历史悠久的餐馆和卡巴莱表演场所。

[2] 斯塔西（Stasi），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

[3] 原文为德文，Alles ist cool。

[4] 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前民主德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民族会战的记忆

它像一个巨大的、用烟熏成黑色的花岗岩搭成的条顿式（Teutonic）火葬堆，切割粗糙的石头向天空兀立，它们似乎要把某个强健武士的身躯奉献给火焰，只是在这个纪念碑的最高处、应该放棺木的平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身躯要奉献给天空，只可以从这儿纵览城市的全景，城市则围绕它而发展成长。它如此巨大，超过欧洲所有其他战争纪念物：一座怒目而视的威廉家族[1]石堆，孑然独立，像家族里最执拗的成员站在莱比锡郊外的一个公园里。就其恶劣的好战趣味，以及僵硬、粗野的纪念碑样式而言，它完全是一种尴尬。雨水如丝，落在它厚重的表面，它似乎在嘲笑：来吧，试试将我焚毁，你会失败的。我太大了，我在这里太久了，我比你们都要长命。

德国从1871年统一后不久，开始纪念1813年的民族会战，当时，100万来自俄罗斯、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士兵激战一天，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拿破仑在那一天最终战败，标志着他的帝国开始没落。那是第一次，来自德意志各公国的人们站在一起作为德意志人而战斗，即使部分德意志人也站在拿破仑一方作战，这个战场仍被宣称为德意志民族的诞生地之一。这个纪念碑正是为此而建，1913年会战100周年纪念典礼上，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II）为它的落成揭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检阅台旗帜飘扬，帝国羽饰犹如丛林，胸甲闪闪发亮，紧绷的绑腿掖在长筒骑兵靴里，刀剑在腰间叮当作响，冷酷的帝国面庞，脚跟咔嚓并拢致敬，戴头盔的人们互相轻轻点头致意——这些牵线木偶们明白自己处于荣耀的顶峰，那在他们头顶矗立的巨大石堆所象征的荣耀。

装饰纪念碑的雕塑家选择向威廉家族献媚，将他们刻画成条顿武士。在纪念碑底座的雕塑饰带上，有这样一个大师形象，是画成德意志武士的圣米迦勒[2]，头盔环绕面颊，眼睛凝望德意志早已确定的伟大未来。环绕他周围扭动着自然世界的象征：狮子、老虎、龙，全都听从他的意志，还有一条长长的斑点蛇，嘶嘶着、微笑着。这些动物充满了矛盾：它们是内心的恶魔，还是邪恶的力量？似乎都有，因为他的目光既犹疑又果决，既痛苦不堪又坚定不移。在圣米迦勒的左边，有一对挤眉弄眼的死神头颅，像斜眼的猴子一样在嘲笑他庄严的目光。

20世纪30年代有一幅著名的海报，元首装扮成一个日耳曼武士，穿着闪亮的胸甲，佩剑，戴头盔，跨骑在马上，高高举起一面血红的旗帜。我一直认为希特勒和戈培尔（Goebbels）在运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人物和形象中，显示了某种创造性。事实上，我还一直认为，这种艺术的创造性——施佩尔[3]呈现在他的纪念性建筑物中，里芬斯塔尔[4]呈现在她的影片里——有助于解释纳粹在人们心中激发的极端狂热。除了敬畏和恐惧，还有身处全新呈现方式的战栗。

但作为政治艺术家，他们的创造比我曾认为的少。纳粹吸引力的全部色情用品都已经在这儿了，在莱比锡的这个纪念碑：同样的头盔、同样的蛇、同样的条顿式激情、同样滑稽的男性阳刚崇拜，同样对本性充满色情的迷惑：它是创造生命的力量，还是淫荡的怨恨？全都在这儿了。希特勒不是政治艺术家，只是一个熟练的低俗品位鉴赏家。

没有不媚俗的民族主义艺术，没有不扮演真挚情感的爱国主义创造。为什么？也许一切非个人化的艺术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真诚，而民族主义艺术从定义上就不可能是个人化的。也可能，民

族主义艺术不可能创新。它固着于可资利用的传统，或者，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则固着于媚俗，在这里是条顿骑士的日耳曼黑森林。

希特勒对日耳曼历史的拿来主义，只限于利用19世纪中期一种庞杂、狂热的伪善情绪。因此，如阿多诺 [5] 提出的，原装货和抄袭货都意味着一种连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民族主义形式。这个纪念碑的峭拔巨大是一种怀疑的自白，希特勒的模仿也是。为了让人信服，两者都必须威吓。

这种对媚俗图腾过于夸大的模仿并没有跟着希特勒一起终结。身着领巾和皮短裤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曾手持火炬向纪念碑进军，并以向德意志帝国（Reich）致敬的仪式作为结束。在图片中，你可以看到火炬在观赏湖面上闪闪发光，烟雾升腾在火红的天空。民主德国坚持它已经和法西斯及资本主义的类似过往彻底决裂。然而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的领巾和短裤叙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而被称为"青年奉献"的青年成年礼——许多声音高呼对新国家的忠诚——甚至复制了旧有的瓦格纳火炬仪式，天空中火红的烟雾怪诞地映照在观赏池中。

"但你还期望其他什么呢？"赫尔穆特·博尔纳（Helmut Börner）说，他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做了个表明自己既绝望又生气的手势。"这是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博尔纳先生是纪念碑隔壁博物馆的馆长。他会觉得民主德国复制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巾奇怪吗？他说不，是我搞错了："我那个时代，在先锋队的时候，我戴的是蓝色的领巾。我父亲那个时候是

黑色的领巾。”

我说：“但是它们还是同样的领巾。”

“啊。”博尔纳先生说着，从我身边溜到玻璃柜后面，那里面有法国胸甲骑兵的制服、一些大炮用的霰弹、老式的火枪和一面鼓。“这是旧瓶装新酒。旧瓶子还很完美。我的父母没有将它们丢掉，他们只是把白酒换成了红酒，”他就此想了一会儿，“是的，也许就是那样。”

“但是新酒不会被旧瓶污染吗？”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眯眼看着，捻着自己红色的短髭，退回到博物馆更远处的另一个玻璃柜后面。然后他问我，是否曾经离开自己的家庭，尝试开始一个新的家庭生活。我说没有。“那么，如果你那样做了，你不会把旧的扔掉。你尝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同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比已经失败的旧婚姻强。”

他指向一个玻璃柜里的一幅小水彩画。它描绘了一群莱比锡妇女在战斗结束后帮助把伤员抬上马车的情形。“他们是法国人还是萨克森人，或是普鲁士人、瑞典人、奥地利人或俄罗斯人，完全不重要。她们一视同仁地照看他们，”他平静地说，“当然，你不能拿今天他们能得到的那种看护来比较。他们成千上万地死亡，死于伤寒、神经和伤口感染，已经开始做截肢手术，那么可怕，我们无法想象。”

如果是在1813年度过他的余生，博尔纳先生会更快乐些。那样会更简单，我会同情他。谁想要解释一个党员如何应对自己的世界的崩溃？

“我比共和国大一个月，”他用自己那种平静、沉思、间接的方式说，“我生于1949年9月，所以我在这个时期、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长大。那是我的世界。”当局让他探查遥远过去的安全性，并认为只有他的展览强调了俄罗斯和德国军队在莱比锡铸就的历史友谊。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他们曾站在同一边战斗。有一些苏式制服的展览把这一友谊呈现于现在，但制服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他在1988年得到许可，把它们处理掉了。他没有任何理由假装自己不是党的一员。他仍旧希望历史能仁慈地评判民主德国，它比在他自己周围正在形成的社会更为平等。而且民主德国生存在和平中。民主德国没有军队参与过战斗。我问，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吗，1968年？没有，没有，他坚持说，也许有后勤支持，但从未有作战部队。

他希望历史能冷静地评判民主德国。但他知道历史不会做出裁判。根本不会有清算。要发生的已经开始，民主德国政权的每一缕踪迹都被扫进了废物桶，所以10年后新的一代将很少相信它曾经存在过。

我自己在想，应该有一个民主德国的纪念馆，摆满特拉比和沃特伯格[6]汽车、从建筑物的山墙上拆下来的锤子和镰刀、体育英雄的图片、埃里希·昂纳克的呢帽、一些斯塔西的档案、隐形麦克风、重修的审讯室、一座原始大小的度假狩猎小屋。博尔纳先生笑了。他说，博物馆永远是成功者的存档、胜利者的圣殿。但是应当有关于错误的博物馆，我说，尤其是对于摧毁生命的错误。问题是，他说，谁会想参观这样一个博物馆呢？

博尔纳先生知道，这种对民主德国的抹杀，正是德国式的。每隔50年，这个民族的过去就被重新书写，那些生活在其他状态下的生命突然被剥夺了他们所有的感觉。这伴随着博尔纳先生的

父亲，纳粹时期的一个学校教师，也将伴随博尔纳先生自己。他说，只有人类如此，因为人们想要压制过去。“在私人生活中可能也是这样，什么事情错了，你非常失望，你想将它关闭，在下面画一道线，再也不想提到它。”确实非常人类化，但人们想知道，各民族是否允许它们自身像个人那样遗忘。

当对党员的清洗——像他这样的党员——波及他在博物馆角落里满是灰尘的办公室时，博尔纳先生被迫辞去工作。在新形势下，他觉得自己会活得更好，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通过只信任“某人最亲密圈子里的一些人，人们可以依靠这个圈子，在这里人们会感到快乐”。东德人不停地哀叹与资本主义一同到来的生活的私有化（“这些天每个人都在为他们的前门买锁”）。事实是，它只会增强在社会主义之下已经存在的生活私有化。

博尔纳先生也知道，相比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遭遇，在他身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会温和许多。1945年，成千上万名纳粹分子受到苏联战时军事法庭审判和枪毙。他自己的父亲在一个苏联集中营待了四年，认为自己足够幸运，得以活命。1989年革命以来，对过去的清洗没有牺牲一条性命。这很了不起，博尔纳先生说。我们德国人并不总是重复错误。

令他最困惑的是，为什么他曾让自己相信，为自己考虑的风险远远超过实际的风险？这是他最为后悔的。“我当然可以更勇敢些，因为我们当然会害怕，会有恐惧，今天的结果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给自己施加某种形式的自我审查，那是不必要的。”当他谈到这里时，映照在玻璃展柜——那里面有制服、火枪、救护马车、鼓和小水彩画——上的脸庞突然显得悲痛和困惑，仿佛他无意中发现了当局将他轻易握于股掌的秘密，太晚了。

他带我走出博物馆，我们站在斜对面民族会战纪念碑的阴影下面。我问他，纪念碑是否并不代表某种德意志理念。他笑了：“在民主德国，我们不谈论德意志。”德意志是被禁止的话题。身份认同是与国家、与社会主义、与对伟大苏维埃母国的友爱联系在一起的，但与德国[7]、人民、世代相传的记忆无关，这些是反动资本主义的谎言，以沉思的条顿人的圣米迦勒为代表。

然后博尔纳先生微笑起来，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说：“我很高兴民主德国没有建造自己的民族会战纪念物，从未尝试用石头建立它的德意志理念。”

“为什么没有呢？”

“你能想象一下如果有，它会是什么样子吗？”他说，突然进入一种自由思想的明亮光芒中，“它应当是一个混凝土地堡，”他再次大笑，“是的，一个混凝土地堡，那是民主德国留在身后的一切。”

---

[1] 德国皇室家族。

[2] 圣米迦勒（St Michael），基督教传说中的大天使，上帝身边的首席战士、天使军最高统帅。

[3] 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纳粹德国的首席建筑师、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

[4] 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纳粹德国时期电影女导演，代表作品《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

[5]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6] 特拉比（Trabi）、沃特伯格（Wartburg），均为前民主德国汽车品牌。

[7] 原文为德文，Deutschland。

生活于民主之下

过去，东德人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状况相对较好，给西德人提供了一个德意志自恋的机会。东德是最为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这个事实似乎证明，德意志的美德甚至胜过计划经济之类的布尔什维克理论。换句话说，民族强于国家。

墙倒下了，西德的实业家们来了。他们参观东德的工厂，仔细察看机器，盘点工厂、建筑物、原材料，记录工人每小时的生产率，等等。他们回到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的总部，面带焦虑。东部是一片灾区。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推倒一切，从头开始。其中也包括工人。他们必须重新学习所有德国人的品质：守时、干净、实干、努力。这个故事的道德意义是什么？国家制造民族；体制可以摧毁一个民族，即使是德国人。

卡拉·辛德勒（Karla Schindler）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像男子一样的短发，露出时髦的环形耳环。50岁出头的她记得进入莱比锡棉纺织厂的那天：1953年9月1日。她的母亲在她之前进厂，她的女儿在她之后进厂。40年的工作，她能展示的是两张证书——社会主义管理部门的致谢，证书装饰有民主德国的锤子和镰刀标志，以及最冷冰冰的东西——科学量角器。她还有持续多年的咳嗽顽疾，这是40年来在棉花机器上工作的结果：在棉丝的阴霾里呼吸，阴霾如此浓密，有时她甚至看不到相邻的工人。

她应该痛恨这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19世纪大杂院，这儿挤

满了厂房和工棚，然而她围着它忙碌，跟叉车上的男人聊天，与守夜人开玩笑，跟机房的女孩子分享秘密。“我为什么要恨这里？这曾是我的生活。现在还是。”辛德勒夫人是工厂在特罗伊汉德（Treuhand）[1] 的代表，这个组织正在将东德的工业部门私有化或者关闭。西德人想关闭工厂。辛德勒夫人正奋力抢救它。“有一位犹太绅士，他的家族从前拥有这个工厂，他对它有兴趣。”她满怀希望地说着，带我进入第一车间。那是一个旧的工业地狱，里面所有的东西——墙壁、宝石蓝机器、塞满了棉花包的笼子，都覆盖着白色棉花丝。空气中是黑褐色的棉丝和灰尘悬浮物，映照在污迹斑斑的窗户中透进来的微弱光线之下。一个老人正把原棉送入一个分离器，它将原棉拉扯成纱。辛德勒夫人把手插进一个棉花包中：“从乌兹别克斯坦来的。苏联，没救了。”那就是工厂存在的秘密：从苏联帝国的亚洲地区送来廉价、低质量的棉花，勤劳的德国人将其变成廉价的棉纱，供应给克拉科夫、布达佩斯或莱比锡的贫穷家庭主妇。这无法继续下去，辛德勒夫人知道这一点。没有优质的原材料和新的机器，这个老家伙将在几个月内失业。

莱比锡纺纱厂是一座对某种劳工乌托邦、某种归属和同志友谊的纪念碑，不管社会主义有多少其他的错误，对于像辛德勒夫人一样的人们，这是真真切切的。她从未完全相信它的一切。这儿曾有一种军事体制，要求各个队伍互相竞争，以完成生产指标。在通往纺纱车间的门口，我们看到一个陈旧的牌子，写着“民族队伍之间的友谊”。当然，意思是俄罗斯和德意志民族之间的永恒的社会主义友谊。“这个怎么样？”我问她，她扬了下眉毛，似乎说，你在开玩笑吗？

纺纱车间里面，有两三个穿浅色、透光连衣裙的女孩子，透

出下面白色的内衣。她们在皮带上来回拍打，将已经满了的纱锭扔进齐腰高的红色箱子里，把新的纱锭装上去，重新绕纱。辛德勒夫人凑上去听她们抱怨一种新的亚麻线给她们带来的麻烦。她不必告诉她们，她们的工作就像她们用牙齿咬断的线那样脆弱。这个古老工厂的一间间房、一层层楼现在都关闭了，机器盖上了塑料布，地板上灰尘堆积。

在楼上的工会办公室里有散乱的盆栽植物、描绘保加利亚海滨游客欢乐的褪色海报。她告诉我，特罗伊汉德将她置于两难抉择的境地。他们告诉她会拯救这个工厂，作为交换，她必须解雇绝大多数员工。

不过，她坚持认为，情况现在正在改善。她可以挣德国马克，可以去西德旅行。“那里很迷人，”她充满渴望地说，仿佛是在谈论塔希提（Tahiti）的岛屿，“那里的空气多么清新。”

我告诉她，从与我交谈的人那里，我一直听到这个奇怪的词语。他们说，过去我们活在法西斯主义之下，然后活在共产主义之下，而现在，他们说，我们是活在民主“之下”。这不是一种怪异的谈论民主的方式么，就好像它只不过是另一个你必须服从的体制？

她微笑着耸耸肩：“从前，主任经常大肆鼓吹社会主义，这个队伍，那个队伍。现在是自由市场经济。他完全转了180度。”但她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或者愤慨：“我们管这叫随波逐流。”

“而现在，”我说，“你正在学习自己游泳。”

“是的，现在我正在学习自己游泳，”她脸红了，“我现在在

公开场合讲话。是的，我做到了。”她参加过一个关于行业未来的座谈会，“我听到我们的总理说萨克森呢如何如何，纺织行业这个、纺织行业那个，我对自己说，应当让他知道工厂里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于是在他的演讲之后的间歇，她喝了几杯白兰地，然后，会议恢复进行时，她站起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那是我第一次有足够的勇气演讲，”她看了看我，腼腆地笑了，再次耸耸肩，惊讶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在每一个地方都讲话，即使是在市集广场上。”至少，辛德勒夫人不是活在民主“之下”，而是第一次活在“其中”。

---

[1] 即托管局。——编者注

做一个好德国人

从前，它叫季米特洛夫 [1] 学校，这儿有一座雕像，纪念这位1934年因国会纵火案而受到审判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学校操场上甚至曾经有过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季米特洛夫雕像，但已经被推倒了，这个位置上现在什么都没有。革命以后，它改名为雷克拉姆学校（Reklamschule），以在纳粹和民主德国时期都受到压制的自由思想出版社雷克拉姆（Reklam）命名。

我在地下室的学生房间里，这儿革命后刷新过，一面墙上有用英语写的涂鸦：“嘿，老师！别干涉孩子们！”17岁的马丁·莫舍克（Martin Moschek）正在告诉我从前的课程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在数学课上，我们要计算这样的题：古巴被帝国主义者攻击，5个人驻扎在一个防空火箭站。我们得计算导弹的弹道抛物线，它是否能击中帝国主义者。诸如此类，”想到这里，他摇摇他的一头卷发，“那时候，我们没注意到有什么奇怪的。”

马丁的父亲是一名路德教派牧师，所以马丁的成长有一半是处于当局的意识形态玻璃罐之中，一半在其外。回头来看，他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相信他们被教授的东西，抑或是默默地在内心“移民”。对他而言，回头看确实难以相信学生们如此顺从。他高兴地笑了，用他那种平静、正式、带点学究气的方式说：“学校没有学生，就不成其为学校，这一点得到更多认可了。”所以一个英国摇滚乐队的智慧被涂鸦在他身后的墙上。 [2]

马丁有一张光滑的、天使般的脸，卷发的轮廓像是在丢勒

[3] 的画中，他柔和、深思熟虑的说话方式带有德国路德派的深沉内敛。我问他，从前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

“我以身为民主德国的公民而自豪，我以我的祖国而自豪。我们总是把祖国和民主德国联系在一起——没有‘德意志’。”

同样的东西，博尔纳先生说得更多。对于在民主德国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德意志”是一个不可置信的幽灵，一个演讲中的形象，只在巴伐利亚啤酒馆中复仇式的怒骂中或民主德国电视台的话语中使用。无论如何，1939年的旧德意志，那个扩展到远至今天的波兰、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已经被英雄般的苏联军队所粉碎。它已经永远消失了，埋葬在盟军和苏联的联合占领之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创建一个只与社会主义自身、工人运动组织及其符号——尖锐、冷漠的科学量角器——相联系的德国。

然而，精英并没有放弃，如果将某些民族象征复活、翻新，对国家的忠诚会更为丰富。20世纪70年代，宣传部组织了对德国传统英雄谨慎、有限的运用。那个反抗德国王公的路德被允许进入万神殿，而那个为德国王公叫嚣、要镇压1525年农民暴动的路德被小心翼翼地从图景中抹去。军纪严明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4] 赢得了官方的尊崇，因为当局对军纪比对社会主义更为看重。与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Husák）一样，昂纳克的德国转向民族主义，以掩盖他的政权的衰朽。

太迟了，太迟了。1989年11月，人民做出决定，是他们，而不是国家，才是真正的民族。

那么，一个17岁的东德人如何理解现在的德意志民族概念呢？马丁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静静地说：“如果现在你说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很清楚——至少对于我是这样——你是在说，你为你的国家而骄傲。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在于它并不就此止步。它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这里有些人说统一尚未完成——波兰的东部领土和苏台德区还在等着。那像是敲响了我体内的警钟。”

他又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全都可以归结为暴力。如果一个人说他为德国自豪，不带暴力地劝说我，那还好。不幸的是，现在在德国这很少见。”

黄昏，马丁和我正穿过架在莱比锡郊区一条运河上的一座狭窄步行桥。我突然注意到在桥上有黑人从我们身边经过，北非人、巴基斯坦人、索马里人，一对一对的，手里拎着塑料购物袋，夹克的领子竖起来抵御寒冷。他们是我在莱比锡见到的第一批非白人面孔。像东欧大部分地方一样，东德是白人占绝对多数。从东德人的角度来看，在统一带来的所有惊奇中，最可让人惊讶的是种族。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国外出生。在每一个人群中，都会有一片这样面孔的海洋。在莱比锡，他们是新奇的、陌生的、异类的。他们在这座桥上，因为这是回家的路，而他们的家是一个提供庇护的旅馆，一群活动房屋，设置在细铁丝栅栏后面的砂石地上，紧邻柏林至莱比锡的高速公路。

我们用法语和一些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交谈。他们走遍了欧洲，寻找工作，他们已经申请在这里避难，正在等待处理。但这

是场痛苦的等待。他们说那些活动房屋又冷又透风，晚上他们躺在铺位上，抽雪茄烟，等待纳粹分子的攻击。

马丁点头同意。他们不是在夸大其词。两个星期前光头党（the skins）第一次在桥上出现，向旅馆走去的时候，他和一个学校的朋友正在这里。他们带有刀和棒球球棒。桥的另一边，警察坐在一辆大众的巴士里面，并没有阻止他们。因此马丁和朋友试图阻止这些光头党穿过桥梁。这两个文质彬彬的少年尽了最大努力，他们没有想过带上武器，没有任何想要打架的意思，他们想，只要勇敢地站出来，他们可以把一队光头党打发走。

马丁悲哀地笑了笑，像是在抚摸一个旧的伤疤："我们被拳打脚踢，他们试图把我们扔到运河里去。"但警察最终跳下车子，把这些人赶跑了。马丁靠在桥栏杆上，注视着活动房屋。我问他为什么认为自己应当介入。这些人是来真的，他们带有武器，这不是少年的地盘。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他知道——因为父亲告诉过她——20年代魏玛时期，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暴力循环不断升级，直到最终完全失控。然后，他盯着坐在活动房屋开放的门口处抽烟的黑皮肤的人，"看，我只是想显示，在这里仍有一些人支持他们，"他想了想，然后说，"我想要那些光头党知道，如果他们再来袭击这些人，他们必须越过一个德国人。"

---

[1]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因纳粹炮制的"国会纵火案"而受到审判，后被无罪释放。其后长期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

[2] 指上文中的涂鸦："嘿，老师！别干涉孩子们！"此为英国著名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歌曲《墙上的另一块砖》（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中的歌词。

[3] 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

[4] 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其间将普鲁士发展为一个强国。

利奥和里希

利奥（Leo）有一个新的伤疤，从他的前额向下穿到右颊，是几天前的夜晚在一个出租车站的打斗中留下的。他还有其他的伤疤，在发梢处和胳膊上，是他在东德的儿童之家和监狱里留下的。在一条前臂上，他有一个英语写的刺青“Skinhead”（光头党），另一条手臂上的刺青是一个铁十字架和一幅1937年的德国地图，地图向波兰扩展了一半。他的汗衫上写着“FAP”，自由工人党 [1] 。“他们是唯一维护工人的政党，”他说，“其他党都是狗屁。”

利奥并没有失业，如果我说新纳粹主义（neo-Nazism）是东德的失业问题催生的，他会嗤之以鼻。对于利奥而言，新纳粹主义是一种信条、一种生活方式，完全与一个稳定的工作合拍。他说，毕竟德国人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知道怎么工作。他是一个好德国人，所以为了保住在西德一家小公司做组合家具平板包装装配工的工作，他让自己的头发长成体面的平头。今天他休息，所以在利奥位于莱比锡北部劳工阶层社区的公寓里，他和同伴，一个16岁、有一双招风耳的中学生里希（Leech），正在喝“煤油”——用几品脱啤酒和樱桃酒混合而成的酒饮。

这儿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外国作家谈论新纳粹主义——并不新鲜。我给他们提供宣传的机会，他们给我提供鲜明的、并不令人愉快的“拷贝”答案。我问他们标准性的问题，而他们报之以标准的怒斥。奥斯维辛？从未发生过，只是抹黑德国人名誉的谎言。“所有那些用毒气杀人都是屁话。从没发生过。”他们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个，但如果你相信老师告诉你的任何事情，你就是个傻瓜。关于德国，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羞耻的吗？没有。国

家发动战争，国家输了战争。那又怎样？对话结束，我得说，像他那样的人代表了正在侵蚀脆弱的德国民主之心脏的癌症。

这已经足够真实，但还有些可以说的。首先，看看里希的背带，它们装饰有英国国旗。对于像利奥和里希这样的好德国人，要承认他们有多感激英国人，多少是件尴尬事。新纳粹主义也许在英国已经式微，但光头文化（skin culture）——种族主义、发型、音乐——正席卷从旧民主德国的波兰—德国边境到法兰克福的地区。光头文化可能是英国对德国以及新欧洲所做的最为持久的贡献。

听利奥说话的时候，我试图理解，为什么他是我在莱比锡遇到的唯一对国家有强烈自豪感的人。这是他让我警惕的地方，而不是他的伤疤，不是他的铁血言论，不是他放在门边的短棍。如果你从他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他来自欧洲唯一不允许对自身有好感的国度。在民主德国，他们告诉他民族主义等于种族主义；在西德，他们说民族必须为其罪恶赎罪，而且他们开始建立一个以德国马克为基础的后民族主义身份。当国家不再以和平的方式为其自身感到自豪时，当民族自豪的宣言被迫转入地下，当爱国主义被罪恶所绑架，也许就会产生像利奥这样的人。

利奥也代表了被压迫者的回归。在西德，大多数人都接受了1945年战败之后加之于它的边界。在东德不是这样。利奥的母亲出生于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那儿曾经是德国的一个省，现在属于波兰。利奥的父亲在上西里西亚拥有一个农场，按他的话说是“一座产业”。利奥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1945年春天俄罗斯人把他们驱赶到莱比锡的时候，家人是如何被俄罗斯人俯冲轰炸，把他们赶进壕沟里逃命。我问利奥是否想回到上西里西亚参观，他说：“不做游客，绝不。必须跟德国国旗一起去。”

但科尔[2]不是签署了条约承认与波兰的边界吗？利奥轻蔑地吸了一口万宝路。没有政客能将德国人忽悠出他们的土地，他说。

如果不是成长时受到一个工人国家的谎言蒙骗，利奥本应是一个好社会主义者。他对身为工人有强烈的自豪，对于从前的日子，他最痛恨的是党的领导人把阶级团结友爱的言辞变成对自己特权令人厌恶的辩护。在昂纳克的政权之下做一个光头党，不仅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反抗标志。它也是真正的德国工人的一种战斗方式，他激动地说。

利奥确实有两年——“我被浪费的两年”——在昂纳克的监狱里度过，原因是试图逃往西方。统一之后，利奥要求作为政治犯获得赔偿。拿1万德国马克作为补偿给一个会兴奋地点燃宪法的光头党，是对德国好心的民主的又一个讽刺。但那样的姿态不可能把利奥争取过来。因为民主对他来说不是一种价值观，只是另一个政权，就像昂纳克的政权，像再之前的希特勒政权。他生活在社会主义“之下”，他将生活在民主“之下”，对哪一个他都毫无敬意。

在社会主义之下，至少有同志关系。“在共产主义之下，莱比锡可能有30到40个光头党，我们会团结在一起，如果其中有人没钱了之类的，没什么，其他人会帮助他，这样我们都有得喝。而现在，我们都在计算每一分钱。太糟糕了。”

我们说利奥是反对一个腐败的工人国家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消极、充满谎言的思想残渣，或反对新的统一带来了比以前更多的无家可归的人，这并不是为他辩护。为利奥解释不是证明他有理。只是当他从破烂公寓的窗户看出去，看着生锈的特拉比车

子，看着被废弃的、毁掉的祖国，他想要把谁的脸揍扁。“家，”他痛苦地说，“这里不是家，这里只有不幸。”

如果在洛杉矶或者利物浦，他可能只不过是又一个少年匪帮的头儿。新德国的噩梦在于，它的少年匪帮谈论政治。也许让人安心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创新，他们的用词和政治想象都有其渊源。希特勒的危险在于看上去他是全新的。这些穿着“希特勒：欧洲之旅”T恤的少年人缺乏自己的戈培尔、自己的里芬斯塔尔或施佩尔。没有扎小辫、穿双排扣西装的中产阶级后现代绅士把自己与这些匪帮绑在一起，为他们的推广和形象而工作。没有推广、没有中产阶级虚无主义者所拿手的迷人魅力，利奥可以受到遏制。可怜的利奥，他是如此地道的工人，以至于鄙视我和所有的中产阶级绅士。如果他更圆滑些，也许会知道如何利用我。如果他更愤世嫉俗，也许会真正危险。

实际上，他已经够危险了。利奥知道，当他和里希向避难者住所投掷火把的时候，他们对德国政治的影响力比议会里的100次演讲还要大。他对这些演讲——呼吁宽容、谴责暴力、鼓吹和解——的轻蔑完全可以理解。他了解他所看到的薄弱之处。

德国民主如何对待利奥呢？除了官方的反种族主义集会、学校里的多元文化主义课程，在整个前东德地区，政府正耗资开展一项公共关系运动。其核心形象是一幅海报，上面是一片红色、金色、黑色——德国国旗颜色——的海洋，标题写着“这是包容和尊重人类尊严的色彩”。德国人的一项任务仍然是：你还得提醒人们，为自己自豪的同时不需要恨其他人。这幅海报奋力在汽车和啤酒的广告中让人们看到。抛开其表面的光彩和复杂，这幅海报意味着一种救命的呼喊。利奥怎么看呢？他轻蔑地微笑，摇了摇头。他知道海报是在说：现在，利奥正走向胜利。

[1] 原文为德语，Frei Arbeiter Partei。

[2] 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930—），1982—1998年担任统一前的西德以及统一后的德国总理。

德国民族主义历史的间歇期

种族民族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在拿破仑1792—1813年入侵德意志诸公国期间的创造。德国知识分子站出来反对法国启蒙运动将政治社会视为一个平等契约社会的观点，他们将德意志文化提高到普世文化的高度，反对冰冷的、机械的法兰西个人主义。在这过程中，诺瓦利斯[1]、席勒[2]、费希特[3]、穆勒[4]等人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民族的真正喉舌。而他们的民族主义信条倾向于捍卫已有的秩序、反对法国人，后来激发出统一和变革的激情，消解了等级制度和德意志诸公国。

对于浪漫派而言，社会权威的新的主体是“人民”，一种德意志民众的高度浪漫、抽象的形象。“人民”是法国“民族”（la nation）理念以种族为决定因素的变种。这个“人民”——简单、干净、纯粹、热忱于公有社会——是一个不快乐的知识界的快乐投影，他们寻求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拒绝的情感归属。

在法国、英国和美国，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化了的意识形态。在浪漫派看来，它变成了一种反现代化的信条，表达了他们对在法国出现的世俗民主的嫉妒和憎恨。浪漫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对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的飞跃，倾向于一种个人通过归属于“人民”的强烈体验获得内在自由的社会景象。

德国历史学的传统之一是将希特勒的恶性民族主义追溯到显然无辜的德国浪漫派情感主义，然而，我们如何从赫尔德[5]那里得出希特勒？至少是从那个给出著名评论——“因此从根本而言，所有的比较都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根源于其内在的幸福核心”——的赫尔德？希特勒扩张性、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普

遍化的信条。德意志要成为所有一切的比较标准。这恰恰是赫尔德历史化、相对化的民族意识理念所否认的。

希特勒统治下的大屠杀结果也不应让我们倒过来重写“人民”（Volkishch）民族主义的历史，把从“人民”的定义中排除犹太人视为一种始终不懈的努力。事实上，反犹主义直到1871年之后还未成为德国民族主义的中心，而它成为中心，盎格鲁—撒克逊的反犹主义（奥斯丁·张伯伦[6]）、法国的优生学和美国的新达尔文主义，与德国本土的舆论潮流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而且，犹太人只是德国民族主义可以抓过来定义他者的族群之一。法国大革命之后，是法国人；1871年之后，是斯拉夫人。

德国人始终对他们东部与斯拉夫各民族的边界高度关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德国人大规模迁移到东部临近斯拉夫人的边界，让德国人相信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殊性。东部的大型德国人社区保留了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事实上许多斯拉夫—德意志的民族同化确实发生了，但民族自我认知的决定性因素是并未发生的那种同化。东部的斯拉夫边界地带让德意志的核心地带将自己界定为一个拥有清晰的种族边界的国家，这是法国无法比拟的。

随着斯拉夫人自己从德国人那里了解了种族民族主义，轮到德国人为他们东部边界上包括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的民族统一蓝图而恐惧了。只要两大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7]和哈布斯堡保持对斯拉夫新兴民族的控制，这种对东部的恐惧是可以容忍的。一旦这些帝国在1918年解体，一个新的斯拉夫帝国在列宁及其后的斯大林领导之下，在衰弱的德意志边界崛起，德国人对

斯拉夫野蛮的古老恐惧复活了。这些恐惧被希特勒熟练地加以操控，他在多种族的帝国熔炉维也纳长大，早已开始讨厌其浓重的多种族性，视其为对德意志人民天然优越性的冒犯。

即使我们注意到德意志对斯拉夫千年以来的恐惧，以及他们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但像最近一些历史学家那样，宣称“德国从德意志民族身份存在一刻起就在准备大屠杀”，不过是某种媚俗的形式。这无异于说，从现代性存在的时刻起，从有铁路和煤气炉开始，大屠杀就准备要发生。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德意志民族的种族性定义会清除其他所有可能的竞争选择，对此如何解释。因为竞争始终存在。在1848年席卷德意志各公国的革命之后，法兰克福议会走得如此之远，其集会甚至是依据德意志公民身份，不仅仅是那些种族上的德意志人，而是“所有那些在德意志居住的人……即使按出生和语言他们并非德意志人”。战后德国转向这样的传统——即使它们已被扫地出门——试图为自己界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形象。

除了明确的自由派和公民传统，还有一种也许可以称为“国家民族主义”。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为拿破仑战败之后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 [8] ，以及俾斯麦1871年达到顶点的统一计划提供了意识形态动力。与浪漫派保守的种族民族主义不同，“国家民族主义”拥有强烈的现代化冲动。它力图首先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不是通过召唤浪漫的“人民”，而是通过创造对帝国机制的集体性公民依附。希特勒魔鬼式的成就是将德意志“帝国”民族主义的（Reichsnational）和“人民”民族主义的（Volksnational）意识强行捏合到一起，形成德意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种族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竞争来源由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作为1914年以前欧洲最强大的工人运动，它有强烈的国际主义和反民族主义意识的特征。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一直坚持——如果不算成功地——反对种族特殊主义，它的余脉仍在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延续。

一方面，工人支持的党派拒绝表达民族性的言论，认为它是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另一方面，传统的德国保守主义未能在德国工人中为宪法民族主义赢得支持。希特勒乘虚而入。德国左派和右派都没有能够在德国劳工阶层中为宪法、公民的民族主义赢得决定性支持，这一灾难性的失败为希特勒打开了道路，放弃它们，转向一种极其恶毒的种族民族主义。他是德国第一个将民族主义转化为流行大众运动的政客。他的仇恨政治指责战胜的协约国对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负有责任，指责犹太人的阴谋对大萧条负有责任，从而精明地将人民划入高贵的受害者之列。受到误导和挫败的人民转向希特勒，因为他的民族主义取悦他们，消除他们的不安，使他们相信其他人应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负责。民族主义提供给党的信徒一种政治麻醉剂，一种永远愤慨、欢欣、偶尔暴力的兴奋状态，使他们从正常的、沉闷的普通生活中逃离出来。

德国自由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都未能证明自己强大到足以阻止希特勒，但如果人们将它们排除到故事之外，德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会变成一次漫长、冷酷、毫无特征的通向希特勒的进军。而且，如果你从故事中排除德国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的传统，你就不能解释战后自由派、社会民主派意识的复兴。换句话说，你就不能解释45年来在联邦德国的民主的真正事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德国历史不是其命运，未来不是过去的囚徒。

只有民族主义者才会那样认为。

---

[1]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原名弗里德利希·冯·哈登贝格（Friedrich von Hardenberg），诺瓦利斯为其笔名，德国诗人，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之一。

[2]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3]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

[4] 亚当·海因里希·穆勒（Adam Heinrich Müller，1779—1829），德国社会学家。

[5]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诗人、哲学家，浪漫主义先驱。

[6] 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1924—1928年担任外交大臣，因促成《洛迦诺公约》而获得1925年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奉行对德绥靖政策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是他的异母弟弟。

[7]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欧洲王室家族，是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

[8] 施泰因—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1807年开始的普鲁士改革，涉及农业、工业、城市、行政、教育及军事等方面，由1807年担任首相的施泰因和1810年担任首相的哈登贝格所推动。改革帮助普鲁士走上现代化道路。

美杜莎餐馆和伏尔泰咖啡馆

莱比锡机场和法兰克福机场只有45分钟的飞行距离。两个城市的规模大体相当，两者都有巨大的国际贸易展会。他们互相之间犹如孪生兄弟，统一以来，法兰克福官员来到莱比锡，告诉他们如何管理城市。但即使他们是双胞胎，从他们的机场你是无法知道的。莱比锡的机场有两个登机口、三架飞机、一个酒吧、几个售票柜台、一个租车处，就这些。而在法兰克福机场，我在数到100以后忘记了登机口的数字，我没有能数清酒吧、餐厅、服装店、色情影院、报刊亭、书店、租车处的数量。它不像一个机场，而是像一个大理石和玻璃构成的市场，处于新欧洲的枢纽。巨大的飞机在出发大厅的窗户外升起，窥视着候机的旅客，犹如水族馆中的鲸鱼。你可以想象，当第一次从莱比锡来到这里、带着硬纸板箱子走下飞机时，法兰克福机场给辛德勒夫人、博尔纳先生或博恩克先生会造成何等的印象。空中小姐胳膊下夹着写字板，嗒嗒地走在大理石地板上；商人们背着西装袋匆匆经过，走向等待出租车的队列；在移动的人流中，你偶尔可以辨认出一小座静止的岛屿：一对紧紧拉着孩子的东德夫妻，他们盯牢孩子，迷茫而迟缓，无人注意。在他们周围，收银员敲击键盘、抽屉开开关关；摄像机和计算机、个人记事本和随身听在玻璃橱柜的转动平台上缓慢地旋转，诱人但是无法触及。

15年之后，是否还能分辨出东德人和西德人？是否人人都将晒得黑黑的，说同样的美式英语，穿同样皱巴巴的亚麻西服，看上去疲倦不堪，就像这些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奔波、正奔向出租车站的德国商人？市场最终会将两个国家合成一个民族吗？也许会。但记忆是顽固的、难以调和的。15年后也许只有一个德国，

但两个德国的记忆将在长得多的时间中存在。

法兰克福，我下榻宾馆的酒吧里有一台固定在墙上的电视机，我看到8点钟新闻。

字幕显示："三人在纵火袭击中丧生。"

"显然是来自右翼极端组织的暴力极端分子晚间杀死三人。犯罪嫌疑人放火焚烧了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摩恩市（Mölln）的两座房子，房子里住的主要是土耳其家庭。一名妇女和两个女孩死于大火中。

"在两个打给警察局的电话中，纵火犯以'嗨！希特勒'挂断电话。"

在屏幕上，我看到了茫然的消防员，他们黄色的外套被水浸湿了，眼睛被烟雾熏得通红，正撤离这座被毁坏的两层楼的砖房，带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亮的绿色棺材。

"死者中有一名10岁的女孩。母亲在摩恩已经居住了二十多年。事实上，她10岁大的孙女是在这里出生的。"

我听到科尔总理在电视上说："发生在这儿的事情只能证明其自身的野蛮，完全不能为任何人类的感性所理解。"他随后说的话有点奇怪："此刻，我也要对我们的土耳其同胞公民，包括男性和女性，表达特别的慰问，他们在我们之中已经居住了很多年。"

同胞公民。奇特的失误。每个人都知道，土耳其人可能在西

德出生，一辈子在这里工作、纳税，但他们不能成为公民。

在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区的美杜莎（Medusa），土耳其乐师正在为琵琶、手鼓、竖琴、齐特琴挑选乐曲。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在跳舞，穿梭在桌子间，来往于这个位于街道之下、粉刷成白色迷宫一样的通道中，侍者们艰难地在沸腾的舞池中移动，托盘上放着啤酒、烤肉串和土耳其沙拉。

20多岁的胡赛因（Huseyn）和祖（Zu）都说一口完美的德语。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从土耳其来到这里。德国是他们所了解的一切。祖可以——像人们说的——“完美地冒充德国人”：她有俏皮的金发和淡色的皮肤，曾经为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工作过，说那种怪怪的美式英语，这是法兰克福的第二语言，这种英语事实上是在宣称：“我不只是德国人，还是欧洲人。”

胡赛因握着她的手，她轻抚他胡须之上的脸颊。我能感觉到他们不愿意讨论摩恩的纳粹袭击事件。他们宁愿把它抛开，这是又一个夜晚，让他们可以听齐特琴、跳舞，忘记外面大街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实际问题不是愤怒或恐惧，尽管有很多这种东西。“当我听到科尔总理表达他的歉意时，仅此已足以令我爆发。”胡赛因咕哝着说。实际问题是他们现在归属哪里，他们是否可以归属任何地方。“我不知道去哪里，”胡赛因说，“我在这里长大，我讲德语。我爱土耳其，但那里不再是我的家园。”随后他又说：“但我始终想着回去。”他伸出手去，再次握住祖的手。

在德国，大街上他们可以在一起。由于父母不允许，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但是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叔叔有时候让他们使用他的住处过夜。胡赛因和祖羞涩地笑了。现在，如果在土耳其，祖玩着她的啤酒杯垫说："我是不可能那样做的。对他不是问题，但对我是问题。"

即使胡赛因最终能在这里获得公民身份，他怀疑也不会有多大差异。"我应该拿护照怎么着呢？"他痛苦地说，"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吗？"一张护照会让人们不再叫他肮脏的土耳其人吗？一张护照会让德国工人在工厂的车间里跟他一起抽烟吗？他有一张土耳其人的面孔，一张护照授予的正式权利不会改变德国人看到他的样子。将来，胡赛因也许会归属于德意志国家，但绝不会归属于德意志民族。

第二天早晨，法兰克福当地一所学校的操场上，下着雨。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跪在人行道上制作标语牌，牌子在雨中有点淋花了。标语牌和海报是孩子们写的，他们写的话包括"外国人是我的朋友"和"我们都是土耳其人"。大约有150名老师、父母和孩子，他们从操场出发，游行穿过社区。

我加入游行队伍，穿过郊区下雨的街道，与这些孩子们肩并肩，他们的面孔满怀希望和天真，带有高尚情感举着有雨痕的海报。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行动。我们不会把自己算到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去。我们不是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当然，问题并不是体面的德国人会不会站出来。在数周和数个月的时间里，数以百万人站出来游行。但这种天真的、荣耀的道德自恋形式到底意味什么？它说：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但我不对其最糟糕的行为

负责。所以当我们游行时，我们将自己与摩恩、罗斯托克（Rostock）、索林根（Solingen），与一系列和那晚的火苗、火把、弹簧刀、尖叫和靴子的踩踏产生联系的城镇区别开来。

在人群中我遇到一个秃头的中年工程师，他和女儿手拉手走着。我告诉他我刚从莱比锡来。“刚从东部回来，是吗？我一个人在那里待了六个月。真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没有希望。没有人有体面的日间工作。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他们绝望、不可救药，从不停止抱怨。”他战栗了。他说：“欢迎回家。”然后紧握住女儿的手。当然，他绝不会像如此随意地谈论他的德意志同胞一样谈论土耳其人。奇怪的人们，相互之间如此地不喜欢。

小小的游行队伍在街道上行进，沉默的旁观者从旁经过，脸上看不出他们对这些标语怎么想。我开始和一个名叫萨宾娜（Sabine）的年轻女人交谈。她解释说她的孩子太小，现在还没有上学。那么，她为什么来参加呢？她有一张修长、黝黑的漂亮面孔，锐利的蓝眼睛，头发挽成褐色，金色的辫子垂在背后。说话的时候，她保持一种微妙的、悲痛的距离：“我不太确定，只不过是来了。只不过是没有坐在家里。”她将黑色长外套拉紧裹住肩头，打了个寒战：“现在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的丑恶，那么多的仇恨。”然后，她声音里带有苦恼地说：“我没办法让我的孩子们远离这些。我想要，但是没办法。”我们沉默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她停下来，抹了抹头发上的雨，似乎终于找到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这儿的话：“我害怕。在德国，我第一次感到害怕。”

法兰克福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于国外：南斯拉夫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以及140个更小的民族。他们

没有公民权利：不能投票或者得到公务职位，他们的地位——即使偶尔有人生于德国——一直是临时的。

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伏尔泰咖啡馆（CaféVoltaire）的吧台，罗莎·伍尔夫（Rosa　Wolf）向我解释了这些事实。她为市政府的多元文化局工作，她不知道自己部门所做的工作能否阻止这个城市正在高涨的仇外潮流。而且，如果右翼赢得下届选举，他们可能把她的部门关闭。当地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一个政客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将寻求庇护的人和毒品泛滥、骗取福利联系在一起。她公开要求控告他种族煽动。市长批评她破坏了作为公务人员的政治中立性。罗莎充满活力，不拘泥于教条而又坚定不移。

我们发现彼此拥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是60年代的孩子，我们活的时间够长，足以让我们看到青年时期的偶像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物。伏尔泰咖啡馆曾经是法兰克福左翼反文化的中心，现在它为法兰克福出版商承办书籍首发式。从前它是策划反对美军基地的狂热游行的地方，现在，我们身后墙上挂着罗莎·卢森堡[1]、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印制画像，似乎是对失落幻象的暧昧、感伤的纪念。

“我们曾经想改变德国社会，”她悲伤地说，似乎知道这样的想法现在看上去有多么奇怪，“我们想要它变得不那么顺从。麻烦在于，我们成功了。”她以扭曲的细节将自己的困难和她孩子们的困难分开。从1968年过来的父母经常发现他们说过的话重新浮现，萦绕着他们。当然，在莱比锡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个反抗顺从的事情。它只是战后德国历史的另一个部分，两个德国从未共同拥有过这一历史。

“我们公然谴责父母是法西斯。我们从家里搬出去。那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们想，不管如何，我们会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身份。”

她继续说，对顺从的反抗，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是它导致70年代旧的青少年惩罚机制的崩溃。“所以现在，这些16岁的少年在摩恩、罗斯托克和索林根用燃烧弹袭击庇护者营地或移民之家，却得不到惩罚。他们只是嘲笑警察。”

现在，她悲哀地发现，对顺从的反抗是对德国过去的反抗，但不是真正地面对过去。“我们太乐观了。我们没有解决过去。”

我们都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想着“解决”过去意味如何。弗洛伊德在哪里说过，认知和认知是不一样的。意思是：你可能在头脑中应对某件事情，而不是在你的内心、勇气中应对它。努力解决某事是治疗方法的全部：将知识从你的头脑中移动到躯体中，从意图转向行动。但没有人知道，与一个民族相应的疗法可以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一个民族如何能够努力排除一切、达到那种深刻的认知。

罗莎意识到的是重新统一标志着某种终结，而远不是一种开始，整个德国社会都还在努力就这个终结达成共识。

“每一个在战后成长的人都曾认为这种生活将会永远继续下去。你知道，那个清晰的、有组织的德国，那个相信每一样事情都可以被组织起来的德国。1989年以来，我们已经进入了真实的世界。我们经济的增长走到了终点。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我们不再感受到在我们的小花园中曾感觉到的安全。我们知道有种东西一劳永逸地结束了。”

随着某种东西的终结，过去重现，但并不像人们所预期和希望的那样。罗莎举起双手，做了个俏皮兴奋的手势。“所有这些德国人现在都说‘40年来我们不得不沉默，40年来我们不得不做出一副谦卑的样子。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是德国人’。然后他们说：‘而且，我们出生得太晚，没有任何东西要隐瞒。’”她笑了，笑他们、笑她自己曾经相信“反对顺从的反抗”将会令古老的德国永远噤声。

她突然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从不讨论民族。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超越了民族。”她讽刺地指了指身后罗莎、卡尔和弗里德里希的画像。“我们曾经是国际主义者，记得吗？”

“你们也犯了一个错误，”这是指德国的邻居们，“你们禁止我们解决我们的过去、与过去妥协，像一个民族应该做的那样。”

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世界上其他地方从不允许德国人对他们应该感到自豪的东西自豪。”

“正是这样。”她说，惊讶地发现，在反对顺从的革命发生25年之后，在认为“民族”是一种对傻子和复仇主义者的归类25年后，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K先生的白马

关键的任务应当是恢复人的自信。我将这一族群界定为受伤的民族……我的感觉是，只有这个族群恢复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天然自尊，才会得到自在。当你拿走一个人的自尊时，他会深深地受到伤害，对于民族似乎亦然。

——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舆论研究者，德国，1992

“为什么我们是欧洲唯一不能为自己自豪的民族？”K先生痛苦地问我。这个问题在我们之间久久回荡，我已经无数次在法兰克福听到这个问题。我们是在法兰克福城外一个村子里，他的小平房在这里。他盯着我，仿佛我应该为他不被允许以德国人自豪而受到谴责。问题是，我还没说过一句话。

然后他站起来，轻快地问：“想看看我的马吗？”K先生热爱他的马，一匹白色的阿拉伯种马，他养在自己房子后面的一个小牧场，位于法兰克福以北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小村庄。他对马的热爱——浪漫、极端、纯真——正像是他对德国的爱。

他爬上他的战马光溜溜的背，告诉我他是如何读着卡尔·麦[2]关于讲德语的牛仔驰骋远方的通俗小说长大的。“我的马，”他说，“使我的梦想成真。”然后他疾驰而去。他想做一名牛仔，他想要这里变成讲德语的狂野西部。不幸的是，他已经是一个秃头的53岁的人、一个退休的监狱官员，这里是一片小小的泥泞空地，四周围着栅栏。他没有疾驰而去消失在落日之下，而是忧郁地回来跟我说话。

跟他这个年纪大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自豪地告诉我，他属于第一代足够幸运的德国人，出生得够晚。哪里够晚？我问他。够晚，不会对任何东西有负罪感，他带着忧郁的轻笑回答。

他只记得1945年冬天燃烧在柏林的红云。俄国人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和母亲逃到法兰克福北部青山之中的这个村子。现在，在监狱里服务25年之后，他作为右翼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

在黑塞举行的地方政府选举。德国政治正在向右转，推动它转向的是像K先生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将会当选：他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能够感觉到风正转向他的方向。

“伊格纳季耶夫[3]，伊格纳季耶夫。”他沉吟地说。我们正在他村子里的一家餐馆一起喝啤酒。“那是什么样的名字？”我告诉他是什么样的名字。他继续说，无意冒犯，但斯拉夫人就是不知道如何工作。看看他们在俄罗斯造成的灾难。我反击说，是人的原因还是体制的原因呢？他回答，绝对是人的原因，如果他们拥有德国人的素质就好了。

“我们是干净的民族，一个自尊、独立的民族。”他说。他对这座郊区的木屋非常引以为豪，那是他和妻子亲手建造的。房子里的墙上挂有大量自然风景画（他说“来自我的祖先”），书柜里放着《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Encyclopedia*）[4]以及收集的席勒和歌德的作品，这是一个谦逊的布尔乔亚对某种德意志理念的纪念。

离K先生漂亮乡间别墅1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为避难者设立的帐篷城市。他开车去那里，我们站在围墙外面，看里面成排的帐篷、泥地里用木板铺成的走道，还有一对忧郁的非洲人在雨中相互给对方理发。K先生特别想让我知道，需要零花钱的德国女人来到这里做清洁工作。他说，你能想象吗？一个黑人把烟灰磕在地板上，而一个德国女人跪下来把它扫掉。不，不能再这样下去。

然后，他的温和又回来了，他的肩膀随着他奇特、阴郁的笑容而抖动。他说难民法是一种“德国自大狂的典型拼凑”。还有其他国家会梦想让自己成为全世界的福利官吗？

他极为欢迎相信德国生活方式正遭受攻击的人。他应该这样，因为他知道他的党不会输。避难的宪法权利已经被删除，共和党已经因为高调发声而获得信任，而其他党派只敢悄悄地说。

但K先生说，收紧避难程序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现实问题是，德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像是在家一样的感觉。法兰克福有30%的人口是外国人。你想我为什么要住在乡间呢。

多元文化主义是问题所在。如果我们“以此方式”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再有自己的文化。

但是你们国家里的土耳其人说德语，过德国式的生活。你们为什么不承认他们是公民呢？

“我们是德国人，他们是‘土耳其人’。”

对于K先生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言，种族主义是过于简单的一个词。关于“他们”嗅闻的方式，或者“他们”烹饪的方式，一个种族主义者通常有某种幻觉。K先生似乎不会受任何恐惧症的折磨。种族本质主义（ethic essentialism）对于他的立场而言是一个更有想象力的词，并且可能更为准确。他相信，身为德国人界定了他可能认知、理解或同情的限度。K先生并不孤独。一整个星期里，我都遇到自由派德国人，他们不会被视作和K先生一类人一样死硬，但由于社会势利和政治信念的混杂原因，他们说着跟K先生一样的话。他们都觉得，伴随着避难危机，自由主义的德国意识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再这样下去，”他们都这样对我说，“我们最终会不知道我们是谁。”

K先生不会认可我说共和党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为暴力煽风点火，然后又极力谴责暴力。谴责电影和电视文化中的暴力，谴

责我们的青年中道德价值的丧失。不要将它归责于我，或者是归责于我的历史。

为什么德国人要为这些袭击受到谴责？为什么你们不让我们与自己和平相处？K先生再次问我，似乎我是他的罪恶的来源或是他免罪的途径。

我的印象是，德国人喜欢他们自己、喜欢他们的民族是件好事，只要他们接受那个确实存在的德国，拥有1945年之后边界的德国，那个容纳数百万外国人的德国。K先生的问题不在于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是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却事实上憎恨他所居住的德国。

他想要一个德国人的德国，而现在这里已经有600万外国人。他想要的德国是遵守法律、干净、有序、女人留在家里、电视不向年轻人宣扬色情和暴力的德国。换而言之，它是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都从未存在过的德国。他继续说，它是一个安居乐业、平和自处的德国。［“你们英语怎么说的？”他搜寻着词汇，“啊，是的，安宁（serene）。”］

一个安宁的德国，是他在儿童时代从卡尔·麦的故事中听到的梦幻之地。在他的政治白日梦之中，他骑着他的白色骏马穿过德国纯净空阔的土地，那个德国即使曾经有过，现在也已不存在，并且，除非以其他民族的自由以及一些土耳其人的鲜血为代价，它无法变成现实。

---

[1]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

[2] 卡尔·麦（Karl May，1842—1912），德国通俗文学作家。

[3] 叶礼庭的姓氏Ignatieff音译为伊格纳季耶夫。

[4] 《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德国著名百科全书，前身为德国学者罗贝尔编的《妇女家庭百科词典》，1808年德国出版家布洛克豪斯将其版权买下，扩充为百科全书出版，其后持续更新版本，对后世影响巨大。

故乡

在法兰克福机场，每个晚上你都可以看到她们走下来自莫斯科的航班，迈出她们迷茫的第一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1]。健壮、冷漠的女人们穿着结实的冬靴，戴着花头巾，她们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两排黄色的牙齿；男人们戴羊皮帽，穿着冬衣，忙活他们的行李，看上去他们似乎需要一杯伏特加；脸色苍白的孩子们穿田径服和廉价的滑雪衫，不安地紧跟着妈妈。西德的商人们用肘推开他们，去往出租车站，这些家庭迈着梦游者一般不知所措的步伐，走进据说是自由的地方。

他们登上巴士，前往临时难民营，你听到他们窃窃私语，用的是俄语。但如果你靠近他们，觉得窘迫的人会陷入沉默，而机灵的人则大声告诉你："我是德国人。"[2] 即使已经安全通过了护照检查，他们还是有些怀疑，你一定是个警察，会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是德国人但其实不是德国人而把他们送回飞机上去。

在众多汹涌通过欧洲各关口的移民人潮中，这些家庭是最令人困惑的。他们是从被摧毁的东方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回流的德意志族人，每年10万人。

德国是仅有的允许他们流失的族人回归的两个现代国家之一，另一个国家当然就是以色列。两个相信民族性在于血缘的民族，都慢慢发现，血缘纽带真的会变得薄弱。

"必须告诉他们要冲马桶。"在法兰克福郊区一个俄罗斯德意志人（Russian Germans）定居点，一个德国社会工作者这么告诉我。从未听说过室内厕所、淋浴或私人浴室的家庭们必须被温

和地重新告知，传统的北德意志新教徒就是干净和美德的同义词。

在定居点的餐厅，我看到一个交通警察耐心地告诉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如何按照交通指示灯过马路。他们无动于衷地听着，仿佛还是在听党或者工厂的讲话。警察让他们站起来，练习把头转向右边，然后转向左边，然后再转到右边，以便在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不会被他们富有“房东”的宝马车撞倒。

这样一个场景让你直面种族的神秘性。这些人看上去像俄罗斯人，他们的习惯和心智还是苏维埃式的。他们的祖先300年前离开德国，越过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斯拉夫边界地区，定居，殖民。异族婚姻淡化了与已消逝过去相联系的纽带。然而，如果你问他们，他们的“故乡” [3] 在哪里，他们会环顾法兰克福旅馆的狭窄房间，骄傲地说：“这里。”对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人而言，他们是回家来等死的。

“一直以来我的梦想是死在这里。”奥尔加·奥斯切斯基（Olga Oschetzki）说，她那双俄罗斯农民的大手交叠在面前的油毡桌布上。她说的德语有一种美丽的古典风味。这种德语被她的家族保存至今，就像一张古老的亚麻桌布。她很自豪从未丢下她的语言，即使斯大林在1937年枪毙了乌克兰日托米尔（Zhitomir）区所有的德语教师，并因为她与德国国防军合作，战后将她流放到西伯利亚。当我唐突地说，有人会认为她更像俄罗斯人而不是德国人，她的蓝眼睛中对我闪现出怒火。“我知道我是谁。”她说。

德意志人是那些少有的祖父母领着他们的子辈和孙辈回家的移民之一。祖父母还会说德语，但他们的孩子们已经不会说了。

绝大多数德国人可能希望他们的俄罗斯兄弟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但他们也知道，如果不让他们来，再过一代人，可能就没有德意志人能带回家了。

奥尔加和她的女儿曾梦想的故乡与她们正冒险探究的这个故乡毫不相干。她们对一切都感到惊奇，例如，商店里有20多种肥皂，车流速度如此野蛮。最重要的是，他们惊讶于那些外国人。“我本以为我是来德国。”奥尔加的女儿说。“然而，是来了土耳其。”她皱了皱鼻子失望地说。她是用俄语说的，因为她不会说德语。

---

[1] 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圣经》中上帝答应给予希伯来人的栖身之所。

[2] 原文为德文，Ich Bin Deutsch。

[3] 原文为德文，Heimat。

最后的思考

基于对德国种族民族主义历史的愧疚和补偿，德国宪法郑重承诺，对所有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给予庇护，只不过它发现无法依照自己的良心来信守承诺。问题不仅仅在于寻求庇护者的数量，还因为战后的自由派德国很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后民族主义的，甚至是反民族主义的国家，以致它发现自己无法清楚地定义与国际移民相关的民族利益。对于像罗莎·伍尔夫这样的德国自由派，难民危机是战后第一次让他们感觉要被迫放弃后民族主义国家的乌托邦，更加冷静地思考德国的民族利益。换句话说，即使是对自由派而言，某些民族主义的对话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得不讨论配额、限制、遣返、对德国失业率的优先考虑。所有这些话题都非常自然，并不会因为其与右翼的关联而被视为耻辱。

然而时代对于德国右派仍然不利。德国城市中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使得把德国人视作一个单一种族的“人民”显得荒谬，而东部和西部德国人之间的差异，令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种“人民”的身份中到底包括了什么。

抛开这些现实情况对德国身份幻想的暴力入侵，界定德国身份的法律工具仍然受到种族民族主义历史的限制。公民身份的标准仍然是基于“血统决定国籍”准则（jus sanguinis）的种族传承。由此导致在现实和种族幻想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明显的错乱。对于绝大多数外部人士以及许多德国人来说，一个出生于德国、成长于德国的土耳其人不能成为德国公民，而一个来自西伯利亚、从未在这个国家居住过、没有语言竞争力的德意志族人，可以被授予公民身份，获得广泛的定居协助，这是荒谬的。

德国公民法的荒谬性，迫使保守的德国人在一个现代的多元文化世界中，面对用“人民”确定民族身份的不一致性。同时，自由派德国人发现，基于愧疚和补偿构建的一种后民族主义身份是不够的。似乎，双方都被现实的力量缓缓推动着，放弃各自的乌托邦，一边是一个德意志人的德国的乌托邦，另一边则是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德国的乌托邦。

同时，伴随着统一，德国最终从一个饥饿的民族转变为餍足的民族。它的边界安定了，它失去的族人正在归来。它现在的任务不是如一些自由派提出的从共同超越民族主义转到乏味的欧洲主义，而是从其种族民族主义的过去转向一个公民民族主义的潜在未来。换言之，这可能是永远埋葬德国“人民”理念的时刻。用现实的语言来说，这将意味着从依民族的认同转向依国家的认同，也即，从基于种族身份幻想的公民身份转向基于民主价值认同的公民身份。

这项事业的主要障碍不在少数种族自身，而是在那些梦想一个从未存在的德意志的保守派，以及那些认为爱国主义是傻瓜才相信的自由派。

结果是个僵局，一个政治和文化的虚空，那儿本应找到一个可信赖的德意志形象。在这个虚空中本应有一个民族，但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它缺乏做任何国家必须做的事情的意志，即保持对暴力手段的垄断。这个僵局每延续一天，这个国家的权威就弱化一天，而利奥、里希和他的朋友们就变得更强大。

我登上飞往伦敦的飞机，想着德国人的反讽之处，他们创造

了种族民族主义的理念，实际上却一点都不喜欢他们自己。我想知道，如果德国人真正平心静气地对待自己的民族，会是怎样？爱它本来的样子，而非可能的样子？爱它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悲剧、所有的暴力？那样的民族主义会是怎样？那样的爱可能吗？

3　乌克兰



图13　1924年，施利希特尔同志在克里米亚演讲，庆祝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文字使用阿拉伯字母（见图片下方文字，上方为俄语），至今他们仍在争取在自己的聚居区使用双语的权利



图14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宣布独立，继而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鞑靼人举行反抗游行，一位老人在游行中哭泣。1944年，斯大林强制驱逐所有生活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将他们迁至中亚地区居住，苏联解体后他们才回归家乡



图15　一张明信片上显示的20世纪早期的“敖德萨阶梯”。19世纪时的敖德萨根本不是一个乌克兰人的城市，它曾是俄罗斯海军、犹太匪帮、希腊人、土耳其人、比萨拉比亚人以及罗马尼亚商人混杂的地方



图16　乌克兰独立后的首位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图17　矿难发生后，一位乌克兰工人正在等待接送巴士。顿涅茨克，乌克兰煤炭与钢铁工业的心脏，也是矿难频发的悲剧中心



图18　2014年2月，乌克兰首都基辅，亲俄派反政府示威人群向警察投掷炸药，独立广场已成战场。乌克兰自独立以来，“民族/国族”认同问题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是影响国内政局的关键问题

酒瓶和香皂

从维也纳到基辅的航班上，我自己在研究一个小塑料瓶，是航空餐附带的奥地利佐餐酒的瓶子。考古学家说，你可以从最小的饰品推断整个文明的形态。我这个小酒瓶是资本主义的缩影：高效、世界化、无差别。

下面是匈牙利地毯式的平原，绵延起伏到喀尔巴阡山脉（the Carpathian），我们进入了乌克兰领空。我穿越这条边界线很多次了。我对那个资本主义的小瓶子突然发生的兴趣是一个信号：我不愿意离开身后的这个世界。

我要选择什么微不足道的象征，来代表那整个壮丽的、可怕的、梦想替代资本主义的失败尝试？

开始下降进入基辅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选择香皂：小小的、带有锯齿的粉红色皂条，在基辅宾馆房间的卫生间里等着我，我知道那儿必定是阴冷潮湿、恶臭难闻，用一盏40瓦的脏兮兮的灯泡照明。这种香皂似乎是用某种动物提取物制成，没有香味，也没有明显的清洁能力，同样的香皂生产了成千上万条，用于这个曾经庞大、现已崩溃的帝国，用于它的每一个宾馆，其中每一个冗长的、带有回响的走廊的每一个乏味的房间。一个文明最强烈的渴望都体现在那些小小的皂条上：要平等，要终结一个社会——有些人拥有雕花皂盒中的芬芳香皂而其他人根本没有香皂的社会；要取缔快乐，取缔慵懒地洗泡泡浴之可能性；最后，是令人困惑的低效率，这个坚硬平实的小香皂事实上根本没有清洁作用。

思考着香皂和塑料酒瓶，我走下飞机，加入穿西装、拿公文包、等待乌克兰签证的双排队伍行列。队伍中所有的人都是男性，每个人都是来出差的。他们是在东欧随处可见的后帝国时代新类型的人们，互相之间都讲一口奇怪的英语世界语，你会奇怪他们是否有自己本土的口音。在我前面的男人是一名俄罗斯移民[1]，定居在维也纳，为一家美国化学公司工作。哪家公司？道氏化学（Dow Chemical）。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名字，凝固汽油弹的制造商。我曾经坐在一所大学就业中心的台阶上，抗议道氏化学招聘像这样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的公司当销售代表。他卖什么？肥料。卖给谁？他笑了。在从前的帝国时代，他解释说，我们所有的生意都是通过莫斯科，我们只有一个买主。你跟他喝酒，跟他吃饭，最后讨价还价，得到你要的价格。现在，他又笑了，我们必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做生意。有多得多的人需要供着。要贿赂多得多的人？我不知道。这儿你有什么小型的顾客吗？有，有些农民。一些集体农庄。他们拥有资产——我想起了在基辅南部看到的广阔平坦的黑土原野，但他们全都非常紧缺外汇。一个英国商人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表示同意，他体格壮硕，带着七个箱子的足球装备，希望能在明晚回程航班之前卖掉。很多生意机会，前提是你要贿赂每一个遇到的人。

在整个东欧，这些人是日常奇迹的期望所在。他们是那些会提供芳香的、确实能清洁身体的香皂的人，他们是使电话能够工作、出售平底塑料小瓶酒的人。此外的每一样东西都尝试过了：带来恐惧和威胁的指令经济的兵工厂已经荒芜；社会民主太瑞典化，太遥远，不合实际。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除了这些带公文包的人们。



乌克兰及相邻地区示意图

每一个衣冠楚楚、发型整齐的男人穿过入境检查处，融入机场大厅里的人群，就像滴下的墨水消散在巨大的水箱中。在其后的三个星期里，我只在基辅最大的两个宾馆见过西方商人。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商人到达这里，然而这个规模相对于这个国家及其存在的问题，似乎让他们不带一丝痕迹就消失了。

我注意到，海关的申报单还是旧的苏联式表格。我申报携带了多少现金，“详细数目统统交代”，我是否携带武器、“艺术品”、书籍、药品。新的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印新的表格，所以，在这同时，帝国官僚的迟钝沉闷继续折磨着人们。

越过别人的肩头偷窥，我发现甚至乌克兰人的护照也是旧的苏联式，只是在“国籍”一栏盖有一个粗糙的、写着“乌克兰”的印章。乌克兰人被告知他们将会拥有自己的护照和自己的货币。到

那时，他们先使用一种过渡性的不可兑换货币，叫做库蓬（kupon），它仍旧盯住俄罗斯卢布，并且像卢布一样，以每月大约20%的速度贬值。像东欧所有的国家一样，整个社会都疯狂地寻找可以兑换的硬通货用以避险，对抗他们自己货币的缓慢崩溃。在签证窗口，乌克兰官员尽可能快地签发签证表格，将商人们的50美元钞票塞进收银盒中。环顾我周围的一切，乌克兰独立的第一印象是萧条和衰退，破碎的玻璃窗格，灰蒙蒙的窗户，遍地都是烟蒂，低瓦数灯泡昏暗的灯光，警察穿着新的绿色制服，抽烟，摆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我问自己，我来这个倒霉的地方干什么？

这是在20世纪最大帝国的废墟上产生的15个国家中比较大的一个。我来这里，是为了探究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实际有什么不同。例如，它会让普通人得到合适的香皂吗？乌克兰是20世纪欧洲创建的最大的新兴国家：拥有5200万人口，领土大小与法国等同。这个国家拥有60万人的军队，帝国兵工厂的遗产使它成为世界第三核大国；它宣称拥有以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为基地的黑海舰队的一部分，是海军力量第六大国；从顿涅茨克（Donetsk）盆地的煤和钢铁到黑土地的富饶农业，它是一个拥有巨大的自然财富的国家。

我确实有理由严肃思考乌克兰。但，说实话，我遇到了麻烦。乌克兰的独立让人想起的形象是农民的绣花衬衫、用鼻音发出的对种族手段的哭诉、戴斗篷和穿靴子的假哥萨克、卑鄙的反犹分子。

儿童时代在加拿大，我记得莫斯科大剧院在多伦多举行芭蕾演出时，流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外面的雪地里示威。他们高呼口号：“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在1960年，他们看上去怪异而

悲情，在雪地里呼喊，对只想来看芭蕾、让政治见鬼去的人们热情地演讲。他们看上去也狂热、非理性。难道他们没有看地图吗？他们怎么会认为乌克兰能得到解放呢？

然而这些狂热的宣传者，拒绝看地图、拒绝承认苏联的权力将永远持续的人们说对了，我们其他人错了。

报关的时候，我感觉像是在申报我到达时候的初步偏见。民族主义不就是一个取悦大众、狂热伪善情感的实践吗？在乌克兰尤其如此。几百年来，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国家，但他们真的是一个民族吗？进入这个虚空之流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主义，努力劝服乌克兰人，乌克兰民族一直存在，它已被压迫了几个世纪，最终它找到了自由，诸如此类。现实并非如此。一些乌克兰人——尤其是那些入了党的——确实走出了帝国。过去50年的大多数时候，党将这里的民族主义情感视为虚弱的、边缘化的并且容易压制的，它并没有错。开放时代，民族主义情感确实正在苏醒，在乌克兰西部，它开花结果，成为一个真正有广泛基础的民族运动。但在其他地方，在更加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东部，并没有高涨的独立要求。

紧随莫斯科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当独立真的来临之时，它并没有代表多年来民族主义鼓动的最高潮（像波罗的海诸国那样）。它的发生是因为当地党的首脑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看到，不用费一枪一弹，他就可以脱离帝国，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领袖。所以他仍旧主掌一套由前共产党人负责的组织机构。乌克兰也许根本不需要一个民族主义的故事，也许只是一个关于美洲豹[2]如何试图说服人民他的职位已经改变的故事。

我忧郁地做好准备，迎接我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居住在城市的知识分子用抒情笔调描写他们很久以前就抛在身后的农民之根；党的官员们回想起对苏联压制乌克兰事务的愤慨；狂热者们试图说服他们自己，独立将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一些老法西斯主义者告诉我，照我的名字——俄罗斯姓名对不对？——我不属于这儿。

但我确实属于这儿。我的俄罗斯祖父生命的前30年在乌克兰度过，他参加了敖德萨（Odessa）学会，在克里米亚（Crimea）度过假，后来在他父亲位于乌克兰中部的农场务农，是在一个叫作克罗波德尼斯塔（Kroupodernitsa）的小村子里。他成为地方自治组织（zemstvo）基辅区议会的主席，后来，1905年的革命之后，他被任命为基辅区市民官。我的祖母认为，他们在基辅住宅区利普基（Lipki）一所菩提树荫下的大房子度过的岁月，是他们婚后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我的祖父说乌克兰语，并且直到流亡生活的最后都唱乌克兰歌曲，写给儿子信上的签名，不是用俄罗斯语的父亲，而是用乌克兰语的父亲，batko。

对我的祖父母而言，基辅不仅仅是一个俄罗斯城镇，它还是俄罗斯民族身份自身的诞生地。俄罗斯东正教开始于987年，当时基辅罗斯（Kievan Rus）的统治者皈依了基督教。现在，毋庸置疑，它是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的首都。

严肃对待乌克兰给我带来的困难，远远超过我那世界主义的、对随处可见的民族主义的怀疑。在内心的什么地方，我也是乌克兰人所称的“大俄罗斯人”，存在一种旧俄罗斯人鄙视这些“小俄罗斯人”的痕迹。

[1] 原文为法文，émigré。

[2] 美洲豹，指克拉夫丘克。

美元区

克雷斯查提克（Kreschatik）是一条弧形的林荫大道，基辅人晚上在这里的树下漫步。在下面地铁站的中央广场，一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一个滑稽戏团在做即兴表演。十个醉鬼边乞讨边哭泣，三个老妇人在卖花，一个穿白色外套的女人邀请你在她的体重计上称重量，一个男人在报刊亭卖萨曼莎·福克斯 [1] 穿湿T恤的海报，另一个报摊在卖与从前被禁的反共游击队的历史相关的报纸。所有这些，从萨曼莎·福克斯到爵士乐队，跟独立前没什么两样。新鲜的是换外汇的人。穿皮夹克的年轻人在地铁广场里上下游荡，站在人行道上，衣服的翻领上别着仿制的小额美元纸币，或者只有个美元符号，有时候是卢布。独立后的乌克兰的另一个新特征是特警，配有左轮手枪、匕首和橡皮警棍。他们大摇大摆地上下走动，对在每一个角落里偷偷交易的换汇者视若无睹。

这就是硬通货，从总统到宾馆服务生几乎所有人都选择的金钱、都趋之若鹜的权势，是美元。

美元将社会分成两个区域：美元区、卢布或库蓬区。一个区是充足区域，有冒牌的金发女郎、食品和科技；另一个区是短缺区域，有的只是排长队、坏脾气和旧日子。美元区有硬通货商店、合资企业、宾馆酒吧、赌场和妓院。在美元区，如果你想打个电话回家，可以使用总部在达拉斯的运营商提供的美国卫星线路，即时连接，但每分钟要花费9到15美元；在库蓬区，要花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能等到一次国际连线，通话的成本是每小时9到15美元。美元区不存在短缺。在克雷斯查提克大街上的阿波隆（Apollon）餐厅里，你身处美元区。这是一家瑞士和乌克兰的

合资企业，几乎所有的东西，从冷面到啤酒，从桌布到厨房洗碗机，都是从瑞士流入进来的。除了面包和黄油外，餐馆从当地供应商那里不买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乌克兰经理耸耸肩说："我们有太多的问题。"你在这里吃不到一份俄罗斯菜，提供的是瑞士版的意大利面，与德国啤酒一起咽下。它是那些资本主义非人之地的小小前哨站之一，在灰色的东方自行生长。旧的党的特权区域——由国家安全部门担任警卫——现在被新的特权区域所取代，门口没有警察，但任何没有带信用卡或是装满美元的皮夹子的人都会被挡在门外。

在阿波隆，我遇到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Christia Freeland），她在基辅为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写稿。她是一名乌克兰裔加拿大人，来自阿尔伯塔（Alberta）北部皮斯河（Peace River）畔的一个农场家庭。她是成千上万名第二代乌克兰裔加拿大人之一，受流亡父母的抚育成长，梦想着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现在她回来了，生活、工作在现实的独立之中。她说，加拿大籍乌克兰人普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乌克兰人，是真正保持信仰的，而现实中的乌克兰人则已经被共产主义体制的宿命论渗入骨髓。乌克兰裔加拿大人回到"家园"，期待一个热情、民族主义的、虔诚的人民，发现的却是冷漠、讽刺、清醒以及宿命论的苏联心灵。独立要求一种新的人类类型，然而，她说，从感情和刺激两方面的均等态势来看，这会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而且，独立对于经济毫无建树。通货膨胀火箭般攀升，生产直线下滑，真实的短缺到处都是。基辅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依靠结识乡下人来给他们供应土豆，或者是自己耕种糊口。政府不敢着手开展市场改革，理由很妙：市场自由最终也许会将他们赶走。

民主更多在表面上而非实际中。总统通过发号施令来统治：从基辅食品供给到外贸政策的所有事务都由其决定。议会中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民主争论微弱无力。旧的精英依然掌权，机械地模仿民族主义的言辞，事实上死不放手，等待什么事情出现。我到这里还不到三个小时，而感觉上民族独立似乎已经成了一场灾难。

那么你会怎么做？我问她。她一口气说出一串清单：给农民土地，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库蓬的可兑换性，然后，她不带感情地笑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乌克兰人担心将会是已经在俄罗斯发生的：不断加剧的混乱。

没有人确切知道，如何将一个失败的指令性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市场社会。没有人轻易相信西方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的作用。我想起在离开伦敦之前，精明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2] 告诉过我："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教给这些人，我们的课程完全不适用。自由市场的万能蛇油不管用。民主不是一定管用的。我们输出的东西并不必然起作用，他们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我们不是说东欧没有希望，只是那种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念——认为对我们管用的东西，也一定不可避免地对他们有用——将会发现自己的缺陷。不能用对阿波隆餐馆出口冻面团、洗碗机和餐具垫的方式，输出西方的自由市场社会。说我们住在同一个世界，可以用同一种方式解决遇到的所有问题，谬矣。也许不存在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性的方案，但那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的唯一选择。在我来此的第一个夜晚，我觉得他是对的。三个星期后，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似乎仍然是对的。

从阿波隆回来的路上，我在黑暗中沿着克雷斯查提克大街行

走，经过弧形的四层楼公寓大厦，它是晚期斯大林风格，矗立在林荫大道的两边，取代了那些1943年的攻城战中被摧毁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粗鲁的信心，一种冷酷的、晚期斯大林主义的辉煌壮丽。每座建筑都仍然装饰有锤子和镰刀，或者伟大卫国战争战斗军团的花岗岩标准装饰。这些建筑物代表帝国的最高水准，是一种带有威胁性的建筑艺术，纯粹权力的具体体现。山墙，巨大的花岗岩呈现出它们被切割的模样，那是在宣告：看看我的作品如此强大、如此令人生畏。它们是在暗示：我们将永远在这里。实际上，帝国只持续了四十多年。

经过市政府所在地基辅苏维埃时，我注意到建筑物整个前立面的锤子镰刀和所有一切全都掉落在街上，躺在临时木栏后面的废墟当中，使这个楼变成了一个没有前脸的建筑。

---

[1] 萨曼莎·福克斯（Samantha Fox，1966—），英国摇滚女歌手。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俄裔英国人，当代著名左翼历史学家。

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

第二天，我返回基辅市政厅，会见乌克兰独立运动的沉默英雄之一——米科拉·霍贝尔（Mikola Horbal），他头脑清醒，已届中年，现在是基辅市议会的代表。

如果你是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你会因为这些天来人们的幻灭感而得到原谅。霍贝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关入监狱，因为他要求说自己的语言和在东仪天主教堂[1]（乌克兰西部奉行的天主教会）做礼拜的权利。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国家，管理国家的人就是当时关他入狱的人。

但米科拉·霍贝尔不这么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全日制的苏维埃教师和音乐家”。谁的音乐？他挖苦地说，“碰巧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的”。克格勃对他的歌极为看重，判处他五年监禁，外加两年流放。他们送他去一个采石场，用风钻开凿石头，很快他的手指就付出了代价。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演奏过任何乐器。他的狱友们无法理解他，他们是冷静的物质主义者，他们问他：“你在基辅什么都有，甚至有套公寓，那么为什么你还要添乱呢？”

因为他成长在乌克兰西部一个虔诚的家族。因为否认说自己语言的权利对于他而言是一个良心问题，因为他希望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于他而言如此显然的事，对于别人却不是。“如果你不被允许说自己的语言，并且因此而受到迫害，那么你只得进监狱。”监狱塑造了他，现在这么说也许带有怀旧的事后之明。入狱之前，他从未质疑过帝国是一个各民族的大家庭的理念。他遇到了其他民族主义者，通过他们，他开始追溯乌

克兰人在苏联时期的受难之路[2]：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饥荒，摧毁了乌克兰农业的强制集体化，以及对乌克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清洗。很久以后，1990年，他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海外乌克兰人社区，回来之后，他确信不管是在苏维埃体制的牢房里，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温情、同化的自由中，乌克兰人将一直是乌克兰人。

他承认，我们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历史意识和独特性，建立一个民族国家。随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说法。不是我们必须建立这个国家，它会自己建立。

霍贝尔的民族主义是最具普遍性的一种民族主义。当然，想要成为乌克兰人的俄罗斯人在这个新国家会受到欢迎。“对于我们，一个捍卫乌克兰利益的俄罗斯人比一个同样这样做的乌克兰人更为亲切，因为乌克兰人本就应该如此。”他并不恨囚禁他的俄罗斯人，因为他们也许是帝国最大的受害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主义？霍贝尔否认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导致其他民族蒙受羞辱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沙文主义而已。”那么是一个爱国者？是的，爱国者。一个承认自己在看到乌克兰军队身穿军服、第一次行进在独立日阅兵式中时，为之深深触动的人。

但关押他的那些人仍旧掌握权力。“我不恨他们，仍旧掌权的人可以得到两个三明治，我只有一个，但他绝不能有三个。”是的，他说的时候带着迷人、平静的微笑：“我应该恨克拉夫丘克。”当霍贝尔入狱的时候，克拉夫丘克是党的意识形态主管，负责将像霍贝尔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定罪为思想上的法西斯分子。现在，克拉夫丘克在公开露面的时候穿上乌克兰农民的衬

衫，民族主义论调成了他的母语。“我应当恨他，但我不恨。当我看到他在联合国出现、为乌克兰说话时，我为我的国家而自豪。”

---

[1] 东仪天主教（Uniate），从东方古老教会中分离出来参加天主教会的教派，持守东方各派礼仪，主要分布于西亚、北非、东欧、苏联和巴尔干等地。

[2] 受难之路（Via Dolorosa），基督教传说中位于耶路撒冷的耶稣受难之路，耶稣背着十字架，经过这里前往加略山（Calvary）受刑，路长约500米，共有14站。基督教有同名福音歌曲咏唱当时情景。

总统

去访问总统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在利普基林木茂盛的高地上——警卫让你在一个巨大、宽阔、铺着红色地毯的大理石楼梯下面等待。穿西装、头戴耳机的人监管着你。一切都是非常苏联化的，只有一点滑稽的、不太和谐的区别。在门口，有三个上了年纪的农妇，她们不怕穿西装的人的重兵把守，不肯退让，手里拿着文件，要求见总统，仿佛这是在中世纪，他不是一个现代有核国家的总统，而是旧时代穿着长靴长袍的好沙皇。

最后，我得到戴耳机的人的同意，走上铺着地毯的楼梯，前往总统办公室。这个地方的一切都将人带回到苏联式权力毫不掩饰的严肃气氛中，空旷的大理石走廊，长长的、消失在远处的红色地毯，向两边打开的加厚的门，连通总统办公室的安静的、华丽的房间，我将在这儿进行访谈。我还期待什么呢？是否有一种乌克兰式的权力呢？当然没有。只有苏联式的，就像对于继承了罗马帝国的高卢人（Gallic）和条顿人首领，他们可以仿效的权力典范是罗马人的胸甲、束棒和宽袍[1]。

总统是个体格结实、仪容完美无缺、头发花白的男人，将近60岁，彬彬有礼，放松，看不出紧张或不安，正是戈尔巴乔夫时代自信的苏维埃官员形象。他似乎有一种幽默感，似乎很享受权威和职位，似乎相信与外国记者打交道是件简单的事情。

他身上体现了乌克兰独立的暧昧性：出身于西部的乌克兰人，可以说流利的乌克兰语，70年代和80年代在党的等级体系内蹿升，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末期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然后，依靠良好的时机意识，运用就在几年前他抓捕的那些民族主义者的

话语，宣布独立。

我请他解释，一个共产主义者如何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给我最迷人的微笑，那意思是说，我现在对你完全坦诚以待。“这不仅让你迷惑，也让国内外的人迷惑。但我的行为在历史上是例外吗？这有大量的例子存在：一个人生活在某种体制之下，与其互相配合，后来却转而领导反抗这个体制的叛乱。”

现在，他说他一直明白，乌克兰在苏维埃联邦结构中的正式自治是一种耻辱。他知道30年代苏维埃的集体化毁掉了乌克兰，而斯大林谋杀了乌克兰共产党之花。“我全都亲眼所见。”

我说，但许多独立的信徒都感到幻灭，那么多来自旧体制的人仍旧掌握权力。听到这里，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他不再彬彬有礼和放松了。“你被误导了。”在独立时，唯一能够了解“统治的艺术”——他是这么说的——的人，是350万共产党党员。我们将引入新人，但他们需要教育和培训。除此之外，他说，共产党人那么坏吗？有些人比所谓的民主反对派更加倾向于民主。

他向我保证，他不想要一个基于种族的乌克兰民族国家。他邀请德意志人在乌克兰定居，他要重申，1100万俄罗斯族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是有保障的。这点我相信他，原因很简单，任何其他政策都会引起内战。

但如果经济继续盘旋下行，难道不是不可避免会引起内战吗？对此他表示同意。“最重要的是避免经济危机恶化，其崩溃会引起其他领域的崩溃。”

---

[1] 束棒（fasce），为古罗马执政官权力象征；宽袍（toga），为古罗马参议员席位象征。

雕像和洞穴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一架苏式直升机上，俯瞰整个城市。在我下面，雄伟的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呈现闪亮的绿色。由此往北90英里[1]是受到诅咒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仍旧向我下面的这条大河倾倒受过污染的水。没有什么比切尔诺贝利灾难更能加速乌克兰人对帝国的幻灭，在80年代，任何其他单个事件都不像它那样为民族主义事业赢得更多支持。

突然，另一个提醒我们苏维埃文化之恶的东西恰好在我们前方闪过，那是一个巨大的银色雕像，一个皱眉的女战士身穿金属长袍，一只有力的手将剑举在空中，另一只手握着盾牌，这是一个极为巨大的雕像，大小与自由女神像相当，用闪光的铝制成，看上去像因为战斗而满身大汗。

她是守卫基辅之门的俄罗斯母亲，面向西方，击退入侵者，是对伟大卫国战争和1943年从德国人手中夺回基辅时死亡战士的纪念碑。

这个巨大的铝制女神像不是在胜利之后马上建立的，而是在1980年，衰朽的勃列日涅夫政权试图制造爱国激情的一部分而建造的。对于这场战争的记忆超越了任何其他东西，将这个帝国团结在一起。阅兵式、分列式、演讲和苏联体制生活的各种节日，所有这一切都将战争记忆作为中心。苏联的新郎和新娘将他们的花环放在战争死难者的墓上。随着战争记忆的消退，巨大的铝制女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城市”竖立起来，目的是维持和操控大众的记忆。这种纪念碑传递的信息显而易见：党拯救了整个帝国，帝国的各民族牺牲自己，合而为一。

直升机带着我盘旋，我想着陆，然后爬到雕像顶上——就像自由女神一样——从她的眼睛中凝视世界。在她的头颅里面难道没有观察点吗？这不可能，神经紧张的神像看护人告诉我。观察塔已被迫关闭。她只不过是在1980年才正式对外开放，但建筑质量如此差劲，其结构用铁迅速锈蚀，她可能会倒塌。

她被用来象征帝国在战争时期的团结，但现在的乌克兰，战争更接近内战而不是爱国热情的一致喷涌。当德国人1941年6月涌过乌克兰的西部边界，他们得到几百万西部乌克兰人的欢迎，被视为解放者。对于他们而言，战争是一个逃离监狱的机会。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首先觉得德国人会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流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德拉 [2] 和梅尼克 [3] 跟随进军的德国军队一起回来，狂热鼓吹他们对欧洲新秩序的信念，希望德国人会奖励他们一个附庸国。等到他们发现德国人不过将他们视为一个奴隶种族、只适合被征服时，已经太晚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发现他们被夹在德国占领者和红军之间，有时同时与双方作战。苏联人战争末期攻克乌克兰西部，最激烈的反抗部分来自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他们继续战斗到50年代早期。所有这些历史完全被这个雕像掩盖了。

直升机飞离母亲雕像，越过基辅修道院的金色圆顶。在苏联时期，基辅的天际线呈现两种宗教——战争死难者的崇拜以及穷人和被排斥者的古老信仰——相互竞争的景象。 [4] 基辅是所有俄罗斯东正教的发源地，因为正是在987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Kievan Prince Vladimir）迎娶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的女儿，同时与其所有部从一起转信东正教。

在弗拉基米尔转信之前，僧侣们曾住在这些悬崖上的洞穴里 [5] ，他们的遗骸放在棺材里，放置在一个深深的地下通道网络

的壁龛里，这儿已经成为东正教信徒的一个圣地。由于乌克兰独立，这些圣徒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位于外国土地上。更糟的是，一个乌克兰东正教堂正在寻求从俄罗斯大牧首那里争夺对它们的专属管辖权。对于乌克兰人而言，修道院贡献了乌克兰民族意识最先开始之地；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基辅罗斯则是俄罗斯民族历程的开始。因而，从俄罗斯人的观点来看，“失去”乌克兰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一个地区，而是失去它自己具有象征意义的起源。

我向下进入修道院下面的洞穴，里面黑暗阴冷，长期以来这里的门对旅游者是关闭的。在一个长长的木板台阶的底部，有一个天蓝色的小型门厅，天花板上角的一个圣像前面点了一盏小小的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差点被石头地板上一堆我觉得是破布的东西绊倒。跨过去，我发现那是一对老夫妻，互相蜷缩在一起，穿着破旧的外套，一起躺在一张用来抵挡潮湿的硬纸板上。他们侧卧着，用手枕在头下面，因为两人都没有枕头。老妇人戴方头巾，老先生戴旧平顶帽，他们睡在一起，姿势像一个调羹。发现他们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看到还有几对老夫妻睡在地板上，另外两对坐在圣像下方几近黑暗的长椅上。离开门厅，继续往下走，我遇到更多这样沉默的老夫妻睡在台阶上，倚靠着栏杆，抱在一起抵抗刺骨的寒冷，他们几乎不动弹，就像死了一样。这些老人是朝圣者，教堂允许他们一夜夜睡在这里，在零下温度的寒冷中紧靠圣徒。

通往墓穴的最后一道门由一个瘦小的老妇人把守，她穿一件乌克兰式披肩，戴头巾，穿着厚厚的外套和拖鞋。她从一座巨大的荷兰式暖炉后面的床上爬起来，打开门，让我进去。她怀疑地看着我点燃蜡烛。我漫步穿过隧道的迷宫，阴影围绕着我。我迷失在死胡同里，遭遇锁闭的门，在一片潮湿的黑暗中，只有我的

蜡烛和圣像灯的火苗照路。在通道的墙上挖掘有壁龛，放置着圣徒们铮亮的木质棺材或石棺。但木棺和石棺是打开的，在圣像灯的昏暗灯光下，他们的脸是被遮上的，但是我发现有几个圣徒，他们枯萎、褐色的手紧紧抓住葬衣。在这里，死者不归于尘土，地下的特殊环境保存了他们的手、带有长指甲的黑褐色的手指。老妇人突然出现在我后面，看着我，确保我不会伸出手去触摸。她的生命消耗在这里，在深深的地下，躺在炉子后面，警惕地看守圣徒。这种对死者的崇拜，对本应化为尘土的尸体进行保存的喜爱，这种在信仰和死亡之间的联系，让我觉得恶心。两个民族、两种语言、两个历史从这个修道院的地下迷宫发源。但我只想出去。无论如何，我要尽快出去，我需要爬上那些台阶，跨过那些睡着的人们（如果需要）。我需要光明，需要空气。

---

[1] 约145公里。——编者注

[2] 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1909—1959），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二战”中依附纳粹德国，后因反对纳粹的政策被捕入狱，“二战”末期被释放出狱，之后组织反苏游击队。1959年被克格勃暗杀。

[3] 安德烈·梅尼克（Andriy Melnyk，1890—1964），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二战”中依附纳粹德国，1944年在纳粹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镇压中曾短暂入狱。战后逃亡西方，1964年逝世于卢森堡。

[4] 指俄罗斯母亲雕像和基辅修道院两个不同建筑形象之间的交映。

[5] 基辅修道院最早起源于修道士所挖的洞穴，在洞穴基础上修建修道院。修道士在狭窄的洞穴里修道，死后安葬在洞穴内，年深日久形成干尸，成为信徒朝拜的圣地。

家族墓地

基辅西南大约两小时路程的地方，罗斯河畔，在文尼察（Vinnitsa）区起伏绵延的甜菜田野中，有一个小村庄，我的曾祖父19世纪60年代在那里买了一块地产，那时他是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908年，他死于此地；1917年，在将要受到革命的波及之前，他的妻子也死了。他们都被埋在教堂的墓室中。1917年2月之后，我的家族再没有人回过这里。道路分岔出来已有几英里，我们的巴士挣扎在满是车辙的铺有鹅卵石的农场道路上，道路蜿蜒穿过平坦、千篇一律的甜菜地。黑暗降临了。我们穿过一个叫波格里比舍（Pogribisce）的镇子，经过一个巨大的甜菜工厂，它在黑夜里仍在运作，将羽毛一般的蒸汽排入寒夜的空气中。然后，随着车头灯在黑暗中将物体一一呈现，我开始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从童年时代，我一直在照片上看这个地方。在铁路线边上有一个长长的、低平的石头谷仓。这一定是祖父每天早晨到铁路边拾取从莫斯科—敖德萨快车上扔下的莫斯科报纸的地方。这一定就是那个教堂，它的圆顶和十字架点燃了灯光，浮现在河岸边的树丛上方，等待我的到来，看上去正与我父亲的英国保姆用布朗尼盒式相机拍下的照片上一样。

我们在教堂院门前停下。没有一丝声音。夜晚的乡村多么空旷。没有街灯，只有天空的黑色穹顶和几颗星星。我们身后有两间小小的砖砌农舍，窗户的灯光从幽暗的尖桩篱笆上方透出来，但我们不知道去找哪一间房子。最后，一个集体农场的卡车司机停下来，带上我们——我和我的翻译，然后把我们放在一座蓝白色的砖房前面，房子覆盖着藤蔓和植物，黑暗中矗立在一条肮脏的道路尽头。他重重地敲门，过了很久，牧师出现了，黑色的法

衣围在肚子上，他用手指捻着胡子，嘟囔着时间有多晚、陌生人多么粗鲁。他围着头巾的妻子来回奔跑，精力充沛，带我们在黑暗中顺着一条小道去哈塔（hata），即我们住的地方。她说，一个房间给女人，指我的翻译。这个是给男人的，意思是说我。她将已经顶着墙放置的床铺好。还有一炉好火，她说着，敲了敲一直延伸到屋子另一头的煤炉，上面热着一个荷兰锅。她点燃屋子角落圣像前面的灯，自己画了个十字，开始在厨房里忙碌，哒哒地进进出出，带来茶和装满土豆的汤锅，还有她装有腌西红柿、洋葱和黄瓜的广口瓶，几瓶伏特加和法国白兰地。牧师回来了，我请他为食物赐福，他用唱歌来赐福，他的妻子用高亢的颤音加入进来，两个人都不停地画十字。

我们一起在房子中央的搁板桌上用餐，上方有一个灯泡。牧师和他的妻子不停地偷偷交换眼神：这真的是伯爵的孙子吗？为什么他不说俄语？他是个信徒吗？

他们说，50年代他们刚来到这个教区的时候，教堂被用木板围了起来，集体农场的机械修理店设在教堂院子里。牧师的妻子说，当他们试图把机械修理店弄出教堂院子时，牧师被抓了起来。但我们还是在这里，他咀嚼着一块黑面包冷静地说。35年了，我们保留了所有的东西。我们保留了你们的墓地。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平静、不动声色地说，也许在问他们自己，为什么恰恰是我配得上这种无私的奉献。

独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借着伏特加和白兰地问。牧师和他妻子对望了一眼。在国家的默许授意下，一个乌克兰教堂正在要求接管乌克兰所有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并且要求用乌克兰语唱颂歌。牧师自己是在俄罗斯的神学院受的训练，然而他对信徒说乌克兰语，但仪式只能在斯拉夫教堂里举行。他准备承认的唯一

的教会权威是从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传过来的古老权威，而不是那些基辅的暴发户。在全乌克兰境内，在教堂门口已经有争斗爆发，争斗双方是旧信仰的捍卫者和新的民族主义教会。他们的儿子是附近最大的城镇文尼察内的大教堂的唱诗班指挥。基辅来的新主教已经来过文尼察，要求移交大教堂。儿子准备抗争。“会有人被杀死的。”牧师的妻子忧郁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在井边把水打上来，洗漱、泡茶。村里的孩子经过，小书包背在背上，去山上的学校上学。女人穿着卧室里的拖鞋，裹得紧紧地抵抗寒冷，在她们的后花园里忙活，浇浇水，把卷心菜的头部剪下来，用嘘声把鹅赶开。一辆马车嘚嘚经过，两个农场工人坐在干草上，双腿在马车侧面晃荡。一个老妇人，弯腰驼背，沉重地倚靠着一根拐杖，慢慢走过。

有一种严重的与世隔绝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衰老、贫穷令这个村子缺少生气，而是那么多的脸上都带有幸存者的不知所措和失败的气息。

集体农庄的领导后来告诉我，现在没人想要工作。我问，为什么你不把土地分给他们呢？我为什么要给他们？谁有资本？看看这些地。他伸出手臂，指着广阔的、毫无特色的甜菜地。他的暗示非常重要：如果农业是新乌克兰的支柱，现在谁来拯救它？农民们在哪里？小农户在哪里？集体农庄的领导带我下到河边靠近教堂的地方，去看集体农庄（kolkhoz）的面粉厂。前门上方显示它建于1886年，与教堂同一时间，在那里面我找到了曾祖父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口的所有机器，仍旧在工作，只是用锤炼过的苏联的锡和铁取代了那些已经老化的部件。我看着头巾上落满面粉的女人把一袋袋谷物倒进古老的机器里，看着优质的白色面粉在下面堆成圆锥形。我擦掉一个铭牌上的面粉灰尘，上面

写着："莱比锡，1886"。集体农庄的领导说："仍旧是这个地区最好的面粉厂。"

我无法摆脱那种感觉：这些人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幸存者。从家族的相册以及英国保姆拍摄的照片上，我知道一些农民的名字，我祖父的那个时代，他们曾经住在这里。他们的名字用白色墨水题记在他们照片的下面：满是胡子的塞舍霍夫（Sessoueff），房子的管家，与他丰满的妻子和七个孩子在一起。鲁德尼茨基（Rudnitsky），看上去滑头滑脑的马厩主管。革命的时候，他们的遭遇如何呢？在教堂墓地，我找到了塞舍霍夫的墓，埋在家族墓室的边上。他的孩子们呢？全都在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了。鲁德尼茨基呢？也被镇压了。为什么？牧师耸了耸肩。他们是富农（kulaks），富裕的农民、谷物囤积商、放贷人、国家的敌人，斯大林两次大屠杀的受害者。

沿着空荡、尘土飞扬的克罗波德尼斯塔小径走向那座大房子，经过一些铁皮屋顶的砖砌小农舍，经过其他还是用篱笆泥墙和茅草搭起的小房子——它们和保姆的照片里是一样的，我感觉到了悲哀像葬衣一样笼罩在这个地方的原因。1931年到1932年间，大约有300万乌克兰人死于饥饿。在那同一个年代的晚期，又有100万人在农业集体化和对知识分子、党的官员的清洗中被杀死。另外有200万—300万乌克兰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的父亲成长时的那种小农户和劳工的农民文化被消灭了。这是大恐慌来临的时候。恐慌此后从未离开，它仍旧保留在老妇人的眼睛里，当我挣扎在通往曾祖父房子的泥泞的小路上的时候，她们从厨房花园的尖桩篱笆上方盯着我看。

房子在一块高地上，可以俯瞰村子，是一座宽敞的两层楼宅邸，涂有白色灰泥，带有一个正式的前门廊，当家族来此避暑的

时候，马车可以停靠这里。正花园早已不复存在，一侧被烧毁了，另一侧成了废墟，但从旧的家族照片上仍然还可以辨认出来。

老师们在台阶上欢迎我。一个穿农民服饰、戴乌克兰头饰——用紫色和粉色的塑料花制成——的女孩子向我行屈膝礼，送我一块圆形面包，上面点缀有糕点末和一束谷物做的糕点，还有一小碗石盐。这是我的祖母1902年作为我祖父的新娘来到这里的时候所受到的欢迎。他们经过的每一座农舍，每一个农民家庭都送给他们面包和盐。现在轮到我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翻译轻声告诉我，我应该拿一块面包，把它伸到盐里蘸一下，然后吃掉它。然而，我窘迫地鞠了一躬。

他们带领我穿过房子，我在加拿大流亡的、上了年纪的叔叔们还记得里面的一个个房间、一条条走廊。我感觉我是梦游在他们的记忆里。我走过厚厚的木头地板，穿过长长的低矮走廊，孩子们在我身后喧闹。我听到学校的主任指着告诉我，是在那里，就是那里，在那些楼梯的下面，我的曾祖父死在那里，在1908年的一个早晨。他没有说他是怎么知道的。这座房子似乎继续着它的神话，一些不可靠的神话。校长想知道，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真的在这里住过一个晚上吗？他领我进入一个长方形房间，房间尽头有一个立着的平台，那可能是家族演戏剧或者朗诵会所用的舞台。现在这里挂着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先锋英雄画像。他们要求我做一个小演讲。我告诉孩子们，我是建造这座房子的人的曾孙。我送给他们我的家族相册中一些照片的复印件，他们看着照片，看着我，带着敬畏和怀疑。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革命之后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祖父的妹妹米卡（Mika）那时在村里经营一个诊所，她留了下来，后来悄

悄去了基辅，进了一家女修道院。每个人都毫不迟疑地说，村里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家族的教子，米卡姑祖母是如何照看他们的。确实是这样。同样确信的还有，这座房子一定被洗劫过。没有一根家具的脚、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个茶壶、没有一个勺子留下，但有一个老人拿了一张褪色的照片过来，是我曾祖父在他最后的日子拍的，他穿着旧的将军大衣，倚靠着曾祖母的臂膀，病态、疲倦，他的胡子没有修饰，耷拉着，脚上穿着拖鞋，站在观赏花园里。到30年代，它成了许多家庭的住所，战后是做孤儿院，现在成了一所学校。在一个房间里，八九岁的孩子们在唱乌克兰爱国歌曲，是关于要推翻莫斯科压迫的哥萨克战士的悲伤、暴烈的歌曲：

锡奇 [1] 的火枪手前来参加血腥舞蹈战斗

来解放他们的乌克兰兄弟、摆脱莫斯科的锁链

我们挣脱莫斯科的锁链

在光荣的乌克兰，我们将纵情欢乐

在一个房间里，孩子们正在学习乌克兰语字母，另一个房间是个关于乌克兰人历史的民俗博物馆：一个木制纺车、一个木耙、一个黑铁俄式茶壶、必备的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 [2] 的画像。粗糙的木地板上散布着香草。但几乎没什么东西留下来：历史遗迹如此贫乏。大饥荒和强制集体化将农民剥夺得近乎一无所有。

所以，我知道了，一个新的乌克兰正在我曾祖父的房子里被打造出来。孩子们学习舍甫琴科，就像从前学习普希金（Pushkin）；他们学习摆脱莫斯科的压迫，就像从前学习尤里·

加加林 [3] 的苏联英雄成就一样。他们用手抚摸破旧的纺车，那是这些地方的农民文化留下的一切。

然后去教堂。钟声刚刚敲响，教区居民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仪式 [4] ，纪念我们的祖先。牧师的儿子带着唱诗班从文尼察过来。牧师的太太点燃了30支蜡烛的大烛台，将它升在空中。墙面是明亮的，有新完工的圣徒和神圣场景的画像。我站在唱诗班边上，后面是一大群老先生和老太太，不断地画着十字。

修道院底下的迷宫令人窒息。现在另外一种感觉又悄悄地攫取了我，不管喜不喜欢，感觉这是我的家族故事开始的地方，感觉这是我的墓地所在。我像一个隧道工人，经受住了窒息，又挖掘出我自己的至少一种归属。我可以对自己说：我的过去那半明半暗的轨迹确实有它的开始，而且我能够回归这个开始。唱诗班歌唱，牧师呼叫我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名字，这些名字，其中有些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从祈祷者的缝隙中偷窥，唱诗班和他们的声音交相回应，充溢在我曾祖父建造的这个教堂里。

然后，牧师请我向他的教民们讲话。我讲了，翻译莱娜（Lena）帮我解释我是谁，感谢他们的光临。他们盯着一看再看，然后靠得更紧了。老妇人在哭泣。他们拿着我的手亲吻。他们透过残缺的牙齿解释自己走了很多英里路来这里，他们记得，他们记得。米卡姑祖母，我祖父的妹妹，是怎样经营诊所的。唱诗班在我父亲的指挥下唱得多么好听。当你在桌边等待时，我的曾祖父是多么的严厉。他们是如何把蘑菇带到厨房门口，他们是如何采集草莓以及这些草莓是如何出现在食品储藏室的盆子里面。不可能记住这些故事，不可能让他们停下。每个人都一下子开始诉说、哭泣，老妇人抓住我的袖子。他们把一些纸片塞到我手里。我的祖父曾在你们的马厩里服务，他去了加拿大，我们认

为他是去看你在那里的祖父，你知道吗？不，我不知道。千丝万缕的联系跨越70年建立起来，然后又破碎了。她们都在哭泣，抓着我，为了过去而绝望地哭泣，大恐慌开始之前她们还是围着头巾的年轻女孩。一个老妇人，几乎蜷成一团，歪倒在教堂后面的一条长凳上自己哭泣，她满是假牙的嘴成了一个哀恸的黑洞。

牧师将她们嘘散，带领我走出教堂，进入地下室，一个低矮、潮湿的石板空间，圣像沿着后墙摆开。在阴暗中，我看到对着远墙有成堆的木材。圣像灯一个接一个点燃，在它们的灯光中我分辨出三个花岗岩墓穴。中间是我曾祖父的，有他的军衔，边上刻着他以沙皇的名义签署条约的名字。一边是他女儿的墓，另一边是我祖父的妹妹，她1915年在照顾伤员时死于一列充当伤寒医院的火车。在她旁边，是我的曾祖母。牧师指出我曾祖母墓穴上是白色大理石，石头上有屠夫的刀留下的砍印。30年代，这里曾是屠宰场。我用手抚摸白色大理石上的黑色切痕。我们站着，唱《永恒纪念》[5]，纪念的赞美诗，牧师为墓穴赐福，然后他们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和一支蜡烛。

民族和墓穴。墓穴和民族。土地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你的祖先长眠之地。祖先必须得到纪念，因为如果没有过去的驻定，人类生命就是渺小而卑微的。土地值得为之牺牲，因为陌生人将会亵渎墓穴。墓穴被亵渎了，屠夫在大理石上面杀戮，一个人如果能力足够的话，将会奋力阻止。

回头来看，我将在地下室的时候视为我开始改变的一个时刻，某种对民族规划的敬意开始溜进我的情感中，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土地和墓穴至关重要，为什么民族在保护这二者中至关重要。

---

[1] 锡奇（Sich），历史上哥萨克军事武装的中心营地，设于第聂伯河下游石滩地区。

[2] 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1814—1861），乌克兰诗人，以诗歌号召乌克兰摆脱俄罗斯的统治，被视为乌克兰民族英雄。

[3] 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1934—1968），苏联英雄，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

[4] 即pannihida，东正教纪念仪式。

[5] 《永恒纪念》（Viechnaya Pamyat），东正教纪念仪式结束时，唱诗班和悼念者共同合唱的歌曲。

利沃夫

与牧师以及牧师太太、儿子、唱诗班作别之后，我们启程前往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Lvov）。随着时间流逝，田野在发生变化，从平坦的黑土地平原，到起伏的、更为繁荣的喀尔巴阡山脚下的村庄。我把剩下的盐水鸭吃完，这是离开的时候集体农庄送给我的礼物，还有一块学校仪式上的祝福面包。我睡着了，然后在巴士行驶在哈布斯堡时期的鹅卵石路面的咔嗒咔嗒声中醒来。

俄国人管这里叫利沃夫。在哈布斯堡时期，它以伦贝格（Lemberg）而知名。对于19世纪挣扎于贫困之中的加利西亚犹太聚居区（Galician Stetl [1] ）的犹太人，那就是他们的耶路撒冷。乌克兰人称其为利维夫（Liviv），它是欧洲各帝国的边界注定要相遇的地方之一。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国家由此诞生。现在，它正见证乌克兰痛苦而缓慢的诞生。

有轨电车穿行在弯弯曲曲的鹅卵石街道上，摩擦出刺耳的声音，令人想起维也纳。铜绿色的巴洛克式尖顶让人想起布拉格。但40瓦灯泡的昏暗光线照在面包店里疲倦不堪的人们脸上，他们只能在他们所在之处——苏维埃帝国的废墟中寻找食物。利沃夫像是哈布斯堡的庞贝，完整地保留在苏维埃火山的尘埃和灰烬之下。

利沃夫一直是乌克兰独立的摇篮，可能是因为它从前不是一座乌克兰人城市，而是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城市，因而作为少数民族的乌克兰人必须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使他们能够超出其他民族的竞争性喧嚣而为人们所听到。

这个城市一直是乌克兰最不俄罗斯化、最不苏联化的部分。直到1918年，奥匈帝国的双头鹰一直优雅地占据在市政建筑之上。1919年到1939年间，它被波兰人统治，你仍然可以看到波兰语的街道标志就在新的乌克兰语标志之上。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协定，将利沃夫移交给苏联人，但入侵的德国军队——在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人员的支持下——将他们驱逐出去。苏联军队1945年重新夺回城市，直到1956年，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的抵抗仍未最终停止。那些游击队的幸存者已头发斑白，他们现在在街上行走，戴着他们的旧军帽。

在更加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东部，苏联的统治可以依赖某些大众的支持。在乌克兰西部，苏联人是作为占领军进行统治。东仪天主教被封禁，他们的教堂被关闭，领导人被关入监狱。民族主义被界定为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者的家庭被驱逐出境，但正是西部乌克兰民族主义神话——通常是在流亡中发育的——现在试图让自己成为整个国家的官方民族主义。

当80年代末开放和改革来临的时候，受到压迫的民族主义力量带着仇恨归来。乌克兰西部受到学生示威、罢工和宗教游行的震动。令戈尔巴乔夫失去整个帝国的错误是他相信一种新的苏维埃人类将由此诞生。但他只会发现，有多么痛苦的、持久的、不可原谅的民族记忆存在于波罗的海、格鲁吉亚，以及这里，利沃夫。

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和民族回归在这里意味着回归欧洲。回归欧洲意味着将你的民族从苏维埃体制的泥泞壕沟中拉出来，就像拉一辆深陷的马车。

我们是欧洲人，在利沃夫主广场的民族宾馆，侍者告诉我。

我们是欧洲人，一个曾经在西伯利亚待过六年的乌克兰国会议员在她小小的三居室公寓里告诉我，在她的钢琴上有一个哥萨克雕像，墙上挂有一幅乌克兰人受难的画像。做欧洲人，在这里意味着不做俄罗斯人。它意味着，做一个个体，承担责任，坚持自我，所有那些西部乌克兰人强烈相信在俄罗斯人身上所缺乏的个性。

做欧洲人也意味着做天主教徒。在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1596年以来，乌克兰西部有一种完全属于自身的宗教——东仪天主教，它是一种波兰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混合体。对我而言，仪式听上去像俄罗斯东正教，但我不敢对东仪天主教民族主义者这样说，他们最不愿承认的就是将任何事情都归因于俄罗斯的宗教传统。我问乌克兰国会议员，为什么她继续痛恨俄罗斯人，她耸耸肩，微笑着说，如果你爱什么——比如你的国家——你也必须痛恨它的敌人。

现在是东仪天主教信仰的光荣时刻。1992年8月，他们把领导人斯莱普主教（Cardinal Slipe）的遗体带回国，他在流亡中死于罗马。他们从俄罗斯东正教手里收回了圣乔治大教堂（St George’s Cathedral），巴洛克式小爱神和祭坛屏风的镀金重又焕发光彩。礼拜日，教堂挤满了各种年纪的秃头男人和戴头巾的女人，当他们与唱诗班一起合唱哈利路亚时，声音在700个头颅上方飘荡，犹如波涛温和地卷过苍穹。

站在毫不掩饰他们强烈感情的男人和女人们中间，民族主义事实上是什么变得清晰了：梦想整个民族可以像一个集合体，歌唱同一曲圣歌，聆听同一个福音，分享同样的感情，不仅彼此间互相联结，而且与他们脚下埋葬的死者联结在一起。

他们在每一个礼拜日做梦，礼拜一回到在商店外面排长队的辛酸现实中。应许之地远离这里。独立只有一年时间，要将苏联体制从人们身上搬走，将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一代人？与我交谈的一个电车司机耸肩大笑，两代人，或许三代人。那些为乌克兰的独立奋斗的人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可能无法活着见到应许之地了。

像马克思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无聊强制”在这里折磨人们。它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施加这种强制，奋力使其崩溃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刚刚意识到，这里的人们如此深情呼唤的独立的“精神”收益相对来说容易得到。让电话运转、食物进入市场、正确地冲洗厕所等这些事务才是建设一个国家的困难之处。

在当下，每个人都知道独立的“精神”收益是什么。当我问我的电车司机朋友，他说的“精神上”的意思是什么，他笑了。“你可以在大街上亲吻女朋友，在公园里喝啤酒，在教堂里自己画十字。”

利沃夫最棒的摇滚乐团加杜金兄弟（Gadukin Brothers）在广场中心壮丽的奥匈帝国歌剧院前面举行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在前来听音乐会的年轻的人们脸上，你看到了自由，对于这种自由，你不可能用犬儒的态度对待。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各种有趣的脸，戴老式的、装饰有蓝色和黄色 [2] 独立绶带的苏联军帽。一个女孩走过，武装手枪皮套里放了一把玩具手枪。在这里没有人模仿西方，他们只是做着他们自己独特的加利西亚和喀尔巴阡式的事情，而台上的加杜金兄弟正在诉说每个人脑子里想的事情。透过吉他和鼓点，你听到加杜金兄弟唱道：

古老的红色战车陷进了壕沟

列宁是那车手

现在的战车是蓝色和黄色

没有人知道它将去向何方

---

[1]　原文为Stetl，应为Shtetl，意第绪语，指犹太人小村，尤指“二战”前东欧的犹太人聚居区。

[2] 蓝色和黄色为乌克兰国旗颜色。

克里米亚

从利沃夫，我坐通宵火车前往敖德萨。像利沃夫一样，19世纪时的敖德萨根本不是一个乌克兰人的城市。乌克兰人绝大多数是农民，而像敖德萨这样的南方港口城镇属于俄罗斯海军、伊萨克·巴别尔 [1] 关于敖德萨的小说中的犹太匪帮和商人，以及希腊人、土耳其人、比萨拉比亚 [2] 人和主宰黑海地区酒类和谷物贸易的罗马尼亚商人。70年的苏联统治，加上德国人的占领和屠杀，令旧敖德萨的种族杂音归于沉寂。现在，乌克兰人将它全都占为己有。

我们在“敖德萨阶梯”（Odessa steps） [3] 脚下的码头上度过了整个晚上，等待前往克里米亚的渡船。渡船事务长耸耸肩告诉我，没有油了。我们等待的时候，甲板上挤满了去度假的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罗斯人的家庭，从停泊的渡船船尾你可以看到那个“阶梯”，就像一个黑布卷从高处滚下来直到海边。

这就是爱森斯坦（Eisenstein）的《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中，婴儿车开始滚下来的地方。独立后，一位法国制片人在阶梯上放映这部电影，敖德萨人出来观看。他们痛恨这部电影，主要是因为其中刻画了被派去驱散人群的哥萨克。对于乌克兰人，哥萨克是英雄，在乌克兰每一个庆典场合都可以看到化妆的哥萨克，穿靴子、羊皮帽和披肩，腰带上挂着短剑。这是独立可以为你做的事情：一部乌克兰人曾经喜爱的伟大影片现在只不过是苏联宣传的一个低劣片段。

我在渡船上睡觉，满心期望醒来时再次见到敖德萨阶梯。但

是，说也奇怪[4]，油找到了，渡船起航，第二天醒来时我看到的是克里米亚的悬崖和雅尔塔（Yalta）绵延在山脚台地上的别墅及花园。那天晚上，一辆巴士带我们沿着克里米亚海岸道路行驶，经过福罗斯别墅（Villa of Foros），这是在1991年8月的政变中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的地方。这整个迷人的欧洲南部岬角——其悬崖伸入大海——曾经是莫斯科精英的后花园。再也不是了。谣言说福罗斯别墅现在由克拉夫丘克家族使用。

黑暗中，巴士带我们在一个路障前停下，这里距离塞瓦斯托波尔16公里。翻译、看守和俄罗斯军警静静地谈判。我们将是第一批被允许在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基地——过夜的外国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在港口有渡船准备带我们出去看看。当船长驾驶渡船“土星”号驶入因克曼（Inkerman）入口的顶端时，我第一次看到一幅骇人的景象：俄罗斯黑海舰队抛锚停泊。渡船靠得很近，船尾的波纹触及它们的锚链，巨大的灰色船体连成无边无尽的队列浮现在我的头顶，从我的头顶经过，有些高达五层楼。童年时代读过的《简氏世界舰船》（*Jane’s Fighting Ships*）的画页似乎飘扬在明亮的港口空气中：护卫舰、轻型巡洋舰、海军拖船、运兵舰、登陆艇、医务船、护卫舰、布雷舰、驱逐舰以及巡洋舰。有些舰船有200米长。它们的桅杆上密布有通信天线和卫星天线，甲板上满是导弹、防空炮、鱼雷和武装直升机。我试图计算总数，但数到60以后就弄乱了。它们开始驶入塞瓦斯托波尔港入口的许多分岔，一个小时之后，我还只看到了舰队的大约三分之一。

当我们给乌克兰朋友讲述当时情景时，一个乌克兰朋友轻蔑地嗤之以鼻：一个舰船的墓地。如果不是墓地，那就是养老院。

一些老旧的舰船好像是一排坐在帆布椅上面对大海的怪人，但不是所有的舰艇都破旧衰朽。1.1万吨的巡洋舰“斯拉瓦”号刚满11年船龄，在早晨的阳光下亮出它锐利的牙齿，绷紧的锚链像拴住一只攻击犬的皮带。

黑海舰队也许是一份已经耗损的资产，但它仍是世界上第十二大海军力量，它的337艘舰船占俄罗斯舰队总数的三分之一。最致命的部分——核潜艇和航空母舰——在其他地方停泊，如摩尔曼斯克（Murmansk）和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然而塞瓦斯托波尔的舰队仍然拥有让俄罗斯成为整个地中海盆地包括中东、北非、南欧不可忽视的大国的力量。任何试图勾销俄罗斯军事大国地位的人都应该去因克曼的渡船上转一转看看。

俄罗斯人的问题是塞瓦斯托波尔现在在外国。乌克兰对基地和部分舰船提出要求，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之间展开了艰难的谈判，分歧巨大，以至于只达成了一个将分割舰队推迟三年的协议。

对于任何一个有军事头脑的人来说，黑海舰队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两个国家都想要将他们的旗子插上去，两位海军将军争相对其发号施令，一艘船甚至已经被停到了敖德萨，升起了乌克兰旗帜。舰队未来的指挥官、海军学院里的士官生毕业时被要求投票选择为哪一面国旗服务。80%的人选择为乌克兰服务，而到现在这个新的国家名下还只拥有一艘海岸警卫艇。这些庞大舰船，没有人确切知道一年后谁会对他们发号施令。

在舰队指挥官海军上将卡萨托诺夫（Admiral　Kasatonov）的接待室里，他的下属们并不想把他们的非常形势看得过于严重。舰长和指挥官、中校和年轻的军官们都聚集在上将办公室外

面的电视机前面，守着看墨西哥的流行肥皂剧《富人也流泪》（Even the rich shed tears）。

卡萨托诺夫上将不到60岁，愁容满面，他的手焦虑地爬梳着灰色的头发，用桌子上十几部电话和一个带鼠标的大型康柏电脑指挥他生锈的战争机器。他的座椅后面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缔造了俄罗斯黑海权力的彼得大帝。这个讯息再清楚不过了：俄罗斯是俄罗斯和苏联帝国海军传统的唯一继承人。乌克兰人，当心点。

访谈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说些陈词滥调，他在莫斯科的上司已经告诉过他不要说任何火上浇油的话。他用最为柔和的方式安慰我，这两个国家在黑海拥有同样的战略利益。他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人，想把事情都留给政治家，他们必须制订出协议。但我继续问，作为一个基地现在位于外国土地上的庞大舰队的指挥官，他有何想法？“你说的外国是什么？”他马上插问，“只是因为政治准则的改变，它不意味着任何本质上的改变。”至少在这个帝国的头脑里，乌克兰已经独立的想法事实上还没有生根。

当天上午的剩余时间，当我登上上将的护卫舰之一“拉蒂尼”（Ladni）号时，有同样的感觉，帝国仍然还在并将持续下去。在舰长船舱中落满灰尘的架子上，我发现了最基本的导航辅助设备：《列宁选集》。舰长召集了四名水手给我进行访谈：一个乌克兰矿工的儿子，两个来自阿塞拜疆的战战兢兢的男孩，一个来自遥远中亚的塔吉克人。他们全都被排练好了，说舰队就像帝国，是一个各民族的欢乐大家庭。军官们被打发到一个炮塔后面、超出耳朵听力范围后，水手们变得更加坦率了。阿塞拜疆人轻声说，我们想为阿塞拜疆在里海的海军服务。至于塔吉克人，他只想尽可能快地回到中亚。

当我上岸以后，我看到征招来的水兵在码头边上把土豆铲进桶里，吃力地带着它们沿舷梯送到船上的厨房。他们的制服肮脏，面色灰黄，他们的晚餐内容不会比这些土豆好多少。身处两个国家经济不断下滑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对舰队的争端像是两个满身泥泞的乞丐为了占有一些小土豆而打架。

一个乞丐帝国，让它的人民贫穷了70年，来维持在水中的这样一支舰队，目的是恐吓我们。现在报应来了，它几乎没法维持抛锚在这里的这笔正在生锈的庞大资产。俄罗斯人仍旧有实力恐吓我们，但那实力正逐渐沉入经济解体的波涛之下。要求人们牺牲以维持这个抛锚的舰队，这种想法令我感到寒心而愤怒。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最为尖锐的记忆不是灰色船体的抛锚停泊，而是离开的那个刺骨寒冷的早晨，一个靠着我的宾馆围墙睡觉的孤独的人。她60多岁，头发像这里受过教育的老妇人一样挽了个发髻，穿一件残破的羊毛外套和一件羊毛衫。她也许是一个舰长的未亡人，契诃夫显然可以用这个题目来写一篇关于她的短篇小说。她没有鞋子，脸因为露宿外面而开裂、发红。她背靠宾馆的围墙躺着，身边是水手们前一晚留下的破碎的啤酒瓶，筋疲力尽，无法挪动，流下完全绝望的泪水。

---

[1] 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1894—1940），苏联作家，代表作《骑兵军》（Red Cavalry）。

[2]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旧地名，介于现乌克兰与罗马尼亚之间，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罗马尼亚曾先后占领该地，“二战”后被纳入苏联版图。现大部归属摩尔多瓦共和国，南部沿海地区归属乌克兰。

[3] 敖德萨通往海边的台阶，共192级。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的经典影片《战舰波将金号》中，“敖德萨阶梯大屠杀”是一个经典场景，该地因此而闻名。

[4] 原文为拉丁文，mirabile dictu。

鞑靼人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最具争议性的土地。如果俄罗斯人有任何与乌克兰人开战的可能，那就是因为这儿。在这个半岛上，俄罗斯人的数量超过乌克兰人。所有人都非常明白，克里米亚只不过是在1954年才由斯大林的继承人 [1] 割让给乌克兰的。在这里有俄罗斯分离主义者，他们在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的当地议会拥有自己的政党，想单方面宣告从乌克兰独立（UDI） [2] ，寻求恢复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就享受这样的地位。然而，尽管乌克兰人数量上不占多数，他们却占有支配地位，因为克里米亚所有电力和水的供应都来自乌克兰。在这里，一个俄罗斯分离主义共和国可能出生时即告夭折。

不那么容易夭折的，是这个半岛最古老居民的渴望，那就是鞑靼人，这个穆斯林民族是在克里米亚山区居住已有千年的原住民。1942年，德国军队向黑海进军，斯大林命令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全部赶出来，把他们重新安置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他们是第一支在红场静坐抗议、要求公正和遣返的种族群体。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返回克里米亚，在他们的古都巴奇色勒（Bachiseray）附近的山脚定居。

19世纪20年代，普希金来到这里，写了一首关于鞑靼可汗宫殿中喷泉的诗歌。每一个房间里都有流水溅落的声音。苏联的导游手册中当然提到了普希金，但没有一句提到被驱逐的民族。

在巴奇色勒贫瘠的山脚下，我们发现了一个鞑靼村庄，它位于一片废弃的甜菜地中间，稀疏散布着一些造到一半的轻型砖砌农舍，周围堆满了建筑材料。看到我们，一个穿浅蓝色家居服的

女人招手叫我们进去，我们照做了，她自豪地指着一个黑绿色的沥青纸小屋：这是我们造好这个房子之前的家，她解释说，然后叫我们把鞋子脱在外面。

现在有一家七口居住在这座未来会是三层楼的房子的第一层，房子里面将刷成令人舒适的白色，涂上灰泥，混凝土地板铺上油毡布，两个大电视机将出现在餐桌上。

我原本希望看到黑头发、黑皮肤的亚洲人，但他们大都没有可分辨得出的民族特征。有些男人是黑皮肤，有浓重的胡子，健壮结实，但其他人是淡色头发、浅色皮肤，典型的俄罗斯人外表，说流利的俄语。坐在门边的一个年轻女人有一张瘦削、苍白的脸，她说自己生于中亚，几乎不说鞑靼语，但她的父母过去说，而她现在说。

他们马上聊了起来。我们放弃了中亚的一切——房子、工作、花园，来到这里。现在看看，只有一座房子。还有种下的几排西红柿和玉米，褐色的表层土壤是从附近修路工地挖来的。在西红柿地里有一间棚屋。没有自来水，水要用卡车运过来，一个星期一次。但是有电，他们烧热水，磨咖啡，用干净的咖啡杯给我们喝深黑的土耳其咖啡，还伴有蜂蜜，是在新罗西斯克（Novorrosiysk）养蜜蜂的亲戚带来的。

父亲60多岁，头发花白，戴平顶帽，脸上灰白的胡子有四五天没刮，右太阳穴上有伤疤。他的妻子说，把他的衣服扒光，你会看到伤疤到处都是。他颇为尴尬。妻子笑了，露出她的金牙。她穿一件印花的家居服，齐踝的白色袜子。女人们是坚强的，男人们更忧伤、更绝望，有一个游离在谈话边缘，脸孔瘦削、苍白、憔悴的人落下了泪水，转头看向别处，像一个孤儿。

我告诉他，我是被迫流亡者的孩子。我们创造了新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拒绝在中亚的新生活呢？父亲说："只有没有母亲的人才知道母亲是什么，只有没有土地的人才知道土地意味着什么。"

带孩子的年轻女人插话："你可以去加拿大，开始新的生活，没有人在意你是俄罗斯人，但是如果你去中亚，他们辱骂和羞辱我们，只因我们是鞑靼人。"

一个年轻男人说："我们被称为人民的敌人，我们有一半人在放逐中死亡；他们把妇女和孩子扔到乌兹别克斯坦，把男人带走，让他们去战场上送死。"

我问，你想要什么？要回你们的老房子吗？女人告诉我，不是，我知道我的房子在哪里，它在几公里远的一个村子里。现在一个乌克兰人住在那里，我不想赶他们走，像我曾经经历的那样。我只想要土地，让我能够造一个房子住下来，而他们说我们是非法占据。

政治上你们想要什么？我们要一个克里米亚鞑靼共和国。我们要直到1939年我们还拥有的东西：自治共和国的地位。我们不想把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赶出去，但我们要自己的语言被承认为官方语言，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学校和社区，要让这整个克里米亚被承认是鞑靼人的故乡。我们真的不想要一个领土国家，我们要一个种族上的民族，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说。

穿家居服的女士拿出一张皱巴的、褐色的纸，从桌上递过来。那是她的出生证明，出自斯大林的时代，出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时期。她要我注意，它是用两种语

言写的：俄语和鞑靼语。她双臂抱胸，说："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从前拥有的。"

他们带我出去，参观这个村子。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有车辙的路走，新的房子在路两边崛起，人群跟随着我们聚集，在深达腰部的地基里劳动的男人们放下铲子，凑过来聊天。我问其中一个人——他从正在挖的一条壕沟里爬出来——他是否会容忍他的民族再次被放逐。他说，我们是个小民族，大的民族总是会想怎么对我们就怎么对我们。但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得先杀了我才行。

一个穿件褪色的黄军装夹克、戴军帽、叼着烟斗、留小胡子的年轻人，大约25岁，他说当他在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经常偷偷溜回这里，回巴奇色勒，那时这还是禁止的，他们会从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挖一些土带回他们过去住的地方。"我们对着这些土壤祷告，也会为之哭泣。"

我问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什么这片特别的土地对他们意义如此重大，他说："对于我们，这里是个神圣的地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死去。如果我不推动我的孩子们回来，谁还会这样做？我们将失去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必须一砖一瓦地把我们的遗产和文化拼起来。相信我。否则，一切都将被摧毁。"

我陷入了沉默，看着一个戴头巾的老妇人嗑手掌里的葵花子，带白色围巾的老人擦着眼睛；泪水也从那个我问他这片土地意味着什么的老人脸上流淌下来，所有人都沉默了，盯着这块没有前途、多雨的山坡，它如此贫瘠，他们必须运来表层土壤来让东西生长。一块贫瘠的山坡，满是电线，到处是建筑沙土和砖

块，地上很多洞，猫和孩子们到处乱跑。

一个穿红毛衣、牛仔裙的老妇人，头上围了块方巾，拥有健康的红肤色和金牙。她突然说："我63岁，看看我，为什么我要放弃自己的房子、工作和所有的一切，两手空空来到这里，然后重新开始？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人民中，并且给予我的孩子们我自己从未拥有过的：一个在我自己土地上的家？"

在她身后的年轻女人听着，并且说她很感激老人们在最黑暗的时候保存着民族生机。"我们没有从政府那里拿到一分钱，我们没有从任何人手里拿到过钱。当我们的人民到来的时候，他们睡在我们的房子里，有时我们这里睡了25个人。我们不想等待什么，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

我从未碰到过像这样的一个相信土地拥有如此神圣重要性的民族。他们的纪律、尊严和凶猛像30或40年代的以色列先驱。对于他们，国家地位——人民（narod）——和个人尊严之间的联系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国家地位，人们会在巴士上蔑视你，人们会嘲笑你到底是什么人。身为一个民族是不够的。为了拥有尊严，你必须拥有一个国家。

我问他们如何得以幸存下来，他们说，我们一定是有某种本能。此外，我们没有与鞑靼人之外的人通婚。大的民族可以承受跨族婚姻，但我们必须有严格的规则。而且我们有强大的家族，尊重老人也是我们保持力量和传统连续性的方式。然而，从他们的脸庞来看，几百年来他们显然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一直通婚。

我问他们，他们是否会在村子里建一座清真寺。他们全都回答说，当然会，还指给我看山上按计划准备建清真寺的地方。再一次，在穆斯林的中亚，他们拥有宗教自由，并且周围是宗教合作人士。没有区别。这是他们想要回来的土地。

对于他们，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多少与他们关系不大，罪责由苏联承担。他们并不关心乌克兰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更重要的是使克里米亚恢复自治的鞑靼共和国的地位。

我担心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许会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诉求充耳不闻，就像70年代俄罗斯异见者对乌克兰自治主义者要求支持的态度一样。乌克兰能够接受一个国中之国吗？没有什么更难满足克里米亚鞑靼人。

---

[1] 指赫鲁晓夫。

[2] UDI，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缩写，即单方面宣告独立。

金刚

从克里米亚，我向东旅行到顿涅茨克，乌克兰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心脏。鞑靼人并不是新乌克兰内唯一想要自治的族群，顿涅茨克地区的许多挖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要求自治，保护他们的语言和教育权利。

顿涅茨克是斯达汉诺夫（Stakhanov）的家乡，这位20世纪30年代的矿工在采煤生产面上的英雄般的、非人的生产业绩成为苏联人生产力的核心象征。在整个80年代，矿工仍是苏联劳动力中的贵族。但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们与其他工人的薪水差异逐渐被侵蚀，他们发起了一波罢工浪潮，弱化了戈尔巴乔夫在工业劳工阶层中得到的支持。然后，在1991年8月，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另一个国家。他们再一次走上了街头，他们对生活水平下降的示威抗议一直是克拉夫丘克政府的持久挑战。

在基辅最高苏维埃前面的一次示威中，我曾遇到一群戴头盔、穿靴子和厚毡布夹克的矿工。我很快与一位体型巨大的矿工弗拉基米尔·科帕科夫（Vladimir Kolpakov）建立了联系，他来自顿涅茨克红星六号煤矿（Red Star Mine Number 6）。弗拉基米尔是个满脸胡子、膀大腰圆的巨人，他的同伴叫他“金刚”。他是示威者中最健谈的一个。我到达顿涅茨克后给他打了电话。他的妻子告诉我他下矿了，所以我去煤矿外面找他。

那是一个小煤矿，有百年历史，雇用了大约250人，他们站在更衣室外面抽上最后一口香烟，然后穿上工作服、钻进笼子，开始向下之旅，工作的地方是在最后一站。他们穿着被煤染黑的工作服，步履沉重地走向笼子，笼子上面有一幅现在已是多余的

列宁画像。

井口由女性管理，她们紧紧地裹着围巾和羊毛夹克抵抗寒冷潮湿。她们有种奇特的时髦，这些粗壮的女性身体结实，妆化得很好，嘴里满是金牙。她们将运煤车从笼子里吊出来，砰的把门关上，有点轻快的野蛮，操作着陈旧的升降机和电话系统。我被告知“金刚”将会在他当班结束后上来。一位煤矿女人挽着我的胳膊，带我去升降机后面的茶室。这是个舒适的地方，装饰有50年代西方电影明星的画像，靠近大暖气管的边上有羊皮椅。在多丽丝·戴 [1] 和奥黛丽·赫本的画像下面，这些女士们喝着茶，对我开玩笑。它是个动人的地方——地狱般的，是的；不是左拉 [2] 式的，是的，但也有种尊严。我可以感觉到她们的同志友爱，她们分担危险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快乐。

“金刚”终于出现在升降机后面，咧嘴笑着，像个巨大而肮脏的浣熊，他的脸被煤染得黑黑的，头盔和工作服被矿井里不断淌下的水滴湿了。我问他下一个班我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下去，他说：不可能，太危险了。

洗完澡，换好衣服，他看上去仍然像一个巨大的浣熊，煤的粉尘染黑了眼睛周围。他拿出烟，吐了几口痰，点上烟。我问他，你的肺怎么样？他耸耸肩，笑了。我们每年有体检。此外，他笑着说：“只要一天完了的时候来一支烟，你就不会觉得做过什么工作。”

我们回到他的公寓，是在矿工们自建的合作社区的八楼，有四个空荡荡的房间。他倒上伏特加，带我参观公寓，它比那些议会代表住的房子还要大得多。矿工确实是苏联劳工的精英。

但他们是在艰难时势中坠落的精英。通货膨胀正在吞噬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支票，食品——在这个帝国从前的粮仓——昂贵而且很难得到。“一盒火柴过去只要1个戈比[3]，”他愤怒地说，“而现在要1卢布加50戈比。”一条面包过去是22戈比，现在要花7卢布。领养老金的人们被任其自生自灭。

弗拉基米尔没有针对这些问题，而是突然开炮说，民族主义者——意思是乌克兰人——正致力于在议会通过法律，把标志牌从俄罗斯语换成乌克兰语，并且把电话里的报时语音改成乌克兰语。

我反击说，但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是俄罗斯对经济的控制导致乌克兰落后，如果国家能够摆脱莫斯科的约束，很快会变得繁荣。弗拉基米尔嗤之以鼻：“没有俄罗斯，乌克兰如何存在？乌克兰没有天然气或石油，森林只剩下很少的一点。没有所有这些东西，乌克兰能够生存吗？糖全部是从俄罗斯来的。什么也没留下。我们旁边住着一个非常强大的邻居，我们始终是在一起的。”

像数百万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一样，他只是无法面对他生活在一个外国的惊愕之处，而且，他从前可以自由旅行的地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到彼尔姆[4]去看望父母——现在不能去了，因为他无法承担卢布和库蓬的兑换比率。民族主义者的议程并不是与他们毫无关联的，它正在积极威胁弗拉基米尔和妻子的生活。“一点一点，”他说，“他们正在抛弃俄罗斯语。”我们一直在顿涅茨克相处得很好，他说，不仅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还有所有的民族，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

注意，他没有任何反对乌克兰人的意思。他的妻子是乌克兰

人，他们都说乌克兰语。他们并不介意儿子每天在课堂上接受乌克兰语教育，在那里他磕磕碰碰地学习舍甫琴科的民族史诗。

如果你逼问他，他承认苏联的“整个结构”是“错误的”。“它早晚会分崩离析。莫斯科负责一切，当每个共和国都想离开的时候，它就到了紧要关头。”

如果是这样，独立难道没有什么收获吗？你可以自由地和像我这样的外国作家交谈，把他带回家里。你可以公开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用担心会被警察逮捕。是的，他的妻子害羞地说：“我从未想过英国人会来我家。”但弗拉基米尔仍然对此表示轻蔑。他曾到基辅参加那些示威游行。他不觉得它们有什么好处。“是的，我可以走在大街上，呼喊‘克拉夫丘克下台’，但没有任何实际的改变。”如果独立让许多乌克兰人感到更加自由，对于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情况并非如此。

在这一阶段的旅行中，我讨厌乌克兰。天在下雨，顿涅茨克的乌克兰宾馆的房间里没有暖气，有许多天没有热水，浴室令人恶心，房间里一盏灯泡放出微弱、模糊的黄色灯光。每样东西都带有柴油、湿布、煤炭、酒精、烟蒂、汗臭的味道。宾馆大堂里摆满了老虎机，湿漉漉的青少年在这里消磨下午的时间。前帝国许多南部地区的不同罪犯在大堂里交易，相互交换塑料袋，点算现金，叼着香烟。有很多语言，说得飞快，我没有听见一句俄语。一个健壮的男人带着一个大箱子跟保镖一起走进来，去找宾馆经理。然后是讨价还价，成卷的库蓬易手，健壮男人转身离开，大箱子留下。我看到宾馆收银员打开它：满满的肉色的避孕套。

在宾馆门口等待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男孩，他的金发被雨打湿了，穿凉鞋的脚完全湿透。他去找大堂里每一个生意人，伸手乞讨。有几个人心不在焉地把硬币扔在他的手里。我看着他溜出大堂，消失在夜色中。

成为一个民族意味着要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到帝国任何一个部分的任何一个宾馆去。那种呆滞、懒惰、强迫性的苏联式存在仍旧继续。窗户从未擦过，大堂里的盆栽棕榈落满了灰尘，门口恼怒的老人把妓女推回大街上，楼梯上带有破洞的地毯，墙纸剥落，出纳室从未打开过，礼品店里的女孩子站在小橱柜——里面满是用漆木做的乌克兰纪念品——前面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

[1] 多丽丝·戴（Doris Day，1924—），美国电影明星。

[2] 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19世纪著名自然主义作家，其代表作之一《萌芽》（Germinal）描写了法国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的反抗。

[3] 戈比，俄罗斯货币单位，1卢布＝100戈比。

[4] 彼尔姆（Perm），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重要工业城市。

束缚

基辅有一个纪念碑，一个巨大的钢铁拱门矗立着，象征苏联和乌克兰各民族永远的友谊。在乌克兰的最后一个上午，我去这个地方做了一次陌生访问。在拱门下面有两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乌克兰人，并肩大步向前。雕像下面还有一个石雕人物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Bogdan Khmelnitsky），17世纪50年代的哥萨克武士国王，他将波兰人赶出西乌克兰，在第聂伯河两岸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哥萨克王国，只是最终自己臣服于莫斯科公国。赫梅利尼茨基象征着乌克兰传统的所有矛盾性，一方面奋起反抗波兰人的压迫，另一方面接受莫斯科的束缚。那种束缚仍然在乌克兰人民身上存在，但不是以大多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描述的方式存在，现在它是一种对苏联石油的依赖，对卢布区的依赖，对独联体（CIS）内叶利钦的诡计的依赖。他们背负着但没有说出来的束缚是苏联文明的全部分量，它的全部分量只有在其整体性上、在细节中才能衡量：不工作的电梯、用电线和铁丝绑在一起的公共汽车、到处可见的灰蒙蒙的窗户；所有官僚们随处可见的无情；工人们在一个工人国家永恒的耻辱：在我住过的一个宾馆，一个女人在宾馆楼梯下的厕所中递手纸给每一个进来的男人，以此谋生。

你离开乌克兰，相信所有关于民族性、关于回归欧洲的言辞离日常现实太过遥远，巨大的废石堆必须从乌克兰的过去中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慢慢恢复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没人知道这种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因为看不到清晰可见的选择。每个还活着的人知道的只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在其后面，存在的只是革命之前乌克兰农民的怀旧天堂，失去的世界现在微缩在宾馆

的纪念品商店里，在他们的边界之外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可能世界。不可能，因为进口视频录像带、蓝色牛仔裤、避孕套和硬通货餐馆很容易，但要进口西方的思维习惯，把它与乌克兰的生活方式调和，并以一种现时的视野融合它们，困难大得多。在民族主义者的独立信念中有一种毁灭性的天真。自由自身从不是道路的终点——只是开始。

4　魁北克



图19　魁北克“十月危机”，1970年



图20　1970年“十月危机”间的“魁北克解放阵线”



图21　克里族，加拿大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之一。摄于19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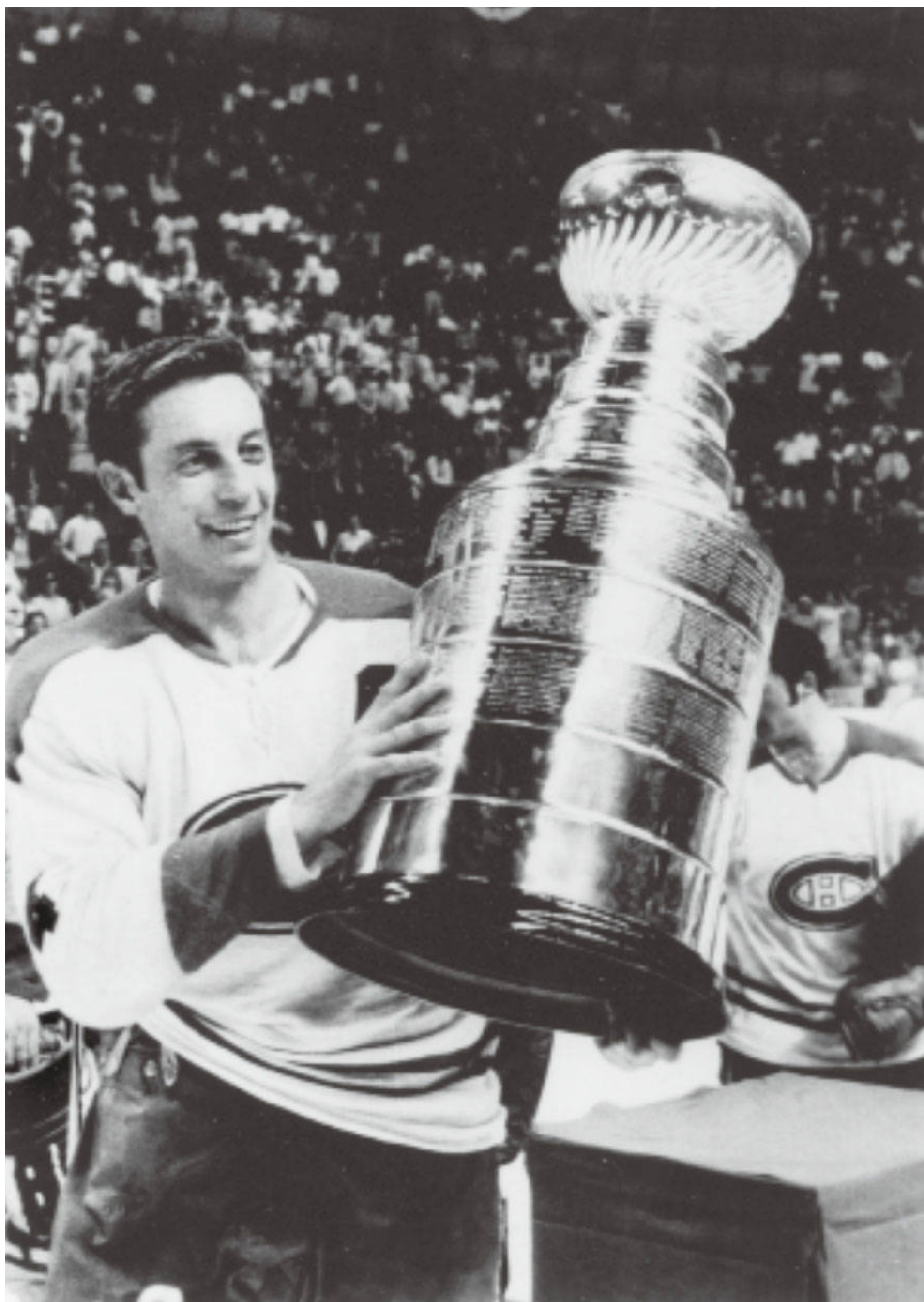


图22　让·贝利弗（Jean Beliveau）拿起“斯坦利”杯，摄于20世纪50年代。让·贝利弗，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效力于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职

业生涯横跨50—70年代，是法裔与英裔加拿大人共同的偶像，2014年过世



图23　1968年9月26日，魁北克圣伦纳德（St.Léonard）的一次关于使用语言的游行示威。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坚持其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恰恰是在失去了许多令其特殊的东西之时，法语正是其中之一。图中最前方的牌子上写着：魁北克，让我们把英语赶走



图24　魁北克党（Parti Québécois）的现任党魁宝琳·马华（Pauline Marois），2012年任魁北克省省长，魁北克独立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摄于2014年

法国佬

在墓地里有法国佬（Frenchies）躲在里面，我们很肯定。他们是严苛的天主教徒的孩子，拥有弹弓。我们全都知道他们在那儿，躲在墓碑后面，等着逮我们。墓地在山上，在我们居住的朱莉安娜大道（Juliana Road）上面，我知道我不应该一个人骑车上那儿去。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把孩子拉下车，把他们的车骑走。他们是坏孩子，这是常识。

有一次，我们朱莉安娜大道的英国裔孩子鼓起勇气进入墓地探险。我们按照军事袭击做计划，像沃尔夫将军（General Wolfe）[1] 1759年在魁北克悄悄靠近法国人一样。我们武装了自己——我的衣兜里装满了卡车洒落在街上的锐石和沙砾——我们在通往墓地的悬崖底下成扇形散开，然后我们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前进，直到最顶上，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的美国骑兵电影中看到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他们比我们大，是无知的大男孩，除了法语什么也不会说，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他们的弹弓用的是真的钢珠。你知道他们的作为，因为在墓地道路的十字路口停车牌上有钢珠留下的整齐的圆形凹痕。

那时我8岁，我很兴奋朱莉安娜大道的大孩子们让我参加这次袭击。我清楚自己有多矮小，怎么样走在他们前面，隐藏在墓碑后面，像一个侦察兵一样行动。那就是我所做的。我是第一个到达墓地山顶的。那儿是如此地安静，隐藏在卡麦隆家、弗雷泽家、麦克唐纳家和罗伯森家的墓碑后面，我因为霜寒而蜷缩成弓形，秋天的枫叶在我的头顶沙沙作响。其他人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到山顶，所以我等待他们，蹲伏在一个墓碑后面，警惕着法国佬，据说他们准备从火葬场的另一边埋伏我们。我可以听到英国

孩子们在我后面偷偷地接近，占据他们的位置，并且我知道他们会问我，下一步应该往哪里移动离法国佬更近。我知道我将不得不说，那儿根本没有法国人，因为我感觉到整个环绕着我的墓地的寂静和空旷。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不会说他们不存在。好吧，他们在那儿，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们。我们从未看到过他们。



魁北克及周边地区示意图

---

[1] 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1727—1759），18世纪英国将军，英法“七年战争”时期英军统帅，1759年奇袭法军驻守的魁北克城。

想象的共同体

你可能从未见过和你一起构成民族的陌生人。所以你想象，你们共同拥有什么东西，在这种共同的想象中，陌生人成为公民，也就是共享同样的权利、共享同一个居住地之图景的人们。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这些想象从未真正重叠，从未真正共享。现在，当我回头审视我以为我们共同拥有的加拿大时，令我震惊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未用同样的方式想象过。伴我成长的神话相信加拿大是两个民族、两种语言、两个历史和两种传统之间的合作。我相信这一点，然而我成长过程中从未真正遇到过魁北克人，而我曾居住的渥太华就在魁北克的河对岸。当我去魁北克的时候，我去东方镇 [1] ，去讲英语的部分，去我的俄罗斯祖父母居住的房子。

我曾相信，不管你信不信，我所属于的加拿大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榜样。我们是一个双民族、双种族的联邦共同体，是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可以在单一国家的框架内共存的活生生的证明。在我的想象中，我将那个乏味但是复杂的发明——加拿大联邦主义——变成对整个无知世界的一盏道德明灯。打个比方，我不知道，于我而言是家庭罗曼司的东西，对于另一半却是场无爱婚姻。至于被称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的那些土著民族，他们根本没有在我的国家公式中出现过。

回头想想，要让我认为我们——魁北克人和我——确实互相有足够的了解才能组成任何种类的共同体，似乎有些离奇。童年时代的墓地回忆实际上更接近真相。然而，那确实是我的记忆，还是一种幻想？我最好现在坦白，我一直不记得现在我说的事。多年来，我觉得我真的与法国佬打过架。我相信我看到了那些粗

鲁的法国大男孩们，他们从墓地高处呼啸而下，用一阵钢珠弹雨把我们赶回朱莉安娜大道。现在我相当肯定：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对我而言他们是幻觉，正如我对他们一样，是他们保留的幻觉。

---

[1] 东方镇（Eastern Townships），魁北克东南部旅游区，介于圣劳伦斯河和美国边界之间，以优美的村落风景著称。

民族主义和联邦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种信条，它认为：（1）世界上的人们区分成各个民族；（2）这些民族应当拥有自决权；（3）完全的自决权需要国家地位。

联邦主义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只是在一国之内的各民族之间分享政治权力的一种特定方式。但它是民族主义的政治对立面。那些相信联邦主义的人坚持认为，要享受自决权，不同的民族不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共享传统、地理或共同经济空间的民族可能同意共享一个国家，同时对于他们有关民族身份的基本要素保留相当大程度的自治。联邦主义是试图调和两种相互竞争的原则的政治：种族原则，依据是一个民族希望由他们自己统治；公民原则，依据是陌生人希望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平等的共同体，其基础不是种族身份而是公民身份。

世界上的联邦国家——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比利时、印度、苏联——试图使用联邦形式的政府，在种族原则和公民原则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我是一个联邦主义的加拿大的孩子，正如萨尔曼·拉什迪[1]是1947年的午夜创造的印度的孩子。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在成长中都想象我们居住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它找到了一条“克服”种族和宗教部族主义的道路。“冷战”时期的神话——现代世界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取决于这些联邦主义试验的生存能力。

那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冷战”图景现在已不被认可。所有的联邦国家都遇到了麻烦：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的内战，印度的分离主义叛乱，斯里兰卡的种族战争，苏联联邦结构

的崩溃，比利时的分裂，以及自1963年以来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崛起。

一切开始于1963年，一枚炸弹被放在蒙特利尔英语区韦斯特蒙（Westmount）的一个信箱里。对于我们那一代的每一个英国裔加拿大人而言，在画面粗糙的新闻纪录片中，那个信箱，和跑向信箱的警察——太迟了——以及随后爆炸的尘土飞扬，标志着某种加拿大理念开始走向终结。那是一种密封在林荫茂密的韦斯特蒙街自身的理念。在新闻纪录片中，你可以看到一条正常的、普通的加拿大街道：草坪、枫树在人行道上投下斑纹光线，还有那个信箱。那是我成长于斯的加拿大的图景：郊区，也许有点乏味，但不知痛苦与悲剧为何物。当那个信箱爆炸，当一个十年任期结束时新选举出来的加拿大政治家被绑架、谋杀，尸体被发现在一个轿车的后备厢里，我成长于其中的加拿大开始死亡。魁北克恐怖主义不再是典型的魁北克民族主义，犹如爱尔兰共和军（IRA）不是典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但是，存在如此痛恨加拿大、宁愿为了摧毁它而去杀戮的魁北克人，这种想法让每一个英裔加拿大人从家庭罗曼司的欢快晕眩中清醒过来。

在一个开始争论自己能否生存，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在讨论的加拿大，我到了政治上的成年年龄。一开始争论是单维度的：在魁北克和加拿大其他地方之间。很快，第二个维度被加入进来，西部省份的分离倾向浮出水面。第三个维度在70年代加入，出现了土著居民权利，他们对加拿大北部的辽阔区域提出了自决的要求。一维的谈判已经够复杂，当牵涉到三个维度时，必须由专业人士来接手了。关于民族主义未来的争论被政治精英、宪法研究专家接管，我们的民族生命在一种政治危机氛围中已经度过了30年。危机仍未得到解决。我们那一代的一些人已耗费了整个成年

后的政治生命来探究这个国家是否能够生存、是否值得生存。在这个时刻，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肯定它能不能生存。

加拿大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应当关注加拿大会否死去。如果联邦主义在我们的加拿大不起作用，它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起作用。加拿大拥有资源，可以缓和滋养了民族主义的经济仇恨。作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它有一种政治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可以在争论中得到调和，而不是被武力压制。联邦主义还没有失败：这个国家仍然在一起，但调和民族主义的代价是国家核心体制中延续30年的僵局。

争论的要点很简单，宪法谈判的无限复杂性让争论看上去复杂。600万说法语的北美人——魁北克人（les Québécois）——认为他们不仅是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历史和传统的种族，而且是一个民族（nation），也就是说，是一个拥有政治个性和自治权利的种族。他们这样的构想不仅是从60年代的寂静革命开始，而且可以上溯到1867年的加拿大联邦。“国民”（nation）这个词在他们的公共语言中一直占有显著地位。例如，与加拿大其他省份不同，魁北克的省议会被称为“国民议会”[2]。

加拿大联邦最根本的问题一直是讲法语的魁北克人将魁北克视为他们的民族，把加拿大视为他们的国家，而讲英语的加拿大人认同加拿大既是民族又是国家。然而，只要魁北克相信自己的生存需要加拿大的其他部分，这种不对称就不是致命的。但1960年以来，魁北克利用其在联邦体制内的权力想变成一个国中之国，发展自己的经济。魁北克从来不需要作为一个民族的加拿大，现在它甚至问自己是否需要一个作为国家的加拿大。

8岁的时候，我爬上了罗克利夫（Rockcliffe）的墓地山，搜

寻一个注定消失在枫树中的敌人。现在，40岁了，我启程前往魁北克，不仅是来与魁北克人面对面，而且与形成了我的想象加拿大的错觉与幻象面对面。发现他们想象的加拿大并不是和我所想象的一样，我本不应惊讶，但我还是感到惊讶。令我尴尬的事实是，在加拿大居住的20年里，我从未去过魁北克的法语区。我去过蒙特利尔很多次，也经常去东方镇的英语社区，但我从未去过三河城（Trois-Rivières），从未去过魁北克北地，从未去过法兰西在北美现实存在的心脏地带。在所有意义上，这都不是一次回归，而是一次发现之旅。

---

[1]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印裔英国作家，因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悬赏追杀。

[2] 原文为法语，L’Assemblée Nationale。

国家和民族

蒙特利尔以北1600公里，在一个花岗岩峭壁下，一个漆成鲜红色的大型悬臂式金属门开始缓缓地升起。四驱车进入一个长长的下降隧道，隧道是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金属门关闭，将隧道与北冰洋的空气隔离。在安全检查站，警卫检查了车辆，挥手示意通过。1公里后，车子极慢地停在另一个小得多的门前面。

小门打开，你还没有准备好会看到什么，就步入了一个犹如城堡一般巨大的空间，只不过它是在地下，墙壁是从花岗岩中开掘出来的，天花板上的灯光延伸直到视野尽头。在一面墙上一眼可以看到有低矮的绿色仪表板。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巨大的涡轮正在转动。地板震动。空气中有一种有规律悸动的嗡嗡声。这儿一定有谁在负责，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控制室。你走过去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工作的迹象：被抛弃的高尔夫车和几个带轮子的移动工具箱，但你没有碰到一个人。在这个回响的洞穴空间里，你是孤独的。

它叫LG-2，拉格兰德2号（La Grande 2）[1]。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电站，耗资28亿加拿大元。在地下有10个涡轮机，由拉格兰德河（La Grande River）的水力驱动。现在时间是7点15分。在蒙特利尔，上万个厨房的水壶打开了开关，十万个恒温器开始送热，从韦斯特蒙到乌特勒蒙（Outremont）的卧室里，女孩子们正在使用她们的吹风机。向导说，这是峰值负荷时间。河水在我们的脚下咆哮，涡轮机嗡嗡作响。这里的电力足以为一个200万人的城市提供热量和照明。

我问向导，她的感觉如何。“自豪。”她说，有一点脸红。为

她的民族拥有可以阻断河流、建造涡轮机、从岩石上开辟出电站的知识而自豪。为魁北克自豪。

LG-2在现代魁北克的打造中拥有神话般的地位。它代表了一种民族主义过往的幸福终结，那种诸如此类的过往。我们从前是个落后的社会，蒙特利尔的盎格鲁人掌管一切，牧师们负责。我们的家族太庞大了，我们贫穷，我们在农场里挣扎，再也不会了。我们的时代到了，我们自豪。

我们现在是自己房子的主人，LG-2证明了这一点。用便宜的电力，我们可以建设自己的经济。我们可以向美国人输出电力。我们可以付得起通往世界之路。

1962年，魁北克将其水电资源国有化，这是它试图成为加拿大联邦的国中之国的第一个重大经济步骤。水力在魁北克民族自尊构成中的重要性，正如阿斯旺大坝（Aswan Dam）对于纳赛尔的埃及，凯泽铝冶炼厂对于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加纳。水力的国有化开启了该省一系列的经济解放。现在魁北克有一大群重要的经济机构，完全独立于加拿大人或美国人所有。还有另一家魁北克经济独立的重要机构，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Caisse de Dépôt et de Placement），它以魁北克的地方养老基金进行投资。现在它是北美第五大投资资本组合。另外，还有通过合作性的储蓄银行例如德信金融（Caisse Desjardins）聚集的投资资金，资产超过450亿加元，以及巨型私人企业，如生产雪地摩托车和公共交通系统的庞巴迪（Bombardier）。

从一个英国裔加拿大人的视角来看，讽刺之处在于，这些发展本应让魁北克人觉得他们不太需要加拿大，可事实上却让他们

感到更加需要加拿大。因为魁北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深深地遵循着加拿大的模式。考虑到国内市场规模小，而国家疆域广大，加拿大政府及其商业阶层一直致力于协同发展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公共企业——从铁路，到航空，到加拿大广播公司，到魁北克水利（Hydro-Quebec）——在加拿大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比在美国更为重要的角色。加拿大125年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果是一种实用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左的公共文化的出现，在魁北克和加拿大英语区都是如此。

魁北克的经济成熟没有令它发现任何与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共同之处，反而证实了一种感觉：它可以独自前行。随着魁北克的商业精英首先进入北美市场，随后进入全球市场，他们将加拿大市场以及他们与加拿大英语区商业阶层的文化和政治联系看成一种历史的残留，是他们做伐木工人和抽水工人之魁北克时代的遗迹。

在蒙特利尔，我去拜访克劳德·贝兰（Claude Béland），他是不仅管理着魁北克的经济，而且象征着其在独立倾向上日益增长之自信的人之一。从德信大厦（Complexe Desjardins）40层的一个办公室里，他管理着400亿加元的投资基金，是小储户、投资者在德信储蓄、贷款和信用公司（Desjardins savings，loan and credit company）的存款累积起来的。两代人以前，像克劳德·贝兰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一个魁北克人可能为在蒙特利尔的皮尔街（Peel street）管理加拿大市场的英加银行与安全署（English Canadian banking and security houses）担任高级会计师。但魁北克人从未在一座塔楼的最顶层拥有一间带转角的办公室，拥有可以看到冰封的圣劳伦斯河的风景，指尖操控着400亿元价值的投资基金。

他说，30年前，德信的借贷和投资全部都是在加拿大市场以内。现在，他们的生意有一半在海外。魁北克在国际金融的盛宴中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

看上去，克劳德·贝兰像一个北美的银行总裁：银发，穿完美得体的深蓝色西装，用流利的英语接听从芝加哥、纽约、洛杉矶和伦敦的分支银行总经理打来的电话。然而，有其他北美重要银行的总裁的母语是法语的吗？还有其他北美银行总裁是民族主义者的吗？

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谨慎的会计师，他曾认为，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主权独立是一个风险太大的选择。现在，他已改变了想法，为什么？

“好吧，你知道，因为国家是保护一个民族的身份的唯一方式。我所定义的身份是在一个人的价值观及其行动之间的调和。换而言之，你知道你是谁，而且你想保护它……让它得到承认。”

对我而言，一个银行总裁讨论“身份”这种形而上的主题似乎有些奇怪，所以我问他，国家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予身份，还是因为它完成了经济的解放？是哪一个，钱包还是灵魂？贝兰并不想做出选择。他说，独立与两个维度都有关。我们拥有太多同一层面的政府。魁北克像是一个公司，“拥有两个财务经理、两个市场总监、两个资源副总裁”。我们都只需要一个，而且我们想要的都是魁北克人。我问他，他是否担心过魁北克在未来连通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内的位置。在加拿大英语区，对于文化和经济生存的焦虑非常普遍。但在克劳德·贝兰的圈子中不

是这样。“不，人们与我们做生意，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治，而是因为我们是好的买家，以及我们生产好的产品。”

总裁的公关代表带我出去，沿着行政套房长长的、铺着宽幅地毯的走廊走下去，我发现自己迷惑于这样一个悖论：像贝兰这样的人作为参与者加入全球经济时，对于被称为魁北克的全球一个小小的角落的民族主权，他们没有失去兴趣，而是变得更有兴趣。我曾经认为，全球参与者不会再关心民族。我错了。换句话说，存在这样一种人，他们相信大陆自由贸易和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到来强化而不是弱化了一个要求主权独立的魁北克。

加拿大英语区注视着魁北克自196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以克劳德·贝兰这样的人为代表，他们说：“如果能够在加拿大内部做到所有这些事，为什么不留下呢？”加拿大已经是世界上最离散化的联邦。而魁北克注视着自身的转变，说：“为什么我们要留下？”

---

[1] La Grande为法语，意为伟大的。

民族主义和落后的民俗学

在这儿，还有更进一步的悖论。从前，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加拿大英语区对魁北克经济的控制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指责。人们也许期望随着经济落后得到克服，经济民族主义也会退潮，并非如此——至少魁北克的例子有其指导意义。这是一个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经济追赶上来的民族，他们不再感到被蒙特利尔的盎格鲁—加拿大精英所支配。如果你问他们，他们最后一次为讲法语感到羞耻是什么时候，他们得追溯到他们的父母那个时代，或者回到他们的童年时代，那时在希尔布鲁克大街（Sherbrooke street）或者T.伊顿（T.Eaton）百货公司的丽兹·卡尔顿（Ritz Carlton）酒吧，除非你说英语，否则他们不会为你提供服务。这些记忆不是个人化的：它们是来自糟糕的旧时代的神话。当个人的记忆消融成神话，人们也许会期望民族主义感情退潮。然而，情况恰恰相反。

以赛亚·伯林曾经将民族主义比喻成一个被弯曲的树枝，如果受到抑制，一旦松开，它会以双倍的力量迅速反弹回来。魁北克的树枝已经被松开很长时间了，但它的力量还远未释放完。这意味着什么？首先那种不满不会因为身处过去就停止变成现实。集体神话不需要个人记忆或经验来维持其力量。英国人在234年前征服魁北克，在亚伯拉罕平原（Plains of Abraham）[1]上，在魁北克城，在这些曾经战斗的地方，孩子们现在玩着雪橇，魁北克嘉年华的号角声声远传，山坡上到处都是喝啤酒的人群。征服已是久远的历史。没关系。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仍将其民族主义规划称为“la reconquête de la conquête”：征服的再征服。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正是在魁北克最终克服失败的时候，魁北克

民族主义将民族的战败化成了一个神话。

这不是唯一的悖论。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坚持其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恰恰是在它失去了许多令其特殊的东西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在大跃进的前夕，魁北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毕竟，落后也是一种形式的特殊。魁北克的小城镇以及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在教育和识字率上落后于加拿大整体水平，其公共文化是威权性的；人口统计上而言，它的家庭结构在北美是独一无二的，家庭通常有10个孩子。

魁北克的寂静革命意味着克服其落后的特殊性，它做到了。它曾拥有北美最高的人口出生率，而现在，魁北克已位居人口出生率最低之列；它曾拥有北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口，而现在魁北克跻身受教育程度最高之列；它曾是北美最为虔诚的宗教社区，现在它是最不遵守教规的地区之一；它曾拥有一个威权政治文化，现在魁北克以其自由和公共辩论的开放性而自豪。

魁北克的特殊性过去像阿巴拉契亚人（Appalachians）或是美国南部的人，是一种与乡村的相对贫困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主义。现在，就像北美其他这样的地区一样，它为自己开启了一种大陆式的生活方式。星期五的晚上，魁北克人蜂拥上路，开着切诺基或温尼贝格房车（Winnebagos），戴着棒球帽，收音机调到当地的乡村或西部电台，前往乡村的小屋，对于外人，这种景象可能是在明尼苏达州或者美国任何其他的州，或者加拿大其他的省份。直到他们开口说话，原来是他们。

魁北克人关于其现代化、其融入北美社会的所有焦虑都集中在对语言的保护上。生存（La Survivance），最重要的，是语言的生存。魁北克民族主义政治的核心要求一直是魁北克成为一

个使用单一语言的国家。民族主义者迷恋语言，一种要求所有的路牌包括停车（Stop）标志都使用法语的痴迷，而如果你明白，引导路牌常常是唯一可以表明你在魁北克而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或佛蒙特州的标志，这种痴迷就可以理解了。

民族主义常常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一种对经济上受困或衰退的阶层和地区之落后的辩护，用以对抗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犹太主义等的火苗。直到60年代，魁北克的民族主义经常持这种论调。现在它不这样做了。就其自身而言，这令人惊奇。考虑到从那以后社会现代化的发生速度，人们原本预期，就现代性对魁北克社会之特殊性的作为，魁北克民族主义会感到遗憾。恰恰相反。民族主义者不断地强调他们是现代性、改革和世俗国家的肇因：攻击教堂在教育和道德生活方面的权力，促进妇女的权利和性自由，寻求在北美经济的核心给予魁北克一个安全的位置。在魁北克，身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意味着做一个进步的、现代的人，一个法兰西的北美人。

对照加拿大英语区和魁北克对美国的态度，相当令人惊奇。在大多数加拿大家庭中每晚有多达60个有线电视台实施电子轰炸的情况下，关于加拿大文化是否能够保留其特性，在加拿大英语区，几代人为此激烈争论。魁北克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威迪通（Videotron）将所有的美国肥皂剧送入魁北克的千家万户，但他们知道，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在魁北克编剧、制作的节目，它们让80%的魁北克人晚上留在家里。只要他们能看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魁北克人就相信他们的文化是安全的。

魁北克人认为他们的语言是一面看不见的盾牌，可以保护他们的文化完整性，避免北美标准的影响。法语让魁北克人对美国人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信，对此英裔加拿大人只能羡慕。然而同

样是魁北克人，在涉及他们自己的非法语少数民族时，没有展现出同样的自信。他们始终担心自己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以及不断增加的非法语移民浪潮会稀释法国人在北美的存在。他们试图控制移民政策以最大限度选择说法语的移民。他们立法限制人们送孩子上英语学校的权利。语言警察被派到东方镇那些讲双语的、安详的村子，把街头小店用微小的英语字体写的硬纸板拍下来。店主受到起诉，这令讲双语的英语母语者和法语母语者都大为愤怒。语言政治的小家子气，让魁北克人规划其生存和繁荣能力的文化自信成了空谈。

---

[1] 魁北克城西部平原，1759年英国军队在詹姆斯·沃尔夫指挥下偷越过法军防线，在亚伯拉罕平原与法军展开会战，并击溃法军，占领了魁北克城。

在两个小丑咖啡馆

一个北极之夜，在老蒙特利尔的两个小丑咖啡馆（Two Clowns Café），我和六个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碰面，谈论语言问题。就我而言，对这个碰面带有的期待，与我8岁爬上那个墓地山时的感觉一样。现在，如同当年，我要碰到“对方”。我知道这很荒谬。毕竟，我们难道不是拥有同样的护照吗？不是喝同样的啤酒——莫尔森（Molson）、拉巴特（Labatt）吗？我们的记忆难道不是充满了同样的英雄——莫里斯·理查德 [1] 、让·贝利佛 [2] ，这些50年代出自蒙特利尔的不朽的加拿大人吗？然而我们的政治设想是如此的不同，好像我们是在不同的国家。

在两个小丑咖啡馆里的这个群体中，有跟我一样年纪的妮可，她是魁北克教师工会（CEQ）的组织者。她的工会是独立派，她也是。妮可和我发现，我们有共同的体育英雄、共同的文学英雄（巴黎派作家），并且同样喜爱雪后寒冷明亮的冬日早晨。我们也分享共同的记忆：1970年的“十月危机”。对于我，那是加拿大政府打破魁北克激进民族主义之后盾的时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 [3] 下令逮捕了500多名魁北克知识分子和武装分子，随之而来的是一名魁北克政治家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遭到绑架并被谋杀。对于妮可，在那个时刻，她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自称为加拿大人。因为她是被捕者中的一员，未经审判被捕，然后突然又被释放。“为什么？”她捻灭香烟愤怒地说，“不是因为我在地下室制造炸弹。我没有。而是因为我拥有某些朋友。”这是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的一个时刻，一个相互的良好意愿和对同样事物的喜好无法克服的时刻。对于我，特鲁多仍然是那个我要用全部生命去信仰的联邦主义理想的最优秀代表。

对于妮可，他是个叛徒，是会毫不犹豫地粉碎他自己人民的民族主义的本地之子。

妮可用她直率的说服力和刺耳的笑声主导着谈话进程，此外还有几个年轻的研究生，他们刚刚取得法律和人类学博士学位，还有一个说话柔和的年轻金发女子，她是魁北克最古老的温和派民族主义社团让·巴蒂斯特（the SociétéJean Baptiste）的主席，他们和其他团体一起组织6月28日魁北克“国庆日”那天横贯蒙特利尔的大游行。

这是一场典型的蒙特利尔式的谈话，以惊人的速度在英语和法语之间切换。我问，如果他们所有的人都能说流利的双语，为什么魁北克必须是单一语言的？让·巴蒂斯特社团的主席说，因为“在北美我们有600万人，而你们有2.5亿人”。

而且，一个年轻的人类学女学生说：“移民们来到这里，他们全都想学英语，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将失去蒙特利尔。”

“失去蒙特利尔？”

“是的！失去蒙特利尔。在一个法语国家中会形成一个说英语的孤岛，那是不可容忍的。”

“不可容忍。”他们都说。

“你们都担心生存。但感谢上帝，你们已经生存下来了。为什么你们还这么担心呢？”

来自让·巴蒂斯特社团的女子说：“是的，我们已经生存下来了，但是看看代价。我们本来到现在可以有1200万人，但有一

半人都去了美国。”

“你想阻止他们吗？”

“当然不是。但关键是，我们被一种外部文明包围着，我们必须保护自己。”

我还是无法理解。语言完全得到保障，标识法禁止英语的公共使用。在加拿大所有的省份中，唯有魁北克对移民事务享有充分司法权，它获得了征募法语移民的权利。公立英语学校的董事会不允许接受父母说法语的学生（而私立英语学校里满是魁北克人的孩子，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双语教育）。

一个人说：“那个，其他地方允许公共资金资助的学校系统采用与主要民族语言不同的语言吗？”

“很好，”我回复道，“我不是说魁北克人不宽容。你们不是这样。我是在问，为什么你们感到如此不安全。为什么你们相信你们的语言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来保护它？”

“我们并不是不安全，”妮可恼怒地说，“我们只是想要待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是的，坦白说，我们厌倦了在加拿大做少数民族。我们想要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做多数派。”

“哇喔，”我叫道，“这听上去太糟了。多数人的暴政吗？”

“那不是多数人的暴政，只是民主。”一个戴眼镜的法律学生说。

“就算你们正确，”我说，“假定你们需要一个国家保护你的语言。你能肯定它可行吗？”

“当然，我们是魁北克有限公司。”

“但如果你们错了，会怎么样呢？你们不用支付代价——你们都有学位。你知道谁会买单吗？三河城的纸浆工人。他们是为一个错误的民族主义实验买单的人。”

“多么邪恶的论点！”妮可大叫起来，带着夸张的愤怒，“道歉！道歉！”她笑着，但半带认真。

“回答问题。”

“亲爱的，我为工会工作。不要告诉我工人们会怎么样，再也不要离间我们，他们和我们一样想要独立。”

谈话就这样继续，空了的啤酒瓶堆在桌子上，酒吧变得越来越吵闹。这个群体的部分成员一语不发，似乎隐瞒着什么，令压力在他们的内心积聚。在酒吧乐队唱歌声音的间隙，一个年轻的人类学女学生非常平静地对我说：“看，我们只是想要一个他们像对成年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地方。我们只是想要像成年人那样被对待，而不是像孩子那样。”她险些落泪，在随后的沉默中，这让我明白，在她对这个我们要共享的共同体的想象中，她将它看作一个家庭，我和我说英语的同类是从不聆听的父母，而她的魁北克是那渴望在这个世界上获取作为成年人的一席之地的年轻女子。

对这样一个深沉的神话，你能说什么呢？它是一种情感，而众所周知，我们无法与情感争辩。但它们可能大量产生误解，就

像我童年时代相信，墓地悬崖顶上藏着法国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会偷走我们的自行车。

在两个小丑的时间已经很晚，该走了。在外面北冰洋凛冽的空气中，我裹紧冬衣，整晚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年轻人走过来，平静地轻声说："奇怪我们还那么大声地讨论，不是吗？似乎我们魁北克人还在努力证明自己什么。"

---

[1] 莫里斯·理查德（Maurice Richard，1921—2000），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

[2] 让·贝利佛（Jean Béliveau，1931—2014），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

[3] 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1919—2000），加拿大第15任总理，执政生涯长达16年，出身于蒙特利尔法裔家庭，但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对魁北克独立。1970年"十月危机"期间以强硬政策应对魁北克恐怖主义。

两次谈话

丽兹·比索内蒂（Lise　Bissonnette）与我同年，她泼辣而有条理，是一名报纸编辑、专栏作家，一个对魁北克主权独立复杂而微妙的支持者。我和她的谈话是在她所在报纸《义务报》（Le devoir）的新办公室。这份报纸是由爱德华国王时代魁北克伟大的民族主义英雄亨利·波拉萨 [1] 创办。

不，她说，她不想被称为民族主义者。“狭义的民族，你知道，民族这个词的种族含义，”她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对我而言是不相干的。”很奇怪，在任何地方，被外界视为民族主义者的人们几乎没人从内心认可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她说，这个词意味着把你自己封闭起来，而对于她，魁北克的文化应当向世界开放。

我问她，在魁北克的语境中，做一个民族主义者是否必然意味着对一个独立的魁北克国家主权的承诺。从魁北克民族主义在加拿大内部的大部分历史来看，它一直想从加拿大得到更多，而不是离开加拿大。所以我告诉她那个古老的笑话：“魁北克想要的是在一个统一的加拿大之内的独立的魁北克”，问她是否还是这样。“当然，”她说，“为什么不呢？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人们两者都想要。独立存在风险，所以魁北克人可能不爱加拿大，但他们喜欢加拿大，他们想保持联系，作为某种安慰。”她说，即使魁北克人给特鲁多投票，也不是说他们必定投票选择联邦主义和加拿大。他们是为他们自己人投票，“他们在玩部族政治”。特鲁多本人听到这话一定会很惊讶。他将魁北克民族主义视为当地精英玩的一种语言游戏，为的是从渥太华攫取最大利益，确保他们对地方政治的控制。他坚持认为，普通投票者看穿

了这个游戏，他们投票给他的时候，是在投票给加拿大。

但是，我坚持问，如果你们在如此多的领域已经拥有专属司法权，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国家？那不是真的，她表示反对，加拿大的联邦主义“正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集中化。联邦政府正在进入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加拿大英语区可不是这样认为的。政府拒绝了将联邦体制进一步分散的建议，是考虑到进一步的地方自治将让国家自身难以存在下去。再一次，什么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已不在讨论之列。关键是，我们对同一个共同体的想象根本就没有交会。

我问她，对于两个民族在一个国家中共同生活的联邦主义理念，为什么魁北克人投以如此之少的热情？她向前俯身在桌上，轻快、不屑地说：“首先，英裔加拿大人提出那种理念的时间很短。在60年代你不大能听到这种观点，那时人们还在努力反对法语可以在这个国家成为官方语言的简单思想。在我看来，双民族国家之梦是多伦多的文化体制对待这个国家的方式，它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但是，我坚持说，在一个被种族民族主义撕裂的世界中，让种族群体和平共存的联邦主义就无处言说了吗？她不想让步。那是一种英裔加拿大人的理念，她彬彬有礼但是态度坚决地说。加拿大已经失败，它说自己是双语、双文化的国家，但是去哈利法克斯或温哥华看看，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唯一接近这种理念的地方是蒙特利尔。她似乎在说，魁北克证明自己在多种族、多文化理念方面比加拿大自身做得更好。

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看到魁北克在联合国拥有自己的大使馆和自己的席位。但她确实相信，魁北克历史的所有动力都在引导

它从加拿大分离。

阿兰·迪比克（Alain Dubuc）是蒙特利尔最大的法语日报《新闻报》（*La Presse*）的主编。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非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换言之，一个觉得自己的民族是魁北克，但国家仍然是加拿大的人。听着，他说：“我真的不关心加拿大，我没有很多精力倾注给这个国家。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向魁北克。”

但如果你对加拿大的感情如此淡薄，我问，为什么你还想留在联邦里面？“因为，”他带着迷人的微笑说，“我们被绑在一起。我们是两个一起长大的有机体，产生了一些联系，这些联系很强。”自此以后，分离是沉重的、昂贵的、有风险的。

如果是这样——分离无疑将是昂贵的、创伤性的——为什么一些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仍然坚持要分离？你得记住，他说，我们的父母们真的遭受过苦难，“他们不是南非黑人，但他们贫穷，而且在魁北克他们拥有的生活机会没有说英语的人多。他们不得不向英语屈服。他们被迫在不想说英语的时候说英语。我们仍然拥有身为‘porteurs d’eau’[2]——伐木工人和抽水工人——的形象。它是我们民间传说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民族主义也是传说的一部分”。

但是，我认为那将意味着民族主义的议程只是抹去旧的记录。如果它只是解决旧问题，它与今日的魁北克有何相关呢？迪比克微笑着耸耸肩：“当然不是。我们如何适应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如何与成千上万从不同的文化来到这里的人们打交道？在一个独立的魁北克，这些问题仍是相同的。”

那么，在此意义上，魁北克分离主义的议程是无关的吗？迪比克点头说：“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拥有一个19世纪的国家观念，即拥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面国旗、一个联合国席位，诸如此类的东西。国家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工具，如果你分离出去，并不必然说你将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拥有你自己的边境、边界、旗帜……”他轻蔑地挥了挥手，“那是在做梦。”

然而，如果情况是这样，为什么双语言、双民族的加拿大的理念从未在魁北克流行呢？迪比克微笑着说：“讽刺之处在于，加拿大唯一接近这个理念的地方，唯一你能找到说法语和说英语的人一起工作的地方，是蒙特利尔。”

我说，那么“魁北克是加拿大之梦——我的加拿大之梦——唯一真的在付诸实施的地方”。

“正是如此。”他带着讽刺的微笑说。

如果这两次谈话对于蒙特利尔的作家、记者和编辑们讨论的问题有任何指导的话，显然在魁北克不存在对联邦主义有激情的、令人信服的辩护。特鲁多和他那一代魁北克劳工领袖、作家和公务员曾为一个以加拿大为家的魁北克而奋斗，但似乎他们用双民族、双语言的国家理念说服的唯一民族是英裔加拿大人。而这种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的转变来得太晚了。因为到这个时候，魁北克舆论的浪潮已经无可挽回地偏离。我和这两个新闻记者的谈话似乎表明，特鲁多的一代在魁北克后继无人。

这并不意味着在魁北克没人捍卫加拿大。民意调查表明似乎有一种三派的分裂：选民的三分之一稳定地反对任何主权的变

化，三分之一同意，还有三分之一有被任何一方说服的可能。但看上去很显然，如果加拿大拥有自己的捍卫者，他们是像迪比克这样清醒、非情绪化的反讽者，认为主权是一个过时的19世纪抽象概念，与现代的全球经济毫不相干。在其反面，是像丽兹·比索内蒂这样的人物，他们认为维系加拿大的努力是在无效地分散魁北克精英的注意力。应当将目光完全转向魁北克文化和经济的建设事业。因此，魁北克精英内部的基本争论是在民族主义观点的框架内设定的，例如在那些相信一个民族必须拥有国家的人和那些相信民族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获得想要的一切的人们之间。

英裔加拿大人仍旧苦恼和迷惑地在问，要求分离的加拿大法语区的不满到底是什么？但那也许是个错误的问题。魁北克的民族主义很久以前就不再是仇恨的民族主义。过去的记录已经被抹去。现在它是一种自我认同的话语。基本的驱动力不再是过去不公待遇的传说记忆，起作用的驱动力是一种对权力和成就的感觉。它是一种对加拿大英语区敌意越来越少的民族主义，这只是因为对于绝大多数魁北克人，随着盎格鲁—加拿大人对经济的控制逐渐减弱，加拿大英语区整体上变得越来越与自己无关。正如阿兰·迪比克所言："我喜欢拜访那儿，但它仍然是外国。"

几乎可以说，只要还在围绕双方关系打造仇恨的话语，魁北克就会与加拿大绑在一起。联邦主义像某些既一致而又矛盾的婚姻，双方各自都对另一方不满，这是一致的。现在这些不满在消退，他们越来越没有理由"同床共枕"。

魁北克不再根据加拿大来界定自己。魁北克内部政治辩论的双方都想当然地认为，LG-2这样的地方已经给予魁北克经济的独立和内在的信心——一个民族需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换句话

说，争论的双方都觉得，他们脚下那些魁北克涡轮机的电力既是现实的又是标志性的。留下的唯一问题是他们有无必要在发电站上空升起一面主权国家的旗帜。

---

[1] 亨利·波拉萨（Henri Bourassa，1868—1952），法裔加拿大政治领袖，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思想之父。

[2] 原文为法语。

部落和民族

自决权和民族体话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它会传染蔓延。魁北克发现了一个也将自己称为民族的人群。

离通往LG-2的大红门大约65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捕猎人的小屋，它位于一片巨大、平坦、白雪皑皑的松树森林中。炉子里生着火，我正在准备雪地装备，要和比利出去一天。

比利是一位克里族猎人，这些冰冻森林是他的王国。我们身处克里族领地之中，这是一片广阔的区域，拥有森林、河流、沼泽和湖泊，面积大体上与德国相当。比利的族人现在大约有11000人，5000年来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狩猎、捕鱼。跟许多土著民族一样，他们已经接受了欧洲人的词汇“民族”，用来描述他们自己，尽管这个词不是他们的本土语言，但看上去他们肯定是一个“民族”。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口头传说，一种以小木屋和设陷阱的路线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一种了解其环境的知识，详细到可以被称为科学。

比利将他的卡宾枪甩到背后，启动了雪地摩托，示意我进入他拉在后面的血迹斑斑的雪橇。然后我们出发了，在森林小路上飞驰，冷杉树枝拍打着我的护目镜，鹅毛般的雪在身后飞舞。比利时不时停下来检查驯鹿在雪地里的痕迹，而我跺着脚、摩擦自己的脸来抵抗严寒。

突然，驯鹿闯入我前方的视野，一对巨大的雄性驯鹿，体形跟马差不多，拥有蓬松、奶油色的皮毛，耳朵警惕地支棱着。它们靠得够近，比利可以一枪命中。但他反而停了下来，我们看着

它们在齐腰深的雪里跃起跳下，努力营造一个覆盖树木的安全处所。几分钟后，它们消失了，森林恢复了平静。

比利担忧驯鹿正在抛弃他的国家。他的陷阱也是空的，鱼钩不像从前那样带来鱼。他的村子移到了更高的地面，设陷阱的路线被输电线路和防火墙分成两半。在新的水库里，水银含量正在毒害鱼类。他的土地就在眼前改变。他的不幸，以及他的微型民族的不幸，在于他们正位于LG项目的路径上。魁北克水电（Hydro-Quebec）在比利的河流上修建了大坝，形成一个巨大的水库，淹没了他狩猎的土地。河流不再是他的，它属于从南方来的白人。

"属于"这个词以及与其相伴的财产的概念，对于克里族是陌生的，正如"民族"这个词一样。民族主义可能是西方关于自然的浪漫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在西方传统中，爱国主义与财产有关，隐含着对自然无止境的占有。而对于克里族，这是一个陌生、无礼的概念。比利不认为他拥有土地，他相信自己是土地的一部分，是众多依靠土地生存的生灵中的一员，他不仅依土地而活，且依它看到整个世界。在蒙特利尔以北1600公里的这儿，从比利的寒冷蓝天之下来看，西方民族主义不是一曲土地的狂想曲，而是一支占有与掠夺之歌。民族主义颂扬民族的土地，最好是征服它以用于人类目的。比利的要求则是做它的管家和仆人。

因为土地被拿走，克里族获得了大量从天而降的金钱作为补偿，有数以百万计的加元。现在他们拥有作为家的拖车，有四驱汽车、雪地摩托，每年还从政府那里得到有保障的收入。他们的村子拥有一个新的社区中心，有一个超市，在那里他们可以购买新鲜的苹果和西红柿。有一个新的冰球场，孩子们晚上可以去玩。但没有人忘记所失去的东西，即使是在冰上滑行的孩子们也

穿着印有“奇萨西比[1]的前猎人”的冰球衫。

詹姆斯湾（James Bay）项目是可能独立的魁北克的动力站。魁北克说这个项目是现代化，是发展和进步。比利说它是一种侵略。两个民族的权利产生了冲突。一个是庞然大物，拥有数十亿元的资源去付诸实施；另一个非常弱小，它这一方所拥有的全部只是一个理由：如果你为自己要求自决，怎么能够拒绝我们的自决？对于比利和克里族，大坝、电站、电力线路、水库也是一种标志，是对他们的掠夺的标志。克里族正在反击，像全世界的土著居民一样，他们诉诸自己的民族性和自决权的话语。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精明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让魁北克人作茧自缚的言辞。在提交给纽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文件中，克里族大酋长马修·恭·甘（Matthew Coon Come）说出了他的民族的宣言：

自决是一种属于各民族的权利。它不属于国家。它是所有民族的权利。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你要么拥有它，要么不拥有它。它不是一种可以由其他人授予民族的权利。请明白，你们也许会为实践这种权利而战斗，但不会为自决的权利而谈判，因为它已经是你所拥有的。

这种话语惊醒了魁北克，自决看上去意味着与自我治理有某种不同。魁北克很快承认了后者，但否定了前者。最近，魁北克土著事务部长说：“土著人自我治理的唯一限制是保持魁北克领土的完整性。”他还说：“在此意义上，在允许建立种族聚居区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在这些聚居区，魁北克的法律不再是优先考虑。”

克里人相信自决与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性是相容

的。自决不必是绝对的，它并不意味着正式的国家地位、国旗、联合国席位。无论如何，克里人很快指出，这些都是白人的发明。自决意味着终结对政府救济的长久依赖，意味着不再是对其土地破坏消极的旁观者。它不仅意味着在水电设施开发土地上进行狩猎和捕鱼的专属权利，不仅意味着在通往主要村庄的道路上设置检查站、限制酒类输入的权利，不仅意味着市政的自我治理。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停止进一步的水电开发。魁北克政府关注着拉格兰德河以北的大鲸河（Great Whale River）系统，以及拉格兰德河以南的诺特韦（Nottaway）河、布罗德贝克（Broadback）河和鲁珀特（Rupert）河系统。如果两者都完成，整个克里族领地——它的河流、森林和营地——都将从头到脚被绑住，陷入由电力线路、道路、大坝和电站组成的严密的网络中。克里族将成为他们自己故土的幸存者。

而这些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地区开发的成本是个天文数字：120亿—150亿加元。每个消费者的电力账单中，已经有40%的部分用于支付魁北克水电现有项目的负债。魁北克说廉价的电力是它在北美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它的电力费率在北美处于最低行列。但它们之所以便宜，只是因为北部开发项目的债务负担被剔除在计算等式之外。如果新的项目继续进行，债务负担将会恶化，而如果节能措施引起需求下降，债务负担将变成一场灾难。换言之，民族开发已经达到了一个承受极限，不仅是对克里人的环境而言，而且是对魁北克民族的承受能力而言。魁北克电力的未来需求是不确定的。美国东北部各州并没有等着与魁北克签署新的电力协议。在多个案例中，克里人能够劝说美国监管当局取消此类交易。

如果魁北克说，够了，适可而止吧，在魁北克北部的民族主

义之间的冲突有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克里人的民族自决并不意味着国家地位：它意味着文化和经济的生存，进而意味着在一个经济大发展的空隙中，得以保留一种狩猎、设陷阱和捕鱼的经济。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展示了巨大的灵活性：枪、雪地摩托、民用电台全都毫不费劲地被吸收、纳入克里族猎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但他们需要时间来调整，他们需要确保不会发生进一步的侵蚀。对于进一步的建设，不存在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论据。

如果魁北克真的继续在大鲸河开发，破坏克里族领地，它之所以这样做，将是因为民族自尊的话语压倒了经济上的良好意愿。民族主义在涉及经济问题时的弊病，是它所投资项目的象征意义之重要性使得政府无视现实。如果詹姆斯湾项目是埃及纳赛尔的阿斯旺大坝、独立后加纳克瓦米·恩克鲁玛的水电和铝冶炼厂，其传递的信息是种警示。在后面这两个例子中，民族独立的宣言让他们的社会濒临破产边缘。民族主义的狂妄是否会令魁北克过高估计自己，仍有待观察。魁北克既不是加纳，也不是埃及，它是一个先进的发达社会，但风险仍然存在。当经济发展披上民族自尊之需要的外衣时，惩罚已等在后面。

---

[1] 奇萨西比（Chisasibi），克里族村庄，位于詹姆斯湾以东，距拉格兰德河河口约10公里。

权利和生存

克里人和魁北克人都基于文化生存而提出他们的民族自决要求。这种生存和自决之间的联系在每个地方都是民族主义诉求的中心，但它值得怀疑和审视。

克里人作为个体的生存没有问题：他们的出生率、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在增长。考虑到这些事实，他们当然能够作为把自己当作克里人的个体生存下去。他们是否能作为一个民族——清晰的、拥有根植于土地的生活方式的民族——生存下去，却不那么确定。你可能认为应当由下一代——那些穿前猎人的运动衫在冰面上滑行的少年——来决定是否仍然保留狩猎和捕鱼经济、延续他们的文化。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是讨论生存本身，而是讨论选择何种生存方式的权利。旧有的生活方式必须得到保留，未来后代的选择自由才能得到保留。

为了保留这种选择，加拿大联邦政府开始将地方政府、警察和司法部门转交给原住民族。在北部的许多原住民社区，司法部门已经由原住民长者和南部来的地方法官共同管理。加拿大法律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但这些社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这是在加拿大南部比如意大利人或华人未能享有的。

因此，满足文化生存的要求，意味着加拿大原住民可能将享有比其他人群更多的自治权利。考虑到这些权利并不侵犯其他加拿大人的权利，也不会达到从加拿大国家分离的程度——他们不会分离，联邦主义从而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容许个体享有权利的某种不对称。

但联邦主义是否可以包容一种情况，即符合一个民族之人民的族群权利貌似侵犯了那些不属于这个民族的群体的权利？至少对于英裔加拿大人，这是魁北克语言管制法所代表的一种道德挑战，该法限制在指示牌上使用英语，并且限制获得英语教育的途径。

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确立法语的地位是魁北克人身份得以保存的前提。他们居住在一个有3亿人说英语的大陆上，他们的自然生育率正在降低，每天都有移民到来，这些人的第一语言不是法语，而他们学习新语言的第一偏好是英语。

这就是政治共同体已经完成的魁北克人和英裔观点之间的对峙僵局。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简单地否认基本自由受到标识法的限制，而说英语的社区简单地否认魁北克人的文化生存处于危机之中。

同样的僵局可以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观察到。例如，在拉脱维亚共和国，俄罗斯族在首都里加（Riga）占据多数，这个事实被用来为一部新的公民法提供正当理由，该法将说拉脱维亚语的能力列为拉脱维亚公民身份的条件。出生和成长于拉脱维亚的俄罗斯族在新的共和国失去了公民身份，除非他们会说基本的拉脱维亚语。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失去了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高兴就可以说自己语言的权利，而这是为了多数派种族的文化生存。

这些不只是关于权利的争论，它们也是关于国家的真正目的的争论。自由派倾向于认为，国家不应带有目的：任何希望加强某种集体目标的国家必然践踏反对那个目标的个体的权利。由此看来，双语主义的联邦政策是一种经典的自由中立主义案例：保护两个语言群体的权利，同时不给任何一方特权。然而，对于魁

北克民族主义者，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存处于危急之时，国家不能采取中立。在现代各民族的现实世界中，英语——作为全球的商业语言——将会把其他语言扫到一边。

许多加拿大自由主义者——以皮埃尔·特鲁多为首——认为，当一个国家保护集体权利时，不管他们是魁北克人还是原住民，结果不可避免地会损害个体权利。根据这个观点，民族主义的基本罪恶是它一定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多数人暴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特鲁多警告说，魁北克可能是一个打造种族国家的范例。只要它留在加拿大内部，其语言政策可以受到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参考最高法院和加拿大《人权宪章》予以否决。如果魁北克取得主权独立，个人会失去这种申诉权利，通往多数种族暴政的道路可能会被打开。

毫无疑问，魁北克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是基于所考虑的绝大多数魁北克人在自己的社会中是一个多数种族，而不是基于在联邦制的加拿大内是永远的、也许强有力的少数种族。但大多数魁北克人坚持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是种族的而是基于平等公民身份的自由民族主义。我一直被问道，难道还有其他社会会资助与多数种族使用的语言不同的公立学校吗？还有其他社会拥有这样全套的、在魁北克《人权宪章》中所赋予的人权保护吗？

他们还补充说，还有其他民族，并不采取措施保护和发展自己文化多数派的语言吗？所有的民族都宣布何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所有的民族都使用其多数人的语言管理学校体系。纯粹程序化国家的自由主义理念，那种对在国家的公立学校中教授何种语言和价值保持中立的理念，是一种空想。按照这个观点，为保护其文化遗产，魁北克只需像任何民族国家那样行事。当然，不管站在哪一点上，英裔加拿大人都会痛苦地叫喊：“但你们不是一

个民族国家！”

谁属于这个民族？

这是个寒冷的2月早晨，阿耶尔岩（Ayer’s Cliff）是魁北克南部距美国佛蒙特州边界大约半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农业社区。麦金农农场的田野一片白茫茫的荒芜，风吹起雪花，吹打着畜棚的门。门里面，20多岁的安格斯·麦金农（Angus McKinnon）和彼得·麦金农（Peter McKinnon）兄弟俩正在给100多头牛挤奶，而他们的父亲丹尼斯在一旁看着，絮叨着过往。过去这附近有很多英国人的家庭，他说。他回想着他们的名字：巴克莱家、托德家、布坎南家。但现在大多数的邻居都是法国人。农民协会过去开会时使用英语，阿耶尔岩镇议会以前也使用英语，但那是从前的日子，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丹尼斯·麦金农是那些能嗅出风向的农民之一，他把两个男孩子送去上法语小学。尽管他们以英语完成了高中的学业并在麦吉尔大学完成农业学课程，但他的儿子们仍然能说双语。安格斯说：“你必须得这样，这里所有的生意都是用法语完成。”

就是这样：在镇议会，在魁北克农民协会的会议上，在种子商店，在机器销售商那里，安格斯说法语。那绝对不是只会一个停止手势的双语能力。安格斯是货真价实的：一个能说流利英语的魁北克人。两代人以前，在这个崎岖乡村地带的农民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人。

这两个社区是热忱的，他们在镇议会里、在农民组织中一起工作，但他们保持着各自的社交。安格斯·麦金农的母亲在谢尔布鲁克（Sherbrooke）的交响乐团演奏小提琴。她原本来自贝尔法斯特，但她的法语很好，很好地融入了这个说法语的乐团中。

但其他乐团成员从未邀请过她去家中做客。当安格斯在星期五的晚上开卡车想出去跳舞时，他要开很远的路，去和说英语的农民跳舞。

自从第一届独立派政府1976年当选以来，有10万名说英语的人离开了魁北克。但安格斯不准备前往安大略，只为一个原因：魁北克的农业在加拿大的所有省份中得到的补贴是最好的，管理也是最好的，当然更比国界以南的地方优越得多，那些地方几乎没有价格维持措施，生产商必须以大量生产和微薄利润求得生存。另外，留下来还有文化的原因。麦金农家和其他类似的家族在这些崎岖的山谷里已待了185年。他们从新英格兰过来，因为他们不想成为新的共和国的一员，因为他们想保持对英国和英国王权体制的忠诚，也因为在这些地方有优质的土地。

魁北克的学校教科书中从未讲述过他们的故事。在魁北克的历史中，说英语的人物都是以殖民地精英的身份出现，他们居住在蒙特利尔的韦斯特蒙，经营铁路、百货商场和皮尔街上的大生意。故事里没有给东方镇的小农民多少空间，他们不符合主导阶层的形象。

麦金农家族不是易怒的人。首先，他们做得太好了。此外，他们想不起受到过任何明显的侮辱。魁北克的俚语把盎格鲁人称为têtecarrée——木头脑袋，但是他们在酒吧、弹子房里消磨的所有时间中，他们与周围的法裔农民一起打台球的时候，从不记得有听到过这个词。

但仍然有其他的事情带来伤害。他们觉得自己和法裔一样是魁北克的一部分，但历史教科书、政治、语言法规全都在传递他们并不真正属于魁北克的信息。

“去年夏天他们派了语言警察到这里来。”安格斯告诉我，我们正在他农庄附近科蒂库克（Coaticook）的一家希腊烧烤吃午餐。独立派政党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PQ）雇用了一些大学生围着镇子四处拍摄只写有英语的标示牌。后来他们回到魁北克城，报告说商人们破坏语言法规。

安格斯一边向穿过屋子来吃午餐的一对法裔夫妇挥手致意，一边说，有趣的是，“这里的每个人都气疯了，不只是英裔。每个人都想：我们在这里是一个社区，外人来这里干什么？想离间我们吗？”他啜了一口咖啡：“我跟你说，要是我们抓住那些学生，我们会把他们撵出镇子。”

并不是安格斯·麦金农的权利被学生们溜进镇子、给标示牌拍照片的鬼祟行径侵犯了。用权利的言辞不能真正地描述问题。问题在于认同。说英语的魁北克人是被多数人承认属于魁北克社会，还是不被承认？

魁北克的少数派种族不只有本土生的说英语的人，也有移民社区，他们都被“纯法裔魁北克人”[1] 或“旧魁北克人”[2] 这样的词大大地激怒，一些人用它们区分那些原来说法语居民的后代和那些稍晚到来的英国人、爱尔兰人或其他人的后代。无论何种情况，这种区分都是欺骗性的。例如，有热忱的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叫作奥布莱恩（O’Brien）或奥尼尔（O’Neil）[3] 。几百年来魁北克的法裔、英裔和土著之间的异族通婚，让那种认为某些魁北克人与其他人相比是更为纯正的法兰西人的想法成为笑谈。一些热忱的民族主义者承认这种区别是虚幻的。我和圣让·巴蒂斯特社团的主席交谈的时候，她承认，当她按照母亲一方称自己是“旧魁北克人”时，她的父亲事实上却是西班牙人。

在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者认为各民族拥有独立的、“纯粹”的种族身份的神话，遭遇到了普通人跨种族繁衍之欲望的顽强反抗。面对种族纯粹的神话和种族融合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者不得不选择如何界定民族成员的资格。魁北克民族是包括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是只有那些生来讲法语的人呢？

所有的民族主义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克罗地亚是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还是所有那些——可能包括塞尔维亚人——选择把克罗地亚作为家园的人们的民族？德意志是德意志人的民族，还是包括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等选择德国作为他们的家园的人的民族？

魁北克民族主义领袖近期的宣言引起了猜疑：他们对民族的定义是种族性的。魁北克人党领袖雅克·帕里佐（Jacques Parizeau）说，有或没有少数民族人口的合作，魁北克的独立都能成功。这可能是一种对事实的说明，但似乎暗含对少数民族意见和权利的一点漠视。

不过，总而言之，现代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在努力将他们的民族概念与带来南斯拉夫灾难的种族理念分开。因此，在其要求主权的争论中，魁北克的一个教师工会CEQ（Centrale d’Education du Québec）拒绝了魁北克是“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国家”的理念。他们提出，魁北克国家应当是每一个选择在这里居住的人的民族国家，“不管他们的种族起源如何”。他们坚持，一个民族国家不必是一个种族国家。

即使它真的成为一个种族国家，安格斯·麦金农沉吟着说，我们也绝不会走南斯拉夫的路。为什么？“因为有通向安大略的

高速公路，”安格斯笑着说，“我们总是可以取道这条公路离开。南斯拉夫的穷人无法离开，不过我们可以。但我不想离开，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

[1] 原文为法语，Québécois pur laine，字面意思为纯羊毛魁北克人，指祖先是纯粹的法兰西定居者的魁北克人。

[2] 原文为法语，Québécois de souche，字面意思为旧库存的魁北克人，指祖先可以追溯到新法兰西政权时期的魁北克人。

[3] 奥布莱恩、奥尼尔均为爱尔兰后裔姓氏。

加拿大的冰球之夜

丹尼斯·卢梭（Dennis　Rousseau）不到30岁，为三河城的一家造纸厂瓦亚加马克（Wayagamack）工作，工厂位于圣劳伦斯河的北岸。他的妻子是名记账员，在镇上工作。他们和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居住在一栋两居室的小屋里，那是在一条郊区的街道上，到造纸厂只需要走几分钟的路。现在外面是零下15度，雪花在路灯映照下飘落。丹尼斯家的前院有一个巨大的用雪堆出来的城堡，街上的孩子有一半在用雪球攻击城堡，另一半在守卫城堡。夜空中，雪球从我周围嗖嗖飞过，在雪堡上炸开，飞溅在丹尼斯的门前。他把我拉进去，笑着关上门。

丹尼斯穿一件冰球衫和一条牛仔裤，稀疏的金发垂到肩头。他的魁北克法语说得很快，口音非常重，有时重到以我的法语都难以理解。他道歉说自己不讲英语，然后指着3岁的女儿——她正推着一个大大的塑料火车头穿过起居室——说道："她准备去接受英语的洗礼。"他们在三河市第一年就开始了英语洗礼课程。"我们不想被隔绝。"他说。

我在寻找能够从工人的角度告诉我一些关于独立之经济状况的人，蒙特利尔的工会组织者给了我丹尼斯的名字。另外，三河城是魁北克的心脏地带，一个单一语言的城镇，过去曾是制浆和造纸业之都。这个地区曾经有过12家造纸厂，每天24小时运转，为整个大陆的电话簿和报纸生产纸张，但盛况不再。由于经济衰退，需求下降了，而且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可以用更少的成本生产纸张。只有6家造纸厂剩下，而丹尼斯的工厂里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

“在我的工厂里，有很多人被解雇了，超过200人。在贝尔格、克鲁格，情况一样，最糟糕的是PFCP，它过去曾经有1000名工人，现在倒闭了。三河城的失业率是17%，太糟糕了。我随时可能失去工作。当我去溜冰场和那些小伙子玩冰球时，永远不知道谁会在那儿。”

我曾经认为，现在不是进行民族主义试验的时候，但丹尼斯不那么看：“政府应当做点什么。我们需要就业政策，但魁北克没有这个权力，就业是联邦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把手放在撬棍上。”

丹尼斯不是魁北克党人的好斗分子，但他代表一种现象：他代表魁北克民族主义的信条从蒙特利尔知识分子的咖啡馆扩展到工业核心地带。三年的衰退已经吊诡地将他转变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们拥有商人，我们拥有技能，我们可以让这个地方工作起来，我确定。”他认为，加拿大政府只关心加拿大英语区。

为什么？我说你们不是与安大略的工人们取得了共识吗？他们像你们一样处于艰难时刻。丹尼斯不置可否：“安大略不能给我们需要的权力，他们说我们已经拥有太多了。”

丹尼斯是一个乐观、直率的人，面对陌生人有些羞怯，但拥有的信念不管我如何争辩也无法改变。我告诉他加拿大政府一直在投入资金对抗魁北克的失业，但他对此无动于衷。一个独立的魁北克要维持一个破败陈旧的造纸厂运转，可能也会碰到同样多的困扰，但这没关系。他知道他所知道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魁北克不可能比渥太华更能令他的生活变得糟糕。

我不禁想，对于丹尼斯，民族主义可能只是一趟逃离恶劣经

济现实的欢迎航班。一个现实情况是，他的造纸厂过去由魁北克公司所有。他们未能投入必需的资金，把它出售给美国人。美国人现在投资进来，但可能太晚了，无法与他们自己在南方的低成本工厂竞争。换言之，在大陆性的市场中，面临竞争的经济，魁北克所有权或者魁北克独立主权能够做什么？

不过，再一次，如果他按我的方式思考，他会放弃。民族主义给他希望，在三河城，你需要所有能够获得的希望。当然，吊诡的是，那是一种如此带有加拿大风格的希望。我们加拿大人相信政府。社会民主干预主义深入我的骨髓，也同样深入丹尼斯的骨髓。悲哀的是，这种共同的信仰正在引导我们走向不同的国家。

尽管丹尼斯给人感觉很强势，但他所说的东西很少或者说没有冒犯英裔加拿大人。他曾经去过尼亚加拉瀑布，尽管在让自己被人理解时曾碰到过麻烦，但他喜欢“下那儿”。丹尼斯去过我的家乡多伦多吗？他摇了摇头，咧嘴笑了。在假日里，他和妻子宁愿南下，去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的东海岸，或者更南到佛罗里达州，在那些地方，冬天有很多魁北克人，人数很多，以至于他们发行了一份只面向他们自己的报纸。这是在整个访问魁北克过程中我观察到的模式的一部分。当你问人们富余时间他们会去哪里的时候，他们都说美国，从不说加拿大。

喝了几杯啤酒之后，丹尼斯要下到赛场，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打冰球比赛。冰球场是我在加拿大的童年时代去过的那些地方之一，一个巨大、阴郁的拱形场所，刺骨的寒冷，中央有一个微微闪光的白色冰菱，没有玻璃防止冰球飞上我就座的那硬邦邦、漆成灰色的露天看台。

不只冰球赛场是这样。就像圣多明各[1]的许多沙地是世界上很多最优秀的棒球游击手成长的地方，或像北伦敦的小球场是阿森纳的球员们学会弧线球入网的地方。三河城是全世界冰球玩得最好的地方之一，全国冰球联盟[2]正是从这样的赛场上发掘天才。

像所有加拿大人一样，我和丹尼斯拥有共同的冰球爱好。在电视出现之前，我听着收音机里的NHL比赛长大。我和他的脑子里同样都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国家队员的名字：乔弗里翁[3]、贝利佛、理查德。我也曾在像这样的赛场上打球。

我坐在看台上，观看瓦亚加马克的小伙子们比赛。丹尼斯打得不错：个小，速度快，技术熟练，很努力，在赛场上来回猛冲，从其他人的冰球杆下把冰球截下来，必要的时候撞击对方。他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当他回到板凳上时，他把头盔从脸上推到后面，喝了一口可乐，大叫："加油孩子们！加油孩子们！注意那家伙加速！可恶！"

我坐在那儿看着他——他倚靠挡墙，准备参加一次集中攻势——希望自己还有一双能滑冰的腿。到最后，我奇怪的是，自己为什么会从一幕加拿大的场景中——那是他的场景，也正是我自己的场景——感受到如此强烈的距离感。我们共享这些东西，可是并非如此。尽管我能说双语，但我们中间有语言分隔，他的魁北克法语不是我的法语。我们玩同样的比赛，坐在同样的赛场里，而我们无法完全契合。可能是阶层的原因？但似乎更多是语言、从前的仇恨和苦难历史的问题——现实的和新出现的——比我们的任何理解都更加健壮、更充满活力。

三河城冰球场的这一幕场景让我们思考，居住在同一个政治

共同体中的人们到底应该共享些什么。为了共同的归属感，认为人们应当共享同样的仪式、同样的冰球场明亮灯光下的冰冷夜晚，这是不是有些太感性呢？毕竟，即使各民族共享的东西比我和丹尼斯之间的共享更少，民族国家的凝聚仍可实现。我和丹尼斯之间的距离，其核心可以归结于此。我们不是一个民族——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因为我是英国人而他是法国人，他生于魁北克，而我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不能爱同一个国家。我告诉自己这也无妨。共同拥有对同一个民族国家的热爱，也许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也许这么多加拿大人的生活所拥有的温和、宽容和良好品质，事实上依赖于这种共同热爱的缺位。然而在星期二的夜晚，一个人坐在三河城的冰球场上，观看一个年轻人脸上洋溢着狂野的笑容、全身心地滑行，我突然希望，我们真的确实热爱同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起居住在同一个国家。

---

[1] 圣多明各（Sante Domingo），加勒比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

[2] 全国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y League，NHL），北美地区的冰球职业联赛，包括加拿大和美国的职业球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冰球联赛。

[3] 伯尔尼·乔弗里翁（Bernie Geoffrion，1931—2006），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

5 库尔德斯坦



图25 土耳其萨武尔地区一个村庄的库尔德儿童



图26　一位库尔德“烈士”的葬礼，目前，生活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的游击组织身处抗击ISIS的前线，经常与之交火，并承受其带来的自杀式袭击





图27、图28　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Party，PKK）的女战士。作为游击队，库尔德工人党至今仍活跃在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



图29　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h Mustafa Barzani），库尔德民主党前任领导人，现任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的父亲，为寻求库尔德人的自治，与伊朗和伊拉克政府对抗。摄于1964年



图30　阿卜杜拉·奥贾兰，库尔德工人党领袖、主要创始人。1999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关押至今

边界

民族的神秘性似乎总是存在，仿佛是民族自身图景的基本特征。然而，民族的边界让这神秘性暴露无遗。在那里，人们意识到，将世界区分成各个民族，事实上是多么不自然、随意甚至荒谬。界墙将村子一分为二，铁丝网可能将同一条街道的两侧分成不同的国家，检查站可能将家族的一半与另一半隔开，地图上的边线可能将同一个族群分成两个不同的民族，边界哨所之间相连的邪恶直线可能与山川和河谷那完全非民族的轮廓线相违背。

现在，我正接近的这条边界尤其随意武断。我的身后，是土耳其东南部的草原；我的前面，是伊拉克陡峭的绿色山地；在中间，是一座长长的跨越底格里斯河（Tigris）支流的两车道混凝土桥梁。我将背包上肩，在5月下午行将消逝的光线下，开始向伊拉克山地行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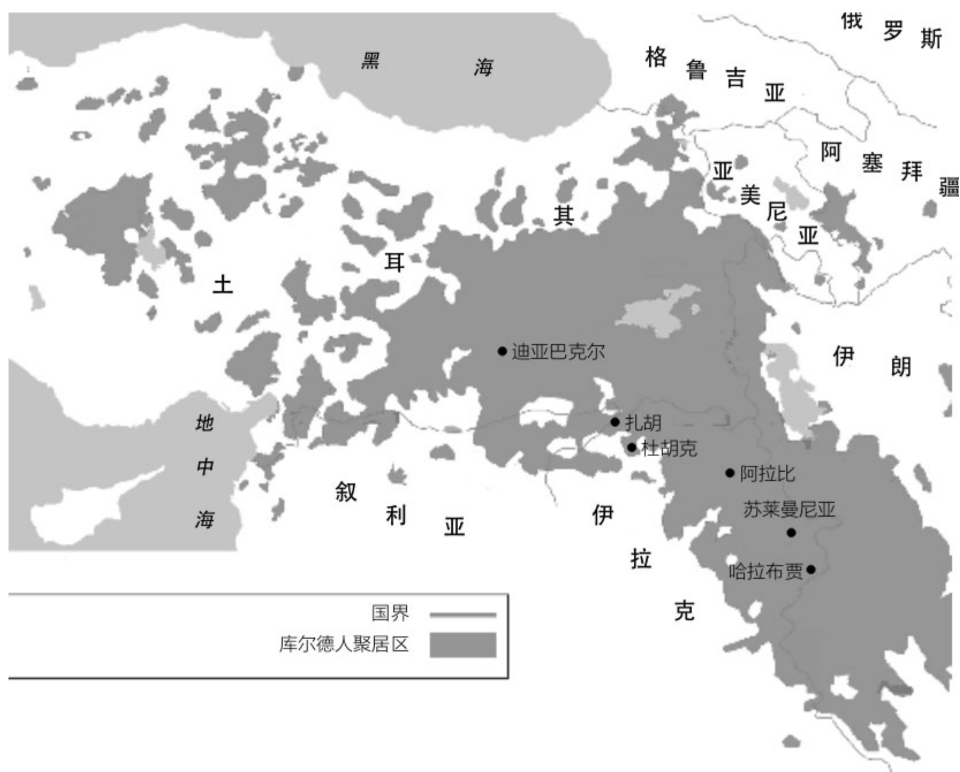
是色佛尔 [1] 还是洛桑 [2] 的哪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决定，这边是土耳其，而那边是伊拉克？同一个民族——库尔德人——居住在这两边，900万人住在这条边界的土耳其一方，300万人住在伊拉克那一方。然而直到两年前，界桩完全忽视了这些人的存在，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条边界将他们的家园一分为二。我来到这里，是因为现在事情终于有了变化。在这座桥的尽头有一张手写的指示牌，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着："欢迎来到库尔德斯坦"。

但这个库尔德斯坦拥有什么？库尔德人声称拥有的土地跨越五个民族国家：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亚美尼亚。在库尔德流亡团体位于伦敦的阴郁办公室里，我曾见过这幅库尔德斯坦的梦想地图，从西部的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东北部亚

美尼亚的阿勒山脉（Mount　　Ararat），到伊拉克的基尔库克（Kirkuk）油田和伊朗环绕克尔曼沙赫（Kirmanshah）的群山。这是一个从古代的米底人（Medes）传承下来的山地部落民族的土地，他们在此定居并宣称它为自己所有已超过4000年，只是他们的要求被在其废墟上兴起的土耳其帝国和现代国家所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斯曼帝国倒下，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凡尔赛短暂地居于主导地位，承诺给予库尔德人一个国家。然而，在1920年许诺给他们这个家园的《色佛尔条约》与1923年批准土耳其边界的《洛桑条约》之间，他们的要求被抛弃了。衣冠楚楚的绅士们忽略了这个梦想，为他们画下的边界线仿佛一张罗网。

库尔德人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家园位于现代世界最具攻击性和扩张性的四种民族主义的交汇之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从而，库尔德人为家园进行的奋斗遭到比他们更为恶毒的民族主义的扭曲和变形。

凯末尔·阿塔图克[3]于1923年建立土耳其国家，库尔德人始终被认为对其统一构成威胁。在阿塔图克集中化的、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引导下，土耳其人开始强制性同化库尔德人，拒绝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教育自己的孩子，甚至称自己为库尔德人的权利。直到10年前，土耳其官方仍将库尔德人称为“山地土耳其人”。“凯末尔主义”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语言融合在一起：现代土耳其的目标是终结奥斯曼帝国的落后遗产。因此，库尔德人不仅被妖魔化为另类的少数民族，注定要与一般土耳其人融合，而且是一个落后、野蛮的民族，注定要服从土耳其国家的现代化活力。



库尔德斯坦及周边区域示意图

类似地，对于伊朗国王的现代化民族主义，不用说，伊朗库尔德人是一个阻碍其现代独裁之路的落后部族。更糟的是，他们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大多数伊朗人是什叶派。国王1979年倒台后，伊朗库尔德人希望他们实施自治的机会有所提升，结果却发现阿亚图拉们 [4] 的宗教极端主义革命甚至比国王对他们更充满敌意。不仅因为他们顽强的山地叛乱阻碍了宗教极端主义所设想的威权控制，他们也被认为是宗教叛徒，是通往什叶派普世主义之路上的逊尼派障碍。即使现在，伊朗仍用火箭弹攻击库尔德斯坦领地内的库尔德人村庄，派遣装载炸弹的幻影战机在领地中的库尔德人村庄上空呼啸而过。

至少在理论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Ba’athist）民族主义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相比没有那么冷酷集权，更少被种族的褊狭所左右。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宪法上被界定为少数民族，保留有用库尔德语教育孩子的权利。不断更替的复兴党政权给予他们名义上的自治，但这只是库尔德部族和民族领导人坚持反抗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领导人是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 Mustafa Barzani）。

当萨达姆·侯赛因在20世纪70年代上台时，新的石油财富加上西方和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使他迅速转向民族主义极权统治。萨达姆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使两种需求合法化：让伊拉克现代化，以及使他自己成为中东最有权势、最令人恐惧的领导人。穆拉·穆斯塔法于1961年开始带领库尔德人反抗，他的儿子们断断续续地延续反叛，这是对萨达姆独裁统治和强行现代化最为有力的对抗。萨达姆从未能够成功地煽动阿拉伯人对库尔德人树立长期、普遍的种族仇恨。相反，他与库尔德人作战，仅仅因为他们是对其特有的独裁形式最顽固的挑战。

这四种民族主义困扰着库尔德人自身创造共同民族身份的努力。许多土耳其库尔德人只说土耳其语，只认识罗马字母。这令他们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区分开来，大多数伊拉克库尔德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使用阿拉伯字母。伊拉克和土耳其政府都熟练地利用库尔德人之间的差异。正如在所有的民族主义斗争中，总是有人抵抗，有人合作。在库尔德语中，那些合作者被轻蔑地称为“小驴”（jash）。萨达姆将他们编成民兵部队，与民族主义的“自由斗士”（peshmerga）作战。库尔德人自己承认这一点，在所有关于共同家园的对话中，他们相互之间的争斗事实上比并肩战斗更为常见。除了被他们的邻居们种下的分歧，库尔德人也

有他们自己内在的分歧：部落和家族的封地、不同的方言——北部的科曼伊（Kurmanji）语、西部的伊拉克语、南部和东部的索拉尼（Sorani）语。民族主义运动一点点清除了部族、地区和语言上困扰库尔德人的分歧，试图创造一种统一性使建立国家最终得以可能。然而统一的目的和前景仍然扑朔迷离，像其他没有国家的民族如巴勒斯坦人一样，库尔德人的问题仍然在于：民族主义能够构建一个民族吗？

在国家缺席的情况下，面对这些分歧，库尔德人能否成功地作为一个民族生存？我怀疑，他们的秘密可能恰恰藏在他们的传统主义中。这可能改变人们通常对他们的看法，即他们的部族主义是政治分歧和缺陷的来源。确实是这样，但部族主义也是一种潜意识的凝聚力来源，即使对于城市库尔德人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在过去的两代人时间里完成了从部族到一种集体归属的民族主义形式的转变，但他们的民族意识仍然是由部族纽带所造就。他们特有的落后，他们顽固地坚持部族忠诚，保护他们免于被同化和整合。

我到达桥尽头的混凝土小屋，递上我的护照，在小屋的屋顶上我看到有一幅崭新的丙烯画，画像上是马苏德（Massoud），穆拉·穆斯塔法的儿子，继承他领导库尔德民主党（Kurdish Democratic Party）。它取代了过去挂在那儿的萨达姆肖像，在1991年3月的库尔德人暴动中，萨达姆的肖像第一时间被射落下来。

在“欢迎来到库尔德斯坦”的牌子下面，并没有真正的边界哨所，只有几个拿着自动武器的褐色脸庞小伙子微笑着说：“尼好，先森。” [5] 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头顶呼啸而过，在蓝天下飞得那么高，根本看不到，小伙子们抬眼瞅了瞅，笑了。他们把护

照还给我，告诉我说："美国人。"

这些飞机从土耳其因切里克（Incirlik）的基地起飞，在伊拉克上空的禁飞区巡逻，它们将库尔德人和萨达姆·侯赛因分隔开。没有人知道它们会飞多久，它们能保护库尔德人多久。无国家的民族的命运被密封在其他民族的首都。

边界的指示牌可以写上"欢迎来到库尔德斯坦"，但这个边界自身实际上将梦想中的家园分成两半。在总共2500万库尔德人中，只有280万人在这里，绝大多数是本地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片领地。它没有自己的国旗。它甚至不被允许称呼自己为库尔德斯坦。技术上而言，它仍然是伊拉克的一部分，货币仍然是伊拉克第纳尔（Denarius）。它建立于1991年的春天，即伊拉克的直升机炮火将库尔德人赶入山口之后。联合部队把伊拉克军队赶回南部，联军的飞机在北纬36度建立了禁飞区，在这里库尔德人获得了避难权，他们从伊朗和土耳其的难民营里返回，重建他们的家园。

但即使它不是一个国家，它的行为依然像是一个国家。它举行选举，拥有议会、一支警察力量和公民治理的基本雏形。自从萨达姆将其与伊拉克其他地区隔离开之后，库尔德斯坦依靠国际援助车队和隆隆穿过大桥的土耳其卡车维持生存。但伊拉克库尔德人无疑相信，从这个核心地带开始，这片领地有一天会成长为一个国家。

在国际法中，库尔德斯坦是"太阳之下的某种新事"——联合国第一次尝试保护一种少数民族，对抗其名义统治者的种族屠杀意图。直到库尔德斯坦，国际社会才开始进行这种挑战民族国家领土完整性和主权的"干预"。随着库尔德人聚居区的建立，它认

同了一种理念：人道主义干预的责任超越主权国家的不可侵犯和完整原则。如果库尔德斯坦收到成效，其他认为自己可以虐待本国的少数民族而不会受到惩罚的民族就会看到，类似的领地将从他们的领土上分割出去。库尔德斯坦完全是乔治·布什“世界新秩序”的遗产。对于“冷战”后的世界而言，它仍然是唯一在人权和国家权利之间取得新的平衡的地方。

既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无国家民族拥有了一小片可以说是自己拥有的地方，我想知道，它将对他们产生什么作用。无国家的民族有一种让民族的安全性凸显出来的方式，而拥有国家的民族觉得这种安全性理所应当。找出民族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意义、它对民族性格所起作用的最佳方式，是花时间到一个从未拥有过自己国家的民族中去。

我乘坐的出租车在陡峭的道路上挣扎前进，经过扎胡（Zakho），前往杜胡克（Dahuk），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库尔德斯坦。在满是岩石、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上，有一些帐篷，部分帐篷带有美国军方标志，有些带有联合国难民事务署（UNHCR）的标志，帐篷里面的煤油灯下，我看到整齐地码成金字塔形的万宝路香烟、火星巧克力棒、土耳其巧克力、成捆的香皂、整包的人造黄油、饼干、整袋的糖和面粉。在其他帐篷外面，我看到一排排堆得整整齐齐的塑料汽油罐，淡红色的汽油满到了罐口，由手和脸被车轴油和引擎油染黑了的小伙子看守着。萨达姆封锁了库尔德斯坦的边界，这个一穷二白的经济体要维持运转，只能依靠翻过山口从伊朗运来食用油和肥皂的精明赶骡人、从这条路上呼啸而过的土耳其卡车，以及这些在路边出售走私罐装汽油的满身油污的小伙子们。小伙子们都光着脚，在夜色

中看上去很冷。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贫穷和绝望的气氛，而是有些奇妙和神秘：颧骨和褐色皮肤映照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帐篷的外形像是一张弯弓，篷幔卷起来以便显露出里面的走私财货。小伙子们站在篷幔边上，他们的脸庞映照在煤油灯下，他们的眼睛召唤我进去。

---

[1] 色佛尔（Sèvres），法国西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920年在此签署《色佛尔条约》，主要内容是削弱战败后的奥斯曼帝国，其中承诺建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但由于条约对土耳其过于苛刻，遭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抗，协议最终未获得实际执行，并于1923年被《洛桑条约》取代。

[2] 洛桑（Lausanne），瑞士城市。1923年，协约国与土耳其在此重新签署和约，其中未提及库尔德人的自治问题。

[3] 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ürk，1881—1938），又译基马尔·阿塔图克，土耳其国民运动之父，现代土耳其国家的缔造者。

[4] 阿亚图拉（Ayatollah），伊斯兰教什叶派对较高等级的宗教学者的称号。

[5] 原文为Allo，Mistair，作者有意模仿库尔德人说英语Hello Mr.的语调。

自由斗士

在杜胡克一个阴冷的宾馆，我度过了第一个夜晚。一辆白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停在了宾馆外面。我很高兴看到它。像我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发现一样，四驱车是“后冷战”世界的战争地区的偏爱。它成了军阀们的战车选择，他们统治着派系、帮派、游击部队、部落的检查站和指挥所，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人为民族的骨头而争斗不休。

在这里，这辆陆地巡洋舰是由马苏德·巴尔扎尼的组织库尔德民主党慷慨提供。库尔德民主党在杜胡克控制着库尔德斯坦的西北部，而贾拉尔·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掌握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PUK）牢牢控制着讲索拉尼语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他们结成联盟，共享权力，但两者之间的鸿沟很宽，历史上长期互相背叛。

库尔德民主党不仅提供陆地巡洋舰——当然是收费的——还提供安全保护。

贝杰特（Behjet）和塔哈（Taha）是我的“自由斗士”，我的战士，我在旅途中的安全护卫。他们戴“杰马戴恩”（jemadane）——一种男战士戴的黑白头巾包裹的头饰，穿束身很紧的褐色军用短外套，用色彩鲜艳的布条扎成漂亮腰带，这叫“舒蒂克”（shuttik），打了四个紧紧的、向上翘着相互缠绕的绳结，束在侧边。他们的裤子叫作“沙尔瓦”（shalvar），像气球一样夸张地蓬松鼓起，底下穿一双织工精细、被称作“克拉什”（klash）的白色棉拖鞋。两个人都留有浓密的黑胡子，有一张警觉、庄严的山地部落人的面孔。贝杰特是资深驾驶员，他的

舒蒂克里塞有一个装着手枪的破皮盒子，而塔哈则在肩后背着一把卡拉什尼科夫。贝杰特的右膝僵硬——战争留下的创伤——走路的时候明显一瘸一拐。他开车的时候，把腿直接绑在油门上。我告诉他，他就是我的牧羊人，而我是他的羊，他庄重地笑了笑。在库尔德斯坦，牧羊人几乎与“自由斗士”一样高贵，而现在他身兼两者。

他们都是党员，自成年以来，他们的全部生命都在为巴尔扎尼战斗。我很快注意到，当贝杰特带我去其他的党派那里，例如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电视台，他会变得很不自在。这些地方对他犹如外星人的地盘，而那些持枪守在门口的人们也用同样的怀疑眼神看他。我跟贝杰特开玩笑，说他一旦不在自己的党内，就拉长了脸，他笑着说：“不，不，所有的库尔德人都是兄弟。”但他的脸告诉我的是另一种意思。

贝杰特和塔哈都有枪，而视野所及，我在街上见到的每一个男人也都有枪。破旧的手枪藏在腰带里，西装内兜里隐约可见手枪皮套，卡拉什尼科夫在肩上背着、在餐馆桌上放着、大摇大摆地挂在椅背上、放置在汽车的前座上；汽车手套箱里放着弹夹；晨光中，一辆满载农场工人前往田野的拖拉机上，枪管一支支挺立；赤脚附身的祈祷者身边，放着枪支。再一次，像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一样，我身处一个权力来自枪杆子的世界。而且不仅仅是权力，它也是威望和雄性的荣耀之所在。

贝杰特和塔哈都不炫耀他们的武器，而我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检查站已经习惯于那种刻意带有性意味的表演。也许这与他们身为穆斯林有关。在我们一起行走的整个旅程中，每到日落时分，他们退到路旁一个安静的角落，脱下鞋子，低声地念诵祷告词。他们滴酒不沾，这一定也对他们那种有尊严而又随意、去性

意味的武器处理方式有作用。与此相比，欧洲人在检查站的那种枪炮文化打破了一种基本的禁忌。绝大多数欧洲人自从1945年以来生活在暴力手段被垄断的国家之内，这种垄断正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所在。当巴尔干各国瓦解之时，这种垄断随之崩溃。军队的枪械库被洗劫一空，猎枪从阁楼上取下来，军火商人一拥而入。对于某些欧洲年轻男性，国家垄断的崩溃所引起的混乱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进入一个为所欲为的色情天堂，因此出现了检查站那种半性意味、半色情的枪炮文化。对于年轻的男人，手里掌握致命的权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色情魅力：用它截停救助车队，恐吓一队队难民，威胁新闻记者，让无辜的平民双手护头躺倒在壕沟里，在自己的枪口下瑟瑟发抖。

与此相比，在库尔德斯坦从未有过国家，因而从未有过对暴力的垄断。曾经统治这里的帝国和民族从未让“自由斗士”解除武装：相反，他们利用“自由斗士”充当民兵和雇佣兵。男孩子们一旦到了青春期就被分发武器。携带枪支，是一个男孩不再是男孩而是必须像男人一样行事的标志。“自由斗士”这个词不仅意味着“战士”，也意味着“面对死亡的人”。因此，这种枪炮文化中的特殊意义强调责任、节制和悲剧意味的职责。因此，基于这些原因，我信任我带枪的“自由斗士”。我可以肯定不会有疯狂的表演。他们的武器在前座上，放在我的身边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而我过了一天，就不再想到它们。

然而，如果到处都是枪，谁是发号施令的人呢？在一个没有民族国家的地方，不存在清晰的指挥链条，没有明显的权威条线。

贝杰特和塔哈属于党的武装人员。但那些我们经过时指挥交通、身着蓝色和白色制服、臀部挂枪的治安警察呢？那些穿军用

制服、打白色绑腿、戴红色贝雷帽的机灵小伙子们呢？这是些旧的萨达姆式的制服，我可以看出来，是以帝国时代的英式旧军服为模板。谁给他们下命令呢？在驾车快速通过杜胡克一个热闹的街道市场时，在许多擦皮鞋的男孩子以及装满了黄瓜、西红柿和白洋葱的木桶中间，我看到党的枪、警察的枪和军队的枪。

没有人确切知道谁负责。一些警察和军队属于旧萨达姆时代，是当地最古老的发号施令阶层。其中有些人一定是“小驴”，即与旧体制合作的人。当然，其中最坏的是那些虐待拷打或收受贿赂的人，他们在1991年3月的暴动中要么逃走了，要么被打死。最诚实的人留了下来，在拥挤的市场中维持交通秩序。

随后，来了新的库尔德人军队：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杜胡克省政府总部附近操练，16岁左右的笨手笨脚的孩子，穿着不合身的军用工作服、肮脏的白色彪马（Puma）训练鞋，第一次学习队列、射击和搏斗。但他们似乎是一支新的力量；新国家的主要战斗力量仍然是“自由斗士”，那些身着传统装束的党的民兵战士。

贝杰特和塔哈驾车带我去党的总部，跟党的首脑们喝例行甜茶，接受他们的正式祝福，然后开始我们的旅程。通常，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如果没有经过这种喝茶的仪式，就没有一件事能够开始或结束。

但今天没有喝茶仪式，因为党的总部处于混乱状态。今天是杜胡克地区七个党主任职位举行选举的日子，大人物们在小学校的台阶上来来去去、上上下下。你可以辨别出他们是大人物，因为他们没有穿“自由斗士”通常穿的淡棕色或灰绿色的卡其裤，他们的沙尔瓦是用轻质、透气的亚麻做的，束腰外衣上沿着缝边向下有许多条纹和紫色的束带。他们进入房子的时候，一种恭敬的

氛围在他们周围扩展开来，人们窃窃私语，某某人曾在1991年的起义中负责杜胡克的军事防卫，而另一个矮小、忙忙乱乱、上身粗壮的男人，头上戴一顶华丽的红色杰马戴恩，胳膊下夹着一堆乱哄哄的纸，据说他曾是俯瞰城市的山上高地的指挥官。

权贵们在小学的前门廊来回踱步，等待里面的选举计票结果，他们把玩忘忧珠，低声地讨论，后面是一幅真人大小的穆拉·穆斯塔法肖像，他穿着舒蒂克，手握匕首。

里面，计票正在一个蓝色的大教室进行，光线透过窗户，与香烟烟雾交织在一起，脚下的石砖地上是杂乱的烟蒂，上百名站在屋子后面监督计票的“自由斗士”发出嗡嗡的低语和传言。其中有些人在香烟盒纸上写下结果，摇了摇头，注视着屋子前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桌子边上，一个男人拣起一张选票，喊出被投票人的名字，围着屋子有八块黑板，其中一块黑板的计票员在提到的名字下面画了个标记。监票人围在唱票人的周围，确保他只念出选票上有的名字。这是一次公开计票，一种有引导的公共仪式，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一切都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优雅进行，名字被喊出来，计票人咕哝着他刚听到的名字，他的粉笔“嚓嚓”地画出一个标记，然后下一个名字稳稳地、平静地读出来，而后面庞大的人群紧张地看着粉笔画的标记在名字旁边累积起来。有一些候选人是女性，但屋子里没有一个女人。库尔德人的民主像库尔德人的战争一样，是男人的事务。

在接下来两周的时间里，我参观在埃尔比勒[1]的库尔德议会，从参观者通道注视那些议员，他们大约有100多人，其中有8位女性，有些人穿传统的库尔德服装，有人穿正式西装，而一些宗教领导人身着华丽的长袍和头巾。我可以看到，相比萨达姆一年召开一次、用来向外国参观者显示对待“他的”库尔德人多么

好的“恐吓马戏团”[2]，这是一个真正的议会，一个有真正辩论的场所。但新生的库尔德民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是在一个小镇的教室里统计选票，人们在后面抽烟、交头接耳、在香烟盒上乱写。我难以解读的是古代和现代之间、部族和党之间、民主选举的平等和人们对领袖的谦恭与尊敬之间的关系。

其后的一个晚上，对于这些问题，我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当时我坐在一座房子的黑暗阳台上，与该镇的党首穆耶丁·拉希姆（Muhyeddin Rahim）一起远眺苏莱曼尼亚[3]。他是个又瘦又黑的精明男子，卷发浓密，很聪明。在他位于华盛顿郊区的房子地下室里，他曾担任库尔德人事业驻美国的代表长达15年，地下室的绰号是“库尔德事业的五角大楼”。我们一起喝苏格兰威士忌，把瓶子放在桌子下面，以便不冒犯在阳台的阴影下站岗的自由战士。穆耶丁用他沙哑的声音向我吐露秘密：“穆拉·穆斯塔法自己非正式地跟我说过，‘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但是要负责任。不要丧失尊严。不要把自己扔进垃圾堆。’”穆耶丁用一种难以模仿的库尔德式美国俚语说话。他喜欢“非正式地”谈话，把新闻记者称作“你们这些家伙”。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华盛顿说客，但他没有。他头上戴杰马戴恩，有一种令人欢快的调调，整个晚上都有持长枪的人来到桌前，谦恭地屈膝行礼，在他耳边轻声低语，或交给他一个紧急电话，或是把杯盘清理干净，为他换上眼镜，为他点烟，烟抽完的时候拿包新的万宝路给他。

我问他，他头脑中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外界支持。”他担心西方良知的变化无常、我们道德关注范围的游移不定。如果我们不对库尔德斯坦保持关注，萨达姆将会把它夺回去。穆耶丁透过烟雾看着我：“无意冒犯，但我们没办法相信每一个人。”

我问他，你的人民过得怎么样呢？“很糟糕，在苏莱曼尼亚大约有100万人，”他继续说，“我们有什么呢？一家无法运转的烟草工厂，因为我们的原材料短缺。一家水泥厂，因为没法进口燃油来驱动机器，不能运转。所以每个人都失业了，我不知道我们能支撑多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来我的办公室，我会告诉你它是什么样子。”

我跟着去了。他从红色丰田车上一下来，请愿者就团团围上来。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奋力将一卷包得紧紧的纸塞到他的手里，那上面详细记录着某些不公正的事情，某些他们认为他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个双腿被炸掉的农夫拄着拐杖一瘸一拐——他开着拖拉机撞上了萨达姆的地雷，他拉开裤子，向我们展示他的假肢；有一个老妇人带着个老头子，他们的孩子被带走枪毙以后，老头子就发了疯。当穆耶丁缓慢地挤过人群走向办公室的时候，乞丐们开始拉他的衣服，低声说：“给我一磅糖，给我一磅面粉……”这是一幅中世纪的场景，由中世纪的信仰所驱使，那就是：如果你能够跟好国王说上话，你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但它们并没有消失。穆耶丁是个军阀、党的领导人，不是创造奇迹的好国王。

当他们在一年前把他从华盛顿的地下室里提拔上来，让他回到这儿，做自己家乡的领导人时，他自己也很震惊。他当了军阀，但他觉得这个词太“好莱坞”化。

我问他，谁是这座房子从前的主人。“一个朋友的朋友，”他狡猾地看着我，“他现在在巴格达。”

穆耶丁凝视着苏莱曼尼亚的夜晚：“15年前，我离开这里的

时候，这整个山脚下都没有房子。我回来了，几乎不认识这个地方了。”在华盛顿郊区的时候，一定有过某些时刻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了解故乡，那他正在为之开创未来的故乡。我问他，回家是不是很艰难。“不，”他开心地说，“你们才有那种问题，我没有。”

而且他说：“我们是一个现代政党，我们不是部落。”他不喜欢部落这个词，这词给他一种谦卑感。当现代的库尔德政党开始建立的时候，部落酋长阿迦[4]的权力非常大。面对他们，人们处于奴役状态。而现在，这块土地的权力掌握在政党的手中。

他又接了一个秘密电话，跟一个助手交换意见，然后悄悄啜了一口威士忌。我问他：“你或者党的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部落酋长？”不，不——他摇手说。你误会了。巴尔扎尼家族的土地财产在哪里？他们的巨额财富在哪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塔拉巴尼家族——巴尔扎尼家族最大的竞争对手——的事情，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跟塔拉巴尼不一样，巴尔扎尼的权力不是来自部落的关系，而是来自他的表率作用。他终生为自己的人民奋战。那是他获得尊重的原因。

“看，”穆耶丁向实行宵禁的苏莱曼尼亚街上挥手致意，“那儿出来的是巴尔扎尼的一个兄弟。他没有为自己的人民做任何事情。我不必给予他尊敬。所以，这种部落之类的说法已经够了。”

他令我意识到，我困扰在一个虚构的发展幻想之中，即认为民族必须经过各个阶段：首先是部落阶段，然后是民族阶段；首先是“落后的”“原始的”和“传统的”，然后是现代的、“非个人的”。库尔德人颠覆了这个幻想。没有固定的阶段，没有之前和

之后，在古代和现代、部落和民族之间没有固定的界线。他们的身份不断切换，融合于个体的生活中。在华盛顿郊区，休息的时候，穆耶丁会穿上旧训练鞋、T恤、斜纹棉布长裤，手里拿一罐啤酒，在房子周围晃悠；在跟国家部门打交道的时候，他会穿正式的西装；回到苏莱曼尼亚，他穿沙尔瓦、舒蒂克和杰马戴恩。他对这两种“制服”应付自如：传统服装体现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现代服装体现他透彻地明白如何才能让事情办成。他两者兼具，因为库尔德斯坦的存在，他可以两者都是。

到了该走的时候。他问我下一站要去哪里，我说哈拉布贾[5]。他朝身后打了个响指，对一个俯身下来的人低声下了命令，然后说：“安排好了。”第二天，我走进酒店大堂的时候，才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在车道上等着我的，是他自己的装甲吉普车，车顶上架着一挺机关枪，有半打晒得黝黑、微笑着的自由战士，带着战斗的疲劳，做我的护卫。我过了一阵子才意识到，保护我只是他们的部分目的。通向哈拉布贾的道路不是特别危险，这种护卫的真正原因是一种军阀人类学的礼仪和展示。护卫的目的是表示对我的尊敬，同时展示那个在阳台上坐在我身边抽万宝路、啜饮苏格兰威士忌的男人的权力、影响和威信。

---

[1] 埃尔比勒（Arbil），伊拉克北部城市，库尔德斯坦首府。

[2] 恐吓马戏团（cowed circus），指萨达姆统治时期，在萨达姆控制下的库尔德自治区议会。

[3] 苏莱曼尼亚（Sulaymaniyah），伊拉克东北部城市，苏莱曼尼亚省省会。

[4] 阿迦（agha），库尔德人对部落首领及地位较高的人的尊称。

[5] 哈拉布贾（Halabja），库尔德斯坦东北部城市，居民一般讲库尔德语索拉尼方言。1988年，伊拉克政府军曾在这里实施化学武器攻击。

恐惧共和国

我和我们的护卫贝杰特、塔哈开始旅程，沿着令人晕眩的山路，穿过山口，下降到绿草萋萋的山谷，经过成群低矮、平顶、双卧室的土砖房子，它们立在山脚下，背靠峭壁寻求支撑。从杜胡克到巴尔赞（Barzan），一个又一个在萨达姆统治下被烧毁或炸毁的村子又恢复了生机。成堆的空心砖堆在路旁，到处可以听到鹤嘴锄挖掘、搅拌水泥和铁铲砰砰作响的声音。戴头巾的牧羊人带着他们的牛羊回到山地牧场。沼泽正在被改造成稻田，大平原上种上了小麦。每一个地方都有西方帮助的痕迹，花钱请来荷兰、瑞士和德国的机构重建被萨达姆毁坏的村庄，新的诊所开始营业，开始着手清洁水的供应，户外厕所修建起来，水泵将水流净化，传染病的传播得到控制。一座家园正在恢复生机，每个地方的人们见到我都很高兴。赤脚的小男孩在路边卖杏仁，当他们见到我的白人面孔时，叫道："尼好先森。"女孩子们穿紫色的"吉拉"（kira），弯腰背着沉重的木材，她们在羊肠小道上停下来，羞怯地朝陆地巡洋舰挥手致意。百利桥[1]横跨奔腾的褐色河流，桥边担任警卫的"自由斗士"行礼致敬。

两年前，这种张开手臂欢迎外来人的情况也许是不可想象的。萨达姆的特工会隔离任何外国访问者，讯问他交谈的每一个人。两年前，我也许会遇到躲避的目光、冰冷的脸、转过去的背影。也可能，在最为传统的山谷村子里，我会遇到那种对所有来访的外来人的猜疑。随着库尔德斯坦的到来，所有都改变了。外国援助工人告诉我，他们从未有过这样受欢迎的工作环境。原因显而易见：没有我们，没有空运的援助，没有时有时无但不会中断的国际关注，就不会有家园，不会有库尔德斯坦。我们——外

面的世界——已经帮助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向白人面孔挥手致意。

我停下来更近距离地观察刚刚播种的稻田，戴头巾的人们从泥水中抽身出来，走近我，与我握手。“尼好先森，”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你们什么时候为我们割开萨达姆的喉咙？”

问得好。萨达姆仍旧威胁着库尔德人的梦想。似乎是为了提醒库尔德人他还在，只隔着群山。他命令切断从摩苏尔[2]送来的电力供应，让杜胡克陷入黑暗之中。他废除了25第纳尔面值纸币的流通，似乎是为了提醒库尔德人，他仍然掌握着经济命脉。由于绝大多数库尔德人持有的金钱主要是25第纳尔的纸币，这个措施令他们的储蓄瞬间化为乌有。

他那风格怪异的木屋和行宫似乎盘踞在每一座山顶上，他的监狱和兵营似乎占领了每一个山谷。这些建筑物实践的是恐吓式建筑艺术，大理石立面、纪念碑式平台和花园，全都在告诉库尔德人：你们什么都不是，我才是一切。但库尔德人报了仇。行宫被洗劫、焚烧、夷为平地。人们占据了兵营和监狱，在里面拉起了晾衣绳。在埃尔比勒，有一个家庭甚至搬进萨达姆靠近议会的行刑中心。一个女人在库尔德人从前被射杀的房间里架起了炉子烤馕饼，山羊在房间里漫步，孩子们在被毁坏的窗户和炮眼上堆砌石头和砖块以抵抗风雨。

萨达姆仍旧引发恐惧，令气氛变得紧张。苏莱曼尼亚的警察主管给我看一个装满了塑料炸弹的橱柜，它们都是萨达姆的特工人员安置在国际援助车队的卡车上，或者留在小学门口无人注意的汽车上的。最近，他派部队穿过边界，到埃尔比勒的三个村庄抢夺庄稼收成。在所有这些伎俩中，萨达姆的策略很简单：一小

口一小口地咬，当西方转过身去，确定我们没有注视他的时候，猛然来一大口。

在埃尔比勒一个新库尔德电视台，一个当地演员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橡皮面具完美地模仿大独裁者的电视演说。他在电视荧屏上砰砰地敲着桌子，摇晃手指，把古老的恐吓和威胁的手势变成无害的滑稽幽默。但当我请他摘下面具、让我拍张照片时，他腼腆地拒绝了，因为担心会有人记住他，如果萨达姆卷土重来，会给他带来麻烦。当我和埃尔比勒的安全首脑交谈的时候，他把我带到镇子外面一片将要成熟的麦田中间。在镇里，会有人群聚过来，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也许有人正在偷听。

伊拉克军队到埃尔比勒只需25分钟，他们集结在一个低矮、被烧过的小山上的防御工事后面，山坡斜斜向下直到科勒克（Kelek）的河边。萨达姆有时关闭边界，有时开放边界。今天是开放的。透过望远镜，我可以看到伊拉克边境守卫，有1公里远，在热气弥漫中昂首阔步，正在检查一群站在平板卡车后面的库尔德工人。然后我看到卡车小心翼翼地开过水泥桥，停在库尔德检查站。在那儿它被用障碍物固定住，检查底盘是否有爆炸装置——经常藏在减震器上。工人们下车，接受证件检查。伊拉克特工经常混在这些运输车上，库尔德人尽全力将他们剔除出去。但边界的检查程序似乎有很多漏洞，并不让人放心。他们需要金属探测器、检查室——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有的全套设备——但他们甚至没法找到一根合适的、横挡在桥身上的金属障碍物，所以人们在饮料销售商、卖花生的小贩和蹲在路边等公共汽车的老妇人身边经过，悄悄潜入，无人注意。

当地的“自由斗士”与贝杰特协商，他不情愿地允许他的“羊”跨过河流，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更近距离地观察伊拉克的

防卫哨所。我们留下陆地巡洋舰，因为它们可能会招来火力，步行穿过桥梁，到达正处于伊拉克炮火之下的一个村子。当地的自由战士带领我们穿过后面的小巷，告诉我们把头低下，躲在墙后面。经过电话沟通，他们带我上到一个楼梯，1991年这里被火箭炮袭击，现在变成了一堆摇摇欲坠的碎石和废铁的废墟。通过小心翼翼地架在一座防护墙上的望远镜，我看到伊拉克士兵在观察我们，他们在防空壕之间来回走动，肩上扛着武器，手里拿着望远镜。他们指着我的望远镜，我躲开了视线。当我跨过河回来的时候，感觉到伊拉克人在他们的视野里追踪着我，在明亮得刺眼的蓝天下，我听到看不见的美国飞机远远传来的轰鸣，它飞得如此高，超出了视力范围。

---

[1] 百利桥（Bailey bridges），英国军队在“二战”中发明的一种预制的桁架结构桥梁，不需要重型机械迅速搭建以满足军事需要。

[2] 摩苏尔（Mosul），伊拉克第三大城市，毗邻库尔德斯坦。

大屠杀

巴尔赞一定曾经是一个美丽的村庄，它从山谷底部大河边的台地上升起，向上穿过山脚的隐蔽缝隙，穿过冲积平原，到达后面环抱的群山。田野里成堆的石头，散布在低矮的台地上，由此你可以想见它曾经是多么的宽广。曾经支撑门楣和屋顶的钢筋从这些石堆中穿刺而出，它们都是巴尔扎尼部落传统家园的残余。

1975年穆拉·穆斯塔法的反抗失败后，萨达姆进行了迅速而残忍的报复。在整个村庄，一座座房子被付之一炬，人们被遣送到埃尔比勒附近的库斯特佩（Kushtepe）和迪亚纳（Diyana）的集中营。在那里，萨达姆的警察严密地看管他们。

然后，1983年7月，当巴尔扎尼一度与伊朗人结盟、在库尔德山地提供情报和侦察支持、对抗萨达姆军队的时候，萨达姆严厉打击巴尔扎尼部落。他的部队包围了库斯特佩和迪亚纳的集中营，强迫每一个男人戴上红色头巾——巴尔扎尼部族成员的标志。所有年龄在12岁到80岁的男性被装上卡车，送往巴格达，此后再也没有见到或听到过他们的消息。他们的女人被留下来，必须自己谋生，她们从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1991年3月的起义期间，巴尔扎尼的寡妇们逃到伊朗。从那以后到现在，她们终于回到了自己出生的村庄。瑞士慈善组织卡里塔斯（Caritas）正在帮助她们建设新家，她们第一次拥有自来水、混凝土地面和波纹钢屋顶，但什么都不能抚平那种不知道她们的男人到底怎么样了的伤痛。

巴尔扎尼寡妇们灰白的长发飞散开来，不加修饰地披在她们黑色的丧服上。她们赤脚盘腿坐在她们空荡荡的房子门口，带着

幸存下来的女孩子，等待她们的男人归来。她们痛苦地解释，房子是空的，储藏玉米和油罐的储藏室也是空的，因为没有男人供养她们。她们依靠外国人的施舍幸存下来。一个女人没法生活。

她们用一种深陷于悲痛之中的呆滞的单调声音说，伊拉克士兵是晚上来的，他们把男人从床上带走，把孩子从小床上带走。他们还把瘸子和盲人都带走，所有巴尔扎尼的男人。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带到了哪里。有些人说有万人坑，但还没有发现任何确定的证据。恶魔之手已经将她们的男人从地球表面抹去了。她们的脸上是条条泪痕，任泪水流淌而不去擦拭。巴尔扎尼的寡妇们说，她们无法控制这种伤痛，因为它没有尽头。最糟糕的是，没有什么能抵抗那种带有希望的痛苦，她们相信有一天，当抬起双眼时，在穿过群山、蜿蜒通向村里的尘土飞扬的羊肠小道上，会看到一列终于归来的幸存者。

民族主义试图将死亡神圣化，以救赎个人的牺牲，并将其与定数和命运联系起来。在战斗中，孤独而恐惧的持枪男孩死于十字路口，他死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孤独而恐惧的男孩。在民族主义的救赎语言中，他成为烈士之想象共同体的一员。在所有的库尔德公路沿线，牺牲的“自由斗士”的画像在柱基上俯视着人们，那儿曾经挂着萨达姆的画像。这些图片都是民族主义的库尔德民间艺术。在一幅画像中，一位战士站在高山雪地中；另一幅画像则是在湖边，有一只鸽鸟在空中翱翔，仿佛希望的气息。这些画像描绘他们穿着制服，枪背在肩上，从死亡所在的安全之处凝视着现在，或是焦虑地回头张望，似乎希望确定他们的牺牲不是毫无意义的。

从巴尔赞往东的道路沿着群山下行，经过苏莱曼尼亚，进入一片广大的种植小麦的山谷平地。我们经过晒得黝黑、正在为他

们的牲口割草的人们，还有一群群蹲在路边的村民，他们身边是巨大的草捆，等待搭乘路过的卡车；后来，我们见到他们全都难以置信地拥挤在平板车上，兴高采烈地从我们身边挥着手呼啸而过，只有戴面纱的老妇人忧郁地坐在草捆上。我们驶过稻田，男人和女人都赤脚在田里耕作，衣服卷到膝盖上面，而皮肤像头发一样呈褐色的孩子们在路边卖蓝色小包装的葵花子。

在其最基本的层面，民族主义也许是对一个人所热爱的某一片土地拥有政治主权的渴望。在最开始，必须对这片土地本身有一种强烈的依恋和一种别无他求、此地最美的感觉，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比。库尔德人说，群山是他们唯一的朋友，唯一从不背叛的那个朋友。但也是群山将他们维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将他们与其他人分隔，给予他们习性和家园，在他们中间一天天创造渴望：有一天这里将真正属于他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正如那晚在苏莱曼尼亚，当我起来准备走的时候，穆耶丁在他的门廊说：“看，所有一切归根于此。”他紧紧地握住拳头，举起来靠近他自己脸庞：“我们想要一样东西，即使它很渺小，但没有人可以把它从我们这里夺走。”

道路转向南，向东，穿过沙里佐[1]富饶的平原，通向伊朗边界。在离边界只有5公里远的地方，在三面光秃秃的圆顶山丘的环绕之中，现在被5月的热浪晒成褐色的，就是哈拉布贾镇。

1988年3月16日，正是库尔德人的新年之际，库尔德“自由斗士”从伊拉克军队手中夺下这个城镇还不到48小时，伊拉克飞机猛扑这个城镇，扔下了成罐的芥子毒气、神经毒气和氰化物。几个小时之中，有5000人死亡。

伊朗摄影师在袭击后的几个小时拍下了影片。孩子们衣服的

颜色仍然鲜艳，枯萎的草和叶子还是绿色的，一些人的脸上颜色如常，父亲们躺在门口，他们的手臂围绕着孩子们，母亲们脸朝下倒在河里，她们想要洗掉喉咙里的灼热。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针对人类的化学攻击。攻击结束后，伊拉克军队进入哈拉布贾，放火烧毁了整个镇子。

我停在郊外一堆很特别的强化钢筋和倒塌的屋顶旁边，在那底下很快出来两个兴高采烈的小孩和一位警觉的母亲，她正将洗好的衣物挂到一个悬空的屋顶和一个阳台之间形成的角上。走进去，在左边大约有75米长的碎石废墟，看不到一块完好无损的混凝土砖，而往右边走到主街上，是试图放火焚烧店铺的各种痕迹：倒塌的屋顶下面断折的柱子，其他的柱子都不见了，只留下裸露的钢筋支撑着屋顶；后墙上有巨大的炮弹壳大小的洞；街上是成堆的碎石，屋顶坠落其间。但在每一个地方，不管如何，都有一些家庭在废墟中维系生存。走上坑坑洼洼的街道，经过茶叶店和饲料店，我遇到一个男人在一个小图书馆里画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拿着水罐站在一条小溪边，旁边是一棵高高的、正在开花的树。房子在山脚下拔地而起，从山的轮廓我可以分辨出，这是已经消失的哈拉布贾的一幅图景。在另一条小巷，我发现了几个鞋匠，他们面无表情地转动白色的纱锭，用来缝制“克拉什”完美的白色上半部分。在制鞋匠的隔壁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管道商人，水龙头、接头、垫片一列列摆得整整齐齐；在他边上是一个木匠，在木屑堆中的一个座位上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哈拉布贾的市场里满是堆着黄豆和草莓的手推车。我看着他们，想知道他们的皮肤和细胞是否还保留有化学物质的任何记忆或痕迹。

我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引人注目的老师，她在回家的路

上，中午从她的小学回家吃午饭。我们并肩走过废墟，她说，是的，他就是死在这里；而那儿，在那堆东西下面，发现了她的尸体；还有那个地下室曾经是个茶室——她指着一堆废墟中间的黑洞——“自由斗士”在那里发现了50具尸体。“其中一个是我的妹妹。”

下午继续上课的时候，她带我去她的小学。在袭击中有多少孩子死去？她没有回答，而是走到黑板前，写下一个数字：198。

班上的孩子们从粗木板搭成的课桌上看着她：7岁大的孩子，辫子用头绳扎起来，有黑色的眼睛，双手捂脸咯咯地笑，热辣辣的阳光斜斜地从带栅栏的窗户透进来，照亮了她们的脸。我问，关于哈拉布贾，你教给她们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她说。

她拍了拍手，孩子们一窝蜂地涌出教室，在操场上和其他班级一起列队，高唱库尔德爱国歌曲，用他们最大的声音欢迎外国访问者，幼小而充满朝气的声音回荡在阳光下。他们围住我，靠近我，满满一操场。

最后，我驱车驶入镇后的群山，想要将哈拉布贾的尘土从我的肺里排除出去。我取道山脚下的一条路，然后发现自己与受难者的巨大墓地迎面相遇。他们被埋进巨大的、毫无个性的混凝土沉箱之中，俯瞰现在沉寂于热浪中的城市。我想起了巴尔扎尼在门口哭泣的寡妇们。贝杰特和塔哈脱下他们的鞋子，因为现在是日落时分，他们跪下，念诵祈祷词。他们祈祷的低语在我身后的空气中升腾，我坐下，看着下面萧条的城市。

“大屠杀”是个被一再滥用的词，有时被用来指向任何一种愤怒、任何一种暴力，甚至被用于没有死亡、只有羞辱和虐待发生的事件。但它确实是具有某种意义的词：计划灭绝一个民族，不需要其他理由，只因他们身为这个民族。在没有大屠杀的经历之前，一个民族可能不相信他们属于这个民族。在大屠杀之前，他们可能相信，是否属于一个民族或相信自己属于一个民族，是一件个人事务；大屠杀之后，这成了他们的宿命。

大屠杀和民族主义的历史相互缠结。是大屠杀让犹太人相信，甚至让非犹太世界相信，他们是一个除非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否则不会得到安全的民族。犹太人如此，库尔德人也如此。看看哈拉布贾，坐在那些无名墓地边上，就会明白，化学袭击将他们永远标记、成为一体，正如它毫无疑问、毫不含糊地揭示出，他们的邻居能够感觉什么、做什么。

所有库尔德领导人都告诉你，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穆耶丁那天晚上在阳台上说，这样一个目标对于我们太过庞大、太不可行、太不现实，它是一种只会带来疯狂和狂热的渴望。我们必须满足于在现有国家中的自治地位。我们必须咽下我们的渴望，与凡尔赛之后像一张罗网一样从天而降于这片土地的民族国家秩序和平相处。

但是在看完哈拉布贾之后，你会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情：自治绝不会有作用。它是通向终点的一个临时车站，但绝不会是道路的尽头。对于哈拉布贾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个已经了解大屠杀的民族，只有一件事情有用：建立一个自己的民族国家。

---

[1]　沙里佐（Shahrizor），库尔德斯坦东南部平原地带，介于苏莱曼尼亚和达尔班迪汗（Darbandikhan）之间。

游击队员

拉尼亚（Raniya）在下雨。我坐在宾馆的回廊下，雨水重重地敲打着白铁皮屋顶。戴黑色面纱的女人攥住自己的裙子，在瓢泼大雨中奔走寻找藏身之处。水从排水管奔涌而出，携带着大量污秽、垃圾和市场里的残留物。俄式茶壶冒着蒸汽，空气中有木炭在火盆中燃烧的刺鼻味道。宾馆厨师正在从一个羊羔——挂在我桌子旁边的一个钩子上——身上切割肉条。贝杰特和塔哈坐在我旁边，拉长了脸。他们在跟他们的"羊"生气。我准备离开他们的保护一天一夜，去访问山里面的一支游击队。我将投向另一个年轻男孩的保护，他名叫哈桑（Hassan），他开了一辆陆地巡洋舰过来，会带我穿过山口，去游击队的营地。我不仅仅是从一个军阀的保护之下转到另一个军阀的保护之下。从贝杰特的立场来看，我是要去访问敌人。因为我是要去访问库尔德工人党（PKK），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游击组织，他们利用库尔德领地的山地作为掩护，袭击越过边界的土耳其军队。贝杰特的库尔德民主党反对这些袭击，担心土耳其会以关闭边界、危及令这片领地得以生存的主要生命线来进行报复。1992年秋天，库尔德民主党的自由战士开展反对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的战争，阻止它们使用领地作为基地。然而现在，他们之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停火状态。得益于停火，我可以去访问我所知道——也存在争议——的最后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式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次访问是多么的冒失。我没有充分考虑到天气状况，现在它进行报复了。桥梁不见了——被冲走了——我们很快就在刚刚犁过的田地里迂回跋涉，寻找河流中低平、有石头的浅水处能让我们过河的地方。我们扎进了河里，轮胎的上沿

被淹没，挣扎着过了河。

哈桑18岁，嘴唇上方刚刚冒出第一抹胡子的细细胡茬。他说一口浓重的索拉尼方言，山地味儿如此重，我的翻译都没法听清他在说什么。但不管路如何崎岖艰难，他都笑得很欢快，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是一个真正的四驱车高手。四个小时的时间，他使出浑身解数，让这辆老爷车沿着泥泞、遍布车辙的狭窄道路前进，这条路不适合车子，更适合那些不断超越我们、驮着走私包裹的骡子。哈桑毫不慌乱地操纵车子沿着螺旋形的弯道往上爬，穿过冲刷着路面的瀑布，车轮加速、小心谨慎地穿过将道路冲垮了的泥石流和滑坡的岩石。我们经过被山洪袭击过的村庄，咆哮的黑褐色急流从山上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村民们徒劳地想用波纹铁管将水从他们的屋顶上导流下来。孩子们和牲口挤在门洞里，我们经过时，他们向哈桑挥手。四个小时后，哈桑停在一片营地，帐篷是用树枝和白色塑料板搭成的。走私贩子，他说，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巨大、温暖、干燥的帐篷，我们脱下鞋，经过一溜正在吃手抓米饭、满怀疑虑的人们，爬进我们的地方，有可口的热薄荷茶款待我们，我们喝着茶，听到雨水重重地敲打白塑料板的声音。这些走私者经营骡队，翻越陡峭的山口进入伊朗，那些山口在群山之上，离这里大约只有1公里远。在帐篷的一角，我看到成堆的伊朗人造黄油、食用油和糖。如果说这儿有伊朗海洛因，我并没有看到。哈桑低声告诉我，走私者和游击队相互合作。什么意思？我只能假设，走私者给游击队一部分利润，用钱或者其他什么，而游击队保护他们。

离走私者1公里远的地方，我们到达了游击队自己的营地，它设在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盆地中，一条汹涌的河流在谷底肆虐，流向山脊侧面，可以保护营地免遭空袭。山坡上到处点缀着暗褐

色、被雨水浸透的帐篷，有一座典型的库尔德式土屋，平顶上伸出一根无线电天线，盆地中央是一座两层楼的库尔德式房子，房前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玩耍。这座房子的楼上就是游击队指挥官的营房，我将睡在那里。楼下睡着有四口人的库尔德家庭，还有他们的山羊、绵羊和鸡。

我注视山坡，发现到处都是女人：她们排成队列，身穿战斗服，扛着长枪，沿羊肠小道向高处跑去；其他人从羊肠小道下来，然后一个一个消失在看上去是在山坡上开掘的巨大军用帐篷里；其他女战士头发盘在贝雷帽下面，在山顶上的堡垒里放哨。面露焦虑、说法语的“联络官”在我身边解释说：“我们正在举行妇女大会。”

他领我顺着羊肠小道去军用帐篷。帐篷里面，条形荧光灯挂在帐篷顶上——营地里一定有个发电机，但他们是怎么把它弄上来的呢？在朴素的白光下，大约有100位女性整齐地坐在粗糙的长凳上，分组围绕着一个主席台。红、黄、绿色——库尔德人的颜色——的旗帜挂在帐篷顶上，上面写着“阿波万岁，库尔德工人党万岁（Long Live Apo，Long Live the PKK）”。一个女人站在角上，正在发表平静但显然是批评性的长篇演讲，其他女人静静听着，其中有些人在做笔记。令人震惊的是她们都如此年轻：绝大多数只有十几岁，最年长的不到30岁，不苟言笑、热忱、年轻的面庞，有些人戴着无框眼镜，她们的头发盘在贝雷帽下面，或者扎成马尾辫。所有人都穿肥大、毫无体形可言的制服，是男人们穿剩下来的。卡拉什尼科夫倚在膝盖边上，或者放在长凳的角上，整体上带有热忱、青春专注的紧张气氛。

我的联络官悄声说，这是一个自我批评的议程。他和我是帐篷里仅有的男性。他说，最近的一些游击袭击由于战略战术的失

误而失败了，生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那就是妇女们正在讨论的议题。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一个站起来，进行简短发言，她们的头低着，声音谦恭而清醒，不讲究修辞，有控制，但从我听来，其中充满了悲伤甚至是痛苦的语调，那是信仰正受到剧烈审视的真正信徒的语调。

集会休息15分钟，女孩子们成双结对分开，卷起香烟上上下下漫步，胳膊挽着胳膊，低声轻语，抽着烟。我跟上她们，得以和一个叫米兰的女战士交谈。她比大多数人都要年长，大约25岁，褐色的头发刚刚好掖在那种猎鹿人式的军便帽下面，我记得在关于俄国内战中的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过这种帽子。她穿着战士的肥大裤子，一双彪马的训练鞋，她在军装夹克右胸的位置用红色的线整齐地绣着“阿波万岁”。阿波是阿波·奥贾兰 [1] ，她所在党的领导人。我问，你见过他吗？当然见过，她说，因为开心和窘迫而脸红了。她曾作为游击战士，在奥贾兰位于黎巴嫩贝卡谷地（Bekaa Valley）的营地受过训练。“在那里我学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军事战略和库尔德语。”

库尔德语？我极为惊讶。米兰微笑，沿着在山坡上挖掘出来、用粗糙的石头铺就的练兵场，沉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距离。她解释说：“你知道吗，我出生于澳大利亚，在墨尔本的郊区，真的。直到17岁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库尔德人。”她这样说了之后，我才注意到她的口音当中的澳大利亚味道。她再次道歉：“请原谅我的英语，我已经有四年没有说英语了。”

澳大利亚的郊区女孩是如何成为库尔德斯坦山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游击队员的呢？一定是有某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在这里发挥作用，它强大到足以将一种生活连根拔起。

“一开始，我问父母，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名字，米兰。他们告诉我这是库尔德语，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而他们不告诉我。幸运的是，党在墨尔本有联络人。”

我渐渐开始明白了：一个澳大利亚少女，生活在一个无根的、无过去的文化中，她突然发现自己拥有那种最为痛苦的民族归属，属于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

墨尔本不是一个做事业的地方。跟党走是一个墨尔本女孩可以做的最为激进的事情，那就是她这样做的原因。她突然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她很年轻：党的那种极端主义，加诸她身上的召唤所具有的激进本质，是如此不可抗拒，令她立即服从了。

找到库尔德工人党没几个月，她就已经将家庭抛在身后，生活在贝卡的兵营里了。当党认为她已经准备好的时候，当她终于会说她称为自己民族的语言的时候，他们鼓动她穿过边界，在山里的关口度过冬天，进行训练，准备行动。对于她内心所发生的化学反应，她只是说，当在这里、在群山之中的时候，她感觉到——此时她停顿了一下，望向山顶，寻找词汇——“贴近生命”。更多的沉默之后，她说：“在这里我活着。”

但我指着伊朗那边——越过我们脚下的河流只有1公里远的地方——说：“在那里也有很多的死亡。”伊朗人的炮兵阵地俯瞰着这个营地。她说：“但那就是为什么，生命在这里宝贵。那正是原因所在。我可能随时失去生命。”

凭着自己身上郊区人的那种笨拙，我坚持说：“但你们如何应对这里呢？生活如此艰难。”她停下来，用脚尖踢开一块山里

的石头。“是的，”她说，“这个冬天，我们的脚上只有这个。”我低头看着她的白色彪马训练鞋。我的联络官已经指给我看过一个蹒跚而行的年轻人，他的所有脚趾都被冻掉了。“有时候这儿的雪有两尺深，我常常生病，我的身体没有准备好。”她自责地说，似乎希望她可以抛弃澳大利亚所受的舒适教育，以及完全生活在电冰箱与阳光沙滩之中时悄悄占据内心的软弱。“很快，我就准备好去战斗了。”如果她的领导人下令，这个温和、脸颊柔美的女孩可以杀了我，也会杀了我。

我想听到令她转变的教化的动力是什么，所以我问她，是什么将库尔德工人党与其他库尔德党派在斗争中区别开来。“他们是部落式政党，与库尔德社会传统的封建和家族性质相妥协。我们是唯一的大众的政党。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社会的部族的、封建的、家长式性质。”

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年轻的女人加入吗？“女权主义是我们党的核心。我们想改变库尔德斯坦的女性状况。首先，我们要在党自身之内改变。然后我们要从外部改变，为了所有的库尔德女性。”她确实在用柔和、热情的句子说着这样的话，那些话似乎来自她体外，来自党的权威核心，来自所有那些在贝卡的密闭帐篷中度过的许多个小时、在粗糙打造的长凳上热情地写下的句子。

“他有听你说过话吗？”我突然问她，意思是指阿波，那个名字被她用红线挚爱地绣在自己胸前的领导人、大人物。“哦，是的，是的，他鼓励女性自己思考，大声地说出来，让她们的声音都被听到。”这话不是用一种强迫式或机械式的方式说出来的，而是带有一种热情的轻信。

但阿波说了很多东西，而他的思想之路是崎岖多变、不一致的。他在1984年开始武装斗争，进行袭击，不只是对准土耳其平民目标，也针对所谓的库尔德人合作者。然后，当甚至他的支持者都认为这些策略太过恐怖的时候，他摒弃了这些策略，命令他的游击队攻击军事目标而不是平民目标。一开始他对库尔德领地的创立充满敌意，然后他改变了想法，转而支持。有时他与伊拉克的库尔德团体和平相处，有时开战。人们不禁想知道，在米兰的头脑中，阿波的思想之路是否仍然运转流畅，抑或会有些小小的磕碰和疑问，深深地藏在她说话时流利地吐出的机械式咒语之中？但对她的内心投以疑问也许是浪费时间。阿波把他们从疑问中解脱出来，从追问自身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是这一点驱使她跟从阿波、绣上他的名字，而且像营地里的男男女女一样，在每一个帐篷的角落里犹如崇拜偶像般摆上他微笑的照片。米兰的事业完全在于放弃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分别。她如此紧密地拥抱一种归属，在像我这样的外部人看来，那些共享这种归属的人们看上去像是思想的奴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似乎终于得到了自由。那是当米兰微笑着跟我握手、奔回军用帐篷的时候，她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是，在这里她是真的快乐。

我很快发现，她并不是这里唯一从流亡或海外放逐中返回的人。我自己的“联络官”，一个更加温和、说话柔和、谦逊的年轻人，枪背在背上会局促不安的人，原来是出生于德国的库尔德外籍工人聚居区。他曾在西班牙和法国担任党的代表，从未在库尔德斯坦内部生活过。他的副联络官，一个喜欢说大话、更加开朗的人，原来是来自多特蒙德。后来，在光秃秃的矮墙砌成的宿舍里，我们坐在地上喝茶的时候，他们憧憬地谈论起海外流亡世界，以及在高高的群山之上他们感到多么的孤独。每个夜晚，他们拿出小小的索尼短波收音机，收听来自欧洲的遥远声音，尤其

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土耳其语电台。从米兰身上，我已经感受到一种事业是如何变成一种完全满足性的归属形式。

从这些男人身上，从他们有些害羞地问出的问题——我有没有去过多特蒙德，我有没有去过法兰克福的这家或那家库尔德餐馆——我感觉到，在这些高高的库尔德山坡上，民族归属成为一种崇高选择的监狱。

我们在一起喝了许多杯茶，随后在马毛垫上方吊着的酒精灯下，我问男人们，在革命中有没有可能坠入爱河。我明白，我触碰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这里是游击队营地，受军事纪律管束：这儿没有爱情的位置。婚姻和孩子是不可能的。“只要库尔德斯坦没有自由，我们就没有恋爱和结婚的自由。”我那说法语的联络官说道，脸上有一种忧郁的神情。（当我回去把这个言论告诉贝杰特的时候，他叹息着，摇了摇头。他已经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政治正确习以为常，没空多管。“一个男人告诉你，除非库尔德斯坦获得自由，他不会结婚，那只是因为他不想结婚。”）

他们突然站起来，告诉我是时候带我去见营地的指挥官了。我现在知道，他不是别人，正是阿波的弟弟奥斯曼（Osman）。我们沿着像蛇一样东弯西拐的羊肠小道，在黑暗中向下走。雨云已经消散，群山环绕的天空中星光闪闪。

领导人斜倚在一个马毛靠垫上，在他哥哥的画像下面吃晚餐。他在摆弄米饭，把米饭和馕泡在一起，无聊地用手把多余的米饭轻轻地弹回盘子里。他的腰带上有一把银色的大左轮手枪，在黑色皮夹克下面刚好能看见。跟他哥哥一样，他是个结实健壮的人，并不喜欢外国媒体。我坐下来之后，他对我咆哮说：“你们都叫我们恐怖分子。”他半皱眉头，半露微笑，重复说：“我们

为库尔德斯坦战斗，而你们叫我们恐怖分子。”这种交锋是一个游戏，它必须持续下去，直到领导人满意地解决了由谁来主导谈话这事。

我回答说：“我长途跋涉爬到山上，不是为了访问恐怖分子。”他咕哝了几声，把目光移开。他的人徘徊在门口，等着他发信号把盘子收走。他摇了摇手指，他们冲进来，把盘子打扫干净，领导人则擦掉他厚厚的黑胡子上的米饭。

我问他，奥贾兰家族为什么会加入“斗争”。他回答说，我们是穷人，土耳其人把我们看成垃圾，这就是原因。我的哥哥在学校里很聪明，他总是取得最好的成绩，他认识到我们必须斗争。“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他说话的时候向下看，单调、呆板地回复，这个不写字的弟弟突然谈起他聪明的大哥想出的那些东西。他说了很多，但我不再倾听，我看着他，这个懒惰、安逸的匪帮之王，然后对自己说，在他的动机里，有多少是民族主义，有多少是纯粹的匪徒性呢？看上去，显然对于他而言，结果的重要性远远低于手段。结果——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库尔德斯坦——最好留给他的哥哥，留给真正的信徒。他显然对手段更有兴趣。是枪炮，是AK-47为他说话，也只有枪炮和AK-47能跟他对话。

第二天早晨，枪炮开始说话了。我被带到下一个峡谷，沿着一条小道，穿过哨所和瞭望台，到另一个训练营，去看一场活生生的实弹训练。奥贾兰不在那里。指挥官是个幽默有趣的老狐狸，灰色头发，盘腿坐在美式军用帐篷的中间，手下的军官簇拥着，正在吃一盘炒薄荷叶加番茄。他命令一支部队攻击下面的一个堡垒，然后邀请我和他一起盘腿坐下来观看表演。在我身后的斜坡上，有数百名游击队员列队，沉默地看着我们。

当攻击开始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士兵非常年轻。下面的一块岩石后面，一枚火箭弹用肩扛发射轰击在对面山崖的玄武岩上，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只激起一片石屑。当机枪向在炮火下的方形堡垒上飘扬的白色旗帜开火时，我试图保持注意力。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攻击组成员开始悄悄推进，躲在岩石后面手脚并用匍匐前进，手里拿着卡拉什尼科夫或手枪。子弹或轻或重地击打在他们周围的泥土里，跳弹呜呜飞过，更多的炸弹爆炸后发出的轰鸣，在这个封闭的山谷空间里回响。攻击组的首领一会儿就到了堡垒的底部，我看到他高高地扔出一颗手榴弹，看到它在空中停顿、爆炸，散发出灰白色、不太真实的烟雾，好像电影中一样。攻击组首领抓住白色的旗帜，点燃草捆，扔进堡垒，宣布占领了它，我身后山上的游击队员们爆发出掌声和欢呼："领袖阿波！领袖阿波！"

后来，指挥官在阅兵场上将他们解散，他们围成半个圈跳舞，手挽着手高唱战争歌曲，穿着彪马的脚有节奏地在泥土中踏步，尘土飞扬，环绕着他们肥大的灰色裤子。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一切似曾相识的感觉。它不是越南丛林中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营地里的画面吗？不是跟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玻利维亚的群山之中一样吗？

爬到库尔德斯坦最高、最遥远的山峰，我得以发现一种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的20世纪民族主义的遗产：僵硬地根据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进行所谓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队，我从米兰那里听到的机械话语，在这种集体舞蹈中的狂热，以及最重要的，在全能领袖面前放弃自我。我曾经认为，"冷战"的终结已经标志着所有这一切的终结。但事实证明，它仍在库尔德斯坦的群山之中活得好好的。通过其反封建、反部族的意识形态和女性主义，它试

图进行现代化。

我离开营地，准备启程前往土耳其，然后回家。此时有两个想法浮上心头。第一，对于一个自由的库尔德斯坦应当是什么样子，在这些游击队员的观点和穆耶丁的观点之间，几乎没有可以妥协或者调和的空间。当民族主义的观点之间存在如此程度的矛盾时，通常会导致战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团结库尔德人方面，被证明并不比部族主义更为有效。事实上，在这库尔德的高山之上往下看，民族主义像是部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人们只能预测，库尔德人抗争中由于意义和方向分歧所导致的部族战争，在未来很长时间以内仍将继续。

第二个想法：既然库尔德工人党是一种土耳其人的运动，完全针对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南部对库尔德人家园的占领，那么这种特定的游击队运动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它们的对手土耳其军队的作风和残暴性。我知道自己之前在哪里见过奥贾兰弟弟腰带上的武器，那是一支土耳其军用左轮手枪。同样的装备，同样的残忍。民族主义运动和与他们作战的国家安全部队经常是处在同样的暴力文化中。敌人之间的相互模仿有时比兄弟还要接近。当我从库尔德人山顶上下来、与贝杰特和塔哈告别、再次穿过边界进入土耳其的时候，这就是我想要验证的假设。

---

[1] 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Öcalan，1948—），昵称阿波，库尔德工人党领袖、主要创始人。1978年奥贾兰创立库尔德工人党，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开始进行暴力活动，被西方国家视为恐怖组织。1999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关押至今。

和雪貂一起

费雷特（Feret）拥有一张热情、令人难忘的年轻面孔。他戴审讯者的面罩，肩头的手枪皮套上有一个“38”字样。他24岁，隶属于土耳其特种部队。我问他特种部队做什么的。他笑着说，告诉我是违反规定的。但今天他带我进入土耳其军方正在与“恐怖分子”——他用来指代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交战的山谷。他说美式英语：“恐怖分子绝对不可能赢。绝不可能。”

他出去安排护卫：一辆装甲车和两辆满载土耳其士兵的路虎，我告诉我的库尔德人司机，有一种小啮齿类动物，有尖利的门牙，伦敦东区的黑帮因为把这种动物放进敌人的裤子中而闻名。我的库尔德司机淡淡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对年轻的雪貂 [1] 来说，土耳其东南部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像北爱尔兰一样，整个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营地：直升机在头顶盘旋，F-16在扫射或者侦察，从库尔德村庄上空呼啸而过，在库尔德市镇中，每一个小餐馆里都有个拿对讲机的人。我已经被跟踪了许多天，他们藏在宾馆内庭院的柱子后面。当我坐车出去的时候，他们躲在一辆白色的小雷诺车里面紧跟，带着摄像机，记录下我看到了什么，跟谁说了话。

这儿所进行的反暴事业前景光明灿烂，对于聪明的少年，职业道路上不存在障碍：公民自由被永久性地搁置，你可以随意逮捕任何库尔德人麻烦制造者，你的上级中没有人关心你是如何从牢房里那些血淋淋的嫌犯身上得到情报的。当地确实有一些来自一家被称为《议程》（*Gundem*）的土耳其语报纸的新闻记者报道过所谓的人权虐待。但什么能阻止你把枪口也对准他们呢？报

道肮脏战争的记者已经有11人被枪杀。多一个几乎不会引起注意。

另一方面，外国记者需要特别对待。你知道，他们全都是伪君子，尤其是英国人。他们应当知道，与恐怖分子作战是件肮脏的事情，但他们来到这儿，告诉土耳其人要对库尔德人友善。他们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索求，要从大不列颠撕走一大块，但他们却来到土耳其，告诉我们要赋予库尔德人以“自治”。停止压迫？停止抓人？这足以让任何好雪貂感到恶心。

但现代的安全文化完全取决于良好的公共关系。所以雪貂说话小心翼翼。“你们想要一场好戏？我们就给你们好戏。”他说。毕竟，伊斯坦布尔想举办奥运会，土耳其想要被接纳。伊拉克和土耳其边境的安全主管不是说他要“人道的程序，像你们在欧洲所拥有的那种”吗？众所周知，欧洲的程序当然是人道的。在反暴力的事业中，那是一种良好的形式，告诉外国人你可以变得多么文明和人道。甚至雪貂也就此发表了一些评论。当我们沿着山路一路摇晃颠簸上行，经过部队的营地、兵营、机场和观察哨所，经过蒙着脸的库尔德村妇的时候，他承认他希望政府多花一点钱在道路上，少花一点在安保上。雪貂当然是正确的：我从未去过在雪貂上花这么多钱的国家。

车队最终抵达了他们认为安全的、可以让我去看的村庄。这里有大约100座贫穷的、单层平顶土砖房子，散布在一座参差耸立的悬崖之下。我发现在悬崖顶上有土耳其的望远镜一闪而过。在悬崖下面的村庄里，女人们将成串的羊粪摊在屋顶上晾干，充当生火的燃料。孩子、绵羊、鸡，都在房子之间盘绕而肮脏的小路上横冲直撞。

我看到了村子的警卫，土耳其军方为他们提供装备，出钱给他们，为村子提供保护。有人说警卫曾恐吓自己的同胞，在邻村犯下暴行，还将其栽赃给“恐怖分子”。雪貂知道我听过这些故事，所以我还没有发问之前，就给我看一沓厚厚的展示最近暴行的照片。那么多的鲜血成池，那么多在母亲身边死不瞑目的孩子，那么多脖颈被刺穿的老人，我甚至不愿去问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恐怖分子们”干的，还是雪貂们干的？谁也记不起来了，谁也不会关心。关键在于，恐吓生效了。恐吓是权力的制造物。恐怖分子说，让他们害怕你，人们就不会与警察合作；警察说，让他们害怕你，他们就不会与恐怖分子合作。于是不断继续，而这就是暴力不断升级的逻辑。

村里的孩子们围着陌生的外国人，一个穿光滑丝质套装、肩上扛着机枪的库尔德人，挥舞拳头，把孩子们赶走。小男孩们在他身后发出怪声，像是被殴打的狗和牛。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他是当地的村民警卫队队长。

他指着我身后的山顶说，这儿一直都不安全。在那座山上，有一个村子，全都是“他们”。村民警卫队晚上在路上不间断地埋伏警戒。学校的老师都被袭击吓跑了，所有孩子都不上学。他又一次向四面乱抓，用手掌抓住附近的一个男孩。穿破烂的乡下人服装的库尔德男人们聚在一起，他们耷拉着头，什么也没说。雪貂就在边上，从他审视的眼镜后面监视着。一个土耳其军方的摄影师正在拍摄每一个跟我说话的人。

我逃离开去，和村里的杂货商一起走上村里的一条小道，他是个红色脸庞的老人，穿库尔德传统的宽松裤子。我们一边走，他偷偷地跟我低声说话。他在恐怖分子和土耳其军队之间左右为难。“如果我们和军队合作，恐怖分子会杀了我们。如果我们和

恐怖分子合作，”他对着正靠近我们的雪貂做了个手势，“他会杀了我们。”

车队护送我离开的时候，雪貂用一种友善、好奇的声音问：“他说了什么？”我说：“他说军队干得很棒。”接下来的回家之路，我们穿过南部土耳其的监狱营，雪貂和我都沉默无语。

雪貂正在做的是阿塔图克的工作，共同努力维持现代土耳其国家的完整。当事关国家统一的时候，你不能妥协。不值得付出的东西毫无价值。拉起帽兜，遮住脸，把子弹推上膛，在夜里去打破库尔德人的门，把他们从床上拉出来，把子弹射入他们的大脑。肮脏战争是雪貂们的天堂，但同时也是阿波·奥贾兰和他弟弟的天堂。民族主义给双方的残忍都提供了借口：一方以自由抗争的名义杀死合作者，另一方以民族国家安全的名义杀死同情者。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循环？采用足够的恐怖，我们总是能制止恐怖主义。但你能制止一个民族相信这里是他们的家园吗？你能制止人民拥有自己国家的想法吗？这里的库尔德人知道在隔壁有一小片领地，在那里库尔德人可以成为库尔德人，他们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微笑、歌唱，用自己的语言开玩笑。你可以走近外国人，和他交谈。在你可以宣称自己所有的地方，没有什么需要害怕。

在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这个边境地区，我终于了解了拥有自己地方的民族和没有自己地方的民族之间人性的差异。在这边，人们的内心和思想是开放的；在另一边，人们的心脏随着恐惧而跳动。在这边，他们呼喊“尼好先森”表示敬意；在另一边，他们对于外国人的接触退缩不前，担心惹上麻烦。无国可归是一

种意识的状态，它是无家可归的近亲。这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理解：只有当拥有自己的地方之时，一个民族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类、完整的自己。

人们对它的渴望太过强烈，恐怖无法阻止。我在军营跟雪貂告别，再次回到山口，摆脱我的盯梢尾巴，最后在薄暮中踏上一条山路。我的路被一大群绵羊挡住了。一个牧羊人穿过石头丛生的牧场走向我。他是个被太阳晒黑的老人，穿两块缝在一起、粗糙而未经处理的兽皮，像是一位先知勇士的盔甲。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大步走近我，用牧羊鞭把羊推到边上。我问他这是哪里，因为我已经在这些高山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他似乎很惊讶，好像我从未知晓世间事物一般。他指着环绕我们周围、沐浴在银光之中被烧过的光秃秃群山，然后用一种既温和又坚定的声音说："这里是库尔德斯坦。"

---

[1] 雪貂英文为ferret，与费雷特近似，作者用以指代费雷特及其所属的特种部队。

6　北爱尔兰



图31　1996年曼彻斯特汽车炸弹爆炸案现场，该事件由爱尔兰共和军策划实施



图32　血色星期五（Bloody Friday），1972年7月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发生的一系列爆炸，由爱尔兰共和军实施，造成一百多人死伤



图33　1970年，贝尔法斯特香基尔道，忠诚派在一处建筑物的墙壁上涂鸦“决不投降”



图34　1972年1月30日，北爱尔兰伦敦德里“血色星期天”，英国士兵朝北爱天主教抗议者开枪，射杀二十余人，随后爱尔兰共和军宣称“将杀死尽可能多的英国士兵”



图35　鲍比·山德斯的纪念壁画，贝尔法斯特福斯路（Falls Road）。山德斯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1981年在狱中领导共和军囚犯绝食而死



图36　阿尔斯特奥兰治党人一年一度的奥兰治游行

镜子，镜子

肉食店和彩票店的百叶窗拉了下来，人群沉默地聚集在人行道上。远处，从香基尔道[1]拥挤的街道上，传来了风笛的乐声和脚步声。一辆平板卡车首先出现，载有花圈，用精心挑选的红色、白色和蓝色的花朵拼成阿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 Force）的首字母；然后是载有鲜花覆盖的棺材的灵车，有一群沉默的军人紧随其后；他们大概有两百多人，穿大垫肩、双排扣的套装西服，白色衬衣，黑色领结。他们扭头扫视周围的人群的时候，墨镜闪闪发光。当他们看见摄像机的时候，一队人马拨开人群，靠过去传话："现在不要拍摄，别自作聪明。"

香基尔人正在向赫比·麦卡勒姆致以最后的敬意。在新教徒的一次游行中，他一直用一把手枪和一枚手榴弹为游行提供保护。警察试图改变游行路线，让他们远离天主教聚居的阿多恩（Ardoyne）。在忠诚派[2]和警察之间，混战爆发了。有些人说手榴弹是扔向天主教徒的，其他人说是扔给警察的，但最终承受爆炸的全部力量的人，是29岁的布莱恩·"赫比"·麦卡勒姆（Brian'Herbie'McCallum），两个孩子的父亲，朋友眼中的民兵英雄，敌人眼中的新教徒恐怖分子。

坟墓边上，在来复枪对空中射击致敬之前，赫比·麦卡勒姆的一位指挥官发表了演讲，他说：

支持妥协；在面对背叛时保持沉默，不为所动；任我们的人民、文化和历史耻辱地遭受诋毁；屈服于不过是实用主义者的荒谬想法——怯懦。志愿者布莱恩·"赫比"·麦卡勒姆和许许多多阿尔斯特志愿者做出了最终的牺牲，证明这个民族将得以捍卫。



北爱尔兰地区示意图

同一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正驾车在安特里姆道 [3] 上，想着这条路看上去多么像北伦敦我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道。路的两边同样排列着砖砌房子，凸窗下面坐落有修剪整齐的方形树篱和玫瑰花丛。一切都是熟悉的英国式的，但在路中间燃烧的这个巴士是怎么回事？在距离它30英尺 [4] 远的地方，我跳下了车，我前面有一个消防员正在向火跑去，这时一记爆炸将他抛在地上。我再次抬头的时候，这个消防员挣扎着想站起来，巴士燃烧得更为猛烈了。

我驾车闯入了一场贝尔法斯特 [5] 的巴士劫持事件。我到来

之前一分钟，一个持枪的男子拦在路上，命令司机和乘客下车，然后扔了一颗汽油弹进去。持枪男子有可能正在看着，等着袭击警察。灰色的装甲路虎车已经封锁了这个路段，穿防弹衣的警官在墙后面占好了位置。这条道路是通向香基尔的，从这一事实来判断，持枪男子是一名忠诚派。

孩子们很快聚集起来，围着消防水龙头泼水玩，而母亲们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穿着围裙，观看巴士被烧成一个骨架。一位女子靠近过来，说：“你可别认为这里一直都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伟大的小城市，不要产生错误的想法。”

我不想有什么错误的想法，但在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行程中，我又遇到了两起袭击事件，厢式送货车在住宅区街道中间任意燃烧，警察的狙击手在郊区花园里防卫。晚上，除了英国城市通常有的声音之外，我可以听到自动武器开火时砰砰啪啪的声音。

赫比·麦克勒姆葬礼两天之后，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忠诚派暴动。40辆巴士和小轿车被劫持、烧毁；有28起针对警察的枪击事件，9起燃烧弹袭击；当消防车到达多尼盖尔街（Donegal Road）地区准备扑灭燃烧轿车的时候，消防车自己也被劫持，消防队员被赶下来，车子被纵火焚烧。警察调动拉斯库尔、伍德威尔、香基尔、海菲尔德的警力，而老虎湾地区也遭到袭击。警方相信暴动是为了展示力量，是由那200名戴墨镜跟随赫比·麦卡勒姆的棺材行走在香基尔的沉默年轻人所策划。

阿尔斯特是个结束我的旅程的好地方，因为它似乎重复着那

么多我在旅程中已经见过的东西：民兵组织，犹如在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和库尔德斯坦；种族狂热，犹如在克罗地亚；雄性暴力崇拜，犹如德国的光头党；民族国家安全，犹如土耳其。直升机不断地在头顶盘旋，路虎和装甲运兵车蹲守在每一个主要路口，戴头盔的男人在他们的枪口瞄准器中注视着你。

像绝大多数外来者一样，我曾把这些问题视作向部族过往的一种倒退。现在，在1993年，北爱尔兰看上去有可以预见的潜在未来。在欧洲，没有其他地方像贝尔法斯特那样承载着如此深重的种族分歧。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和平墙原本是防止同一街道的人们相互扔燃烧弹和谋杀，现在像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一样成了永久设施，有些地方高达20英尺，将劳工阶级的贝尔法斯特一分为二。

种族分隔确实减少了死亡统计数字。在70年代中期，每年有250—450人死亡。现在这个数字在100以下。同时，社区的分离正在加剧。60%的人口现在居住在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比例超过90%的地区。

分离以微分子模式加剧：一个轮胎被划破了，一个孩子被殴打了，一个信箱里被倒进了汽油，是这一方或是另一方干的，于是又一个家庭决定选择统计数字显示安全的地方。贝尔法斯特喜欢谈论“种族清洗”，但微分子式的小打小闹无法和波斯尼亚的屠杀相提并论。如果萨拉热窝有一天看上去像是贝尔法斯特，它会觉得自己幸运至极。

跟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一样，在北爱尔兰，种族、宗教和政治被如此彻底地熔铸在身份之中，个人如果想要挣脱它们的掌握，会被视为一种挑衅。在这边，一生从未去过教堂

的人们生活在新教徒的标签之下；在另一边，从不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尔兰，但恰巧是天主教徒的人们，被彻底地烙上了“民族主义者”的标签。

这些标签将每一个人陷于分裂之中，一种不可再简化的种族身份的分裂。然而，北爱尔兰的一切不是一场种族战争，不比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或乌克兰—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更具种族性。在所有这三个例子中，民族之间本质接近，说同样的或者相近的语言，共享同样的生活方式，在宗教上有差异但似乎没有人真正地实践这种差异，他们被一个简单的事实区分开来：一方曾经统治过另一方。是对过去被统治的记忆，或是对未来被统治的恐惧，而不是差异自身，将冲突变成一个无法打破的政治暴力之无底旋涡。

在阿尔斯特，我试图了解，当英国性（Britishness）被放置在一场肮脏战争的讯问台上时，它呈现何种样貌，令人感觉如何。在英国本土，英国性是一个休闲益智的游戏、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在阿尔斯特，它可能攸关生死性命。我想，忠诚主义（Loyalism）可以充当一面镜子，让我看到如果事关其民族的生死，英国性会是什么样子。我选择在7月访问，是因为忠诚主义的盛大节日——巡游季——即将开始。但在赫比·麦卡勒姆的葬礼之后，我已经不确定忠诚主义的镜子揭示的是什么。现在，新教徒民兵组织在北爱尔兰杀的人比爱尔兰共和军杀的还多。他们的受害者范围从无辜的天主教徒到英国士兵和警察成员。这是一种与英国作战的英国性，一种向王冠和阿玛利特[6]长枪宣誓效忠的英国性。

英国是这个纷乱世界中一个安静的岛屿，这种幻觉在贝尔法斯特的街头一天也无法存活。事实上，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自由民主国家，大不列颠因政治暴力导致的死亡都要多得多。自从1969年以来，发生了3000起政治谋杀，超过5万人受重伤。在大不列颠，按人均计算，在政治谋杀中死亡的人数超过印度、尼日利亚、以色列、斯里兰卡或阿根廷，而所有这些国家都被英国人认为比自己更为暴力。

这种暴力的程度和集中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秘之处。正是依其本性，民族主义将民族之间的斗争定义成为荣誉、身份和灵魂而进行的斗争。当赌注被拔得如此之高的时候，冲突很快就缩减成一种零和游戏。一方的胜利必定意味着完全击败另一方。当赌注看上去涉及自身生存时，结果就是暴力。北爱尔兰就是这样的情况。两个民族国家都对这片区域提出主权。90万新教徒或新教徒的后裔希望留在英国。60万天主教徒或天主教徒的后裔大都——但不是全部——希望成为爱尔兰人。既然要满足一方的愿望只能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结果是无止境的冲突就不会令人惊讶了。

比暴力的程度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本土继续花钱买单的意愿。一个相对贫穷的自由民主政体一年花费30亿英镑、部署2万名士兵来支持当地的警察力量作战，这可以起到遏制作用，但无法取胜。

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国家的领土统一及其权力的合法性都与之生死攸关的话，如此的投入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可能期望这样的事业会激发最深沉的民族主义情感，然而，支撑英国（在北爱）之存在的似乎是令人厌倦的跨党派共识：恐怖必须被视作是不可以做交易的，部队不能撤回以免发生内战。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北爱尔兰事业是捍卫联合王国，那么阿尔斯特已经不被看作不列颠本土的一部分。帝国的代理领事——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管理一切事物，从与都柏林谈判到分配国民住宅。货币是英镑，但北爱尔兰的银行票据在英国本土不是可交易的合法清偿方式，英国的各政党不会为这里的选票竞争。经历了25年威斯敏斯特 [7] 的直接统治之后，当地的民主几乎消除殆尽。阿尔斯特明白，它已经处于半分离状态。

忠诚派痛苦地注意到当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 [8] 的“英国主权领土”时喷薄而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对阿尔斯特的冷漠之间的一种奇特差异。如果可能的话，英国本土会放弃阿尔斯特。民意调查对于下述选择的支持度极高：对将英国的主权移交给北爱尔兰施加限制，或是与爱尔兰共享主权。

甚至英国对阿尔斯特的承诺也受到条款的阻碍。自从1985年的《英爱协议》之后，英国只承诺，只有当大多数民众还愿意，它才会留在北爱尔兰。因此，这个地区只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拥有受保护的分离权利。英国政府越来越将自己塑造成“中立的”、在一个希望留在英国的群体和另一个希望成为爱尔兰人的群体之间的和平维持者形象，忠诚派对此极为愤慨。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北爱尔兰事业是捍卫联合王国，那么它是一个几乎没有打动英国人之内心的事业。然而这是矛盾的，英国的民族主义一直具有公民多样性：一种对国家机制——王室、议会、法治、联合王国自身——的依附，而非对一个民族的依附。然而像加拿大、印度、比利时和其他多种族国家所发现的，对国家的依附可能会比对构成国家之民族的依附要弱。毕竟，联合王国是宪法的创造物，谁会对宪法的创造物产生强烈的感情呢？

种族民族主义将其自身附着于对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捍卫，这些在经历重新勾画的联合之后仍可以存活下来。英国可以割让北爱尔兰，在本土很少有人会感到羞辱刺痛或受懊悔折磨。他们是否应该这样做是另一个问题。但就英国而言，这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已经失去了曾经勇于捍卫阿尔斯特的民族主义冲动吗，还是从未将阿尔斯特人放在第一位呢？

英格兰人总是拿他们自己的宽容温和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幻觉做比较，用来作为他们自己身份的试金石。居住在岛上，对其他容易激动的民族实行帝国权威统治，以拥有最古老而且连续存在至今的民族国家而自豪，这些让英格兰人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认为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免疫。一种反讽的、自我贬抑的民族性格仍旧重视其官僚阶层的情绪控制，这种性格要求自己将民族主义激情的烈酒拒之门外。

休·塞顿·沃特森（Hugh Seton Watson）是一位伟大的研究东欧民族主义的英国历史学家，他确信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不存在民族主义这样的野兽。他相信，一个从未被其他人征服过、侵略过或统治过的民族，不可能是民族主义的。“英格兰民族主义从未存在过，因为既不存在当作一种信条的需要，也没有为独立而斗争的需要。”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是有可能的，威尔士的民族主义也是可能的，但英格兰的民族主义绝无可能。

1707年之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室结合，一种英国民族身份被塑造出来，让英国人得以发展他们独特的双重归属：对他们原来的民族，以及对他们的民族国家和帝国。作为一个起始就是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而言，英国可能是第一个将爱国主义指

向帝国而不是指向构成帝国之民族的国家。在其帝国的全盛期，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核心形象是不列颠尼亚[9]，大海的统治者。

帝国主义是这种一直存在的英国民族主义的形式和体现，而英国的殖民地民族从未对其主人这种不可救药的自尊有过多怀疑。然而，主人自己相信，他们的爱国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这种将民族主义视为病态、只会感染外国人的观点，为数百年来的大英帝国统治提供了基本准则。法律中的种族因素越少，意味着将种族解放出来，更少受部族狂热的影响，并且教给他们英格兰种族的公民脾性。即使事实证明殖民主义远未能消灭对种族的忠诚，而且实际上有助于使种族团结起来形成民族意识，英国人仍然确信，他们自己是一个超越于其他民族的部族情感的民族。用那句著名的话来说，他们不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10]获得了帝国吗？他们不是以一种发派的方式将帝国拱手相让、从而证明自己没有被民族主义的野心控制吗？200年来，帝国主义可能一直是英国性的表面面目，但按照它自己的想法，帝国主义是一种不偏不倚的独特形式，一种勤勉而生、自愿放弃的“负担”。

随着英国适应了一个新的、优雅教养相对衰减的后帝国主义时代，它可以找到各种理由，因为不受庸俗的民族自尊诱惑而褒奖自己。对于精心打造一种后帝国主义的民族身份，美国人尖锐刺耳的爱国主义自信是个完美的陪衬，这种民族身份将任何形式的英国民族自尊都看作喜剧表演。

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冷战”也有效地压制了民族的自我界定。由于一致认为有必要展现统一战线以对抗苏联的威胁，西欧国家正常的民族自我肯定和相互竞争被搁置了50年。

同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相对繁荣侵蚀了英国的地方主义，开始弱化英国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和不可救药的独特性的信心。新到来的黑人和亚洲人口，仅其存在本身已开始暴露出集体归属的象征是多么的白人化、帝国化。古老的民族礼制开始面对新的观众上演，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和场景两者都必须改变。甚至君主政体也不再是英国自己的：它变成了整个星球的童话般的家族罗曼司。

在去殖民化、移民和优雅的经济衰减之外，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民族认同，它欣赏和赞美英国，准确地说是因为它本质上是后民族主义的，因为它加诸个体之上的要求是温和的、灵活的，足以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做自己的英国人。

我1978年从加拿大来到英国。我更喜欢人们认为在衰退的英国，它相对摆脱了那些民族的地方主义——将他们自己视为世界中心的地方主义。它不像美国那样妄自尊大，不像德国那样自我满足，不像法国那样自我封闭。它处在艰难之中，这让它成为一个有趣的居住之地。

我既不喜欢也不相信外界认为它国势日衰的论调。它最触动我的，是一种被压抑的帝国怀旧之情。一切被看作衰落和腐烂的标志——失去帝国，来自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新到人口，惨痛的经济重建——似乎是康复而不是腐烂的迹象。像欧洲任何国家一样，战后英国被迫急剧改变，这种变化没有导致分崩离析，没有废弃其自由民主政体的功能。

但随着在这里住的时间日久，我慢慢认识到，在英国，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族、后民族的世界主义的空间比我想象的要狭窄。那些为这种世界主义身份代言的人，仍僵持在与其他观念的

人们的斗争中，那些人们想象英国是自己的，寻求避免欧洲入侵的安全保障，按照君主政体和议会主权界定自身。这是关于英国在欧洲之地位的三十年战争的核心原因，只有傻子才会认为历史站在世界主义这边。

英国抗拒欧洲的程度让我怀疑，我被英国人将自己刻画为超越欧洲大陆低级民族主义情感的形象所蒙骗了。这只不过是又一个英国式的矫揉造作。事实上，英国是所有民族中民族主义最强烈的。现代民族主义确实是英格兰人的发明创造。

“民族”这个概念获得其现代意义正是在英格兰的新教革命期间。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下的都铎王朝以“英格兰民族”为名领导了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反抗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堂。同时，都铎王朝开始征服天主教的爱尔兰。正是从其民族体的一开始，英格兰性（Englishness）被自相矛盾地定义为与欧洲大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爱尔兰陷入难解难分之斗争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民族的信条。从16世纪50年代的玛丽迫害[11] 到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12]，再到查尔斯·斯图亚特[13] 在内战中被处死，英格兰民族通过反抗海外天主教入侵者和国内的天主教暴君来界定自己。

在英格兰身份的形成过程中，转折点之一是在1685年，天主教徒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登上王座，开始挑战议会的权威，迫害新教信仰。1688年，全国起义，呼吁传位给荷兰统治者、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到达英格兰，赶走了詹姆斯，建立议会主权，树立了新教的至高地位。

詹姆斯退回其在爱尔兰的天主教领地，开始重新征服爱尔兰，作为进攻英国的前哨。同时，他的盟友和庇护者，法兰西的

路易十四（Louis XIV）入侵新教的荷兰。新教欧洲的命运悬于一线。除了信仰新教的北部，整个爱尔兰很快被詹姆斯控制。1689年，詹姆斯二世党人（the Jacobite）的军队围困伦敦德里（Londonderry），该城坚守了105天，为奥兰治的威廉登陆并进而重新征服爱尔兰赢得时间。1690年6月，奥兰治的威廉亲自在卡里克弗格斯（Carrickfergus）登陆。在1690年7月12日的伯恩（Boyne）之战中，他决定性地击败了天主教护卫者。

奥兰治的威廉的胜利，与光荣革命、开辟议会主权的帝国盛世、宗教宽容和立宪君主制一起成为英国神话。在阿尔斯特，威廉的胜利成为种族优越性的奠基神话。对于阿尔斯特人，伯恩之战正如塞尔维亚人的科索沃之战：这是一个弱小民族与不共戴天的仇敌作战、为整个欧洲捍卫了基督教世界的时刻（尽管新教徒在伯恩取胜，而塞尔维亚人失去了科索沃，但两种文化都将他们自己视为其信仰的英勇无畏、受到误解的捍卫者）。阿尔斯特人得到的回报，如其所见，是他们对天主教爱尔兰人的永久优势地位，他们现在永远将爱尔兰天主教徒视为反对英国王室的潜在叛乱者。

至少从1688年到1912年，阿尔斯特新教徒相信他们的奠基神话也是英国整个国家的奠基神话：击败詹姆斯国王，确立新教徒在爱尔兰的优势地位和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然而并非如此。爱尔兰被证明是英国国家——以及民族——建构中的最大的失败。新教主义在英国认同中的核心地位使它不可能成功地将天主教的爱尔兰吸收、融入联合王国。1912年，当英国承认爱尔兰自治时，阿尔斯特人在爱德华·卡尔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率领下，愤怒地起来反抗，他们认为，作为王室最忠诚的追随者，得到的回报却是对英国性自身最基本要素即其新教核心的背叛。

英国没有将阿尔斯特看作自己的基本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是英国认识到他们的民族建构在爱尔兰遭遇了最大失败。这些麻烦强化了英国人意识中的一种认定：毕竟，阿尔斯特是充满矛盾的、顽固的他者，即爱尔兰人。

自从1920年爱尔兰独立之后，天主教的爱尔兰不再是英国界定其自身是谁的一面镜子，爱尔兰和英国不再是兄弟式的敌人。新教曾经是将英国与爱尔兰以及天主教欧洲区分开来的试金石，现在，在一个只有15%的人口将自己当作教堂常客的世俗化国家中，它成了一个苟延残喘的自我界定要素。在信仰新教的阿尔斯特，情况不是这样，那里65%的人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他们在英国人当中独一无二，仍然与几百年来定义英国性的“他者”直面相对。毫不奇怪，在不列颠群岛，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最强烈的英国民族主义；毫不奇怪，一次阿尔斯特之旅就是穿越历史各时代层级的旅行，在此历史时期，英国本土与它曾经拥有的英国性分离了。

---

[1] 香基尔道（Shankill Road），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的一条主要道路，居民主要是亲英国政府的劳工阶层。

[2] 忠诚派（Loyalist），或译亲英派、保王党，指北爱尔兰忠诚于英国政府和王室的新教徒群体。

[3] 安特里姆道（Antrim Road），贝尔法斯特主要街道之一，因历史上北爱各武装组织多次在这条道路上发动袭击而闻名于世。

[4] 不到10米。——编者注

[5] 贝尔法斯特（Belfast），北爱尔兰首府、政治文化中心，是北爱最大工业城市及最大海港。

[6] 阿玛利特（Armalite），美国军火制造商，所生产的AR长枪在北爱冲突各方均得到广泛使用。

[7]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议会所在地。

[8]　福克兰群岛（the　Falklands），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西班牙语：Islas Malvinas）。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在此爆发战争，英国最终取胜，胜利激发了英国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并帮助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赢得1983年大选。

[9] 不列颠尼亚（Britannia）女神，英国的象征和化身，其形象通常是身披盔甲，手持三叉戟和盾。

[10] “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为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其1883年的著作《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中的著名论述：我们似乎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征服了半个世界。

[11]　玛丽迫害（Marian　persecution），玛丽一世（英格兰女王，1553—1558年在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其父亲亨利八世信奉新教，她登基之后试图复辟天主教，残酷迫害新教徒，约有300多人被烧死。

[12] 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1588年，西班牙派出无敌舰队，意图征服英国，在格瑞弗兰海战中被英国击败，西班牙国势由此转衰，英格兰崛起为海上第一强国。

[13] 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即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汤米·多伊尔

它古老而美丽，它的色彩令人愉悦

经历了德里（Derry）、奥格里姆、恩尼斯基林和伯恩，它已然陈旧

在那流逝的昔日时光，我年轻的父亲曾身披它

所以12号那天，我总是披着它，我父亲披过的肩带

汤米·多伊尔（Tommy Doyle）披着他的奥兰治党人（Orangeman）肩带，在战争纪念碑（the Cenotaph）前面来回踱步，等待索姆[1]纪念仪式开始。汤米告诉我，贝尔法斯特战争纪念碑正是大战之后帝国建立的第一个纪念碑。它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的阴影之下，市政厅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建筑物，是在贝尔法斯特还是大英帝国的亚麻和造船之都的时候建立的。纪念碑旁边是一尊达弗林和阿瓦侯爵的雕像，他曾担任加拿大总督、印度总督，附带还有两个低着头的雕像，一个是包头巾的锡克人，另一个是加拿大毛皮猎人，用以纪念一个阿尔斯特人的骄傲，所以铭文写着纪念“一个伟大的爱尔兰人”。

汤米，一个整洁的74岁老人，有明亮的蓝色眼睛。他属于后隔离、后帝国时代，在那时没有阿尔斯特人会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汤米是著名的忠诚主义人士：爱尔兰副总会长、贝尔法斯特区第二分会会长，虔诚的教徒，禁酒主义者。他终生的工作都是在柜台后面当一名五金批发商，但不是他的工作而是奥兰治主义构成了他的生活。在汤米的身体里面并没有狂热的基因。他按照教义要求的去做，即憎恨天主教教义的罪恶，而不是憎恨被天主

教罪人所迷惑的穷人。

1977年的一个早晨，汤米的信箱中收到了一个“小小的棕色包裹”，一开始他以为可能是个邮件炸弹。他小心翼翼地划开封印，检查里面是不是有看上去可疑的电线，一封来自女王陛下的漂亮信件滑了出来，与之一起的还有一枚闪亮的银禧纪念勋章[2]。在隆重的场合他会佩戴勋章，把它别在他的奥兰治肩带上。

汤米还打着爱德华·卡尔森爵士领结，上面印着“决不投降”。爱德华·卡尔森勋爵领导了1912年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运动，帮助动员和武装当时的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用来保卫阿尔斯特、反对自治。战争[3]爆发之后，这支部队志愿保卫帝国，他们作为第36阿尔斯特师前往索姆河赴死。1916年7月，在两天的战斗中，有5500名阿尔斯特师的士兵死伤。正如加里波利[4]属于澳大利亚人，维米岭[5]属于加拿大人，索姆河是属于阿尔斯特人的。但加里波利和维米岭的浴血牺牲完成了两个年轻殖民地主权的民族解放，而索姆河的神话让阿尔斯特人陷入它最初的神话——被背叛的忠诚主义——之中停滞不前。索姆河之战四年后，归来的阿尔斯特志愿军发现他们的奉献换来的是分离和爱尔兰自由国家的出现。

阿尔斯特忠诚主义惨痛的矛盾纠结全都凝缩在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故事之中。一支民兵组织因爱尔兰自治而站出来与英国人战斗，他们曾在索姆河为捍卫帝国而战斗、牺牲，却因分离而失去爱尔兰。20世纪60年代，阿尔斯特的军事传统复兴了，他们承继旧有的名称，再一次与英国的背叛抗争。

汤米余生剩下的事业是在法国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1916

年7月死去的阿尔斯特奥兰治党人。他已经让人设计好了纪念碑，由全世界的各奥兰治分会（Orange Lodges）掏钱，很快他就会前往法国北部的蒂耶普瓦勒森林（Thiepval Wood），在那儿的一片田野上看到自己的梦想实现。他成长于贝尔法斯特大街上的劳工阶层中间，在那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房子里有儿子或丈夫再也不曾归来的记忆。他眼中含泪，叙说16岁的少年死在战场上，他们的出生证书伪造了年龄，让他们有服役的资格。看上去，他真的记挂着那失去的一代人，在本来阳光灿烂的天气中，如果还有什么苦痛的话，那就是怀疑英国记住他们的执着程度不到他的一半。

但是当听见管乐队沿着大道走来时，他又变得开朗了；他看到同胞们从市里的住处向纪念碑前进，戴着他们的圆顶礼帽，哔叽西服上装饰有白色的袖口，有些人带着卷好的雨伞，其他人佩剑，还有一些人“披挂着”颜色——联合杰克[6]旗的颜色和阿尔斯特旗的颜色，在圣帕特里克十字架的中间是血红的手[7]。花圈放好了，《最后的岗位》（Last Post）已经奏响，彩色旗帜放低了，一百个上了年纪、满面忧愁的男人用颤抖的声音唱起阿尔斯特的赞美诗：“上帝是吾千年保障。”

奥兰治乐队走远之后，汤米带我去奥兰治中心总会，山墙上的字显示，它建于1883年，字的上方就是两面联合杰克旗，还有奥兰治的威廉骑在一匹跃起的马上的雕像。正面墙上覆盖着钢丝网，溅落有白色的油漆，这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一辆经过的小汽车上扔出的油漆炸弹造成的。总会是一个褪色的英式堡垒，像个坟墓一样黑暗，因为窗户都被用钢化防弹百叶窗密封了。汤米审视着褪色的、从顶部剥落的织锦墙纸，历届和现任总会长那落满灰尘的肖像，大约制于1953年、褪色的伊丽莎白女王铜版

像，以及纪念“被阿尔斯特的敌人”杀死的奥兰治党人的黄铜牌匾，他承认：“我们需要在这儿花些钱。”汤米带我去内部的密室，一间会议室，在那儿，每周一的晚上，他坐在长桌一端的雕花木头椅子上，主持总会的会议。

当我们谈到忠诚派自身的时候，汤米的话语开始变得像一个梦游者，他从无意识的内心深处拽出完美组织的句子。他说，他是忠诚的，“忠诚于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国王在1690年7月的伯恩之战击败詹姆斯国王的天主教军队时所建立和确认的宗教和公民权利”。我评论说，这似乎并不是英国人所忠诚的对象，他悲哀地耸耸肩，承认可能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支持照片顶端的女王。”

对于汤米而言，身为英国人的意义，从根本上意味着做一个新教徒。两者不可区分，在这两者和南方的“神权政治”（theocratic）国家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奥兰治主义是他的生命，因为他的两种忠诚——对王室的忠诚和对宗教的忠诚——都统一在奥兰治的信条之中，是它让汤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正在做上帝的工作。但它也意味着他是一个无法改变和学习的人，他就是他自己。“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说，“如果他们把圣帕特里克十字从联合杰克旗上拿下来，旗帜上不会剩下什么，不是吗？”

我问汤米，当天晚上他是否参加奥兰治舞会（Orange Ball）。汤米脸红了，说他要回家。汤米是一个真正的奥兰治传统的绝对戒酒者，但他承认戒酒是一个已经过时的理念。但是，你仍然会坚持自己的信仰。他明天要去教堂，没有时间饮酒作乐。“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他说，眨了眨眼，挥手告别。

到了楼上的舞厅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汤米会离开。他不会喜欢在用联合杰克旗装饰的舞台上演奏的乡村和西部音乐。他不会喜欢从泵里流出来的啤酒，或是男人女人在一起亲密跳舞的方式。他不会喜欢一个醉酒的人试图把我赶走时所使用的语言。“你他妈的在这儿干什么？出去，滚出去！”酒吧服务生把他从我身边拉开，而其他一些中年妇女甚至把我往舞厅地上摁，这个地方有一种塞尔维亚式的狂热和仇恨的气氛。汤米可能会跟我一样，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开始笼罩在整个场景里酒醉的绝望感到尴尬，这些上帝钟爱的奥兰治男人和女人们是如何开始咒骂、如何在狂饮中摇摆，最后在一个男人——他除了一顶“决不投降”的棒球帽和印有联合杰克旗的汗衫和内裤之外什么都没穿——带领下，每个人唱着《肩带》（*The Sash* ），挥舞联合杰克旗，环绕着舞厅跳康茄舞。

那一周的晚些时候，我参加了纪念威廉在伯恩之战胜利的奥兰治仪式。几百名中年奥兰治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加上一些游行的鼓乐队，挤进长老会中心教堂，聆听布道，布道者称之为“新教徒自由的伟大宪章”，那是圣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使徒书：“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

在阿尔斯特新教教义中有许多关于自由的论述，但宣讲至上之观点的仪式更像是冗长、枯燥的受罪。阿尔斯特人对于忠诚和背叛的迷恋根植于新教徒反抗肉体的精神之中。路德和加尔文，以及两个世纪的地狱之火的布道，让阿尔斯特人处在一种被压制的愤怒状态中，愤怒是针对他们自己冲动的不可抑制的背叛。在新教徒崇拜仪式中，所有这些都被压制在并不轻松的控制之下，然而它仍然寻找各种可以爆发出来的途径，甚至是在奥兰治的奉献仪式上。最终，捐款金额被收集在一起统计，结果发现不足去

年的总数。在我去过的任何一个教堂，这不过是件默默为之遗憾的事。在贝尔法斯特不是这样。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被公开宣布，计算到最后一个便士，得出的赤字结果是126.35英镑。“这是个侮辱，”奥兰治党人的主持人大发雷霆，“是对奥兰治主义及其传统的侮辱。”再一次，肉体得胜。再一次，在奥兰治日历上最神圣的一天，人们发现，对良知的需要排在上帝之前。在压抑的沉默中，会堂为之一空。

---

[1] 索姆（Somme），法国北部省份，因境内的索姆河得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索姆河战役发生于此。

[2]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勋章。

[3]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4] 加里波利（Gallipoli）半岛，位于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在此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想开辟南方战线进攻奥匈帝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军队组成澳新军团参战。澳新军团后来被澳大利亚人视为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和国家象征，设立澳新军团日作为纪念，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5] 维米岭（Vimy Ridge），位于法国阿拉斯（Arras）以北。维米岭战役发生于1917年，为加拿大军队第一次独立作战并取得胜利。该战役在加拿大人心目中具有重大意义，被视为加拿大民族形成中的重要事件。

[6] 联合杰克（the Union Jack），即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旗，英文俗称联合杰克，由英格兰圣乔治十字、苏格兰圣安德鲁十字以及爱尔兰圣帕特里克十字组合而成。

[7] 指1953—1972年北爱尔兰旗帜，其图案为带红手和王冠的红十字旗，俗称红手旗（红手为阿尔斯特纹章标志）。1972年北爱尔兰议会被取消后，红手旗不再做官方使用。

兰博格鼓

在北爱尔兰有两场战争：一场战争在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的天主教和新教徒劳工阶层之间；另一场是在靠近爱尔兰共和国边境地区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和新教徒农民、市民之间。随着新教徒农民和他们的家庭被枪杀、被击穿膝盖、被轿车和货车炸弹驱赶出这片土地，在边境地区谈论“种族清洗”的话题更多、更随意。我驱车前往阿玛（Armagh）郡绿意盎然的原野，此前一天，军方发现一辆载有2000磅农业肥料的货车，有两枚定时炸弹准备引爆，目标是马基特希尔，一个非常美丽的农业村庄，那里之前曾经被一枚炸弹摧毁过一次。

我前往贝尔法斯特以南一小时路程的马基特希尔，去看看边境战争，拜访一位我曾听说过的人：迪克·斯蒂利特（Dick Sterritt），一位制作兰博格鼓（Lamberg drum）的人。迪克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不到30岁，声音柔和轻快。他说，兰博格鼓是“阿尔斯特人的心跳”，巨大的鼓面——3英尺1英寸[1]宽——发出的雷鸣般声音是新教徒300年来行进的声音。迪克将于7月12日在波特当（Portadown）举行的奥兰治游行中与他的兰博格鼓一起行进，就像从出生以来，他和父亲欧尼一起做过的那样。

迪克一整年都在制作和修补鼓，加入了全郡各奥兰治会的制鼓竞争行列。迪克带我去附近的斯加瓦村参加一个由奥兰治会赞助的竞争。在奥兰治会的停车场，竞争者和旁观者围成一个圆圈，鼓手和他们的鼓依次展示，就像是获奖的公牛站在裁判面前。三个拿记分册的老人弯腰聆听鼓声，倾听每个鼓中制作者称之为“心脏”的悦耳回响音质。在任何其他制鼓传统中——比如说加勒比——重点是鼓声，奖励会给予最为丰富、最具创造性的节

拍。兰博格鼓不是这样，节奏像阿尔斯特传统自身一样是不变的：一记突然的高调声音迸发，持续达数分钟，而鼓手的脸因为用力而胀得发紫。尽管努力尝试，但我无法分辨出哪一面鼓拥有更多的心脏，竞争者们也无法分辨。当结果宣布的时候，对于选择决定的反应，更多是宽厚的困惑。比竞争更重要的事情似乎是消耗掉许多杯布什米尔斯[2]威士忌，以及，不用说，以全体在场的人起立、高唱《女王》（*The Queen*）而结束。一切都结束后，迪克悄声对我说："我们在爱尔兰共和国敲鼓不安全，现在还是这样吗？"

像其他所有的阿尔斯特传统一样，鼓来自威廉国王。它们是定音鼓，在马鞍的两边各平放一个演奏，自从伯恩之战以后，它们一直是阿尔斯特人的守卫者。迪克喜欢讲关于清晨战斗的故事，当时新教徒还在伯恩河的一边沉睡，詹姆斯的军队已经进军，想要打他们措手不及。"那儿有一只鹪鹩，一只小鸟，它开始敲鼓，击鼓的男孩于是醒了，敲响了警报。"这是件奇怪的事情，他说着眨了眨眼，所以天主教徒现在喜欢射杀那些小鸟。

迪克所有的鼓都经过精心绘制和装饰：除了"北方雄鸡"——鼓身上有一只打鸣的公鸡——之外，还有一面大约有80年历史的鼓，被称为"奥兰治征服者"，上面有威廉国王戴假发的画像，边上是一面新鼓，煞费苦心地画着一个年轻男子，有浅桃红色的脸和红色的头发。他是迪克的亲戚、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RUC）的一名预备巡警，1991年，当他离开阿玛的军营时，死于在他的路虎车下引爆的一枚地雷。

"我得到消息，去看望我的姨妈，大卫的母亲。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卫再也不能和你一起在7月12日的时候行进在马基特希尔的大街上了。我对她说：'艾薇姨妈，我会在7月12日

的时候永远与大卫在一起，因为我要把他放在我的鼓上。’”每一年，迪克带着他鼓上的大卫一起行进。

迪克的父亲欧尼是位退休的建筑商，他忧郁地听着。“事情在于，”他用低沉的阿玛口音说，“他们出卖了我们的利益，不应该有外国势力告诉我们怎么管理这里的事务。”他不仅是指都柏林，也指威斯敏斯特。“英国人永远不理解如何统治我们，”迪克说，“他们不相信我们归属相同。”

对于欧尼·斯蒂利特，英国本土是一个遥远的伤心之地。“他们过去在电影院里唱《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他沉吟说，“不要以为他们在本土也会那样做。”他叹了口气：“一切都悄悄溜走了，真的是这样。”迪克听着，沉思着。“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故事要讲述，没有一支歌要唱，”迪克说，“他们似乎不知道他们是谁。”

欧尼给我看斯蒂利特的家谱，它追溯到17世纪。迪克想让我知道，他们是“黑嘴人”。迪克解释说，在安妮女王时代，像长老会这样持不同意见的宗派被封禁，只能在田野里、躲在黑莓树丛后面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在黑莓季节，孩子们的嘴唇和面颊都被黑莓果实染成了黑色。迪克说：“那是我们的名称，它始终与我们相随。”他仍然对把已建立的爱尔兰圣公会教堂（Anglican Church of Ireland）作为他的黑嘴祖先所在之地抱有怀疑。“只有一张薄纸将他们与罗马教堂分开。”他阴郁地说。迪克完全了解，有许多时候“黑嘴人”感到与天主教——也在宗教禁令下艰难生存——的亲密关系比跟当地的新教徒地主高斯福德爵士 [3] 更为亲近。异见传统对于圣公会体制的政治和宗教形式都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为阿尔斯特人不稳定的忠诚主义又增加了一种压力。在阿尔斯特人对英国本土体制的憎恨中，有一种被压制的民

主冲动，被压制是因为忠诚主义从未能转化成一种自己的民族主义，从未将阿尔斯特人民的事业与本土体制的事业分离出来。

迪克带我出去，开着他的红色雷诺4型货车兜风，他称这辆车为山羊马车，因为他使用它在乡间搜寻大到足以给他37英寸[4] 鼓皮的山羊。他的有些羊来自周围的天主教徒，但他肯定是先打电话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打电话给天主教村子里的监视站。这样他的山羊马车就不会被“强盗”抓住。在强盗之乡就是这样。“在这儿你不会想在夜晚外出。”他说，看着起伏的田野，弗里赛奶牛在门口咀嚼反刍食物。有些篱笆门是临时派[5] 设置的炸弹陷阱，小树林中将会布满英国士兵。英国对这个郡的控制似乎在他们之间摇摆不定。每一条小巷都有战斗的记忆。迪克经过一所房子，想起他的一个朋友，一位业余战士，他在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遭到绑架，受折磨，被枪杀，然后被扔在他家门前的路上。军方担心尸体是个炸弹陷阱，只好用一辆路虎把他拖出村子，他的家人只能看着。“这让你想要知道，”他温和地说，“是什么样的人会像那样杀死一个人，明知道他的家人会看到他的样子。”

在从他位于马基特希尔主街的酒吧回家的路上，他自己曾经被几个戴头套的当地天主教男孩挑衅。“现在，在你自己的家乡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了。”一位邻居告诉他哪些天主教徒要为此负责，到第二年，他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找了出来。“只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就够了。”

但天主教徒只不过是迪克的问题之一。他曾与一些奥兰治党人和一个乐队坐车前往伦敦德里，一些男孩子上车，要求他购买一张为被关押的忠诚派民兵募捐的彩票。迪克拒绝了，说如果他们在监狱里，是他们罪有应得。那天晚上下车之后，那些男孩子

就在一些巡警的眼皮底下攻击、殴打他，巡警将他从厮打中拉出来，并且问他是否要控告他们。在愤怒之下，迪克说他会控告，但这个事情未能提交审判，因为他接到电话，说他不应该继续追究。迪克承认："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称为威胁。"

他没有时间参加当地的民兵组织。他指出一些飘扬着UVF [6] 旗帜的房子，这些蓝色旗帜表明这家人支持独立的阿尔斯特，一个与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都没有关系的阿尔斯特。这让迪克认为是疯狂政治。他摇了摇头："他们脑子里缺根筋。"而且，他说道："如果英国人不在这里，农民们去哪里要补助？"

他说，尽管有这些麻烦，但这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国，他不会住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往邻近"自由国度"的边界开去，由冬青和紫红灌木圈起来的牧场陡峭、起伏，里面有弗里塞奶牛和赫里福牛。白色的小屋围在玫瑰花丛之中；联合杰克旗在爱尔兰教堂（Church of Ireland）的尖塔上飘扬，而阿尔斯特的红手旗在反对派礼拜堂和奥兰治堂的钟塔上方飘舞。然后，伴随着道路中间的一个减速带和一个转弯，迅速一个闪避，穿过一条小溪，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块牌子，写着"欢迎来到爱尔兰共和国莫纳亨郡"。没有边境检查站，郁郁苍苍的风景没有任何断裂，没有任何东西告诉你这是地球上最具争议性的边境之一。

迪克每年穿过边境很多次，参加赛马会。他热爱喝酒、漂亮的赛马和好听的故事，在边境以南他从未遇过任何麻烦。有时候，如果他的天主教朋友、来自马基特希尔的基兰手头宽裕的话，迪克会带他一起，但这不常见。在腰带下面挂上一对音箱的时候，迪克喜欢唱歌，他唱的绝大多数是反叛歌曲，关于逃出奥马监狱的歌，关于头发上系着黑色丝带的女孩的歌，关于夜莺之催眠曲的歌。他会把芬尼党人 [7] 和忠诚派的歌、南方的和北方

的歌混在一起，一首接另一首，直到你没法分辨哪个是哪个，或者直到在他当地酒吧中的男孩子们开始尖叫，半带严肃、半开玩笑地，说他应该扔下那些反叛歌曲，给他们演唱一曲完整的《肩带》，那样才会真正让他们开心。

我来到这里，在一个强盗之乡寻找英国性是什么模样，而我发现（当然，是我未曾预料到的）：一个像迪克·斯蒂利特这样的男人，用他对酒、歌和故事的热爱，平静地告诉我抗拒——他并没有说战斗，但是抗拒到底——明显地表现出他已经“是”的人：一个爱尔兰人。

---

[1] 约0.94米。——编者注

[2] 布什米尔斯（Bushmill’s），北爱尔兰威士忌酒品牌。

[3] 高斯福德（Gosford），马基特希尔当地世袭贵族家族。

[4] 约0.94米。——编者注

[5] 临时派（Provies），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的绰号。1969年，爱尔兰共和军分裂为正式派（Official）和临时派，正式派于1972年之后放弃武装斗争，支持以政治行动争取爱尔兰统一。临时派则继续坚持以爆炸、暗杀等暴力活动为斗争形式。

[6] 阿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 Force）的缩写。

[7] 芬尼党人（the Fenian），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爱尔兰独立运动组织。

拉斯库尔男孩

回到贝尔法斯特，马蒂、希兰、迪基、保罗和马德正在将拉斯库尔房子（Rathcoole Estate）的基石刷成红、白、蓝色。绝大多数新教的房子在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粉刷基石，为12日做准备。粉刷基石像是贴上一张比利国王 [1] 或是用阿玛利特长枪和蒙面头套全副武装的忠诚派民兵的壁画。它标示出领地范围。“他们在那边也做同样的事。”迪基说，指着远处的天主教建筑。只有在天主教徒那边才有爱尔兰的三色旗和引自绝食英雄鲍比·山德斯 [2] 的文字。

直到几年前，拉斯库尔还是欧洲最大的公共住宅区，从前是混居的。鲍比·山德斯本人生长于此。但此景不再。拉斯库尔现在属于死硬派新教徒劳工阶层。在白色蕾丝窗帘后面的塔式大楼里，在那些半独立平房干净的起居室里，是经常令人困惑的贝尔法斯特式混合：文雅、遵纪守法的人们混合着准军事组织暴徒，他们守护着当地的孩子，防范时而发生的枪击膝盖的报复。马德，一个14岁、忧郁地粉刷基石的孩子，因为偷车和驾车围着戴蒙德兜风而遭到过报复，那里是妓女、干洗店和青年俱乐部聚集之地。

戴蒙德现在并非鼎盛期：在赫比·麦卡勒姆葬礼之后的骚乱期间，妓院被捣毁了，青年俱乐部也被捣毁，路面上汽车被点燃的地方还有火烧过的痕迹。男孩子们不会说谁应该负责，但对于他们是否参与，所有人都抱有某种含含糊糊的态度：他们不说自己在那儿，也不说自己不在那儿。

他们无法确切说出，对于做个英国人，他们到底喜欢什么，

但他们满怀真正的爱国激情，把联合杰克旗的颜色粉刷到基石上。“是足球。”保罗大胆地说。马蒂说：“是的，流浪者队，太棒了。”新教徒的贝尔法斯特崇拜格拉斯哥流浪者队，而流浪者队的头巾在忠诚派的标志中，地位仅次于联合杰克旗。拉斯库尔的男孩中几乎没人去过英国本土，但他们听说，在本土，没有人会想过要把房子的基石刷成红白蓝色。“他们没必要，是不是？”保罗说，“他们不会反抗我们所反抗的东西，是不是这样？”

对于本土的房子的基石不刷颜色，马蒂的观点是因为“所有不同的种族和一切，在那儿是混合居住的”。在这儿，他说：“只有我们和天主教徒们（Taigs [3] ）。所以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色彩，是不是这样？”

马蒂、保罗、希兰、迪基和马德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很多要说的——至少我在那儿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当他们穿上白教堂区 [4] 新教徒男孩军乐队的紫色制服时，一种变化在他们身上悄然发生。他们从身后的袋子里抽出黑檀木长笛，每个人都谙熟至少100种曲调，以及十几种小军鼓节奏。他们一整年都在青年俱乐部的体育馆里练习，在7月的游行季节，他们几乎每个夜晚都会出去，在拉斯库尔和附近地区游行和演奏。乐队不仅仅是他们的俱乐部，音乐就是他们的演讲词。他们也许不能滔滔不绝地告诉你英国性或者新教主义意味着什么，但是当长着青春痘的大男孩敲响大低音鼓，希兰用他的小军鼓指挥他们开始行进，而马蒂、保罗、迪基和马德在长笛上奏出曲调时，他们在雷鸣般地宣称自己是谁。

我在雨中跟随他们前往奥兰治会，交通近乎停滞，路上推着婴儿车的夫妇驻足向他们鼓掌，军队卫兵谨守岗位，保护他们免

遭沿路房子里天主教男孩子们的攻击。鼓声不容任何置疑，难怪天主教徒们称军乐队的音乐是挑衅。但它自有一种暴烈之美，而男孩子们会告诉你，当你行进在市中心、声音回响在城市的高墙峡谷之上，获得的感觉无与伦比。

---

[1] 比利国王（King Billy），即奥兰治的威廉三世，Billy为其小名。

[2] 鲍比·山德斯（Bobby Sands，1954—1981），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1981年在狱中领导共和军囚犯绝食而死。

[3] Taigs，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忠诚派对天主教徒的蔑称。

[4] 白教堂区（Whiteabbey），贝尔法斯特的一个教区。

迪街篝火

午夜钟声敲响，7月11日进入12日的那一刻，迪街（Dee Street），像这座城市里所有的新教徒街道一样，在篝火上点燃教皇和爱尔兰的三色旗。在过去的17年里，L女士亲自缝制“迪街教皇”，她用一个玩具的头颅，喷上绿色、白色和金色的漆，用一个主教的法帽做皇冠。教皇总是穿着红色的袜子，事实上伊恩·佩斯利牧师大人[1]因为将教皇阁下称为老红袜而著称。

在L女士干净完美的客厅里，侧边柜上摆满了她的家族在信鸽比赛中赢得的奖杯，L女士也用她在疯狂大甩卖中购买的上好丝线绣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旗。她的儿子身材细长，14岁，穿一件贝壳装，带头为篝火做收集工作。他相当确定今年迪街的篝火将是全城最大的。

迪街是一条狭长的两车道街道，两上两下，建于19世纪，是在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Harland&Wolff）的黄色吊车阴影之下，为船厂工人修建的。在通往迪街各条道的光秃秃墙上，有喷上去的标语：“阿尔斯特说不！”“迪街说不！”“育空街（Yukon Street）说不！”（当地的一个孩子为我喷涂一幅街上的画，他画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对话泡泡框中也写着“不”。）

迪街上所有的客厅都开着门，日日夜夜，孩子们在其中穿梭进出，从一座房子到另一座房子。失业率很高，有很多20多岁、重度文身的人在客厅里晃悠、喝酒、监视陌生人。在街道尽头、面对篝火的墙上，有一幅画着三个新教徒民兵的壁画，他们戴蒙面头套，持自动武器。

我在迪街上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一个男人告诉我，他是“新来的”，最后承认他在同一座房子里生活了25年。只不过跟在这里出生的妻子相比，他是一个新来者。

迪街有它自己的狂野男人。有莫里斯，手臂上上下下都是刺青，每个耳垂上都有一个心形的刺青，他想保护我，换取报酬。然后是留山羊胡子的雷诺士，窄小眯缝的眼睛，剃光了头。迪街的人会告诉你，他“买不起一片三明治”。他和他的女朋友麦蒂有过一个孩子，街上的妈妈们帮助他们生下孩子，但麦蒂还在医院的时候，社会福利机构就来把孩子带走了。雷诺士发现以后，邻居们看到他在迪街上大发雷霆，眼中满是杀气，手里拿着一罐汽油，叫喊着要把“社会”彻底烧掉。

迪街提供的归属带有一种复仇—同情感，对自己人是温馨和欢迎，对敌人是像石头一样绝不屈服。我花了很多天的时间让他们相信，我没有任何恶意。我告诉他们，我只是来和男孩子们谈谈篝火，但L女士半信半疑。忠诚派像塞尔维亚人一样，对于他们遭受的误解念念不忘。

为篝火进行的收集工作开始于3月。迪街的男孩子们，年龄范围从7岁到23岁，冲洗街道、停车场和工厂，用超市的推车拖拉他们的战利品。到7月初的时候，收集物极为庞大，他们必须整晚露营，防止被邻近街道的篝火男孩们偷走。到7月10日，迪街的篝火堆令人惊异地达到60英尺[2]高，堆满电缆卷、盘子和旧沙发、箱子、桶、铁路枕木和汽车轮胎。

跟拉斯库尔男孩一样，对于英国本土发生的事情，迪街男孩们只有最模糊的概念。戴一顶芝加哥熊队的皮质馅饼帽和流浪者队的围巾的斯图尔特说自己听到过“盖伊·福克斯之夜”[3]，但他

不能告诉你是什么时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篝火节，他们有他们的，差不多。”斯图尔特对英国本土的最美好记忆是一场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流浪者队的比赛，阿尔斯特的颂歌《我们，我们，我们是比利的孩子！》响彻球场。但英国其他地方，至少从一些访问来看，似乎对他是陌生的。在他去的每个地方，“他们都管我叫爱尔兰佬，好像我是爱尔兰人，必须对他们所有的爆炸案负责”。

此外，英国人的房子好像都冷冰冰的、不友好，他说，拍拍一个邻居的罗威纳犬，它走过来，在篝火堆边的垃圾中间嗅来嗅去。“没有孩子在外面玩，像在迪街上一样。好像一切归于寂静。”说实话，斯图尔特承认，“在贝尔法斯特，离开三条街远我就会得思乡症”。迪街是他所熟知的一切。他自己有两个孩子。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不管如何，就是不行。如果他工作，社会可能断绝他的“给养”——贝尔法斯特给失业者的福利。

我问他，天主教徒住在哪里，他指着身后的道路沿线，大约400码[4]远。我问，如果你们去那里，会怎么样？其他男孩中有一个人迅速回答：“杀了你，肯定的。”如果他们来到这里，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被狠狠教训的，”斯图尔特说。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正好经过，他们就会那样对你。“他们中有几个可能会开始教训你。所以你也必须一样。如果他们来这儿，会被狠狠揍一顿的，不是杀了他们，别介意，只不过是要让他记住。”话说得没有任何恶意。事实上，斯图尔特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有一点窘迫，好像是想说明如果你住在一个混居区域，事情会完全不同。但在迪街上不是这样。

那些男人呢？我说，指着那些民兵壁画。许多篝火男孩不太

自在地扭头看向其他地方，一个男孩是英国士兵的儿子，他迅速说，他们是非法的，你不能谈论他们。但斯图尔特用一根棍子戳着地面，说他们在那儿是为了惩罚“流氓和小偷”。在迪街的范围之内，惩罚应当保留在家族内部，警察——或者他们称为“皮勒”（peeler）[5] ——应当置身事外。比如说你偷了一辆车，或者“做掉”房子，然后你会得到应有的东西。那是什么？敲掉膝盖。那么你害怕他们吗？斯图尔特狡黠地看着我说：“你不会认为我说不怕吧，你会吗？”

7月11日的晚上，我回来看教皇和三色旗被插在篝火堆的最上面，看迪街的男孩子们来来往往游行，雷诺士在最前面，犹如疯子一样挥舞着阿尔斯特旗，而L女士的孩子阿历克斯用一个只有一面鼓皮的残破小军鼓击打节奏。但话传到L女士那里，说我一直和男孩子们谈论天主教徒和武装民兵，她把我叫到她的起居室。“他们只是孩子，”她说。“他们什么都说，但他们不一定是那个意思。”她要我明白，当我扬长而去的时候，她还得住在这里，这并不容易。“看，我购物是在马路上搞大甩卖的时候，跟天主教徒一起。”如果他们知道斯图尔特放话说要狠狠地“教训”他们，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至于武装民兵，她说：“我认为你应该远离政治。”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不回到L女士的“良好印象”，我在篝火边没法一直待下去。我尽全力让她放松，她听我说完，在起居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的脸憔悴而瘦削。最后她原谅了我，传话过来说放过我了。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迪街男孩们的汽油弹飞落在篝火堆上，随着人群一阵长长的欢呼，篝火堆的火苗升腾起来。雷诺士挥舞红手旗，莫里斯正一次喝下两罐麦克尤恩 [6] 啤酒，火苗中升腾的热气迫使庞大的人群像旋涡一样往后退；两个男人兴高采烈地咒骂我是为“那些他妈的ITN [7] 里的柴火共和派”工作。当教皇着火、共和国的三色旗倒下来

掉进火苗里时，人群发出低沉、来自肺腑的呼喊。L女士最后出现，被她的孩子们包围着，恬静地沉醉，忘却了一切，缓缓地围绕着篝火堆，与每一个想和她跳舞的人转着圈，轻轻地对自己唱着：

它古老而美丽，它的色彩令人愉悦

它经历德里、奥格里姆、恩尼斯基林和伯恩而变得陈旧

---

[1] 伊恩·佩斯利牧师（the Reverend Ian Paisley，1926—2014），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政治家，自由长老教会牧师。

[2] 约18米。——编者注

[3] “盖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1605年，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因不满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新教政策，偷偷将火药运入议会大厦，准备在11月5日爆炸，事败，盖伊被捕处死。后来英国民众将11月5日视为篝火节，每年此时点燃篝火庆祝胜利。

[4] 约360米。——编者注

[5] “皮勒”（peeler），俚语，指爱尔兰或者英国最低级的警察。

[6] 麦克尤恩（McEwan），苏格兰啤酒品牌。

[7] ITN（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独立电视新闻，英国一家为商业电视台进行新闻采访和新闻制作的公司。

原野

为什么每年的奥兰治游行时的天气总是安详温和，阿尔斯特人解释说：“上帝是个新教徒。”就是这样。7月12日的早晨，黎明清朗明亮。乐队和数千名会友聚集在中央总会前面，汤米·多伊尔神采焕发，一边啜饮着一杯茶，一边向老朋友们致意。12日这天，在整个北爱尔兰，有8.5万名奥兰治党人参加游行。迪克和欧尼·斯蒂利特将在波特当游行。实际上，游行是个错误的用词。“漫步”是奥兰治人喜欢用的词，表明它代表一种恰当的礼仪和优雅的品味。但天主教徒看到的不是“漫步”。雷鸣般的乐队，整齐的步伐，还有来自比利男孩的歌声中、讲述他们是如何“在芬尼亚党人的血泊中昂首挺肩”的歌词，足以让绝大多数天主教徒们在游行这天闭门不出。

奥兰治党人会怀旧地告诉你天主教徒们从前来观看游行的日子。像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一样，双方都对一个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失落天堂深感兴趣，那时种族之间相互包容，每一方都乐于尊重另一方的仪式。对于忠诚派，相信这一点比承认事实更容易，因为奥兰治主义一直处于激烈反对天主教的边缘，而恐惧上帝、遵守法律的新教主义始终热爱它自己鼓声中的挑衅和暴力性。

他们的游行或漫步向另一方传递了一个信息，即我们在这里，阵容强大，注意点，留在屋子里。但他们的游行也是向自己传递信息，重申信仰，慰藉信仰。因为忠诚主义的长期生存一直深受怀疑，1991年的人口调查数据表明情况不容乐观。20年前，天主教徒占人口的34.7%，今天这个数字是41.4%并且正在迅速增长。有谣传说在贝尔法斯特的学龄儿童中，天主教徒占到

总数的50%。从统计上看，新教主义呈现的状况是成年人口的衰减，最优质、最聪明的人口缓慢但是稳定地外流到英国本土。这些数字对信徒的困扰如此强烈，以至于在7月12日的小册子上，全爱尔兰总会长警告他的奥兰治党人同胞，不要把信仰“寄托在有意误导的人口统计数字”上，就像他秘密警告他们，特务和破坏分子可能潜伏在游行中，披着奥兰治的肩带。

所以，当他们游行到里斯本路（Lisburn Road）、往艾登德里原野 [1] 前进的时候，他们高举着旗帜，曼彻斯特的常胜公爵 [2] 、克伦威尔的铁甲军 [3] 、拉恩 [4] 的新教徒男孩和巴里加利（Ballygally）的管乐队、来自卡里克弗格斯的崛起的索姆河之子 [5] ，你数着每一个40岁以下的奥兰治人，你想知道，这种秩序还会生存多长时间。

但他们确实制造出壮丽的场景。在贝尔法斯特边缘被称为原野的养牛牧场上，巨大的橡树散落在向下倾斜的牧场斜坡两翼，管和鼓乐队、手风琴乐队、风笛乐队在树下川流不息。斜坡底部树立了一个小小的平台，用来容纳重要人物，放了几排听演讲的椅子，但在成千上万游行进入原野的人们中间，可能只有100多人愿意听讲。其他人散乱在草地上，用联合杰克旗和阿尔斯特的红手旗盖住脸，抵挡太阳，鼓堆在一起，制服、绑腿、袜子、靴子，一团混乱，炸薯条的包装袋中间堆着啤酒罐和香烟盒。甚至警察也把防弹背心脱下来，头冲着他们路虎的保险杠，在草地上休息。演讲没完没了，古老的宗教指责从讲台上传出来：“罗马天主教是真正宗教的堕落，爱尔兰天主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堕落的。”我听到一位尊敬的绅士大声叫喊。另一位演讲者咆哮着：“阿尔斯特新教徒将让阿尔斯特再次强大，恢复英国过去这些年来已经严重衰退的荣光。”似乎还是没有人在听。当老年人

的咆哮变得软弱无力的时候，年轻的乐队成员们已陷入了熟睡之中。

---

[1] 艾登德里原野（Edenderry Field），贝尔法斯特郊区一处广阔田野。1972年以来，贝尔法斯特每年的奥兰治游行均以这里为终点。

[2] 曼彻斯特的常胜公爵（the Duke of Manchester's Invincibles），奥兰治分会名称。

[3] 克伦威尔的铁甲军（Cromwell's Ironsides），奥兰治分会名称。

[4] 拉恩（Larne），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Antrim）市镇。

[5] 崛起的索姆河之子（the Rising Sons of Somme），管乐队名称。以上均为奥兰治游行中的旗帜展现的分会名称或乐队名称。

船货崇拜

越水而来的伟大国王，从他的白色船只上登陆。在一场伟大的战役中，他从部落敌人手中解救了土著人，成功地保住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在离开的时候，他授予他们权力，永久主宰这个岛屿。完成这些神奇的谋划之后，他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以后，土著人崇仰他的名字，绘制他的图像，用他的脸庞装饰他们的鼓面，随身携带他的肖像。他们长久地保留关于他的神圣记忆，即使他所有的踪迹都已从他曾到过的这片土地传统中消失不见。

根据《人类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Anthropology*），船货崇拜（cargo cult）是一种土著人的千禧年行为[1]，他们相信，千禧年来临的时候，将会有装载欧洲贸易物品或船货的巨大船只到来。这些货物是由先祖的灵魂带来，分派给那些遵从偶像之教导的土著人。一些船货崇拜领袖呼吁驱逐所有外来人，殖民元素是救赎的前提条件，而其他人坚持摒弃传统的生活方式，采用欧洲人的习俗。

按照在南太平洋研究此类崇拜的人类学家的观点，关键特征在于“船货崇拜是在白人失去监管和引导对他们物品的欲望的能力之处发生的行为。当局利用并且部分创造出对于白人物品的欲望，作为激励乡民们进行发展之规划的一部分，但当那些欲望转而针对他们自己时，他们被吓坏了”。人类学家将船货崇拜定义为一种“不受控制的模仿”的结果，土著居民照搬白人的仪式和行为，只是为了颠覆他们，将他们转变成为一种崇拜物，从而实际上将他们从欧洲的源头释放出来。

英国船货崇拜是世界上最顽固、最坚韧的。它在我青年时代的加拿大，在蒙特利尔丽兹宾馆的沙龙里，在多伦多的皇家约克宾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维多利亚的女皇宾馆，但也在新加坡的莱福士宾馆、香港的曼德琳宾馆。从斯里兰卡的茶叶种植园到印度的山中避暑地，不间断地供应茶和黄瓜三明治，一个已经消亡的帝国的仪式漂浮在他们如鬼魅般的后世生活中。仪式所暗含的忠诚主义在这里只不过是怀旧或哀悼，但也存在反叛性的对英国性的船货崇拜，例如在白人至上的罗德西亚，伊恩·史密斯[2]在1965年宣布单方面从英国独立之后的实践。这是一种以反叛来对抗英国自身的英国性。

肩带、篝火、燃烧的教皇和三色旗，兰博格鼓，游行的乐队，红手旗，歌声：在我所有的旅程中，从未遇到过一个如此强烈仪式化的民族主义形式。在某一个层面上，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英国性被仪式化，因为它对抗的是其对立面和强硬对手：爱尔兰共和主义。

由于敌人是“民族主义者”，忠诚派不仅禁止使用这个词，也避免让自己披上这层面纱。然而，也许这就是忠诚派的本质所在：一种不敢冠以其名的民族主义。按照这种解读，忠诚主义事实上是对自己忠诚，但由于它不敢大声说出来，它在一种展示完全属于自己的身份的归属仪式中，将它沉默无言地表达出来。

红手概括了所有这种模糊性。你可以在每个地方看到它，在旗帜上，在武装民兵的壁画上，在每个糖果店卖的糖果包装纸上。根据凯尔特人的传说，两个苏格兰国王游泳到阿尔斯特。谁先碰触到阿尔斯特的土地，谁就赢得比赛，赢得统治这个地区的权利。当游泳者越来越接近终点时，落后的那个国王砍下自己的左手，然后用自己的右手把它扔到岸上，从而赢得了胜利。

这是一个残酷然而恰当的象征，尤其是这种将该地区作为一个血淋淋的奖品奉献给一个牺牲性对抗的方式。它是一个既值得尊重又有反叛性的标志，既出现在该地区的官方纹章上，又出现在尊崇忠诚派暴徒的武装民兵壁画中。它的凯尔特起源以及在英国本土的不为人知，令红手只不过展示了忠诚主义是如何紧张地在认同与拒绝、忠诚与反叛之间寻求平衡。阿尔斯特人崇拜17世纪的新教神殿（shrines），而英国本土不再承认那是属于自己的。它阐述了一种相信自己的母亲已经背叛了的英国性。它无法发展成为民族主义叛乱，因为那样会让其共和派敌人开心，它也无法退缩到满足和顺从状态，因为那样过于相信母亲。

然而它还是种特定的英国性，首先在于其曾经做过主人的帝国记忆，因此它无法考虑更不用说承认成为其他民族之外的少数派。它的特殊英国性还在于它屡受伤害的自决权遭到拒绝、背叛，在于它未能将民主意识所受的伤害转变成一种真正的民主的民族主义。英国本土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整体上，英国的民族意识继续希望民族是具体体现在王室体制而不是体现在民众身上。英国人将自己视作臣民（subjects），而非公民，并普遍承认英国历史上的公民成就——法治、议会主权、国家稳定——倾向于在一种婴儿般理想化的君主政体中表现自己。可以争论的一点是，相比一种臣民的民族，一种公民的民族也许会被证明是对这些成就更为坚定和勇敢的捍卫者。

船货崇拜是对它们起源的讽刺漫画，然而漫画揭示了事实，就像游乐场的镜子。如果阿尔斯特人不能决定它所忠诚的对象——它自己的人民还是王冠——这可能是因为英国整体上对同一个问题还没有答案。

在阿尔斯特忠诚主义的船货崇拜中，英国民族主义的种族和

公民成分正开始分离。忠诚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它矛盾地使用英国性的公民符号——王冠和国旗——来标识种族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内容被清空了：例如，忠诚派的武装军事主义只是太想分清楚，忠诚派社区的哪一部分将法治视为英国公民身份的核心。最终，王冠和国旗的意义退化成与贫穷白人少年身上的刺青一般，它们只不过是种族暴力的标志。

在英国，同样的分离很容易发生，而且事实上已经在发生。像国旗和王冠这样的身份符号，从前曾代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治和公民外衣，被幻灭、不公和压迫耗损成了纯粹的白人性的标志。如果一个社会不再能教育他们的孩子，英国性是与公正而不是种族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其标志就会出现在仇恨的标牌上。

正如在加拿大、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其他地方所见，英国不是民族身份的公民和种族成分正在分离的唯一国家。绝大多数多民族、多种族的民族国家都发现，他们的人民经常更忠诚于组成他们的种族单位，而不是将国家凝聚在一起的联盟和法律。

成功地将民族和种族张力约束在世界上的现代多种族社会中的，是一个强大到足以令其权威得到尊重的国家。即使在北爱尔兰，这仍然千真万确。尽管英国的机构在双方的社区中没有得到同等的尊重，英国国家仍然成功地控制着局势。拯救这个地区、避免它成为波斯尼亚的，无非是谨守本职的英国军队、警察和依据证据断案的法庭。

在这里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道德认识。对于种族民族主义，唯一可靠的解毒剂被证明是公民民族主义，因为确保种族群体肩并肩和平生活在一起的，只有共同的对国家的忠诚，足够强大，

足够公平，足够平等，来要求他们服从。

---

[1] 千禧年行为（millenarian movement）是某些宗教、政治、社会团体因持有“世界将面临巨大转变，转变后万物将面目全非”的“启示录”式信仰观点而做出的一些仪式性行为，大洋洲不少土著部落的“船货崇拜”即是其中一种。——编者注

[2] 伊恩·史密斯（Ian Smith，1919—2007），前罗德西亚及津巴布韦政治家，1964—1979年任罗德西亚总理，1965年发表《单方面独立宣言》，脱离英国，以维持白人的少数派统治，1979年结束白人统治。1980年津巴布韦成立，罗伯特·穆加贝当选总理，开始漫长的独裁统治，史密斯担任津巴布韦国会议员，至1987年被穆加贝免职，退居南非，2007年逝世于南非开普敦。

饥饿和餍足

我在旅程开始的地方结束我的旅程，思考着论点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的良好意图和民族主义暴力之间的关系。理性主义者倾向于相信，民族的所作所为肇始于他们说想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民族主义者说暴力因自我防卫和寻求自决而成为正当，理性主义者断定，这是暴力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我不再那么确定了。在我看来，似乎经常是暴力首先发生，民族主义者的理由随后才出现。比如说，武科瓦尔被双方无情毁灭是对此的完美例证，令我印象深刻。在那种情况下，对民族主义言辞的最佳理解，是它为已发生的事情开脱，而不是解释所发生事情之缘由。

在我去过的每个地方，民族主义最为暴力之处，是在以对抗最为接近自己的人们来区分自己族群的地方。对冲突的理性解释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至少对于外部人士来说，阿尔斯特人听上去、看上去和爱尔兰人接近，正如塞尔维亚人看上去、听上去和克罗地亚人近似一样，然而正是这种相似性推动他们自己互相看成极端对立方。自从该隐和亚伯[1] 之后，我们已经知道，兄弟之间的仇恨比陌生人之间的仇恨更为暴烈。我们老生常谈地说这是因为仇恨是一种由爱转而对抗自身的形式，或者说我们对亲近之人有最深的仇恨，或者说暴力是对我们无法承受之亲密的最终拒绝。这些都不对。存在不是任何民族主义理论、任何微小差异自恋理论能够解决的难题。去过新世界秩序的那些被废弃的土地，尤其是那些竖立着无数木头十字架的原野墓地之后，你会因道德解释的缺失而陷入震惊与沉默。

在文章《与过去妥协意味什么》中，西奥多·阿多诺说：“民族主义再也无法完全相信自己。”在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民族主义言辞有一种令人困惑的虚假和伪善，似乎嘴边挂着民族主义口号的人们，在内心某个地方明白他们自己的话语的非真实性。那些上一刻告诉你所有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沙野兽的塞尔维亚人，下一刻就回忆起自己与他们和平生活时的快乐日子。在这种分裂的意识中，有一个抽象性的幻想层面和一个直接经验的层面，两者决不允许互相面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道德语言系统的主要作用是确保这种划分，并且以此来弱化这种意识。但它从未完全发挥作用。正是那些以未经思考的热情接受这种概括的人，经常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们，以他们的经验，这些概括实际上是错误的。然而即使绝大多数人听到这种内心的声音，似乎很少有人能按照它行事。民族主义话语的权威就在于，绝大多数人对他们自己经验的证据进行积极审查。

民族主义是一种演说形式，它的喊叫不仅是让自己被人听到，也是由此相信自己。它几乎就是粗糙的历史虚构、暴力的道德夸张、对敌人的滑稽讽刺，与演讲者自己了解它是彻头彻尾谎言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商。但这种伪善也许是一种语言的功能性要求，它承担着要坚持如此大体量谎言的重负。例如，民族主义者对于一个种族纯粹国家的幻象，承担的任务是说服普通的人们对负面的社会学现实顽固地视而不见，比如说，绝大多数社会都不是，也从未达到种族的纯粹。民族主义领导人热情地鼓吹共同社会的同胞感情，但必须克服对于他的每一个听众都简明易见的证据，即没有一个现代社会是合乎某单一民族的意愿。诸如此类的幻想确实抓住了很大一部分人，但只是证明这些人内心深处多么渴望逃离顽固的生活现实。

因此，此种解读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幻想和逃避的语言。在许多情况下——塞尔维亚是恶名昭彰的例证——民族主义政治是从社会落后现实的全面、集体的逃离。与直面现实——欧洲外围一个贫穷的、原始的、三流经济体——相比，聆听关于塞尔维亚的英雄般悲剧命运的演讲、幻想最终击败其历史敌人，绝对是更有吸引力的。

所有社会的政治体制——先进的和落后的、发达的与不发达的——都受到幻想之诱惑的伤害，唯一可靠的解毒剂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灾难的冷水浴。即使如此，除非他们拥有一个能让自己去除幻想的政治体制，否则各个社会难以从民族主义幻想中醒悟过来。拥有足够的民主传统的社会已经证明他们自己对幻想政治是脆弱的，但一个民主体制至少可以提供惩罚，对与谎言如影随形的幻想家的惩罚。然而同时，人们不能将民主作为对民族主义的一个可以依赖的解毒剂。像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民族主义煽动家在选举中能够获胜，让人们断定，即使在像塞尔维亚这样的表面性的民主政体中，那些将人们从现实中抽离、转移出来的人通常比说真话的人拥有更为长久的政治寿命。

这些主题——幻想、伪善和虚假——让我们多少更为深入地理解民族主义观点和民族主义暴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考察民族主义语言是如何重写、重建现实世界，将其转变成一个高尚事业、悲剧性献身和残酷必要性的幻觉王国开始。然而还有进一步的要素可以加入这幅图景中。

正如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绝大多数民族主义的暴力是由一小部分年龄在18岁到25岁的年轻男性所犯下的。其中部分人有心理病态，但绝大数人完全是心智健全的。直到我在新世界秩序的检查站度过那么多的日子之后，直到我遭遇

那些沉醉于他们屁股上的枪的力量的年轻男子，我才开始理解，在手中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带来何等深度的快感。认为每个人都痛恨和害怕暴力，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派错误。我遇到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们热爱废墟，热爱毁灭，热爱来自他们枪杆子的权势。

也许自由派还没有理解男人憎恨的力量，那是在几百年来欧洲逐渐走向和平中累积起来的。我们的文明的历史，是国家将暴力手段收归己用的历史。但这一成就是不可消减的年轻雄性内心始终憎恨的。自由派们没有预料到男人们对和平与家庭生活的厌恶，以及现代国家在没收武器时年轻男人的愤怒。民族主义叛乱背后的隐形原理之一，是它们发掘出这种深植于男性之中的对现代国家自身斯文和秩序的憎恨。因为看上去很显然，国家秩序是父亲的秩序，而民族主义是儿子的叛乱。除非我们在解释民族主义存在的可能性时留出某种空间，证明儿子针对父亲的报复是合理的、合法的，否则还有什么让我们来解释民族主义暴力令人惊愕的无端性和兽性，以及它对于不管是军事逻辑还是合法的正当防卫之边界的持续不断的逾越？

我的旅程也让我重新思考归属的本质。任何放逐者必定都有渴望更为完全的民族归属的时候。但我去的那些地方，归属是如此强劲、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对它因恐惧而畏缩。这种恐惧的理性核心在于，在暴力和归属之间有一种深层的联系。你对归属于自己群体的纽带感觉愈强烈，你对外人的感觉就愈带有敌意、愈加暴力。你无法拥有强烈却不带暴力的归属感，因为这种强度的归属掩盖了个人良知：如果民族给予人民一个理由来牺牲他们自己，它也给予他们一个理由去杀戮。

在我的整个旅行中，我一直想起《罗密欧和朱丽叶》

（*Romeo and Juliet* ）中的场景，朱丽叶穿着睡衣在阳台上自言自语，没有察觉到罗密欧站在阴影中听着。她努力去理解，一个凯普莱特 [2] 家的人，爱上一个蒙特鸠 [3] 家的人，对于她意味着什么。突然，她呼喊道：

只是你的姓氏成为我的仇敌；

你就是不姓蒙特鸠，你还是你自己。

蒙特鸠是什么？不是手，不是脚，

不是臂，不是脸，也不是人身上

任何其他一部分。啊！换另外一个姓吧：

姓算得什么？[4]

在波斯尼亚前线，在忠诚派与共和派贝尔法斯特的房子里，在所有部族帮派（我们时代的蒙特鸠和凯普莱特）正在执行种族忠诚法律的地方，都仍旧有朱丽叶和罗密欧在呼喊：“啊！让我不做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让我只做我自己。”

只做你自己是种族民族主义不会允许的。当人们——因为恐惧或者欣喜——首先将自己视作爱国者，其次才是个人，他们已经走上了摒弃伦理的道路。

而每一个地方，在贝尔法斯特、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利沃夫、魁北克和库尔德斯坦，我遇到常常同为自豪的爱国者的男人和女人们，但他们顽强地抗拒走上那条道路。他们的第一忠诚保留给他们自己。他们的第一事业不是民族，而是保卫他们的权

利，选择自己的归属之边界的权利。

但这些人是四面被困的少数群体。这个世界不是由怀疑论者和讽刺家在管理，而是由持枪者和笃信者管理，而他们将要传递给下一个世纪的新世界，看上去已经是一个超出我想象的、更加暴力的、令人绝望的世界。如果在“冷战”终结的时候我曾经认为新的世界将由哲学家和诗人统治，那是因为我曾愚蠢地相信，我所居住的国家并不稳定的文明和秩序必定是所有民族的理性渴望。现在我不确定了。我作为一个自由派开始这一旅程，结束的时候我仍是自由派，但我禁不住想，自由派的文明——法治而非人治、以辩论代替武力、以妥协代替暴力——是与人类本性深深对抗的，只有经过与人类本性进行最为坚忍的斗争才能达致和延续。自由派的美德——宽容、妥协、理性——仍像以前一样有价值，但它们难以灌输给那些因恐惧而疯狂、因复仇而疯狂的人们。无论何时，说教总是听起来空洞。我们必须准备好用武力来捍卫它们，餍足的、世界主义的民族未能这样做，已经让饥饿的民族蔑视我们、厌恶我们。

在饥饿的和餍足的民族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理解障碍。我此生中一直居住在餍足的民族国家，在这里没有严重的边界争端，不再被外国人或压迫者统治，做我们自己房子的主人。餍足的民族有资本去做世界主义者，餍足的民族可以承担向饥饿民族的激情屈尊俯就的奢侈。但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库尔德人和克里人那里，我遇到了饥饿的民族，除非获得自决权（不管是在自己的民族国家，还是在其他民族的国家里），他们的生存仍岌岌可危。

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出在民族主义本身。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有一个家，每一个这样的饥饿民族都必须得到抚慰。错的是某一

种类的民族，那种民族主义者想要创建的家园，那种他们用于追寻其目标的手段。不管我去哪里，在那些仍旧相信一个民族应当是一个所有人的家园，相信种族、肤色、宗教和信仰不应当是归属的障碍的人们，和那些相信民族只应是他们自己家园的人们之间，斗争正在持续。这是在公民的民族和种族的民族之间的战斗。我知道自己站在哪一方。我也知道，现在，哪一方正侥幸走向胜利。

---

[1] 该隐和亚伯（Cain and Abel），《圣经》记载，该隐和亚伯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之子，该隐因为嫉妒而杀害亲生兄弟亚伯。

[2] 凯普莱特（Capulet），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的姓氏。

[3] 蒙特鸠（Montague），罗密欧的姓氏。

[4] 译文来自梁实秋先生所译《罗密欧与朱丽叶》。

延伸阅读

民族与民族主义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Verso,1983.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Blackwell,1983.

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Harvard,1992.

ERIC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870,Cambridge,1990.

ELIE KEDOURIE,Nationalism,Hutchinson,1960.

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Penguin,1991.

德国

ROGERS BRUBAKER,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Harvard,1992.

GORDON CRAIG,The Germans,Penguin,1982.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The Great Migration’,Granta,42,1992.

MICHAEL HUGHES,Nationalism and Society,Edward Arnold,1988.

ANNE MCELVOY,The Saddled Cow,Faber,1992.

PETER PULZER,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Halban,1988.

PETER SCHNEIDER,The German Comedy,Tauris,1992.

乌克兰

JOHN ARMSTRONG,Ukrainian Nationalism,Columbia,1980.

BOGDAN KRAVCHENKO,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Ukraine,Oxford,1985.

IVAN L.RUDNYTSKY,The Role of Ukraine in Modern History,Harvard,1987.

OREST SUBTELNY,Ukraine:A History,Toronto,1988.

南斯拉夫

SLAVENKA DRAKULIĆ,Balkan Express,Hutchinson,1993.

PAUL GARDE,Vie et Mort de la Yougoslavie,Fayard,1992.

MISHA GLENNY,The Fall of Yugoslavia,Penguin,1992.

BRANKA MAGAS,The Destruction of

Yugoslavia,Verso,1993.

JACQUES RUPNIK,ed.,De SarajevoàSarajevo,Editions Complexe,1993.

MARK THOMPSON,A Paper House:The Ending of Yugoslavia,Hutchinson/Radius,1992.

库尔德斯坦

JOHN BULLOCH AND HARVEY MORRIS,No Friends but the Mountains,Viking,1992.

PHILIP G.KREYENBROEK AND STEFAN SPERL,The Kurds,Routledge,1992.

SHERI LAIZER,Into Kurdistan,Zed,1991.

KANAN MAKIYA,Cruelty and Silence,Cape,1993.

魁北克

WILLIAM DODGE,Boundaries ofIdentity,Lester Publishing,1992.

RON GRAHAM,The French Quarter,Macfarlane,Walter and Ross,1992.

MORDECAI RICHLER,O Canada O Quebec,Viking,1992.

PETER RUSSELL,Constitutional Odyssey,Toronto,1992.

CHARLES TAYLOR,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Recognition,Princeton,1992.

PIERRE TRUDEAU,Federalism and the French Canadians,Macmillan,1968.

北爱尔兰

ARTHUR AUGHEY,Under Siege,Hurst,1989.

JONATHAN BARDON,A History of Ulster,Black Staff,1992.

GEOFFREY BEATTIE,We are the People,Heinemann,1992.

LINDA COLLEY,Britons,Yale,1992.

ROY FOSTER,Modern Ireland,Penguin,1988.

TONY PARKER,May the Lord in His Mercy be Kind to Belfast,Cape,1993.

致谢

我必须为一个欺骗请求读者原谅。本书所写，似乎我是在独自旅行。事实上，不管何时，陪伴我的人从未少于五个，制作与本书相伴的BBC电视纪录片。没有他们的陪伴，我可以肯定本书绝无可能产生。

我感谢阿兰·叶托柏制作本电视系列片，感谢他的继任者迈克尔·杰克逊的全程支持。Primedia公司的帕特·费恩斯和BBC威尔士频道的杰兰特·特尔芬·戴维斯最早提出本系列片的构想，BBC威尔士频道的菲尔·乔治全程带领团队，迈克尔·卓别林为本项目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卡迪夫工作室的特莎·休斯、瓦尔·特纳和玛丽安·威廉姆斯安排旅程，提供基本后勤支持。一路上，三位杰出的摄影师布莱恩·麦克戴蒙、安德鲁·卡彻里和亚采克·佩特里茨基设计画面。杰夫·诺斯、鲍勃·琼斯、托尼·米林和帕特里克·博兰德负责录音。伊恩·摩斯、劳伦斯·加德纳、拉尔夫·麦克唐纳和麦克·卡尔林担任摄影助理。科林·托马斯和蒂姆·兰伯特分别是三部电视片的导演和制作人，对于电视片的最终成型，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亚于我。本书中的许多思想源自他们的头脑。

在所有这些旅程中，我对我的翻译、研究人员和修理师倚赖甚重：在乌克兰是丽娜·波梅兰采夫，在德国是艾菲·帕里斯，在北爱尔兰是玛丽·卡尔森，在克罗地亚是阿兰·比瑞麦克和马克·汤普森，他们关于南斯拉夫崩溃的优秀书籍影响了我对这个地区的整体观点，在塞尔维亚是拉扎尔·斯托贾诺维奇和苏珊娜·约万诺维奇。

部分文字以不同形式首先发表于《新共和》（*New Republic* ）、《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Books* ）和《观察家》（*The Observer* ）。

最后，我感谢BBC图书的玛莎·考特和苏珊妮·韦伯、查托公司的乔纳森·伯恩汉姆通过一系列出版期限——我们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促成本书。

我必须要把我的感谢送给每一个参与的人，与你们一起分工合作的那种快乐无与伦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缘与归属／（加）叶礼庭著；成起宏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17-3329-0
书名原文：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I . ①血… II . ①叶… ②成… III . ①民族主义 - 研究 - 欧洲 IV .① 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9828号

血缘与归属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赵灿
特约编辑：田奥
责任印制：刘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战士的荣耀

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

[加拿大] 叶礼庭 著
MICHAEL IGNATIEFF
成起宏 译

THE WARRIOR'S HONOR

ETHNIC WAR AND THE MODERN CONSCIENCET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战士的荣耀

——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

[加]萨缪尔·巴特勒 著
成起宏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目录

导读：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

导论

1 一切皆不神圣？电视的伦理学

2 微小差异的自恋

3 道德厌恶的诱惑

4 战士的荣耀

5 我们想要从中醒来的噩梦

文章来源

来源注释

献给苏珊娜



第一次世界大战某战场，战争过后士兵正合伙把伤员抬出战场。“战士的荣耀既是归属的准则，也是责任的伦理。不管在哪里实践战争艺术，战士要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正当的和非正当的目标、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武器、文明的和野蛮的对待俘虏与伤员的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某战场，战争过后士兵正合伙把伤员抬出战场。“战士的荣耀既是归属的准则，也是责任的伦理。不管在哪里实践战争艺术，战士要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正当的和非正当的目标、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武器、文明的和野蛮的对待俘虏与伤员的方式。”



1993年，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西南4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鲁塔（Ljuta）在塞族人和穆斯林发生交火后被焚烧。“这是一场村庄战争，交战的双方从前都是邻居。”



战火中的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城市废墟一角。“这个城市将自己撕得四分五裂……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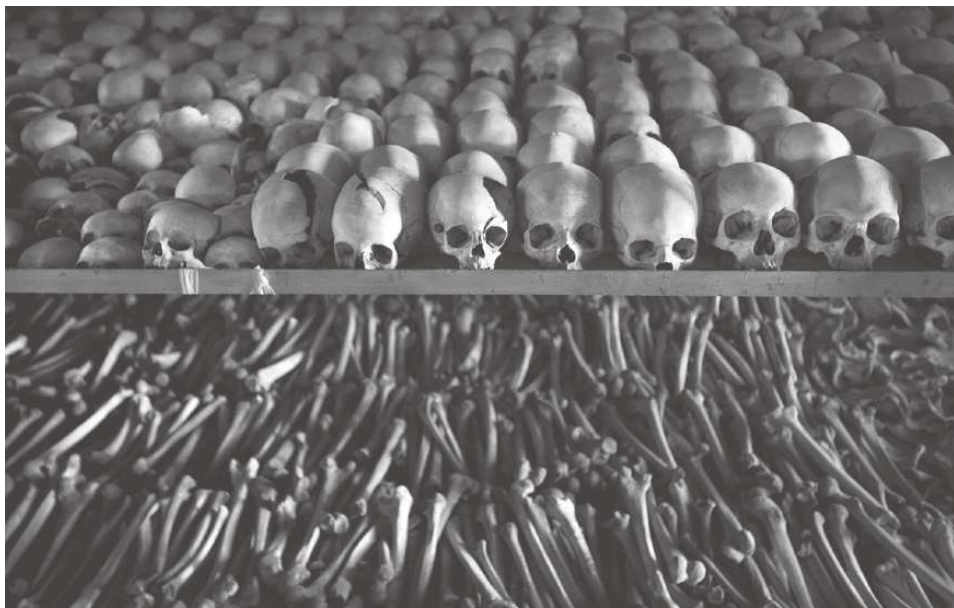
一位穆斯林妇女为在波黑战争中死去的亲人失声痛哭。“没有比内战更野蛮的战争，没有比最亲近的亲属之间的仇恨更棘手的仇恨。”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他是一个热情、瘦削而结实、皮肤泛黄的70岁老人，单独坐在一个靠窗的座椅上，看着窗外苏丹的沙漠。他想谈非洲，而我想谈波斯尼亚。”



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死难者。“在这儿，即使杀戮过了一年多，幸存者们仍然从中挖掘尸体。秘书长凝视着散发恶臭的黑暗，然后走开去深深地喘了口气。”



卢旺达大屠杀中的累累白骨。“一盏肮脏的灯光斜照在大腿骨、踝骨、臀骨、肩关节、牙齿和头盖骨上。没有肉体留下来，没有腐败的味道。衣服已经褪色犹如灰烬。”



在非洲执行任务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图中的部队由中国军人组成。“进入布特罗斯-加利时代以来，部署在全世界的维和部队数量已经下降，而活跃战争的数量在增加；在地球村里，我们重新回到了狭隘政治的时代。”



一辆布满弹孔的救护车，这是第32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会议会场外的一个展览品，瑞士日内瓦。“塔利班已经突破了阿富汗政府在喀布尔东南的防线，联合国和一些救援组织正在疏散城里的无关紧要人员，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如以往，将会留在大部分地区。”

导读：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

王前 [1]

2014年3月，笔者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参加关于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研讨会。来自欧美的专家在为期两天半的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伯林跟启蒙运动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伯林创建并担任首任院长的学院里，与会学者大多对伯林关于启蒙的研究颇有意见，有的炮火之猛烈让我这个也研究点儿伯林的外来者很是吃惊：如果搞不清状况，你会疑惑正在被讨论的这位哲学家是否还有讨论的价值。

记得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后一个多小时，我才赶到会场，因不想在别人发言时闯进去打扰，于是就上了二楼，站在走廊跟座席之间光线很暗的过道上听。没多久，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走了过来，他打开门正要进去。我定睛一看，眼前的不正是伯林传记的作者叶礼庭吗？简短的寒暄后他先进去了，我也就尾随而入，坐在二楼的座位上继续听。这天叶礼庭有主题发言，他反驳了时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德隆（Jeremy Waldron）对伯林的严厉批判。沃尔德隆主要批评伯林忘记了立宪启蒙主义的重要性，具体内容就不在此赘述了。 [2]

当时印象很深的是，这位伯林晚辈中唯一曾在政坛居高位、跟加拿大总理宝座擦肩而过的学者真是能言善辩，对当今法哲学重镇执牛耳者沃尔德隆反驳起来毫不客气，似乎成了场内为伯林辩护的最强音。遗憾那天他参加完会议就离开了，我没有机会请教。一晃三年过去，因缘凑泊，这次有机会阅读他的三本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读完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

因为以前只是仔细读过他那本伯林传记——那是本难得的关于哲学家的传记佳作——其他的除了访谈外基本上没有读过。这次通读三本书有许多新的发现，尤其对他深入兵荒马乱的纷争之地，了解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真相的努力肃然起敬：他是位典型的行动型知识人。

《血缘与归属》《火与烬》和《战士的荣耀》各有特色，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三部曲。《血缘与归属》谈新民族主义，《火与烬》写从政的经历，可以说是对他的从政经历的一部总结，而《战士的荣耀》则是一部谈论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若干当今世界重要问题的评论集，他关注的是“超越我们的部落，超越我们的民族、家庭、熟人网络的道德义务”。三本合在一起正好反映了叶礼庭这些年来的人生轨迹和他最关心的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叶礼庭谈论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有个特点，就是他不像某些理论家那样坐而论道，而是深入冲突的现场，亲自了解冲突各方的观点和立场，使自己掌握第一手证据，对问题具有发言权，从而使自身的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场感，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衍。换而言之，作者虽不乏理论家的素养，但并不是学院派理论家的论证风格，而是以充满临场感的报告为论述的前提和基础，让我们这些没有到过现场，没有掌握冲突的第一手资料的读者也能获得一副眼镜，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背后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在论述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从人权等普世价值出发进行的政治和军事干预时，作者也以明晰的笔调揭示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两难，一种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悖论，令人想起作者熟悉的伯林的著名论断：各种价值观未必是能够共存的，人类追求的有意义的价值观之间往往会产生冲突，真、善、美往往不

能兼得。处理那些复杂的民族冲突等问题时，需要有高度的现实感和政治智慧，否则结果只可能是半吊子的仁义和道德理想的幻灭而已。换而言之，叶礼庭揭示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很多悖论，身处那些悖论之中，我们会发现也许永远找不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我想先来谈一下给我很大震撼的《血缘与归属》。在此书中，作者写了他的六次关于新民族主义的旅程，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开始，中经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再到北爱尔兰。通过这些旅程，叶礼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当今新民族主义的灰色甚至是血腥的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世界各地的新民族主义倾向是如何导致冲突，甚至残酷战争的。比如，说到克罗地亚跟塞尔维亚的冲突，我们这些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外国人，除了看报纸电视上的报道，实在搞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何从原来和睦相处的邻居，昼夜之间就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给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概念》又提供了一个绝佳样本。叶礼庭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冲突地区进行实际调查，就是想要搞清楚双方冲突的根源。许多时候死亡如影随形，光凭这点就令人对这位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另眼相看。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我们这些遥远的东方人也就渐渐明白冲突的起因和问题的复杂性了，远非一句塞尔维亚人对异族进行种族清洗就可以解释完毕的。

我当时是从西方的媒体上得知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后来才知道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还有其他事件，比如“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民族独立组织乌斯塔沙(Ustashe)曾加入轴心国阵营，残杀过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等异族，最后被铁托击溃。作者到底是历史学出身，对事件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做了很细致的调查，所以他能够对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做出比较独立的判断，

对当年西方政府几乎一边倒的措施也能提出批评。他还去了铁托故居，为的是了解这位作为南斯拉夫象征的政治家在处理该国民族问题中起到的作用。原来铁托并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作为克族人的他，在建立了南斯拉夫之后，并没有真正处理好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矛盾，而是通过遮蔽和向前看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很敏感的问题。这种方法在铁托那样的铁腕人物在世时可以起作用，一旦他去世，原来被掩盖起来的问题就渐渐露出水面，后继者既然没有前任那样的权威，掌控不了局面，再加上立场偏颇，终于酿成一场巨大冲突，使原来和平相处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从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邻居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一些老人甚至说“二战”时候都没有杀得那么凶，这也让我们见识了新民族主义的巨大破坏性和残酷性。作者还采访了当过铁托副总统的一位老政治家，他俩关于历史和现状的对话也极有意思，读来饶有兴味。

作者写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民族矛盾的那一章也很吸引人，因为这里面有他自己的寻根旅程。叶礼庭的《伯林传》出来后，我读过一些人对作者的访谈，里面他谈到自己的家族。他的曾祖父是沙皇时代的内务大臣，参与过沙皇时代的排犹决策，而他的祖父则是沙皇时代末期的一位教育大臣，“十月革命”后举家流亡，最后定居加拿大。在去乌克兰采访的旅途中，他参拜了曾祖父母的墓地，见到了了解自己家族情况的年长的乌克兰人，虽非叶落归根，但这颇有回乡意味的旅途让作者感慨万千。毕竟他是流亡者的后代，所以他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尖锐民族矛盾有跟纯粹局外人不一样的视角和感受。作者在采访黑海舰队时所了解到的情况真是极好地体现了原属一个大国的若干民族在国家解体后面临的困境：你的忠诚对象究竟是谁？书里面提到住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到俄罗斯去竟然要护照，原先非常平常的国内旅行一变为国

际旅行，身份认同也变得尴尬起来了。

叶礼庭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到英国寻求发展，不但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做过不少精彩节目，而且为伯林那样在整个西方都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写了颇受称赞的传记，英国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了。但即便他熟知英国，在调查北爱尔兰问题时还是对英国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自己被英国的世界主义给“骗”了——英国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传统的。联想到脱欧公投，我们也就能理解英国独特的民族主义了：英国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变成世界主义式的，它虽然没有狭隘的岛国根性，但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这些“发现”都是作者的功劳：帮助我们打开视界，改变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对这个世界获得新的认知。

如果说叶礼庭的传记对象伯林是20世纪对民族主义最有见解的思想家之一，那么三本书中最厚的这本《血缘与归属》则给我们提供了新民族主义的各种范例。它们的本质都很相似，只不过是换了时代和环境，上演的剧本没有本质的差异。伯林在谈到民族主义时，既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也分析和批判了其残酷暴力的一面。伯林说19世纪的思想大家们几乎没有一个重视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大多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主义会逐渐式微，所以那些大家几乎都没有预料到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勃然兴起，甚至主导了很多政治运动。不管左翼、右翼，如果没有跟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可能都无法取得胜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礼庭的这本书几乎是在为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提供一连串有意思的解释和注脚。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因本书作者的叙述而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有立体感了。

伯林在思考自己的犹太民族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时，虽然并非完全没有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批评的袒护以色列的一

面，但他还是提出了双方应该妥协的建议，他对以色列政府的过激政策也提出过尖锐批评。巴以冲突里有的特征，你都可以在叶礼庭所记录的六次旅程里找到类似的对应。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处理民族问题的准则呢？透过叶礼庭深入冲突现场的考察，我们虽然被那些鲜血和暴力震撼，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让本来深陷民族冲突的各方和平相处的原则。当然，这绝不是喊几句世界主义的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需要倾听各自的声音，通过理性的对话来寻找一条共生的道路，否则只会是无止境的、没有意思的冲突罢了。叶礼庭对比了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笔者也倾向于认同公民民族主义，因为既然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都已几乎不可能是由单纯的同一个民族组成的，那么公民民族主义也就是唯一的选择了，这点跟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都说自己是绝对的正义，都不准备妥协，那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已故的卓越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对巴以问题的剖析完全可以用在巴尔干民族主义冲突上面。

在读完沾有血腥味和戾气的《血缘与归属》之后读《火与烬》，会觉得很有趣味——对曾败选加拿大总理的作者来说，这样说也许有点失礼。这本书是叶礼庭在近耳顺之年投入政坛的从政记录，对我们了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有不少帮助。笔者很喜欢看BBC转播的英国下院的论战，原以为欧美的议会大概都是差不多，哪里知道在作者的笔下，加拿大的议会运作并不精彩，有意思的演讲讨论也不多，纳税人也不是很关心自己国家议会的运转情况，跟英联邦的龙头老大西敏寺大本钟下的议员们比起来似乎差远了。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叶礼庭写他如何从政坛菜鸟逐步迅速进入角色，临危受命成为加拿大最大在野党——自由党——的党魁，并进而挑战当时的哈珀总理，却终因是空降政治

家和若干失言导致落败的过程。从作者坦诚的叙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英美等国工作30年左右，然后应忧心自由党前途的若干政治家的热烈恳求回国从政，这本身就给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在选举中对手始终可以拿这点来攻击他，而事实上加拿大的保守党正是这样做的，这让叶礼庭有口莫辩。毕竟作者大半生都在媒体和学界工作，做的是职业知识人而非职业政治家，要完成从学人到政治家的转身，时间还是太短了（虽然如今也有从房地产大亨摇身一变，成为总统的活生生的例子，那毕竟是罕见的，不可当作常有的事情）。他在选举过程中的失败经历正好说明他是政坛的菜鸟，跟那些年纪轻轻就在政坛打滚的职业政治家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不过他从谈政治的学人、战地记者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转到政治家的行业，从书桌上的“空论”到身体力行，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也是这本书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读完此书，可以发现他为我们考察当今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样本。我们一般都不太熟悉加拿大的政治文化，它的国土那么辽阔，却似乎一直生活在南边那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下。通过作者这位前自由党党魁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特朗普上台，引起这些巨变的要素在加拿大这个民主制度运转基本上算是很成功的大国也存在，比如移民问题，比如政策如何反映民意，等等。在去年美国的大选中，建制派精英饱受攻击，主张美国第一的民粹主义占了上风，这当然是跟美国国内存在的现实问题分不开的。叶礼庭本人是作为“空降兵”突然闯入加拿大政界的典型精英，当然会遭遇巨大障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跟选民打交道，让他们认识你、接受你，实在是很不简单的事情，需要接地气，自己去摸索，再多的政治理论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些修行的经历在书里都有很详细的

描述，让你觉得要当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实在不容易。当然，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叶礼庭落选后没几年，自由党又重新执政，当今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正是叶礼庭年轻时助选过的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的儿子，而这位加拿大“官二代”的从政阅历并不比叶礼庭丰富到哪里去，看来毕竟还是因为拥有父辈的人脉，加上更“接地气”吧。

《战士的荣耀》作为一本评论集，是叶礼庭对包括新民族主义在内的当今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汇总，里面也有很多令我们读后深思的内容。如果说《血缘与归属》是以报道为主，这本书则是他对那些问题较为理论化的探讨。作者在此书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电视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微小的差异如何导致民族冲突、红十字会在现代社会里的使命和局限，以及转型社会和民族冲突地区的和解问题。在讨论为何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样差异极小的民族会发生激烈冲突时，叶礼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做了梳理，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再有，讨论和解问题的《我们想要从中醒来的噩梦》也写得非常有深度，反映了他所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很多问题一经他的阐述，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的很不简单，远非采用“理客中”的态度就能处理好的。比如这篇文章里讲到和解中如何处理真相问题。我们知道南非有真相委员会，其在南非的国家和解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作用，战后西德对历史的反省也颇受称赞，但如果看一看内部情况，其实并不简单，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努力，有时是迫于外界压力。叶礼庭最后总结道：“和解建立在互相道歉的基础上，承认历史不是命运，承认历史不应受到谴责；也不应谴责文化或传统——历史必须谴责的只是特定个体。和解的最后一个维度（即哀悼死者）在于对和平的热望必须战胜复仇的渴望。除非和解尊重仇恨背后的情感，除非和解让曾

陷入战争的共同体学会共同悼念死者的仪式，以之取代包含的对逝者的敬意，否则它不会有反抗仇恨的机会。和解必须触及死亡民主的共享遗产，告诉人们所有终结于杀戮的争斗都毫无作用，想要报复那些不再存在的人的所有努力都是无止境的徒劳。因为杀戮不会让死者复活，这是最基本的一项确定性。这是一种可以共享的遗产，当它得以共享的时候，一个人从梦中醒来时或许才会获得这种深刻的认知。”这是在观察了新民族主义冲突的现场，对历史上和当代的种族冲突进行深刻思考后得出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对我们思考自己的历史也是有启示的。每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都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读完这三部著作，笔者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为了写作伯林传记，跟着伯林在伦敦坐巴士的那个四十岁左右的俄裔加拿大学人。叶礼庭写作的《伯林传》给20世纪留下了一份极有意思的记录，他在自己正值壮年的一段时期跟伯林的人生产生了交集，他所尊敬的这位哲学家思考的很多20世纪最重要的问题自然也给了他不少影响。细心的读者肯定能够发现，那些思考也不时出现在这三部著作里。叶礼庭的从政生涯虽然没有结出硕果，但他对政治的思考，对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重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因为他从政失败而失去意义。恰恰相反，这三本书是一位不满足于坐而论道，有付诸行动的勇气的知识人的人生记录和理论反思，在这个价值观有错位的时代里提供了很清醒的判断，对我们理解时代和政治大有裨益。

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托尼·朱特的友人、合写《思虑20世纪》的耶鲁大学斯奈德教授说，那些曾经被坚信的重要的现代性价值观如今却被怀疑，西方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黑暗的保守主义时期。从上面的叙述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叶礼庭跟他景仰

的伯林一样，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之子，虽然对现代性价值观不无批判，但他们都是捍卫现代性价值观根本原则的学人。依笔者的推测，对这个新保守主义时代他们肯定不会是赞成者，相反会是严厉的批评者（或许会被某些同胞骂为“白左”也说不定）。之所以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他们是顽固地捍卫启蒙等现代性原理的教条主义者，而是基于他们对历史的锐利洞察和学理上的深刻见解。那些启蒙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性价值观，固然在这两三百年里经历了很多批判，尤其是在被称为“极端世纪”的20世纪上半叶，启蒙运动以来的重要价值观遭遇过远比今日更为深刻的危机。虽然历史并未因为福山的那本名扬天下的著作而终结，现代性的根本原理毕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现在的我们也无须因为一场令人大跌眼镜的总统选举就对整个现代性价值体系产生深刻的动摇。

笔者在写这篇导读的时候，看英国的《卫报》等媒体报道说如今担任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校长的叶礼庭正在进行一场保卫大学的战斗。作为行动的知识人，他正在捍卫学术自由，在写他人生的新篇章，而此时他已入古稀之年。我们当然无法说作为政治家的叶礼庭获得了大成功，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败选后在电视上用英语和法语发表败选感言时的落寞眼光。据说西塞罗很喜欢说不应该根据成就来评价一个人，而是应该根据他为了某个目标而做的奋斗来判断，用这句话来评价叶礼庭，也许非常合适。在民粹主义再度沉渣泛起的年代里，叶礼庭的思索会给我们很多启迪。他当然不可能提供包治百病的药方——事实上自从柏拉图以降，也没有一个政治理论家做得到——但是他的观察和思考一定会刺激我们思考那些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的“真问题”。我相信各位读者读完他的这些著作后，大概会有类似的感触，也会有看问题的新视野和新眼光吧。

[1] 王前，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东亚教养教育创新组织特任副教授，专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在日本出版《中国是如何阅读西方思想的？》、《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合著）、《现代中国与市民社会》（合著）等多本著作，另在《知识分子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思想》等学术类杂志发表若干论文、随笔。

[2] 关于叶礼庭具体的发言内容，可参见笔者发表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思想》第二十六期上的文章。

导论

1993年到1997年，我在现代民族战争的各种景象之中穿梭：到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去了卢旺达、布隆迪、安哥拉，还到过阿富汗。我见过武科瓦尔 [1] 、万博 [2] 和喀布尔的废墟，奈阿卢布耶 [3] 教堂里的尸体，以及马扎里沙里夫 [4] 的孤儿。在检查站，我遇到新型战士——持有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的赤脚少年，戴弧形太阳镜的武装分子，正在检查枪支旁边的祈祷跪垫、包裹头巾的塔利班狂热分子。

我展开这些旅程，正巧是在新一波干涉主义的国际主义（interventionist internationalism）在海湾战争期间兴起之后，又在这波国际主义于波斯尼亚退潮之前。我想找出是一种怎样的道德团结和傲慢的混合物，让西方国家开始这一推动世界走向正确的短暂冒险。是怎样的冲动让我们去监督缅甸的选举，试着从萨达姆手底下保护库尔德人，把联合国部队派遣到波斯尼亚，恢复海地的民主，将安哥拉的战士推上台面。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仍旧联结着也许是本书的大多数读者和我所居住的安全地带，以及民族争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危险地带？

在此前的一本著作《陌生人的需求》（*The Needs of Strangers*）中，我关注的是在民族国家之中、在国内环境下的陌生人之间的道德义务。在这里，我关注的是超越我们的部落，超越我们的民族、家庭、熟人网络的道德义务。《战士的荣耀》是关于一种冲动的，那种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某则来自波斯尼亚、卢旺达或阿富汗的骇人报道时，都觉得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为什么恰恰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自认为对这些陌生人责无

旁贷？除了偶然看到电视上播出的暴行图像刺激我们采取行动，是哪种介入（involvement）的脚本和叙事，让我们中的一些人承认自己对那些人承担义务，而他们与我们毫无干系？

在19世纪，帝国的利益将两个世界捆绑在一起：象牙、黄金和铜使得帝国的代理人深入“黑暗之心” [5] 。在“冷战”的50年间，如果某一个超级大国的代理人、间谍或雇佣兵在一场特定的民族战争中出现，那么对立的另一方也必定在那里现身。现在，不再有迫使安全地带视危险地带为自身事务的帝国竞争或意识形态斗争的叙事。剩下的是一种同情叙事，而这种变化无常的、模糊的关系正是我的主题。

为什么我们要管远在半个世界以外、处于危险中的人们的事情？理由并非一目了然。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道德宇宙的边界也就是部落、语言、宗教或民族的界限。仅仅因为属于同一个物种，我们就应当对于边界以外的人类承担义务，这种理念是晚近的创造。是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帮助在20世纪的恐怖实验和种族灭绝中死去的成千上万陌生人，从由此产生的羞耻中觉醒的结果。这些实验没有带来任何好处，除了一种意识，即我们都是莎士比亚所谓的“天赋原形”：草味的人类，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 [6] 也正是“天赋原形”成了现代普世人权文化的主题——以及其基本理念。

以下文章探索了新文化在赋予我们创造能力时的道德联系。部分文章是讨论那些将陌生人的痛苦看作自己事务的西方人：激发了他们介入的义愤和理想，紧随介入而来的道德复杂性，以及常常伴随心力耗竭和脱身之后的幻灭循环。这种介入是现代道德想象一个极重要的新特征。在19世纪，这些人可能是外交官、传教士和帝国避暑山庄中的指挥官。现在，他们是援助人员、记

者、战争罪行法庭的律师、人权观察家，所有人都以一种无形的道德理念的名义工作，即不管其他人有多遥远，他们的问题都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但几乎每一个试图按照这个理念生活的人都有一种糟糕的感觉：没有人能完全确定，我们的参与让事情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没有人能完全确定，我们的参与应当扩展到多远；没有人能完全确定，我们的承担事实上有多么深入——毕竟，它们是通过电视传播，而我们的参与可能是密集的，却浮于表面。康拉德的道德厌恶寓言——《黑暗之心》——仍然拥有令人不安的作用。

我的第二个主题是：一旦介入，我们将会面对什么？正在发生什么，让世界显得如此危险和喧嚣？谁是后现代战争的新建筑师，是那些正在将20世纪90年代的失败国家撕裂的武装分子、游击队员、民兵和军阀吗？过去，战争发生在战士之间；现在，战争发生在非正规人员之间。这可能是后现代战争如此野蛮、战争犯罪和暴行如今成了证明战争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新的战争制造者和代表我们道德关注的自由派干预主义之间，有一种道德上的断裂。身处西方的我们从一种基于人权理念的普世伦理出发，新的战争者是从排他主义的伦理出发，亦即将合法的道德关注限定在部落、民族或是种族之内。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许多机构发现，人权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市场。对于那些斗士而言，战士身份远远比人类身份更有吸引力，因为战士拥有荣耀的准则，而人类——作为人类——什么都没有。即使如此，对于一名持有卡拉什尼科夫的赤贫孤儿，或者依靠抢劫和掠夺生存下来的非正规民族武装分子，战士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呢？随着国家的分崩离析，军队和指挥链条随之瓦解，与此同时，那些固有的、有时可以避免战争沦为兽行的战士之准则也不复存

在。在这样令人绝望的环境中，国际救援人员努力寻找本土化的道德和援助策略，力图防止民族战争沦为大屠杀。

本书进一步的主题是国外民族战争对于我们思考国内民族包容性的影响。这些战争的野蛮使得厌世具有一种富于诱惑的吸引力。我们很容易认为，民族战争是潜藏在我们所有人之中、不可救药的部族主义的返祖性爆发，不同种族和族群生活在一起毫无希望。自从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以后，返回危险地带的旅行者们一直运用他们的经验，来纠正那些生活在安全地带的人们的自由主义幻觉。

然而，在我们的本性中，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让种族或族群冲突无可避免。不同的种族和族群可以和谐甚至友好共处，这样的理念不是无望的幻觉。如果更进一步审视，甚至长期存在的、对民族战争地区的顽固憎恶明显是一种恐惧的表现，这种恐惧由一种机制的崩溃或者缺失所造成，这种机制能让个人形成足够强大的公民身份，从而抵消自己的民族忠诚。当人们居住在稳定的国家——即使是贫穷国家——的时候，他们不需要仓促地寻求群体保护。是国家的解体以及由此导致的霍布斯式恐惧，催生出民族的分裂和战争。

我提出的最后一个主题，是记忆和道德治愈：社会如何从战争和野蛮之中醒悟过来？他们如何才能将不可承受的过去抛在身后？再一次，当这些社会需要遗忘的时候，自由派的干预主义者带着对真相的治愈作用和正义的道德必要性的虔诚来到这些地方。我们 从真相的精神分析特质开始，他们 学到的则是镇压的必要性。非洲格言说，所有真相都是好的，但是否所有真相说出来都是好的呢？这是摆在战争罪行法庭和真相委员会面前的困境。局外人能够带来的治愈是有限的。民族战争仍然是一个家族

的争吵，是兄弟之间的殊死争斗，只能在家族内部得到解决，只有当恐惧不再统治之时才能得到解决。

没有理由绝望。对于每一个像阿富汗一样陷入民族冲突的社会，都有一个像南非一样从深渊中挽救回来的艰难旅程。只要这个世界宣称某一部分——比如说中非——毫无希望，就会出现看上去有能力打造出这些地区所需要的强大的、合法的国家领导人——如果他们想自己从战争陷阱中抽身的话。对于每一个像索马里那样的失败干预，都有一个安哥拉，让人们始终抱有以协商方式获得持久和平的某种希望。当这个世界似乎想让战争罪犯们逃脱罪责的时候，只有将某些人绳之以法，逃脱惩罚的循环才会被打破。

世界并没有变得越来越混乱或者越来越暴力，尽管我们在理解和行动上的失败让世界看上去混乱或暴力。世界也没有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尽管同情叙事和道德承诺可能软弱无力，但绝对比50年前强大得多。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1945年以来，随着道德普世主义——其最重要的表现是一种共享的人权文化——的话语和实践的增长，我们的道德想象转变到了何种程度。电视使得人们很难保持冷淡和漠然。最后，在我们世界的各个地区之间沟通调停的援助人员和活动分子大军，其力量和影响持续增长。他们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托词，但也是我们在未来做出更为深入、更为持久承诺的途径。这种全球良知的出现没有给我们任何自满的理由，但也绝不会为幻灭提供辩护。

---

[1] 武科瓦尔（Vukovar），克罗地亚东部城市，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此展开激战，整座城市变成废墟。（本书除导读部分外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2] 万博（Huambo），安哥拉中西部省份。

[3] 奈阿卢布耶（Nyarubuye），卢旺达城市。

[4] 马扎里沙里夫（Mazar al Sharif），阿富汗第四大城市。

[5] 《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著名小说，叙述英国殖民者深入刚果河非洲腹地的故事。

[6] 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中的名句，译文参考朱生豪译本。

1
一切皆不神圣？电视的伦理学

I

埃塞俄比亚，科勒姆（Korem）难民营，一位英国护士小心翼翼地穿行在一大堆蹲坐于战地医院门口尘土中的妇女和儿童之间。她正在挑还可以施以救助的孩子，她在决定，谁可以活下来，谁将死去。一个电视团队跟在她后面，在一片饿得奄奄一息的人群中艰难移动。一名电视记者拿着麦克风，靠近护士，问她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何感受。这个问题让她觉得无法回答。面对摄像机，她的眼神十分迷惘。

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带着像这样的问题，电视让西方的道德良知直面饥荒地区和民族战争的苦难。通过它的新闻报道和像“拯救生命”[1]这样的大型演出，电视已经成为享有特权的媒介，用以沟通现代世界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然而，我们很少审视电视图像的作用，以及关于此类道德关系的新闻采集准则和规范。第一眼看上去，这些图像所产生的道德关系可以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要么把它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可能产生的、混乱的窥视癖的例证，要么看作道德良知的国际化大有希望的例子。当然，困难在于，这些对立的解读可能都是真实的。让我们一个个来看吧。

首先，毫无疑问，电视对于饥荒和战争的报道对西方慈善事业产生了显著的作用。单单在英国，自从1984年10月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纪录片首次播放以来，超过6000万英镑的资金捐献给

了饥荒救助机构。自比夫拉[2]以来，欧洲各国政府第一次发现自己在一个发展问题上受到公众持续的压力。许多本来众所周知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如欧盟农业政策所产生的大量粮食盈余——当与饥荒图像并列放置在一起时，突然变成一桩公共丑闻。电视带来的公众压力直指官僚主义的惰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借口——放任早已预测到的食品危机变成一场灾难。电视有助于打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无须两边的政府在其中斡旋。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子化的国际主义，将富人的良知和穷人的需要联结在一起。作为一种媒介，电视大幅度减少了压力和行动之间、需求和反应之间的时间滞后。没有它，成千上万的饥荒和战争的受害者会继续死去，就像他们在电视出现之前默默无闻、无人惋惜地死去一样。

然而，如果这是电视的道德良知中善的一面，当它将目光投向灾难时，也有带来更多麻烦的另一面。有批评认为，除非食物的短缺有一种庞大的视觉吸引力，否则电视新闻将对它视而不见。还有些人质疑，当对恐惧的关注转移到世界的其他角落时，食物短缺的报道就从每晚的新闻报道里消失了。媒介的聚焦是短暂的、集中的、混乱的。它为自己制造的道德理由的有效寿命极为短暂。通过那个记者询问护士的问题，电视聚焦带来的其他令人忧虑的方面进入人们的关注视线：你有什么感受？这个问题也许是源自一种渴望，想要跨越记者所了解的、横亘在护士和那些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的人们之间的距离。它也可能源自一种需求，想要填补那些饥饿地挣扎于记者脚边的人的无声沉默。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只不过确认了一条移情——“共同受难”——毫无希望跨越的鸿沟。这个问题暴露了一种星际间的道德距离，视觉图像文化以其残忍的即时性仿如魔法般消除了距离。

一方面，电视有助于打破国籍、宗教、民族和地理等障碍，这些障碍曾经将我们的道德空间一分为二：那些需要我们承担责任的，以及那些超出我们范围的。另一方面，它让我们成为其他人苦难的偷窥者，成为他们痛苦场景中的游客。它带领我们直面他们的命运，同时模糊了横亘于我们之间的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距离。我试图阐明的，正是这种矛盾的、互相抵消和影响的混乱。

II

电视图像无法确证一切，它们只能作为个别例证。人类遭受苦难的图像并不能确证自身的意义；它们只能作为一种道德宣言的例证，如果观看的人们明白他们对被观看者承担潜在责任的话。观看者对这些图像的反应中，似乎有自然的移情机制在发挥作用，在此背后，存在一个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反应，从而形成道德良知的历史。正是这一历史，让欧洲人逐渐开始相信人类普世性的神话—— 一种简洁的理念，即民族、宗教、性别、国籍或者法律地位不能用来为不公正的对待辩护；或者更明确地说，人类的需求和痛苦是普遍相同的，我们也许有责任帮助那些出身、国籍、民族或地缘亲近程度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

基督教对救赎普遍性的承诺，是第一个挑战传统的、将人类划分为公民和奴隶做法的伦理宣言，中世纪的普通法将这个所有人类主体具有同一性的理念，视为欧洲法律体系建构的基础。伴随着宗教改革，对于一个分裂成敌对教派的世界来说，以基督教王国统一性为前提的人类普世性被认为是全新的。现代早期的自然法理论家们发展法律思想，希望为一个存在尖锐的法律和伦理冲突的世界提供一个普遍性的自然法。自然法的核心关注是界定

陌生人的权利——战俘、灾难事故的幸存者——碰巧从某一种法律区域掉入另一个区域的人们，或者掉到两个区域之间的人们，以及那些因此而被解除了防备，依赖于自身及俘获者、自身及救助者之间的责任文化的人们。这种界定和捍卫普世个体的权利的斗争，大都是在宗教战争的阴郁背景下进行的。

在蒙田 [3] 、培尔 [4] 、洛克 [5] 和其他许多人的笔下，出现了现代的宽容理念，他们憎恶用区分人类身份的方式，如宗教、民族、地域，为屠杀其他人类辩护。其核心，如朱迪斯·施克莱 [6] 和其他人所指出的，是否认反上帝的罪恶——亵渎神明、异端邪说、不服从——为反人类的罪恶提供正当性。没有更高级的法律可以为非法夺走人类生命辩护。这种宽容理念的倡导者也坚持认为，考虑到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形而上学基础普遍无知，所有人类都有平等的权利尽可能地解释那些基础，只要他们对其他人的财产和生命不构成危害。17世纪的哲学家认为，在国内以及国家之间，教区中公民和平的哲学根基，是一种共同遵守的人类同一性和平等性的自然理念。

当然，这些都只适用于欧洲人世界中的白人男性，但当欧洲人入侵北美和南美时，在16世纪人物如散文家蒙田和西班牙传教士拉斯·卡萨斯 [7] 看来，很明显它也适用于非白人民族。即使他们的笔未能阻止或延缓欧洲帝国主义带来的大规模毁灭，但他们有助于在帝国主义叙事的核心中创造出一种分量堪比征服自身的罪恶感。即使欧洲帝国主义将世界区分成“我们”和“他们”——白人和黑人，基督徒和异教徒，文明人和野蛮人——但在欧洲的道德良知中，始终存在一种基督教的和法学上的普世主义，拒绝承认这种对人类责任的排他性定义。我们仍旧生活在开始于欧洲人第一次地理大发现的良知历史中，但肯定有那么一个时刻，人类

同一性的普世主义定义赢得了对排他性不可逆转的胜利，那就是从1780年到1850年间成功地反对奴隶贸易，进而反对奴隶制本身的运动。当然，在这些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意图并不完全是高尚的；奴隶制的成本、奴隶相比于自由劳动者的低效率也在经济利益和道德良知的权衡中起到了作用。确实，整个故事不能写成道德启蒙进步性的演变，它更像是一种斗争，想要调和普世主义道德冲动及其常常带来的令人不安的结果。

这些结果有一部分被带入饥荒问题的尖锐争论中。从早期教父 [8] 的时代开始，纾解穷人困苦的职责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这是基督徒公共伦理争论中的中心议题。如果这个职责是正义的，穷人的困苦可以说是给了他们要求富人财产的权利。像阿奎那 [9] 这样的教父们担心，这一权利会危及固有的财产权利，而这是社会秩序自身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穷人没有权利，只能依靠慈善过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饥荒时期注定会饿死。基督教伦理的历史是在财产权利和饥荒时期穷人的要求之间反复不休地争论的历史。在实践中，伦理学普世主义的要求，在基督徒教诲以及后来的欧洲自然法中受到严格的限制，对于困苦中的陌生人，富人仅仅有自愿性的慈善义务。概括来说，一个依次递减的受道德影响的秩序形成了：首先是朋友和亲属，然后是邻居、同一教派的人、同一国籍的人，只有到最后，才是不确定的陌生人。到今天，陌生人——电视屏幕上的受害者——的要求，在我们的道德义务太阳系中，是最远的那颗行星。要求我们帮助那些“更靠近自己家”的人，总是更有说服力。这种说服是否正当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在这种对国外的慈善性移情的所谓自然流露中，有大量的道德混淆。而它反映出，在伦理的普世主义良知和私人财产权体系的需求之间，在熟识者的需求和门外陌生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长期冲突。

面对这种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总是将资产阶级的道德普世主义看作一种意识形态欺骗的面纱。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所有个体都是拥有权利的生物，这种自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只有在根除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关系的社会中才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讽刺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的历史，要特别提及莫里斯·梅洛-庞蒂 [10] 的《人道主义和恐怖》（*Humanism and Terror*），它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公开审判斯大林之批评的回应。梅洛-庞蒂指出，人道主义者对苏联政治暴力的批判，是一种虚伪的努力，它试图否认资产阶级自身统治的暴力本质，也是一种否定革命的必要自卫手段的努力。梅洛-庞蒂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缺憾是拒绝承认：从资产阶级崛起到苏联革命胜利，暴力始终是进步的动力。

罗兰·巴特 [11] 关于影像展览的论文《人类一家》（“The Family of Man”）属于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反击一类，它将梅洛-庞蒂的观点扩展到了美学领域。巴特提出，展览对人的自然人类身份——他是“人类一家”的成员——的赞颂，将历史上真实的男人和女人，贬低为仅具有动物学身份的无关紧要的同一性。通过这种做法，这些图像试图将人类经验的基本要素——工作、游乐、苦难和悲伤——包裹在一个永恒的必然性的光晕之中，从而将苦难和压抑从人类行动的范围中去除掉。

如果我们遵循这种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伪善之言的批判，那么电视传播恐怖图像的耻辱之处，并非存在于它们所显示的东西之中，而是在它们所压抑的东西之中。因此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说，视觉图像文化将观看者和受难者之间的关系道德化，由此形成一个游离于历史之外的永恒的移情时刻。电视将经济和

政治关系展现为人类关系，断言西方道德良知和第三世界陌生人的困苦之间的联系是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隐瞒了将西方与其新殖民腹地联系在一起的剥削历史。按照这个观点，移情所释放出的慈悲是一种忘却的形式，是一种健忘症的再现：西方忘了要为自己引起的饥荒和战争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怜悯机制确实是遗忘和傲慢的复杂混合体，而被拔高的自尊则是对他人遭受苦难而产生的道德移情光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电视（以及我们自身）与这些图像的相遇，其矛盾程度远远超出此类分析的结果。尽管我们很容易认为，视觉图像文化更喜欢苦难的形象而非连篇累牍的分析，但它没有压制对其原因的分析。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每一个结构性特征——非洲之角的军备竞赛，不公正的世界商品定价体系，西方开发机构未能给予土壤垦殖、土地改革、定居计划充足的投资，当地的统治者投身内战而不是致力于满足人民需要的荒诞现实，这些都在电视上被记录下来。如果观看者认为饥饿某种程度上理所当然与自己有关，那是因为在这些图像之前，我们记录第三世界的发展已经超过10年，这种发展尽管偏向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12] 而非弗朗茨·法农 [13] 的意识形态方向，但至少明确阐释了某些新殖民经济和政治依赖的结构。报道当下事件的电视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沟通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新文化，用来作为观看者和受难者之间移情流动的媒介，但对在西方公共舆论中建立大众对发展问题的初步理解，它扮演了一个诚实的、有时是重要的角色。如果电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至少要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涉及第三世界时——是故意的健忘症、怀有负罪感的良知、道德化的自尊以及现实理解的深层复杂混合体。电视并没有压抑这种矛盾，它如实地再现了所有的混乱。

人类同一性的神话，一种将观看者和受难者捆绑在一起的、人类共同需求和共同痛苦的想象，其本身暧昧含混。白人观看者为了地球另一头的黑人受难者而邮寄支票，这种慷慨可能与他们对待自家附近的黑人截然不同的行为混合在一起。移情的快乐之一，是忘记人们的道德不一致性。然而，宣称建立在距离之上的道德移情不过是自我欺骗的神话，而且不言而喻是依赖其自身的道德神话，即完全基于共同经历的“共同受难”可能只存在于那些享有共同社会身份（例如同一阶级）的人群中间。然而，与普世性的人类手足情谊相比，阶级身份仍然是神秘的、想象的。其中产生的伦理学必然将世界区分成我们和他们、朋友和敌人。基于阶级同一性的道德国际主义曾有过其荣耀时光——如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但也有其耻辱时刻。当苏联坦克隆隆驶入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这些部队被告知，他们的进军是为了帮助他们的同志，对抗共同的阶级敌人。“消灭阶级敌人”一直是“二战”以后苏联军队和游击队所使用的口号 [14] ，更不用说柬埔寨的水稻田里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果存在于人类手足情谊神话中脆弱的国际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回归现代世界，那是因为那些按照宗教、民族和阶级划分的排他性的人类团结体——已经因以他们为名所犯下的罪行而名誉扫地。

但是，在20世纪，这一神话拥有一种比19世纪的先驱者们——如反对奴隶贸易的福音派运动 [15] 和反对保加利亚暴行的格拉斯顿（Gladstone）运动 [16] ——更为阴郁的道德色彩。19世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自由贸易的政治经济中汲取灵感，其愿景是将全世界各个民族聚集在同一个世界市场中；从一个进步信念中汲取灵感，即将不列颠帝国的扩张理解为人道思想前进的例证，并且依据为次等种族 [17] 带去文明法则来构想人类的普世性。

在20世纪，人类普世性的理念，更多停留于恐惧而非希望之中，更多停留于对人类做恶之能力的恐惧而非对人类行善能力的乐观，更多停留于人类对自己同类的狼性而非人们做自己历史创造者的想象。在通向这一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驻留有亚美尼亚、凡尔登、俄罗斯前线、奥斯维辛、广岛、越南、柬埔寨、黎巴嫩、卢旺达和波斯尼亚。一个世纪的全面战争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平民和军人、男人和女人以及孩子，等等。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暴力分布于部落、民族、宗教或民族分界线的时代——怜悯和同情也是如此。如果说新的科技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和一种新的犯罪——大屠杀，那么我们也见证了一个新的受害群体的诞生。战争和大屠杀颠覆了按国籍、民族和阶级划分的道德界标，我们曾习惯于用它们来分配救助苦难的责任。如果我们现在理所当然地认为，遭受苦难的陌生人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那是因为一个世纪的全面破坏已经让我们羞于按照民族、宗教、地域来划分道德责任的营地，而正是这种划分导致对犹太人的抛弃。现代道德普世主义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犯罪经验之上：反人类的罪行。

饥荒和民族战争将大量不同的个体研磨成完全平等的纯人类单位。五十多年前散布于欧洲东北部集中营里的，有来自波兰的农民、来自汉堡的银行家、来自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来自里加[18] 的杂货店主，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社会身份，与他们的统治者有不同类型的关系，他们都被放置在苦难的砧板上，锤炼到完全同质，然后彻底湮没。在埃塞俄比亚的营地里，高地的基督徒、低地的穆斯林、厄立特里亚人（Eritreans）、泰格里翁人（Tigreans）、阿法斯人（Afars）、索马里人 [19] 重演了砧板上的苦难一幕，成了完全同质的受害者。在这个裂变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被割断了社会关系，在正常时候，这种社会关系也

许能拯救他们的性命。每一个在埃塞俄比亚集中营里的个体，曾经是儿子、女儿、父亲、母亲、部落成员、公民、信徒、邻居，但这些社会关系都不足以支撑危难时刻的救助恳求。饥荒，像大屠杀一样，摧毁了维持每一个个体权利体系之社会关系的毛细血管系统。以此，大屠杀和饥荒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主体——纯粹的受害者，他被剥夺了社会身份，因而丧失了在正常情况下会倾听他哭泣的特定道德观众。家庭、部落、信仰、民族都不再作为这些人的道德观众而存在。如果他们最终想要得到拯救，必须将信任投向最令人恐惧的依赖关系：陌生人的善心。

因此，在这些情况下的人类手足情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来自陌生人的剩余道德义务体系，当其他所有能够帮助一个人的社会关系都被剥夺时，它才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手足情谊是被20世纪的恐怖历史变为现实并具体化的神话：它是与历史相随的神话，一件只有历史才能给予的必需品。不存在像人类种族之爱这样的东西，只有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爱，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道德真理在20世纪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测试。我们总是说，义务是社会性的、有前因后果的、关联性的和历史的。然则，对于那些社会和历史的关系已经完全被粉碎的人们，能做些什么呢？人类生活现在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范围遍及整个大陆的饥荒、生态灾难和大屠杀，这些情况下的受害者没有社会关系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拯救，结果，他们让来自陌生人的普世性道德义务伦理学，成为未来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一件必需品。毫无疑问，这样的义务伦理学在我们的道德意愿中将始终是第二位的要求，从属于我们慷慨给予兄弟、姐妹、同胞、信仰相同者或共事者的关怀。但没有这种软弱的、变化无常的伦理学，没有这种非个人化的、对陌生人的承诺，普世受害者将会发现，没有人会越过铁丝网来帮助他们。正是这种软

弱的道德语言，以及它试图应对普世受害群体的全新经验，让电视成为拥有特权的现代媒介。

III

电视也是一种新的政治工具。1945年以来，生活富足和理想主义让一大群非政府的私人慈善组织和压力团体 [20] 得以出现，其中包括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救助贫困组织（CARE）、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基督教救助协会（Christine Aid）、乐施会（Oxfam）、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以及其他机构，他们使用电视作为其活动的中心，为全世界面临困境的人们和他们的居住地进行道德动员和募捐。这是一种将世界而非国家看作政治空间的政治，是一种将人类物种本身而非特定的国籍、民族、宗教或族群作为目标的政治。它是一种“物种政治”，努力从人类自身手中拯救人类，就像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正在努力从偷猎者手中保护自然和动物物种一样。这些组织寻求避开介于机构和人之间的“双边政府关系”，在两者之间建立直接的政治联系，例如，大赦国际的支持者与特定的囚犯之间，或者美国的家庭与拉丁美洲等待收养的孩子之间，又或者田野服务的志愿者和他们的农民客户之间。这种政治试图建设一种世界公共舆论，守护那些缺乏自我保护手段的人们的权利。运用电视媒介，许多这样的国际组织已经成功地迫使各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自己采取的国内镇压措施所产生的公共关系成本。通过说服西方国家将贷款协议、武器合约和一揽子开发项目与人权领域行为的某些标准联系在一起，这些组织也在尽其所能提高这种成本。从而，在基加利 [21] 、喀布尔和约翰内斯堡的监狱中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了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的事

情。在民族国家、政党意识形态、公民行动主义之类的政治显示出耗竭、幻灭和僵滞迹象时，这种新的政治展现出自身强有力的承诺和资金动员能力。它之所以受欢迎，大部分要归于一个事实，即它是一种反政治，它拒绝所有政治理论家们提出的、为伤害人类的罪行辩护的论点。它也是一种拒绝将受害人分门别类的反政治。例如，大赦国际拒绝将政治犯区分为右翼或左翼，拒绝区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下施行的虐待，或是在美利坚式自由的名义下施行的虐待。

电视尤其适合这种政治的某些特性，它能将政治意图及其后果面对面地放在一起：轻点一下编辑按钮，电视可以凸显将政治家捍卫自由的演讲和丛林中被屠杀的尸体分隔开来的抽象鸿沟。电视道德的最佳体现是战地记者的道德，这些富有经验的老手已经听够了左派和右派提出来为人类的残忍辩解的陈词滥调，他们明白最终只需要将关注点放在受害者身上。英国战地摄影师唐·麦库林 [22] 在他关于比夫拉、孟加拉和越南的图片集的序言中表达了这种伦理：

> 但我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我当然站在穷困者这一边。我永远不会说自己是政治中立的。但要问我是属于右派还是左派——我没法说。我觉得自己受到困扰，我的背景，我对再现事实的无能为力，以及面对政治理论时的完全困惑：我是如此沮丧，甚至不去参加投票。我试图做一个见证者、一个独立的旁观者，结果是无法超脱我所看到的事实。我见过太多的苦难。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中的一员。而站在那样的立场上，我才找到了完整的自己。

电视的良知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同样的词语来描述：关注受害者而非虚伪的政治修辞；拒绝区分好人的尸体和坏人的尸体（尽管美国人对越南的报道因没有做到这一点而声名狼藉）；做一个见证者，一个向全世界的良知关注者们传递坏消息的承载者。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道德国际主义，它与60年代的国际主义隔着一个疲惫不堪的世界。如果有人在1967年说，他拒绝区分美国人对人权的侵犯和北越人对人权的侵犯，他可能会同时遭到左派和右派的攻击。但既然北越人获得胜利之后紧接着是进一步的扩张战争，以他们留下的受害者为道德立足点去评判意识形态的这一做法，便压过了正义的喧嚣而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就像衣服有时尚，道德也有流行时尚。电视曾经跟随越南战争中的道德时尚，那确实不是电视创造出来的时尚。只有电视管理层相信电视让美国人不可能赢得战争。如果今天在电视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伦理学是不留下任何好的事情——只有坏事情的受害者——那么我们不能保证媒体不会向下一波道德时尚屈服。甚至存在一种危险，电视对事件原本健康的愤世嫉俗，可能倒转过来变成一种浅陋的厌世情绪。只有在受害者自身显然无可指责的时候，受害者伦理学才能产生移情作用。但在现代的内战中——20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90年代的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平民和战士之间的区分常常模糊不清，邻居之间互相残杀，很难分清谁是无辜的、谁是有罪的。一开始身为侵略者的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常常到最后变成受害者，本来是受害者的民族——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成了侵略者。寻找无辜受害者变成一个徒劳无功的任务。散落在废墟之间的尸体似乎彻底表明更深的理解毫无必要：这里的人们陷入死循环，每一方都有完美的理由去杀戮对方，每一个理由都和对方一样疯狂。电视上的尸横遍野让人们从想要理解的尝试中退缩回去。

当移情找不到无辜的受害者时，良知在浅薄的厌世情绪中找到了安慰。“他们全都疯了”，由于这种反应一再出现，它消除了帝国式的西方和东方的两分法，即存在于西方的美德、温和、理性和存在于东方的狂热和非理性。在这里，厌世在所有场合中投下了健忘症的阴影：越南、福克兰群岛、“格林纳达入侵”、“沙漠风暴”，在这些地方，嘲笑东方狂热的同一种良知，发现自身陷入了犹如战争一般的狂热。

如果人们要理解现代战争，不仅要进入受害者的世界，也要进入枪手、施虐者、为恐怖辩护者的世界。对于这些人，“人类是拥有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生物”这一理念只对自己人有效。在涉及其敌人和受害者时，这些人则会罗列有说服力的理由，完全拒绝把他们看作人类。恐怖世界不只躺在尸体之上，不只是那些后果，也存在于意图之中，存在于杀戮者的思维之中。面对具有深层说服力的杀戮意识形态理由，在道德厌恶中寻找避难所的诱惑确实很强。然而厌恶只是思想贫乏的替代物。作为道德厌恶的媒介，电视拥有令人不安的力量。作为暴力人群和他们希望受其关注的观众之间的道德中介，电视图像展示后果比挖掘意图更为有效，它更善于指向尸体，而不是解释为什么在某些地方暴力可以获得回报。因而，电视新闻对于那种普遍的厌世情绪要承担某种责任，对轻易地放任狂热、愚蠢的犯罪行为和暗杀要承担责任，这种放任为我们时代一种危险的文化情绪提供了正当性，即认为世界已经变得过于疯狂而不值得认真对待的那种情绪。

IV

到现在为止，我提出了如下观点：以电视为媒介的道德移情拥有一段历史——道德普世主义在西方良知中的出现；这种普世

主义始终与“亲属与朋友比陌生人更具有道德优先权”的直觉相冲突；20世纪道德普世主义的变形采取了与受害者站在一起的反意识形态和反政治的伦理学形式；这种伦理学所承担的道德风险是厌世，一种由于电视的视觉专注于后果而非意图而加剧的风险和诱惑。

现在我们要更密切地关注电视新闻本身，关注其体制选择的影响和观看者与它所描述事件之间道德关系的呈现。当我们说看电视是一个被动的经历，意思是说，在其他方面，我们不了解支配我们视觉的权威之本质是什么。电视新闻是一种最新的形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半小时新闻已经有30年的时间，而其规范应当已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落地生根。然而，随着熟悉程度的增加，这些规则变得更加明显，更多是一件文化讨论和拷问的事情。新闻是一种相当于小说或戏剧的体裁：它是一个视觉权威的体制，一种用秒表来控制的强制性的图像集合。电视新闻的很多规范传承自报纸和广播：国内新闻比国际新闻重要；新闻是一天之中“国家”和“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昨天的新闻——如昨天的饥荒——不再是新闻；必须有一部分新闻是好消息，也就是说，广播可以在一个惨淡的世界中卸下某种加油助兴的责任了。对于这些现成的规范，电视采用了其中的两个：新闻必须都是视觉的，而且它必须适合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的形式。这些规范产生了一些臭名昭著的后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每晚半小时新闻的整个脚本内容，与《纽约时报》头版四分之三的内容完全一致。晚间新闻是个大杂烩：宾夕法尼亚的龙卷风、波斯尼亚的枪手、曼彻斯特罢工的教师、英国王室出游萨福克郡、加利福尼亚医院里的婴儿心脏手术，全都交织冲撞在一起，按媒体的时间限制口述出来。而这种展现给观众的事件混乱堆积，似乎就是外部世界的混乱无序的体现。这种散漫性还混合了富有人情味的故

事，它在所有媒体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新闻在这方面的增长一度被理解成平民主义者对官方、政府垄断信息的强硬反抗。然而这种平民主义者对新闻价值的重新定义中包含了好奇、怪诞和娱乐，它摧毁了这种媒介形式自身的一致性，因此有思想的观众应当每晚至少问自己一次：“为什么给我看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个新闻？”

新闻作为神话之所以延续，因为它是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阶段——通常是自上一次发布新闻之后——“国家”和“世界”发生的事情的图景。成千上万的人盯着屏幕，寻找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成员或者一个世界公民之集体身份的各种现象。在民族和全球的“想象共同体”构建（数百万的单独的“我”在“我们”中寻找共同身份的神话）中，媒体正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种虚构在于，所有事件都被描述成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有关。新闻编辑像是这个“我们”的口技表演者，提供一份作为“我们”应当知道的信息大餐；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符合这种媒介形式的视觉限制和时间顺序限制的东西。在这种循环过程中，新闻作为一种权威体制得到确立，它担当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国家机制的角色，即国家身份的承担者及其行动的把脉者。

然而，新闻并不只是一种权威体制，也是在利益群体和个人之间进行社会竞争的场所，这种竞争试图影响它们自身在正观看的“我们”眼中的“呈现”。针对“呈现”的斗争已经变得与针对权力的斗争一样重要；事实上，它已经成了权力本身进行利益斗争的特殊方式。19世纪我们称为“公共舆论”的战斗，是在范围相对受限、读者为中上层阶级的媒体之间进行，现在已经变成在以社会异质多元的大众为受众的晚间新闻中争夺“覆盖面”的斗争。自从公众民意调查开始存在，并用于汇总个人对这种斗争的反应以

来，自从这种民意调查受到当权者重视之后，针对有利于自己的媒体覆盖面的斗争成了选举、罢工和慈善运动的关键战场。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决策的基本原则被放在公众的密切审视之下。政治舞台上的各方都指责媒体管理者存在偏袒，而他们面对这种压力，转而高度依赖于记者的公正性和中立性，但这常常意味着浅薄和过于疏离。

对于政治偏见的关注是媒体扭曲“我们”的源头，给新闻这种体裁自身留下了无法解决的扭曲效应。新闻是对社会身份的神秘描述，这种身份由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和出售的商品构成。晚间新闻可以理解成一种市场，各种惊人的、可怕的图像争夺在新闻公告板上的90秒空位。恐怖的图像有市场，就像粮食和猪肚肉有市场一样，还有些人专注于生产和传播这种图像。道德机制可能会让人认为，这样一种悲惨图像的交易是不道德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文化中，仍有很多货物不被允许进行交易，比如司法和公共职位，但它们经常被交易。许多国家试图禁止下流色情图片的传播，但几乎没人想要限制对于人类苦难图像的交易。要禁止苦难图像的交易，可能不仅会排除令人不安的、有时极为残忍的镜头，还会排除许多西方艺术的杰作，包括戈雅 [23] 的《战争的恐怖》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只要文化自身是一个在图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市场交换的过程，只要我们不认为任何人对这些图像的内容都有指手画脚的权利，我们的文化将始终必须面对从其他人的痛苦之中制造商品的道德模糊性。在电视上观看这种恐怖景象时，我们心底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模糊性，它部分来源于我们知道自己正在消费其他人受苦受难的图像，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道德关系是以一种消费关系为中介的。因此，窥视的羞耻与他人的苦难相关，它拥有某些不可改变的、内在于呈现自身的消费之本质当中的要素。

不过我们羞耻中的其他一些部分容易受到干预影响。晚间新闻充满杂乱无章的竞争，其结果是一堆混乱的悲剧和犯罪——这一分钟是阿富汗，下一分钟是波斯尼亚，然后是卢旺达，或者堪萨斯的列车喋血事故——累积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极为庸俗的恐怖商品。新闻体裁的时间纪律，降低了在触及另一个人的苦难时所需要的最低道德要求：人们要花时间跟他们待在一起，花足够长的时间才能穿透分隔我们与他人的道德世界的自我专注和疏离的坚硬外壳。道德生命是一种观看的斗争——一个与想要否认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东西的欲望的斗争。这种尊从自身感觉的斗争，是我们从偷窥到承担的转变过程的核心。在面对自身感觉的证词时，即便是野蛮的目击者也会发现自己逃到一种精神幻想之中：他们正在观看的东西不过是一场噩梦，他们终会从中醒来。

戈雅的《战争的恐怖》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借助我们亲眼做证的欲望来直面这种逃避，它们通过建立在美学形式上的恐怖，迫使旁观者感觉像是第一次观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新闻媒体缺乏同样让真实成为真实、迫使眼睛观看的表现能力，缺乏承认它所看到之物的道德良知。然而，新闻每晚播出的节奏对这种观看有负面作用。由于是将各种不同故事混合在一起，由于要遵守时间的控制，新闻不可能留意人们看到的所有东西。最终，人们看到的只是新闻——它的个性，它选择和放弃的准则，它的权威声音。总之，新闻的主体是新闻自身：它描绘的是一种再现自身权威的方式。在这种对自身，对它的快速性、它庞大的新闻聚集资源和击败时间的能力的崇拜中，新闻以其表现风格将所有的现实变成90秒钟的练习题。

当电视新闻的潮流减少了全世界对同质商品的恐惧时，一种

羞辱随之产生。在一种被大量的混乱控制的文化中，一定存在某些对现实——身体被击中、遭受虐待、受到侵害的真实瞬间——予以特别关注的行为，存在一个坚持让现实被看到的界限。人类学家会把这种行为称为仪式（rituals）。尽管人们常说现代文化已经很少有神圣的仪式了，但情况并非如此。它当然拥有自己的拜物教——金钱或者消费——而且，对于所有道德争论的表面喧嚣，它拥有一种广为认同的、给予人类个体特别尊重的信仰。个体拥有神圣的财产、权利和生命，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理念，尽管这一理念在遭到破坏的时候比得到遵守的时候更令人瞩目。从事物本性来看，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否不再暴力、不再充满苦难，是不可能被决定的。看上去，较少引起争议的是，文化更难满足我们人类承担作为生物之尊严的需求，更难对人类的苦难和暴力经验给予应有的尊重。

如果电视观众想要道德抚慰，这种怀疑可能会回应，他们应该转向教堂：电视管的是新闻，不是虔诚；是信息，不是布道。神圣不是它的领域。如果事情确实如此，如果电视除了搜寻信息不会崇拜任何祭坛，这个回答已经足够了。如果媒体根本不需要对任何事物给予尊重，宣称电视应当对苦难给予某种尊重将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如果电视新闻公开坚持这种怀疑论的荣誉准则——一切皆不神圣——那么事实上它是在崇拜权力。电视是现代权威的教堂。例如，想想看，电视直播了1953年英国女王的加冕礼，直播了约翰·F.肯尼迪的葬礼，以及温斯顿·丘吉尔的葬礼、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斯宾塞小姐的婚礼，还有总统的就职典礼。这些都是现代世俗文化的神圣时刻，电视设计了自己的语言修辞和仪式，将观众笼罩在一种重大时刻的神圣感觉之中：评论员安静肃穆的声音，对象征权力的制服和铠甲的爱慕关注，最重要的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推论，即正呈现于观众面前的是具有国

家级重要性的仪式。

那么，如果电视能够将权力视为神圣的，我们要求它对苦难予以同等尊重就变得可行了。如果电视可以抛弃其日常安排，将其议程用于一次婚礼或一桩葬礼，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它对于饥荒和大屠杀也如此。如果电视真的知道怎样将自己从新闻体制中解放出来，那么就有可能要求它重新考量新闻体制整体上的充分性。考虑“电视究竟是否应当有新闻”这样的问题，至少变得离乌托邦远了一点点。与一家优秀报纸对权力的阐释相比，根据电视记者自己的选择向世界提供90秒的片断是一个低级的次优选择。在自我怀疑和自我审查的时候，优秀的电视记者将承认，一般大众如果完全依赖他们提供的每晚新闻去理解世界，他们的获知将会极其有限。这些怀疑的逻辑也许应当进一步深入。电视确实在某些事情上做得非常好。最好的纪录片有时候为道德视野获取了先决条件；它们迫使旁观者去观看，去摆脱陈词滥调的外壳，去面对陌生世界的所有神秘性和复杂性。新闻公告的时间模式，让即使最好的记者也几乎从未有做同样事情的机会。当一种媒介体裁的规则与那些想要最大利用它的人们的需求和意图存在这样的矛盾时，这种体裁将有可能一起粉碎。如果晚间新闻被杂志栏目或者纪录片特辑取代，一种尊重自身和它报道可怕事件的新闻主义的体制性条件将开始存在。这样一种新闻主义将被迫承担记者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选择，极其严肃的选择。在选择报道时，它将会抛弃很多故事，而且它将改变对“故事是什么”的理解。它将会挑战已得到认可的新闻价值的定义：干预是通过在饥饿变成饥荒之前的干预、虐待变成大屠杀之前的干预、种族迫害变成大规模驱逐之前的干预、宗教冲突变成内战之前的干预，去挑战已被广泛接受的新闻价值的定义。换言之，它将要求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到达现场。这样一种新闻主义也许能够挑战其自身形

态中其他的强迫性特征：例如新闻编辑室里的经验法则，一个英国人、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生命——在新闻价值上——值100个亚洲人或者非洲人。当对恐怖图像的慷慨回应变得平淡，媒介自身正在促使产生一种国际认知，它对种种歧视越来越缺乏耐心。

毫无疑问，乌托邦。然而，我们至少要明白，希望这个乌托邦成为现实，是有道德基础的。不管愿不愿意，在陌生人遭受的苦难和那些存在于世界上少数安全地带的良知之间，电视已经变成主要的媒介形式。不管其管理者如何孜孜不倦地强调媒介的作用只是提供信息，他们也无法逃避其权力带来的道德后果。它不仅仅变成我们互相观看的方式，而且也成了我们互相肩负起对方命运的方式。如果它用以沟通这些关系的呈现体制让它们所描述的苦难蒙受羞耻，那么，其代价不仅仅要用羞耻来衡量，还有人类的生命。

---

[1] “拯救生命”（Live Aia），1985年7月13日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同时举行的摇滚音乐演唱会，目的是为埃塞俄比亚的饥荒筹集慈善资金，全球100多位明星参加演出。

[2] 比夫拉（Biafra），即比夫拉共和国，1967—1970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国家，1970年灭亡。战争造成大约200万人丧生。

[3]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

[4] 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思想家、启蒙思想先驱。

[5]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

[6] 朱迪斯·施克莱（Judith Shklar，1928—1992），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7]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74？—1566），西

班牙多明我会（Dominican）教士，致力于保护西班牙帝国统治下的印第安人，控诉殖民者的残暴。

[8] 早期教父（early church fathers），指基督教会初期的教会作家。

[9] 托马斯·阿奎纳（omas Aquinass，约1225—1274），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

[10]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法国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11]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社会评论家、文学评论家。

[12]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1916—2009），美国商人及政治家，曾任美国国防部长（1961—1968）、世界银行行长（1968—1981）。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致力于消除贫困，大幅增加对贫困国家的贷款。

[13]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他鼓吹以暴力反抗殖民统治。

[14] 原文为法语mot d’ ordre。

[15] 福音派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流派，在英国18世纪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中，福音派发挥了重要作用。

[16] 保加利亚惨案，187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镇压保加利亚人民起义，屠杀居民上万人。英国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对土耳其的暴行和英国保守党政府维护土耳其政府的立场予以猛烈抨击。

[17] 次等种族（lesser breeds），语出英国诗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诗歌《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其中有“毫无法纪的次等种族”（lesser breeds without law）之语，该诗是吉卜林1897年为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所作的颂歌，被认为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吉卜林的帝国殖民思想。

[18] 里加（Riga），拉脱维亚首都。

[19] 埃塞俄比亚人口中，基督教徒主要居住于西部高地，穆斯林则聚居于低地，泰格里翁人是境内主要族群之一。阿法斯与吉布提的前身为法属阿法斯和伊萨领地。

[20] 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指为确保自身利益而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团体，其可以与执政集团相抗衡，对政府决策造成一定的影响。

[21] 基加利（Kigali），卢旺达首都。

[22] 唐·麦库林（Don McCullin），1935年出生，英国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参与报道了20世纪下半叶全球几乎所有的主要战争。

[23]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Francisco Jose de Goya，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

2
微小差异的自恋

I

米尔科维奇（Mirkovci），1993年3月，凌晨4点。米尔科维奇是克罗地亚东部的一个村庄，它因1991年9月到1992年1月间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战争而一分为二。全面的民族战争已经向南转移到了波斯尼亚，但在这里，每天晚上，在环绕米尔科维奇的战壕里，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武装仍旧用小型武器进行交火，偶尔会互相发射火箭炮。我在一座农场的地下室里，这里现在充任当地塞族武装的指挥部。克罗地亚人大约在250码（约230米）以外，在黑暗中的什么地方。

这是一场村庄战争，交战的双方从前都是邻居。负责放哨的塞尔维亚人——绝大多数是疲惫的中年预备役军人，他们大多宁愿躺在床上——过去都是跟克罗地亚人一起上学，附近地堡里的那些人一样，他们疲倦不堪，可能也同样是中年人。战争之前，他们上同样的学校，在同一家工厂工作，跟同样的女孩子约会。据南斯拉夫1990年进行的国民调查显示，在离这里20英里（约32公里）远的武科瓦尔（Vukovar）镇以及附近的村庄，跨民族婚姻的比例高达30%。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宣称自己的国籍是南斯拉夫，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属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也不是穆斯林。

这座农场的屋子里大约有十几个战士。时不时地，他们中的一个人肩上扛超长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狭长的、穿越花园和

晾衣绳的壕沟。其他人坐在行军床上休息，闲聊，抽烟，打瞌睡，清理自己的武器。绝大多数人都是预备役人员，但有一个叫柯比（Chobi）的民兵，戴一顶黑色的绒帽，帽子上绣着一句箴言：“塞尔维亚：自由或死亡。”他在民用无线电台上呼叫一个老朋友。“乌斯塔沙 [1] ，”他逗对方说，“你还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吗？”克罗地亚人回答：“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切特尼克（Chetnik） [2] 的变态。”玩笑继续着，然后他们挂断了通话。看上去他们大多数晚上都会通话。

当他们打瞌睡、玩牌、清理武器的时候，我跟他们坐在一起度过了几乎整个晚上。我想要了解邻居是如何变成敌人的，从前有许多共同之处的人最终是如何除了战争之外不再有共同语言的。我在许多地方看过这种过程发生，比如阿富汗、卢旺达、北爱尔兰，我发现无论在哪里，它都令人困惑。我从未接受过那种认为民族主义战争是部族仇恨和古老敌意爆发的说法。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一类的理论家也许想让我相信，在米尔科维奇的后花园中有一条横亘着的分裂线，地堡里的克罗地亚人代表的是西方的罗马天主教文明，而附近的塞尔维亚人代表的是东方的拜占庭、东正教和斯拉夫文明。当然，那是多数自我吹嘘的理论家们看待这次冲突的方式。但此刻在米尔科维奇，从底层的视角来看，我看不到这个文明的分裂线，看不到被分隔开来的地理板块。这些想当然的隐喻需要给出解释：从前对他们属于对立文明的想法一无所知的邻居，是如何开始思考——以及憎恨——这些词语的；他们是如何中伤乃至妖魔化从前被他们当作朋友的人的。简而言之，相互恐惧的种子是如何在共同生活的土壤中一粒一粒种下的。

在我邻近的铺位上，一个结实、精悍的中年男人斜靠着墙，

他穿着迷彩作战服，有一双明亮、精明的眼睛，留着时髦的浓密胡子。我带着某种伪装出来的天真，大胆地说出想法：我没法区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什么让你们认为你们是如此不同？”

他看上去不屑一顾，从卡其布夹克的口袋中掏出一个香烟盒：“看到这个了吗？这是塞尔维亚香烟。在那边，”他做个手势指着窗外，“他们抽克罗地亚香烟。”

“但它们都是香烟，对不对？”

“外国人什么都不懂。”他耸了耸肩，又回去擦他的红旗牌（Zastovo）冲锋枪。

但我问的问题困扰着他，所以过了几分钟之后，他把枪往我们之间的铺位上一扔，说：“看，事情是这样。那些克罗地亚人，他们自以为比我们优秀，他们想当绅士，觉得自己是高贵的欧洲人。我要告诉你，我们不过都是巴尔干的狗屎。”

一开始他告诉我，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毫无共同之处。从抽的香烟开始，他们的每一件事情都不相同。一会儿，他告诉我克罗地亚人的真正问题是他们认为自己“比我们优秀”。最后，他得出结论：我们实际上毫无区别。

是的，他说的话体现出文明的对立，但这些话是神话和经验、幻想和现实之间一次含糊不清的对话的一部分。仿佛是民族主义的神话（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是泾渭分明的民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与这个男人的生活经验（他与他的克罗地亚邻居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在做斗争。两种平行的意识——政治的和个人的——共存但并没有相互面对。在他心中的某个地方

有一小片疑云，它可能导致质疑甚至否认，但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其他话语能让他的怀疑得到确认，并找到跟他有类似怀疑的其他人。所以矛盾冲突在他的头脑中萦绕。晚上守夜的时候，他紧张而无眠地等待下一轮炮击。开枪射出一些子弹也许是缓解紧张的一种方式。他可能会诅咒，见鬼去吧。他们不值得我思考。让事情简单一点。至少，暴力可以做到这一点：它让事情变得简单。

关于这个男人的民族身份，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它不是某种由历史和传统形成的原生本质，潜藏着、等待着将他带入战争。对他来说，身份首先是一个关系词汇。一个塞尔维亚人，是某个不是克罗地亚人的人。一个克罗地亚人，是某个不是塞尔维亚人的人。但如果差异是关系性的，那么它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同义重复。我们不是我们不是的人。那个精悍的塞尔维亚战士只是无法告诉我他在为什么而战斗，除了他自己的生存以外。但生存并不能完全解释他在这里的原因，因为他完全了解，直到几年前，他的生存并无问题。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他现在生活在一个恐惧的团体之中，一起仇恨地对抗另一个充满恐惧的团体，这对他根本是不可思议的，对我而言也是如此。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试图填充他内心的这种空虚，试图给徒步士兵们一个战斗和死亡的理由。但不管这个塞族人在广播里听到什么或是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什么，都不能吞没由其自身的经历所形成的身份。在民族身份和个人身份之间的匹配并不完美。戴黑色绒帽的民族武装分子可能是虔诚的信徒，但普通人——像他一样的民族战争的徒步士兵——模糊地、有时痛苦地感受到，他们亲眼所见的东西和他们被教导要相信的东西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表现”一种预先存在的身份，它还“建构”了一个新的身份。对于世界这一部分的历史，我们不能坚持说民族对抗过去只是在等待着，就像岩浆在火山之下等待一次板块的移动，等待一条砰然分开的裂缝。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称为族群，完全是人类学术语的滥用：他们说的几乎是同一种语言；他们源自南巴尔干斯拉夫人的同一个民族血统。他们之间存在不同，尤其是在家族姓氏方面，但这些差异对于外人而言，几乎是察觉不到的。粗略地看，你根本没法将他们区分开。即使我们容许自己管他们叫民族群体，这个男人相信在卷入战争之前自己一直就是的那种塞尔维亚人，并不是他在战争之后变成的塞尔维亚人。在战争之前，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南斯拉夫人、一位咖啡馆经理或一位丈夫，而非塞尔维亚人。现在，他坐在这个农场的堡垒之中，两百多米以外就是有可能杀死他的人。对于他们，他只是一个塞尔维亚人，不是邻居，不是朋友，不是南斯拉夫人，不是从前在足球俱乐部里的队友。因为对于他的敌人而言，他只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所以对于他自己，他也变成“只是一个”塞尔维亚人。

民族主义是一种虚构：它要求你自愿放弃怀疑。相信民族主义的虚构就是要忘记某些现实。在这个塞尔维亚战士的例子中，发生的事意味着他忘记自己曾经是另外一个战壕里人们的邻居、兄弟和朋友。但民族主义是如何“建构”/创造身份的呢？民族主义是如何重新打造这个特定男人的身份呢？我们需要发现一种叙事，可以解释如何在利益的共同体之外创造出恐惧的共同体，一个可以在像米尔科维奇这样的地方，在深达人性的层面，把国家权力的崩溃和民族主义狂热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叙事。

II

从1945年到1991年，邻居们共同居住在一个被称为南斯拉夫的国家。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存在差异——一个是东正教的，一个是天主教的——他们之间还有一个相互憎恶的历史，有“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在克罗地亚迫害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的鲜明记忆。有一个由铁托（Tito）主导的国家，通过威吓和在民族群体之间呼吁“兄弟友谊和团结”来巩固权力。民族战争发生于1941—1945年间，战争遭到了计划性的镇压，而铁托尽其最大努力防止任何一个民族垄断联邦国家机构，不过到最后，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国防军中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导职位。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跟“兄弟友谊和团结”的号召一样，确实都拥有某种民众合法性。许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人真诚地相信他们已经将民族仇恨抛在脑后。对民族差异的强调——例如，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的要求——遭到了压制。到1990年，受到“二战”伤害的一代开始走向死亡，过去的毒药正在被过滤、消除。在一个像米尔科维奇这样的村子里，“兄弟友谊和团结”确实意味着大量的民族联姻，尽管塞族人和克族人进不同的教堂，但他们在当地的机构中一起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警察局。如果你遇到麻烦，如果有人偷走了你的车载电台，警察不会上来先问你的国籍。你不一定能够得到高效的处理过程，但至少不会遭受民族歧视。

随后，铁托于1980年5月去世。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依赖于某一个人的魅力，当这个人去世的时候，国家只 可能分裂。铁托是最后的哈布斯堡（Hapsburgs），是南巴尔干半岛最后一个拥有合法性、能让分而治之的策略奏效的统治者。在铁托死后，权力开始从各共和国的共产党精英核心扩散。但这些精英现在感觉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正遭到侵蚀。没有了铁托，他们不过是腐败的民族庇护网络。到1989年，东欧政治体制的崩溃将他们置于

恐慌边缘，急于寻找合法性。1989年之后，在整个东欧，各国共产党试图将自己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选举机器。他们的行动是一场闹剧，但不管他们如何虚伪，这确实有助于创造这些国家所需要的选举体制—— 一个“正常的”（也即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这就是东德、匈牙利、乌克兰和波兰的前共产党人选择的道路：他们接受民主的本土化，呼吁作为个体投票者的公民支持他们。问题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公民前景在南斯拉夫是可以获得的，为什么却从未能落地生根？为什么南斯拉夫的精英们甚至对民主的闹剧也无能为力？因为要求自由政治选择的呼声应当是非常强劲的。铁托允许南斯拉夫人旅行，他们带回来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关于民主的观念。南斯拉夫人享有的是东欧最为自由的公民社会，拥有反对派媒体，有像贝尔格莱德圈 [3] 之类的哲学讨论群体，有活跃的咖啡馆生活、艺术、戏剧和电影。回头追溯，似乎很清楚，这种公民社会的相对自由事实上正是其软弱性的来源。反对派的生存是基于容忍；在其内心深处，它知道这是铁托的一种精明的放任。它是一种文化上的反对，不是政治上的反对，它从来没有以明确的民主派立场挑战这个体制。幻觉在于，在铁托统治下，情况似乎比东欧其他地方好，这种幻觉团结了反对派，防止它发动人民成为公民。在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警察镇压严厉得多，让反对派觉得对当权者毫无指望；让他们明白，南斯拉夫人享有的那种文化自由毫无意义，除非他们也享有政治权力。南斯拉夫反对派从未从——用蒂莫西·加顿·艾什 [4] 的话说——“逆境的作用”（uses of adversity）中获益。铁托的相对纵容令反对派软弱无力。他们未能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跨民族的号召口号来替代“兄弟友谊和团结”。到1990年，超过四分之一的南斯拉夫人确认自己的身份是“南斯拉夫人”。这是反对派有可能动员起来的在所有加盟共和国中捍卫多民族政治的选民群体。但到那时，政治上变得如此割据，共和国各自为政，以至于其中各

共和国的公民反对派从未能团结在一起，共同捍卫公民价值，反对将国家分裂的种族民族主义。到那个时候，东欧政治体制正在崩溃之中，当时的英雄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遭受迫害的人们，在南斯拉夫这些人是像克罗地亚的图季曼（Tudjman） [5] 这样的民族主义者。

20世纪中期，在铁托死后位居高层的共产党精英意识到，领袖的离去、内部的衰朽，要求他们发明一种新的话语去吸引大众。即使在一党制国家，一种新的话语对于动员公众也是必要的。在多山的科索沃（Kosovo）西南地区，塞族人已经逐渐减少，成了少数民族，这一现实给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Milošević）恰好提供了一个战斗的呼唤。阿尔巴尼亚族占人口的90%，他们正要求独立，或者与邻近的阿尔巴尼亚合并。塞尔维亚人本来可以接受少数民族地位，如果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人的想象中没有占据这样一个中心地位的话：科索沃是他们最古老、最漂亮的中世纪教堂所在的地方，科索沃的田野是他们于1389年与土耳其人的重大决战发生的地方，战役导致土耳其帝国长达五个世纪的占领。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对他们在落后的科索沃的亲戚们的状况漠不关心。但在科索沃纪念战败500周年 [6] 的仪式给米洛舍维奇提供了机会，他宣称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民族生命的心脏地带，罔顾几乎没有什么塞族人住在那里的事实。

米洛舍维奇是否真的将科索沃放在心上，颇为可疑。对于他而言，民族主义的煽动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是在后铁托主义继承战的不确定世界中，寻求在选战中生存下来的修辞策略。他显然惊讶于自己碰巧获得了一个取胜的模式。在一次与科索沃塞族人的集会中，塞族人对阿尔巴尼亚族人要求独立或自治表示抗议，

米洛舍维奇显然是即兴地评论说："他们永远不能再殴打你们。"是阿尔巴尼亚族人而不是塞族人受到米洛舍维奇的警察的殴打，这个评论显然是颠倒事实，但它确实触及了塞族人自怜的深层心弦：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曾经为反抗土耳其人、为自由而战，曾与奥地利人作战，一度遭受乌斯塔沙的迫害，一度遭到铁托——一个克罗地亚人——的限制，防范它在南联盟中占据垄断地位，现在在自己的心脏地带正遭到穆斯林多数族群的迫害。这种混杂了真诚的悲痛和自怜的狂热的易燃物被米洛舍维奇的言论，被他随后取消科索沃自治而将其重新纳入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行动点燃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塞尔维亚的自怜及其历史庄严梦想的受挫，与日渐加深的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将塞族人重新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民族主义梦想，不仅提供给统治精英一个选举动员的话语，还提供了一种视线的转移。这是一种幻想的政治，引领人们远离现实问题，比如塞尔维亚正在加剧的经济危机和南巴尔干的顽固落后。大塞尔维亚的幻想也是另一层次的幻想。由于塞尔维亚人口在邻近共和国的分散，重新统一塞尔维亚人（或者同样的任何民族群体）的计划要想达成，只有通过强制人口转移，以及种族清洗。

塞尔维亚扩张的意义对于邻近共和国的精英们来说一目了然。南斯拉夫的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开始要求拥有自己的国家，他们这样做了，于是每一个共和国中的少数民族开始怀疑："现在谁可以保护我们呢？"这是我那个塞族战士现在问他自己的问题。当克罗地亚在1990年走向完全独立的时候，他看到新的克罗地亚政府解雇了当地警察局中的塞族人。民族正义的前景就在眼前，不管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如何否认，他们确实倾向于将克罗地亚的塞族人从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奠基性民族贬低为服从多数民族统治的少数民族。在其新宪法中，新的克罗地亚不是把自己

称为克罗地亚民族的国家么？他们将那些住在克罗地亚但不是克族人的人置于何地呢？

这种黎明前的顿悟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无论在哪儿，跨民族的包容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和平共处的条件，是多数民族不利用其优势将国家机器变成民族偏袒或者民族正义的工具。在南斯拉夫的情况下，替代性的自由主义选择——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民族群体拥有集体权力或者特权，所有的个体拥有同等的权利——无法得到。对于克族人，民族独立意味着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是从属性的少数民族。正是对受控制的恐惧在塞尔维亚人的意识中灌输了狂热。那个塞尔维亚战士也许在塞族人的报纸上读过关于克罗地亚人在“二战”中对塞族人犯下暴行的报道，被称为亚塞诺瓦茨（Jasenovac）的集中营只有45英里（约72公里）远。他从前听到过一些，但现在才开始关注。现在暴行的故事开始产生一种集体自怜的神话，渗透进他的自我描述中。第一次，这个精悍的塞尔维亚预备役人员开始思考：我不能相信我的邻居，细想一下，我们一直都是不同的。自从他自己的洗礼之后，他从未去过东正教堂做礼拜，但现在他想起来了，毕竟，“我们”是东正教徒，“他们”是天主教徒。当塞尔维亚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广播和米洛舍维奇的电视台一再告诫他，塞族人只有在自己的国家中才安全，他开始认为，他们是对的。到1990年末，可以看到铁托主义国家在他身边分裂：在当地的警察局，所有塞族人都被解雇了。他所在地区的镇议会被忠于弗拉尼奥·图季曼的政党的克罗地亚人小组接管，在克拉伊纳（Krajina）塞族人——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被这样称呼——中流传谣言，说克罗地亚人正在储备武器，在夜间秘密训练，为他们宣布完全独立的那天做准备，而贝尔格莱德派出坦克作为报复。在这个时候，塞尔维亚地方军阀——绝大多数是从前的警察或者军人——开始

出现，他们告诉他，铁托死了，克罗地亚人正在接管权力，你什么也不是，只有我们能保护你。很快他就开始为军阀做事了，整夜整夜地在废弃的农场房子里跟从前他称作朋友的人交火。在三年的时光里，他已经被穿越回到了400年前的封建世界晚期、欧洲民族国家还没形成的时候。三年的时光，他被从文明时代——从跨越民族的容忍和包容——穿越回到了霍布斯式的民族战争世界。

注意这里的因果顺序：首先是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崩溃，然后是霍布斯式恐惧，之后才是民族主义狂热以及紧随其后的战争。首先发生的是国家的解体，然后是民族主义狂热，普通人中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政治瓦解的第二结果，是国家秩序及它带来的跨民族包容的崩溃的反应。民族主义产生了恐惧的共同体，即相信他们的安全依赖于依此信念团结在一起的群体。在感到害怕的时候，在“现在谁能保护我”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变成“我们自己人”的时候，人民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这里，我试图做的是讲述一个故事，它将上层和下层——精英和人民——联结在一个共同的叙事之中。但仍然存在一个重大的困惑，如果霍布斯式的恐惧解释了为什么邻居变成敌人，那什么能解释此前让身份可以互相渗透的迁徙开始遭到封闭呢？人们是如何开始将自己看作塞族人或者克族人而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呢？过去大约50年里，身为塞族人或是克族人，对于身为南斯拉夫人而言是第二位的身份；有时候它甚至是排在第三或者第四的位置，排在身为工人或是母亲之后，或者是任何组成我们归属范围的其他身份之后。民族主义拒绝多元归属的可能性，它坚持民族身份是首要的，凌驾于其他任何忠诚之上。但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这里我们需要采取理论上的迂回，更为仔细地考虑其差异自

身，询问差异——始终是比较性的、关系性的——如何随着这种突变而改变。

III

至少是从《创世记》开始，从兄弟到敌人的转变就困扰着人类的想象力。因为《创世记》的人类故事不是开始于陌生人之间而是兄弟之间的谋杀。 [7] 恰恰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此微小，以至于罪恶的根源仍然如此神秘。兄弟之一是牧羊人，另一个是地里的农民。两人都向上帝献祭，一个得到了上帝的欢心，另一个没有得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的赐福如此偏心。上帝只是告诉那个失望的哥哥，他必须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要挑战天意神秘莫测的偏爱。

再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哥哥拒绝服从上帝的决断。对上帝不公的愤怒，以及对弟弟莫名其妙好运的嫉妒，在这两者的共同折磨下，哥哥把弟弟哄骗到一片田地。在那里，他徒手或是用某种未知的武器夺走了弟弟的性命。不用说，上帝在看着他。遭到指控的时候，该隐拒绝认罪，而且否认了他的人类亲情：

“难道我是我弟弟的看护人吗？”

值得注意的是，该隐并没有因为他的罪行而被消灭，而是成了伊甸园东方的放逐者和流浪者。在那儿，他成为各个民族的创始人，由于他的权威开始于一次谋杀，罪恶和反罪恶在复仇逻辑的可怕沉沦中展开。“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8] 正是这个逻辑让上帝觉得如此恶心，以至于他决定要让洪水淹没世界，只留下诺亚和他的动物群体。

圣经学者雷吉娜·舒瓦茨（Regina Schwartz）[9] 在其精细的研究中，发现了是什么让这个故事如此神秘：上帝仁慈的稀缺。为什么他不能同时降福于该隐和亚伯呢？为什么必须选择一个人而排除另一个呢？为什么两者相同的时候，有一个必须被驱逐出去呢？她认为，这是一神教信仰体系的逻辑。“稀缺”，她写道，是“作为一个单一性原则隐码（encoded）在《圣经》之中（一个土地、一个人民、一个民族），隐码在一神教的思维之中（一个神灵），它成了一种以暴力驱逐为威胁的排他性忠诚要求”。上帝之下的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动力似乎来源于这样的理念（尽管我们并不精确地了解）；只有一个民族会被选中，只有一个兄弟能够得到恩宠，而其他所有人必须在该隐的印记下受到折磨。更进一步，选举和暴力紧密相关，因为选举的自我正义总是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之下，害怕同样可能被打上该隐的印记。最好是在其他人身上打上该隐的印记，以免它被钉在自己的额头上。

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并不只是关于上帝仁慈那令人困惑的稀缺，不只是人类确信（或担忧）上帝如果神秘地赐予仁慈，也有可能同样神秘地将其收回。在最简单的层次上，它也是关于兄弟，关于兄弟比陌生人更强烈地互相仇恨的悖论，关于在共同性之中激发的情绪比纯粹、根本的差异引起的情绪更为暴力的悖论。在《创世记》的一些短诗中，同一血缘的两个人最终互不承认对方是骨肉同胞。该隐的故事似乎想说，在其最简单的层面上，没有比内战更野蛮的战争，没有比最亲近的亲属之间的仇恨更棘手的仇恨。

IV

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在一种忧郁的厌世情绪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开始将注意力转到群体侵害现象，具体是转向一个他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难题。1917年，在写作论文《处女的禁忌》（“The Tatoo of Virginity”）时，他捎带观察到：“恰恰是原本类似的人们之间存在的微小差异，构成了他们之间产生冷淡和敌对情绪的基础。”他继续写道：“追寻这种思想，以及这种‘微小差异的自恋’产生的敌意，将是引人入胜的，在每一种人类关系中，我们都看到这种对抗友情、压制所有人都应当互相爱戴的律令的敌意。”

人类要洞察自己的身份，那些区分他们的边缘性的“微小”因素似乎比他们拥有的共同因素还要重要。马克思称为“类存在物”（species being）的东西——我们作为人类成员的身份——相对来说无足轻重。除了一两个染色体以外，男人和女人拥有共同的基因传承，不过，始终是差异而非共同性更为引人注目，以至于无可置疑的共同特征——如脑容量——被诠释为不平等，尽管所有证据表明的事实都与之相反。令弗洛伊德困惑的是，为什么这种分化过程伴随着如此大量的焦虑。为什么男人的身份取决于将女人想象成一种不仅是欲望也是恐惧的对象？“也许这种恐惧是基于男人和女人不同的事实，”弗洛伊德写道，“永远不可理解，神秘，陌生，以及因此产生的显然的敌对。男人担心被女人弱化、被她的温柔感染，然后显示出自己的软弱。”陌生，并由此产生敌意，那么为什么微小差异是陌生的，并因此 是带有威胁性的？

五年后，弗洛伊德回到“微小差异的自恋”，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Ego* ）中，

他的分析从性别转向群体差异。他写道，即使在关系亲近的群体中，“友谊、婚姻、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敌意和猜疑的情绪也会与人类的亲属亲情展开竞争。在这里，“物种身份”和长期的情感纽带也不足以完全克服敌对的情绪。同样的现象在社会和民族之间也可以观察到。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越亲近，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产生的敌意就越强烈：

> 就两个毗邻的城市来说，一个是另一个最忌妒的对手；每一个小州都蔑视地看待其他的州。密切相关的民族彼此疏远；南部德国人不能容忍北部德国人，英格兰人恣意中伤苏格兰人，西班牙人看不起葡萄牙人。我们不再感到吃惊的是：更大的差异会导致几乎无法克服的反感，诸如高卢人对日耳曼人、雅利安人对闪米特人、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反感。[10]

当弗洛伊德将分析扩展到包括民族和种族差异时，他似乎混淆了重大差异和微小差异之间的区别。认为某些人类差异，如民族和性别，本质上比其他差异如阶层或国籍更为重要，这似乎是一种错误。民族和性别差异与将男人、女人以及不同民族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决定性的基因共同性相比，当然是较为微小的，但当作为权势和身份的标志时，它们变得举足轻重。只有当成为一种特权的时候，只有当它们变成压迫的基础的时候，某种人类的差异才会变得重要。权势是将微小变成重大的载体。

而且，从外界看上去像是微小差异的东西，从内部来看的话，可能会感觉到一种重大的差异。抛开它所有的偏颇之处，弗洛伊德的区分仍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从中立的外部观察者的角度

衡量，在毫无关系的群体之间，与其文化、历史或体质差异的规模相比较的敌意和不宽容的程度。事实上，这些差异对外部人士显得越微小，它们在内部人的互相自我界定中就显现得越重大。

对于弗洛伊德，这种对抗性的自我界定与“自恋”联系在一起：

> 在人们对于不得不与之相处的陌生人产生的毫无掩饰的反感和厌恶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爱即自恋的表现。这种自爱是为了个体的保存，似乎任何背离他自己的特定发展路线的出现，就意味着对这种路线的批评以及对这种路线进行改变的要求。[11]

弗洛伊德的分析重点是我们对自恋和攻击性之间矛盾关系的关注。正是因为在群体之间的差异微小，它们才必须表现得具有攻击性。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越不显著，双方就越要努力将那些差异说成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将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所需要的攻击性不仅是对外朝向另一个群体的，而且也是对内的，致力于清除将个体区别于群体的差异。弗洛伊德说，个体要为群体归属付出心理代价。他们必须将攻击欲望转向反对自己的个性。例如，为了将自己的身份融入塞尔维亚国家，那个徒步战士必须压制自己的个性以及　　他与从前克罗地亚朋友们的共同联系的回忆。他必须对自己采取某种暴力，让自己套上一张仇恨的面具。

从弗洛伊德稍稍扩展推论，我们可以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自恋。一个民族主义者接受一个民族的中立性事实——他们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和历史——将这些事实转变成某种叙事，目的是阐发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让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自

决权的民族。换言之，一个民族主义者接受“微小差异”——他们自己是无关紧要的——将它们转化为重大的差异。为此目的，传统被创造出来，一个光荣的过去被镶上金边、粉饰一新，给公众享用。一个也许从未想过自己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突然开始梦想自己是一个民族。将民族主义看作是某种自恋形式，揭示了民族主义议程中的投射性和自尊特质。民族主义是一面扭曲的镜子，信徒们从中看到的是其简单的伦理、宗教或领土的属性转变成光荣的属性和特质。尽管弗洛伊德没有确切地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但对自我的系统性的高估，导致系统性地贬抑陌生人和外部人。用这种方式，自恋性的自尊依赖于不宽容并因此加剧了不宽容。

再一次，差异事实本身是中性的：关于民族、人种和性别之间的对立，并没有什么基因密码。如果在民族群体之间有某种形式的政治安定、某种支配性的国家确保所有人各安其事而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的话，语言、传统和历史的差异可能是相对不重要的事情，在和平条件下，民族边界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模糊。人们将以个人特征而非种族作为自己身份的核心。他们首先是丈夫或妻子、爱人或朋友，其次才是一个群体的成员。

但既然身份是关系性的，任何一个群体中的群体自豪的激活，必然也会相应激活其他群体。最初，只要有一个国家能够保证双方的安全，群体之间的自恋竞争可能采取相对纯洁的形式。没有挑衅意图，只有群体自豪觉醒的游行、行军、演讲，可能只会引起另一方的模仿展示。一旦这些群体自豪的展示开始包括对领土的要求、自决的要求或对旧有悲哀和伤害的重温，自恋的循环就开始超越模仿，进入对抗。

自恋者凝视的特殊性在于，对他者的抬眼一瞥，只是为了确

认其差异。然后它就将目光收回，将其凝视放在自己身上。它与对方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接触 。自恋者的焦虑主要体现在消极的自我专注之中。自恋者不关心其他人，除非其他人的反应一定程度上触及他。差异如果未能在自恋者的自我观照中确证自恋，这种差异将被他拒绝。

在原始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Narcissus）是消极自我专注的原型。他凝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日渐消瘦，遗世独立。弗洛伊德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同一个自我专注的人物会突然从他的凝视中苏醒过来，攻击那些破坏了他的沉思的人。但通过将自我专注与侵略能力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确实帮助我们发觉在自恋和民族主义的不宽容之间的联系。不宽容的人没有任何积极性去了解他们决定蔑视的人。弗洛伊德帮助我们将这种封闭思维形式视作一种自恋性的防卫，将不宽容视作一种指向自我的体系，自恋者利用外部世界只是用来确证他的基本信仰。正是对不宽容的自恋性投入，让它对理性争论的反应特别迟钝。在那个塞尔维亚人的堡垒中，我听到预备役军人说不喜欢与克罗地亚人呼吸同样的空气，不喜欢跟他们同处一室，他们有某种令人不安的肮脏。而这是来自仅仅两年前甚至从没想过他们呼吸的空气是属于某个群体或其他群体的人们。

V

但我们太超前了，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的后期，当两个群体已经互相将对方描绘成敌人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自恋性的冷漠。在第一阶段，更多的是身份的矛盾、冲突，差异的感情对抗认同的感情——这正是当塞尔维亚战士告诉我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事实上并无不同时我的心路历程。这些矛盾、冲突、对抗

并不是由感觉到根本差异从而与其他人起冲突导致，而是因为拒绝承认存在一种认同时刻。对其他人实施暴力之前，先要对自己施加暴力。在邻居被重新塑造成敌人之前，必须先烧灼和清理彼此间的联系和认同。

如果人们假定民族身份是既定的，是只需要通过灌输一些恐惧就可以复活的古老存在，这种对于自身的暴力并不是必需的。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萨缪尔·亨廷顿不会对肆虐于南斯拉夫的暴力感到惊讶。他认为，将民族差异看作微不足道是一种自由派的“世俗短视”。民族性建基于宗教或忏悔的差异——天主教对抗东正教——之上。“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他断言，“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断层线战争’（fault line wars）的频度、强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上帝而极大地增强。”

但“世俗短视”很难说明，在巴尔干，至少50年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官方世俗主义，与经济现代化带来的更为有效的世俗化一起，很大程度上侵蚀了有组织宗教的控制。当然，民族主义者中的牧师/神父和残留人物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都得以复兴，但在草根层面，更突出的是将宗教差异的象征符号清除干净的过程。确实，有一些民族武装分子打仗时戴着东正教或天主教的十字架，把它当作个人珍宝；确实，每一方的炮手都曾将对方的教堂、尖塔、清真寺和墓地当作特定目标。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宗教信仰的虚伪、浅薄和欺诈。跟我交谈的武装分子说他们正在保卫自己的家人，他们从未说过正在捍卫自己的信仰。亨廷顿将巴尔干的暴力当作宗教差异“重大”和根本的证据。这个观点也可以倒过来说：正是因为宗教差异逐渐消失，它们才引发了这样一种被夸大的自卫。不是因为宗教触发了深层的情感，而是因为它

触发的是虚伪的情感，才促成这样一种自命正义的暴力混乱被释放出来。

这些属于令人对悲剧感到困惑的难题，甚至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们也是如此。几乎每一个人——一小部分民族主义的真正信徒除外——都对50年的民族共存极其迅速地被摧毁感到惊讶，那也许是永远被摧毁。幸存者群体拥挤在曾经共同生活的废墟上，问他们自己：我们是如何自己将屋顶拉倒的？在最根本的层面，这种惊讶是形而上学的：它们似乎是在说，如果我们全都是人类，怎么会像这样对待彼此？

不用说，我们不能将他们的惊讶当成真的。当表现给外人看的时候，惊讶是轻易就能对人类家族许下的忠诚誓言，它不需要排除对隔壁邻居家的残忍暴行。G. K.切斯特顿 [12] 有一首小诗："那些别墅和教堂/我在那里轻松学会/怎样爱我的同胞/以及憎恨隔壁邻居。"抽象的人道主义可以与对现实人类的憎恨和谐共存。把我们自己看作好人，至少在20世纪必须要相信道德普世主义；另一方面，要保护我们自己，必须憎恨，并且以强烈的道德排他主义形式将这种憎恨正当化。排他和普世之间的冲突的解决通常是做出一个判断：尽管所有人类都应予以同等的道德考量，但在现实中，邻居根本不配被称为人类。南斯拉夫的枪声响起很久以前，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双方的媒体已经让他们的人民认为另一方是寄生虫、臭虫、禽兽和其他有害动物。然而，再一次，非人类化需要特别孜孜不倦地创造一种自恋性的虚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看上去没有区别，都是两条腿走路，共同拥有明显的人类属性。非人类化的幻想如何克服共同人性的证据呢？一旦杀戮开始，非人类化很容易达成：另一方杀死了你这边的人，这个事实让他们被界定为非人类，然后让你这边的非人类

行为合法化。难题其实出现得更早：在枪声响起之前，非人类化是如何达成的呢？是恐惧让微小差异变得重要，让民族之间的壕沟变成物种之间、人和非人之间的清晰界限。不只是恐惧，还有内疚。因为如果你和其他群体曾经拥有共同的生活，然后突然开始害怕他们，因为他们突然拥有了凌驾于你之上的权力，你必须克服这种幸福记忆的权衡；你必须将摧毁共同生活的责任归之于他们 。

微小差异的自恋也许无法解释　恐惧的共同体为什么开始互相憎恨。它不是一个解释性的理论。它只是一个词组，具有某种启发式的作用。它的实质在于，它不将民族对抗视作既定的，它拒绝承认不同的历史和起源注定会带来血腥结果。它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关注民族身份的刻意和幻想化特质，关注它们的高度虚伪性。它认为，正是它们的虚伪性触发了暴力的自卫反应。它也帮助我们注意到它们的动态性质。民族有时候被描绘成像肤色一样，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命运。实际上，民族最根本的东西是它的可塑性。它不是皮肤，而是面具，可以不断地重新绘制。

弗洛伊德思想中最有用的成分，是它认识到当群体之间的外部差异不断消减的时候，象征性的差异变得越发突出。当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的时候，戴上可区分的面具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开同样的车子，作为客籍工人（gastarbeiters）在同样的德国工厂工作；他们同样期望在城市的郊区建造瑞士式风情的山中小屋，在同样的花园中种同样的蔬菜。用一个宏大而丑陋的词来说，现代化已经将他们的生活方式拉到了一起。相比先辈农民，他们之间可能拥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尤其考虑到他们的先辈都是信徒，而信仰有可能确实是分隔的来源之一。但后辈们已经多年没有去过教堂了。现代性——至

少是从1960年以来他们一直过着的现实生活——已经稳定地减少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民族主义仍将他们之间想象出来的差异变成了一个深渊，只有用炮火才能将其填满。在双方的军营里，年轻人为维持民族差异而战斗，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国际化的军服：紧身的战斗迷彩衣，特别设计的墨镜，还有因为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饰演的兰博（Rambo）[13]而大受欢迎的头带。

如果是这样，人们无法认定，可以指望不断增长的实际收入、现代化、均质化、世俗化、落后地区的逐渐改善，来减少民族的冲突和不宽容。事实上，尽管可能只是一种过渡现象，但现代化也许恶化了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导致不宽容的增加。现代化给他们的争斗提供了战利品，如果现代化提高了所有人的收入，但没有减轻民族群体之间的经济分化，就可能加剧他们之间的争斗。即使现代化为所有群体都带来好处，它仍然可以一下子就将他们送回幻想身份的聚居区。竞争群体之间“客观”差异的减少，并不必然、自动地导致“主观”猜疑减少；事实上，随着群体“客观地”汇集在一起，他们相互之间的不宽容也会增加。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族主义的复兴并不局限于贫穷的、边缘的国家，为什么繁荣的增长没有消除民族主义的不满。

全球主义将浮在我们身份表面的差异荡涤干净，迫使我们回到更为坚定的内在差异：语言、心智、神话和幻想，它们躲开了表面清洗。当全球主义让我们更紧密，使我们都成为邻居，去除了以民族或地区消费风格为标志的旧有身份障碍，我们的反应是紧紧抓住残留的边缘性差异。50年来，南斯拉夫人说着同样的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使用斯拉夫字母和拉丁正字法，方言、拼写和发音的地域差异很小。卷入战争之后，这种共同的

语言传承遭到了破坏：萨格勒布[14]和贝尔格莱德的语音学家们开始坚持认为他们说的是两种语言，而非一种，并且开始清理来自对方的每一个词汇。现在，在极少有的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聚会的场合，他们一般喜欢说英语。

这种解读的民族主义不是亨廷顿希望我们看到的——古已有之的历史竞争和对抗的爆发。民族主义是一个现代语言游戏，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5]曾经说过的，发明它是回应现代性带来的根除效应。它通过将身份转化成自恋，来迎接对古老身份的挑战。它是一种话语，承认存在差异的现实，并且将它们转化成叙事性的、正当化的政治自决。在为政治规划——获得国家地位——提供合法性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赋予身份以荣耀，它把邻居变成陌生人，把可互相渗透的身份界限变成不可逾越的边界。

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在每一个地方都始终是一种幻想的政治。只是因为它所证明的身份可能是虚构的传统和现代狂热的暧昧组合，并不意味着它所讨论的身份不是真的受到威胁。民族主义确实解决了跨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权力的不平等——并且坚持认为，除非拥有自决权，否则人类无法产生自我归属感。而且，民族主义的话语明白人们想要自己发出声音，而不是由他人代言。在少数民族必须服从真正的暴政的地方，在语言和文化被真正压制的地方，民族的复兴，甚至民族主义的起义，是不可避免的、正当的。

民族主义的问题不是它对自决的渴望，而是特殊的认识论幻觉：只要身处像你一样的人中间，你会觉得有归属感，你会得到理解。民族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做自己房子主人的欲望，而是相信只有像你自己一样的人才配得上待在这个房子里。

这种冲动也导致在有保障的民族国家中可以观察到的民族分裂。从前满足于接受主流文化强加同化的族群，将不再允许他们自己被人代言。没人想让“他”的声音被视为想当然，没人想让“她”的喜好汇总变成其他人的喜好。黑人不允许自己被白人代言；妇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群体要求为自己发言的权利。再一次，许多关于这些趋势的警告出现了，许多人非常焦虑地谈论多民族社会的民族分裂，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精英，他们习惯认为自己代表这些少数群体说话和行动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当把这个过程视为民主化而非分裂：令人恐惧然而积极的授权逻辑。然而问题是，谁会得到授权：在这些群体中的个体，还是只有他们的发言人和领导人？赋予个性的授权，即允许少数群体中的个别成员清晰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经验，并且从多数派中赢得支持，这是一回事；只是为了巩固群体对个体的控制，并将个体锁定为受害者，这样的授权是另一回事。

对外搞民族主义，对内实行身份政治，带来的问题是自闭症（autism），用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 [16] 大有裨益的话来说：群体如此病态地封闭于他们自以为是的受害情结小圈子中，或者陷入他们自己的暴力神话和仪式之中，以至于他们不能倾听、不能听到、不能从任何他们以外的人那里学习。国外的民族意识和国内某些民族意识的形式的共同特征，是认为倾听陌生人毫无作用，因为除了你自己的群体，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被否认的是移情作用的可能性：人类理解力能够穿透分隔身份的玻璃罐。但不论在哪里，社会和平生存取决于这样一种认识论行为信仰：当涉及政治理解的时候，差异总是微小的，理解总是可能的。一旦这个信念——对人类交流可能性的这种基本信仰——失去，政治无非就变成了民族掮客之间的一种操控，用庇护和各种

形式的正向歧视来收买不满。当一个政体分裂成民族派系，相互之间的交流只是通过集体的威胁和最后通牒等话语，那么它已经处于内战的边缘。可以用来防止这种分裂的，不仅有信任，还有那种只有在信任的情况下才能够生存的个人主义，即个人充分感受到不再恐惧，不需要再额外依靠民族、宗教或者部落群体来保障自己的根本利益。

VI

在1929年的论文《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弗洛伊德在民族主义、自恋和不宽容之间建立了联系。他观察到“只要有其他人成为进攻性的对象，那么总有可能用爱来联合起相当多的人”[17]。弗洛伊德随后继续挖苦地说到他自己的民族，犹太人“已经为他们东道国的文明提供了最为有用的服务”，即为他们所有遭受压制的敌意提供一个便利的攻击目标。弗洛伊德对自恋和不宽容的评价写于希特勒即将掌权的前夜。随后的十年，弗洛伊德自己以及家人被迫流亡。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对于自恋和微小差异拥有如此深刻的直觉，这不是偶然的。没有其他群体比犹太人更深刻地见证了德意志文化（Kultur），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比犹太人更成功地被同化。这些都未能拯救弗洛伊德和奥地利犹太人。不管他们如何积极地同化，不管他们如何仔细消除分隔他们和所在国公民的差异，身为犹太人仍然是简单的事实；那种简单、确实微小的事实（微小，就是说，对于许多犹太人它不过是一个残留的身份，是许多人中的一个）被希特勒转化成两个民族和文化之间的重大“生理”障碍。随着同化消除了各种重大差异要素，对于那些身份遭受犹太人同化之威胁的人（比如希特勒），剩下的微小差异获得了神经过敏般不断增加的显著性。（应当注意，当同化威胁到反犹主义

的时候，它也欺骗了犹太人，因为它让犹太人混淆了文化同化和政治同化。犹太人在音乐厅、在大学里、在职业圈中得到了认可，他们没有认识到，文化的归属并不能成为政治归属。）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希特勒成功地将同化重新描绘成污染；一旦完成这一步，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彻底隔离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为一种净化行动。今天甚嚣尘上的净化和清洁的言辞，可能是所有自恋话语中最危险的一种。清洁和肮脏之间的区分，变成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区分、重要和低贱的区分。这一轨迹从微小差异的自恋开始，最终是完全的道德抛弃。

让我们在这里稍做停留，从弗洛伊德的观点中提取一些隐含意义。如果将不宽容和自恋联系在一起，马上会产生这样一个现实的结论：只有当我们对自己爱得少一点时，我们才可能对其他身份的人更宽容一些；只有当我们也打破自尊中的幻想成分，打破对其他人的成见才可能起到作用。不宽容的根源存在于我们过高估计自己身份的倾向之中；我是说，通过高估，我们坚持我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没有任何可以共享的东西。在这种坚持的核心里，潜藏着净化的幻觉，潜藏着不可跨越的界限的幻觉。

VII

基因研究表明，在不同人种、民族、性别的群体之间，智力、认知或道德能力的分配没有任何显著的不同。显著的差异存在于这些群体中的个体之间。不宽容的悖谬在于，它通常将群体之间的差异认定是显著的，而忽视了个体之间的差异。确实，在不宽容的绝大多数形式中，被蔑视之人的个体性是完全被忽视的。不宽容的人们对于构成被蔑视群体的个体毫无兴趣；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把“他们”看作个体。重要的是构成“我们”和“他

们”之间的主要对抗因素。个性只会将情况复杂化，从而让偏见更难以持续，因为正是在个体的层面，移情作用能够颠覆主要群体之间的对立。从这个观点来看，不宽容是有意地拒绝关注个体差异，顽固地坚持个体身份被包括在群体之中。如果不宽容的群体未能将他们所蔑视的那些人视为个体，那可能是因为不宽容群体不能或者不愿将他们自己也看作个体。微小差异的自恋由此纵身跃入一个集体的幻觉，这种幻觉让受到威胁的或者焦虑的个体逃避为自己思考的重负，甚或是将自己视作个体的重负。严格地说，宽容依赖于能够将自己和他人个体化，能够“看到”自己和他人；或者换一种方式说，能够关注“重大”差异，这是个体性的，将“微小”差异（集体的）相对化。塞尔维亚农庄中的那个夜晚显得如此令人窒息，是因为民族战争几乎扼杀了这些人作为个体去思考和反应的能力。我说“几乎”，是因为在他们的迷惑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们在挣扎，要在他们的所知所感与民族主义脚本让他们说的东西之间，开启一个空间。

VIII

用这种方式谈论塞尔维亚预备役军人，说他们受到致命性的虚构掌控，而我和像我一样的人则不被这种谎言左右，这听上去是自以为是。事实上，回头来看，对于在农庄里的那个夜晚，至少对于那些男人而言，最令人烦扰的是捍卫我 的政治信仰赖以存在的非致命性虚构有多么困难。因为自由主义信仰对于虚构的依赖，并不少于民族主义信仰。在那些“不证自明的”自由主义真理——所有的人类都是平等的，他们的人身不得受到侵犯，他们因为身为人类这个简单事实而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背后存在一种农庄里的男人们会认为极其愚蠢的虚构，即人类的差异是微小的，在表皮之下，我们都是 兄弟和姐妹。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虚构，它要求一种自我意识：以道德习俗的名义筛选掉某些经验现实。例如，被告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法官和陪审团被要求忽略他们那些显而易见的身份：男人、女人、黑人、白人、富人、穷人，仿佛把他们当作不可分隔的人类中的一个简单的、平等的单位。所有自由主义制度的延续都依赖这个复杂的、历史性的新奇思想试验。它是复杂的，因为它是如此抽象，要求我们拒绝平常的事实，探究在这些事实下面的某些据说我们都拥有的基本要素。从历史角度来说，它是新奇的：从未有一个人类社会如此努力地忽略差异、宠爱共同性，我们甚至不过是从20世纪才开始这么做的。

这一历史的新奇抽象过程发表了关于身份的重大宣言。它说：我们首先是法律主体，首先是公民，平等地享有一系列习俗和保护；所有的差异都是微小的，如果这差异能够产生优势，应当全力予以反对。不用说，我们的"微小"优势继续产生优势和劣势，法律和社会的公平仍然遥不可及。但是我们正式地承认——我们社会机制的合法性依赖这一承诺——这样一个理念：差异应当无关紧要。没有这一抽象过程以及实施它的机制，我们仍将是一个部族社会。

为了获得我们生活方式的独特性，有必要回头看看我们是如何达成这个持续的虚构。第一步是想象这个抽象的、承载权利的创造物在16世纪的宗教战争中出现。问题很简单，而且极其现代：既然基督徒忏悔的统一性瓦解了，既然人类不再分享共同的宗教信条，如何能够说服他们互相信任、和平共处？如何能够说服他们停止以终极真理的名义互相迫害？基督教王国的瓦解产生了巨大的、试图理解社会统一基础的动力。一旦差异——在这里是宗教方面的——破坏了一个政体的统一性，什么东西有可能将

其凝聚在一起？答案姗姗来迟：经济利益，以及每个人对某种所有人的生存都必需的审慎规则的认可。从霍布斯到洛克、亚当·斯密，一种社会理论开始成形，亦即将自由个体联合起来的一种秩序，用以保证每个人的安全、自由和繁荣。这个故事常常被忽视的重要一点是：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家激进地简化了初始假设，简单地、理所当然地认为唯一能让人信服的自由个体是有产的白人男性基督徒。在该特定的意义上，这个故事是一种虚构，因为它创造的共同体不是依据当时的实际人口——包括女人、孩子、非白人和非基督徒在内——而是依据一种心照不宣的、未经审视的排除过程。一开始，自由主义理论寻求囊括进来的差异是宗教忏悔。然而，即使在这里，可接受差异的范围事实上是狭窄的。例如，洛克认为，如果人群中包括无神论者或穆斯林，政治社会能够结合在一起将是不可思议的。他问道，如何能指望这些人遵守绝大多数人依据《圣经》发下的誓言？他在1690年煞费苦心提出的宽容信条，因此只适用于基督教信徒，适用于那些始于共同的基督教启示预设的人，不管他们后来可能多么反对这信条。

类似的，当新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开始构想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伴随着同样受到限制的差异假设。他们将自己的共同体限制在有产的白人男性基督徒内，而这是在一个有奴隶存在的社会中。这种盲目性经常被用来攻击国父们，尤其是攻击蓄奴的自由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18]。它当然是盲目，然而可能是一种必要的盲目。如果要求把所有人都囊括进来——妇女、黑人、无产者、非基督徒、青少年，自由主义的虚构可能永远不会成形。如果要求政治共同体将18世纪晚期社会所有可以看到的差异都囊括进来，自由主义的思想实验可能会被当作荒谬的甚至是危险的异想天开而遭到抛弃。如果自由主义理论家在构建政体时没有认定共同民族、宗教和性别起源能理所当然地

带来稳定作用，他们永远不会相信此类政体可以凝聚为个人权利和利益的体系。他们所设想的公民契约只有在这些共同假设的环境中才是可能的。

我们身处20世纪末期，是一种普世话语的继承人，即认为所有人类都拥有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话语从未打算　包括所有人类。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伪善形式，正是忽略了这一点。没有这种想象的伪善，它也许根本不会想象一个平等个体的社会。因此美国国父们没有详细分析个体神圣权利之中潜在的分歧。相反，他们假设每一个个体会被嵌入相似阶层、民族和性别群体的同质身份之中，这些身份不会对权利话语的个性化带来的社会凝聚造成威胁。

然而，一旦自由主义的实验开始，它的权利话语就会被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的每一个人捡拾起来。再一次，我们不应当将自由主义视作一个伪善的体系，值得强调的反而应该是这种给自由主义自身的伪善指控带来的动态效应。因为一旦其术语进入道德语言之中，这些术语可以带着严厉的效果作用于自由主义自身。一旦权利话语在美国宪法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被赋予神圣地位，它开启的事业将令其创造者也瞠目结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9]几乎是立即提出了显而易见的问题："人类"这个词怎么可以只适用于人类种族的一半的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怎么能够合法地拒绝那些在理智、情感和道德直觉上毫无疑问差异微小的生物？关于女人是否应当包括在自由主义政体之中的争论贯穿了整个19世纪，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尘埃落定：人们赞成将她们囊括在内。

先是妇女，然后是无产者。逐渐赋予劳工阶层选举权，废除选举参与者的财产要求，占据了19世纪绝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史。

再一次，跟妇女一样，反对劳动阶层囊括在内的观点认为如果阶层差异得到包容、底层被赋予选举权，政治共同体可能无法生存，稳定和凝聚力依赖限制差异，阻止其动员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破坏稳定。再一次，跟妇女一样，结论性的反驳是，除非差异能够被包容、被赋予选举权，否则政治共同体将无法生存。

包容具有分解差异的作用，也就是说，将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赋予个体一种观念，将自身看作拥有权利的生物，拥有对国家、对机会的个人诉求权，拥有要求群体和集体（比如工会）为了包容他们而斗争的诉求权。随着个体赢得政治权利，对集体身份如阶级和性别的固守开始弱化。以这种方式，个体被包容进入自由主义国家，起到了消减那些界定身份、分化社会的差异的权力的作用。

下一场战役直到1945年才开始打响，即民族差异的包容和赋权。在国内公民权利话语之下，在要求自决权的反殖民斗争中，道德宣言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普世人权话语毫无疑问不能排除任何民族群体。从在英国普通法传统中受过训练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到在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话语中成长起来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这些领袖在自由社会中受教育，却被自由社会排除在外，他们只是要求逻辑上无法拒绝的东西，即自由社会的道德条款也同样适用于他们。

自由主义理念可能已有400年之久，但只是在最近的40年间，自从非白人民族的民权解放以来，我们才真正地开始严肃的试验——建立一个基于平等权利、包容所有可能人类差异的政体。这并不是说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过去不存在，它们一直存在，但它们不是基于权利的民主政体。它们不是以包容性的公民模式作为前提，也不以这样一个理念为前提：将一个社会团结在

一起的，不是共同的宗教、人种、民族、语言或文化，而是附着于法治以及我们都享有同等权利的理念之上的共同规范。

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民族战争，影响之一是惊醒了自由社会，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有多么沉重，让他们意识到400年来，他们第一次真的要坚持初始的信念，否则将卷入内战。在公民秩序传统上依赖于一系列排外行为的地方，现在每个人都被包括进来，一个真正的个体的“公民”秩序是否能够在不依赖多数优势——文化、语言、宗教和道德上的——的情况下兴旺发达，获得了新的紧迫性。1945年到1989年间，自由社会的社会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外部敌人的存在。现在，我们只有洛克和杰斐逊，以及他们留给我们赖以为生的话语。

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真的开始依靠我们声称信仰的话语生存。首先是宗教，然后是阶级和财产，再是性别，其后是民族，现在是年龄，全都逐渐不再用作判定自由社会成员资格的基础。随着我们进入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时代，我们一直被迫挑战自由主义的建构想象：我们把X作为一个平等的权利分享者，还是当作某一个群体的成员？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我们的道德话语不再允许我们寻找任何借口。

确切地说，没有一个人能始终坚持这个理念。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想象——人类的相似性是主要的，差异是次要的——我们将会沉沦。为了政治审慎、道德行为和法治的目的而忽略差异，并不是说谎，但它确实要求我们看透表皮之下的东西，这是一个让我们进行道德想象的独特日常训练的过程。而这种想象的训练——这种关注身份而非差异的选择——是维系自由主义制度之所在。

这一虚构也支持一种特定的认识论，即将宽容视作社会实践之根本。传授“宽容”的根本任务，是帮助人们将自己看作个体，然后也如此看待其他人，也就是让那种未经传授、未经审视的个人和族群的身份融合——它令民族主义的不宽容赖以存在——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为民族主义的不宽容要求一个抽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真正的、真实的、带有他们一切个性的个体被去个性化，变成群体仇恨特征的承载者。

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不宽容是一种被分裂的意识形式，在其中，抽象的、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仇恨征服了具体的、真实的、个体的认同时刻。我的塞尔维亚朋友处在承认他的敌人是个体的边缘时刻，他只是屈服于自己那“根本差异”的民族主义幻觉。只要他可以读到报纸或者听到电视广播（不用仇恨和谎言毒害他的），就会有一种意识、一种痛苦、一种不确定性，可以吹进来一些合理的、人性的东西。如果他有途径接触把自己作为一个理性个体来对待的公共讨论——报纸、广播、电视直播、政治演讲——他也许会有机会成为他自己。就个体能够学会自己思考的程度以及成为真正个体的程度而言，他们能够逐个地从微小差异自恋的致命冲动中解放自己。在这种意义上，自由社会的作用不仅仅是传播人类普世性的高贵想象，而且要创造在自己的身份中足够强健的、依据这种想象生活的个体。

---

[1]　乌斯塔沙（Ustashe），克罗地亚民族独立组织，目标是建立纯粹克罗地亚人的国家。“二战”时期乌斯塔沙政权加入轴心国作战，残酷屠杀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1945年被铁托击溃。

[2] 切特尼克，塞尔维亚军事组织，“二战”时期在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带领下曾抵抗纳粹德国的入侵，但战争后期与纳粹妥协，对盟军作战，“二战”结束时被击溃。

[3] 贝尔格莱德圈（Belgrade Circle），1992年成立于贝尔格莱德的非政府组

织，在知识分子中举办演讲和讨论活动，反对塞尔维亚的军政府统治，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

[4] 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1955— ），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e Uses of Adversityy”为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的标题。

[5] 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1922—1999），克罗地亚政治人物，铁托时期因支持克罗地亚分裂而入狱，1990年5月当选克罗地亚总统，主导克罗地亚于1991年脱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宣布独立。

[6] 原文如此，应为“600周年”。

[7] 《圣经·创世记》故事，该隐和亚伯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之子，该隐因为嫉妒而杀害亲生兄弟亚伯。

[8] 语出《圣经·创世记》，为拉麦所言。

[9] 雷吉娜·舒瓦茨（Regina Schwartz），美国文学和宗教学者，西北大学教授，以圣经研究和17世纪英国文学研究著称。

[10] 译文引自《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文集》第六卷，熊哲宏、匡春英译，长春出版社2001版，第74页。

[11] 译文引自《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文集》第六卷，熊哲宏、匡春英译，长春出版社2001版，第74页。

[12] G. K.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神学家。

[13] 出自系列电影《第一滴血》（First Blood）。

[14] 萨格勒布（Zagreb），克罗地亚首都。

[15] 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捷克裔英国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

[16]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 ），德国著名诗人、作家。

[17] 译文引自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 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18] 托马斯·杰斐逊（omas Jeersonnn，1743—1826），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

[19]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1759—1797），英国女权

主义者。

3
道德厌恶的诱惑

I

1995年，**7**月**13**日，星期四。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1] 的飞机从开罗起飞前往南方，这是一架狭窄的小型行政专机，挤满了行李和乘客，他的团队成员有7人，还有3名记者。我被邀请做一个简短的访谈。他是一个热情、瘦削而结实、皮肤泛黄的70岁老人，单独坐在一个靠窗的座椅上，看着窗外苏丹的沙漠。他想谈非洲，而我想谈波斯尼亚。

斯雷布雷尼察 [2] 刚刚陷落。荷兰维和部队被劫为人质。妇女和儿童步行穿过交战线，已经到达图兹拉 [3] ；波斯尼亚的塞族士兵抓捕了年龄在15岁到55岁的所有穆斯林男性，不知道把他们带去了什么地方。联合国的使命蒙受了羞辱。我问道："为什么秘书长不取消这次行程，飞回联合国呢？"

他说，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了，非洲国家将告诉全世界，尽管在非洲有大屠杀——在卢旺达有100万人死去——但秘书长只关心欧洲的一个村子。提到它的名字时，他的发音是"斯雷布林尼斯卡"（Srebreenisika），声音低沉、沙哑，带有黎凡特 [4] 口音。

他曾经发誓保卫"安全区"，但拥有地面维和部队的荷兰人反对进一步的空袭。现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

正在图兹拉建立一座帐篷城市，空运食物，接上水管——事实上，他们是在通敌合作，而且再一次，是在遭受种族清洗的波斯尼亚东部。

要在安全区建立可靠的防御，至少需要4万名士兵。各会员国只能提供7000人。资源如此之少，我不清楚秘书长是否相信防御还有可能性。

如果他们不再安全，还能叫作安全区吗？当联合国维和部队（UNPROFOR）不能保护自己，还怎么可以叫作维和部队呢？在面对明确的侵略者和明确的受害者，当中立正在一天天地损害联合国的道德信誉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中立呢？

“我们不能干预某一方。没有允许这样做的授权。”他很激动地说。

我奇怪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托辞。秘书长没有多少权力，但他拥有道德权威。我来到飞机上，是要看他如何运用这一权威，碰巧我选择的是这种权威最为妥协让步的一个星期，波斯尼亚的危机正使其变成国际联盟的阿比西尼亚 [5] ：一片荣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的外国战场。

从布特罗斯-加利自始至终的好脾气里，看不出他和我一样认为这是个危急时刻。他遇到过更糟的时候。对于他的道德权威，他处之泰然：从定义上来说，它是一项消耗性资产。看，他说，我们都是谈判者。没有人喜欢谈判者：任何争议的各方总是发现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失败轻易地谴责我们。他暗示说，如果联合国在波斯尼亚失利，那是因为没有人——不是穆斯林、塞族人或各个大国——让联合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如果说联合国还在

这儿，那是因为大国相信其他替代选择会更加糟糕。

秘书长轻敲着他面前桌上一份蓝色的文件夹。里面满是从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纽约来的电报。他刚刚挂断与他的波斯尼亚特使明石康 [6] 以及联合国调停人托尔瓦·斯托尔滕贝格 [7] 的电话。秘书长保持着联络。

他说："如果不是我们去过那里，情况会变得更糟。"战争没有扩展到马其顿和科索沃，280万难民得到了食物、衣服和避难所。"我们在可怕的情绪压力下做了我们的工作，"他说，"尤其是来自媒体的压力。没有人意识到要让人们恢复理智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他提醒我，还记得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坐下来谈判花了多长时间么？

这些都没错，但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已经对欧洲一个村子的人们许下本不该许下的承诺，因为承诺者知道它是无法实现的。

如果这个想法让秘书长晚上睡不着觉，那也没什么要紧，不过我很想知道是否如此。当然，他什么都没有透露。在他这个位置的人无法容忍这种精神状态 [8] 。询问他的情绪是偏离主题了。他对此闭口不言。人们只能猜测，是多年的外交官经历和身为埃及少数民族科普特人（Coptic） [9] 贵族成员的身份教给了他自我克制。他的个性是高度强化的，但随后他出人意料地承认："不管我们在哪里工作，都要努力与死亡文化做斗争。"

在南斯拉夫失利，这样一个说法暗示失利是相对而言的。他似乎是在说，如果你认为我们在南斯拉夫失利，那么看看那些我们没有能够干预的地方：死亡文化肆虐于阿富汗、车臣、斯里兰

卡、塞拉利昂和利比亚，而我们什么都没做。他称这些地方是“孤儿的冲突”，是西方在其选择性的、零乱的关注中碰巧忽略了的，他们偏爱那个欧洲的村子。

我说过斯雷布雷尼察或萨拉热窝是联合国第一次失败的地方吗？秘书长回忆起贝鲁特（Beirut）的命运。他在那儿有朋友，都是文明、宽容的人，跟萨拉热窝的人们一样相信多元文化的幻觉。西方满意地看着这个城市将自己撕得四分五裂。那是20年前。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他想让我明白，这真的不是犬儒主义，只是对事情的一种清醒的理解。而且，有比萨拉热窝更糟糕、比斯雷布雷尼察更糟糕的地方，他准备带我去其中的一部分。

7月14日，星期五：奈阿卢布耶，卢旺达。 四架白色的联合国直升机一架接一架出现在香蕉树上空，降落在一片被灼烧过的草地的圆圈里，这里是一个天主教传教区的中心。两个持AK-47的保镖在秘书长直升机的螺旋桨叶下面散开，第三个保镖带着布特罗斯-加利裹在大衣里的防弹衣紧随其后。一堆赤脚的村民乱哄哄地聚集在低矮的砖房旁边，脸上扑满直升机激起的灰尘。一些人手里拿着印有英语的胶合板标语牌。一个牌子上写着：大屠杀之前联合国在哪里？ 秘书长从直升机上走下来，低着头，步行穿过人群。

胡图人的武装组织以“联攻派”（Interahamwe，“我们一起进攻”）闻名，他们在1994年4月来到这个天主教传教区。然后他们将胡图人和图西人隔开，系统性地屠杀图西人。图西人蜷缩在教堂的长凳后面或者教室的课桌下面，躲藏在山谷的沼泽地里，或者爬到树上，他们在这些地方被砍死。当武装分子因为杀戮而疲惫的时候，他们把受害人胳膊上和腿上的肌腱切下来，让

他们动弹不得，离开去休息，然后再回来做完工作。

当图西人的丛林军队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 Patriotic Front）在5月份重新夺回这个地区的时候，幸存者从他们在坦桑尼亚的躲藏地回来。然后他们做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决定，令人一开始难以置信。他们决定让成千上万的尸体留在他们倒下的地方：在教堂的长凳之间，在学校的课桌下面，在外面的操场上。幸存者将奈阿卢布耶的教堂区变成了非洲大屠杀的亚德瓦谢姆 [10] 。

秘书长被引导到一个长方形低矮房间的门口，这里从前用来研究圣经。地板上一排一排延伸出去的，都是尘土掩盖、衣衫褴褛的骷髅。一盏肮脏的灯光斜照在大腿骨、踝骨、臀骨、肩关节、牙齿和头盖骨上。没有肉体留下来，没有腐败的味道。衣服已经褪色犹如灰烬。

布特罗斯-加利被带去参加一个临时的纪念仪式，一个小小的锡棚，大小跟电话亭差不多，有人在里面堆了一堆骨头、衣服的碎片和干枯的草。警卫递给他一个花圈，他把花圈放在这个小堆上。他站了一会儿，接受拍照。他鞠躬，闭上眼睛，然后离开了。

人们带他沿着一条红土路去公共厕所，在这儿，即使杀戮过了一年多，幸存者们仍然从中挖掘尸体。秘书长凝视散发恶臭的黑暗，然后走开去深深地喘了口气。他脸上的表情，仿佛一个想尽可能地退缩、回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人。

在教堂台阶底下，幸存者们坐在灰尘中等待秘书长。他们大约有100人，脸朝上仰着，沉默着。他们可能不知道秘书长到底

是什么人，但他们知道他在做什么：在任何语言中，这都是在忏悔。当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有大量的比利时联合国派遣部队在卢旺达。当时，胡图人在基加利的广播电台煽动联攻派去屠杀；派遣部队本可以关闭广播电台；挥舞砍刀的匪徒在街上肆虐，联合国的坦克本可以制止他们。但用联合国的话说，这种行动“超出授权”。然后，到1994年4月，10位维和士兵遭到折磨和杀害，比利时派遣部队撤出。联合国士兵留下来，保护那些与他们一同避难的人，但他们不能阻止大门外面的屠杀。而现在，一年以后，联合国向胡图人联攻派提供食品和衣物——是在边境那边的扎伊尔，在戈马 [11] 的难民营里。

当秘书长与聚集在他身边的幸存者交谈的时候，他承认自己辜负了他们。他说他向许多国家请求派出部队来制止屠杀，但没有人回应，到后来为时已晚。即使如此，他告诉他们，“国际社会”没有忘记他们。他承诺有罪者将难逃惩罚。他们将在扎伊尔、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遭到围捕，他们将受到惩罚。幸存者们听着，但只是当听到翻译过来的一个特别的句子时，他们才鼓起掌来：“他们将受到惩罚。”

直升机带着秘书长升空而去，我留下来，在幸存者中间听他们交谈。一个人说，至少他来了，而且他表示了哀痛。另一个人说，是的，没错，但他没有倾听，他没有让任何一个幸存者说话。他们知道谋杀者的名字，他们从前是邻居，甚至是朋友。幸存者们现在需要正义，就如他们需要面包一样，而他们不相信自己会得到正义。这个老人在走上直升机之前喊出来的安慰的词语——勇气！勇气！勇气！ ——没有被翻译出来：它们可以说是法语，但没人知道它们的意思。

7月15日，星期六：罗安达 [12] ，安哥拉。 秘书长的行政

专机从卢旺达向西南飞行了三个小时，到达安哥拉。联合国正在监督一项停火协议，是它去年在若纳斯·萨文比 [13] 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14] 游击队与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 [15] 总统的政府军之间调停达成的。在现代的无意义编年史中，安哥拉内战被排入最野蛮之列。有超过50万人死亡。这样的内战不是其参与者单独能够支撑的。美国人和南非人支持萨文比，俄罗斯人和古巴人支持多斯桑托斯。在2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中，双方将一个石油储量丰富、拥有巨大待开发潜力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变成了非洲破坏最严重的废墟之一。

在秘书长下榻的艾美总统酒店（Meridien Presidente Hotel）前面，一小群被截肢的孩子在肮脏的广场里乱爬。一个孩子撑着用一条椅子腿做成的拐杖；另一个孩子没有腿，用双手拖动身体。他们为能够占住自己的位置而争斗：在艾美总统酒店前面，总是有联合国的鞋子可擦，总是有联合国的陆地巡洋舰的车前盖可以擦洗。

在安哥拉，既然双方已经摧毁了他们奋力想要统治的地方，他们便接受了协议，联合国来了7000多人，来防止协议遭到破坏。联合国需要安哥拉。波斯尼亚之后，索马里之后，卢旺达之后，联合国需要一个胜利，而它已经宣称在这里取得了成功。但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它称得上是成功吗？

安哥拉可以告诉你很多自1992年本届秘书长接任以来联合国所发生的变化。那个时候，全世界有4000名维和士兵；现在，仅仅过了三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7万人。不管秘书长去到哪里，他可以动用的地面力量会让绝大多数国家的首脑羡慕：坦克、部队、直升机、陆地巡洋舰、卫星天线、运输车队。

20年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是由一些日内瓦律师组成，他们修订、改进关于难民的国际公约。现在，它成了一支全球快速反应部队，能够在24小时内将5万顶帐篷运到任何一个飞机场，或者是为扎伊尔的100万难民提供食物。40年前，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还不存在。现在，它能够维持一整个国家的人口。联合国已经成为帝国大潮退去之后，西方收拾留下的失败国家残局的慈善使团。

联合国从前监督分散的发展项目，现在它接管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行政基础设施，从头开始予以重建。在对失败国家的重建中，安哥拉是最新的一个试验项目，之前有莫桑比克、萨尔瓦多、海地、纳米比亚和柬埔寨。穿过罗安达荒凉、垃圾满地的大街，来自许多国家、报酬丰厚的公务人员坐在白色的陆地巡洋舰里从一个会议赶去另一个会议。这些穷人的主子说的是发展的术语：建设"地方能力"，加强"本土的主动性"。但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个帝国式的前提：有钱的陌生人拥有了统治那些因过于贫穷、饱受冲突之害而无法自我统治的人们的权利。如果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它是仁慈的吗？只有取得成功，让安哥拉学会统治自己，这些收入丰厚的国际良知的代表们才能卸下自己的工作。但没有人知道它是否能成功。

迹象显示不太乐观。停火破坏事件正在成倍增加，军队的首脑们已经自立为地方军阀。尽管白天会对道路进行清雷，但他们经常在晚上重新布雷。很少有难民能回家。势头（momentum）是布特罗斯-加利喜欢用的词。他来这里，想重新启动某种势头。

在一轮谈判临近结束的时候，多斯桑托斯总统给秘书长提供了他的总统707专机，飞去会晤总统的宿敌萨文比，后者牢牢地

控制着拜伦多 [16] 高原。在前往途中，布特罗斯-加利邀请媒体参观707专机的行政舱，里面有蓝色皮革的旋转座椅、酒柜和会议桌。其豪华证明了一条通用规律：国家的状况越是悲惨，总统专机就越是奢侈。

但当我们飞去会晤萨文比的时候，安哥拉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关心所在。英国在伦敦召集了一次会议，来决定西方对斯雷布雷尼察陷落的军事应对措施。美国人正在讨论直接针对波斯尼亚塞族指挥控制部的“非对称”空中打击。他们想从联合国秘书长手中接过空袭的批准权。秘书长正在抵抗。如果失去了否决权，他将失去目前拥有的管理危机的军事和外交反应的手段。我问他，在事件出现转折的时候，他是否感到被边缘化。“一点都不。”他是不是因为西方大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混乱无序而感到沮丧呢？他做了个怪脸：“争论现在更加公开了。”

我问他，看到美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试图用空袭威胁塞族人，随后过不了多久又开始谈论撤军，他会如何反应？他不会公开说会员国的坏话，但从他的举止来看，关于撤军的疯狂言论显然已经考验着他的耐心。

“从哪里撤军？”他问道。撤出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 [17] 是一回事，但撤出萨拉热窝就是从波斯尼亚完全撤军。而如果你从波斯尼亚撤出，是不是也要从克罗地亚和马其顿撤出？如果你撤了，谁能把各方带到谈判桌前？“我正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他说道，轻敲着蓝色的南斯拉夫卷宗。

总统专机抵达万博，代表团转乘比奇飞机 [18] ，经历30分钟的航程前往萨文比在拜伦多的红土跑道。当我们落地的时候，身披闪亮子弹带的少年游击队员在香蕉树之间的泥屋中向外窥

探。我们的比奇飞机后面卷起的尘土落定之后，一个身穿夜总会保镖式白色夹克、黑衬衫、拄一根装饰有鹰头的手杖的大个子男人走过来，拥抱秘书长。这是萨文比。他们一起坐在一辆黑色奔驰中驱车离去。车子挡泥板上钉着萨文比的图腾：一条巨大的、灰白色的塑料斑点狗。当这辆豪华轿车驶离跑道时，狗头上下晃动着。

晚些时候，在算是拜伦多市中心的一排破破烂烂的房子中间，一个阴郁的草莓粉色的地下室里，举行了一次媒体见面会。布特罗斯-加利拍着萨文比的手，称他为“我亲爱的老朋友”。这是一个古怪的用词，因为联合国关于安哥拉的各项决议用了大量的篇幅谴责1992年之后在安哥拉蔓延的大屠杀，责任正是归咎于这位“亲爱的老朋友”身上。

后来，我问布特罗斯-加利，为什么把秘书长认同的荣誉披在萨文比这样的肩膀上？他嘲讽地瞥了我一眼，似乎在说我的顾虑不切正题：联合国的大家庭大部分是由手上沾有鲜血的人统治的，而且安哥拉的和平进程已经落后于预定计划。十字路口的一次屠杀就可能让疯狂再度上演。在萨文比的营地里，有很多人想回到丛林里去战斗。参与和平进程的奖赏需要讲清楚。必须要安抚萨文比。

安抚结束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布特罗斯-加利瞥见屋子后面有一个横幅，上面写着：真正的和平是人们心里的和平。“在人们心里有和平。”秘书长拥抱萨文比的时候咕哝着说。屋子后部的记者们不以为然地转动眼睛。回到飞机上，布特罗斯-加利耸了耸肩，做了个会意的微笑。你得鼓励人们，你得让人们相信，是的，在他们的心里有和平。

7月16日，星期日：戈巴多莱 [19] ，扎伊尔。 离开安哥拉，布特罗斯-加利的飞机穿过非洲中部，降落在扎伊尔的赤道森林的中心地带。蒙博托 [20] 总统希望两人面对面会谈 [21] 。

但我们被告知，总统还在做弥撒。所以我们先在他的行宫歇歇脚，这是一座郊区别墅，周边森林有重兵把守。布特罗斯-加利四处走动，看表，用手抚摩蒙博托收集的黄金非洲小雕像，它们立在阴凉的白色大理石底座上。角落里一个巨大的彩色荧屏上，CNN（美国有线电视网）正在播送新闻简报：泽帕处于攻击之下，乌克兰联合国派遣部队的堡垒遭到围困。布特罗斯-加利看着，脸上毫无表情。然后他站起来——唯一我看到他脱离自己角色的一个时刻——说："这就是全球化。"似乎他太过享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吊诡：在这儿，扎伊尔的森林中，观看CNN报道又一个欧洲村庄的陷落。

10分钟过去了。然后20分钟过去了。为什么还在让我们等待？我问秘书长的一个助理。"因为，"他悄悄地说，"蒙博托是国王。"

终于有一辆加长卡迪拉克停在外面。它载着秘书长疾驰而去，我们坐一辆巴士跟在后面，经过蒙博托的村民的泥屋，到达一座山顶上的大理石宅邸。屋子前面的花岗岩广场上，音乐喷泉正在表演。我们被邀请来观赏面前一览无余、180度的赤道丛林雾气蒸腾的全景。突然，蒙博托一个人出现了，身穿米色西装，接缝处绷得紧紧的。他戴着宽边的太阳镜和豹皮帽，倚靠一根银质饰头的手杖。当他向秘书长随从中的女性致意时，对每一个人都低声说"很高兴认识你，女士 [22] "，并用嘴唇轻吻她们的手。进到门里，我们被允许参观闪闪发亮的灰色大理石地板、哥白林 [23] 挂毯、路易十六时代的家具、根德 [24] 公司的电视机、令人

目眩的枝形吊灯、饮料车里巨大的威士忌酒瓶。然后我们都被带了出去，面对面会谈开始了。有传言说布特罗斯-加利正在劝说蒙博托不要驱逐成千上万从卢旺达逃到扎伊尔的胡图族难民。

45分钟之后，我们再度被请回来。蒙博托紧握着布特罗斯-加利的胳膊，拉了两个穿西装的大个子男人过来，说这些人是他的部长，他们将为他的承诺做证。然后他突然冒出来一个有趣的想法。他总是可以把他们枪毙掉，这样就没有人记得他的承诺了。但那个时候，他咧开大嘴对秘书长说："你可能会遇到人权上的困难了。"部长们的脸上摆出一副奉承的笑容，而布特罗斯-加利让自己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

这就是工作，我想，如果你是秘书长，你会这样算计：蒙博托很坏，但没有蒙博托的扎伊尔会更糟糕；30年来，这个独裁者一直控制着权力，因为华盛顿、莫斯科、巴黎和伦敦都在做同样的算计。独裁者将得到的国际支持视为理所当然，这让他对信守承诺毫不在乎。在表面向秘书长承诺不会驱逐难民的三个星期之后，他的部队开始驱逐难民。在晚间新闻的报道画面上，部队闯入难民营，用鞭子驱赶妇女和儿童。

7月17日，星期一：布琼布拉 [25] ，布隆迪。 旅程进入第五天。唯一没有显出精疲力竭的人是这个位居旅程核心、活力充沛的72岁老人。我从来没有见他放松过——从没看到他的领带解开过，今天早晨他出现的时候，突然从电梯里走出来，弯着腰，有一点轻微驼背地迈着步。跟在后面的随从人员已经精疲力竭。在尼罗河酒店（Hôtel Source du Nil）里，到了后半夜，你还可以在走廊里看到他们，穿着睡衣，把电报送到他的房间，转接来自纽约的电话，他们的床上堆满了文件。他把手下催得很紧。他的美国警卫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达里恩的前警察，他回忆起跟

随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26] 或瓦尔德海姆 [27] 的时候，那时在旅途中还有时间观光。“跟这位就不行，”他叹了口气，“当他查看时间表的时候，发现有去动物园的行程，就会划掉它，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会议。”

布隆迪是那种容易被人忘记的小国，它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因为他们自我毁灭的倾向。布特罗斯-加利飞到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畔的小城布琼布拉，目的是劝说布隆迪的政治精英们恢复理智。少数民族图西族长期掌权并且控制军队，因为多党民主的到来，他们被迫与多数民族胡图族分享权力。1993年，一个胡图人最终当上总统掌权，却被暗杀了。随之而来的是大屠杀，据信胡图族和图西族都各有大约10万人死于非命。

为了制止布隆迪分裂，布特罗斯-加利任命艾哈迈德·乌尔德·阿布达拉（Ahmed Ould Abdallah）为特使，他是一名55岁、不知疲倦的毛里塔尼亚外交官，可以忍受撒哈拉酋长的专横。1994年4月，在载有卢旺达和布隆迪总统的飞机在基加利机场被射落下来的那个晚上，阿布达拉前往电台和电视台以防错误的谣言造成血腥杀戮。他整晚都与军队的参谋长待在一起，打电话给地方指挥官，命令他们留在军营里。对于阿布达拉拯救布隆迪，免于其像邻国卢旺达一样遭到大屠杀风暴的肆虐，大多数观察家都给予高度评价。

在布隆迪没有维和部队，阿布达拉不需要任何部队。“我们这里需要的只是精神学专家，”他说，“我每天都跟政客们碰头，他们彼此害怕。当我跟他们握手的时候，他们都在流汗。为了掌握一个小时的政治权力，每个人都会谋害另一个人。”

阿布达拉不抱任何幻想：将近两年的疯狂工作，仅仅是延缓了滑向深渊的惯性过程。三天前的晚上，他自己团队的一名图西族成员的妹妹，在城市南边的公路上遭到胡图族武装分子的攻击，一起的还有她当军官的丈夫。丈夫遭到肢解，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妻子被开膛破肚。

做这些事情的匪徒绝大多数受雇于当地的政客。阿布达拉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在阿布达拉警卫森严的住处，他眺望坦噶尼喀湖，他不断地给他们打电话。“你必须让他们保持忙碌，否则他们就会干坏事。”他对政客们总是说同样的话：要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要像个成年人一样做事情，停止报复行为，如若不然，最终你会被自己释放出来的东西摧毁掉。

我和他一起坐他的装甲车出去，穿过布琼布拉遭受过种族清洗的社区，跟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雷的年轻人谈话，他们为了几瓶啤酒就可以炸掉一条街道。他下车，直面他们，告诉他们必须停止杀戮和反杀戮的循环，否则他们都会被横扫干净。似乎没有人觉得这令人惊讶：一位联合国大使亲自为一个非洲的小城充当警察，但没有其他人拥有这样做的资源和可信赖度。这是一种试验：用预防性的外交作为停止民族间杀戮漩涡的一条途径。在其他地方联合国也可以这样做，但缺乏足够强硬和有魅力的人。阿布达拉自己也很快要离开布隆迪了。

我被邀请列席预防性外交的工作过程。布特罗斯-加利坐在宾馆铺着台呢的桌子的顶头，倾听胡图族和图西族的领导人说话，他们面对面分坐在两边。胡图人坚持认为图西族主导的军队正在发动一场灭绝运动；图西人说胡图人极端分子那天晚上发动的袭击断绝了所有宪法对话的可能性。屋子里的气氛因为指责、反驳、怒目而视以及轻蔑而越来越凝重。

各方说完之前，布特罗斯-加利一语不发。然后，他告诉他们，他们让他耻于称自己是个非洲人。“你们好像都以为，”他说，扫视两边不敢互相对视的眼睛，“国际社会会拯救你们。你们是在自欺欺人。记得贝鲁特吗？我有很多好朋友死在那里，被同样的幻想所欺骗。国际社会很乐意看到你们互相屠杀直到最后一个人。援助团体已经精疲力尽。它已经厌倦于救助那似乎已经不能自我拯救的社会。”他将手掌平放在台呢桌面上。“你们都是成熟的成年人，”他说，“自助者天助之。你们的敌人不是对方，而是恐惧和怯懦。你们必须有接受让步的勇气。如果没有，没有人能拯救你们。”然后他收拾好自己的文件，大步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在尼罗河酒店，我问他，在私下场合，他是否一直采用这种尖刻的语言？

“当我必须这么做的时候，是的。”跟个人无关。怒气是一种专业设计的固定战术，目的是让畏缩怯弱的本土精英恢复理智。

它会起作用吗？

“我们只是医生，”他说，“如果病人不吃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这个比喻相当不准确。这些病人不只是拒绝吃药，他们是在对诊所放火。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他们应当被弃之不顾——甚至让秘书长也屈服于道德厌恶之诱惑？

在他去到的每一个地方，他似乎都成了这些赤贫之地对联合国、对那个高贵的虚构——国际社会——所抱期望的囚徒。这些期望证明他的机构的有效性，是对他的机构的真实要求，是其“存在的理由”[28]。而且，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他有意地

试图降低这些期望，来遏制不可避免的失望，迫使人们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能力。

我问他是否感到疲倦。

“一点也不，你看到的样子就是我的状态。”

他最近说过，联合国50年来的成就是创造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我告诉他，在这路上的五天时间，我没有看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我看到的是一个丛林，陷入在绝望赤贫的困境之中。

他摇了摇头。并没有那么糟糕，有更多理由保持希望。他没有灰心丧气。“我们给国际社会带来希望。”然后他离开了，上楼，去会晤另一个手上沾着鲜血的武装组织领导人，去接另一个来自萨格勒布的明石康或是纽约的秘书的电话。

夜色降临在尼罗河酒店。游泳池寂静无声。在走廊里，他的随员风风火火、来来去去，有一种沉寂，但很快被一轮炮火声和尖利的手雷爆炸声打破。种族清洗正在秘书长住处半英里远的地方进行。我切换到CNN，然后打开灯。有来自泽帕未经证实的报道，说波斯尼亚的塞族士兵诱骗躲藏在城镇边缘丛林里的平民走出来，把他们排成排，然后全部射杀。他们说塞族人戴着蓝色头盔 [29] 。

II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看到，在与布特罗斯-加利一起穿越非洲的旅程中，我见证了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走到日暮途穷的时刻。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的两次灾难，让开启于1989年的一

个短暂的希望时期落幕。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历史机会被浪费掉了。想要知道原本可能发生什么，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可以比较的转折点。1945年为元年，紧随其后发生的是，联合国建立，“北约”建立，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以及修订《日内瓦公约》（the Geneva Conventions）和战争法（the laws of War）。苏联崩溃之后的这几年提供了类似的机会。苏联的否决不再让联合国陷于瘫痪。苏联的装备和顾问不再支持全世界各地的政权和叛乱。世界上两种竞争性的人权文化—— 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被一系列的最低准则所取代，全世界每一个政权都认可这些准则，都期待出现一个超级大国们摒弃令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众多地区沦为乞丐的代理人战争，转而进行健康而且务实合作的时代，这并非不切实际；凭借“冷战”终结带来的和平红利，设想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和发展预算会有一种持续增长，也并没有超出可能性的范围。

与这些新的机会相伴的是国际社会中道德氛围的一种深刻改变。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出现的人权和发展活动家团体获得了国内选民的支持，拥有足够的机构权力去影响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类似红十字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这样的组织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身价的全球性运作机构，它们运用CNN这样的新兴全球媒体，创造出对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广泛需求。

这些机构抓住了现代世界的新现实，正是这些现实改变了现代道德良知的视野。媒体打破了过去将我们的道德关注局限于眼前的家庭、邻里、地方或国家的狭隘分隔。自从电视新闻在20世

纪60年代出现以来，我们开始直接面对人类的苦难，这种苦难从前超出我们的视野范围并因此超出诸如内疚、羞耻、愤怒、懊悔之类的情感范围，但正是这些情感能让我们将其他人的困境视作自己的事务。同时，喷气机革命和快速调度的物流服务让我们感到，对于在电视上看到的灾难，我们可以 做些事情，并且可以很迅速地完成，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最后，我们前所未有地了解到，西方积累的规模庞大的未利用资源——谷仓里的粮食、医药仓库里的输液器、我们工程师和医生的技术知识——可以投入使用、缓解世界的苦难。这些因素已经改变了现代的道德想象：道德冲击的边界是全球性的，我们知道 自己可以做出改变。我们安于宿命和不作为的借口似乎越来越不可信。我们的能力大小，我们未利用资源的体量，会共同谴责我们。

这种被唤醒的道德良知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明显的。接二连三地，国际社会授权了一个又一个雄心勃勃的干预行动：联合国在柬埔寨监督选举；反对独裁者占领邻国的海湾战争；救援库尔德人的国际人道主义努力，并且给他们建立一个处于美国空中保护伞之下的安全区；在索马里压制派系争斗、为饥荒受害者提供食物的干预；派遣联合国部队到波斯尼亚保护人道主义运输车队。正处在这一波人道主义干预的高峰，像法国的贝尔纳·库什内（Bernald Kouchner）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的前创始人，曾在密特朗总统内阁担任部长——宣称严格国家边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干预的时代已经到来。联合国将库尔德人置于国际人道主义保护之下的决议，被视为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一个重要先例，它构建了在平民遭到当地暴君镇压的时候，国际社会干涉国内事务的权力。

这些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90年代初的国际主义不是像1945年那样富有创造性的时刻，倒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尔逊式国际主义的失败。当道德的国际主义失败的时候，孤立主义重新抬头，收缩的迹象遍及我们周围。进入布特罗斯-加利时代以来，部署在全世界的维和部队数量已经下降，而活跃战争的数量在增加；主要国家的援助外国预算陷于停滞或者下降；媒体正在关闭他们在国外的办事处。在地球村里，我们重新回到了狭隘政治的时代。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道德行动主义的退潮，其历史轮廓开始显现。它曾被当作一种将原则置入实际政治的尝试，旧有的帝国式授权干预话语被新的人道主义需求的话语替代。但一种帝国式的野心、愚蠢和反讽继续困扰着其运作。布特罗斯-加利的飞机飞越的黑暗丛林——以及我们短暂停留的蒙博托在戈巴多莱的度假地——都接近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1900年出版的《黑暗之心》对欧洲帝国主义接近落幕时的伟大寓言的实际场景。1890年，年轻的康拉德乘坐蒸汽船旅行，穿过刚果，他对比利时殖民者在该地区一些代理人残酷成性的野蛮极为厌恶。这些人是康拉德写邪恶的库尔茨（Kurtz）时参照的原型。

在《黑暗之心》中，康拉德观察到，从近距离看，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件美丽的事物。“能够救赎它的，只有思想。”在库尔茨自己的眼中，他对象牙的贪婪追寻被他将文明带给野蛮的计划赋予了高贵性。当然，最终文明什么都无法救赎。在河流的最后一个转弯处，当马洛（Marlow）发现库尔茨的时候，库尔茨的文明使命留下的所有东西，是一排穿在梭枪上的原住民头颅，以及库尔茨已经无法实现的、要求国际社会镇压野蛮习俗的最终报告，在报告的最后一页上，发狂的库尔茨潦草地写下：“消灭所

有野蛮人！”康拉德的著作是关于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它因无所作用而无力，因虚无主义的愤怒而耗竭——的寓言。它也是关于道德厌恶的诱惑：因为未能教化野蛮人，库尔茨转而用其道德自我幻灭的全部力量对抗他们。

20世纪90年代初的自由主义干预都自觉地公开宣称是后帝国主义的，然而康拉德的延续和反讽仍然萦绕着它们。康拉德用《黑暗之心》中的炮艇图像象征帝国主义的无能：停泊在非洲的河岸，向毫无反应的丛林发射无用的炮弹；当代的景象则跳跃到北约的战机在1994年向被废弃的塞尔维亚人炮兵阵地投放炸弹。康拉德自己也许无法想象，没有什么比这个景象更能说明帝国主义的无能了：绝大多数是巴基斯坦人的联合国士兵向索马里人群开枪，杀害那些他们得到授权要保护的妇女和儿童。当然，现在所有索马里行动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就像比利时在刚果存在的所有痕迹都被丛林再次覆盖。如果按照预期，北约部队在1998年的某个时候撤出波斯尼亚，这种情况很快也会发生，他们也会仿佛从未在那里待过一样。过去和未来共同展现了大国的徒劳无功。

1989年以来进行的干预在国际上被认为是自我限制的，因此是权力的道德实践，没有沾染帝国的贪婪。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盟军在通往巴格达的道路上停止进攻，萨达姆被允许继续掌权，我们将自己限定在为库尔德人提供空中保护伞，让他们尽可能塑造自己的未来。在索马里，我们为了所谓的“快速撤出”战略而预先排除了占领整个国家。在波斯尼亚这片整个19世纪无论是奥地利还是奥斯曼龙骑兵的占领下都保持和平的土地，我们直到1995年夏天还认为，仅仅是我们的反对、贸易禁运以及偶尔从飞机上扔颗炸弹的威胁，就可以让我们完全不用召唤自己的“龙

骑兵”。然后，我们带着一种天真——认为曾统治奥匈帝国的古老的犬儒主义是可笑的，认为可以派我们自己的“龙骑兵”去待几年，然后再把他们撤出来，留下和平的波斯尼亚。要是我们更多一些帝国式的冷酷无情，也许会更为务实有效。如果施瓦茨科普夫将军 [30] 让自己成为征服伊拉克 [31] 的麦克阿瑟将军，伊拉克的海外反对派现在也许在重建国家了；如果海军陆战队仍然在摩加迪沙（Mogadishu）的街头巡逻，推动索马里从霍布斯式世界到洛克式世界的进程也许多少会有更光明的前景；而如果北约已经在1992年4月通过对塞尔维亚暴乱的空中打击保卫了波斯尼亚政府，可能欧洲不必经历集中营的重现。类似地，如果在1995年的《代顿和平协议》之后，西方政府在联合国的授权下简单地接管波斯尼亚的行政管理，至少到当地各方可以用切实的证据证明自己能够管理国家的时候，波斯尼亚也许可以在一个更有保障的基础上进行重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一种可能，这个事实说明，一种自由干预的外交政策从词义上可能是矛盾的：原则上要求我们干预，然而不允许让干预得以成功所需要的帝国式残酷存在。

在后帝国主义时代，我们发誓放弃帝国式的道路，但帝国式傲慢的痕迹还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每一个人都认定，任何外部的力量可以进入索马里、终结派系战争、然后撤出，所有这一切都在几个月里完成？在南斯拉夫，并不是胆小让我们避免过早使用武力，而是傲慢让政策制定者认定只用强硬的言辞就可以让狡猾、无情的煽动归于无形。我们一直高估了自己的道德威望，并且一直低估了那些人发动民族战争的决心。

而且，当政策受到道德动机驱使的时候，它通常是被自恋所驱动。我们干预，不仅是为了拯救其他人，也是为了拯救我们自

己，毋宁说也是将我们自己作为普世准则捍卫者的一种想象。我们想要表明西方“意味”着什么。这种想象的西方，这种我们自己的自恋形象，我们相信它具体呈现在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波斯尼亚的神话之中。干预的欲望可能导致我们重新书写波斯尼亚的历史，让它符合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挽救之地的理念。然而，一个对于让穆斯林外籍工人少数群体集中居住没有显示出任何疑虑的西欧，恰恰在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基督徒共存中突然发现了自身的多元文化幻象，这显然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波斯尼亚成了一个移置的剧院，在其中，原本可以消耗捍卫国内多元民族社会的政治活力，转而被引导去捍卫远方的神秘多元文化主义。波斯尼亚成了被寄予厚望的最新一代，它尝试过生态学、社会主义和公民权利，却见证这些尝试都失去了浪漫的动力。

尽管知识分子的道德愤慨对波斯尼亚的结果有实际影响，但回头来看，很明显，美国施加压力达成《代顿和平协议》，其支配性动力是政治性的、地缘战略上的，而不是道德的：美国干预是为了通过定期、恰当地展示全球领导力来挽救克林顿政府，而更根本的是为了拯救北约和大西洋联盟。自从1993年初美国拒绝支持欧洲的万斯-欧文（Vance Owen）计划以来，欧洲和美国对波斯尼亚一直有尖锐的分歧。克林顿在波斯尼亚进行干预是为了留住他的盟友，并且按照美国的条件去做。但代顿现在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当我们的龙骑兵离开时，战火可能重燃。正如奥匈帝国已经告诉我们的，巴尔干总是暴露出帝国权力的悲情一面。

在这些自由主义的干预中，道德的反应——“必须要做些事情”——常常得到未经审视的假设的支持，即认为我们拥有做任何事情的权力。这种全能的假设经常在愤怒和洞察力之间，在强

烈的感情和明白何者具有可行性之间进退两难。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更为谦卑的假设——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总是比我们想做的少，我们也许能够制止恐怖，但我们无法防止所有悲剧——我们也许会更为负责，并且有可能（只是可能）设计出成功机会更大一些的干预战略。

既然我们正面临绝大多数干预所带来的耻辱和并不完美的结果——波斯尼亚最可能的未来仍然是低级别的民族暴力；萨达姆·侯赛因仍旧掌握权力；军阀们仍旧让索马里充满血腥和死亡；非洲大湖区域继续被卢旺达大屠杀留下的仇恨分裂——存在另外一种康拉德式的平行道路可以考虑，其主题是道德厌恶。如果说现在许多人从西方的失败中私下得出的结论是“消灭所有野蛮人”，那也许太过头了一点。但许多人已经受到相关思想的诱惑：“让野蛮人自己清除自己。”

在布隆迪和卢旺达，秘书长的言辞与这种幻灭和厌恶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危险地带，类似的幻灭随处可见。在将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夷为废墟的内战中，在让阿富汗俯首称臣的“二十年战争”中，努力为受伤者和难民提供帮助的援助队员正在减少，像刚果丛林中的康拉德式站长 [32] 一样，他们常常感到不再能理解他们到底在那里干什么。道德厌恶不只是一种诱惑；它是对事件、精英和社会年复一年徒劳地帮助他人的一种客观反应。激情的疲倦——就资助发展的国家和私人捐赠而言——可能是某种疲惫以外的东西。它也许代表一种主动的、对接受帮助的社会没有尽其所能拯救自己的厌倦。

将维持接触放在第一位的道德叙事的崩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再度出现的幻灭。所谓道德叙事，只不过是指那些我们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让远方变得有意义，解释为什么我们应当介入他

们的困境。认为全球性媒体自动创造了这些接触叙事，是一种谬误。在 这些暴行和苦难的图像中，没有任何东西自动产生同情和介入。一些图像、一些地方与我们有关，其他的则无关。众所周知，我们与遥远他乡的道德接触是选择性的、偏袒性的。我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看上去与我们相似的人，而非不相似的人；我们更愿意帮助那些历史和境遇更能为我们所了解的人，而不是那些我们无法洞察其境况的人。我们的接触行为严重依赖媒介——作家、记者、政治家、目击者——提供给我们的叙事，他们让我们接触恐怖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提供的叙事可以分成两类。一种叙事是，全球化的故事告诉我们，世界正在走向同一，过去不在我们考量范围之内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正迅速变成竞争者。这些叙事给予我们理由，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接触，认真考虑他们，即使只作为潜在对手。第二个叙事是混乱的故事。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凭借其著名文章《无政府时代的来临》（“The Coming Anarchy”），可能是围绕这个主题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者。在从西非到高加索的旅程中，他构建出一种叙事：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已经进入无政府状态，战争形态如此混乱，称为内战已经是高抬了它们。它们是派系之间、团体之间的分裂战争，其目标甚至不能被称为政治性的。他们为了毒品、领土、生存而争战，其争斗除了混乱不能带来任何东西。

如果我们将两种叙事——全球化和混乱——放在一起，很显然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图景。在最低层次上，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图景：一个24小时的全球贸易经济将东京、新加坡、台北、巴黎、伦敦、罗马、纽约和洛杉矶联结在一起，但世界的广大地区——中非、拉丁美洲的一部分、中亚——都游离于全球经济之外，陷入了半永久性暴力的次理性地带。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把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即使看上去这儿是我说了算。要点在于，由于解释性叙事的缺乏，接触的伦理正在受到侵蚀。当我们在自己的边界之外看到的都是混乱时，厌恶的诱惑变得无法抵抗。如果我们可以在混乱中找到一种模式或者一个机会，来给这里或那里带来秩序，干预和伦理性长期接触的准则也许会再度变得切实可行。我们忘记了“冷战”给我们创造的意义世界：它给予第三世界的战争一个显明的准则，它解释了各方立场，它划定了我们应该站在哪一方。我们已经丢弃了我们的叙事，以及与其相伴的接触准则。

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叙事已经远离了建立在其中的条件要求。我们要求受害者清白无辜，当他们不是完全无可责备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们承担责任来掩盖我们的幻灭。为什么我们要求受害者应当是无可责备的？在美国空军提供保护的领地内，库尔德人的政治派系相互之间持续争斗不休；当一个团体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的时候，它转向巴格达，然后，曾经在1991年支持他们起义的自由主义干预者看到了富有启迪性的一幕：库尔德人领着伊拉克秘密警察的特工人员，在领地内围捕他们的库尔德对立派。与库尔德人最凶恶的敌人联盟，目的是在库尔德运动内部进行清算，这当然会让库尔德人的西方朋友们断言：“你们都合该倒霉。”[33] 然而，当一个弱小民族知道美国政策对于他们的事业没有严肃的承诺时，他们能做什么？如果波斯尼亚战火重燃，西方要想脱身很容易。毕竟，他们是“咎由自取”。

谴责受害人，是幻灭的诱惑之一。道德厌恶有非常非常多的辩解理由，都是围绕着新世界秩序的失败，一种自我开脱的“借口”——“我们”努力了，“他们”失败了。事实上，说我们所有 行动都是失败，具有启示录一般的诱惑力。真相模糊得多：库尔德

人将被拯救，免于毁灭，但不会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是继续挣扎在四个满怀恶意的邻居当中；索马里的饥荒得到缓解，但军人的统治不会终结；萨达姆受到了惩罚，但还没有被推翻；西方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免于被清洗，但不能防止他们的国家遭到分解。

这是我们所能取得的最佳结果吗？在那些认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的人和那些认为还可以做更多的人之间，还存在一个位置，即承诺的伦理与责任的伦理相遇的地方，我们对处于危境中的陌生人做出的承诺，可以通过可行的救助战略获得支持。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中间过程，政策和公共舆论有可能一直在斯库拉过度承诺的傲慢和卡律布狄斯 [34] 犬儒式的脱离之间左右两难。

要找到这个中间过程，应当考虑三个问题：（1）外部权威在什么时候有必要在内战中动用军事力量？（2）什么时候支持一个少数民族宣称脱离国家是正确的？（3）如何能够保护平民免遭内战的荼毒？

越南的经验暴露出一个民主政体对于后帝国时代运用武力施加的决策限制。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例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民主国家才能够达成国际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共识。选举周期让这种共识注定是脆弱的：事实上，只有低风险因而也是低收益的、基于空中力量的军事干预战略，看上去才是可行的。巴尔干的威权民粹主义者展示了对现代后帝国权力的阿喀琉斯之踵的精明认知。

然而，巴尔干的故事似乎表明，歧视性的、有目标的干预——通过空中武力——是威权民粹主义者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

孤立的、被围困的少数民族早在1992年就呼吁以军事行动制止塞族人，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1995年的《代顿和平协议》，只有在运用美国空中力量改变地面的军事平衡的时候，才有可能。第二个明显的教训来自马其顿，即外部力量的预防性部署可以在一开始就防止内战。小型的派遣部队能够拥有非对称性的作用。既然预防性的部署有作用，来自波斯尼亚的第三个教训似乎是：如果你准备干预，尽可能早。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将是：如果你不准备尽早干预，那么干脆不要干预。折中手段通常比完全不采取手段更糟糕。

困难得多的问题是，外国的政府是否应当鼓励或者限制国家的分裂。往回追溯，西方国家应当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告诉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南斯拉夫联邦的和平解体是可能的，但任何用武力迁移人口或者改变各共和国边境的尝试都将受到经济和军事制裁，包括选择性地使用空中打击。当然，问题在于，直到1990年，维持一个联合的南斯拉夫及其领土的统一性，似乎仍然是避免民族主义战争的较好的途径。直到1991年6月，欧洲和美国的政策仍继续鼓吹支持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不幸的是，塞尔维亚当局将这种支持视为一种默示授权，动用武力反对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声明。即使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西方政府继续将南斯拉夫国防军对克罗地亚的攻击视作一个联邦国家对分离主义运动的合法反应。西方政策转变的正确时刻显然只不过是马后炮。

武力的合法使用问题因此必须与何时支持联邦国家、何时支持他们分裂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在少数民族对抗多数派暴政或不公正的任何地方都会重现，如中非和高加索。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必须理解我们所讨论地区的历史。如果少数民族和多

数民族在晚近的时候有过相互屠杀，期待他们未来和平共处是不现实的。一段仇恨的历史——真实的、一再重复的杀戮——确实可以让分离和自决的声明具有正当性，前提是——这是关键之处——所要求的领土是正当有理的，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以及如果分离的一方准备保护那些留在他们的国家之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相反，在像魁北克这样不存在杀戮历史的情况下，很难判断过去的不公正如何让双方都有的分离成本具有正当性。一个清晰的、近期的流血记忆确实是能让分离具有正当性，是让对少数民族自决声明的国际支持具有正当性的唯一标准。

第三个问题困扰着前南斯拉夫的整个人道主义行动，即如何保护在内战之中进退维谷的平民。我们并不是要削弱那些代表我们参与干预的维和队员和救助人员的奉献精神和勇气，但仍要问，最终他们是否没有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例如，我们应该问，在交战地区向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车队的努力，是否最终延长了战争。原则上，我们寻求将帮助带给各方无辜平民受害者的速径。不可避免地，有些平民不是那么无辜；不可避免地，大多数援助落到了交战者的手中。我们所采取的干预策略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想法，即我们不能让自己在巴尔干卷入对抗塞尔维亚人的地面战争，包括保护安全区内的穆斯林、防止萨拉热窝陷落，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塞族人的炮击。事实上，西方的政策中有这种说法：我们不会与主要侵略者作战，我们不会让受害者抵抗，但我们会努力防止受害者遭到清洗。

然而由于未能阻止和逆转塞尔维亚的入侵，西方成了毁灭波斯尼亚及其首都的同谋。联合国让自己成为塞尔维亚围困下的萨拉热窝的管理者。联合国没有让这个城市饿死，但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打破围困，结果导致延长了城市的苦难。没有比这更含

混的道德结果了。我们只能说，外部干预防止了一个大塞尔维亚的建立。如果克罗地亚不是在1991年12月得到了承认，很有可能它会被全部吞并。如果联合国特遣部队没有进入萨拉热窝的话，这个城市可能已经陷落；如果它陷落了，波斯尼亚所有人现在都会在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控制之下。西方的干预实际上防止了塞尔维亚实现其全部的战争目标，然而我们应该全都冷静深思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方式。我们选择的战略使采取其他或许更有效的方式不再可能。通过在地面部署维和部队，西方提供的轻武装部队成为当地军阀的潜在人质，从而预先排除了空中力量的持续运用。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尽管是必需的，但可能降低了双方协商解决的动力。

大卫·里夫 [35] 和其他人曾经提出，联合国在波斯尼亚失败是因为它要的是和平而不是公正。但这正是联合国维和的目标，而不是其失败的标志。维和部队从定义上来说是偏袒的而不是公平的，他们的任务不是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之间做出道德区分。通过他们在分界线的存在，维和部队实际上还认可了侵略者的征服，并且阻止受害者夺回失去的土地的尝试。维和部队的存在也无法宽容地对待未能恰当行事和放弃战斗的受害者。波斯尼亚拒绝屈服，让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和平的维和部队指挥官大为恼火。

报道战争的记者不断呼吁联合国部队对于恶意开火进行还击，谴责和追究侵略者，要求空中打击介入，但没有说明联合国一旦介入，要如何避免被强硬的塞族人袭击撕成碎片。那些想要联合国采取更加积极立场的人，不了解联合国部队在地面有多么脆弱。索马里的信息表明，即使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他们寻求公正、开始狂热地追捕恶霸军阀的时候，也可能蒙受羞辱。

在波斯尼亚和库尔德斯坦，联合国蹒跚走向一种新的行动模

式：安全区。划出一条警戒线，将没有武装的平民围起来，让他们的军队在外面战斗，确实至少解决了在不可能停火的情况下保护平民的问题，但安全区政策是否有效依赖于两个条件：安全区内的战斗人员是否都被解除了武装，周围边界和空中的安全力量是否足以保护安全区。在波斯尼亚安全区，两种安全力量的保护都没有。结果是一种令人惊骇的猜谜游戏，“安全区”这个词变成了西方的伪善和无能的具体代表。最糟糕之处是一种相当好的理念（可以应用在其他地方的）遭到了羞辱。在斯雷布雷尼察之后，谁还会相信西方提供的“安全区”呢？然而，在内部崩溃国家的战争区域找到一种保护平民的可行战略，是一种挑战，它创造或破坏的不仅是联合国，还有整个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干预。

后“冷战”世界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是国家的崩溃，以及由此导致的平民人口自我供养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崩溃，既要对抗饥荒，又要对抗民族战争。过去各国有承担帝国式责任的能力，现在他们不愿再肩负这一职责，在这样一个世界，去殖民化形成的许多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被证明不具有维持国内秩序的能力。这些民族获得自决，是基于最残酷的可能条件。他们要么被民族冲突撕裂，要么是太过弱小，无法克服其人民的贫困。前南斯拉夫属于一种数量正在增加的国家，它们位于苏联帝国的南部边缘或非洲，国家已经崩溃，还将其公民抛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战争，或者部分人反对部分人的战争之中。这些国家需要的是一种内部的和平，以及紧随其后的体制重建，实现法律的统治而不是枪炮肆虐的统治。这种工作完全与后“冷战”时代的即时干预、迅速撤出的风格不匹配。它需要的是一种长期的、不那么引人注意的重建社会自身的承诺。显然，这样的工作只能由人民自己来承担，但外界的持久承诺能够有所帮助。

在19世纪，这种工作是“白人的责任”：库尔茨的责任，即在野兽横行、肮脏污秽的丛林里建设帝国统治管理的基础设施。在巴尔干，那是奥斯曼人的工作，后来是奥匈帝国。他们工作的残留遗迹仍然是点缀的风景。至少回头来看，帝国统治拥有某种逻辑：那些无法就自我统治达成一致的人们，也许可以服从陌生人的统治。

在民族主义和自决信念崛起之时，这种逻辑无法存活。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现代不言自明之理带来的结果，这种不言自明之理包括：陌生人的统治比自己人的统治糟糕；人们最好是自己统治自己，即使他们搞得一团糟，也比受外国人统治好，尽管这些外国人的工作还过得去。民主派从这些不言自明之理的真相中不会得到任何回报。康拉德关于帝国的丑陋深刻是正确的，对帝国式瓜分全球的怀旧毫无意义。然而问题仍然是，当自决失败的时候，当内战或饥荒摧毁了一个政体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谁来重新创造让自决发挥作用的必要机制？即使在巴尔干能够协调达成某种形式的和平或者永久性停战，也需要一到两代人来重建体制，国内信任和政体的有效运作都有赖于这个体制。谁已经准备好来担负这个重任？准备承担这个挑战的非政府组织并不缺乏：律师团体准备走出去，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给予民法和刑法的指导；警察可以传授在多民族社区中的法律执行问题；医生和护士准备重建医疗保健设施。但这些国家的持续衰弱——它们无法约束和控制暴力——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善意在沙地里流失耗尽。这些地方最需要的是国家，在一个后帝国主义的时代，这是外界人士唯一无法给予他们的东西。

一直有要恢复国际联盟时期的古老理念——托管制度——的讨论，即将整个国家转交联合国管理，不是按月计，而是按年

计，直到普通人可以摆脱分裂他们的恐惧和仇恨。但令人怀疑的是，国际社会是否有实施这种做法的耐性，以及当地的人民是否可以忍受由陌生人统治。长期来看，托管必定会产生憎恨，同样的憎恨曾导致对帝国统治的反抗，到结束的那一天，托管制度留下的可能是跟它们进去的时候同样分裂而失败的国家。

如果我们退后一步，从康拉德式反讽的立场来审视我们笨拙而模糊的干预，令人惊异的是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之道德联系的脆弱性。康拉德的寓言提醒我们，帝国的统治事实上可以多么卑劣。然而明显的是，帝国和帝国竞争给我们提供一个可居住的安全区，在其中我们接受一个介入危险地带的永久性准则。随着帝国的消逝，发达的“北方”世界似乎越来越没有理由去关注其周边不稳定的、正在崩溃的国家。令人痛心的是，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的命运都泾渭分明。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两种叙事——全球化和混乱——并没有连接起来。甚至经济利益关系也不太可能将优势基于知识的发达世界与只能提供非熟练劳动力和原材料的边缘世界联系在一起。全球村的话语、媒体的全球化，掩盖了我们最基本利益日渐增长的疏离。现在我们甚至不清楚，是否需要曾引诱库尔茨进入丛林的象牙。

这是在人道主义关注的革命中应当看到的环境。因为存在这样一种革命：普世人权的启蒙遗产重新焕发光彩；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对人权活动家、发展工作人员和救助专家的赞助者，这些人的道德准则是人类利益和需求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不可分割。然而这种断定人性相互依赖的努力，必须对抗似乎流向另一个方向的历史河流：地球的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和安全利益上趋于分离。康拉德式的反讽在于，相比20世纪末期后帝国时代的政治家和商人，这种相互依存更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的库

尔茨这样的人物身上。需要更加清楚理解的是——不管其意义多么悲观——当良知是富人和穷人、北方和南方、安全地带和危险地带之间的唯一联结时，它确实是非常微弱的一种联系。如果波斯尼亚的事业没有激发普遍的愤怒和痛苦——如同人们期待电视机屏幕上的暴行镜头所引起的——并不是因为那些坐在舒适起居室里面观看这些图像的人们缺乏正常的人类怜悯。他们的慈善反应相当强烈，维系团结的现实障碍源于深层：在于某些深层次的、根深蒂固的感情，即“他们”的安全和“我们”的安全确实是分隔的；从历史、财富和运气来看，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确实是割裂的；即使我们对他们寄予同情，我们并不能与他们共命运。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相信，尽管遥远的火灾是糟糕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将它们拒之门外，尽管它们可能毁掉邻居的屋顶，但火花绝不会跳到我们自己的屋顶上。

---

[1]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2016），埃及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1992—1996）。

[2] 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波黑城镇，波黑内战中被联合国划为“安全区”。1995年7月塞族军队攻占此地，屠杀了约8000名穆斯林男子。

[3] 图兹拉（Tuzla），波黑东北部城市。

[4] 黎凡特（Levant），历史上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泛称。

[5] 阿比西尼亚（Abyssina），埃塞俄比亚原国名。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当时的国际联盟予以谴责，但未能有所作为，阿比西尼亚最终被意大利吞并。

[6] 明石康（Yasushi Akashi，1931— ），日本外交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7] 托尔瓦·斯托尔滕贝格（orvald Stoltenbergg，1931— ），挪威政治家、外交官，1993年4月出任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冲突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之一。

[8] 原文为法文états d’ame。

[9] 科普特人（Coptic），埃及少数民族，信奉基督教，是古代埃及基督教信徒的后裔。公元400—800年，基督教是埃及主要宗教，被穆斯林征服之后，基督教在埃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10] 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以色列纪念“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的官方纪念馆，1953年建于耶路撒冷。

[11] 戈马（Goma），刚果民主共和国（旧称扎伊尔）城市，毗邻卢旺达。

[12] 罗安达（Luanda），安哥拉首都。

[13] 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1934—2002），安哥拉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曾领导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1975年安哥拉独立后，长期领导反政府武装展开内战，2002年于战斗中阵亡，安哥拉内战结束。

[14]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ã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缩写UNITA），安哥拉反政府武装组织，1966年成立，长期与安哥拉政府军展开内战，2002年领导人诺纳斯·萨文比阵亡，内战结束，其后成为安哥拉主要政党之一。

[15]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1942— ），安哥拉军事强人，1979—2017年担任安哥拉总统。

[16] 拜伦多（Bailundo），安哥拉中部城市，位于万博省，20世纪90年代这里是萨文比的安盟总部所在地。

[17] 泽帕（Zepa），波黑东部城镇，位于斯雷布雷尼察西南。

[18] 比奇飞机（Beechcra），美国飞机制造商，主要生产公务机和特种飞机。

[19] 戈巴多莱（Gbadolite），扎伊尔北部城市，毗邻中非共和国，是独裁者蒙博托的故乡。

[20] 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ésé Seko），原名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Joseph-Désiré Mobutu，1930—1997），扎伊尔独裁者，1965—1997年担任刚果民主共和国（后于1971年改国名为扎伊尔）总统。

[21] 原文为法语tête-à-tête。

[22] 原文为法语Enchanté，Madame。

[23] 哥白林（Gobelin），法国手工艺编制品传统商家，历史悠久，生产的挂毯是昂贵的奢侈品。

[24]　根德（Grundig），德国著名电子产品制造商，1945年成立，产品以收音机、电视机为主。

[25] 布琼布拉（Bujumbura），布隆迪首都。

[26]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Pérez de Cuéllar，1920—　），秘鲁政治家、外交官，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1982—1994）。

[27] 库尔特·约瑟夫·瓦尔德海姆（Kurt Josef Waldheim，1918—2007），奥地利政治家、外交官，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1972—1982）。

[28] 原文为法语raison d’être。

[29] 蓝盔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标志。

[30]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1934—2012），美国陆军上将，海湾战争时期多国部队总指挥。

[31]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当时美国尚未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

[32] 指《黑暗之心》中的人物库尔茨。

[33]　作者在这里借用了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著名对白，莎翁原话为“你们两家合该倒霉”，见梁实秋译《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一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远东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127页。

[34]　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女妖，各自据守在墨西拿海峡的一侧，吞吃过往船员和船只。“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后来成为习语，喻指处于左右两难的困境。

[35] 大卫·里夫（David Rie，1952—　），美国非虚构作家和政策分析家，苏珊·桑塔格之子。

4
战士的荣耀

I

1859年6月24日，一个名叫让-亨利·杜南特 [1] 的富裕日内瓦人在意大利北部旅行。在卡斯蒂格里奥尼（Castiglione）附近的高地，他看到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军队在索尔弗利诺（Solferino）的葡萄园和山谷里互相厮杀。整整一天，杜南特听着战斗的声音穿过硝烟炮火，震彻云霄。黄昏时分，奥地利皇帝放弃了战场，他的部队战败退去。司汤达在《帕尔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 ）中描述了滑铁卢战役的混乱；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纪事》（*Sevastopol Stories* ）中描绘了克里米亚战争中俄罗斯防御堡垒中的战友之情。但没有什么记叙能比杜南特的《索尔弗利诺回忆录》（*A Memory of Solferino* ）更能反映战斗结束之后的战场景象：凝固的血将泥土染成黑色；枪支、背包和战衣被乱扔一地；到处是断肢残躯、裂开的骨头碎片、子弹盒；失去骑手的马匹在尸体间逡巡；因死亡的抽搐而扭曲的面孔；受伤的人爬向血水和泥混杂的小水塘解渴；贪心的伦巴底农民奔走于尸体之间，为的是脱下死人脚上的靴子。

进入卡斯蒂格里奥尼，杜南特发现两个帝国的数千名受伤士兵肩并肩奄奄一息躺在教堂里、广场上和村子的小巷里。他派人去找医用绷带和其他基本用品，并招募村里的妇女，开始看护伤员，他得到了两个度假路过的英国绅士的帮助。杜南特那时候30岁出头，是一个地道的业余人士、一位战场的观光者。他此前从

未看护过任何人。他穿的白色亚麻西装逐渐变得血迹斑斑，他在死者和垂死者之间来回奔波，挤进村里教堂的中庭，分发香烟，相信一支优良哈瓦那的香气可以缓解腐烂伤口的臭味。除了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清洗伤口，只有软麻布可以用于战地包扎。10个小时的战斗，6000人死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还有几千名士兵将会因伤死去。

那个周末杜南特有没有救活一个生命是存疑的。只过了几天，他便放弃了，回到了日内瓦，但他看到的场面改变了他的生命。对于绝大多数信奉自由主义的欧洲人而言，索尔弗利诺是一个光荣的胜利，帮助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下最终获得了自由。对于杜南特来说，索尔弗利诺则是一个他终生努力破解的道德难题，而对受伤者的漠视是一个耻辱，揭穿了战士受到国家敬重的神话。他决定写下自己的经历，引导他那个时代的良知。他的《回忆录》于1862年出版，在其中，他描述卡斯蒂格里奥尼的护士们说那些垂死的病人，“Tutti fratelli”（他们都是兄弟），这个身穿血污斑斑亚麻西装的人成了道德名人。他见到了某种亘古有之的东西——战场，并且是某种重新见到的战场；他关注的是军官和国王们离开之后留下的伤员和垂死者，这是以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像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2]一样，他不认为战争只是军人的事情：作为一个平民，他走入他们的道德范围，并且坚持那里发生的事情是所有人的事情。南丁格尔在斯库台（Scutari）医院发现了老鼠，发现士兵甚至无法躺在一张床上静静地死去，她让英国军队感到羞耻，感到要去做点什么。杜南特开始做同样的事情。他游历了欧洲的各个首都，用他的声望为一个新的计划寻求支持，即一个可以让急救团体在战时救护伤员的国际协定。他写信给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寻求得到这位患有忧郁症的隐居圣徒的支持，但她决然地拒绝了。她坚持

认为每个国家的军队医疗服务应当只为自己的伤员负责。作为一个瑞士人，杜南特偏向于建立一个由中立志愿者组成的、可以救护交战双方伤员的国际组织。一个由日内瓦著名人士组成的五人委员会——将要成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缩写I. C. R. C）的核心——于1863年2月成立，用于传播杜南特的理念。

1864年8月，瑞士政府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会议，代表来自16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他们寻求在改善战场医疗服务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在会议期间，有人建议医务工作者戴上白色袖标；另一个人建议在上面加一个红十字，作为对瑞士国旗的致敬，瑞士国旗是红底加一个白色十字。红十字诞生了，它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广泛认可的标志。三个星期后，代表中的12人签署了有名的《日内瓦公约》。公约是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协议，它同意医院、救护车和医疗人员“中立化”，并建立了一个原则：敌方士兵应当得到与本国部队同等的医疗待遇。它对不守约者没有设立任何处罚，它没有实施机制，但它设定了一个战斗人员应当符合的标准——如果他们希望自己被认为是“文明的”；对于杜南特而言，这已经足够了。甚至在杜南特的时代，“文明”战争的思想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甚至是一个不正当的——理念。《日内瓦公约》签署的时候，美国内战最终以血腥收场，它绝对不是文明的。任何一个怀有战争荣光之幻觉的人都应该去看看马修·布雷迪 [3] 拍摄的葛底斯堡（Gettysberg）战役的死难者图片，他们的衣兜被盗贼翻了个底朝天，他们的脚因腐败而肿胀。

第一个《日内瓦公约》可以追溯到当战争变得更加野蛮而更为人所见的时候。第一挺实用机关枪加特林机枪 [4] 在美国内战中得到使用，这开启了机械化屠杀的进程，在索姆 [5] 和凡尔登

[6] 达到顶峰。同时，在家里阅读战况的公众与战场的距离越来越近。像布雷迪的照片一样，摩斯码和电报的发明打破了分隔平民和屠杀现实的道德距离。新的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主体——战地记者，以及一个新的道德体裁——战争报道，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两者都有助于创造出一种清晰的现代意识，即在光荣神话和其血腥现实之间存在隔阂。

《日内瓦公约》也应当被看作一种努力，试图挽救17世纪和18世纪的旧制度之下实施的战争行为准则，避免拿破仑式的大众征兵带来的新型野蛮。例如在路易十六时代，征雇佣兵需要耗费巨额成本，这样就确保了统治者有强烈的动机去降低士兵的伤病损耗。切尔西（Chelsea）的皇家医院和巴黎的荣军院（Invalides）都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两者都曾经是老兵医院，它们可以证明这种担忧。1789年的民主革命创造了现代的大众征兵制军队，依靠整个国家的人口，拿破仑可以毫不顾惜他的士兵的生命。而且，民主战争省略了当战争还是贵族之间的竞赛时可以看到的那种精致。法兰西国王的军队比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更加尊重医疗队伍的中立性，后者相信战争是民主和反动派之间无限制的竞争，他们带着这样的信仰投入战斗。在19世纪上半叶，战场救护服务大大落后于后勤保障、技术和战术的革新。因此，1690年的徒步士兵比索尔弗利诺时的徒步士兵拥有更大的从战场受伤生还的机会。

人们可能希望民主战争的时代能展示对于普通步兵生命的一种新的担忧，关注他的死亡是否获得荣誉。事实上，在滑铁卢，两边军队的死者被留在战场上任其腐烂；他们的骨骸被英国的承包商收集起来，用船运回英国碾碎，作为骨粉和肥料出售。只是到了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之后，死者应当受到更好对待的思

想才逐渐为大众所接受。这种思想慢慢得到普及，即每一个士兵不管军衔高低，都应当得到道义的认可，单独安葬，拥有自己的墓碑。因此，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意味着一种复杂革命的开始，即对战场上的伤者和死者给予道德考量，这是一种更新旧的军事荣誉传统、适应民主战争新时代的努力，一种将教养和仪式的文雅从贵族的精英战士扩展到普通人——时代的新主人——的努力。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复杂的道德进化是在对战争自身普遍憎恶的背景下出现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杜南特在索尔弗利诺战场的遭遇并没有将他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回忆录》有部分是基于冷静承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还有他对战士文化之英雄主义的赞颂支持，例如，他讲述了一个法国上校的故事，上校在索尔弗利诺重整溃败的军队，他抓住军团的旗帜，高呼："每个热爱这面旗帜的人，跟我来。"但杜南特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骑士精神的时代和机关枪的新时代——一个"我们听够了进步和文明的时代"，他写道，也是一个战争无法避免的时代。"难道防止或者至少缓和战争的残酷不是一件紧急的事情吗？"他问道。

1870年8月，当俾斯麦（Bismarck）率领的普鲁士侵略法国的时候，杜南特的理念第一次面临战争的考验。日内瓦的国际委员会让法国政府注意到现实：看上去几乎没有法国士兵了解公约，他们的战地护士几乎都没有佩戴红十字袖章。那年秋天，普鲁士拒绝按照公约的要求移交已康复的法国士兵，因为法国不能确保他们会否回到前线，此时委员会介入。杜南特建议宣布巴黎为"安全区"，以保护其平民免遭攻击；他的建议无人理睬。巴黎处于围困之下，医院上方飘扬的新的红十字徽章遭到炮击。那个

时候，杜南特的财政处于困境之中，当一桩阿尔及利亚的生意失败后，他觉得应该放弃国际委员会中的委员职位。他隐居在康斯坦斯湖 [7] 畔的一个小镇。“我曾了解贫穷对于其他人意味着什么，”他写道，“但现在它压倒了我。”杜南特默默无闻地生活了23年，直到被一个好奇的记者重新发现。1901年，他被授予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杜南特将奖金捐赠出去，然后在1910年82岁时死去，到最后仍旧满怀希望。

到杜南特死去的时候，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全国性的红十字会团体。美国内战中的一名护士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在1881年建立美国红十字会。在穆斯林世界，这个团体过去到现在都以红新月会（Red Crescent）闻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红十字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组织，并且保持至今。

在国际法领域，到1914年前夕，战争文明化的运动已经扩展成为关于战场新规则的一片浓荫。早在1868年，《圣彼得堡宣言》 [8] 禁止“爆炸性的”和“易燃性物质的”弹丸，宣称“各国在战争中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1907年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以及1906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为陆地和海洋的战争确立了规范，并且为如何对待战俘确定了基本原则。例如，根据这些公约，被审讯的俘虏必须交代的信息只限于他们的姓名、军衔和序列号。当欧洲狂热地重新武装的时候，用《海牙公约》条款的话来说，也同时寻求让战争屈服于“人性的法则和公共良知的要求”。这些公约让欧洲相信，在欧洲步履维艰走向“诸神的黄昏”之时，如果战争来临，它仍会遵守公约的规则和礼仪。甚至有可能，这种幻觉会让战争更有可能诱使人们相信道德法则可以遏制和控制大规模的屠

杀。到1914年，杜南特教化战争的思想成了欧洲文化自尊的核心要素，它自鸣得意地相信，文明已经一劳永逸地征服了野蛮。

有一些批评提出了不同意见。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19世纪20年代——在杜南特的时代之前——的写作拒绝了战争可以被一个国际公约教化的观念。“战争是一种武力行为，”他写道，“要强迫我们的敌人按我们的意愿行事……对于武力有一些自愿接受的、难以察觉、几乎不值一提的国际法和惯例的限制，但它们很少能削弱武力。”但克劳塞维茨理所当然地认为，总体战争也是一个理性的仪式、一个有限制的暴力的运用，是通过其他手段达成政治和外交目的。他也相信暴力应当具有某些道德特性：他的总体战争的观点没有包括对平民不加区别地屠杀或者杀害、虐待俘虏。他认定，这些行为贬低了战士的尊严。

公正地说，杜南特本人从未相信国际公约自身的权威。他从来没有在这一点上有过不同意见，他明白这些公约依赖于更深层的道德来源——战士的荣耀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但他们似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而且他们的共同特征存在于最古老的人类道德制成品中：从基督教的骑士精神到日本的武士道（Bushido）——或曰“武士之道”，即武士的严格道德准则，它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发展起来，到16世纪时候成形。作为伦理体系，它们主要关注建立战斗的规则，界定道德礼节体系，武士们据此判断自身是否值得互相尊重。战士的荣耀意味着一种将战争作为道德剧院的理念，人们在那里公开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带有荣耀的战斗，是无所畏惧、毫不犹豫的战斗，也意味着一种不存在两面性的战斗。准则承认战斗的道德悖论：那些勇敢地彼此战斗的人必定互相尊重；如果他们在对方的手里逝

去，他们将在死后成为兄弟。

战士的荣耀既是归属的准则，也是责任的伦理。不管在哪里实践战争艺术，战士要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正当的和非正当的目标、道德的和非道德的武器、文明的和野蛮的对待俘虏与伤员的方式。这些准则也许常常是在遭到破坏时而不是被遵守时才得到尊重，但没有它们，战争就不是战争，只不过是屠杀而已。

战士的准则是严格排他的，就是说，它们只适用于特定的人们，不适用于其他人。骑士的准则所提供的保护只适用于基督徒，对于异教徒，一个骑士可以毫无限制为所欲为。欧洲自然法传统在16世纪开始形成，当时法官试图找到办法，调和相互竞争、经常处于交战状态的宗教和国家的法律和习俗，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普世的雄心。自然法是《日内瓦公约》的基础，它第一次试着想象规则可以适用于每个人：基督徒和异教徒、世俗人士和信徒、公民和非公民。

《日内瓦公约》既将欧洲的战士荣耀规则化，又努力将其普世化，也就是说，摆脱其排他偏见，对每个人打开保护之门，不管他们是在谁的旗帜下战斗。但法律对战争的支配一直是不确定的。战场上非人道行为的决定性限制存在于战士自己的内心，在于作为一个手持武器的人，他如何理解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用英国战争史学家约翰·基根 [9] 的话说："作为在战场上践行美德的媒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荣耀，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说得更确切些，在产生死亡的战争之地，没有法官，没有警察。"

索尔弗利诺是两军之间的单日竞赛。在凡尔登和索姆，战争

变成了国家之间的大规模对抗。杜南特的理想也许会在弗兰德斯[10] 的原野破灭，一起破灭的还有许多其他19世纪的道德进步思想。但令人惊讶的事实是，现代红十字会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冲突双方的国家红十字会都征召妇女——从俄罗斯沙皇的皇后到英国的家庭主妇——参与战争。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她们包扎绷带，为俘虏准备食品包，管理医院，护理病人。国际红十字会利用瑞士的中立性，让自己成为人道主义事务必不可少的中间人。它将其授权从看护伤员扩展到探望战线两边成千上万的战俘。它在日内瓦的总部成了家庭寄给其被看押儿子的数百万明信片、信件和包裹的交换中心；它的搜寻中心处理了数以百万寻找失踪士兵的请求。即使国际法没有给予该机构任何这样做的明示授权，它还是在平民非战斗人员之间传递信息，帮助被战争隔绝的家庭得以团圆。战争使红十字会得以存在，作为一个机构，其复杂性的核心在于，战争是红十字会仍然存在的原因。

到今天，中立仍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道德政治的核心。它绝不区分好的战争和坏的战争、正义的或非正义的事业，甚或侵略者和无辜者。它的伦理很简单：不管受害者在哪里，找到他们；教育战士，告知他们按照规则打仗。但随着新的人权政治进入这个领域，中立的信条变得更具有争议性。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该宣言的第一章高调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不管“兄弟关系”的意义可能是什么，它不可能包括制造战争。现代的人权传统将战争视作一种道德侵犯，而且，在战争制造者及其受害者之间，人权活动家不可能保持中立。

1949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更新了其章程，制订了四个单

独的条约，被称为《日内瓦公约》。公约没有就人类兄弟关系做出高调宣言。相反，它们承认战争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学仪式，是能够解决某些人类争端的唯一方式。它们只寻求确保战士遵守某些基本人性准则，最主要的准则是放过平民和医护人员。这两种传统——人权和战争法——激励了全世界所有危险地带的人道主义活动家，但它们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实践道德。即使在红十字会内部，这些道德之间的冲突仍未解决。有些人坚持红十字会的终极责任是消灭战争事业，而其他人相信它的存在只是为了驯服野兽。

大多数美国人所了解的红十字会可能只限于其血库和伊丽莎白·多尔 [11] 。美国红十字会是170家国家红十字会之一，它们主要应对本国国内的紧急情况。将战争——以及驯服战争——作为核心事务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它的总部位于一个可以俯瞰日内瓦的山坡上，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个健身中心或者医药公司的总部，如果不是有许多清瘦、专注的年轻男女穿着衬衫和牛仔裤在建筑物之间急匆匆地奔走的话。委员会主要由瑞士的律师、银行家和外交官组成，主席是科内利奥·索马鲁加 [12] ，一位健谈而精明的意大利裔瑞士籍律师。我曾经问索马鲁加，为什么一个国际组织必须由一个瑞士委员会来管理，他顺着我的问题打开了话头：只有一个由单一国籍人士——在这里，是瑞士——组成的管理层，才可能避免经常困扰跨国组织比如联合国的瘫痪停滞问题。这些瑞士的名人们管理的是世界上受到最广泛尊敬的救助组织，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雇佣了900名海外现场工作人员（即其“代表”），以及7000名当地雇员和国家协会的会员，年度预算达到6.2亿美元。这个机构介入的国家多达80个，工作在世界每一个武装冲突的前线，不管那里是像阿富汗一样有媒体存在，还是像斯里兰卡和东帝汶那样没

有媒体存在。

尽管国家的红十字会主要依靠私人捐赠，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绝大多数资金直接来自政府。瑞士政府是第三大捐赠者，欧洲联盟排在第二，最大的政府捐赠者令人惊讶，是美国，它在1995年贡献了大约1.7亿美元。考虑到这个国家欠了联合国16亿美元，而且其政客似乎经常辱骂国际组织，美国的贡献规模足以证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华盛顿的认可程度。在海湾战争中，因其对交换俘虏和释放人质的监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赢得了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少有的尊敬；当这个组织采取激怒美国的立场时——就像它坚持应当允许巴拿马的曼努埃尔·诺列加 [13] 将军作为一名真正的战争俘虏在佛罗里达的监狱里接受探访——它这样做是基于带有其个性的审慎。它坚定的中立性，让它得以在紧张对峙、潜在暴力性的政治僵局中，充当有用的中间角色，比如在日本驻秘鲁利马的大使馆遭到围困的时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拒绝充当调停者，但它促成双方谈判，向游击队员和人质传递所有物件，包括心脏药物、新的连裤袜等。

该组织对战争的态度是非常“瑞士式”的。尽管拥有200多年的和平与中立，但瑞士并不是和平主义文化之产。它的官方信条是武装中立。每个瑞士人都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因此很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知道如何清洁和组装那些在检查站经常挥舞于他们眼前的武器。它最英勇的代表之一马塞尔·朱诺 [14] 曾作为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见证了1935—1936年的阿比西尼亚战争到广岛的行动，他将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没有武器的战士”（Warrior Without Weapons），这并不是偶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文化和它参与并试图控制的战争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奇特的相似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像一支军队，尊重纪律、秩序

和荣誉。当它与战士面对面的时候，取得的成效最佳。

直到1991年，这个组织的战地雇员还不接纳非瑞士人，理由是非瑞士国籍的代表可能危害其公正和中立的声誉。但在过去的6年里，它一直在招募其他国籍的人，将英语增加为其主要工作语言，它正在拉开自己与其瑞士驻地的距离。直到10年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媒体是关闭的。它像瑞士银行一样，习惯于以其审慎和保密为傲。但是，跟瑞士的银行一样，它发现这些美德不断引起怀疑。现在，它在大多数主要的代表处都有媒体官员。

在日内瓦郊外的卡尔蒂尼（Cartigny）举行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培训课程中，新的代表们被传授如何驾车穿过地雷区域，如何依靠嘴皮子通过检查站，如何在遭遇火箭弹袭击时逃离车辆。他们模拟遭到绑架的情况，由戴面具的人实施，受训者说那是真实的用语言和肉体恐吓的攻击。他们被告知绝不要在车辆中携带武器，或者允许任何模样的战士与他们同行。而且要让他们明确知道，他们的安全依赖于红十字袖标的无形的、不确定的道德权威，依赖于他们小心谨慎保持的中立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可能比地球上任何团体的人——包括大多数将军在内——都更了解战争。在战况变得糟糕的时候，其他人道主义机构通常会撤出来，或者为他们的人重新安排地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强调留下的重要性：它所有主要代表团都配备有地堡、沙袋和防弹玻璃。它的代表们见过最原始的现代战争：在卢旺达，他们透过车辆的窗户，看联攻派匪徒在基加利的大街上肆虐，用砍刀将平民砍死。他们也见过最高科技的战争：1991年1月，留在巴格达的瑞士代表见证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令人畏惧的声光表演。

尽管有这些风险，或者可能正是因为这些风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收到的志愿者申请总是超过它能接受的数量。它雇佣拥有国际关系学位、在加入银行之前寻求一两年冒险生涯的年轻毕业生，渴望旅行的前嬉皮士，前出租车司机，厌倦了瑞士诊所里安稳生活方式的医生和护士。所有人都来寻找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事物之一，即做有价值之事情时产生的无形满足感。除了要准备一份“动机说明”之外，未来的代表还需要经历严格的面试。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到这里来是逃避什么？”有时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是瑞士生活令人产生幽闭恐惧的安全性，或者是消磨个性的现代职业生涯。绝大多数代表开始的时候怀着改变世界的幻想；一些人失望了，其他人继续着，从一些小的功绩中获得补偿奖励，比如使被战争分隔的一家人团圆，找到已经认定在行动中被杀或失踪的某个俘虏。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是善行领域最优秀的参与者。它的救助工作人员在1945年最先抵达德国的集中营，它的一名代表是最先到达广岛的中立方观察者。但自从进入电视播放灾难的时代以后——开始于1968年的比夫拉战争——这个领域已经变得挤满了竞争者，其中包括联合国的机构。各国家的红十字会也一直努力进入战争地带有利可图的媒体世界。机构之间对捐赠人、新闻头条和受害者的竞争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毫无规则可言的大集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努力让自己在喧嚣之间发出声音，并保持其原则。它的中立信条受到“无国界医生”这样的组织的质疑，这些组织坚持认为，人道主义干预不可能在塞族军人和穆斯林平民之间、手舞砍刀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受害者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审慎和沉默信条——让它可以在冲突的双方都开展工作——也受到了记者的批评，理由是沉默使其成为战争罪责

的同谋。这些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怀疑，在一个族群现在想要灭绝另一个族群的尖锐冲突中，杜南特的坚持，即所有受害人平等而不管他们的事业正义与否，是否还有意义。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国际法的授权，实施和维护《日内瓦公约》。这赋予它其他人道主义机构所没有的权利：探访和登记所有战俘的权威，监督交换战俘，指导作战人员遵守战争法。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法律框架是否适合后“冷战”时代的混乱状态。新的战士是否仍然依照旧的规则战斗？例如，海湾战争是脑海中有公约附加条件的美国人打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的一个参谋人员甚至宣称沙漠风暴是美国人打过的最合法的战争。精通国际法的律师对军方的攻击目标决策提供建议，让公众意识到这是一场干净的战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部分决策抱有质疑——比如人们没有给巴格达的孩子留下水或食物——但结果仍是严格遵照《日内瓦公约》的。成千上万名战俘被安置在沙特阿拉伯的营地，然后像公约所要求的，他们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护下，可以得到探视和获得释放。

红十字会的问题在于，海湾战争是近期少有的各方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战争行动。破坏公约在所有 的冲突中存在，即使交战双方都是公约签署国。但红十字会的代表们现在面临一种杜南特从未能想象的战争。在当今大约50起冲突中，几乎没有一个遵循国家之间的传统战争模式。它们包括军队叛乱和反对不得人心政权的游击战争、少数民族反对多数民族统治的起义，以及在失败国家肆虐的走狗匪帮。在这些冲突中，平民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在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和斯里兰卡，平民跟任何军事目标一样经常被非正规武装当作攻击目标。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冲突的丛林部队是如此势均力敌，除非他们战斗于其中的社会被摧

毁，战争才会结束；同样的消耗战争现在正在南部苏丹进行。在阿富汗和车臣，战争开始时是真正反抗外部占领的民族起义，却陷入武装组织之间为领土、资源、毒品和武器而进行的邪恶战斗，这些武装组织通常与匪帮没有任何区别。这些战争对大国没什么利益——没有相关领土或者安全利益——因而它们被容许永远持续下去。在中非和东非的衰败国家（扎伊尔、卢旺达、布隆迪），在被毒品战争和游击队叛乱撕裂的拉丁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秘鲁），以及沿着新伊斯兰与苏联帝国战火燃烧的边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正如反暴专家勒鲁瓦·汤普森（Leroy Thompson）所说，“乞丐战争”（ragged war）已经成了一项残酷的日常生活特征。

在索尔弗利诺时代，战争的目的是击败另一方的军事力量。希特勒之后，战争的目的发生了变化，现在它包括了恐吓、驱逐甚至灭绝另一方的平民人口。要让《日内瓦公约》发挥作用，必须要有足够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可以看出作战人员和平民之间、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之间的区别。但如果根本就没有任何训练，会怎么样呢？在利比里亚，内战开始于1989年，叛军起而反抗腐败的政府，内战导致15万人死亡，超过100万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无家可归，这是派系之间为了控制毒品和钻石贸易而争斗的结果。根据某些估计，有多达6000名战士是儿童。娃娃兵对杜南特的荣誉准则一无所知。在利比里亚，娃娃兵在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郊外空旷道路上的检查站抢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运输车队。这些孩子身穿飞行员夹克，脚蹬跑鞋，肩膀上扛着火箭筒或者在屁股上挂着半自动步枪，在尸体之间昂首阔步走来走去。他们戴上用红漆涂抹的面具，取了类似“兰博少校”“双重麻烦上尉”和“蛇将军”之类的绰号。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报告说，在检查站，这些戴面具的人大多数是重度吸

毒者，并且对于他们为谁战斗、为什么战斗没有最起码的认识。他们抢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车辆，毫无内疚之感。

莫桑比克前总统的遗孀格拉萨·马谢尔 [15] 曾经为联合国做过一个关于这类娃娃兵的调查。他们受到招募有很多原因：本土的武士传统过去鄙视在男人的职业中使用儿童，这一传统已走向式微；许多冲突的共同特征是造成大量的孤儿和流离失所的儿童，这使得把他们招募进入私人军队、武装组织和准军事团体很容易。格拉萨·马谢尔也观察到，现代的武器科技也让使用娃娃兵变得更简单：现代自动武器如此轻便，很容易拆分和再次组装，可以把它们交到儿童手中。在伊拉克北部山地，我曾见过成队的库尔德少女游击队员，她们使用比自己还高的发射器发射火箭弹。在当前的至少25起武装冲突中，至少有数十万娃娃兵。在绝大多数传统社会中，荣誉与约束相连，男子气概与纪律有关。在许多阿富汗老战士的男子气概之表现中，或者是在库尔德自由斗士（peshmerga）的尊严之中，有一种战争秩序，它也是男性身份的自豪显现。20世纪90年代战争的极端残酷发掘了另一种男性身份的景象——青春期男性的狂野情欲。青少年提供给军队一种不同种类的战士——对于他们，武器不是一个以庄重的正确态度来尊重和对待的东西，而是具有一种明显的阳具崇拜因素。在波斯尼亚的检查站，青春期的男孩子戴着墨镜，穿着紧身的卡其布战斗服，挥舞AK-47，要穿过检查站等于进入一个中毒的睾丸素地带。战争总是有性的一面——战士的制服并不是优良品行的保证——但当战争是由处于青春期的非正规军人主导的时候，性的野蛮变成了战争的日常武器之一。

在整个20世纪，人道主义法则一直在与军事科技恶魔一般的创新能力、现代战争的千变万化和不断改变的面貌进行一场不公

平的竞赛。《日内瓦公约》1949年修订的时候，第三章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国内战争和其他非国家之间的冲突。第十三章承认，在这些新形式的叛乱中，作战人员并不必然穿战士的制服。在这个战争的新世界中，战士的标志不再是他的军装，而是他的武器。它颁布规则说，任何“公开携带武器”的人，都受到公约的保护。后来，在1977年增加了两个协议，一个授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干预国内解放战争和公民不服从的内部运动，例如巴勒斯坦起义。美国、英国、以色列和其他一些国家尚未批准这些附加协议，他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种内部战争中的出现，是给予叛乱与主权国家一样的正当性。但即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准许接触叛乱团体，它仍面临更严重的问题：找到领头的人。公约所说的异议者军队是处于“负责任的指挥”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战斗是非正规军所为——这是社会崩溃的结果——或者是结合了土匪和军人的武装匪帮所为。当战争从国家手中移交到军阀手中的时候，与这些武装职业联系在一起的礼节限制也土崩瓦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变得更加危险。在卢旺达，单单在1994年，红十字会运动就失去了36名战时行动工作人员，这部分是因为它成了特定的攻击目标。而1996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漫长历史中最糟糕的一年。在布隆迪，6月份有一辆载有3名代表的陆地巡洋舰遭到埋伏攻击，车子坠入一条山谷，所有人都死在里面。在车臣，1996年12月，6名红十字会战地工作人员在格罗兹尼 [16] 郊外一所医院的床上被杀死。几乎每一个跟我交谈过的代表都经历过绝对恐怖的时候。对于阿富汗代表团成员帕斯卡·莫奇利（Pascal Mauchle）而言，这个经历是乘坐一辆没有武装的白色陆地巡洋舰，穿越前线进入一片无人区，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是否有地雷，不知道是否相信上一个检查站的枪手说的前方安全的话，不知道当下一个检查站的持枪者看到他的车子进入视线的时候会不会向他开枪。

新的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安全的恐惧，让这个机构陷入直指其中立性核心的两难困境。如果红十字会的代表随着联合国的车队进行调派，他们会得到联合国盔甲的保护，但机构的中立性声誉将受到损害。即使只是给代表提供防弹衣、凯夫拉头盔（Kevlar helmets）[17] 和防弹的陆地巡洋舰，也时不时引发强烈争议。如果你加固目标，而争议继续，你只会增加它成为目标的可能性。如果你信任武装组织，他们会信任你，但代表们为这种信任付出的代价是生命。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牛津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亚当·罗伯茨 [18] 严厉抨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其荣誉威望的依赖：“关于安全的建设性思想……并没有得到传统的帮助，而是在于其自身值得尊敬的、公正的、中立的人道主义相关行动之中：有时，安全的要求可能必须背离这些原则。”

虽然没有背离其原则，但红十字会已经开始改变安全规程。它现在设置了武装警卫，保护其代表的住所。在医疗站和食品仓库周围也有武装警卫，防止抢劫行为。至于医院、诊所、医疗中心以及其代表团内部等相关场所，武器是禁止携带的，但它们提供外围的安全保卫，这是有武装的。

II

正是在南斯拉夫，现代战争第一次向红十字会显示了其新面目。1991年6月，战争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爆发。冲突爆发五个月后的11月18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尼古拉斯·博辛格（Nicolas　Borsinger）得到消息，多瑙河岸边拥有4万人口的克罗地亚城镇武科瓦尔很快将要陷落。在武科瓦尔被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国防军围困的三个月里，博辛格一直守候在附近的匈牙利边境。这个城镇已经成了克罗地亚的斯大林格勒。博辛格

宣称跟“将军”有约，连蒙带吓通过了塞尔维亚人的封锁线。这个城镇是一幅毁灭的景象：几乎没有一栋房子还立着。喝醉酒的塞尔维亚人在大街上狂欢，向空中开枪，其他人将克罗地亚平民从他们的地堡和地下室中拉出来，把他们圈在一起。“一切都表明一场大屠杀近在眼前。”博辛格回忆道。他获准进入市立医院，当时这里处于一名塞尔维亚上尉的监管之下，里面挤满了受伤的克罗地亚平民。几个小时之后，这名上尉逐渐对博辛格失去了耐心，博辛格决定还是离开为好。同一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订出一个协议，把医院中立化并且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但无线电通讯坏了，协议的内容从未到达武科瓦尔。博辛格第二天返回的时候，被扣押在检查站，在那儿他看到塞尔维亚军人驾着三辆卡车离去。其中有210人，包括病人和医院工作人员，他此后再未见到这些人。一年后，在附近的一个村庄奥夫卡拉（Ovcara）发现了一个集体墓地。墓地被发掘出来的时候，一些受害者还穿着医院的病号服，他们的手臂上还带有静脉注射管。

武科瓦尔的暴行——以及在前南斯拉夫其他地方犯下的许多最为恶劣的战争罪恶——是由塞尔维亚军阀以及与政界、商界和贝尔格莱德黑社会相关的犯罪组织头目控制的武装团体实施的。“白鹰”（White Eagles）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由贝尔格莱德一名亲法西斯的政治家舍舍利公爵（Duke Seselj）[19] 领导；“阿尔坎”[20] 领导的“猛虎”组织是另外一个。阿尔坎是一名贝尔格莱德恶棍，因为谋杀而在瑞典遭到国际通缉令的通缉。他充分利用自己军事组织的声名，建立了一个黑帮帝国，涉及从贝尔格莱德的冰淇淋店到加油站的生意。

1993年穿越南斯拉夫的旅程中，我自己遇到了阿尔坎存在的标志。在1991年从克罗地亚人手里夺取的某个地区的农庄

中，我看到一幅阿尔坎的挂历挂在墙上，它位于这座农庄厨房的一角，仿佛一个保护符。阿尔坎与一队身穿作战服的武装分子摆出姿势，手持一支精致的乌兹（Uzi）手持冲锋枪 [21] 。这些人是非正规的私人军队，由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政权——而克罗地亚也有克罗地亚国防军（HOS），他们自己的类似准军事组织——训练、颁发执照，他们做那些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允许其正规军做的肮脏事情。阿尔坎和舍舍利的人1991年“清洗”了东斯莱文尼亚的克族人村庄；1992年，他们又横扫德里纳河（Drina）东岸，屠杀和虐待穆斯林，将他们赶出位于塞尔维亚边境上的家园。

在1993年的那次旅程中，我参观了武科瓦尔的废墟。舍舍利的白鹰在武科瓦尔唯一还挺立的大型建筑物内建立了指挥部，塞族人18个月之前从克族防御者手中夺取了它。穿着战服、戴黑色绒帽的男子，在一片暴露在风中的广阔空间——从前是市民广场——担任警卫，他们问我为什么围着废墟乱转，有一个当地的记者陪着我。他们是身材高大、长头发、塌鼻子的男人，一半是战士，一半是匪徒。我说当地的记者是我的朋友，帮我做翻译；他们说他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匈牙利人，如果他们抓到他对塞尔维亚说谎话，就会杀了他；我说我不喜欢被威胁；他们说你要小心点。那天晚上，在黑暗废墟的某个地方，警告的子弹射向我们的车辆。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了武科瓦尔。

非正规军与战争本身一样古老，他们的野蛮不言而喻。但在过去的时代，军方有效地收编非正规军，引入军规，将他们的暴力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哥萨克被沙皇的军队驯化；苏格兰高地的部落被击败，然后吸收建立了高地军团。巴尔干战争中的非正规军历史上与众不同，他们没有被国家收编和驯服，反而是国家

——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偷偷摸摸地唆使他们实施暴行，这不是酒醉和纪律败坏的无意识后果，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军事战略。从监狱里招募人，在军方的秘密营地训练，装备国家军械库里最好的武器。非正规军的建立，是给国家提供官方伦理不能去做的种族清洗。战争被特许授权给私人企业，是为了撇开任何与职业军人有关的道德责任。

1992年5月，武科瓦尔陷落六个月之后，战争来到波斯尼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遣了一支医疗救护车队到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由其最具个人魅力的代表之一弗里德里克·莫里斯（Fredric Maurice）带领。他的车队从贝尔格莱德出发，在塞族人首都帕莱（Pale）停留，然后前往萨拉热窝。在这座城市内，车队——包括5辆车，都喷成白色，带有绝不会认错的红十字标志——通过塞族人的检查站，平安无事。在抵达穆斯林的检查站之前，车队遭到无名枪手的袭击。红十字会官方仍然不想正式说出谁为此负责。45分钟的时间，车队陷入困境，遭到火箭弹和轻型武器雨点般的攻击。最终，穆斯林军队出现，指明了安全的道路。莫里斯被从用子弹打成筛网一般的陆地巡洋舰拖出来，送往医院；他在紧急手术之后死去。波斯尼亚离瑞士大约两小时飞行时间。阿尔卑斯的草地和山间溪流让瑞士的代表想起了家。波斯尼亚的领导人反复承诺遵守《日内瓦公约》，它的军队是在欧洲的战争法之下进行训练的。然而，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战争，允许国家拒绝承担《日内瓦公约》的责任。他们也创造了一种战士，这些人在以红十字会车队为目标时毫不犹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日内瓦命令其代表团在5月末撤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五个星期的时间，没人回去。

那五个星期成了战争中最糟糕的时期：穆斯林城镇和清真寺

遭到破坏，墓地遭到挖掘。帕特里克·加塞尔（Patrick　Gasser）是第一批返回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在波斯尼亚北部靠近班加卢卡（Banja　Luka）的曼加察（Manjaca），他遇到一幅他无法描述的景象。在闷热的关牲畜用的波纹金属棚里面，加塞尔发现了大约2300名穆斯林囚犯：非战斗人员，男性平民，憔悴，眼窝深陷，处于惊恐的状态中。这些人如此憔悴瘦弱，以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带了一名经历过索马里饥荒的营养师来监督食物供应项目。加塞尔飞回日内瓦，报告他所看到的东西。一开始，他没法让他的上司明白，集中营在欧洲重现了。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会研究加塞尔的报告，讨论能做些什么。如果他们公开此事，可能会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助受害者的能力有所损害。如果他们保持沉默，就成了种族清洗的同谋，并且可能是走向种族灭绝的同谋。

差不多正是在50年前，红十字会曾面临类似的困境。1942年10月14日，由23名瑞士政治家、律师、医生和商人组成的管理国际红十字会的委员会，开会讨论代表们提出的关于被占领欧洲的平民遭到放逐的证据。就严格的法律意义而言，平民根本不是红十字会的事务：他们在1939年通过的《日内瓦公约》授予红十字代表的权限仅限于探访战俘。但在这些探访的过程中，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听到了放逐的谣言，看到了密闭的车厢前往东方的目的地，他们也曾驱车经过集中营。当他们向德国红十字会的头头恩斯特·格拉维茨 [22] 探询时，他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与日内瓦事务毫无关系。格拉维茨知道这是谁的事务：他不仅是红十字会的头头，也是党卫军（SS）的首席医务官员，是对集中营犯人进行秘密医学实验承担罪责的人之一。

尽管集中营的大门对红十字会关闭，但日内瓦约略知道里面

发生的事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的一名高级官员卡尔·伯克哈德 [23] 在访问柏林的过程中，有一位德国高级官员告诉他，希特勒早在1941年就签署了一个命令，指示到1942年底的时候，“在德国不应再有任何犹太人”。当伯克哈德将此事通报给美国驻日内瓦领事的时候，领事问他，这是否意味着种族灭绝。伯克哈德回答说不可能意味着其他任何事情。

到9月底的时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公开呼吁，尽管其中没有直接提及犹太人或其他任何群体名称，但谴责了放逐和强制劳动对平民人口造成的伤害。进行投票的时候，卡尔·伯克哈德坚决反对这份公开呼吁。他提出，对国际道德的高调公开呼吁不可能对希特勒产生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它们只会损害红十字会已有的探访战俘的通道。瑞士政府的代表害怕一项公开宣言甚至有可能危及瑞士的中立性，也建议要慎重。“这不就是好撒玛利亚人（Samaritan）只做好事却从不打破沉默的情形吗？”公开呼吁从未能发布。红十字会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对于他们知道的东西保持沉默。

当德国人1944年占领匈牙利的时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弗里德里希·波恩（Friedrich Born）成功地保护了部分犹太孤儿和医院，他将这些孤儿安置在红十字会的监管之下，还给数千名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犹太人发放红十字会的证件。但他未能为其中任何一个人搞到出境签证，到1944年下半年的时候，他只能无助地看着5万名布达佩斯犹太人被圈起来，步行前往他们在德国的毁灭之地。

德国和波兰的代表完全被禁止进入集中营。代表们1944年经过毛特豪森 [24] 的时候，看到从焚尸炉飘出的烟雾。其他代表在探访波兰一个集中营里的盟军战俘的时候，听到一个叫奥斯

维辛 [25] 的淋浴室，平民在那里被毒气毒死。但他们没有任何机会证实这些谣言。他们从未看到里面的现实，直到1945年春天德意志帝国崩溃。在那个时候，党卫军医生和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恩斯特·格拉维茨自杀身亡——就在他对犯人实验的全部真相被公之于众之前。

与1942年相比，在1992年，沉默是不可能的：世界媒体已经通过自己的途径找到了班加卢卡附近的集中营。《华盛顿新闻报》（*Newsday* ）的罗伊·盖特曼（Roy Gutman）到过那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是对记者抱有猜疑，但这次它和记者们合作。加塞尔没有透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现的细节，但给《华盛顿新闻报》提供了必要的确认，令其足以写出第一批报道。一个星期后，英国新闻机构独立电视新闻（ITN）在伦敦堵住了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 [26] ，从他那儿获得承诺，允许ITN派遣一支电视小组到集中营去拍摄。当时在场的红十字会代表以怀疑的态度看着获得保证的媒体。当地非常复杂的现实情况，可以在大屠杀的道德质疑中立刻被重新包装。媒体实际去看的营地并不是死亡营，而是平民羁押者的过渡营地，塞族人准备驱逐他们。事实上，当摄影组到达特尔诺波尔耶（Trnopolje）的时候，铁丝网已经被移除。尽管如此，ITN拍摄的被驱逐的穆斯林男人默默无语地站在铁丝网后面的影像片段，成了整个波斯尼亚战争中最令人同情的一幕。对于现场的红十字会代表，在种族清洗和大屠杀之间的道德等式是高度可疑的。情况很快变得清清楚楚，通过邀请世界媒体，塞族人是在嘲讽地利用西方对大屠杀的回忆，诱使西方政府接受穆斯林难民，从而为波斯尼亚中部的种族清洗推波助澜。塞族人甚至成功地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拉进了这个计划：到1992年圣诞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监督关闭了波斯尼亚北部所有集中营，绝大多数犯人被转移到克罗地亚和

欧洲其他地方的过渡营地。

在整个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努力设计一条保护平民，同时不会成为种族清洗的非自愿代理人的道路。1992年10月，科内利奥·索马鲁加建议将一些穆斯林城镇宣布为安全区。1993年4月，这些城镇处于即将被塞族人夺取的边缘，联合国安理会采纳了索马鲁加的建议，那时他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在欧洲的战争法中，安全区是一个传统的主意——杜南特1870年就提出这样一个主意来保护巴黎——但索马鲁加的主意要发挥作用，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穆斯林没有使用安全区作为军事基地；塞族人尊重他们的中立性。两方在谈判中都没有遵守自己的角色。第三个条件是联合国成员国同意派遣35000名士兵保卫这些领地。结果，只派去了7000人。斯雷布雷尼察只有几百人守卫。对无辜平民所做的这些道德承诺，是任何了解情况的人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内都知道无法做到的。

1995年7月，塞尔维亚武装力量打开了进入保护区的道路，解除了在那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武装，围住了城里的所有男人，把妇女、儿童以及当地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驱赶出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个城镇只有波斯尼亚当地的工作人员，其代表驻扎在临近的图兹拉（Tuzla）。现在这些代表无助地看着大约23000名妇女和儿童步履蹒跚穿过交火线，穿过雷区，前往图兹拉的空军基地。在那里，国际社会付出了规模庞大的救助努力照看他们；感谢现场的新闻摄影机，当妇女和儿童们到达的时候，有多达50家人道主义机构聚集起来帮助他们。红十字会挤在人道主义救助的混乱之中，决定聚焦于追踪受难者。它的代表在基地搭了一个帐篷，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斯雷布雷尼察的妇女们到这里排队登记，讲述她们的男人是如何被塞族军人带到枪口之下

的。甚至在那时候，每个人都已明白，失踪的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估计总共大约有7000人——绝大多数已经被处死。一些女性代表不得不承受斯雷布雷尼察妇女的悲痛和愤怒的所有力量。紧张的情绪如此沉重，以至于有一名代表不得不撤回日内瓦。

斯雷布雷尼察的寡妇们被安置在图兹拉郊外的宿舍里，宿舍是用体育馆、学校、从前的女修道院和餐馆改造的。铺位互相紧靠，一个房间40人；床架上悬挂着塑料袋，里面是女人们的财产。这些女人大多数是农村人，戴着头巾，穿宽松的裤子，她们穿着旧绒毡拖鞋，在自己的铺位、卫生间和食堂之间来回穿梭。她们的脚步无精打采，一小时一小时地坐着，盯着窗外。她们在等待，等待正义，等待一个说法，等待时间恢复原样。而她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她们的男人再也不会归来。她们跟你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膝盖，潸然泪下。

她们想要正义，但看护她们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并不负责正义，海牙的战争犯罪法庭才必须给她们正义。然而，尽管拥有最大的、最可靠的关于屠杀受难者的数据库，尽管帮助记者揭露波斯尼亚集中营发生的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然拒绝与法庭分享其信息。它的中立和保密信条禁止它这样做。像彼特·施维策（Beat Schweitzer）和帕特里克·加塞尔这样的代表激烈地争论说，如果塞族政权知晓红十字会把信息转交战争犯罪法庭，他们就永远不会得到去特尔诺波尔耶和曼加察的准许。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希望得到准许探访被那些战争罪犯关押的俘虏和受害人，那么他们就不能协助将这些战争罪犯付诸审判。这种政策也许在道德上看起来是含混暧昧的，但也有一种意外的好处。1995年，克族人和穆斯林联合进攻期间，北约的

F-16在班加卢卡上空徘徊、摧毁塞尔维亚防空设施的时候，红十字会是唯一获准留在塞族人控制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人道主义机构。所有其他机构由于与北约成员国的联系，都必须离开。这意味着，当克族-穆斯林在波斯尼亚进攻以及克族人进攻克拉伊纳塞族、开始产生大量塞族难民的时候，红十字会可以在那儿帮助他们。战争的讽刺之一，是冲突中单次规模最大的种族清洗行动——克罗地亚人清洗克拉伊纳，将60万塞族人驱逐回塞尔维亚——针对的正是要为将这个词引入我们的语言世界承担责任的那个民族。 [2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为难民提供食物和衣服。涉及战争犯罪法庭时，中立性可能是存在争议的，但当做恶者突然变成受害者的时候，它让红十字会可以留在那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南斯拉夫的经历动摇了这个组织的核心。它的代表表现出极度的奉献和勇气，但其中许多人受到一种失败和无力感的压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到武科瓦尔的时间太晚，数以百计的人已经被杀；萨拉热窝遭到攻击的时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才进驻到那里，它发现了集中营，然后无意中成了种族清洗的同谋；它加入了建立安全区的国际闹剧，却只能无助地看着安全区变成一个陷阱，最后成了一个7000人的坟场。在一个非欧洲的城市里看到《日内瓦公约》遭到漠视是一回事，但看到他们的原则在离日内瓦只有几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毫无作用，真的令人震惊。许多代表公开质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迷失了方向，或者质问世界是否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个组织不再有容身之地。

III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其在阿富汗的项目为骄傲，它有骄傲的

原因：它为许多人提供食物，为地雷受害者再造断肢，探访冲突所有各方的俘虏；向谙熟圣战之残酷逻辑的圣战者们传授战争的法则。但在一个自从1979年以来死了100万人的国家，怎么能断定一个项目是成功的？

1996年9月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邀请我参观它在阿富汗的战地设施。在离预计到达日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来自日内瓦的电话，告诉我塔利班已经突破了阿富汗政府在喀布尔东南的防线，联合国和一些救援组织正在疏散城里的无关紧要人员，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如既往，将会留在大部分地区。我是否还想去？

等我到达白沙瓦（Peshawar）的时候，喀布尔已经陷落。我搭乘第二批救援航班进入喀布尔。机场被群山环绕，所有土地都被烧得光秃秃的。跑道边缘落满灰尘的麻布散落在没有机翼的米格（MiG）和机舱内部被掏空的图波列夫（Tupolev）飞机之间，这是俄罗斯人在1992年最后离开时留下的残余。机场是苏联人建造的，现在很少发挥作用：它的窗户都被打碎了，行李厅黑乎乎的，传送带静止不动，落满了灰尘。一群塔利班士兵聚集在跑道边，包裹头巾，穿着肥大的裤子，倚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他们后面有一辆三菱帕杰罗，上面装有火箭弹发射筒。

塔利布（Talib）意为“宗教学生”，这一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源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学校。到1994年，在巴基斯坦武装和训练的塔利班（Taliban）武装开始他们夺取阿富汗的征程，他们实施穆斯林世界最为严格的伊斯兰律法：禁止妇女就业；强迫她们穿包裹全身的长袍，脸蒙上令人憎厌的格子面罩；对通奸者实施石刑；偷窃者砍手。现在，塔利班控制了这个国家的首都以及四分之三的地区。

在旅程中，我见过很多的荒芜：武科瓦尔的废墟；斑斑点点弹孔密布的混凝土鬼城，那是安哥拉的万博。但在常规战争的景象中，喀布尔完全是一种独具一格的荒芜。它是后“冷战”时代冲突的德累斯顿 [28] ：连绵不断的瓦砾和尘土废弃在风中，到处是在被锯成两半的卡车集装箱里挣扎求生衣衫褴褛的家庭。山坡上排列着数千座没有屋顶和窗户的房子，已经被它们从前的住户抛弃。交战双方军队没有放过任何东西：蓝色圆顶的清真寺、尖塔、医院和学校。喀布尔博物馆曾经藏有早期佛教遗迹的收藏品，它露天敞开着，古老的柱子躺在路边，收藏品被洗劫一空。苏联大使馆和苏联文化中心四分五裂，塔利班的炮兵部队在废墟中来回碾过。

1992年，当苏联支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拉 [29] 政权在一次军事政变之后倒台的时候，他和兄弟在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寻求避难，纳吉布拉在那里待了四年。我抵达前三天的晚上，塔利班将他从办事处拖出来，把他阉割，殴打至死，然后把他烂泥一样的尸体挂在一座交通管理员观察塔的柱子上。当我坐车进入市区的时候，只剩下带有斑斑血迹的吊索仍旧飘荡在塔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指挥部设在喀布尔市中心，隐蔽在成堆的沙袋后面。门楣用粗糙削过的木头支撑加固。十几辆白色的陆地巡洋舰停在院子里，每一辆的车门上都贴有“日内瓦国际委员会”的贴花，还有一个打了红叉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标志：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车子里不允许有武器，在营地里禁止使用武器。无武器的当地雇员会对每一个穿过大门进来的人搜身。

我了解到，在塔利班接手之后的日子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开放着与管理城市的叛军指挥官的联络线。“管理城市”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喀布尔没有政府。塔利班领导人征用了

一切可以得到的车辆，匆匆赶往北部，去追赶已经远远深入群山的政府军。留在后面管理城市的部队没有做多少管理工作。许多监狱已经空了，红十字会的救助站挤满了戴着红十字会黄色登记牌、寻求救助的前囚犯。门廊，尤其是靠近卫星电话的地方挤满了记者，他们急切地想报道塔利班的占领，尽管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喀布尔令人苦恼地缺乏可以通过电视播出的近期屠杀迹象。全力应对他们的是一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媒体代表，他之前是南非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他半带嘲讽地说自己现在应召参与“事业”。媒体代表是最近增加的，用来展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战争地区的战地服务。仅仅在那里已经不够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被看到　在那里：否则捐赠国可能会质问为什么它们的慷慨仍然不被看到。

阿富汗代表团的头头是迈克尔·杜卡勒斯（Michael Ducraux）。他的办公室有维梅尔 [30] 和马蒂斯 [31] 的画作复制品，有防碎裂的塑料窗户，有风景，但完全被堆了8英尺（约2.4米）高的沙袋挡住了。杜卡勒斯是一位清瘦、优雅的男士，50岁出头。他看上去沉着冷静，似乎保持着内心里玩世不恭和职责担当的微妙平衡。他对战争的观点自相矛盾。他回忆到，当最近穆斯林武装炮轰城市的时候，整个代表团一整天都躲在救助站下面的掩体里，长时间挤在黑暗、狭窄的掩体里，同时还向下定决心摧毁对方的武装人员提供医疗服务，还向伊斯兰战士进行约束说教，而这些人已将自己的城市变成了废墟。那是“超级难受的”，杜卡勒斯说道。

阿富汗人是在各文明之间——伊朗、印度、中亚——多事的缓冲地带的边界民族，与从亚历山大大帝到英国军队的每一方都战斗过，顽强地保持独立到现在。他们拥有古往今来最令人敬畏

的游击队的声誉。他们的战斗传统——建立在小型的移动单位基础上，避免直接攻击或阵地战，代之以寻求利用山地的关口来埋伏和围困敌军——给他们带来了对抗俄罗斯人的胜利。这是一个尊重贫穷社会生态和多山国家气候的传统：当种下庄稼或将牲口带到牧场的时候开始战争，在收获的时候和雪降下来的时候停止战争。战争是常见的，但也是自我限制的。

然而，一旦军阀们不再联合起来对抗外部敌人，他们就开始转而互相攻击。伊斯兰激进主义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宗教原则没有将各武装组织联合在一起，现在反而令他们互相将枪口指向对方。而俄罗斯人身后留下的武器，以及美国人用船运来的武器——从坦克到毒刺导弹——威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们压倒了战士传统的自我限制生态学。过去阿富汗的战士们不会以清真寺和尖塔、医院和学校为目标。喀布尔是阿富汗战士之荣耀的坟墓。

那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在在这里做什么？杜卡勒斯拥有富于哲学意味的个性。“还有什么比战争更体现人性？”他沉思着说。这个组织在这里不是制止战争，甚至使战争人性化的尝试也证明是苍白无力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减轻损失，”他说，“来给寡妇提供食物，来探访俘虏，来将新的肢体安装在那些被地雷撕开的躯体当中。”战争是荒谬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似乎在说，除了微小功绩的最轻微的道德性，还能有什么？

要遇到塔利班的战士没那么容易。大部分人在喀布尔东北的潘希尔（Pansheer）山谷，那些留下来保卫城市的人对外国人怀有敌意。但在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 Hotel）驻扎有一个分队，60名野蛮人不合时宜地挤进了仍奇迹般矗立在喀布尔一座小山顶上的酒店里，这里可以看到壮观的毁灭景象。坦克和大炮部

署在环绕酒店停车场的松树林里。我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翻译——他谨慎地脱掉了西式的夹克，戴上了一顶小小的白帽（他的胡子已经留了好几天）——一起接近一队塔利班士兵，他们坐在酒店干涸游泳池边的草地上，眺望喀布尔的尘埃阴霾。他们盘腿坐着，大胡子脸包裹在头巾里，正无精打采地玩弄酒店花园里的玫瑰花，或是用手指卷弄他们那忧愁的胡子。他们拥有新手表和新鞋子。

我问他们为了什么而战斗，他们转头看向一个看上去最有教养的人，一个暴躁的神学院学生，留着西式发型和大胡子。“为了伊斯兰教，”他说，“为了制止兄弟之间的战争，还为了拥有一个伊斯兰国家。”

我问，那么为什么兄弟们之间还在互相杀戮？

“先知穆罕默德，愿天保佑他的名字，教导我们，当尘世间还存在堕落时，我们必须战斗以带来和平。”

第二天早晨，塔利班找到了一个腐化的例证，就在洲际酒店的地下室。1400罐啤酒和1800瓶“酒精饮料”被拖出来，堆在停车场。祷告过后，塔利班宗教警察（这支部队的名称意为“厉行良善和禁绝违法部”）的一名头头做了简短讲话，然后仪式性地将瓶子砸碎，将罐子压碎，一批焦灼的西方记者受邀作为观众，他们的沮丧溢于言表。

当我从洲际酒店回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驻地的时候，发现家具被移到了院子中间。裹头巾的阿富汗人正奋力搬着桌子和椅子。两名女性代表—— 一名办公室行政人员和一名护士——已经包裹好头巾，穿上阿富汗裤子。阿富汗妇女——负责维护通讯

系统、保管探访的俘虏档案、跟踪俘虏和失踪者——已经转移到看不见的单独区域，那是在一座沙袋墙的后面。红十字会正在重新安排办公室，以便将妇女们藏起来，让塔利班满意。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阿富汗副代表托马斯·盖特纳（Thomas Gurtner）刚刚与其他救援机构开完会回来，这些机构包括乐施会、无国界医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它们都有雇佣阿富汗妇女从事工作的项目。所有机构都在抗议塔利班禁止妇女工作、强迫她们回到家里、听从丈夫和父亲支配的命令。这些机构一直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加入他们的诉求。盖特纳拒绝了。

我问他，他是否认为妇女权利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

“当然不是。”他迅速回答。

我开始明白，战争法是一回事，人权又是另一回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战争法，它不是一个人权组织。它并不参加反对不公的活动，它的正当性依赖于它与战士和军阀的合作，如果他们坚持妇女远离视线，它没有选择，只能同意。

要接受塔利班对妇女的立场，退一步来说，就是要做一个道德相对主义者。那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如何调和这种相对主义，以及它作为一个普世主义者对作为一种普世主义准则的《日内瓦公约》的捍卫呢？你们如何教导接受了伊斯兰圣战训练的人们以战士的荣耀准则呢？你们如何对可能从未听到过《日内瓦公约》的人们教授战争法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喀布尔负责“宣传”的代表是让-帕斯卡·莫雷特（Jean-Pascal Moret）。42岁的弥勒佛（Jampa）——这

是他的无线电呼号——比绝大多数红十字会的战地工作者年长。他没有大学学位，在执行红十字会任务的间隙，有时候他在日内瓦开出租车，是一名身体力行的藏传佛教徒。

正如弥勒佛观察到的，红十字会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宣传：如果你在喀布尔的街道上驾驶陆地巡洋舰开得太快，会给整个代表团带来傲慢的名声；如果你在检查站跟一个塔利班顶嘴，下一辆通过的陆地巡洋舰可能会遭到攻击。宣传，换个说法，意味着保持红十字会符号的道德流通性。如果说阿富汗项目是一个“成就”，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符号在所有的派别中仍然保有认可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法制止武器从巴基斯坦和俄罗斯流入；它无法强制实施停火或者达成协议。它只能努力让这些派别看到某些基本规则：不要向伤者开枪，不要向救护车开枪，不要瞄准医院，不要攻击平民，不要虐待俘虏。它是在这样一个命题上下注：在全世界，不论战士的文化可能多么不同，它们至少可以在这个基本的最低限度上达成共识。即使如此，这个基本的最低限度不管看上去多么的普遍，还是必须翻译成当地的道德方言。

一代人以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几乎不会对本土文化让步。在我出发来喀布尔之前，资深人士皮埃尔·加斯曼（Pierre Gassmann）——现在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哥伦比亚的首席代表——告诉我，自从他20世纪60年代末加入这个组织以来，宣传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开始，我们把我们的规则扔给他们，”他说，“后来把他们的规则扔给他们。现在，我们不知道把什么规则扔给他们。我们正在尝试更微妙一些的东西。”

在索马里，红十字会管理剧院团体，既为不同的部族表演，也为武装团体表演；代表团雇佣了歌手和诗人——信不信由你

——来录制关于战争法的歌曲，歌曲和戏剧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全球频道播出。在车臣，急救小组分发的肩肘吊带上印有卡通图案，表现的是战士在战场上扶起伤员、护送孤儿到安全地方、把战俘集中起来送他们到羁押地方。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欧洲的战争法传授给伊斯兰激进主义者。

在中世纪的欧洲，敌意战争 （bellum hostile，以限制为特征的战争）和罗马式战争 （bellum Romanum，用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 [32] 的话来说，即“没有限制和禁止，所有被认定为敌人的人，不管有没有携带武器，都会不加区别地屠杀”的战争）之间存在明显差别。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将这个差别带到了对抗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保留对异教徒的极端残暴。伊斯兰教予以同样的回应：圣战正是他们自己的罗马式战争。这些传统的道德排他主义区分有价值和无价值的受害人，与《日内瓦公约》道德普世主义呼吁士兵尊重所有受难者针锋相对。

如果欧洲自己的战士传统一直是高度排他的，怎么能够产生将它们普世化，让它们真正得以普遍的雄心呢？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情感之一——例如，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伏尔泰对西班牙法庭和宗教战争残酷性的严厉斥责之中——是一种对宗教伦理被用来为迫害和屠杀辩护的憎恨。它是对基督教伦理自封为普世主义，却被用来掩盖和证明一种灭绝性的排他主义——直接针对异端、野人和异教徒——的憎恨。在对这种基督教伪善的启蒙愤怒之外，是一种齐心协力的努力，要构建一个基于人性的推定事实——尤其是我们对痛苦和残忍的普遍感知能力——的普世主义伦理。这种从宗教排他主义中拯救伦理并将其奠基于人类本性的观点，正是在欧洲地理大发现和帝国开拓揭示出全世界文化、伦理和信仰的步履蹒跚的多样性的时候出现的，这并不是偶然。红十

字会是启蒙对宗教排他主义之反抗的继承人，是启蒙信仰的传承者，尽管文化可能因其尊重和价值观而有不同，但所有的文化都赋予痛苦和灾难近乎一致的意义。在特殊之下，是普遍；在不同之下，是同一——这是人道主义行动所依赖的现代信仰。

为了在伊斯兰文化中寻找有吸引力的普世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视野超越了圣战的传统。例如，四年前，这个机构在开罗印刷了一本带插图的平装书《伊斯兰—阿拉伯编年史》（*Chronicles of Islamic-Arab History*），将《日内瓦公约》的关键条款和阿拉伯和伊斯兰的部分传统智慧放在一起。这本书引用了一位穆斯林战士哈里发阿里·伊本·艾比·塔利卜（Ali ibn Abi Talib）[33] ——他是穆罕默德的侄子 [34] ——的忠告：

> 如果你战胜了他们，不要在背后捅他们！不要杀害伤员或者暴露他们的私处！不要损坏已死者的躯体！不要撕掉一个面纱！

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我们熟悉的古代农业经济的各种禁令：

> 不得通奸；不得超过界线；不得背叛；不得杀害幼年儿童、老人或者女人；不得砍伐棕榈树；除非为吃饱肚子，不得屠杀羊、牛或者骆驼。

在阿拉伯国家，红十字会的代表反复讲述阿拉伯战士萨拉丁苏丹 [35] 和他优待其俘虏十字军国王狮心理查 [36] 的故事。“因此，”红十字会满怀希望地提出，“伊斯兰律法一千多年以前就已

经领先于国际社会了。”

这里有某种吸引人的东西：一种决心，证明红十字会的原则不只是瑞士加尔文主义的结果，而是人类普遍性的成果，可以在所有的文化中找到。同样，红十字会急切地想证明人类暴力可以因宗教经典的禁令而得到遏制，在这种信仰中也有某种辛酸。喀布尔的办事处将类似的禁令印在日历上。这些日历和它们的人道主义宣传物一起被挂在废墟环绕的建筑物中。

然而，阿富汗需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当宗教给战争裹上神圣目的之时，战争总是最难以遏制的，而塔利班可能是地球上最具攻击性的宗教军事组织。在环绕城市的各个检查站，它的战士正在搜查车上的杂志和磁带。在这样的一个检查站附近，我看到录像带和录音带悬挂在一棵树上，猜想它们是色情物品、摇滚乐或者某种反塔利班的宣传物。但我了解到，战士们的目标实际上广泛得多。他们在搜寻任何描绘人类面貌或任何上帝造物的东西。其他任何一个新取得革命权力的伊斯兰社会都不曾走得如此之远。伊朗的伊玛目嘲讽塔利班，因为后者认为视觉表现存在有害作用的严格信仰。结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日历因为包含战争截肢者在哈扎里沙里夫 [37] 的蓝色清真寺花园里蹒跚而行的图片，以及来自伊斯兰文本中的慈善信息，都将被摒弃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当地派发的连环画也将面临同样命运，那是和BBC的一个广播剧联合制作的，讲述阿富汗的一位虚构英雄阿里·居尔（Ali Gul）的生涯和苦难。如果塔利班领导人为所欲为，这种耐心的甚至可以说微妙的将欧洲的战争法翻译成当地战士文化本土语言的工作，将会化为乌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且，根据塔利班对《古兰经》极为严格的解读，所有针对眼睛的描述——所有的图片、绘画、印刷品、视频和电影——都

受到禁止。塔利班领导人说，只有真主自己可以看透心灵的窗户。

《日内瓦公约》的核心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非法监禁工作，正如它自己所说的：保护战争中的俘虏。负责探访喀布尔战俘的代表是帕斯卡·莫奇利（Pascal Mauchle），他是另一个“新生代”，似乎欢迎记者的外部监督，觉得也许团结他们更好。他邀请我一起去进行一次探访。

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三个组：两个组去最近发现的一个监狱，里面关押着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时俘获的政府方面的军人；第三组到城里，调查由塔利班安全部队实施的现场逮捕的情况。我被分配到去监狱了解详细情况的一个组。

监狱是一座破旧的黄色建筑，草屋顶，有很厚的石墙。塔利班的警卫和一些后备支援的巴基斯坦秘密警察一起，在通向黑暗监牢区长长的入口处巡逻。低矮的牢门是脆弱的木头做的，敷衍了事地锁着。我们像鸭子一样蹲下来，进入一间牢房，约6英尺（约1.8米）宽、10英尺（约3米）长，里面有18个囚犯蹲坐在肮脏的垫子上。墙壁的钉子上挂有几个放东西的塑料袋。牢房里的味道犹如牲畜散发的味道，但还算干净。透过一扇破烂的窗户，可以听到鸡街[38]上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和摊贩叫卖的声音。

俘虏们挤在我们周围，他们年轻得令人不安，我很快就意识到，几乎没有人超过18岁，有几个不会超过14岁。一些人还没有长出胡子。一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盘腿坐在地上，开始给他们登记，为每一个俘虏填制一张个人信息卡，他们的故事开始点点滴滴冒出来。他们绝大多数是塔吉克族（Tajiks）。没有

一个承认自己是正规军战士。他们都声称自己一直是做摊贩、服务员或工厂技工的工作，他们被军事组织吸收，是因为在一个崩溃的经济中，政府的军队可以给他们提供安全、金钱和食物。但他们未能证明自己是坚定的战士。他们被派到喀布尔东南郊区抵抗塔利班的进军，但他们投降了——他们是这么说的——没有放一枪。

当代表记录某个俘虏的详细信息时，我将前一个俘虏的黄色登记卡折好，把它塞到一个塑料夹中，递给他。很多人接过卡的时候微微鞠躬，或者致以阿富汗的礼节：将一只手简短地在胸口按一下。然后，每人都将自己的卡放进棕色坎肩的内袋中。这个仪式中有某种神圣的东西。在全世界的监牢、拘留所、囚笼和集中营里，这样的俘虏一直得到类似的卡片，这是《日内瓦公约》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保护和道德关注的保证。这是他们还没有被遗忘的证据，如果他们失踪，或者下次探访的时候身体上带着伤痕出现，会有某个外国人承担讨要说法的责任。

但黄色卡片似乎远远不够。一旦每个人得到登记、拥有了卡片，俘虏们都奋力往前挤。有一个人急切地对着代表说了很长时间。当他们被塔利班俘虏的时候，得到过赦免的承诺。他们想要红十字会代表承担这个事情。

代表收好文件，他是强硬的：赦免完全与他无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干预“正义的进程”。《日内瓦公约》不是关于正义，而是关于善待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出现，是为了确保人们得到文明的对待，得到食物，在他们被释放的时候，可以得到某些帮助以便返回他们的村子。他们互相交换着失望的表情，当我们鞠躬、穿过牢门离开的时候，很多人发出了嘘声。

在喀布尔的整个期间，人们告诉我，我必须见见阿尔贝托（Alberto）。和许多当地的传奇一样，他似乎没有第二个名字——就是阿尔贝托。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典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但对很多记者而言，他象征着这个组织令人尊敬的一面。阿尔贝托，就是阿尔贝托·开罗（Alberto Cairo），一个高高瘦瘦、热情的意大利人，四十多岁，戴着圆圆的金丝镜架的眼镜，灰色头发，有一种激动人心的气场。他在喀布尔待了七年——比其他任何代表都长，也比几乎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外籍人士都长。当火箭袭击卡特瑟（Kar Teh Seh）医院的时候，他在那里，走廊里挤满了伤员和垂死者；当盲人难民营遭到爆炸破坏的时候，当圣战者威胁马拉斯通（Marastoon）的精神病避难所的时候，当瘟疫爆发的时候，当一名红十字会护士在城市西南被杀的时候，当红十字会的救护车成为攻击目标的时候，他都在那里。他来的时候是一个理疗师，现在管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大的假肢项目：瓦兹尔·阿克巴·可汗（Wazir Akbar Khan）医院的整形外科中心。这是一个兴旺繁荣的工作场所，其雇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自身是阿富汗战争的受伤者。他带我参观的时候，亲吻了一个正在车床上测试断肢平衡性的断肢者；轻抚另一个人的头发，这个人正在为新近断肢者的断肢打石膏；还开玩笑地敲了敲第三个人——正在将新的铸件扔到炉子里——的胳膊。我了解到，人造假肢的脚后跟是从旧的苏联轮胎切割下来的。阿尔贝托说："质量非常好。"

阿尔贝托的病人有许多是阿富汗青少年，他们从来没有上过学校，进入武装组织是因为军阀是唯一能付给他们工资的人。现在他们在花园外面的小路上脚步沉重地走来走去，带着陌生、新奇的假肢跳跃着穿过沙砾地。除了战士以外，还有其他甚至更严酷的战争受害者。在一个房间里，医院的一个小床上有一小堆灰

蓝色的破布。阿尔贝托拨开遮盖，露出来的是一个满脸尘土的孩子，大约7岁，她在睡梦中颤抖着。“小儿麻痹症。”他说。免疫计划遭受挫折，小儿麻痹症随战争一起重返阿富汗。

阿尔贝托要我和他的首席管理员摩诃布·阿里（Moheb Ali）见面，他是一名26岁的半身瘫痪者，坐在轮椅上，穿着天蓝色的睡衣。两年前，一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整形中心处于电视山（Television Hill）的政府军炮火和以附近街道杂居区为巢穴的武装组织的交叉火力之下。外籍工作人员撤了出去，但摩诃布自愿与无线电台和少数警卫一起留在中心，尽其所能保护人造假肢的制造机器，防止这个驻地被摧毁。战斗持续了12天，阿尔贝托和城里的代表团只能通过电台和摩诃布联系，由于炮火声太吵，他常常无法分辨出摩诃布在说什么。后来的一个晚上，政府军冲进了驻地，抓住了摩诃布和他的警卫，认为他们隶属于正在交战的武装组织。摩诃布干巴巴地回忆说：“我正在诵祷词。”

阿尔贝托不顾一切劝说一位政府部长命令他的军队释放摩诃布。第二天晚上，武装组织占领了整形中心。在地堡里，摩诃布无助地坐在轮椅上，听到他们穿过大门。“我开始再次祈祷，诵读《古兰经》。”他说。这一次，政府的大炮将武装组织赶出了驻地。

两个星期之后，阿尔贝托终于说服双方都同意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车队将摩诃布和他的警卫撤退出来。食物已经完全断绝，摩诃布的电台的电池几乎耗尽。摩诃布做好了准备。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中，他和警卫成功地为绝大多数设备的撤离做好了准备。摩诃布几乎是只手拯救了中心。

对于我来说，这是阿富汗的故事。被武器和意识形态驱动而

疯狂的双方为了拥有一个红十字会的整形中心，会毫不犹豫地互相杀戮。对于阿尔贝托，这个故事解释了他为什么留在喀布尔。当摩诃布说完他的传奇故事的时候，阿尔贝托看着我，做了一个意大利式的耸肩表情：“我怎么能离开？”我们花了一两分钟才发现摩诃布对他的故事有什么感受。他转身回到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前，处理他的购买订单，然后说了句什么，声音如此地轻，我只好请他重复：“红十字会让我变得勇敢。”

IV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日内瓦总部，我和吉尔伯特·霍勒夫（Gilbert Holleufer）分享了自己对这个组织的疑惑：我尊敬它的代表们的勇气，以及我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无力感。他是一名媒体咨询师，正在为这个组织的下一个世纪准备资讯。

我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政治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我而言，这个组织传递的讯息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甚至是令人怀疑的。霍勒夫是一位清醒、深刻的瑞士裔德国人，拥有一双悲悯的大眼睛，他理解这种矛盾之处。“在现代伦理中，战争是非人道的，因而不能为它辩护，”他说，“驱动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是生态学、人权和人道主义伦理。战争越来越受到现代文化的禁止。”当然，人权是一个晚近的概念。战争法在它之前很多个世纪就已经出现：那种战士应该对其受害者表示同情的理念，要比那种所有人类都拥有权利和应当得到平等对待的思想古老得多。杜南特的天赋在于他承认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仪式，可以被驯服，但永远不会被根除。而霍勒夫认为，这种仪式，是与我们时代的和平主义者的基本假设——我们的人权文化——相矛盾的。霍勒夫补充说，在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自身，有许多代表发

现很难容忍这个组织对战争的认可。“很多红十字会的人认为我们必须为和平而战。”他说。他们相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站在“公正、安全和自由”的一方。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核心组成部分，他说，可能不赞成这些价值，而是有更为黑暗的想法：认为即使在死亡、恐惧和屠杀之中，尊严也仍然可以在战士们中间普遍存在。

霍勒夫打开一个视频，他希望能在前南斯拉夫的电视台播放它。视频中有一段战士们在废墟的街道上巡逻的黑白连续影像，伴有一段简短的画外音：“一名战士不会杀害俘虏，一名战士不会杀害儿童，一名战士不会强奸女人。”画外音为它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而努力。它没有呼吁任何同情或文雅的想法，它没有呼吁将所有人都看作人类，它只是要求参战者做一名战士。

有多少人会对战士寄予我们的道德信任？毕竟，凯利中尉[39] 是一支有着重要荣誉传统的军队的军官，但这个传统并没有能够制止美莱（My Lai）的屠杀。然而，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这段时间让我反思我们的反战文化。红十字会明白战士的荣耀是一个微茫的希望，但它可能是将战争与野蛮区分开来的全部希望所在。由此推论的一个希望是人们可以被训练为了荣耀而战。军队训练人们杀戮，但它们也教导人们克制和纪律，这两者将侵略导向仪式。战争只能通过道德规则来救赎，而且，像霍勒夫所说：“红十字会是规则的守护者。”

他承认，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战士不再按照规则参与游戏。现代科技不断拉大战士和他的猎物之间的距离，包括道德上的距离和地理上的距离。什么样的荣誉才能将操控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技术人员和1000英里以外的巴格达平民联系在一起？在问题的另一端，小型武器的全球市场正在破坏现代国家对暴力手段

的垄断。在世界上各个解体的国家里，废弃的武器潮水般地涌入，其中大多数是旧的卡拉什尼科夫，在市场里花一条面包的成本就可以买到。有了这种便宜的武器，国家要遏制暴力变得不可能。战争的历史一直是国家将暴力从社会中充公，授权给一个特定的战士阶层。但如果国家失去对战争的控制，就像在世界众多的红色叛乱和反抗区域发生的情况那样——如果战争成了私人武装、匪帮和准军事组织的保留曲目——那么在战斗和野蛮之间的区分将会消失。

索尔弗利诺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从日出到日落；安哥拉内战持续了30年；阿富汗的战争从1979年持续至今；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屠戮场开始于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独立，此后不断循环发生。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战争看到了自身的生态学限制。当耗尽了士兵、供给和食物之后，冲突毁灭了自身。现在，战争已经能够超越当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也有可能，外界的人道主义干预不是帮助遏制了战争，而是促进了战争的持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英勇献身的代表们奋力让人们能够挺过难以忍受的境地，但萦绕在每个代表脑后的，是让伤员康复、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安抚寡妇和孤儿的可能性，它们只是延长了冲突，给予一个社会持续摧毁自身的能力。外部干预也鼓励了在参战者之中形成一种新的道德借口。参战者请求外部干预制止冲突，是后现代战争的一个普遍特征；而不可避免的，当外部干预无法制止敌意的时候，参战者以此作为托辞继续作战。由此出现了一种依赖综合症——在巴尔干地区最多见到——干预者的失败被当作继续发动战争的道德借口；同时，人道主义干预自身也开始依赖于它们试图遏制或制止的敌意。20世纪末期乞丐战争或地方战争的出现，有助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迅速

扩张其预算和人员。坦白地说，战争一直是有利于生意的，糟糕的是，似乎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轻易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干预延长了它本应制止的痛苦。

像阿富汗这种地方的荒芜，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一个更大的失败——大国未能首先制止战争——寻找到了托辞：人道主义干预。只要红十字会在那里，外部世界至少可以说“我们”正在给残疾儿童安装假肢。红十字会的代表们自己也痛苦地意识到，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善行促使外界的各大国为广泛的不介入找到了辩护理由。

不仅在阿富汗，而且在绝大多数后“冷战”世界的危险地带，更大的问题是国家的解体。这是一个人道主义行动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国家的垄断被打破，其军火库遭到洗劫，武器变得廉价和易于使用，一个孩子在一刻钟的时间里就能学会如何杀戮，武器像病毒一样传遍贫穷国家的整个社会组织。

如果在扎伊尔、卢旺达、阿富汗、前南斯拉夫待上一段时间，你会面对一个结论。不仅仅是发展，不仅仅是救助或紧急救护，不仅仅是维和部队，这些社会需要国家，需要拥有训练有素的领导人指挥之下的职业军队。武装组织必须被解除武装；武器必须被没收；已经扩展深入社会肌体，到达最年轻、最脆弱成员——孩子——的暴力，必须被国家征收和驯服。在西方的反战传统中，我们如此习惯于将国家看作暴力的主体，看作战争的煽动者，以至于忘记了国家在我们自身发展中的其他历史角色：从军事组织和中世纪的武士贵族随从的手中收缴武器，确保单一权威对武力之合法使用的垄断。不管听上去是多么矛盾，民族国家的警察和军队仍然是我们所发展的唯一可行的、具有控制和疏导大规模人类暴力的组织。问题由此变成这样：我们这些足够幸运、

居住在相对安全地带的人们，如何帮助那些居住在危险地带的人们，重新建立有活力的国家？我们要如何干预才能不让事情变得更坏，不是引入新的武器或更微妙地帮助人们延长冲突？尽管很难承认，但有时候，最佳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做：让一个胜利者出现，然后帮助他建立、延续秩序所依赖的暴力垄断。在另一种情况下，当对立各方势均力敌、难以产生一个决定性的结果时，我们也许应当干预，站在看上去最正义的一方，帮助它巩固权力。当然，这种办法承认，战争可能是民族冲突不可避免的解决之道。它意味着接受战争之罪恶的道德影响，力图运用其火焰，焚烧出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尽管大多数红十字会的代表会拒绝这种说法，他们也已经用战争的罪恶制造了自己的影响。往回追溯到杜南特，历史似乎告诉我们，战争经历了其各种形式的野蛮愤怒而生存下来，梦想一个超越战争的世界或者想象一个战士的艺术不再需要的世界，是无意义的，而道德理性之路存在于微妙、甚至是偶然之中：接受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有时甚至是可欲性（desirability），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试着根据某种荣耀的准则引导它。让战士遵守荣耀准则的努力并不是无用的或者无望的任务。规则在被破坏时得到的荣耀超过它被遵守之时，这样的规则仍然值得拥有。存在人性的和非人性的战士，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必要的杀戮形式和令我们全都为之蒙羞的杀戮形式。红十字会已经成了这些区分的守护者，他们是人性和非人性之间的哨兵。

我们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人性和非人性之间的哨兵。他们的工作从未如此危险。1996年12月17日，在车臣格罗兹尼附近诺维耶阿塔吉（Novye Atagi）的一家医院，6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睡在床上。这家医院为冲突中所有的各方提供医疗服务，得到

了俄罗斯和车臣官方当局的认可。医院驻地由不携带武器的车臣人员担任警卫。一群人数未知、戴面罩的武装人员翻过驻地的围墙。他们都带着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他们将一名警卫打晕，朝医院的计算机开了几枪，然后前往红十字会工作人正在睡觉的宿舍区。杀手们受到一名车臣护士的询问，她被告知不要挡路。6个睡梦中的人——来自加拿大、挪威、新西兰、荷兰和西班牙——在如此近的距离被射杀，以至于他们身上还发现有火药灼痕。一名起来碰到袭击者的男性代表肩膀中了一枪，他装死逃过一劫。一名车臣警卫——他违规随身携带了武器——朝天开了一枪示警，这些武装分子逃之夭夭：他们翻过围墙，消失了。没有一个车臣或俄罗斯的团体、派别声称对这桩罪恶负责。这次事件是历史上对红十字会人员最严重的屠杀。在紧急召开的代表团首领讨论安全的会议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识到，新的、半刑事化的战争形式令代表们暴露在他们此前从未见过的危险之中。但他们并不认为必须派武装警卫进入医院内部，或者是为他们的车队提供武装护送。他们重申他们对于红十字标志正当性的信仰。

当载有6名工作人员——南茜·马洛伊（Nancy Malloy）、雪莉·泰耶（Sheryl Thayer）、汉斯·艾尔克包特（Hans Elkerbout）、英格伯格·弗斯（Ingeborg Foss）、甘希尔德·米克巴斯特（Gunnhild Myklebust）和费尔南达·卡拉多（Fernanda Calado）——遗体的棺材出现在日内瓦机场的跑道上的时候，在袭击中幸存的挪威红十字会医生托拜厄斯·布雷德兰（Tobias Bredland）立正站立，他的冬衣翻领上佩戴着红十字徽章。在红十字会总部，院子里的旗帜降半旗，在用来举行圣诞晚会的一间屋子里，工作人员和代表们聚集在一起，聆听科内利奥·索马鲁加讲话。他从一名战地代表手中接过一份文稿，把它读了出来：

我们所有的努力是基于这样的信仰：即使在战争最邪恶的时刻，人类仍然保留有基本的、最低限度的人性。这样的事件，令保持这一信仰变得极为艰难。但没有它，我们将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区分人类与野兽，而那是我们决不会承认的 。

索马鲁加在最后一句话做了特别强调。屋子里肃静了一会儿。然后，红十字会的男人和女人们沉默无语地走出去，走进寒冷的冬夜之中。

---

[1] 让-亨利·杜南特（Jean-Henri Dunant，1828—1910），瑞士商人，国际红十字会创办人。

[2]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士，现代护理学先驱，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的声誉首先来自她所带领的护士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改善伤员卫生和医护条件做出的贡献。

[3] 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1822—1896），美国最早的摄影师之一，以其对美国内战的摄影而闻名。

[4] 加特林机枪（Gatling gun），美国人理查德·加特林发明的多管机关枪，转速可达每分钟600转，1862年取得专利，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首次使用。

[5] 索姆（Somme），法国北部省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一次会战索姆河战役发生于此。

[6] 凡尔登（Verdun），法国东北部城市，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耗时最长的一场战役，亦成为“一战”的顶峰和转折点。

[7] 康斯坦斯湖（Lake Constance），德语称为博登湖，位于瑞士、德国、奥地利三国交界处，湖区风景优美，是德语区最大的湖泊。

[8] 《圣彼得堡宣言》（Declaration of St.Petersburg），全称为《关于在战争中放弃使用某些爆炸性弹丸的宣言》，1868年签于俄罗斯圣彼得堡。

[9] 约翰·基根（John Keegan，1934—2012），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

[10] 弗兰德斯（Flanders），西欧历史上的地理名称，现分属法国、比利

时、荷兰等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主战场之一。

[11] 伊丽莎白·多尔（Elizabeth Dole，1936— ），美国政治家，1991—1999年担任美国红十字会主席。

[12] 科内利奥·索马鲁加（Cornelio Sommaruga，1932— ），1987—1999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13] 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1934—2017），巴拿马军人、独裁者，1983—1989年统治巴拿马。1989年美军出兵巴拿马，将诺列加带回美国接受审判。

[14] 马塞尔·朱诺（Marcel Junod，1904—1961），瑞士医生，曾在意阿战争中的阿比西尼亚、内战期间的西班牙、“二战”期间的日本担任红十字会代表，1947年出版《没有武器的战士》，后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15] 格拉萨·马谢尔（Graça Machel，1945— ），莫桑比克已故前总统萨莫拉·马谢尔的妻子，1998年与纳尔逊·曼德拉结婚，成为曼德拉第三任妻子。

[16] 格罗兹尼（Grozny），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

[17] 凯夫拉为美国杜邦公司研制的一种防弹材料，广泛应用于头盔和防弹衣。

[18] 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1940— ），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国际关系学荣誉教授。

[19] 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Seselj，1954— ），塞尔维亚政客，曾任塞尔维亚副总理。南斯拉夫解体后，组建塞尔维亚激进党，自封为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公爵，被控战争期间犯有反人类罪与违反战争规则罪。

[20] “阿尔坎”（Arkan），即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Željko Ražnatović，1952—2000），塞尔维亚军阀。

[21] 以色列生产的一种轻型冲锋枪，由乌兹·盖尔（Uziel Gal）于1948年设计。

[22] 恩斯特·格拉维茨（Ernst Grawitz，1899—1945），德国医生，纳粹德国党卫军副总指挥，曾任德国红十字会主席。

[23] 卡尔·伯克哈德（Carl Burckhardt，1891—1974），瑞士外交官、历史学家，1945—1948年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24] 毛特豪森（Mauthausen），位于奥地利东北部，1938—1945年，纳粹在此设立集中营，是纳粹在欧洲最大的集中营之一。

[25] 奥斯维辛（Auschwitz），位于波兰克拉科夫附近，1940年纳粹在这里设置集中营，对犹太人系统地实施大屠杀，约有110万人在这里被杀，绝大部分为犹太人。

[26] 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194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治人物，曾任波黑境内塞族共和国总统，后被控在波黑内战中犯有种族灭绝和战争罪，长期隐姓埋名逃亡，2008年被捕，引渡至海牙受审，2016年3月被海牙国际法庭以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判处40年监禁。

[27] 作者认为，“清洗”一词用于种族屠杀是始于塞尔维亚，参见作者另一部著作《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成起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28] 德累斯顿（Dresden），德国城市，“二战”后期受盟军大规模轰炸，城市遭到严重毁坏。

[29] 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uhammad Najibullah，1947—1996），阿富汗政治人物，1982—1992年担任苏联傀儡政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最高领导人，1992年倒台，1996年被塔利班残酷处死。

[30] 约翰内斯·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荷兰画家。

[31]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野兽派创始人。

[32] 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1922—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战争史。

[33] 阿里·伊本·艾比·塔利卜（Ali ibn Abi Talib，约600—661），伊斯兰教历史上第四任哈里发，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伊斯兰教法、宗教思想权威，对后世影响深远。

[34] 原文如此。

[35] 萨拉丁（Saladin，约1138—1193），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苏丹，他建立了一个包括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地在内的疆域广大的阿拉伯帝国，因其带领阿拉伯人抗击十字军东侵而被视为民族英雄。

[36] 狮心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1157—1199），即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以骁勇善战著称，曾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率军取得对萨拉丁的重大胜利。狮心理查并未做过萨拉丁的俘虏，但萨拉丁1187年攻占耶路撒冷之后，将十字军战俘释放，并允许城内大量基督徒可以保留财产回国，其仁慈慷慨被赋予人道主义色彩。

[37] 原文为Hazar el Sharif，疑为马扎里沙里夫（Mazar el Sharif），为阿富汗第三大城市，其蓝色清真寺为阿富汗最大的清真寺。

[38] 鸡街（Chicken Street），喀布尔街道名，原为出售活鸡的市场，现已成为工艺品一条街。

[39] 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1948— ），前美军军官，越南战争中，在美莱村率部队屠杀数百名村民。凯利是唯一为此屠杀负责的人，1971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后被尼克松总统特赦。

5
我们想要从中醒来的噩梦

I

19、20世纪之交，都柏林的一所学校里，一位不抱希望的老师正在一堂历史课上痛苦挣扎，年轻的学生们跟他一样烦躁。他问学生，皮洛士 [1] 赢得他的皮洛士式胜利 [2] 的古代战役名称是什么，当学生们咕哝着说出错误答案的时候，他的思维开始漫游。为什么历史如此压抑？这不过就是一堂没用的、愚蠢的课吗？这就是他的学生们坐在课桌前打着哈欠、无意识地了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保持沉默、等待下课铃响将他们送回到操场的喧嚣之中、送回到青春还没有被收走的各种可能性之中？

在他的学生潮水一般涌入操场之后，年轻的老师去校长的办公室领取每周的薪水。19、20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在大英帝国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迪西（Deasy）先生的办公室装饰有帝国和英联邦的象征：一幅威尔士亲王艾尔伯特·爱德华 [3] 的锡版画，还有著名的英国赛马运动印刷品。迪西先生用这幅画显示新教徒在大英帝国的权势，折磨那位年轻的老师，说他是芬尼亚分子（the Fenian） [4] ，年轻老师咬着牙不说话，脑海里浮现出新教徒征服爱尔兰时发生的野蛮行径：在穿越爱尔兰的血腥之路上，克伦威尔身后留下的天主教徒尸体。这是最令人窒息的历史：浸满血腥的传说让一切仁慈变得不可能。迪西先生吟诵所有反对自治和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坚定口号：“阿尔斯特（Ulster）要战斗，阿尔斯特是正义的。” [5] 但还有更为黑暗的传说束缚着迪西先生这样的人。他向年轻老师摇动手指：“记住我的话……

英国已经掌握在犹太人手里了。他们占去了所有高层的位置，金融界、报界……古老的英国快要灭亡了。”把付给年轻老师的钱币放进他手里后，迪西先生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问，为什么是爱尔兰“拥有唯一从不迫害犹太人的国家的荣耀”？“为什么，先生？”“因为它从不让他们入境。”

迪西先生告诉他，犹太人已经得罪光了，而历史——正趋向于显示上帝的荣光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对此，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 [6] ——的著名回答是：“历史是一场我正努力从中醒来的噩梦。”

历史不只是反犹主义的俗套和爱尔兰新教徒优势地位难以捉摸的帝国式傲慢——就像沉淀在19、20世纪之交的老师大脑污物池中的东西。还有一个想要逃离的“芬尼亚党人”版本。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7] 中，民族主义者达文（Davin）告诉迪达勒斯：“试着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在内心深处，你是一个爱尔兰人。”当迪达勒斯宣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以及这一生活塑造了我。我要表现我自己的本性”时，达文反驳说：“一个人首先属于国家。首先是爱尔兰人，斯蒂夫，然后你才是一位诗人或神秘主义者。”对此，迪达勒斯冷淡愤怒地回答：“爱尔兰是一头正在啃食幼仔的老母猪。”

乔伊斯的写作是对某些版本的历史的长久谴责，这些版本将历史视作遗产，视作根基和归属，视作安抚、庇护和家园。他的写作是反抗的宣言：只有当你逃离了家园，只有当你挣扎着从先辈的梦中醒来，你才能成为你自己。对于艺术家乔伊斯，醒来意味着找到一种他自己的语言，对抗强迫性的语言传统和遗产。正

如他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所说：“当一个人的灵魂降生在这个国家，就会有许多张网抛向它，不让它飞翔。你们跟我说国籍、语言、宗教，我要奋力飞越那些网。”乔伊斯确实飞越了它们：飞到了的里雅斯特 [8] 、巴黎和苏黎世，从《画像》到《尤利西斯》，再到《芬尼根守灵夜》 [9] ，从家园到流亡，从他出生的语言到一种他自己的独特语言。艺术家的醒来，是创造某种既超越个人历史也超越国家历史的东西。醒来是回归你自己，是强行将部族让你成为的人与你的真正自我进行分割。

噩梦的可怕之处，是它不容许在做梦的人和梦之间留有距离。如果历史是一场噩梦，那是因为过去并没有过去。作为一位艺术家和一名爱尔兰人，乔伊斯只能了解同一时刻的爱尔兰，而不是线性的爱尔兰。在《画像》的一开始，针对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帕内尔（Parnell） [10] 的身败名裂和死亡的意义，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丹特（Dante）得意扬扬地尖叫：“我们把他摁死了。”而凯西先生（Mr. Casey）为他死去的国王悲痛哭泣，斯蒂芬的父亲眼睛里溢满了泪水，显然，帕内尔的死根本不是发生在过去。在争吵中，过去、现在和将来被时间的愤怒火焰点燃了，共同闪耀出亮光。

那么，从历史中醒来，就是恢复过去和现在之间被省去的距离，区分清楚神话和真实。神话是一种拒绝仅仅成为过去的过去。神话是一种由欲望而非真实形塑的叙事，它不是依靠我们竭尽所能建立的事实，而是根据我们对安抚和慰藉的渴望所形成的叙事。觉醒，意味着弃绝这种渴望，重新获得在真实和我们希望的真实之间的全部尖锐分隔。

相信我们创造的自我身份与我们所继承的身份同样重要，相信归属是选择性的而非群体性的、自觉的而非无意识的、可选择

的而非被决定的，这些已经成了一般共识。即使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环境，但我们可以在自己命运的这些因素之中，选择由哪一种来界定我们的传承。像乔伊斯这样的艺术家已经帮助我们将自己的身份视作艺术创造物，促使我们相信自己也可以自由飞越国籍、宗教和语言的罗网。

事实在于，这些罗网确实束缚着我们大多数人。我们中几乎没有人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艺术家。这并没有让我们成为囚犯：我们可以觉醒，我们没有必要在神话和集体幻觉的微光中耗费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成为自觉的。我们中几乎没有人像乔伊斯那样完整地创造出我们所站立的想象之地，或创造出我们所说的语言。尽管乔伊斯费尽心力赢得的自由也许不是我们大多数人可以企及，但他觉醒的比喻指向一种对我们所有人都开放的可能性。在觉醒之中，我们回归自身，我们重新获得了在自己被要求成为的人和我们所是之人之间被省掉的距离。这个被省掉的距离是反讽的空间。我们醒来：我们将自己的噩梦告诉他人，它对我们的控制开始打破，它看上去开始变得滑稽或者至少不那么悲惨。我们在讲述的时候也许仍会战栗，但至少我们可以分享它。我们可以振作起来。这一天可以开始了。

II

一个民族与其过去达成和解，意味着什么？民族像个人一样拥有灵魂吗？一个民族的往事是否会让个人难受，就像我们知道被压抑的记忆有时会让个人难受一样？反过来，通过用事实取代神话、用真相替代谎言，一个民族或其互相争斗的各部分是否能像个人一样与其过去和解？民族是否可以从他们过去的噩梦中“觉醒”，就像乔伊斯相信一个人可以做到的那样？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yschoanalysis* ）中曾经评论说，有这样的认知和那样的认知，它们并不相同，这令他的观众感到迷惑。我们认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但事实上我们完全不了解它们。我们可以在头脑中知道一件事情，但不需要从我们的内心了解它；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头脑中原谅人们，不用在我们的内心中原谅他们。知识可以是建议性的或处置性的，因为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前者要变成后者，就必须被"修通"（worked through）。这里涉及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在头脑中所了解的东西，必须变成我们在内心中了解的东西；在我们内心中所了解的东西，必须变成在头脑中所了解的东西。被创伤所分割的灵魂和躯体必须得到重新连接。这个过程注定是缓慢而痛苦的。在修通死亡和失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经常抗拒我们的头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或者我们的思想拒绝相信身体已经感知到的东西。管理创伤，不仅是把身体和思维连接在一起，互相接受；它也让身体和思维都重新意识到，过去已经过去。这意味着将过去移出现在，以线性的顺序取代心理上的同时性，逐渐放松对悲痛和愤怒——权力令我们陷入一个无休无尽之昨天的悲痛和愤怒——的抑制。

我们能否说民族"修通"了一场内战或者一场暴行，就像我们说个人"修通"了一桩满是创伤的记忆或事件？按照我们的隐喻所指向的路径，问题绝非轻易可以回答。我们试图赋予民族以意识、身份和记忆，仿佛它们是个体一般。赋予某个人以单一身份已经问题多多，我们的内在生命就像战场，支配它的是不稳定的休战；民族的身份还会因地域、民族、阶级和教育而另外产生裂缝。这不仅在于民族的这些因素每一个都会做出自己带有创伤的计算，而且在于真实的计算是原子化的，它存在于组成一个民族的数以百万的个体的意识之中。然而，民族拥有公共生活和公共

议程，而原子化的个体计算决定性地受到这种对过去的公共讨论的影响，民族的领导人、作家和记者让这种讨论成为可能。

关于民族如何“修通”其过去的问题是难以捉摸的，但这些问题也是迫切的、具有实践意义的。1993年，在经历了75年的内战、分裂、恐怖威胁和民族间的暴力之后，南北爱尔兰的人们再一次开始尝试从他们乔伊斯式的噩梦中醒来，开启治愈与和解的联合进程。在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南非，一个真相委员会开始全国巡回之旅，试图提供一个论坛，让受害者和做恶者能够就种族隔离达成协议。如果做恶者选择真相，也即，如果他们揭露自己的所知所为，他们可以避免审判，获得赦免和宽恕。海牙的战争犯罪法庭既对巴尔干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进行起诉，又将它们公之于众，以帮助达成最终的和解。在非洲城市阿鲁沙[11]，一个类似法庭的机构正在搜集卢旺达大屠杀的证据，相信在这里，真相、正义与和解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有例子——爱尔兰、南非、巴尔干和卢旺达——所使用的言辞是高尚的，但基本原则并不清晰。正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有问题的目标，但正义的达成是否有助于和解绝不是显而易见的。类似地，真相是好事，但正如一则非洲谚语提醒我们的，真相不总是说出来好。

用图图大主教[12]的话说，他的真相委员会的目标是“促进民族统一与和解”，以及“治愈受到创伤的、分裂的、伤痕累累、极度分化的人民”。值得赞赏的目标，但它们是内在一致的吗？看看他做出的假设：一个民族拥有一种灵魂而非多种灵魂，真相是确定的而非有争议的，以及当真相众所周知的时候，它就具有治愈与和解的力量。与那些关于人类本性信仰的文章不同，这些假设并没有太多认识论的意义：真相只有一个，如果我们了解

它，就会让我们得到自由。

我们其他人在旁观，为之欢呼，但也许忘了问我们的社会能够承受多少真相。所有的民族都依赖于遗忘：铸造统一和身份的神话，让一个社会遗忘它原初的罪恶、它隐藏的创伤和分裂、它无法治愈的伤口。我们只能承受这么多的真相，这对于民族是事实，对于个人也是如此。但如果太多的真相是存在分歧的，问题就变成，有多少真相便已足够？

对真相治愈作用的确信激励了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的委员会，它们试图查明，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军政府统治时期，成千上万“失踪”的无辜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委员会相信，如果知道了真相，一个因为恐怖和谎言而受到折磨的民族会恢复健康。但结果是模糊不明的。正如彼拉多 [13] 在洗手的时候问的，什么是真相呢？最起码，它应包括事实真相和道德真相，包括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叙事和试着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谁为之负责的叙事。南美的真相委员会更多是在前一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不是在促进后者方面。他们确实成功地还原了关于数千人失踪、虐待和死亡的事实，这一信息给予亲属和朋友以安慰，让他们知晓失踪者的命运遭遇。很多人说人类对真相的需求在于，受害者的家属更愿意要事实而不是虚伪无知的安慰。还有很多人谈论宽宏大量的道德吸引力，这些人中有许多应当更喜欢真相而不是复仇甚或正义。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便已足够；为了将过去抛到身后，他们不需要惩罚罪人。

但真相委员会也负责生产公共真相，重塑公共议程。他们的职责是产生一种道德叙事：解释邪恶政权的源起，对于在这些政府统治之下犯的罪行分摊道德责任。而在这一点上，他们远未成功。

军队、安全和警察体制都准备让失踪的个人案件浮出水面。他们可以承担事实真相，但道德真相不可能。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对针对安全部门的个人的指控，反对为他们的罪行承担责任。承认伦理责任将会弱化他们作为机构的权力。这就是阿根廷和智利军方提出的抗辩，其民选政府建立了真相委员会，它们必须在正义和自身的生存之间做出选择，在指控罪犯和冒军事政变的风险之间，或在放任不管与让一种民主传统落地生根之间做出选择。

拉丁美洲真相委员会的成效，让许多相信分享真相是社会和解之前提条件的人们感到幻灭。军队和警察体制在真相委员会的讯问之下得以存活，他们的合法性受到了损害，但权力未受影响。我们所涉及的这些国家利用真相委员会树立了一种幻觉：他们已经将过去抛在了身后。事实上，真相委员会恰恰为那种虚伪的与过去——预先被创造出来的——和解提供了便利。德国作家、思想家西奥多·阿多诺 [14] 观察到这种虚伪的和解在其战后的祖国起到的作用：

> “与过去妥协”并不意味着严肃的、对过去的解决，不是通过一种清晰的、有意识的行动来打破魔咒。毋宁说，它希望翻过这一页，并且，如果可能，从记忆中将其清除。犯下不义行为的一方典型地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对于那些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恰当的做法是原谅和遗忘每一件事情。

虚伪和解的危险是足够现实的，但拉丁美洲真相委员会带来的幻灭也许过头了。改革军队和警察体系绝不是真相委员会的职责，顶多跟图图大主教在南非做同样事情的职责（或其权限范围）相当。真相就是真相，它不是社会或体制改革。

如果真相是由一个官方委员会来公布的话，它也不太可能被那些反对它的主导者的人们所接受。警察和军队有他们自己的真相，而他们得以实施其控制，正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真相并不全是谎言。他们相信自己正在镇压恐怖分子或叛乱威胁，仅仅因为一个真相委员会揭露这种威胁没有根基，就期待他们否认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人们，尤其是身穿制服的人们，并不会简单地、轻易地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前提妥协。如果曾经有过忏悔的话，也仅是个别人。真相委员会所能做到的全部只是减少广为流传、未经挑战的谎言的数量。例如，现在在阿根廷，不可能有人断言军方没有将半死不活的受害人从直升机上扔进海里。在智利，不再容许公开宣称皮诺切特 [15] 政权没有“处置”数以千计完全无辜的人们。真相委员会能够也确实改变了公共议程和公共记忆的框架，但不能因为他们未能改变行为和体制，就断定他们失败了。那不是他们的作用所在。

真相委员会可以筛选出事实，引导社会争论通向自身应往的方向。但它无法令这些争论得出结论。有时候，对真相委员会的批评听上去好像过去是一部神圣的文本，比如美国宪法或权利法案被盗走和毁损之后，还可以修复、放回到某个庄严的公共圆形大厅明亮的玻璃柜中。但过去绝不是像一件文献一样可以拥有固定的、不变的身份。过去是一场争论，真相委员会的作用跟诚实的历史学家一样，只是净化争论，缩小可容许的谎言的范围。

在和解背后已经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共识的国家，真相委员会成功的机会最大，比如说南非。这种共识也许与认为需要清理过去余毒的道德一致关系不大，更多是一种大多数人认可的、审慎的道德计算，即相信司法惩罚有将社会撕裂甚至引发内战或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相似乎是一个比正

义更不易引起分裂的目标，图图的真相委员会即使强制揭露痛苦的真相，但也增强了创造出这个委员会的政治共识。

另一方面，在南斯拉夫这样的地方，各方派别多年来对其他派别实施谋杀、折磨，儿女的罪恶常常建立在父亲和祖父的罪恶的基础上；真相、和解和正义的前景黯淡得多。但不管这些境况多么黯淡，都有指导意义，因为它们说明，在真相与和解的关系之中，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和解取决于共享的真相，这一理念假定关于过去的共享真相是可能的。但真相与身份有关，你相信什么是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相信自己是谁；而你相信自己是谁，主要是按照你相信自己不是谁来界定。要做一个塞族人，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成为克族人或穆斯林。如果塞族人是相信克族人有一种法西斯主义历史趋势导向的人，克族人是相信塞族人有一种大屠杀倾向的人，那么，对双方的群体而言，抛弃这些神话，就是放弃了一个界定他们自己身份的要素。战争创造了恐惧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无法想象能与他们的敌人分享共同的真相以及一种共同的责任，除非他们不那么害怕，除非对他者的恐惧不再是他们认定自己为谁的一个组成部分。

显然，身份远远不是他者的对立形象所组成的。许多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反对这些对立的顽固形象和席卷他们国家的民族主义狂热。他们许多人奋力在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之间保持一个道德空间。然而即使这些人——人权活动家和反战运动人士——也无法想象，有一天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会认可一个共同版本的冲突历史。共享一个事件的编年史也许会取得一致，尽管这也会充满争议，但很难想象三方能在如何分摊责任上取得共识。对人们至关紧要的真相不是事实或记录上的真相，

而是道德或解释性真相。这将始终是巴尔干地区争议的主题之一。

认为“不偏不倚的”或者“客观的”局外人会成功地获得冲突各方都认可的对灾难的道德和解释叙述，这不过是一种幻觉。身为一个局外人的事实恰恰是损害而非增强了其合法性，因为始终存在一种只有局内人才会理解的真相。或者，如果没有真相——因为事实就是事实——那么这些事实的道德意义只有一个局内人才能够完全理解。真相如果要为人所相信，必须由那些亲身承受其后果的人来书写，但战争的真相如此令人痛苦，那些互相争斗的人们罕有机会坐下来共同书写它。

共享真相的问题也是它无法存在于“中间”，它不是两种互相竞争的版本的妥协。对萨拉热窝的围困，要么是一项有意为之的努力，试图威吓和颠覆一个合法当选的、国际认可的政府，要么是一次先发制人的正当防卫，是本土的塞尔维亚人对抗穆斯林的攻击。它不可能两者都是。试图写下一个对双方所坚持的真相都“公正”的真相，这种外界的努力不太可能让任何一方信服。

承认共同的苦难也不等于共享真相。对双方而言，互相承认对方的苦难相对容易，对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要达成共同认知则困难得多，事实上一般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侵略者有他们对抗真相的辩护理由，受害者也会有。我们可以理解，相信自己是侵略受害者的民族，不会相信自己同样犯下了暴行。无辜和受害的神话是直面责任的一个强有力的障碍，正如另一方所犯暴行的神话一样。

1992年夏天，波斯尼亚福卡 [16] 山村地区的塞族人告诉英国记者，他们民族的武装组织是被迫才清洗这个地区的穆斯林

的，因为众所周知，穆斯林把塞尔维亚人的孩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们的尸体顺着河流漂过塞尔维亚人的定居点。由于这样的传说不需要事实的证实就可以自我复制，它们不太可能因为相反的系列事实而被驱散。这种特殊暴行的传说过去曾经在中世纪时代的犹太人中间传播。关于犹太人的传说不是真实的，关于穆斯林的传说也不真实，但那不是关键。传说更多是在内心世界通过狂热、欲望和期望来维系的，它的消解，不是发生在外部世界的事实与其抵触的时候，而是在内心对它的需求消失的时候。

谈论传说，不是争论某一方可能比另一方受害程度更深，也不是质疑暴行是否发生。其虚幻之处在于，暴行被用来揭示民族——按照犯下罪行的民族的名义——的基本身份，即内心固有的屠杀倾向。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认为易受这种倾向的影响，即使罪行只是由特定的个体犯下的。集体罪恶的理念依赖于一种民族心理或民族身份。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想象类似于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幻觉，即认为个体的身份是或应当是被包含在其民族身份之中。

民族战争将个人和集体身份焊接在一起。侵略者和受害者都只能作为个体为他们的行为和遭受的苦难承担相应责任，他们需要集体身份为其提供赦免。

民族战争将侵略者从他们自身行为的真相中分离出来。如果种族清洗是成功的，它移除了受害者，留下胜利者占有一片对真相毫无争议的领地。毕竟，有谁被留下来提醒胜利者，其他人曾经拥有这些房子、在这里祈祷、在这片土地上埋葬他们的先人？种族清洗根除了过去被非难的真相。在此之后，过去可以被重写，受害者存在的任何记录都不允许留下来。胜利将胜利者封闭在一种遗忘之中，消除的正是罪恶、羞耻或懊悔的可能性，而这

些情绪对于任何坚持面对真相的人是必需的。

在民族战争的受害者一方，他们失去了可以证实他们所坚持真相的场所。他们再也不能指出他们的家园、他们的祈祷场所、他们的墓地，因为这些地方已经消失了。在流亡之中，受害者群体自身变得越来越不真实。受害者不断地呼吁真相，但关注的人越来越少，而那些告诉他们面对现实的局外人，实际上是在让他们承认失败的事实。民族战争的受害者也可能拒绝这一现实，他们更喜欢聚集在难民营和定居点，而不是分散开来作为个体去独自面对世界。拒绝失败的现实是他们尊严的一个条件，但也令他们陷入一种集体受害者的群体身份。

因而，民族战争的双方最终都陷入集体身份之中：胜利者陷入健忘症，受害者拒绝承认失败。这些命运塑造了记忆和个性，从而在长期来看，让任何一方与真相都不可能和解。

III

如果共享真相的前景糟糕，和解的前景会更加糟糕，我们对正义的前景还能说什么呢？在关于真相与和解的对话中，正义的关键作用是将个体和民族分解，将关于民族的虚构拆解，这种虚构认为民族要像个体一样为以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战争犯罪审判最重要的任务是将罪恶“个体化”，将其从集体承担转到由个体承担。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 [17] 谈到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时说：“对于我们德国人，这一审判的好处在于，它清楚地区分领导人的特定罪行，而不是谴责德国人这个集体。”

因而，与纽伦堡类似，海牙审判不是要将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或克罗地亚人放在被告席上，而是要将罪犯从民族中分离出

来，将罪行置于其应放之处，放在个人的肩膀上。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审判无法将所有的罪行分摊在所有应当负责的人身上。首先，小人物有为重要人物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的倾向，从而强化了正义不是确定性的而是随意的印象。其次，这类审判并不必然能打破个体和民族之间的联系。纽伦堡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世界仍然认为德国人承担集体责任，而事实上，德国人自己也承认这种责任。德国小说家马丁·瓦尔泽 [18] 曾经写道，当一名法国人和一名美国人观看奥斯维辛图片的时候，“他不会想：我们人类啊！他会想：那些德国佬！我们会想：那些纳粹！我个人不能……”在战争犯罪审判中，说得最多的可能是，通过将罪恶感转化为羞耻感，这些审判有助于卸下民族的集体罪恶感重负。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在德国发生了。不过单单有纽伦堡是无法做到的。正如伊恩·布鲁玛 [19] 在《罪孽的代价》（*The Wages of Guilt*）中指出的，许多德国人轻蔑地将纽伦堡审判视作“胜利者的正义”。20世纪60年代严厉的德国战争犯罪审判而非纽伦堡，迫使德国人面对他们自己在大屠杀中的角色。在德国法庭中达成的裁决得益于一种纽伦堡进程从未享有过的正当性。

与过去和解也不只是消化和吸收国内战犯审判所传递的信息。德国学校的孩子去集中营参观的次数超过100万次，出版物超过千种，播出了好莱坞的系列电视纪录片《大屠杀》 [20] ——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跨代的清算，它仍在进行之中。

但只有当公共资助的议程容许，这样一种清算才得以可能。联邦德国（西德）做出了集体努力去面对纳粹的历史；作为一个被西方大国占领的被征服国家，它别无选择。在教室里，在其公共纪念的话语之中，以及在领导人时不时就赔偿和赎罪的公开表态中，联邦德国直面其过去，并且通过这样做，逐渐让过去成为

过去。

另一方面，在民主德国（东德），公共议程将纳粹过去的负担转嫁给西部，转嫁给“反法西斯墙”的另一边；官方的说法是，东部是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继承人，因而免除了为希特勒的罪行承担的全部责任。即使这种说法必然与普通人关于自己参与希特勒相关运动的记忆相矛盾，与这种说法同流合污却并无不便，对于他们之中的战争罪犯，有组织的公共失忆症提供了避难所和辩解理由。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公共谎言变成了当政者的一项负担：官方失忆只不过是证实了对当政者的怀疑，即它整体上依赖于历史谎言而生存。当公共舞台上充斥着谎言，私人记忆仍将停留于暗处。确实，在民主德国，公共遗忘造成了私人失忆。但放在长时期来看，如果一个政权坚持说着关于过去的谎言，其当下的合法性无可避免地会受到损害。民主德国崩溃得极其迅速，说明公共谎言和私人真相之间的鸿沟已经产生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墙上的裂缝带倒了脆弱的整体结构。既然斯塔西 [21] 不再存在，民主德国必须清醒地面对现实：他们和父辈们共同合谋的不是一个独裁而是两个独裁，红色和黑色，从1933年直到1989年。

这种对暴行的双重继承解释了为什么东德从1989年以来经历了最令人震颤的全面努力，清理自己的过去：国家审判，真相委员会，解雇秘密警察的情报线人，彻底公开秘密警察的档案。这一过程的彻底性令人印象深刻，但其速度颇为可疑。推动这一进程的联邦德国精英似乎相信，单单一次激烈的行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排除过去所有的余毒。做恶者及其同谋在这个过于迅速的原谅和遗忘中勾结在一起，而许多受害者也确实只是想安然度过余生。资本主义市场爆发性地侵入民主德国，让遗忘变得更容

易。为了沐浴在资本主义消费的安抚之下，每个人都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们情有可原地相信资本主义也将清洗掉过去。但过去很有韧劲，这只是因为它握有如此众多通往现在的线索。不管一个民族在什么时候问自己：我们是谁？——正如民主德国必须问自己一样——他们必须拷问自己：我们是怎样让自己屈服的？民族身份在当下的所有问题没有一个可以通过逃避面对过去令人痛苦的秘密而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只要这些问题仍然具有活力——它们在德国永远具有活力——遗忘就不可能存在。

IV

德国之所以遭遇其红色和黑色的过去，是战败所迫。盟军坚持纽伦堡审判；联邦德国人坚持在民主德国去斯塔西化（de-Stasification）。但如果国家不是因为战败而被迫去面对受到谴责的过去，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有真相委员会、没有战争犯罪的审判，会发生什么？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并没有——也不可能——面对过去的罪恶。在这里，官方的文化积极压制集体的过去，因为公开承认政权的罪恶将会损害这个政权仍然保持的、来自其成功击败纳粹的合法性。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神话——反法西斯主义的伟大胜利——让这个国家要面对盛行于其中的某种主义变得极为困难。那些为了保留记忆而战斗的人们——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萨哈罗夫（Sakhrov）、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和阿赫玛托娃（Akhmatova）——受到迫害，不只是他们要求自由表达的权利，而是因为他们说出了真相。如果这个真相公之于众，将会连苏联的合法性一起被摧毁。这个真相对数百万人是明了的；因为数百万人必须遭受恐吓或者屠杀，来维持这个谎言。早在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Khrushchev）年代的人们刚刚勉强幸存下来，他们开始承认，维持一个历史谎言

的成本正变得难以容忍。而当新的一代——在戈尔巴乔夫（Gorbachev）之下掌权的一代——逐渐在等级体制中往上爬升时，他们随身带来的是他们的父母悄悄告诉他们的恐怖和屠杀故事。在他们被迫讲述的公共谎言与他们私人的和家族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记忆之间，矛盾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最后通过侵蚀戈尔巴乔夫的精英对权力的掌控而终结。在一个同时面对经济停滞和社会腐化的精英的灵魂中，这一矛盾深深地播下了对于这个社会道德合法性怀疑的种子。与在东德一样，只有随着体系自身的崩塌，与过去和解才有可能，而且，就像东德一样，崩溃来得非常突然，仿佛大厦根基的裂缝已经潜行了很久，只是在等待历史事件给予其最后一击。

但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精英成员的权力欲受到他们自身家庭记忆和虚假公共神话之间矛盾的侵蚀，在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党员身上并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们没有感受到这类矛盾或怀疑。俄罗斯社会整体上从未去斯大林化。从来没有真相委员会或者公开审判，对过去罪恶的承认，比如像1956年赫鲁晓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只有在事实已经过于公开、无法再否认的时候才发生。事实上，施虐者被授以功勋、得到晋升、光荣退休。对卢比扬卡 [22] 的刽子手或是马加丹 [23] 集中营的指挥官从未有过任何审判。应归功于索尔仁尼琴，关于过去还留下了一些真相，但那里从未有过正义，因而在两种俄罗斯人——与当局顺从相处的大多数人和被送进古拉格的少数人（数量以百万计）——之间从未有过和解。真相的觉醒仍然限于老戈尔巴乔夫精英中的一小拨自由主义少数派、大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和职业阶层。对于无数的前党员，没有什么需要忏悔，没有什么需要道歉。既然缺乏正义，那么，真相甚至也遭到拒绝。

当代俄罗斯的例子表明，拥有关于过去的部分 真相是不够的。不管索尔仁尼琴和维塔利·什泰林斯基 [24] ——后者迫使克格勃不再保守对俄罗斯作家迫害的秘密——等人的英勇研究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仅仅揭露真相——未受惩罚的罪行的记录——并不能像司法审判那样迫使一个抗拒的社会接受结论和判决。

正义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审判能够得到什么结果最好还是谨慎看待。法律程序的伟大作用在于通过证据规则树立无可辩驳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拒绝接受难民的国家，战争犯罪审判更为困难。但如果说审判有助于推进揭露真相，它们能否促进和解进程仍是存疑的。正义的净化作用倾向于只在受害者一方发挥作用。当受害者觉得正义已经伸张的时候，做恶者所归属的共同体也许会觉得他们被当成替罪羔羊。我们能说的全部不过是，任战争犯罪不受惩罚将会更加糟糕：免受惩罚的循环不被打破，社会就仍将自由地沉迷于他们逃避的幻梦之中。

V

对于正义或真相确实具有治愈作用与否，是可以开放质疑的。我们有一种信条，认知——尤其是自我认知——是心理健康的条件之一，但包括我们的社会在内，每一个社会都只不过是依靠对其自身过去真相的最具危险性的掌控，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每个社会都会对其英雄进行大量心理投资。要揭露它的英雄是战争犯罪的祸首，等于承认他们捍卫的共同身份给自己蒙上了暗影。为什么一个社会通常不情愿接受自身站上战争犯罪法庭，为什么它如此强烈地“拒绝接受”对于外部的每一个人都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战争犯罪挑战集体的道德身份，当这些身份遭受威

胁的时候，拒绝确实是在捍卫他所珍视的一切。

有很多种形式的拒绝，范围从直截了当拒绝，到承认事实是事实，再到复杂的相对化策略。在这之中，一个人承认事实，但争辩说敌人同样有罪，或者说提出谴责的一方也应受到谴责，或者说这种“过分行为”令人遗憾但在战争时期是必需的。相对化是接受它的两面性：承认事实，同时拒绝为它们承担完全责任。

拒绝历史真相是群体身份的功能之一：国家和民族将它们自身的意识编织进顽强拒绝修正的自恋式叙事之中。类似地，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顽固对抗真相的历史神话。在南斯拉夫，铁托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这样的神话：他的游击队领导了反抗德国和意大利占领的民族抵抗运动。事实上，游击队员与南斯拉夫同胞之间的战斗，跟他们与占领者的战斗同样激烈，他们甚至与德国人做交易，加强自己对抗国内对手的力量。由于这些事实对于那一代的南斯拉夫人来说是普通常识，兄弟友谊和团结的神话需要不断地宣传强化。

兄弟友谊和团结的神话也许指向的是一种超越民族仇恨的未来，但由于对过去撒谎，当局令它原本想让南斯拉夫人克服的仇恨得以永久持续。通过压制1941—1945年间种族屠杀的真实历史，铁托主义政权会令这样的屠杀不可避免地卷土重来。历史真相的各个版本相互竞争：塞族人、克族人和穆斯林，没有和平的、民主的方法让这些真相在铁托的南斯拉夫被其他人听到，只有带到战场上，去让他们的真相能够取得优势。五年的战争，结果是一种共同的真相现在已无从谈起。所有继承了铁托南斯拉夫的主要共和国都以种族分离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共同的真相——从而一条从真相通往和解的道路——遭到禁止，不只是因为仇恨，也是因为体制太不民主，以至于对抗性的真相难以得

到传播。

坚持说真相的信息不可能渗透到继承南斯拉夫的各个威权国家，这并不是要贬低战争犯罪审判过程。要点不过在于，人们必须让正义与和解分离。正义就是正义，在可能的严格限度以内，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正义也将服务于真相的利益。但真相并不必须要被相信，相信真相可以起到治愈作用，是对真相寄予了过多信任。

当谈到治愈的时候，人们面对着最为神秘的一个过程。看上去很明显，在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和南非，过去继续产生痛苦，因为它并未 过去。这些地方不是活在连续的时间秩序之中，而是在一个同时性的场景之中，过去和现在是连续的、凝结在一起的，由幻想、扭曲、神话和谎言构成的混合体。巴尔干战争中的记者经常发现，当人们告诉他们暴行故事的时候，他们无法确定这些故事是发生在昨天，还是在1941年或1841年或1441年。对于传说的讲述者，昨天和今天没有分别。同时性似乎是复仇的梦幻时刻。罪行从未可能被安全地固定在历史的过去之中；它们仍被锁定于永恒的现在，因为血腥而大声呐喊。乔伊斯明白，在爱尔兰，过去的身躯从未安全地死亡和埋葬；它们总是在生者的睡梦中穿行，寻求报复。

确切地说，民族无法像个人对个人和解那样与其他民族和解。尽管如此，个人可以从公共的赎罪仪式中得到帮助，去治愈与和解。当智利总统艾尔文 [25] 出现在电视上，向皮诺切特镇压罪行的受害者道歉时，他创造了一种公共氛围，让上千件私人忏悔和道歉的行动得以可能。他也具有象征意义地清除了智利作为国家与这些罪行的联系。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 [26] 在死亡集中营下跪的姿态，通过从官方将德国国家与悔罪进程联系在一

起，拥有类似的排解效果。

这些行动与应当承担巴尔干战争责任的政治人物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如果不是写一些琐碎地纠结于亚塞诺瓦茨屠杀的数字的书，而是去到克罗地亚最臭名昭著的死亡集中营现场，公开为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对塞族人、吉卜赛人、犹太人和共产党游击队犯下的罪行道歉，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也许可以将克罗地亚的现在从乌斯塔沙的过去中解放出来，他也有可能大大增加作为少数派的塞尔维亚人接受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之合法性的机会。如果他直面过去，1991年的战争也许可以避免。当然，他的选择不是这样：尽管自己曾经身为一名反乌斯塔沙的游击队战士，但在争取独立的运动中，他依赖于来自前乌斯塔沙流亡成员的财政和道德的支持。而且，对于图季曼和他的大多数选民，要承认克罗地亚对战争罪行承担历史责任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独立驱动力背后居于核心的基本原则，正是克罗地亚人是侵略扩张的塞族人的历史受害者。尽管如此，仍然正确的是，图季曼这一方的赎罪姿态可以清理其屠杀的遗产，可以邀请克罗地亚人放弃自怜自哀，不再歇斯底里地拒绝过去，而是代之以基于良知的讨论，它也会向塞族人释放出一个绝不会被误解的友爱信息，可以防止他们屈服于同样的自怜和歇斯底里，屈服于塞尔维亚神话——塞族人只有在一个大塞尔维亚之内才能得到安全。社会和民族不像个人，但他们的领导人可以对那个神秘的进程有巨大的影响力：个人与他们社会的过去痛苦地达成和解。领导人给予他们的社会以许可，说出不可说的话，思考不可思考的思想，将和解的姿态提升到人们作为个体无法想象的高度。在巴尔干地区，没有一个领导人拥有勇气驱除他的民族的统治幻想。

和解道路上的主要道德障碍是复仇的渴望。现在，复仇普遍

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没有价值的情感，而因为有这种看法，其深层次的对人们的道德坚持很少被体会到。但从道德上考量，复仇是一种对死者保持忠诚的渴望，是通过接过死者所留下的事业，赋予他们的记忆以荣誉。复仇在代与代之间保持忠诚，它所引起的暴力是一种对共同体死者致敬的礼仪形式，其合法性存在于此。和解之所以困难，正是因为它必须与这种强有力的替代性的暴力道德竞争。政治恐怖是坚韧的，因为它是一种民族实践，它是一种对死者的祭奠，一种可怕而绝对的敬意表达。

当民族或共同体之间互相争斗的时候，他们通常是继续着开始于此前世代人们的冲突。在征服、穿越爱尔兰的过程中，克伦威尔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在德罗赫达 [27] 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这些是继续横亘在20世纪90年代的爱尔兰和解之路上的障碍。1992年的波斯尼亚某一方实施的大屠杀，常常是为了报复1942年的某次屠杀。这种跨越代际的报复循环没有逻辑终点。从任何有意义的含义而言，子辈无法替父辈还债或是为他们父辈的不幸报仇。但正是跨代际复仇的不可能性，令共同体陷入强制性的重复之中。就像是在噩梦之中，每一方都将自己抛入一个锁闭的过去之门，徒劳地努力打开它。

只有双方都在罪恶和责任之间做出基本区分的时候，跨代际冲突才可能平静下来。子辈不必为他们父辈的罪行承担罪责，只有当他们不再感到有责任为父辈们所遭受的不幸复仇的时候，和平才会来临。他们确实仍有讲述关于他们的真相的责任。他们必须承认所发生的事情，但他们也必须自己承诺不会冤冤相报。

和解意味着破除跨代际复仇的循环。它意味着去除邪恶的、堕落的暴力循环，代之以互相增加尊重的、向上的良性循环。只有将复仇等同于一种对于死者表示尊重的形式的时候，和解才能

够制止复仇的循环。在内战的余波之中，每一方的根本要求，是“另一方”敢于面对它引起的死亡。拒绝承认这些死亡的现实性，是将它们看作一场梦，看作一场噩梦。没有道歉，不承认发生的一切，过去就无法回归其本来的位置。幽灵将继续在城垛上潜行。 [28] 当然，道歉必须反映出对另一方悲痛的认可，某种比英国人海恩斯 [29] 在《尤利西斯》中善意却随意的评论——“我猜想，一个爱尔兰人必定是那样想的。我们觉得，在英格兰我们并没有不公平地对待你们。应当责备的似乎是历史。”——更为深刻的东西。

乔伊斯的伟大反抗就是反对将历史视作命运的理念，这一理念迫使每一代人重新制造出前一代人的仇恨，因为对死者的忠诚——赋予他们的记忆以荣誉——似乎要求拿起武器为他们复仇。和解建立在互相道歉的基础上，承认历史不是命运，承认历史不应受到谴责；也不应谴责文化或传统——历史必须谴责的只是特定个体。和解的最后一个维度（即哀悼死者）在于对和平的热望必须战胜复仇的渴望。除非和解尊重仇恨背后的情感，除非和解让曾陷入战争的共同体学会共同悼念死者的仪式，以之取代包含的对逝者的敬意，否则它不会有消除仇恨的机会。和解必须触及死亡民主 [30] 的共享遗产，告诉人们所有终结于杀戮的争斗都毫无作用，所有想要报复那些不再存在的人的所有努力都是无止境的徒劳。因为杀戮不会让死者复活，这是最基本的一项确定性。这是一种可以共享的遗产，当它得以共享的时候，一个人从梦中醒来时或许才会获得这种深刻的认知。

---

[1] 皮洛士（Pyrrhus，公元前318—前272），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

[2] 皮洛士式胜利（Pyrrhic victory），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79年，皮洛士在对抗罗马人的战役中取胜，但己方亦损失惨重，后人因此将这种得不偿失的胜

利称为皮洛士式胜利。

[3] 艾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即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女王长子，1901—1910年在位。

[4] 芬尼亚党人（the Fenian），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爱尔兰独立运动组织。

[5] 这是保守党人兰道夫·丘吉尔勋爵（温斯顿·丘吉尔之父）在1886年喊出的口号。

[6] 斯蒂芬·迪达勒斯即上文中的年轻老师，以上为作者引述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出版于1922年的著名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中的情节。

[7]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1916年出版。

[8] 的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乔伊斯1905—1915年定居于此。

[9] 《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乔伊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1939年出版。

[10] 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9—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自治运动领导人，1889年因通奸丑闻而丧失政治地位，并导致爱尔兰自治运动的分裂，1891年逝世。

[11] 阿鲁沙（Arusha），坦桑尼亚城市。

[12]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 ），南非黑人，曾任南非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1984年因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5年领导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促成南非实现种族隔离之后的国内和解。

[13] 彼拉多（Pilate），罗马驻耶路撒冷总督，处死耶稣的人，《圣经》传说他因为害怕民众而用清水洗手，以示杀害耶稣与己无关。

[14] 西奥多·阿多诺（eodor Adornoo，1903—1969），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5]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1915—2006），智利军事独裁者。

[16] 福卡（Foca），波斯尼亚小镇，旅游胜地。

[17]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

家、精神病学家。

[18] 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 ），德国小说家、剧作家。

[19]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1951— ），荷兰作家。

[20] 《大屠杀》（Holocaust），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978年播出的电视系列剧，反映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21] 斯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机构。

[22] 卢比扬卡（Lubyanka），位于莫斯科，曾为克格勃所在地，设有卢比扬卡监狱。现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

[23] 马加丹（Magadan），俄罗斯远东地区城市，早期设有臭名昭著的劳改营。

[24] 维塔利·什泰林斯基（Vitaly Shentalinsky），1939年生于西伯利亚，记者、作家。他以对克格勃档案的研究著称，参与制作多部纪录片，并耗费大量精力研究苏联时期遭受迫害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命运。

[25] 帕特里西奥·艾尔文·阿索卡尔（Patricio Aylwin Azócar，1918—2016），智利政治家，1990—1994年担任智利民主化时期第一位总统。

[26] 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德国政治家，曾担任联邦德国总理，1970年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谢罪。

[27] 德罗赫达（Drogheda），爱尔兰城市。1649年，克伦威尔在征服爱尔兰的战争中攻下这个城市，屠杀了城内大约3万居民。

[28] 语出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父王被谋杀，其幽灵在城垛上潜行，告知哈姆雷特要为自己报仇。

[29] 海恩斯（Haynes），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人物。

[30] 死亡民主（democracy of death），出自英国作家G. K.切斯特顿的“死者的民主”（democracy of the dead）概念，他将传统看作一种死者的民主，即死去的先辈们选择的结果。

文章来源

这些文章的早期版本，有部分以不同形式刊载于：

《一切皆不神圣？电视的伦理学》刊载于《代达罗斯》（*Daedalus*），1985年秋季刊。《微小差异的自恋》的一部分以“民族主义和宽容”（“Nationalism and Toleration”）为题，载于理查德·卡普兰（Richard Kaplan）和约翰·费弗（John Feffer）主编《欧洲的新民族主义》（*Europes New Nationalism*，纽约，1996）。《道德厌恶的诱惑》载于《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第62卷，第1期，1995年春季刊；关于加利秘书长1995年7月穿越非洲之旅的部分文字见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1997年3月24日。《我们想要从中醒来的噩梦》为1995年6月在都柏林所作的乔伊斯讲座；有部分文字以“信条”（Articles of Faith）为题，载于《审查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第25卷，1996年第5期。

来源注释

1.一切皆不神圣？电视的伦理学

关于1984年的埃塞俄比亚饥荒和英国做出的慈善反应，我得到乐施会（Oxfam）公共关系部的帮助；关于电视对饥荒报道的研究，参见威廉·布特（William Boot）：《埃塞俄比亚：饥荒盛宴》（*Ethiopia* ：*Feasting on Famine* ），载于《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985年3—4月号，第47—49页；关于饥荒的背景，参见弗雷德·哈利戴（Fred Halliday）和玛克辛·莫里纽克斯（Maxine Molyneux）：《埃塞俄比亚革命》（*The Ethiopian Revolution* ，1983）；格莱汉姆·汉考克（Graham Hancock）：《埃塞俄比亚：饥饿的挑战》（*Ethiopia* ：*The Challenge of Hunger* ，1985）；以及雷夏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对衰败中的埃塞俄比亚君主制的出色刻画：《皇帝》（*The Emperor* ，1983）。关于自然法理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的起源，参见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自然法理论》（*Natural Rights Theories* ，1979）；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1978）；以及彼得·施泰因（Peter Stein）：《法律演化》（*Legal Evolution* ，1981）。关于宽容的信条，参见亨利·卡曼（Henry Kamen）：《宽容的崛起》（*The Rise of Toleration* ，1967）；约翰·洛克（John Locke）：《关于宽容的一封信》（*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1990）；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Popkin）：《怀疑主义史》（*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1979）；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论宽容》（*On Toleration* ，

1997）；关于将野蛮置于邪恶之首的自由主义思想，参见朱迪斯·施克莱（Judith Shklar）：《普通邪恶》（*Ordinary Vices*，1984）。亦参见我的《陌生人的需求》（*The Needs of Strangers*，1985）。关于奴隶贸易及其禁止，参见大卫·B.戴维斯（David B.Davis）：《革命年代的奴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975）；关于基督教对饥荒时期的慈善伦理的争论及其对欧洲思想影响的详细讨论，参见伊斯特万·洪特（Istvan Hont）和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编：《财富和美德：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形成》（*Wealth and Virtue*：*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1983）。对饥荒和饥荒纾解的现代讨论，参见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贫困和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对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参见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编：《马克思：早期著作》（*Marx*：*Early Writings*，1975）；亦参见M. 梅洛-庞蒂《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e et Terreur*，1972）；以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3）中的论文。我也要感谢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8）和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关于观看》（*About Looking*，1980）。对唐·麦库林（Don McCullin）的引用来自《摄影中的生活》（*A Life in Photographs*），载《剑河》（*Granta*）杂志，1985年冬季刊；关于电视及其传统和叙事形式，我得益于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著作，尤其是《洞穴中的影子》（*The Shadow in the Cave*，1973）以及《从书籍到字节》（*From Books to Bytes*，1995）。关于神圣理念，参见马塞尔·格歇（Marcel Gauchet）：《世界的祛魅》（*Le désenchantement du monde*，1985）；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政治理

性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Reason*，1983）；以及最重要的，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宗教》（*Religion*，1983）。

2.微小差异的自恋

尽管我让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1996）在这一整章中令人厌倦，但我认为需要公平地指出，他对民族对抗的文化和宗教根源的强调，会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功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方法的欢迎。关于南斯拉夫的灾难，我要感谢劳拉·西尔柏（Laura Silber）和艾伦·丽塔（Allan Little）的《南斯拉夫的死亡》（*The Death of Yugoslavia*，1995）；米莎·格兰尼（Misha Glenny）：《南斯拉夫的陷落》（*The Fall of Yugoslavia*，1992）；以及斯蒂芬·帕夫洛维奇（Steven Pavlovitch）和其他人的论文，载于卢嘉酷（Jacques Rupnik）编：《从萨拉热窝到萨拉热窝》（*De Sarajevo à Sarajevo*，1992）。我自己在1993年穿越克罗地亚战争地区的旅程详见我的《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1993）；关于民族身份，我得益于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199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1983）、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198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870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870*，1990）；以及埃利·凯杜里（Elie Kedourie）：《民族主义》（*Nationalism*，1960）。关于东欧的民主过渡，我从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

《逆境的作用》（*The Uses of Adversity* ，1991）尤其获益良多；关于该隐的神话，我要特别感谢雷吉纳·M.施瓦茨的《该隐的诅咒》（*The Curse of Cain* ，1997）；关于孤独症，参见汉斯·玛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内战》（*Civil War* ，1994）。弗洛伊德对自恋和微小差异的论述可以在《处女的禁忌》（*The Taboo of Virginity* ，1917）中找到，载于《弗洛伊德论性别》（*Freud on Sexuality* ，鹈鹕弗洛伊德图书馆，卷7），第272页；《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1921），载于《弗洛伊德》（*Freud* ，鹈鹕弗洛伊德图书馆，卷12），第131页；以及《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929），亦载鹈鹕弗洛伊德图书馆，卷12，第305页。关于民族和差异，我要感谢K.安东尼·阿皮亚（K. Anthony Appiah）和艾米·盖特曼（Amy Gutmann）的《肤色意识》（*Color Conscious* ，1996），以及柯南·马利克（Kenan Malik）：《种族的意义》（*The Meaning of Race* ，1996）。最后，我要感谢提出并发展这个观点时聆听我演讲的听众：在公开大学帕维斯中心（Pavis Center，Open University）的就职演讲（1994），在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关于宽容的莫雷尔讲座（Morrell Lecture，1994），以及南安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关于宽容的帕克斯讲座（Parks Lecture，1995）。

3.道德厌恶的诱惑

在思考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新国际主义时，我从大卫·里夫（David Rieff）的优秀论文《谁的国际主义，谁的孤立主义》（*Whose Internationalism* ，*Whose Isolationism* ）获益甚多，载

于《世界政策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 ），第二期，1996年夏季；以及他的《屠宰场：波斯尼亚和西方的失败》（*Slaughthouse* ：*Bosnia and the Failure of the West* ，1995）。我也要感谢《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卷62特别号上的文章，第一期，1995年春季，载于《援助：美德的悖论》（*Rescue* ：*The Paradoxes of Virtue* ），阿里翁·马克（Arien Mack）主编。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与刚果的关系，以及库尔茨（Kurtz）这个人物可能的来源，已经在亚当·霍赫希尔德（Adam Hochschild）的优秀文章《库尔茨先生，我的推测》（“Mr. Kurtz，I Presume”）中得到讨论，载《纽约客》（*The New Yorker* ），1997年4月14日；关于卢旺达大屠杀，我要感谢菲利普·古勒维奇（Philip Gourevitch）在《纽约客》的作品，尤其是《回归》（*The Return* ），1997年1月20日。关于“人道主义干预的正义”（le droit d’intervention humanitaire），参见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他人的苦难》（*le Malheur des autres* ，1992）。关于人道主义的批评，参见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失落的人性》（*L’Humanite perdue* ，1996）；关于喧嚣的叙事，参见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世界的尽头》（*The Ends of the Earth* ，1996）。

4.战士的荣耀

关于红十字会、《日内瓦公约》和战争法，我受益于弗朗索瓦·比尼翁（François Bugnion）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战争受害者保护》（*Le Comite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et la protection des victimes de la guerre* ，1994）；我也查阅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90—1996年的年度报告，以及其杂志《红十字国

际评论》（*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的某些期次。关于红十字会1936—1945年的行动，参见马塞尔·朱诺（Marcel Junod）：《没有武器的战士》（*Warrior without Weapons* ，1982）；关于海湾战争中的红十字会，参见克里斯托弗·吉罗德（Christohpe Girod）：《沙漠风暴》（*Tempête sur le desert* ，1995）。关于红十字会坚持认为其不言而喻的任务是终结战争，而不仅仅是控制战争的观点，参见N. O.贝里（N. O. Berry）：《战争和红十字会》（*War and the Red Cross* ，1997）；关于红十字会在南斯拉夫的情况，参见M.梅西尔（M. Mercier）：《不受惩罚的犯罪》（*Crimes without Punishments* ，1994）；罗伊·盖特曼（Roy Gutman）：《见证大屠杀》（*Witness to Genocide* ，1993）；让·威廉·霍尼格（Jan Willem Honig）：《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 ，1996）。关于阿富汗，我从巴内特·R. 鲁宾的《在阿富汗寻找和平》（*The Search for Peace in Afghanistan* ，1995）以及与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弗雷德·哈里戴（Fred Halliday）的讨论中受益匪浅。战争法历史的可以获得的最佳论述收集在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乔治·J.安德罗波罗斯（George J. Andreopoulous）和马克·R.舒尔曼（Mark R. Shulman）所编《战争法：西方世界对战争的限制》（*The Laws of War* ：*Constraints on Warfare in the Western World* ，1994）。最后，关于现代战争的变化，参见约翰·基根（John Keegan）：《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 ，1991），以及他无可匹敌的研究：《战争面目》（*The Face of Battle* ，1977）。亦参见马丁·范·克里费德（Martinvan Creveld）：《战争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1991）；勒鲁瓦·汤普森（Leroy Thompson）：《乞丐战争》（*Ragged War* ，1994）；罗伯特·D.卡普兰：《世界的尽头》；P.戴尔玛斯（P. Delmas）《战争的美好未来》（*The Rosy Future*

of War ，1997）；以及C. H.格雷（C. H. Gray）《后现代战争》（*Postmodern War* ，1997）。最后，我特别感谢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他的《论历史》（*On Histroy* ，1997）中的《野蛮主义：用户指南》（“Barbarism：A User’s Guide”）。

5.我们想要从中醒来的噩梦

在思考德国的战争罪责时，我需要感谢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罪孽的代价》（*The Wages of Guilt* ，1991）。蒂莫西·加顿·艾什的《档案》（*The File* ，1997）对于东德修通其共产主义历史和斯塔西告密者网络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和斯大林主义的记忆在损害精英阶层的自信所起的作用，参见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列宁的坟墓》（*Lenin ’s Tomb* ，1993）中的论述；亦参见维塔利·什泰林斯基（Vitaly Shentalinsky）的《被捕者的声音：找回苏维埃政权消失的声音》（*Arrested Voices* ：*Resurrecting the Disappeared Voices of the Soviet Regime* ，1995）。《审查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 ）卷25，1996年第5期，载于《受伤的国家、破碎的生命：真相委员会和战争审判》（*Wounded Nations* ，*Broken Lives* ：*Truth Commissions and War Tribunals* ），包括有一篇阿尔维托·曼古艾尔（Alberto Manguel）关于阿根廷真相委员会的杰出文章。阿瑞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的戏剧《死神与少女》（*Death and Maiden* ）是对智利语境下的正义、复仇和谅解问题最具穿透力的描绘。对真相委员会和国家犯罪的惩罚的最佳综述是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的《前政权的国家犯罪：对过去的了解、问责和整顿》（*State Crimes of Previous Regimes* ：*Knowledge* ，*Accountability and the Policing of the Past* ），载于《法律和社会探索》（*Law and Social Inquiry* ），卷20，

1995年第1期。我也从阿维沙·玛格丽特（Avishai Margalit）已发表的演讲《铭记、遗忘和谅解》中学到很多，该演讲1996年5月作于荷兰蒂尔堡（Tilburg）的关系研究院（Nexus Institute）。西奥多·阿多诺的《与过去妥协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Mean?* ）载于他的《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卷10，第2部，第555—572页（1977），由蒂莫西·巴蒂（Timothy Bahti）和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翻译。我在自己的《血缘和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一书中探讨了亚塞诺瓦茨和克罗地亚人与其乌斯塔沙过去的关系。也可参见斯莱文卡·德古丽琪（Slavenka Drakulic）的《巴尔干快车》（*Balkan Express* ，1993）；米莎·格兰尼（Misha Glenny）的《南斯拉夫的陷落》（*The Fall of Yugoslavia* ，1993）；以及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的《克罗地亚如何可能》（*Comment peut-on etre croate* ，1992）。关于民族身份，参见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 ，1991）。最后，我对爱尔兰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罗伊·弗斯特（Roy Foster）的《现代爱尔兰》（*Modern Ireland* ，1988），以及他的另一著作《帕迪和庞奇先生》（*Paddy and Mr. Punch* ，1993）。关于乔伊斯，我得益于埃默尔·诺兰（Emer Nolan）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民族主义》（*James Joyce and Nationalism* ，1995），以及詹姆斯·菲尔霍（James Fairhall）的《詹姆斯·乔伊斯和历史问题》（*James Joyce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 ，1993）。

THE WARRIOR’S HONOR
by Michael Ignatieff
Copyright © 1997 by Michael Ignatieff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 / （加）叶礼庭著；成起宏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9
书名原文：The Warrior’s Honor: Ethnic War and the Modern Conscience
ISBN 978-7-5117-3366-5
I . ①战… II . ①叶… ②成… III . ①民族战争 - 文集 IV . ① D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 第180755号

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赵灿
特约编辑：田奥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010) 52612345（总编室）(010) 52612341（编辑室）
传真：(010) 66515838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

火与烬

政治中的成与败

[加]叶礼庭 著
MICHAEL IGNATIEFF
黄天磊 译

FIRE AND ASHES

前加拿大自由党党魁 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汉娜·阿伦特奖、乔治·奥威尔奖获得者

叶礼庭讲述 ——

从学者到总理候选人，这条路究竟有多险阻？

学识渊博的名校教授
~~清谈误国，不懂政事~~

远离党争的新鲜面孔
~~空降部队，缺乏威信~~

视野开阔的世界公民
~~匆匆过客，难以信任~~

一个政坛局外人的
从政冒险史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
民主反思录

火与烬

——政治中的成与败

[加] 叶礼庭 著
黄天磊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目录

导读：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

致谢

第一章 狂妄

第二章 雄心

第三章 命运女神

第四章 察言观色

第五章 金钱和语言

第六章 责任与代议

第七章 资格

第八章 敌人和对手

第九章 听出租车司机怎么说

第十章 召唤

谨以此书献给巧兰，

纪念布拉德·戴维斯、迈克尔·格里斯多夫与马里奥·拉格

导读：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

王前 [1]

2014年3月，笔者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参加关于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研讨会。来自欧美的专家在为期两天半的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伯林跟启蒙运动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伯林创建并担任首任院长的学院里，与会学者大多对伯林关于启蒙的研究颇有意见，有的炮火之猛烈让我这个也研究点儿伯林的外来者很是吃惊：如果搞不清状况，你会疑惑正在被讨论的这位哲学家是否还有讨论的价值。

记得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后一个多小时，我才赶到会场，因不想在别人发言时闯进去打扰，于是就上了二楼，站在走廊跟座席之间光线很暗的过道上听。没多久，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走了过来，他打开门正要进去。我定睛一看，眼前的不正是伯林传记的作者叶礼庭吗？简短的寒暄后他先进去了，我也就尾随而入，坐在二楼的座位上继续听。这天叶礼庭有主题发言，他反驳了时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德隆（Jeremy Waldron）对伯林的严厉批判。沃尔德隆主要批评伯林忘记了立宪启蒙主义的重要性，具体内容就不在此赘述了。 [2]

当时印象很深的是，这位伯林晚辈中唯一曾在政坛居高位、跟加拿大总理宝座擦肩而过的学者真是能言善辩，对当今法哲学重镇执牛耳者沃尔德隆反驳起来毫不客气，似乎成了场内为伯林辩护的最强音。遗憾那天他参加完会议就离开了，我没有机会请教。一晃三年过去，因缘凑泊，这次有机会阅读他的三本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读完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

因为以前只是仔细读过他那本伯林传记——那是本难得的关于哲学家的传记佳作——其他的除了访谈外基本上没有读过。这次通读三本书有许多新的发现，尤其对他深入兵荒马乱的纷争之地，了解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真相的努力肃然起敬：他是位典型的行动型知识人。

《血缘与归属》《火与烬》和《战士的荣耀》各有特色，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三部曲。《血缘与归属》谈新民族主义，《火与烬》写从政的经历，可以说是对他的从政经历的一部总结，而《战士的荣耀》则是一部谈论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若干当今世界重要问题的评论集，他关注的是“超越我们的部落，超越我们的民族、家庭、熟人网络的道德义务”。三本合在一起正好反映了叶礼庭这些年来的人生轨迹和他最关心的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叶礼庭谈论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有个特点，就是他不像某些理论家那样坐而论道，而是深入冲突的现场，亲自了解冲突各方的观点和立场，使自己掌握第一手证据，对问题具有发言权，从而使自身的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场感，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衍。换而言之，作者虽不乏理论家的素养，但并不是学院派理论家的论证风格，而是以充满临场感的报告为论述的前提和基础，让我们这些没有到过现场，没有掌握冲突的第一手资料的读者也能获得一副眼镜，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背后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在论述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从人权等普世价值出发进行的政治和军事干预时，作者也以明晰的笔调揭示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两难，一种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悖论，令人想起作者熟悉的伯林的著名论断：各种价值观未必是能够共存的，人类追求的有意义的价值观之间往往会产生冲突，真、善、美往往不

能兼得。处理那些复杂的民族冲突等问题时，需要有高度的现实感和政治智慧，否则结果只可能是半吊子的仁义和道德理想的幻灭而已。换而言之，叶礼庭揭示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很多悖论，身处那些悖论之中，我们会发现也许永远找不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我想先来谈一下给我很大震撼的《血缘与归属》。在此书中，作者写了他的六次关于新民族主义的旅程，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开始，中经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再到北爱尔兰。通过这些旅程，叶礼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当今新民族主义的灰色甚至是血腥的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世界各地的新民族主义倾向是如何导致冲突，甚至残酷战争的。比如，说到克罗地亚跟塞尔维亚的冲突，我们这些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外国人，除了看报纸电视上的报道，实在搞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何从原来和睦相处的邻居，昼夜之间就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给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概念》又提供了一个绝佳样本。叶礼庭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冲突地区进行实际调查，就是想要搞清楚双方冲突的根源。许多时候死亡如影随形，光凭这点就令人对这位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另眼相看。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我们这些遥远的东方人也就渐渐明白冲突的起因和问题的复杂性了，远非一句塞尔维亚人对异族进行种族清洗就可以解释完毕的。

我当时是从西方的媒体上得知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后来才知道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还有其他事件，比如“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民族独立组织乌斯塔沙(Ustashe)曾加入轴心国阵营，残杀过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等异族，最后被铁托击溃。作者到底是历史学出身，对事件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做了很细致的调查，所以他能够对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做出比较独立的判断，

对当年西方政府几乎一边倒的措施也能提出批评。他还去了铁托故居，为的是了解这位作为南斯拉夫象征的政治家在处理该国民族问题中起到的作用。原来铁托并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作为克族人的他，在建立了南斯拉夫之后，并没有真正处理好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矛盾，而是通过遮蔽和向前看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很敏感的问题。这种方法在铁托那样的铁腕人物在世时可以起作用，一旦他去世，原来被掩盖起来的问题就渐渐露出水面，后继者既然没有前任那样的权威，掌控不了局面，再加上立场偏颇，终于酿成一场巨大冲突，使原来和平相处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从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邻居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一些老人甚至说“二战”时候都没有杀得那么凶，这也让我们见识了新民族主义的巨大破坏性和残酷性。作者还采访了当过铁托副总统的一位老政治家，他俩关于历史和现状的对话也极有意思，读来饶有兴味。

作者写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民族矛盾的那一章也很吸引人，因为这里面有他自己的寻根旅程。叶礼庭的《伯林传》出来后，我读过一些人对作者的访谈，里面他谈到自己的家族。他的曾祖父是沙皇时代的内务大臣，参与过沙皇时代的排犹决策，而他的祖父则是沙皇时代末期的一位教育大臣，“十月革命”后举家流亡，最后定居加拿大。在去乌克兰采访的旅途中，他参拜了曾祖父母的墓地，见到了了解自己家族情况的年长的乌克兰人，虽非叶落归根，但这颇有回乡意味的旅途让作者感慨万千。毕竟他是流亡者的后代，所以他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尖锐民族矛盾有跟纯粹局外人不一样的视角和感受。作者在采访黑海舰队时所了解到的情况真是极好地体现了原属一个大国的若干民族在国家解体后面临的困境：你的忠诚对象究竟是谁？书里面提到住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到俄罗斯去竟然要护照，原先非常平常的国内旅行一变为国

际旅行，身份认同也变得尴尬起来了。

叶礼庭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到英国寻求发展，不但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做过不少精彩节目，而且为伯林那样在整个西方都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写了颇受称赞的传记，英国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了。但即便他熟知英国，在调查北爱尔兰问题时还是对英国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自己被英国的世界主义给“骗”了——英国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传统的。联想到脱欧公投，我们也就能理解英国独特的民族主义了：英国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变成世界主义式的，它虽然没有狭隘的岛国根性，但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这些“发现”都是作者的功劳：帮助我们打开视界，改变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对这个世界获得新的认知。

如果说叶礼庭的传记对象伯林是20世纪对民族主义最有见解的思想家之一，那么三本书中最厚的这本《血缘与归属》则给我们提供了新民族主义的各种范例。它们的本质都很相似，只不过是换了时代和环境，上演的剧本没有本质的差异。伯林在谈到民族主义时，既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也分析和批判了其残酷暴力的一面。伯林说19世纪的思想大家们几乎没有一个重视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大多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主义会逐渐式微，所以那些大家几乎都没有预料到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勃然兴起，甚至主导了很多政治运动。不管左翼、右翼，如果没有跟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可能都无法取得胜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礼庭的这本书几乎是在为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提供一连串有意思的解释和注脚。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因本书作者的叙述而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有立体感了。

伯林在思考自己的犹太民族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时，虽然并非完全没有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批评的袒护以色列的一

面，但他还是提出了双方应该妥协的建议，他对以色列政府的过激政策也提出过尖锐批评。巴以冲突里有的特征，你都可以在叶礼庭所记录的六次旅程里找到类似的对应。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处理民族问题的准则呢？透过叶礼庭深入冲突现场的考察，我们虽然被那些鲜血和暴力震撼，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让本来深陷民族冲突的各方和平相处的原则。当然，这绝不是喊几句世界主义的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需要倾听各自的声音，通过理性的对话来寻找一条共生的道路，否则只会是无止境的、没有意思的冲突罢了。叶礼庭对比了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笔者也倾向于认同公民民族主义，因为既然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都已几乎不可能是由单纯的同一个民族组成的，那么公民民族主义也就是唯一的选择了，这点跟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都说自己是绝对的正义，都不准备妥协，那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已故的卓越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对巴以问题的剖析完全可以用在巴尔干民族主义冲突上面。

在读完沾有血腥味和戾气的《血缘与归属》之后读《火与烬》，会觉得很有趣味——对曾败选加拿大总理的作者来说，这样说也许有点失礼。这本书是叶礼庭在近耳顺之年投入政坛的从政记录，对我们了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有不少帮助。笔者很喜欢看BBC转播的英国下院的论战，原以为欧美的议会大概都是差不多，哪里知道在作者的笔下，加拿大的议会运作并不精彩，有意思的演讲讨论也不多，纳税人也不是很关心自己国家议会的运转情况，跟英联邦的龙头老大西敏寺大本钟下的议员们比起来似乎差远了。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叶礼庭写他如何从政坛菜鸟逐步迅速进入角色，临危受命成为加拿大最大在野党——自由党——的党魁，并进而挑战当时的哈珀总理，却终因是空降政治

家和若干失言导致落败的过程。从作者坦诚的叙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英美等国工作30年左右，然后应忧心自由党前途的若干政治家的热烈恳求回国从政，这本身就给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在选举中对手始终可以拿这点来攻击他，而事实上加拿大的保守党正是这样做的，这让叶礼庭有口莫辩。毕竟作者大半生都在媒体和学界工作，做的是职业知识人而非职业政治家，要完成从学人到政治家的转身，时间还是太短了(虽然如今也有从房地产大亨摇身一变，成为总统的活生生的例子，那毕竟是罕见的，不可当作常有的事情）。他在选举过程中的失败经历正好说明他是政坛的菜鸟，跟那些年纪轻轻就在政坛打滚的职业政治家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不过他从谈政治的学人、战地记者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转到政治家的行业，从书桌上的“空论”到身体力行，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也是这本书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读完此书，可以发现他为我们考察当今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样本。我们一般都不太熟悉加拿大的政治文化，它的国土那么辽阔，却似乎一直生活在南边那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下。通过作者这位前自由党党魁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特朗普上台，引起这些巨变的要素在加拿大这个民主制度运转基本上算是很成功的大国也存在，比如移民问题，比如政策如何反映民意，等等。在去年美国的大选中，建制派精英饱受攻击，主张美国第一的民粹主义占了上风，这当然是跟美国国内存在的现实问题分不开的。叶礼庭本人是作为“空降兵”突然闯入加拿大政界的典型精英，当然会遭遇巨大障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跟选民打交道，让他们认识你、接受你，实在是很不简单的事情，需要接地气，自己去摸索，再多的政治理论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些修行的经历在书里都有很详细的

描述，让你觉得要当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实在不容易。当然，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叶礼庭落选后没几年，自由党又重新执政，当今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正是叶礼庭年轻时助选过的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的儿子，而这位加拿大“官二代”的从政阅历并不比叶礼庭丰富到哪里去，看来毕竟还是因为拥有父辈的人脉，加上更“接地气”吧。

《战士的荣耀》作为一本评论集，是叶礼庭对包括新民族主义在内的当今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汇总，里面也有很多令我们读后深思的内容。如果说《血缘与归属》是以报道为主，这本书则是他对那些问题较为理论化的探讨。作者在此书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电视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微小的差异如何导致民族冲突、红十字会在现代社会里的使命和局限，以及转型社会和民族冲突地区的和解问题。在讨论为何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样差异极小的民族会发生激烈冲突时，叶礼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做了梳理，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再有，讨论和解问题的《我们想要从中醒来的噩梦》也写得非常有深度，反映了他所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很多问题一经他的阐述，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的很不简单，远非采用“理客中”的态度就能处理好的。比如这篇文章里讲到和解中如何处理真相问题。我们知道南非有真相委员会，其在南非的国家和解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作用，战后西德对历史的反省也颇受称赞，但如果看一看内部情况，其实并不简单，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努力，有时是迫于外界压力。叶礼庭最后总结道：“和解建立在互相道歉的基础上，承认历史不是命运，承认历史不应受到谴责；也不应谴责文化或传统——历史必须谴责的只是特定个体。和解的最后一个维度（即哀悼死者）在于对和平的热望必须战胜复仇的渴望。除非和解尊重仇恨背后的情感，除非和解让曾

陷入战争的共同体学会共同悼念死者的仪式，以之取代包含的对逝者的敬意，否则它不会有反抗仇恨的机会。和解必须触及死亡民主的共享遗产，告诉人们所有终结于杀戮的争斗都毫无作用，想要报复那些不再存在的人的所有努力都是无止境的徒劳。因为杀戮不会让死者复活，这是最基本的一项确定性。这是一种可以共享的遗产，当它得以共享的时候，一个人从梦中醒来时或许才会获得这种深刻的认知。”这是在观察了新民族主义冲突的现场，对历史上和当代的种族冲突进行深刻思考后得出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对我们思考自己的历史也是有启示的。每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都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读完这三部著作，笔者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为了写作伯林传记，跟着伯林在伦敦坐巴士的那个四十岁左右的俄裔加拿大学人。叶礼庭写作的《伯林传》给20世纪留下了一份极有意思的记录，他在自己正值壮年的一段时期跟伯林的人生产生了交集，他所尊敬的这位哲学家思考的很多20世纪最重要的问题自然也给了他不少影响。细心的读者肯定能够发现，那些思考也不时出现在这三部著作里。叶礼庭的从政生涯虽然没有结出硕果，但他对政治的思考，对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重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因为他从政失败而失去意义。恰恰相反，这三本书是一位不满足于坐而论道，有付诸行动的勇气的知识人的人生记录和理论反思，在这个价值观有错位的时代里提供了很清醒的判断，对我们理解时代和政治大有裨益。

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托尼·朱特的友人、合写《思虑20世纪》的耶鲁大学斯奈德教授说，那些曾经被坚信的重要的现代性价值观如今却被怀疑，西方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黑暗的保守主义时期。从上面的叙述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叶礼庭跟他景仰

的伯林一样，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之子，虽然对现代性价值观不无批判，但他们都是捍卫现代性价值观根本原则的学人。依笔者的推测，对这个新保守主义时代他们肯定不会是赞成者，相反会是严厉的批评者(或许会被某些同胞骂为“白左”也说不定）。之所以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他们是顽固地捍卫启蒙等现代性原理的教条主义者，而是基于他们对历史的锐利洞察和学理上的深刻见解。那些启蒙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性价值观，固然在这两三百年里经历了很多批判，尤其是在被称为“极端世纪”的20世纪上半叶，启蒙运动以来的重要价值观遭遇过远比今日更为深刻的危机。虽然历史并未因为福山的那本名扬天下的著作而终结，现代性的根本原理毕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现在的我们也无须因为一场令人大跌眼镜的总统选举就对整个现代性价值体系产生深刻的动摇。

笔者在写这篇导读的时候，看英国的《卫报》等媒体报道说如今担任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校长的叶礼庭正在进行一场保卫大学的战斗。作为行动的知识人，他正在捍卫学术自由，在写他人生的新篇章，而此时他已入古稀之年。我们当然无法说作为政治家的叶礼庭获得了大成功，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败选后在电视上用英语和法语发表败选感言时的落寞眼光。据说西塞罗很喜欢说不应该根据成就来评价一个人，而是应该根据他为了某个目标而做的奋斗来判断，用这句话来评价叶礼庭，也许非常合适。在民粹主义再度沉渣泛起的年代里，叶礼庭的思索会给我们很多启迪。他当然不可能提供包治百病的药方——事实上自从柏拉图以降，也没有一个政治理论家做得到——但是他的观察和思考一定会刺激我们思考那些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的“真问题”。我相信各位读者读完他的这些著作后，大概会有类似的感触，也会有看问题的新视野和新眼光吧。

[1] 王前，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东亚教养教育创新组织特任副教授，专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在日本出版《中国是如何阅读西方思想的？》、《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合著）、《现代中国与市民社会》（合著）等多本著作，另在《知识分子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思想》等学术类杂志发表若干论文、随笔。

[2] 关于叶礼庭具体的发言内容，可参见笔者发表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思想》第二十六期上的文章。

致谢

如果没有一支为你倾其所有的团队，你在政界必然无处可走。我如今能走到这里，要感谢的正是这支从开始的陌生人到最后变为挚友的队伍。如果我遗漏了你们中的任何人，请原谅。

艾尔弗雷德·阿普斯（Alfred Apps）、丹·布罗克（Dan Brock）和伊恩·戴维（Ian Davey）把我引入了政界的大门。参议员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与他热情活泼的助理珍·哈特利（Jen Hartley）曾在我参选党领袖时帮助我动员议会党团的支持。前总理保罗·马丁（Paul Martin）与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曾给过我不少建议，也包括一些我应该听从却最终没有听从的建议。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曾在2006年出色地领导了自由党一整年。曾在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政府出任内阁部长的马克·拉隆德（Marc Lalonde）与唐纳德·S.麦克唐纳（Donald S. Macdonald）两位，与罗伯特和埃莉诺·卡普兰（Robert and Elinor Caplan），以及戴维和佩妮·科莱尼特（David and Penny Collenette）一样，曾将他们的宝贵经验传授于我。我所到之处，似乎总能看到阿德里安·麦克唐纳（Adrian McDonald）、卡罗莱娜·加洛（Carolina Gallo）与南希·科尔达姆（Nancy Coldham）的身影，戴维·莱特（David Wright）和拉里·赫尔曼（Larry Herman）也是如此。在我参选党领袖期间，萨钦·阿加沃尔（Sachin Aggarwal）、亚历克西斯·莱文（Alexis Levine）、马克·坂本（Mark Sakamoto）与莱斯利·丘奇（Leslie Church）是我那支由律师和学生组成的辅选团队中的核心成员；米尔顿·陈（Milton Chan）是当时众多“数据猿”中的一位，汤姆·埃里森（Tom Allison）则是一位幕后的决策

者 （*eminence grice* ）。贝丝·希斯菲尔德（Beth Hirshfeld）负责管理我的拉票队伍。宝拉·维奥拉（Paula Viola）去上法学院之前，也曾和我们一起四处奔波。马克·查理福克斯（Marc Chalifoux）曾在2006年担任我的私人助理。除了为我们筹款外，埃尔维奥和马尔琳·德尔赞托（Elvio and Marlene DelZotto）还处处维护我们、为我们着想。亚伯·施瓦兹（Abe Schwartz）曾为2006年的党代会组织了一支摄影队伍，我们也从此成为了朋友。任劳任怨的玛丽·凯瑟（Mary Kancer）是我在怡陶碧谷湖滨（Etobicoke-Lakeshore）的选区助理；阿尔芒·柯南特（Armand Conant）曾是我的官方代理人；杰米·马洛尼（Jamie Maloney）曾是我的选区协会主席。我仿佛还能听见他的母亲，玛丽恩·马洛尼（Marion Maloney），在我耳边强烈敦促我招募更多女性加入我的辅选队伍。凯西·科特里斯（Kathy Kotris）、安妮塔·朱厄尔（Annetta Jewell）、娜塔莎·布朗夫曼（Natasha Bronfman）、吉尔·费尔布拉泽（Jill Fairbrother）、马蒂·卢维斯（Marti Rowse）与康妮·米卡莱夫（Connie Micaleff）曾是我在怡陶碧谷湖滨的团队主心骨。我与省议员劳雷尔·布顿（Laurel Broten）共同负责这一选区。杰夫·基欧（Jeff Kehoe）曾驾驶飞机载着我们在安大略省（Ontario）南部穿越暴风雨，也曾数次在深夜里把我们送到全国各地的小型机场参加活动。保罗·泽德（Paul Zed）炫目的驾驶技术曾让我在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的路上吓得不轻。史蒂夫·麦加奈德（Steve Megannety）正是那个对我说“我希望党能变回原来的样子”的“标语男”；凯文·陈（Kevin Chan）放弃了在枢密院办公室（Privy Council Office）前途光明的工作，来为我做政策研究；亚当·戈登堡（Adam Goldenberg）负责为我撰写演讲稿，而我还曾自作聪明地想在上面做修改。彼得·多诺洛（Peter Donolo）曾任我的办公室主任，和帕特·索尔巴拉（Pat Sorbara）、希瑟·

恰森（Heather Chiasson）以及让——马克·富尼耶（Jean-Marc Fournier）一起，从2009年开始管理我的办公室。帕特里克·帕里佐（Patrick Parisot）也曾将他丰富的内政外交经验带到我的党领袖办公室；萨拉·韦尔奇（Sarah Welch）让我们的工作得以井井有条；杰里米·布罗德赫斯特（Jeremy Broadhurst）在处理众议院各项事务时沉着冷静，魅力非凡；布赖恩·博亨尼基（Brian Bohunicky）与迈克尔·麦克奈尔（Michael McNair）为我草拟了用于2011年大选的政纲；凯西·安塔罗（Casey Antolak）、丹·兰格（Dan Langer）、戴夫·里奇（Dave Ritchie）与吉姆·宾布利特（Jim Pimblett）和我一起在竞选期间遍访各地；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不断对我说，“你的梦想正在实现”。马克·根德隆（Marc Gendron）、歌西娅·莱德辛斯卡（Gosia Radaczynska）与乔丹·欧文斯（Jordan Owens）负责管理我们的社交媒体团队。理查德·马克斯密（Richard Maksymetz）是我们在西部的组织人，他从没能真正戒烟；马特·斯蒂克尼（Matt Stickney）从不会忘了忙里偷闲；麦克·欧沙纳西（Mike O'Shaugnessy）在竞选时逐渐精通了怎么在人群里像鸭子似的倒着走路。

特雷弗·哈里森（Trevor Harrison）、克里斯蒂安·普罗文扎诺（Christian Provenzano）与里欧·刘易斯（Rheal Lewis）三人曾在我任党的副领袖时尽心辅佐我，与我一同渡过了2007年12月的乔克里弗核设施（Chalk River Nuclear Facility）危机。

生活在斯托诺韦（Stornoway）的两年半时间里，乔希·德拉赫（Josh Drache）、艾克斯比·卡斯特拉（Expie Casteura）与杰里·珀蒂（Jerry Petit）每天都会在家欢迎我们回来，让那座房子成了我们当时最好的庇护所。简·肯尼迪（Jane Kennedy）细

心体贴地照顾巧兰和我的生活起居。斯科特·麦考德（Scott McCord）总是可以让我们以最快速度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党的执行主任伊恩·麦凯（Ian McKay），他让党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维持正常运转。

警卫官凯文·维克斯（Kevin Vickers）总会在我忘记的时候提醒我，众议院是一个高尚的地方；议长彼得·米利肯（Peter Milliken）则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议会的权威。党的众议院立法活动主任理查德·瓦克德（Richard Wackid）生前也曾深深热爱在众议院的工作，但他不幸在与卢伽雷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勇敢的搏斗中离我们而去。

2006年至2011年间，每周三与参众两院自由党议员在党团会议上的会面都让我感到收获满满，而每次与他们一起在各自的选区工作，也让我从现实政治里学到了许多。此外，我也想在此感谢所有在我的领导下参加了2011年大选的候选人们。

奥利佛·杜切尼奥（Oliver Duchesneau）、布丽吉特·勒高（Brigitte Legault）、罗伯特·阿塞林（Robert Asselin）、保罗·瑞安（Paul Ryan）、马克——安德烈·布兰查德（Marc-André Blanchard）、雷蒙德·加诺（Raymond Garneau）、让-马克·福尼尔（Jean-Marc Fournier）与吕西安娜·罗毕拉（Lucienne Robillard）尽其所能让我理解了魁北克省的政治形势；同时，德怀特·邓肯（Dwight Duncan）、唐·盖伊（Don Guy）与艾琳·卡罗尔（Aileen Carroll）则加深了我对安大略省情况的了解。如果没有玛丽·麦克劳克林（Mary Mclaughlin），我们在伦敦与安大略的访问就不可能成行。安大略省省长达尔顿·麦坚迪（Dalton McGuinty）曾对我说：“在政界，只有两个问题值得一问：你准

备好赢了吗？还有，你做好输的准备了吗？”魁北克省省长让·查尔斯特（Jean Charest）告诉我，政治中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坚持不懈（*la pérseverance*），叶礼庭先生，坚持不懈”。在纽芬兰省，保罗·安特尔（Paul Antle）不仅把我的团队安顿妥当，还让我在他家楼下的沙发上休息；在新斯科舍省，吉姆和莎伦·戴维斯（Jim and Sharon Davis）用他们自身启迪人心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作勇气：吉姆的儿子保罗在阿富汗服役时不幸去世。在萨斯喀彻温省，理查森和麦钱特两家人（the Richardson and Merchant families）从始至终都支持着我。在阿尔伯塔省，格兰特·米切尔（Grant Mitchell）、琼·布拉萨（Joan Bourassa）和达丽尔·福里德汉德勒（Daryl Fridhandler）的努力让我们得以在当地拥有坚固的选民基础；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思和玛丽·简·米切尔（Keith and Mary Jane Mitchell）总是会对我们表示慰问，而戈登和基尔比·吉普森（Gordon and Kilby Gibson）和他们的女儿们也时常给予我们建议和灵感。戴维和布伦达·麦克莱恩（David and Brenda McLean）对我们既慷慨又热情。贾庭德和罗茜·赖（Jatinder and Rosie Rai）对不列颠哥伦比亚低陆平原上的所有社群而言都是出色的导师。

保守党的庄文浩（Michael Chong）、新民主党的彼得·斯托弗（Peter Stoffer）以及魁北克集团（Bloc Québécois）的吉勒斯·都赛佩（Gilles Duceppe）亲身证明，在众议院不同党派间的以礼相待是可能的。

《新闻》（*La Presse*）报社的安德烈·普拉特（André Pratte）、《多伦多之星》（*Toronto Star*）报社的苏珊·德拉古（Susan Delacourt）、《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的迈克尔·瓦尔皮（Michael Valpy）和加拿大电视网有限公司（CTV）

的克雷格·奥利弗（Craig Oliver）向我们证明，记者也能坚守对你的信心，永远不会背叛你。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e）曾告诫过我当下所做之事的危险，可我却辜负了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败选的那天晚上，在所有人都已离开了现场后，克里斯·布雷特（Chris Bredt）与杰米·卡梅伦（Jamie Cameron）仍在身边陪伴着我们。柯尔斯滕·沃尔格伦（Kirsten Walgren）与罗布·里门（Rob Riemen）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得以在阿姆斯特丹休息了一阵子，而伯纳德·海汀克（Bernard Haitink）与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则给予了我们最好的鼓舞。

从政的五年里，李博（Bob Rae）既是我的对手，也是我的朋友。他在我出任党领袖时曾忠心耿耿地为我效力，后来他在出任临时党领袖时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罗布·普里查德（Rob Prichard）、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戴维·内勒（David Naylor）和贾尼丝·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的帮助让我得以在败选后找到一份难能可贵的工作。戴维·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艾丽丝·博纳特（Iris Bohnet）和阿瑟·阿普尔鲍姆（Arthur Applbaum），还有许多其他的同事则对我回到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继续执教表示欢迎。

201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法学院院长邀请我在J. 罗伯茨纪念讲堂（J. Roberts Memorial Lecture）上做了一场以“在法律与政治上的资格”（Standing in Law and Politics）为题的演讲。布伦丹·奥利里（Brendan O’Leary）对这场演讲所提的建议让我获益良多。同年，彼得·弗

洛伦斯（Peter Florence）邀请我去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的雷蒙德·威廉斯讲堂（Raymond Williams Lecture），做了一场关于政治与文学的讲座。另外，受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The Humanities Cent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的邀请，我在该校的主席讲堂（Presidential Lecture）做了一场以“敌人和对手：政治中的政党偏见”（Enemies and Adversaries：Partisanship in Politics）为主题的发言。2013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tionality，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埃德娜·乌尔曼——马加利特讲堂（Edna UIlmann-Margalit Lecture）上，我以“政治中的理性”（Rationality in Politics）为题做了一场讲座。回到肯尼迪学院，在我所开设的代码为DPI 205的“责任与代议”（Responsi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课堂上，我的学生们让我明白了这本书应该怎么写。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李纳克尔学院（Linacre College）的邀请，让我有幸在2013年6月登上坦纳讲堂（Tanner Lecture）围绕责任与代议发表演讲。

AP瓦特代理公司（AP Watt）的德雷克·约翰斯（Derek Johns）在他人尚未发现时便看到了本书的价值。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的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与加拿大兰登书屋（Random House Canada）的保罗·汤顿（Paul Taunton）和德雷克一样眼光锐利，他们的编辑让本书以更好的品质呈现在读者眼前。

我的弟弟安德鲁·伊格纳季耶夫（Andrew Ignatieff）对我当初从政的决定曾有异议，但当我真正踏入政界后，他便始终支持着我，帮助我渡过了每一次的难关。

这本书也为了纪念以下三位同事而写：布拉德·戴维斯

（Brad Davis）是一位年轻的律师，2006年时曾在我的辅选团队工作，后不幸罹患癌症去世；迈克尔·格里斯多夫（Michael Griesdorf）曾与我一起在2006年挨家挨户地与民众接触，后于2008年去逝；马里奥·拉格（Mario Laguë）曾在我的办公室任通讯部主任，于2010年8月不幸死于一场车祸。我为他们所有人哀悼。

我要特别将这本《火与烬》献给一位自始至终陪我一路走来的亲人——我的夫人，苏巧兰（Zsuzsanna Zsohar）。

第一章 狂妄

2004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三位与我素未谋面的男士特地到访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邀请我和夫人苏巧兰共进晚餐。他们便是后来被我们戏称为“黑衣人”的艾尔弗雷德·阿普斯、丹·布罗克和伊恩·戴维三人。我们约好在查尔斯酒店见面，酒店旁便是我教授人权和国际政治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来自多伦多的律师艾尔弗雷德·阿普斯看上去似是三人的领队，健谈的他在吞云吐雾间几乎主导了饭桌上所有的谈话，他面前盛着红酒的高脚杯很快就见了底。一旁的丹·布罗克来自蒙特利尔，外表儒雅，英语流利，在多伦多经营着一家大型律所。另一边眼窝深陷、眉毛粗浓的是伊恩·戴维，他既是作家也是导演，他的父亲正是当年使自由党在全国大选中数次胜选、人称“造雨人”的参议员基思·戴维（Keith Davey）。待寥寥一两杯琼浆下肚，阿普斯便直奔主题，问我是否考虑回加拿大代表自由党参选。

当时，执掌加拿大政权的仍是自由党。我于是问他们，是不是时任总理保罗·马丁（Paul Martin）派他们来的。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便知并非如此。看来三位“黑衣人”自行提议让我回国参选，是准备要在党内另起炉灶，他们直白地告诉我，如此提议的目的便是要让我有朝一日出任总理。丹·布罗克说，自由党“正走向自我毁灭”，如果再不及时出现一名新的领袖，党在下次大选中几乎必败无疑。他们会组成一个团队，许多年轻人会拥护我。他们还向我承诺，一旦我答应他们的提议，便会助我在两年后的选举里赢得一席之地。我是否应该至少考虑下他们的提议？

他们的提议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我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个完完全全的加拿大人，但我毕竟已经背井离乡三十余年，这期间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做过研究员，也在英国做过自由撰稿人，如今在哈佛担任教授。诚然，我曾在皮埃尔·特鲁多1968年的辅选团队里工作过，一生也都在观察着各路的政治家，但为什么会有人仅凭我的政治写作能力就认定我够格成为一名政治家呢？我是一个为思想而生的知识分子，一个喜欢从辩谈中汲取或简单或复杂的快乐的知识分子。我一向十分崇敬那些弃笔从政的知识分子——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捷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和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但我也知道，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生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况且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1]

“黑衣人”的提议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也全然不知他们是否真能兑现承诺。当晚酒足饭饱后，他们准备启程返回多伦多时，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会予以考虑。

走出查尔斯酒店，我和巧兰沿着查尔斯河岸，沐浴着秋夜的静谧步行回家。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很幸福。工作上，我既有令人称奇的学生，也有赫赫有名的同事；生活上，即便身处异乡，我和巧兰在美国的生活也很安逸舒适。既然如此，是什么动摇了我在此系泊的游子之心——是迟来的爱国精神？是单纯的政治野心？还是为了找回那份被长期压抑的存在感？面对这个荒唐的想法，我本应一笑置之，可当时的我却一丝笑意也没有。我以为自己是谁？

这本《火与烬》所要讲述的，便是我为什么——在不久之后，罔顾一些好友的异议，答应了“黑衣人”的提议——的故事。

它记录了我从初识政治的残酷开始，一步步朝着这个地球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民主国家的权力巅峰攀登的经历。我想通过这本书展现的是，一个原本明智的人是如何因为一个梦想让自己的生活天翻地覆的过程，说得不客气些，就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是如何无助地向内心的狂妄屈服的过程。

比起为我自己作传，这本书更是一本反思过往的回忆录。我希望能借自己的故事来去芜存菁地探讨政治，探讨以政治为业、为生活方式的一般特性。我曾将这种生活方式践行到极致，即便是期间最为黑暗的时刻，如今想来仍让我缅怀万分。我知道在一个人头攒动的礼堂里面对4000位民众演讲还能游刃有余地——至少我觉得还能——掌控全局的感受。我也知道和一群对我怀有敌意的民众交谈，还要看着他们写满了冷漠和怀疑的脸庞是什么感受。从上千名与我们共同奋斗的同事那里，我体会到了忠心耿耿，而从少数居心叵测的人那里，我尝到了背叛的痛楚。有些时候，我会觉得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也有时候，我不得不无助地目睹局面一步步走向失控。曾经，每每想到自己或许能为人民谋福祉便会欣喜若狂，而如今，我只能背负着自己再也无法有所作为的遗憾。总而言之，我曾那样活过，曾为吸取的教训付出代价，也曾在飞蛾扑火般追求权力的路上，亲眼看着最后的希望化为灰烬。

灰烬，虽然只是不起眼的残渣，却也有独特的用处。我的父母过去常从壁炉里铲出余烬，撒到我家西墙边的玫瑰地上。我的父母已离世许久，但每到夏天，当他们的玫瑰绽放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相信，正是因为我仍从壁炉里铲出余烬撒到玫瑰地上，这份美丽才成为可能。

我希望自己政治生涯里的余烬，也能被撒到别人家的苗圃

里。如果你和我一样，儿时会在上学路上自言自语地发表演讲，会憧憬各种各样的政治荣耀，并且长大成人后选择亲身践行儿时的理想，那我希望我在这五年里学到的东西能够给你一些启发。任何和我一样热爱政治的人，都会想要鼓舞他人为自己的理想而活，并且希望他们能在正式投入政治的疆场前，做了比我更充足的准备。我希望他们不仅能明白、能体会到成功的甜蜜，也能尝一尝失败的苦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学会不惧成败。

这本书是为了高歌政治与政治家而写的。这段经历让我重拾对政治家群体的敬意，也让我心中对公民力量的信念再次复兴。如果你觉得这些话从一个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的人嘴里说出来，听上去有些奇怪甚至虚伪的话，那我必须告诉你，失败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段对我而言并不顺利的经历却让我收获了赞美这种生活的权利。

当今的民主政治确实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弊病——我会在之后详述——多到让人们很容易忘记民主理想所蕴含的真理，就是这样一种反复被考验的信念：任何普通人，无论男女，都拥有选择让谁来以他们的名义治理社会的权利，而那些被选为治理者的人，都能带着正义与怜悯之心展开治理。任何书写民主政治的文字都势必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即如何在毫不留情地批判现实政治的同时，坚守对民主理念的信仰。这一信念伴我同行至今，我以它为生。本书便是我对这一信念的誓约。

---

[1] Mario Vargas Llosa，A Fish in the Water，Transl. Helen Lane Farrar（New York：FSG，1 994）；Václav Havel，To the Castle and Back，transl. Paul Wilson（New York：Knopf，2007）；Carlos Fuentes，Myself with Others（New York：FSG，1988）.（本书注释除特别标明外均为作者注。）

第二章 雄心

你从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从政。或许你会惊奇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身处政界却依然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的人。但是，为什么　会是选民、记者和对手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政治生涯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你之所以想成为国家的领袖，或许是因为这份工作会让你拥有一架专机，一处豪宅，一个为你马首是瞻的政府，还有一众穿着西装、戴着耳麦、佩带枪支的男女保镖；又或许是因为你渴望权力，享受将别人的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快感；也可能是因为你想流芳后世，做一个名人，让人把你的名字写进历史教科书或者用来命名学校，再把你的肖像挂在各种神圣的礼堂大厅；甚至有可能，你只是想清算自己的过去而已，报复每一个曾断言你定将一事无成的人。

当然，这些理由你一条也不会想告诉别人。在政界，说话率直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会告诉别人的一定只是：你想改变世界。你相信自己的经历让你有资格担此重任。这种表达上的迂回不仅是民主的礼节，更是对人民主权仪式性的致敬。虽然人们可能会怀疑，你想改变的只是自己而非他们的生活，但他们仍然希望听你亲口说：你正是为了他们才决定从政。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掩饰或许也有其独特的作用。一开始的伪善，最终可能会演化为政治家的第二天性。从最初装出一副为民服务的姿态开始，久而久之，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最终真的在践行承诺。当然，你起码要有一些基本的公仆意识，否则你必然无法在政治的夹缝里生存下来。有时，政治家真是份吃力

不讨好的工作，要是心里再没有一丝一毫的使命感，你就只能逐步沦为一介草夫，还不自知。

当我开始考虑是否要接受那三名“黑衣人”的提议时，我必须首先想清楚自己参选总理的初衷是什么。没错，让我出任总理就是他们提议的核心。如果我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我就要回到家乡，参选议员，再待时机成熟后，出面角逐总理宝座。可是，我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做总理？我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使命感，而且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动机去做个高官。对我而言，回国从政吸引力最大的部分，就是可以不用再做一名观众。我一直以来都坐在观众席里看着场上的比赛，现在也是时候亲自上场了。你当然能够这样告诉自己，但不能这样告诉那些你想争取他们支持的人。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不久后的一次教训让我从此记住了这个道理。2006年夏天，正参选自由党领袖的我出现在鲍尔集团（Power Corporation）的白色宴会厅里，应约和蒙特利尔商界人士会面。在场的一位商业领袖问我，能否用简短的一两句话解释一下我参选总理的初衷。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意外。我回答说，这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拿下这个挑战。

身处政界，没有什么会比将真相脱口而出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了。我还记得，当时我话音刚落，整个宴会厅便霎时被一阵寒意笼罩。在场的都是生意人，这些商业领袖不会对资助我参加什么生存挑战有任何兴趣。他们意欲支持的，是一个有希望赢得大选，并且会在胜选后赋予他们权力的人。

当时我就知道，自己答错了这道关于我从政初衷的基础题。此后，当登顶的征途从冒险之旅开始转变为求生之旅的时候，我才明白关于这道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是何等重要。相信我，

只有外行才会给出这种拿下生存挑战的理由，因为我就曾被这样指责过。

我记得在2009年9月到12月间，作为党领袖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错，我的手下看着我们不断下跌的民调惊慌失措到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但我们仍然要设法应对媒体不留情面的追问。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必须在众议院质询时段（Question Period）[1] 与眼前那个自以为是的政府对峙，可我却总是拿他们没有丝毫办法，这让我感到万分煎熬。所以，每次质询时段开始前，我都会先冲到盥洗室，看着镜中的自己，强迫自己接受这份工作，强迫自己相信我能够胜任，告诉自己不能就这样当场认输。那时，巧兰常对我说：你还不够想要这份工作。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我已经想不起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才想从政的。正如其他任何困难的工作一样，你都会遇到这种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胜任的时候。每一次犯错似乎都让无法胜任的质疑得到印证，你的自信心也会因此屡屡受挫。但也正是在这种时候你才会明白，如果你想熬到目标达成的那一刻，不管你决定要得到什么，你都不能忘了那个一开始驱使你的原始冲动。所以，你最好别忘了。

政治比其他任何我所了解的职业都更适合用来考验一个人的自知之明。这一路风雨兼程让我意识到：你为何想成为一名政治家这个问题，其实就等于，你是为了谁 才想成为一名政治家。就我来说，我究竟是为了谁 ？

在雄心根植的那个原始层面上，你想要拥有某些东西，是为了那些使你成为今天的你的人。对我而言，我从政为的是我的母亲艾莉森与父亲乔治，因为我相信如果他们还在世，一定会希望我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当然，这只是猜测罢了，因为他们早在

我投身政治前就已经去世。我想，他们对我的影响并非来自对我该怎么走人生道路的强制要求，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独特的人生历程。比起内生的自我创造，我的政治理想更像是传承了父母的衣钵。早在19世纪，伊格纳季耶夫一家便因效忠沙皇而被封为贵族，享有声望。我的曾祖父早年曾被沙皇派驻君士坦丁堡，出任沙俄驻奥斯曼帝国宫廷的使节。1882年，他出任沙俄内政部长，负责重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Czar Alexander II）被刺杀后的国家秩序。然而，他的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最后只能在自己位于乌克兰的庄园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0年，为失去了沙皇的信任以及他原先为国家制定的所有计划付诸东流而闷闷不乐。他的儿子，我的祖父保罗起初负责打理家族在乌克兰的庄园，后来沿着帝国的官僚系统一路晋升为农业部副部长，并最终成了沙俄末代皇帝尼古拉斯二世（Czar Nicholas II）内阁的教育部长。之后的俄国革命将他赶出了俄国，起初他流亡到英国，后来才到了加拿大。他与我的祖母纳塔莉在魁北克省墨尔本上城的一个村舍里度过了生命里最后的一段时光，两人最终被安葬在俯瞰圣弗朗西斯河的长老会墓园（Presbyterian cemetery）里。[2]

我的父亲乔治虽是兄弟五人里的老幺，却是最有雄心壮志的一个。当整个家族因为处境艰难从英国搬来蒙特利尔时，父亲只有16岁。搬到加拿大后的第一个夏天，他便离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在库特尼峡谷（Kootenay Valley）为一个铁路公司铺铁轨赚钱，期间也逐渐学会了喝酒、骂人和伐木。等他在1928年夏末回家的时候，已然成了一个皮肤棕黄、肌肉强健的加拿大人。后来，他到多伦多大学求学，成绩优异的他在毕业后获得了罗德奖学金（the Rhodes Scholarship）并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继续深造，彼时正值1939年“二战”爆发之际。40年代初，他完成学业后离开牛津前往伦敦，在位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加拿大别

墅（Canada House）[3] 为加拿大政府工作。那时27岁的他，身处正遭德军狂轰滥炸的伦敦，担任文森特·马西（Vincent Massey）的私人助理。作为马西·哈里斯·弗格森农机公司的继承人，文森特当时正任加拿大政府驻英国高级专员。在那枪林弹雨的四载时光里，父亲负责起草马西的信件和电报，安排他的行程，有时也会陪他一同到白厅（Whitehall）[4] 与内阁大臣和将军们会面。从1940年的敦刻尔克（Dunkirk）大撤退到1942年美军抵达英国战场，加拿大军队是当时不列颠群岛上一支至关重要的防卫力量。加拿大在当时的角色很关键。因此，在那样一个时间点上，以加拿大外交官的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虽然危险，却也荣耀。我的父亲正是在那位一丝不苟又自视甚高、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的传奇领袖的手下度过了自己的学徒期。

那时与我父亲共事的，还有一位魅力出众的外交官，他便是后来成了加拿大总理的莱斯特·B.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1940年到1941年间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他和我父亲轮流在加拿大别墅的房顶上值夜，观察交火形势。一旦看见特拉法尔加广场附近出现炮火，他们便会立刻致电当地民防部门告知情况。敌人发动猛烈突袭的那几次，他俩被迫从房顶撤至地下室，在黑暗中蜷缩在一起，任由一旁破裂的管道里淌出来的水浸湿他们的鞋子。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一场激烈的突袭刚刚过去，他们亲眼看见方才被袭击的白厅办公楼的窗户里，飘出了一张张烧焦了的文件。皮尔逊当时说了一番话，据我父亲后来的回忆，他的大意是："文明哪里经受得住如此摧残，我们必须设法阻止。"[5] 至少我父亲认为，皮尔逊在战后对联合国大力支持的念头便是从这一刻萌生的。

同样在战时的加拿大别墅，我的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艾莉森

·格兰特（Alison Grant）。她是文森特·马西的侄女，马西的妻子爱丽丝·帕金（Alice Parkin）是她的姨母。我母亲在1938年来到伦敦，在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求学。当时22岁的她还在为英国军事情报机关军情五处（MI5）工作，出任打字员和秘书。

我母亲一家与伊格纳季耶夫家族同样志向远大、热心公益。我的外曾祖父乔治·帕金（George Parkin）是新不伦瑞克省的一名教师，凭借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培育英才的能力成为管理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的罗德基金会（the Rhodes Trust）的创始秘书。我的另一位外曾祖父，乔治·门罗·格兰特（George Monro Grant），曾是一支铁路勘测队的秘书，这支由工程师桑德福·弗莱明（Sanford Fleming）带领的勘测队曾在1872年夏天一路往西，勘察从落基山脉（Rockies）直通太平洋的耶洛黑德公路（Yellowhead Route）。[6] 从酷热的7月到初雪的10月，他们划着独木舟，乘着火车和汽船，骑着马，最后又坐着红河推车（Red River cart）[7] ，从大西洋沿岸来到太平洋沿岸，成为加拿大建国五年来第一批在陆地上穿越这片土地的人。当他结束这段旅程回家后，便写下了《从此洋到彼洋》（*Ocean to Ocean*）一书，他在书中不仅描绘了沿途所见雄伟壮丽的风光，还憧憬了这片土地未来的美好前景。如果你的成长过程中，书架上也有这本《从此洋到彼洋》相伴，想必你也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来自一个建国者的家族。

格兰特一家也有不少与总理有关的故事。约翰·A.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那位通过贿赂、胁迫和各种粗鄙的政治手腕执掌国家机器直到1891年去世的保守党领袖——曾是金斯敦（Kingston）当地的一名议员，而我的外曾祖父就曾在位

于金斯敦的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担任校长。常被金斯敦当地居民亲切地称作乔迪·格兰特（Geordie Grant）的外曾祖父，曾对麦克唐纳的很多做法深感不安——比如他从铁路修建者那里敲诈钱财来充盈保守党钱袋的做法——并毫不犹豫地将他的顾虑广而告之。两人垂垂老矣之际，曾在金斯敦的一次聚会上相遇。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走到外曾祖父跟前半开玩笑地问他："乔迪，为什么你从来都不是我的朋友？""我曾是你的朋友，约翰爵士，"外曾祖父尖酸地回答说，"在你做对了事情的时候。""我要这样的朋友有什么用！"[8] 这头老狮子吼道。

正是这些故事驱使我在困难的时候迎难而上。政治是一个大舞台，是一个既可以让你自己度过有意义的一生，也可以让你继承家族使命的舞台。政治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决定从政，既为了我的家族，也为了我自己。

但我现在要向你们承认，以上这些故事仍然不是"你为何选择从政"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你不可能奉父母之命才从政，所以这么回答也会是个政治错误。任何关于从家族那里承袭权力的念头在如今的政治中无疑都是致命的。民主最美妙的部分就在于——或者应当在于——你必须亲手争取每一样东西，亲自去争取每一张选票。我深知不应觉得自己天生就有从政的权利，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才行。然而，当我在考虑是否要接受那三位曾在10月的夜晚与我共进晚餐的男士的提议时，我来自一个对于公共生活有着强烈使命感的家族——这个事实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当我的母亲在为军情五处工作时，她曾和一位脾气刻薄、身材娇小的温尼伯人（Winnipeg）凯·穆尔（Kay Moore）同住在南肯辛顿沃尔顿大街54A号楼，凯后来冠了夫姓金佩尔

（Gimpel）。1942年末到1943年初，她们曾把一个房间和一张床借给两个加拿大人弗兰克·皮克斯吉尔（Frank Pickersgill）和约翰·麦卡利斯特（John Macalister）住，他们加入了特殊作战执行部（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即将空降在法国的领土上加入与德国占领军战斗的抵抗运动中去。1943年6月前的数月，我的母亲和弗兰克走得很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有多近——直到他有天晚上离开了住处，后来随降落伞落在了巴黎南面的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的一处降落点。几乎就在两人降落的同时，他们就被出卖了，被直接交到了盖世太保的手上，随后便被关进了集中营。之后的两年，我母亲和凯都在等两人的音讯。特殊作战执行部让他们想了一些只有弗兰克和约翰能理解的暗号——比如“54A号楼里俄式茶炊的水开了”——看他们是否会通过无线电报回信，但之后收到的那些回复似乎都并非出自弗兰克和约翰之手。事实上，当时德军在同他们玩电波游戏，企图误导特殊作战执行部，使其相信他们两人仍然充当着特工的角色。我的母亲和凯开始恐惧最糟的情况是否已经发生。直到1945年春天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9] 解放，两人才知道弗兰克和约翰在历经了长期的折磨后，早在1944年9月就被杀害了。[10]

1945年4月，我母亲写了一封信给弗兰克的兄弟杰克。我在信中仿佛听见——孩子很少能听见母亲以这样的口吻——她在亲口诉说着自己年轻的希望和梦想：

> 我知道（弗兰克）在英国的那些日子是快乐的——他的生活很充实，我们也被他所创造的无拘无束的爱情与欢愉深深吸引，和这些比起来，现在失去的又算得了什么。

他用他的幽默风趣、广博的兴趣和爱人之心将我们紧紧地黏合在一起。他的存在为我们设立了生活的标准。我清楚地知道，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阻挡他的脚步。直到他出发的那天，他都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非去不可。他的离去不只是我和其他深念他无可替代的诸位的个人损失。他的果敢、无畏，还有他非凡卓越的想象力不仅在战时不可或缺，在战争结束后的今日同样如此，我们都应以他为楷模。

然而，他的生命并没有被白白浪费。正如许多他在这里的朋友告诉我的那样，我感到他将那股正义凛然的精神和绝不妥协的信念留给了我们。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向我们彰显了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而我将永生铭记。

1945年秋天，我的母亲从战场回家，与我父亲成婚。尽管她几乎从来没有主动提及过弗兰克，但在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弗兰克却好像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50年代，我们在渥太华郊区的住所离弗兰克兄弟杰克的家仅相隔一个街区。比起我们，弗兰克当然更是他们的一员，但我们也同样珍惜和他有关的那些回忆。

战争结束后，我的父母在加拿大外交系统内一路晋升，我们兄弟两人也跟随他们的脚步常年旅居海外，逐渐在华盛顿、贝尔格莱德、伦敦、巴黎、日内瓦和家乡渥太华等地长大成人。我的父亲曾为数位总理效力，其中也有莱斯特·皮尔逊，对他而言莱斯特永远是当初的迈克。[11] 20世纪50年代的渥太华，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皮尔逊先生有一次在外交部组织的野餐会上玩起了棒球。我父亲当时在外交部任职，而皮尔逊先生

是外交部长。那是一个郊区学校的棒球内场，皮尔逊先生身着衬衣、打着领带，站在击球手的位置上。只见他击球后便径直向一垒跑去，站上垒包后便转身朝所有正忠诚地为他欢呼着的下属投来一个欣喜的笑容。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我的父亲受命组织了一支苏伊士运河区域的维和部队，这一行动后来帮助皮尔逊赢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0年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时，皮尔逊成了总理，而我父亲则成了加拿大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我的父亲是联合国第242号决议的起草者之一，时至今日这份决议仍然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相处起着奠基作用。

1973年1月，在皮尔逊的葬礼上，我的父亲是其中一位抬棺人。他亲手把皮尔逊送到了他位于魁北克省韦克菲尔德的长眠之地。就在我踏入政界前不久，我还曾来此拜谒，以致敬意。皮尔逊被安葬在两位生前好友身旁，他们在世时也都是虔诚的人民公仆——诺曼·罗伯逊（Norman Robertson）与休姆·郎（Hume Wrong）。皮尔逊、罗伯逊和郎所代表的是一个加拿大政府和公共服务史上的黄金时代。他们穿着朴素，以令人敬畏的智慧行事，以严谨的工作准则要求属下。他们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诚实守信，在财政上作风保守，在政治上开明自由，以一种悄无声息又富有加拿大特色的方式践行着爱国主义。他们的那个世界便是我所坚信的世界，是我成长过程中始终想要追求的典范。正如我之前所说，你是为了那些使你成为今天的你的人，才会想要拥有某些东西。在我回国从政之前，我从未想到那个由他们构筑起来的自由世界、那个他们创造的加拿大，早已不复存在。

我父亲所向往成为的正是那种理所应当地认为政府应该成就伟大事业的人。1956年布达佩斯发生反共示威后，父亲便和时

任移民部长的杰克·皮克斯吉尔（Jack Pickersgill）一起，帮助数以千计的匈牙利难民离开难民营，到加拿大来寻找新的生活。那是一个自信的大国才会有的大动作，我的父亲也因为自己帮助那么多人重获自由而感到自豪。这种宽厚的雄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加拿大政治中十分常见。当时，欧洲和北美的自由主义政府正着手重建社会秩序，为此后30年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启动了州际公路系统建设和国家太空计划，而加州的民主党州政府正在建立日后将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楷模的加州公立大学体系。在加拿大，自由党领导的政府建成了国家公路系统和圣劳伦斯航道（St. Lawrence Seaway），并已募集到资金准备建设崭新的大学校园和国家科研机构，比如当时建立起来的乔克里弗核设施，让加拿大成为全球医用同位素生产行业的领军者。当时决策者的理念是，只有一个富有远见的政府才能将整个国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后来，等我的年纪长到可以参与家庭餐桌谈话时，我迫不及待地和大家分享了我的这个想法——或者说幻想——只有一个在如我父亲这样的人的管理下的好政府，才是解决国家面临的任何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的父亲热爱政府的公职，但他始终坚持与党争划清界限，从他讲述的那些故事里，几乎看不出他作为政治家和公务员之间有什么区别。他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1944年，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和妇女组织“帝国之女”（Daughters of the Empire）会面时，他曾在一旁做会议记录，该组织担心色情作品，比如蓓蒂·葛莱宝（Betty Grable）的海报和其他更过火的东西，会削弱当时正从荷兰一路攻向德国的加拿大军队的士气。当时，金的办公室里坐着十几位女士，她们轮番阐述着此类色情作品的不良影响。金耐心地听完每个人的发言后，起身走到她们面前，肃穆地与她们一一握手，并称自己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如此

重要的会面。这些女士离开后，总理办公室即刻安静下来，父亲清了清喉咙，问金先生他希望针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行动。“回去工作，”总理一边气冲冲地说，一边挥手示意父亲离开办公室。金高超的掩饰本领让父亲当时惊叹不已。这似乎也是政治生活的本质，但父亲坚持与之划清界限。

当我终于在2009年出任反对党领袖时，才发现我那间在议会大厦三楼转角处用实木墙板装饰的办公室，原来曾在“二战”时为金总理所用。每当我坐在办公室的那张椅子上，脑海中便会浮现出65年前我的父亲坐在这间办公室的角落里，弓着身子用膝盖上的记事簿做会议记录的场景。隔壁那间用镶板装饰的长条形办公室则是金总理的战时内阁开会的地方，那间屋子的门上刻有两句话：“敬畏上帝”（Fear God）与“荣耀我王”（Honour the King）。每每走进那间屋子，我便会感到那段历史似乎在告诫当下的自己振奋精神，直面挑战。

18岁时，我曾赢得过一次安大略省即兴公共演说比赛的冠军，当时多伦多一家叫作《环球邮报》的报社采访了我，还给抱着奖杯的我拍了张照片。当时，当被问及自己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时，我脱口而出：“我想做总理。”

回溯过往，我似乎还是那个60年代的孩子，或许还是个孤儿，被今日看来已是遥远回忆的那段政治往事影响着的一个孩子。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1年1月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只有14岁。我记得，当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肯尼迪的就职典礼上磕磕巴巴地朗诵着他的诗作时，一旁年轻的总统特意向前站了一步，用身体为垂暮的诗人挡住了诗稿上刺眼的阳光。我和学校里的同学们也曾乐于模仿肯尼迪的波士顿口音，还学过他那左手插在夹克衫口袋

只露出大拇指的经典动作。到上加拿大学院（Upper Canada College）求学后，有一天，一个朋友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凑到在我耳边小声说："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肯尼迪总统被人枪杀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刻自己站在楼梯井里的什么位置。

这位倒下的总统曾经塑造了我们这代人的政治理想。这份使我感同身受的政治热情在我朋友们的身上同样存在。李博是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同窗好友中最为聪明的一个。他的父亲索尔与我的父亲在30年前也在同一所学校求学，互为学业上的对手和生活中的好友。我最初遇到李博时，发现我俩除了以上背景之外，还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我当时注意到，他每次站在舞台一侧等待上台发言的时候，都会把左手放在口袋里，只露出大拇指。

我们入学多伦多大学的时候，正值全美大学校园兴起一阵反对"越战"示威宣讲热潮，这股热潮正在北上向加拿大校园蔓延。当时，与杰夫·罗斯（Jeff Rose）和李博一样，我也加入了反对"越战"的政治活动。除了帮忙组织了一场有关"越战"的辩论会外，我们还参加了反对为战争制造凝固汽油弹的陶氏化学公司的校园招聘的静坐抗议。此外，我也为自由党在1965年秋季的选战出了力，挨家挨户地为寻求连任的出色议员马尔文·盖尔伯（Marvin Gelber）拉票。他的竞争对手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是加拿大新民主党（Canadian New Democratic Party）的领袖，比起自由党，他们是立场更为左倾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是我参与的第一次选战，我很享受在竞选办公室、区域活动室和拉票团队中的工作氛围。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场选战，但我们的候选人还是输了，我的首次自由党选举经历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1968年初，作为多伦多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在圣劳伦斯大厅（St.Lawrence Hall）见证了当时还是皮尔逊内阁司法部长的皮埃尔·特鲁多宣布竞选自由党领袖（此前不久，皮尔逊先生刚刚宣布从这一职务上卸任）。我从未像当时那样，觉得自己被一位政治领袖的非凡魅力所笼罩。特鲁多是一位法学教授，一位前不久才将家乡从天主教会的流毒和莫里斯·迪普莱西（Maurice Duplessis）反动政府打压工会的恶行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特鲁多难以捉摸的魅力让我深深着迷，但最让我着迷的还是他为人的真实，以及为了在纷扰的宣传和政治活动中保持真我而展现出来的那份努力。然而，如今看来，他刚上任时的表现常常是业余甚至做作的。他挣扎着一边企图控制那些被他亲手解除了束缚的势力，一边又想保留内心那个好自省的本我。40年后的今天，我才发现当时正憧憬进入权力巅峰的我受到了特鲁多决定性的影响。直到快50岁时，他才从大学的教室里一脚踏入政界。既然他能行，我为什么不行？我这样想着，虽然我绝不可能是特鲁多的翻版。

特鲁多如此让我着迷的原因还在于，他可以一边坚决反对安抚魁北克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边又一腔热诚地向魁北克人民承诺把他们带到国家公共生活的舞台中心。正因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为了谁而从政，他才能成为这么一位鼓舞人心的政治人物。我们当时都很确定，他是为了我们这代人在奋斗。

1968年4月，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Liberal Convention）在渥太华会议中心召开。第四轮投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刻，我仍在说服那些立场摇摆不定的与会代表选择支持特鲁多。我亲眼看着刚刚当选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并可能会借此成为下一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投票支持他的欢

呼雀跃的人群挥手致意。

为了早日就任，他几乎立刻便宣布参选总理。我作为一名全国青年组织者，也随即坐上了他的专机和他一起四处奔波，直到他1968年6月首次赢得大选。他是那种领袖人物：在机舱里四处走动，坐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身旁，询问我手上正读着什么书。我仍然记得，我当时在读的是一本维也纳建筑家维克多·格伦（Victor Gruen）所写的关于城市规划的书。[12] 当飞机翱翔在北美大草原上空时，特鲁多就坐在我身边，听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叙述着这本书的大意，同时用冷峻的眼神打量着我。飞机一降落，他便坐进了车队里领头的那辆轿车直奔目的地，而我则钻进了队尾的行李车紧随其后。除了充当人墙，阻止人群过于靠近，我在那些活动上就没什么其他的工作了。我之前从没见过可以与当时达到顶点的特鲁多热（Trudeaumania）相提并论的疯狂场面。在他和民众互动的时候，人们会紧紧攥住他的手，年轻的姑娘们则会尖叫，甚至试图亲吻他。这种狂热的情绪可以迅速蔓延到整个群体，这让在一边旁观的我兴奋不已。

同时，1968年的夏天，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领导的反约翰逊总统和反“越战”的运动也出现了一幕戏剧化的高潮。1968年2月，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得票数量直逼约翰逊。多亏了众多支持麦卡锡的青年人，他最终成功迫使约翰逊退出了总统选举。当时即将迈入21岁的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竟然也能在政治上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由此感到无比兴奋。

然而，兴奋和对年轻人力量的初步体察并不是我们当时心中唯一的情绪。绝望和恐惧同时在我们心中逐渐发酵。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孟菲斯遇刺身亡。

前一晚，他做了此生最后一次布道，并且用他那使人焦虑不已的预知力，告诫人们自己或许会像摩西一样，无法和追随他的人们一道亲眼目睹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的出现。金遇刺当晚，正在积极备选的罗伯特·肯尼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停下了脚步，随即将这一消息通报给了当地的黑人群体。在一片暮色中，他努力抚慰着那些沉浸在痛苦与愤怒中的人们。他用自己轻柔的波士顿口音安抚着大家，告诉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一个好兄弟，同时告诉刺杀者，大家应一同为他哀悼，并像诗人埃斯库罗斯所教导的那样，学会“忍受上帝那令人生畏的恩典” [13] 。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这些有关政治应该如此的超凡范例对我的启发有多么深远。两个月后的1968年6月4日，当我乘坐特鲁多的专机在安大略省萨得伯里（Sudberry）附近上空盘旋时，机长通过机上广播告知了我们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一家酒店的房内厨房中遇刺的消息。当晚，肯尼迪刚在民主党加州初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一刻对我内心的冲击，时至今日我仍难以忘怀。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突然震惊地发现，原来我们亲身践行着的政治生活，除了可以给我们带来兴奋外，也可以带来暴力和不可估量的损失。

肯尼迪遇刺三周后，圣让巴普蒂斯特日（St. Jean Baptiste Day） [14] 如期而至，皮埃尔·特鲁多也出现在了蒙特利尔市中心大游行的观礼台上，当时距离大选仅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作为那个年代崇尚联邦主义政治家中最重要的一位，特鲁多在家乡魁北克可谓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发泄怒气的目标。游行现场，从讥笑着的分离主义示威者手上扔来的瓶子和啤酒罐如雨点一般砸在他的周围，让一旁的安保人员不得不尽力将他拉回安全的区域，而特鲁多当晚表现出的勇气则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相机捕捉到的那个场景。当他一把推开安保

人员阻止他继续向前的双手，独自站到愤怒的人群面前时，他那不加掩饰、毫不妥协的政治意志表露无遗。

一周后，他在选举中获胜，他的办公室随后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哈林顿湖居（Harrington Lake）做客。那是位于渥太华郊外加蒂诺丘陵（Gatineau Hills）、专供加拿大总理居住的乡村居所。珍妮弗·雷（Jennifer Rae），一位在特鲁多辅选团队中任职的相貌出众、美丽动人的幕僚，那段时间一直陪伴在特鲁多左右。她是我大学同学李博的姐姐，或许请我来此作陪正是她的主意。刚当选总理职务不久的特鲁多和珍妮弗看上去好像都不太适应这座坐拥湖景，却布局杂乱、风格老旧的乡村居所。那段时间，我们三人会跳进水里从船坞处向远方游去，也会讨论各类书籍和各种与政治无关的话题。我现在还能记起，当时我感到疑惑，是否是特鲁多对这个此生中获得的最大胜利有些无所适从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就好像他突然意识到，进入政坛仅仅三年就一跃成为一国的政府首脑似乎是一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一样。当时的他不爱说话，有些孤傲，正试着唤起内在的决心来面对前路的挑战。我好似瞥见了一眼荣耀背后的代价，一种即便是最无畏的人也会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感。

那是我在他执政期间最后一次见到他。我的父亲后来继续在他的手下出任大使，特鲁多偶尔也会向父亲咨询在外交事务上的建议。1978年，当特鲁多正在寻觅一名新的总督（governor general）——加拿大元首和女王在加拿大的代表人选时，他曾表示，我父亲是他心中的头号候选人。我的父母为接任这一职务做了好几个月的准备，除了在女王访问加拿大期间伴其左右，还积极学习王室规章和礼仪。我母亲的姨父，同时也是我父亲踏入职场后的第一位上司，文森特·马西曾出任总督。我父亲一旦上

任，则会成为史上第一位来自移民家庭的加拿大总督。这一任命决定后来不知怎么被媒体得知，这倒也并不出人意料。但是，为了讨好西部的选民，特鲁多却在最后一刻改了主意，最终任命曼尼托巴省前省长为新一任总督。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特鲁多也不例外，他最终还是输了1979年的大选。另一方面，我的父亲也因此几近崩溃，我弟弟记忆里唯一一次听见父亲哭泣就是在那个时候。

之后看着父亲逐渐恢复的那几年，或许是我平生接受的最早一次弹性教育。他重新站了起来，整理自己受挫的理想，然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高尚的十年岁月——出任多伦多大学名誉校长的同时，照料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父亲曾有一次对我说，失败是发生在他身上最美好的东西。

很久以后，当特鲁多远离政治后，我曾在伦敦见过他一面，到了90年代初，我们甚至有一次共同出现在镜头前，有些不自然地讨论着他新写的关于安提戈涅和政治冲突悲剧的文集。[15]我们在交谈间并没有提起我的父亲，他那时已经去世了。

回顾我在特鲁多手下工作的那段经历，他本人对我的影响已经强烈到我觉得必须把自己从他的引力场里拉出来才行。那年夏末，我离开了渥太华，到哈佛攻读研究生。当时我一无所长，也没有准备好继续留在渥太华给哪位部长做幕僚。但无论如何，那段能被邀请到哈林顿湖居做客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层层叠叠的官僚体系已将我和我尊敬的领袖隔绝开来。当时的我才21岁，离开渥太华去充实自己的头脑恰逢其时。我花了整整37年的时间才又一次回到政坛，我希望这次我准备好了。

我的父母、特鲁多和皮尔逊的故事，还有美国的肯尼迪、麦

卡锡和金——那些悲伤又发人深省的回响——共同塑造了我的理想，驱使我投身政治。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遗传和家史都不代表宿命。我的弟弟安德鲁比我小三岁，他同样也是这部家史的继承者，和我度过了完全相同的60年代，但他却完全没有参选公职的想法。相反，他觉得我是疯了才会这样置家族的良好名誉于不顾。正如家族的神话当初选择了我一样，我似乎也注定要承担起延续家族神话的重任。所以，当那三位陌生人来邀请我回国从政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等了他们一辈子。

他们当时描绘的家乡的政治图景无疑令人忧心。由保罗·马丁执掌的自由党政府不久前刚以微弱的优势在2004年的选举中与败选擦肩而过，已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当权者之间的内讧和发生在魁北克的财政丑闻更是让党的名誉大为受损。马丁是一个正派、有原则的人，他奋斗了整整20年才成功登顶出任总理，可是不论对错，现在他却表现出了一副茫然不知的模样。他曾是一名强硬又极富远见的财长，可是，后来成了总理的他却被人讽刺为“犹豫先生”（Mr. Dithers）。和英国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一样，保罗早早便谋划好了登顶之路，但这好不容易坐上的总理宝座看来也快坐到头了。自由党已全然失去招募英才的能力，在西部或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支持者极少，甚至为零。马丁的前任让·克雷蒂安执政的11年后，自由党已经黔驴技穷。他们邀请我登上的，正是这艘朝着礁石撞去的巨轮。

我这几位政治上的新朋友觉得是时候给这艘巨轮换一名新船长了。我在他们口中被描绘成了一副十分招人喜欢的形象：一名具有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公民，不但有着可追溯到皮尔逊和特鲁多时期的政治经历，而且能言善辩，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作为一名局外人，我和正将自由党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内部斗争没什么

瓜葛，也和正把党拖入泥沼的魁北克财政丑闻没有任何关联。我该好好考虑他们的提议吗？

鉴于当时的情形，我本应问他们一些更为尖锐的问题，比如我们该如何赢得下次选举？我又该如何带领一个在过去十年得票数不断下跌的政党走向复兴？我当时一定是在心中假设这是个“天然的执政党”，必定会有人来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我们仍然是整个民主世界中最成功的执政党，所以才没把这些问题问出口。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由党的执政地位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当掂量手中的各种选择，我就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在美国的政坛有所作为。我不是美国公民，也无法说服自己去申请一张美国绿卡。当时，我的同事兼好友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即将离开肯尼迪学院，准备为伊利诺伊州（Illinois）出身的新晋年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效力。我知道如果我继续留在美国，永远只能站在场外围观。我要是有意参赛，就必须回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共和党人——近期刚经历改革的、由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领导的加拿大保守党——很显然，哈珀的从政颠覆了所有我一向坚守的政治理念：强化作为国家脊梁的共同公民身份（common citizenship）的国家计划，所有加拿大公民的平权，以及以独立自主与国际主义为两翼的平衡外交战略。在他人的国家，我或许永远只能做个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察家，但在我自己的故乡，我却有机会成为一名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家。这道选择题的答案似乎已经昭然若揭。

我继续质问自己，我该如何克服自己显而易见的劣势？多年以来，我早已习惯在加拿大和美国间来回穿梭，写作、教书、拍电影、做讲座，但是，我既缺席了80年代宪法之争，也没有参与

1995年那场令人窒息的魁北克独立公投。要知道，倘若你没能在国家深陷泥沼时伴它生死与共，就别想在日后谋求一官半职。我担心自己会因当初的缺席而在选举中被大家指责。可是，我所有关于政治的信念仍然全部来源于加拿大。我一直视我的祖国为人类社会中彬彬有礼、宽容大度、积极参与国际交往的典范。我当时一定是觉得，心里这份对家乡纯粹的浪漫主义情怀应该能弥补自己常年旅居国外的遗憾。

我还曾考虑再三，如果回国参政，我该怎么向人民讲述我的故事。讲故事是每个政治人物不得不做的功课。对于每个参选公职的候选人而言，设计、控制并使大众接受你的故事就是他们最核心的任务。对我而言，我必须把自己明显的弱势——旅居国外多年——转化为优势才行。要这么做就只有一种可能：给我的故事贴上“返乡”的标签。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故事之一：浪子回头。《圣经》里，那些迷途知返的人不是都会得到众人的宽恕和拥抱吗？

落笔至此，我想读者们完全有理由对我在寻找从政动机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自吹自擂、妄自尊大感到厌烦。对此，我所能辩解的是，适当的自吹自擂对一个政治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你包装自己是为了让公众更加了解你，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还有谁会这样做呢？

起码于我自己而言，“返乡”的想法是真情实意的。无论我身在何处，对我来说，家永远都是乔治亚湾（Georgian Bay）沉船岛（Wreck Island）上海伦姑母的小屋，迪马叔叔和弗洛伦斯婶婶在魁北克的农场（现在为基南一家所有），以及我们家在多伦多的那栋有三个卧室的房子，还有最重要的，魁北克上墨尔本那片墓地，我亲爱的家人都长眠于此：我的祖父保罗伯爵、祖母纳

塔莉伯爵夫人、父亲、母亲，还有我所有的叔叔和阿姨。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会来这里常伴他们。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早在“黑衣人”劝我回国参政之前，我便开始花更多时间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我开始在班夫教书，因此我的孩子们一到夏天便能在落基山脉间骑马、漂流，我还开车带着巧兰游历全国，让她得以近距离感受大草原天高地远的壮阔。此外，我还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担任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s）的主讲人。在我当时所做的一系列题为“权利革命”（The Rights Revolution）的讲座里，我试图这样定义加拿大政治的独特性：我们的法律既不允许死刑，也不允许公民持有武器；我们坚信保护法语和用原住民语言给土地命名是人民的集体权利；我们坚信女性普遍享有做任何选择的权利；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双语实验，这个决定时刻面临各方压力，作为一种真实的生存状况，要求我们去尝试理解他人、求同存异。[16] 美国人可以经得起红蓝分色的党派纷争，但我们不行。我窃以为，妥协的艺术已被深深嵌入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

我一生都在做一个快乐的国际公民，但我也知道，旅居国外的代价正不断增长。当你旅居异国他乡的时候，你最后一定会砰的一声撞在一扇玻璃门上，而那扇门后则是一块只为本国人保留的地方。你会发现你虽然能够理解当地人口中的话语，却从未真正懂得其中的内涵。虽然我所到之处，人们都会热烈地表示欢迎，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另外，侨居国外实际上也是搭别国政治便车的一种形式，正如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只是那些拥有别国护照者的特权一样。我手上的这本护照来自加拿大，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2月，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策划回

国。这段时间里，“黑衣人”当初承诺组建的辅选团队逐渐有了雏形。与其说是我挑中了这些精兵良将，不如说是我被他们选中了。我有一次飞回多伦多，发现自己处于这些专业政治精英的考察中，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想知道我是否有两条能够站得稳的“腿”。在决定加盟辅选团队之前，几位年轻的法学院学生——比如萨钦·阿加沃尔和米尔顿·陈——就我在同性婚姻问题（我持支持立场）上的立场向我发问。那一年里，我还在午餐桌上结交了参议员戴维·史密斯和前省长戴维·彼得森（David Peterson）等党内大佬，以及为自由党筹款的埃尔维奥·德尔赞托等人。此外，我的邮箱里开始不断涌入由如亚历克斯·马泽（Alex Mazer）、苏吉·乔杜里（Sujit Choudhry）和迈克尔·帕尔（Michael Pal）等年轻的政策幕僚编制的一本本厚重的医疗、能源、就业等领域的政策简报。在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政策简报的同时，只要想到自己或许能就这些年轻的研究员摆在我面前的种种问题有所作为，便会感到十分振奋：对一个崇尚平等主义的国家而言令人发指的收入分配不公，持续疲软的制造业，对一个全球重要能源生产国而言缺失的国家能源战略，选民和政治体制之间日益严峻的疏离，存在已久的法语人口与英语人口的团结问题，以及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断加大的城乡差异。我认真研究了上述议题后意识到，我必须更为深入地认识这些问题的实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政治上的知识储备和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储备之间的不同之处：用心而非头脑去接纳一个议题，还要知道哪项事业最适合用作你在战场上的口号。

2005年3月，自由党在渥太华召开了两年一次的政策大会，而我的竞选团队则成功地说服了党主席麦克·埃泽格（Mike Eizenga）邀请我在数千名党代表面前做一场主题发言。我还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我用这番话开始了我的演讲：“在我

所工作的美国，民主党仍是在野党；但在加拿大，民主党是执政党。在那里，做一名自由党人是个沉重的负担，在这里，做一名自由党人则象征着一枚荣誉的勋章。”

话音刚落，在座的党代表便伸出双手为我鼓掌。被他们的回应所感动，我便向各位代表坦言自由主义对我的意义。我告诉他们说，我母亲与他人分享的每一块蛋糕，都满载着慷慨与宽容。自由主义应当永远与宽容紧密联结：宽容的心、宽容的精神、宽广的想象力和视野。我最后说道：

> 宽容不仅仅是张开双臂对陌生人表示欢迎，更代表着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它意味着互相信任，不计成本地互相帮助，共同承担风险。宽容让我们的心彼此敞亮，共同畅想更加美好的未来。长久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直如此，而这个党的任务便是让我们的祖国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宽容、团结、主权、公正，以及选择的勇气、执政的意志——这才是指引自由政治前行的灯塔所在。[17]

演讲一结束，欢呼着的代表们便将我簇拥起来，大家争相与我握手，手机闪光灯在我眼前闪个不停，一旁的媒体则焦急地等着要采访我。我的老朋友格雷厄姆·弗雷泽（Graham Fraser）也和大家一起簇拥在我身边，并在我耳边轻声说了句：“精彩的发言。”我想，那一刻他或许已经意识到我是下定决心要迈出这一步了，所以他当时的脸上写满了同情，那种表情只有在你的老友意识到没办法阻止你趟某处浑水时才会表现出来。

翌日，总理保罗·马丁要求见我。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当时担任他助理的吉姆·宾布利特——后来又成了我

的助理——坐在一旁，自始至终用他那猱猴一般锐利的眼睛目不斜视地盯着我，片刻没有离开。总理先生则试探着我对加美关系的看法，想试着从我的反应里摸清我的底细。他是个仁慈的人，但他不可能为我这次成功的演讲和此后受到的热情回应感到欢欣雀跃。我明显是他的对手。此次会面后，他派手下来告诉我，他将不会在我参选议员的道路上提供任何帮助。看来，我只有靠自己的拼搏才能在党内站稳脚跟。

同总理和马克·拉隆德相继会面后，我知道，回国参选这件事已是板上钉钉了。马克曾是皮埃尔·特鲁多身边最亲近的幕僚之一，听闻我当时的进展，他向我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我决定在圣诞节前后离开哈佛，接受多伦多大学的工作邀请，然后逐步踏入加拿大政坛。

在决心回国从政后，我和巧兰有一次在多伦多中国城同我的大学室友李博、他的妻子阿琳（Arlene），以及他们的一位千金共进晚餐。李博毕业后便一直在政界工作，起初以新民主党籍的身份出任国会议员，后来在1990年至1995年间出任安大略省第一位新民主党籍的省长。虽然他在1995年的选举中大败于对手，但他很快便调整好了自己，开始在多伦多做一名律师，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可是，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参政的时候，他却面朝着我大发雷霆。看来我还没为自己赢得从政的权利。为了重回政坛，他已准备了这么多年，而我以为自己是谁？我有些退缩了。回过头来细想，既然我和他分属两党，他又凭什么认为我没资格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参选议员？我没把这些想法告诉他，现在想想，我当时应该更加坦诚地和他交流才是。事后看来，他当时怒火冲天的反应代表着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这位老友的政治志向还未结束，他想转而加入自由党。我们互相之

间都出现了误判，而且，我们都错误地以为我们多年的友情能化解我们敌对的身份。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伦敦一家饭店碰面后，决定由布莱尔而非布朗出选工党领袖。如果我和李博当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协定，我们后来的仕途或许会与现在的截然不同，可是谁又能保证我们其中一人会真的向对方妥协呢？坦率地说，我认为只要两个人的志向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便双方是好朋友，双方之间也无法调和。

木已成舟，我的归心已决。虽然我和巧兰仍会时不时带着渴望的眼神回望远去的平静生活，但来自未知前方的暗流已悄悄袭来。那年夏末的一天，巧兰转过头来笑着对我说："我们有什么输不起的？"

我们都不知道。

---

[1] 质询时段（Question Periods），指加拿大国会众议院每日例行的45分钟质询时间。期间，由众议院反对党议员就政府相关政策向总理、内阁成员与众议院各委员会主席提出质疑。——译者注

[2] 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Russian Album（London：Vintage，1987）。

[3] 加拿大别墅，加拿大驻英国高级事物委员会（High Commission of Canada in the United Kingdom）所在地。——译者注

[4] 白厅，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一条街，两旁及其附近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等英国主要政府机关。——译者注

[5] George Ignatieff，The Making of a Peacemonger（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5），p. 73.

[6] George Monro Grant，Ocean to Ocean（Toronto，1873）；同时参见Michael Ignatieff，True Patriot Love（Toronto：Penguin，2009）。

[7] 红河推车，一种由牛、马或驴驱使的木制双轮推车，常见于19世纪加拿大红河流域地区。——译者注

[8] W.L. Grant，Principal Grant（Toronto，1903）.

[9]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纳粹在德国图林根州魏玛附近所建的集中营，也是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译者注

[10] George H. Ford，ed.，The Pickersgill Letters，1934-1943（Toronto：Ryerson Press，1948）；Jonathan Vance，Unlikely Soldiers：How Two Canadians Fought the Secret War Against Nazi Occupation（Toronto：Harper Collins，2008）.

[11] “迈克”（Mike）的昵称是皮尔逊在“一战”时服役于英国陆军航空队时得到的。此后，皮尔逊一般只在签署文件和正式场合使用“莱斯特”的名字，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称呼他“迈克”。——译者注

[12] Victor Gruen，The Heart of Our Cities：The Urban Crisis：Diagnosis and Cure（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65）.

[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E3-_z5YPoM.

[14] 也称魁北克日，每年6月24日举行，为魁北克省庆日。——译者注

[15] Pierre Trudeau，Memoirs（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93）. 参见该书第369页上的叙述。

[16] 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Rights Revolution：The Massey Lectures（Toronto：Anansi，1999）。

[17] 参见我在加拿大自由党双年政策会议上的发言《21世纪的自由价值》（“Liberal Values in the 21st Century”），2005年3月3日。

第三章 命运女神

我一度天真地以为自己重返加拿大政坛的过程，会像散步回家一样轻松，先在加拿大的大学里教书，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踏入政坛。可是突然，一个个预料之外的事件相继发生。2005年11月末，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保罗·马丁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下台，总理随后宣布下次大选将于2006年1月23日举行。如果我要重返政坛，就必须要把握住这个时机。

我在教政治学的时候，常喜欢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搬上讲台。学生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愤世嫉俗是那么令人震撼，置于当下的政治中又是那么应景。与此同时，他们也时常对马基雅维利为何会写下有关命运女神那一章文字感到不解。该书的第25章写于1513年，当时马基雅维利刚被驱逐出佛罗伦萨政治圈，饱受折磨的他狼狈地回到了自己旧时生活的庄园，过去苦痛的经历促使他写下了这一章，并在其中告诫人们，主宰着政治的正是命运女神。他心怀不满地写道，命运是个变幻无常的女人，她必须被驯服、被追求、被打败。马基雅维利的用语在现代人听来非常粗俗无礼：“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1]

一旦把马基雅维利的各种比喻放到一边，便能发现他的洞见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政治始终都在一名变幻无常的女神眼皮底下

运行。现实政治并非一门科学，它更像是狡猾的人类为了适应命运女神在他们前行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阻碍所做的无止境的尝试。然而，这种尝试所需的基本技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颜料是画家创作的媒介，政治家工作的媒介则是时机：他必须不断地去适应政治生涯中各种突发的、预料之外的，甚至是残酷的变数。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自己或许会对某些理念或政策有兴趣，但对政治家而言，他们感兴趣的就只有一件事，即适合某个理念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当我们将政治称作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时，指的是此时此刻 何为可能的艺术。这里说的可能性还包括潜力。同样一个房间，在一位平庸的政治家眼中就只是一个封闭的屋子而已，而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则能看见房间后面藏着的那扇通往新机遇的大门。实际上，我们在政治里所说的幸运，就是天赐良机：出手打击的时机，韬光养晦的时机和静候机遇的时机。当政治家开始抱怨自己的仕途充满不幸时，其实他们不满的是时机。只有愚者才会相信自己有本事掌控时机。在你真正可以控制什么的问题上保持谦卑，这才是在政治生涯中应当秉持的谨慎态度。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任英国首相，当他被问及自己的首相生涯里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时，据说这位长者是这样回答的：“事件，亲爱的孩子，各种各样的事件。”[2] 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会懂得如何将各种事件巧妙地转化为自身的优势。尽管政治家们总是被指责为投机分子，但学会做个经验老到的机会主义者正是政治艺术的要义。一个在政治里缺乏技巧的机会主义者，总能让人明显地看出来他是在利用 某个机遇，而一位经验老到的机会主义者则会说服公众，是他自己创造 了这个机遇。

我进入政界的时机由不得自己选择，但我和很多人想的一样，认为自己应该可以将眼下的情形化为自身的优势。虽然我在

课堂上教过马基雅维利，但我并未真正理解他。我曾以为自己可以掌控时机，到头来才发现自己早被时机所掌控。

我和我的多伦多团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向一位资深的议员简·奥古斯丁（Jean Augustine）献殷勤，希望已经快在这一职务上服务了三十年的她能够提出辞职，好让我有机会得到提名以接替她的议席。11月末，她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并对我接替她的议席表示支持。我在肯尼迪学院的维纳礼堂（Wiener Auditorium）上完了最后一节课，与学生合影之后便与巧兰共同登上了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我们本以为，即将参加的只是一场常规的提名我为位于多伦多西郊的怡陶碧谷湖滨选区——一个大约生活着2.5万居民的地区——的自由党籍候选人的仪式。

我政治生涯的第一幕是在一所有着瓦格纳式名字的机场酒店拉开的。那个机场酒店叫作瓦尔哈拉旅馆（Valhalla Inn），坐落在多伦多市中心通往皮尔逊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旁，酒店里还有一个70年代风格的宴会厅。后来，为了在这块地方建造新的公寓楼，酒店便被拆除了。如今每当我路过此地，都会忍不住怀疑那个酒店是不是真实存在过。

2005年12月的那个夜晚，当我所乘坐的机场客车在瓦尔哈拉旅馆门前停下时，只见酒店的停车场、入口与大堂挤满了数百名示威者，他们一边高喊着“可耻！可耻！可耻！”的口号，一边举着写有“姓伊的回家”的标牌。我心想，我现在就在 家。一些示威者脸上戴着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面具，谴责我支持他侵略伊拉克的决定。还有一群人则穿着关塔那摩监狱鲜亮的橙色连体囚服，批评我为虐囚辩护，他们显然是曲解了我在《次级罪恶》（*The Lesser Evil*）一书中的论述。[3] 呼喊声最响的是一群乌克兰裔加拿大人，他们基于我父亲一系的背景指责我是个

俄国沙文主义者，客气地说，他们也错误地理解了我13年前在《血缘与归属》（*Blood and Belonging* ）中的一段叙述。在那本书里，我揶揄地对乌克兰独立发表了一番评论，称它的独立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混杂的景象，“绣花的农民汗衫、民族乐器的鼻音哀嚎、穿着披风和靴子的假哥萨克人和凶神恶煞的反犹分子” [4] 。他们好像没人发现这段话里的反讽，也没人读过我后来那篇明确支持乌克兰主权独立的文章。 [5] 对那些围在我车外的人群而言，这些我在1993年发表的言论仅仅只是他们如此行为的借口。有一群乌克兰裔民众本想推出一个自己人参选怡陶碧谷湖滨选区的议员，并且已经获得了一位在任的自由党籍议员的支持，所以才会在得知我和简·奥古斯丁间所谓的“交易”后大为恼火。因此，他们翻出了我数年前的文章，把上述这些罪名强加在我的身上，想在最后关头阻挠我获得提名。

政治的这个侧面——有意曲解你在多年前的言论——对我而言仍然很陌生。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为我笔下的文字负责，但我究竟写了什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对手如何将你的“档案”变为他们的优势。所谓的“对手研究”（oppo research）就是指搜集可以在断章取义的理解后给某人定罪的视频片段、照片和言论的调查，这已然成为现代政治攻击中不可或缺的一支武器，而且，这种专门致力于“对手研究”的武器在网络上有着极为辽阔的作战半径。在如今这个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盛行的年代，你要么完全不发表、不从事任何可能在未来被用于攻击你的言论或行为，要么任由这些言论或行为的碎片散落在各个角落，你必须在这两者间做出选择。我坚定地支持后者。你不能因为对手纯粹恶意的攻击就绑架了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选择不再将现在心里所想的说出来，那一旦迎来发表言论的契机的时候，你就会忘了自己的初

心。

当我们透过车窗对示威人群做了一番调查后，我竟然产生了一种滑稽的想要为自己辩解的欲望。我想告诉那些戴着布什面具的年轻人们：“只有当你亲眼见到我在1992年的伊拉克北部看到的那番场面，看到萨达姆是如何对库尔德人（the Kurds）使用毒气的时候，你才会明白我为什么认为他必须离开。”对于那些穿着关塔那摩监狱囚服的人们，我想说：“如果你真的好好读了《次级罪恶》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和你一样对虐囚深恶痛绝。”[6] 你们都误解了我。我本可以出面解释。但我知道，在政治的世界里，解释总是来得太迟。所以你从来不会解释，也从来不会抱怨。要是你足够幸运，复仇的机会自然会来到。

当示威者正在不透明的车窗外朝我大吼大叫时，我和巧兰坐在车里相视无言。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过放弃从政回到哈佛的念头，但巧兰的眼神却传递出了一则明确的讯息。这并不完全是我们之前想象的荣归故里的场面，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冲出去战斗。

我们推开把我们团团围住的示威人群和一旁跑来看我们笑话的摄像机和记者，一路穿过大堂，到达闷热的酒店宴会厅，站到了演讲台上。我的团队也集合了一群支持我的民众在台前为我鼓掌欢呼，但后头那些对我表示不满的人却试图用更高分贝的呐喊来压过我的声音。他们手中挥舞的标语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对我的提名既不民主也不公正，我不仅是所有乌克兰人的公敌，还是乔治·布什的辩护者。

我仍记得自己当时愤慨的情绪。那些乌克兰裔的民众怎会指责我蔑视他们的权益？我的曾祖父母就葬在乌克兰。[7] 还记得

我在访问乌克兰时告诉当地人这件事后，他们便拿出传统的面包和盐作为礼物欢迎我。就连他们都视我为朋友，我的同胞怎么会把我视作敌人？而且，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裂自己的同胞？我并非俄罗斯籍，他们也不是乌克兰籍。我们同是加拿大公民。我声嘶力竭地喊着，声音盖过了喊着“耻辱！耻辱！耻辱！”的乌克兰裔民众和穿着囚服的示威者，和我们在台下喊着“我喜欢迈克”（I like Mike！）的自己人。

瓦尔哈拉旅馆是我踏入政坛后经历的第一次“肉搏战”。说实话，我倒也觉得很享受。当时面对恶意的指责者，义愤的情绪不禁涌了上来。可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一切和好意或恶意无关。在政治的赛场上，任何手段都会出现，最重要的不是展现善意，而是赢得胜利。那天晚上，我就赢了。“黑衣人”替我邀请了自由党全国主席麦克·埃泽格监督整个提名过程，另外请了数名党内律师到场以确保所有程序合乎规定。随后，集会现场的党员终于通过了我的提名。在示威人群的呼喊声中，我被随行人员从后门悄悄带到了我和我的辅选团队首次会面的现场。

看到现场众多的反对者，想必他们一定和我一样惊讶。在和他们一一握手、相互介绍后，我心想，他们便是我此后唯一可指望的人了。他们都是来自选区的本地居民，一共十余人，包括坐在轮椅上令人敬佩的玛丽恩·马洛尼和她的儿子杰米·马洛尼，从前是房地产律师但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官方代理人的阿尔芒·柯南特，简·奥古斯丁的助理玛丽·凯瑟，还有几位简组织的小团队里的退伍军人。简把她的这支队伍称为“能干大事的小引擎”，起初我还有些怀疑他们的能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他们都非常尽职，时至今日我和他们仍维持着朋友的关系。当时他们都无法预知，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捆绑在一起会有怎样的后果，但他们

中的每一个人都陪我走到了最后。

现在我已经获得了提名，或许还是整个多伦多地区最富争议的一位候选人。接下来的55天，我的辅选团队——那支集结了城中律师、电脑天才和当地社区居民的队伍——试图把我塑造成一个能干的政治家。这绝非易事。当时我挨家挨户去拉票的场面看上去一定很滑稽，我竟然以为自己应该在每一位选民面前都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与他们来一段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我的团队成员每次都必须用力给我使眼色才能把我拖到下一家门口。

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却好像透过一面镜子，窥见了每一个谋求公职的人内心都存在的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接下来的五年里，我始终活在他人的眼光里。19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将国家称为“每日例行的全民公投”，对于任何寻求公职的人而言，这便意味着民主，你每天无时无刻都在评估每一个公民对你的看法，包括街上的行人怎么看你、你走上去和他们握手时他们会怎样问候你、你经过机舱的走道坐进位置时他们又会如何与你互动。[8] 那些从没参加过公职竞选的人或许永远不会理解你对这种每日全民公投式的考量有多么依赖，每当你走入公众视野，人们每个眼神的暗示、鼓励的微笑或厌恶的蹙眉都会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清晰的印记。相较于民调，我更依赖于民众直观的反应。据说前纽约市长埃德·科赫（Ed Koch）每天走在纽约街头都会问上路人百余次：“我做的怎么样？”[9] 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我 做得怎么样？你 觉得我做得怎么样？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无足轻重的。我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手上。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在国人心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工作检查会在多大程度上掌控我的生活，并开始塑造我对自我价值的判断。

在商场、公寓楼、下着雪的怡陶碧谷湖滨郊区街道上拉票的时候，我会留意每一张有意向支持我的面孔，也学会了如何判断任何微小的信号，不管是迟疑不决、逃避，还是赤裸裸的拒绝，我都能感受得到。总体而言，公众对于拉票中的政治人物都会出奇得礼貌，但他们的行为也在向你传递着一些信号。那个摇下车窗收下传单的男人，下一秒便将传单揉成一团丢在一旁继续开车，他在用行为告诉你，就算你等到天荒地老，也不可能赢得他的选票。那位开门后用围裙擦着手然后耐心地听你讲完话的女士，可能只是一位小时工。那位想请你进门聊聊天的长者只是有些孤独。那个在地铁站里摘下耳机，听你说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便不时点头的姑娘一定会投一票给你，只要她记得在选举当天出门投票的话。我开始认识到我在哪些人群面前势在必得，又在哪些人群面前永远只能吃闭门羹。我们在青年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少数族裔中广受欢迎，而在选区内那些有着宽阔私人车道的更加富有的地方，保守党比我们更具优势。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和比我们左倾的新民主党争夺那些生活在选区南部的工会劳动者和贫苦家庭的支持。我们是一个中间政党，正是因为我们长期坚持中间立场才得以在几乎整个20世纪间持续执政，但我能感觉得到，我们的支持者正在向另外两个政党流失。

我们接手了一栋位于一个繁忙十字路口的废弃银行大楼，作为我们的竞选总部——我在地下的保险库里有一个无窗的壁橱——这个保险库很快便被大批工作人员占领了。如果你热爱政治，那选举办公室会是个无比美妙的地方。这里总是乱中有序：到处都有喝了一半的咖啡、吃剩的中餐外卖、丢在桌上的披萨，还有我夫人准备的匈牙利热汤，常有陌生人进进出出，也总有记者在到处踱着步等着采访我们，后面的屋子里也总有一些年轻的政策顾问涂写着一张张地图，上头用不同颜色标注着我们和对手

的票仓。我们甚至还请了一位教会牧师，罗布·奥立芬特（Rob Oliphant）定期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尤其是我开一些心灵处方，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名出色的议员。整个团队的核心是那些年轻的“数据猿”们，他们无论男女总是面色不佳，长期缺乏睡眠的他们，双眼一直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上各种拉票活动的统计数据，在这场战役正式开打之前，计算我们究竟有多大胜算。

在这个废弃银行大楼的一片嘈杂里，我头一次意识到政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分裂的时代，人们因阶层、收入、种族、信仰和年龄的不同互相隔绝，不计其数的人只得无依无靠地过活，任凭那昔日热闹的广场大街如今空无一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党让那些原本彼此陌生的人为了维护彼此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为了相同的事业携手并进。每当我们的拉票员涌入大本营领取一沓新的民调问卷，然后准备再次走上白雪皑皑的大街去挨家挨户地游说时，我都会站到屋子正中间一个摇摇晃晃的椅子上这样鼓舞他们：你们代表的不是我，也不是党，你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最出色的一支力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竞选活动推翻了肤色、种族和阶级的芥蒂，打破了让同胞互相对立的阻碍。在此之前，我从未在一个背景如此多样化的团队中工作过：一位巴基斯坦裔军官哈利法少校（Major Khalifa）带领着一组阿赫迈底亚穆斯林（Ahmadiyya Muslims），负责在夜间散发传单；一位意大利木匠负责在草坪上捶置标语；数个此前支持简·奥古斯丁的加勒比团体，一开始对是否要支持我犹豫不决，后来也成了我的得力干将；一支由布拉德·戴维斯、米尔顿·陈和萨钦·阿加沃尔带领的学生和青年律师队伍，他们都被我的竞选活动中给青年一代提供了革新党务的机会吸引过来；一名来自选区北部高层住宅梅贝尔、总是穿着优雅长袍的索马里妇女；数位波兰裔的天主教徒，他们成功地调和了自身信仰与我们党支

持同性婚姻与堕胎的立场间的矛盾；一众乌克兰裔居民，包括一位当地教堂的牧师——神父特里，他们为了声援我们不惜站到对我抱有敌意的同族人的对立面；还有一众电话拉票员，每天说着十几种不同的语言，通过电话向民众宣传着自由党的执政理念。

有几个人让我印象深刻。被称作“标语男”的史蒂夫·麦加奈德（Steve Meganetty），身材高大，一头银发，说话总是面无表情、拖腔拖调的他一个人贴完了整个选区的竞选标语。他是党内的一位退伍老兵，每天驱车一个半钟头从尼亚加拉（Niagara）的家里来帮我的忙。他说自己受够了党内的派系斗争。2003年，时任总理让·克雷蒂安被保罗·马丁所逼，让出了总理宝座，自此之后，这个曾经厥功至伟的全国性政党开始分崩离析，派系林立。我问史蒂夫为什么他愿意每天来帮我，他简单地答道：“我希望党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巴杰特·西坎德（Baljit Sikand）同样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位热心肠的锡克族人，头上总是扎着时髦的彩色头巾。从怡陶碧谷一间温室旁的小木屋起家，如今的他运营着雇有上百名司机的布卢明代尔豪车服务公司（Bloomingdale Limousine Service）。有了他的支持，就相当于拥有了当地数量庞大的一众锡克族支持者，还能享有无可比拟的本地情报服务。散布在整个选区各个角落的出租车司机和豪车租赁从业者都是获取情报的一线好手。

我们的竞选活动从当年12月持续至次年1月，那段时间里，我每天三次出门拉票，每次都会穿上一件之前为了去北极所准备的派克大衣，下身穿着滑雪裤和雪地靴，还戴着围巾和手套才能出门。冬天的多伦多，太阳在下午三点半就落山了，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摸黑在被雪覆盖的大街上艰难跋涉。为了证明被对手戏谑为“外来客”（carpetbagger）和“空降选手”（parachute

candidate）的我有着满腔热诚，我的拉票团队和我决心要迎难而上。

我们敲开了数千扇门，期间遇到的一些民众我至今仍然记得。比如那位应声来开门时还在围裙上擦着手的女士，后面还跟着一个小男孩。“布赖恩有哮喘，”她说，“你准备怎么减少空气污染？”快在她家门口冻僵的我尽力向她阐述了一个她能够信服的环保政纲，可当她转身回到屋子里继续喂布莱恩吃晚饭的时候，我开始怀疑我是否赢得了她的支持，而且，我仿佛从中体察到了横亘在全神贯注的选民和天马行空的政治家之间的鸿沟。然而，从与那位夫人和其他上百位民众的交谈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正是为了她而从政。

我也还记得在平安夜给我们开门的那对年轻夫妻。他们当时脸上挂着泪痕，我说我可以等会再来，但他们执意要我留下，并且告诉我他们刚参加完侄子的葬礼回来。他们的侄子之前出门和朋友玩时，突然遇到两群毒贩在街头交火，这个年仅20岁的孩子不幸被一颗流弹从背后击中，当场毙命。数周之后，我亲自到市政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此后，当我在议会带头反对政府废除控枪法案的提议时，为的正是在平安夜那晚遇到的沉浸在悲痛中的他们。

这种门前政治也能让你亲眼看到社会的分化，而弥合这些裂缝正是政治家的职责。记得那位住在蜿蜒小径尽头，家门前富丽堂皇的女士，在对我们党的政策进行了一番盘问后，便直言她绝不会投票给任何要她多缴税的政党，然后就把我打发走了。我还曾拜访过一些住在光线昏暗又臭气熏天的老公寓楼里的移民家庭，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敢随意打开房门，而那些来开门迎接我的都是些半裸着身体、露出大片刺青、目眦欲裂又穷困潦倒的年轻

人。

我们在当地的选举活动得到了多伦多各地自由党人的广泛支持。随着我们在开展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愈发丰富，我们工作的热情也随之高涨起来。但是，从全国层面看，支持自由党的势头正在减弱。我最初投入这场选战时，是认定了自由党一定会胜选的。20世纪90年代时，自由党政府曾成功削减财政赤字，其恢复财政秩序的政策无论有多粗暴，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当时，国家的经济正持续增长，总理则因创造了持续繁荣的情景而广受赞誉。但是，自由党毕竟已连续执政了13年，党和政府都已经开始明显地感到乏力，而后来的丑闻又让我们的名誉大为受损。经历了1995年那场差点让魁北克独立势力得逞的公投，政府决定授权在魁北克资助一项以提升魁北克公民国家认同的项目。然而，这个项目数以百万的财政资助却在不知不觉间流入了十多个欺上瞒下的工作人员的口袋。尽管后来总理下令要彻查该案，那几个贪赃枉法的人随后又全数入狱，但保守党从此便不断拿这场“资助丑闻”攻击我们，民众似乎也逐渐认同了他们的说辞。

我们的选举活动进行到一半时，又遭晴天霹雳。加拿大皇家骑警（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宣布将就向股票经纪人与投资者泄露证券市场转向信息一案，对当时的自由党籍财长展开调查。虽然这一指控纯属子虚乌有，这名财长后来也确实被宣告无罪，然而，就在警察介入并宣布开展调查后，我们的全国选战便受到了一次空前的剧烈冲击，原本我们在全国民调中的领先地位瞬间化为乌有。

距离选举日只剩10天的时候，数名“数据猿”跑来垂头丧气地告诉我，我们在民调中正处于落后位置。保守党的支持率正在激增，这让保守党领袖史蒂芬·哈珀信心大增，他甚至一度兴冲冲

地到我选区内的一个乌克兰裔居民聚集的大教堂，呼吁集会的民众“把叶礼庭送回哈佛”。为此，我们特地召集了一大批拉票员，和我一起挨家挨户地从早上十一点到晚上九点半昼夜不停地向民众拉票。我的夫人则在大本营内帮忙接电话，煮饭烧菜，保障后勤。当选举活动进行到最后一周，一派自由党籍乌克兰裔民众出于对我的不满，竟走进了选区内的保守党总部，宣布支持我的保守党对手。而此时，新民主党的全国领袖杰克·莱顿（Jack Layton）也公布了几千通电话录音，告诉人们我的竞选活动正土崩瓦解，呼吁所有支持改革的选民转而支持新民主党人。总的来说，我们的选举活动是在一派失去控制的局面下结束的。

2006年1月23日的选举当晚，我们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怡陶碧谷湖滨选区的压倒性胜利，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场近五百名拉票员的努力。我这时才明白了政治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把你的渴望展示出来。我展现了自己赢得选举的渴望，人民便以支持回赠我。数千名同胞国人把他们对我的信赖和托付通过选票交到了我的手上，那是一种陌生又崇高的体验。那一刻之前，我只需为我自己代言，只需对我的家庭和我自己负责。现在，我必须开始为陌生人发声，对陌生人负责。

在那个修缮一新、名为“好莱坞”的迪斯科舞厅的地下室里，我站在电线杂乱密布的地板上，头顶着刺眼的强光，向所有支持我的陌生人、同胞公民和数百名志愿者们表示感谢，是他们让这场胜利成为可能。巧兰提前为我准备好了一首匈牙利小诗，准备让我在胜选时拿出来读，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小诗冷静的语调和其中朴素的意蕴。“黑衣人”之一伊恩·戴维在我耳边轻声说，“跳过这首诗”，我没有听他的，还是读起了这首约瑟夫·奥蒂洛（József Attila）所写的《多瑙河旁》（*By the Danube* ）最末几

句：

我欲追求那事业虽然人性难以

全盘坦白我们往昔的作为

但那载着前生、今朝和来世的多瑙河水

将我们温柔地卷入随湍急的水流流淌

父辈战时洒下的热血

传达着和平的讯号让我们共同缅怀与尊敬

将秩序融入我们的公共事务：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而它注定艰难 [10]

在这个挤着支持者和记者、吵闹不堪的迪斯科舞厅里朗读这首诗，确实感觉有些奇怪。对于那些一向不看好我的人来说，这也让他们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此前对我这个从国外来的知识分子的印象是正确的。但我并不介意。之后的几年，“将秩序融入我们的公共事务”成了今后我习惯用来定义我的政治职责的各种方式之一。

在之后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我们仍挤在“好莱坞”舞厅的地下室里见证全国大选的结果出炉。史蒂芬·哈珀和他领导的保守党最终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尽管坐拥众多议席，但保守党的议席数量仍然不足以组建一个多数党政府。正当我还在消化方才那个改变我命运的选举结果并且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将从出任一名在

野党议员起步的时候，总理马丁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他承认败选，并宣布辞去党领袖的职务。一场争夺党领袖宝座的鏖战随即拉开帷幕，那些原本想来看看我这个“空降选手”是否能够安全着陆的记者和摄影师立马将我团团围住，问我是否准备参与这场角逐。如果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有记者暗示我说，我将成为这场党领袖选举中最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在现场媒体闪光灯的簇拥下，命运女神掌控了我命运。

关于之后几周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第一次坐进议会，第一次参加自由党议会党团的会议，还第一次听到败选的议员最后一次在党团同事面前发言。其实，我们这些选举的幸存者应该多听听那些落选的同僚在说些什么。当时我们都认为，保守党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因为作为天然执政党的我们很快就能夺回执政权。我们不断告诉自己，我们只是被暂时困在“禁区”而已，败选只不过意味着我们要在这里等上一段时间罢了。这是我上的第一堂关于政治幻想具有遮蔽效果的课。我们中的每个人最后都开始用同样的话安慰自己，尽管这只是个自欺欺人的理由。倒是我们那些败选的议员同事，包括那些回忆起自己在任时的情景便会不禁流泪的同事，更能比我们看清形势，他们说：“或许你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你们在野党的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时我们确实不知道，在野的身份将在前路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机。

就在新一届议会即将开幕而我即将赴议会履职前的几周，“黑衣人”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这一次我们商讨的是如何打好一场角逐党领袖的全国选战。我们原本设想，这场比拼还有好几年才会到来，可没想到这场决定我命运的党代会已近在咫尺。12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将在蒙特利尔拉开帷幕，届时将

有来自全国308个地区通过投票产生的4500位党代表出席，他们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新一任的党领袖人选。当然，当时的我们对即将到来的党代会将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然而，党领袖将在此类党代会上由代表们亲手选出这一点，确实是加拿大政治惯常的运作方式。这势必将是一场群雄四起、竞争激烈的角逐，我们必须做足准备。有意加入这场战斗的志愿者开始注册，所需的上百万资金也开始陆续进账。站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我绝不能像哈姆雷特一样优柔寡断。我要加入吗？

此前事态的演化全都在我们的预料之外，但巧兰和我都明白，我们已经出于种种原因回国，尽管我缺乏足够的从政经验，但我们可能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决心加入。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像滑雪的初学者，正从山顶开始沿着一条黑钻 [11] 滑道往下滑。我能听见脚下滑板擦过雪面的声音，也能感到向下俯冲时加速产生的巨大动能。但我告诉自己，我之前就已登上了顶峰，现在只要能安全下山就行。

首次当选议员后的第八周，刚刚在议会宣誓就职的我便宣布参选加拿大自由党领袖。接下来的九个月，竞选党领袖的野心不仅将带领我横跨整个大陆，遍访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将把我带入内心深处那片我从未发现的新天地去。

---

[1] Nic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1513），ed. and transl. David Wootton（New York：Hackett，1994），ch. 25.（此处译文参考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0页。——译者注）

[2] 对于麦克米伦是否真的发表了这次广为人知的讲话，争议仍存。Elizabeth M. Knowles，ed.，What They Didn’t Say：A Book of Misquot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 Vi，33.

[3] 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Lesser Evi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4] 参见Michael Ignatieff，Blood and Belonging（Toronto：Penguin，1993），p. 123。

[5] 参见Michael Ignatieff，Blood and Belonging（Toronto：Penguin，1993），p. 146。

[6] “对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言，拷问从来都令人深恶痛绝，它绝不应当被合法化、被容许或在战场上被暗中使用。一旦国家实施了拷问，那也就表明该国认为人的个体是可消耗的这一终极观点。这一观点与任何认为自身存在的价值是以人类尊严与自由之名管控暴力与压迫的宪政社会的精神是对立的。”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Lesser Evil，p. 143。

[7] 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Russian Album（London：Penguin，1997 ed.），epilogue。

[8] 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 http://www.nationalismproject.org/what/renan.htm.

[9] http://www.theatlanticwire.com/politics/2013/02/ed-koch-obituaries/61684/.

[10] http://www.poetrymagnumopus.com/index.php？showtopic—1685.苏巧兰对本诗英语翻译已略做调整。

[11] 一般说来，正规的滑雪场内的雪道上都有道标，不同颜色和形状的道标代表不同级别。黑钻滑道（Black Diamond）也称黑道，是滑雪场内难度最高的一种雪道。——译者注

第四章 察言观色

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参选政党领袖绝对是个十足的体力挑战。毕竟，我们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民主国家，横跨六个时区，有着五个地区和两种官方语言。12月，由全国308个选区的六万名党员提名的党代表就将从五湖四海聚集到蒙特利尔，代表全国党员选出一名新的党领袖。他们所代表的地区北至北极圈，南至加美边境，西抵太平洋沿岸，东迄大西洋沿岸，东西跨度长达5000公里。要想当选党的领袖，我就必须赢得绝大多数党代表的支持，无论他们是来自北部的原住民保护区，还是东南部的渔港，或是西海岸上的豪华公寓。因此，我有上千公里的路要赶，上千只手要握，还有数不清的政治和谈、深夜协商、交易会面和募资集会要参加。

就在我宣布参选后不久，另外12名候选人陆续宣布参选，他们无不是些经验老到、出任过选任职务甚至是内阁部长的资深政治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比我更懂政治。他们的加入势必会让这场选战变得更为激烈：曾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Montreal Canadiens）守门员的肯·德赖登（Ken Dryden），曾在90年代因在辩论场上驳倒分离主义者而扬名天下的魁北克人斯特凡·狄安（Stéphane Dion），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青年时代的好友李博。当时的他为了获得参选自由党领袖的资格，已从新民主党出走，加入了自由党。

我觉得自己要比李博略胜一筹，毕竟我已经为自己在议会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他压根没有参加这次选举。我前一年在政策大会上的演讲让数千名党代表认识了我，也让媒体对我的回国从政

兴趣渐浓，开始给我腾出越来越多的版面。参议员戴维·史密斯用他那雄辩的本事说服了大批经验丰富的政坛前辈支持我的参选，他们坚信我能够当选。他们对我的认可带来了一个悖论。我本是个作壁上观的局外人，仅仅踏入政坛数周就成了一名党内的认证候选人（establishment candidate）。这反倒给我的辅选团队带来了紧张的气氛，那些负责运作我的选举活动的年轻人本想通过我给党带来一次彻底的变革，可是那些同意为我背书的专业政治家们却希望自由党能够维持现状。

从你踏入政坛的那一刻，你的对手就开始给你贴标签，如果你不想方设法地摆脱它们，你就很有可能会被踢出候选的队伍。如今，我的身上刚刚贴上“认证候选人”的标签，党外的对手就已经开始定义我为乔治·布什的辩护者了。竞选活动启动之初，我有一次到渥太华大学做讲座。刚到现场，就有一群人跟着涌了进来，后来在我讲到一半的时候，三个戴着面罩、打扮成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囚犯模样的人突然站了起来，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站到了讲座结束。我尽力让自己用自由主义的姿态来应对这一情形，告诉人们我欢迎抗议者的到来，但是在现场各大全国性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显然党外那些反对我的学生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我的形象扭曲成了一个会为任何坏事辩护的人——比如虐囚或对被关押者实施酷刑——尽管我和他们一样对这种行为厌恶至极。

正当我们试着研究这些学生向我施压的缘由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时，我和我的团队却意识到，原来媒体对我的高度关注并不会理所应当地带来党代表的支持。只有亲自与他们握手寒暄，才可能赢得他们的选票。如果你不在他们的家门口出现，他们就不会投票给你。出现在他们面前，并用行动告诉他们我可以迎难

而上争取他们的支持，对我而言格外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在他们心目中自视甚高、却对政治涉猎浅薄的“官二代”形象。

我们便这样上路了。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同其他所有候选人一样，巧兰、我和我们的助手马克·查理福克斯生活在飞机和机场间。我们有时会搭大型客机去一些更远的地方，还有些时候我们就坐在我的朋友杰夫·基欧驾驶的四人座小飞机上，缓缓地翱翔在2000英尺的高空中俯瞰广袤的草原和森林。夜深时分，窗外尽是一望无际的黑暗，只有远离人烟的农家还亮着稀稀疏疏的灯火，地图上幅员辽阔的疆土开始在我们的脑海中变得具象起来。我们住过各种各样的酒店，有的酒店有着低矮昏暗的走廊，有的房间门口还会停着废弃的餐车；我们整天靠蒂姆·霍顿斯（Tim Hortons）的袋泡茶、酸奶和饼干度日；我们一刻不歇地工作，后来发现自己无论站着或坐着都能睡得着，尤其是在深夜空无一人的机场休息室里。我们从马克经营乳牛场的父母那儿借了一辆车驶过大江南北，以至于他曾说我们应该给自己的回忆录取名叫作“别克君威岁月”（*The Buick Regal Years*）。

一旦踏入政坛，你每日的生活都将成为电视直播。你永远不会插队，永远不会对一个司机、服务员或柜台职员不耐烦。你永远不会发脾气。你也永远不会忘记每次有路人上前来与你合影或索要签名时要面带笑容。你不得不放弃任职期间自己所有的私人生活。人民在看着你。

许多打算从政的成功人士，既不屑于没完没了的见面寒暄，又不愿意在公众面前假装态度温和，认为这么做有失尊严，但他们错了。政治里所有的苦差，包括无止境的出差和开会，完成各种不可能的行程，还有时刻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都是为了寻求

一种从别处无法获取的权威。你必须了解你的国家。

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对于国家的认识，是在简报里找不到的。他知道一方水土如何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又如何塑造了一方水土。没有什么形式的政治专长比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更为重要了：当地政治中奇闻逸事的细节，当地高官和权力代理人的名字——市长、高中教练、警署长官和大企业主——因为你常会需要在讲话里提到他们。伟大的政治家必须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至少得记得每一寸自己曾经踏足的土地。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要能让人觉得自己对这里就像对自己的家一样熟悉。当他们询问人群中的某人来自哪里时，他们要随时脱口而出一个故事，把自己的背景巧妙地和提问选民的背景联系起来，达到令人称赞的效果。法语中会用“一个属于当地的人 ”（*un homme de terrain* ）来表达对政治家的称赞。英语里没有准确对应的表达，虽然它应该有。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某个政治家对于脚下的土地和人民的背景都很了解，仿佛自己的根就在这里一样。我认识许多这样属于当地 的男性 （*hommes* ）和女性 （*femmes* ）政治家。我记得，有一次自己和一位议员同坐一架飞机出行，当飞机经过他位于东海岸上的选区，然后逐渐靠近降落地点的时候，他始终专注地俯瞰着地面上的农场。“这家人是我们的支持者。”他手指着一户农家说道。随后，他又把手移到另一座房子说：“就算你双膝跪地求他们，这家人也不会投票给你。”他熟悉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屋子、每一片农场甚至每一条乡间小径，谈起这片土地时就像一个在评价自家羊群、眼里不带任何感情的农人。

只要民主政治仍然要求政治家掌握此类的属地知识，仍然以此作为衡量政治家可不可信的标准，那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而，一旦民主政治将自己与广袤的土地脱钩，让原本遍布

于集会礼堂、客厅、餐馆和酒吧里的议政热情全然转移至电视屏幕和网络上，麻烦就大了。我们将不得不任由那些形象设计师和媒体顾问摆布，并且让我们的思维囿于他们展示的种种幻象。到那时，政治将成为大都会独裁的戏码，罔顾小城镇和偏远乡村的现状，而这些地方和大城市一样都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所有那些认为网络将更好地落实民主的言论，我想说，网络可能会让我们失去那个让政治真正变得民主的侧面：选民与政治家面对面的互动。YouTube上的视频和广告永远无法代替两个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真实的交流。要是网络接管了政治，那选民就永远失去了核实现状的机会，失去了与政治家面对面交流后再决定是否支持他或信任他的机会。政治必须保持有形的沟通，因为信任也是有形的。

我想起了新斯科舍省斯普林希尔市（Springhill）的皮西厄斯骑士团礼堂（Knights of Pythias Hall）、安大略省林赛市（Lindsay）的山姆休斯军团礼堂（Sam Hughes Legion Hall）、温哥华唐人街上的富大海鲜酒家（Floata Seafood）和其他中国餐厅。这些地点和不计其数的更多地方，正是我们国家践行民主的见证。这些场所的墙上总是挂着各种旗帜和横幅、女王和前总理的肖像，以及当地狮子会 [1] 或扶轮社颁发的徽章。一走进去，便会看到后方的桌子上摆着茶壶、咖啡壶和三明治，围着讲台被摆成半圆形的宴会椅，以及坐在你面前的忠诚的党员们。他们中有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也有头戴棒球帽的农民，还有穿着工会T恤衫的男士和打扮精致的妇女。他们的身边总是萦绕着安静、庄重的气息，表面和气的他们其实心里仍然对你有所怀疑，而你正是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而来。他们正是手中握有投票权的党代表。

在漫长的党领袖竞选活动中，我每天四次甚至更多次迈入类似的会场，先和完全陌生的人握手寒暄，试着搞清楚他们是谁、想听什么，再上台做竞选演说，然后回答问题、签完海报后，就直奔下一站，或是机场，或是礼堂，最后到下一个酒店的房间里倒头就睡，结束这漫长的一天。

要想让他们耐心地倾听你的演说，你就必须知道他们想听什么。这在专业人士的口中被称作是“察言观色”（reading the room）。如果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准确地察言观色，就能牢牢地掌控现场。但要是在察言观色的过程中出了错，就只能在聚光灯下敛手待毙。我也曾在察言观色时出过不少错，直到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在上场前忘记你之前懂得的所有东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必须丢掉小聪明，丢掉伶牙俐齿，丢掉侃侃而谈，开始学着怎么和自己的听众建立联系，任何联系都行。后来，我学会了从自己的生活中找一些故事，试图用很长的一段话来告诉他们：我认识 你，你也认识我 。在魁北克，我会谈起我的姨父姨母（主要是姨母）在列治文（Richmond）经营的乳牛牧场。在海洋省（the Maritimes），我则会说起自己来自新格拉斯哥（New Glasgow）的曾祖父，和在弗雷德里克顿（Fredericton）出生的祖母。在西部，我会和人们闲谈父亲过去在落基山脉铺铁轨的故事。这些原本对我而言有些抽象的血脉，现在却开始变得真实起来。我在做一件所有政治家都会做的事情：把我的故事变成他们的。

在呼吁党代表支持我的同时，我也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刚刚被夺走执政权、正挣扎着重拾信心和方向的政党的党员们。所以我每到一处便会对所有人说，支持我就代表着支持变革，支持革新。我和让自由党名誉受损的绯闻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同时是一

个忠诚的党员，与自由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40年前。这就像走钢丝一样难。我在争取领导的政党，曾有着令我深恶痛绝的密谋文化，可我又不得不寻求那些忠诚党员们的支持，如果我的厌恶太过明显，他们肯定不会把票投给我。我必须说服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握手、回答和微笑——让他们知道我有做一名党领袖所需的能力，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让他们知道我值得信赖。

政治是一项对肢体能力要求很高的工作：你通过双手的触碰、攥紧和握持，通过眼神，和他人建立联系。于我而言，这些本事并不是天生就会的。曾经我有这样一个坏习惯，别人和我说话时，我总是习惯性地眼神朝下，从不与人对视。一直以来，我也习惯了将信任用语言表达出来，让语言替我传递情意，然而在政坛耕耘时，真正的信息却是需要用肢体表达的，需要用眼睛和双手来传递的。不管你嘴上说着什么，你的肢体必须同步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你可以信任我。

如今投身政坛的我，比往常更加懂得欣赏政治艺术的美妙。我不禁回想起2001年上过的一堂政治研修课。我当时正带着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穿过举行达沃斯论坛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我们途中经过一个房间，随后，克林顿展示了他那能将所有人的名字信手拈来的本事——不仅是人名，还有人们各自家族的故事——让我十分惊讶。他和大家握手、亲吻脸颊、对视，然后向前行进的过程，就好像是一台联合收割机，一边前进，一边将所有的稻谷捆在了一起。当我后来遇到奥巴马总统时，他一边握住我的手肘，一边快速提及了我写的一本书和一位共同好友萨曼莎·鲍尔的名字，让我永生难忘。他在不经意间透露出的风度，仿佛让人觉得，他在台上讲话时，眼里除了你，没有别人。

这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一种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在《廷臣书》（*Book of the Courtier*）中大为赞扬的政治艺术。他基于自身为曼图亚公爵（Duke of Mantua）的宫廷效力的经历，于16世纪初写成了该书。他在书中用“轻松”（*sprezzatura*）一词来形容政治中最为关键的一种天分。英语中同样没有准确对应的词汇，它大抵上是指能让他人在你的陪伴下感到轻松的一种天赋。时至今日，卡斯蒂廖内给出的建议仍然历久弥新：

> 我发现了一个似乎比人类的任何行为或言语都更为有用的普世准则：即不计成本地摆脱任何矫揉造作，把它视作如礁石般崎岖、危险，并且（或许可以用一个新奇的表达来形容）用一种可以使所有奇谲巧作隐匿起来的、特定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万事万物，使人的所有言行看上去浑然天成，毫不费力。我确信，优雅将从个中迸发…… [2]

“浑然天成，毫不费力”——伟大的政治家能让复杂的设计看上去浑然天成。人类所有的政治技巧中都包含着诡计的成分，而诡计则必须被轻松和优雅包装得让人看不出破绽。这种后天的优雅只有在岁月与历练的洗礼中才能被逐渐掌握，无论是谁都无法教授。它不是一种技巧，也不是一种常规，没有任何执行领导力的课程可以把它教给你们。相较于一种技术智能，这种人类行为的优雅更像是一种体育竞技的能力。要是起步时没有这种天然的魅力相伴，便无法在后天习得，任凭你的意志再坚定，也自然无法展现。当我们称一个人是“天生的”（natural）政治家时，就是指他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与他人产生联系，让他人感到放松，让他人感到自己在他的眼中独一无二的本事。所有天生的政治家的

本事都可以通过后天的练习更臻完美，但除非是与生俱来的天分，否则看起来不免有些虚伪。政治家因圆滑而遭人嫉妒和鄙夷，这一点并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对人们口中的故事、阐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故事背后的涵义产生真实的好奇和兴趣。在所有构成轻松　的品质中间，我会把倾听，真诚地倾听你的同胞国人的心声，列为最常被低估的一种政治技巧。人民想从政治家那里获得的、有权利向政治家要求的，正是被倾听。很多时候，倾听是你唯一能做的。人们向你倾诉的问题或许无法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或许在你的能力之外，但是只要你全心全意地倾听他们的心声，凝视他们的双眸，眼神不越过他们的肩膀落到队伍中的下一人身上，即便你没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也会坦然接受。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技巧，而我眼下正面临着一场十分激烈的竞争。与我争夺党领袖宝座的对手们，不仅有的比我党龄更高，而且清一色都是资历丰厚、政治技艺纯熟的老手，个个都有匹配人脸与名字的能力，并且轻而易举便能找来曾经施过恩惠的人帮忙。

在遍访全国的旅途中，我发现一幅人民心中的政治关切的地图，一幅以自己生活的地方为中心，随后向全省乃至全国辐射开来的地图。这是一幅对宪法和司法毫不关心的内心地图。每当有人问你类似当地医院和社会日间照料中心为何关停的问题，你当然不能用这些不在联邦司法管辖范畴之内所以与我无关的理由来搪塞他们。除非人们发现你对本地的事务很熟悉，否则他们不会听你发表任何对全国性事务的见解。可是，熟悉当地事务并不容易。有一次，我们到访萨斯喀彻温的乡间小镇埃斯特黑齐（Esterhazy），巧兰和我在从政之前便来过这里。早在19世纪

80年代，匈牙利人便率先在这片平原上安营扎寨，他们中的某些人至今仍葬在城外的一座山丘上。我的夫人正是一名匈牙利后裔，她以前在我面前读起这里的地名时，会像在娘家说话时一样，发出一个短促的a元音。可当我试着在发表政纲时模仿她的口音，人们的表情却冷若冰霜。原来，当地人在读这里的地名时，发的是个拉长的a元音。一个小到如何正确地发一个元音的细节，也可以决定你和当地人建立联系的能力。

政治强烈的属地化本质时常让我不禁怀疑，究竟什么才是我们作为同一国人民、组成同一个国家而共享的事物。为我们的共通之处发声，正是一个政治家背负的责任，尽管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我们相通的地方并不多。

这个问题在魁北克尤为突出。我原以为自己的法语已经足够流利了，可当我来到魁北克农村与当地的党代表交谈时，我的法语能力仍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因为当地大部分居民只会说法语，还带着浓重到让人难以理解的口音。用你的第二语言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感觉就像是在一条信号很差的电话线上打越洋电话那样艰难。况且，我所说的法语比起魁北克更接近巴黎口音，这一点也常为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我花了好一阵才适应了当地的口音，能够听懂当地人说话。我的夫人告诉我，我一开口说法语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的动作幅度会开始加大，甚至有那么一点过于做作。

魁北克曾向国家提出过许多要求，但都落在同一个大范围里：承认他们独特的民族身份。时至今日，只要想到1759年被英国打败的6万法国殖民者如今竟然发展成了一个拥有800万人口、充满活力、联系密切、热情洋溢的群体，人们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然而，无论他们多么成功，他们始终都没

忘记在这个拥有3亿英语和西班牙语人口的北美大陆上，这里是一座说法语的孤岛。

我们党和魁北克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党的创始人威尔弗雷德·洛里耶（Wilfrid Laurier）是加拿大历史上的首位法裔总理，自此之后，三名来自魁北克的政治家——路易斯·圣洛朗（Louis St.Laurent）、皮埃尔·特鲁多和让·克雷蒂安——曾先后出任自由党领袖和总理。长期以来，国家统一——使法语人口与英语人口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融合到一起——是自由党人心中神圣的使命，然而，腐败的丑闻却使我们逐渐失去了魁北克选民对我们的信赖，从而使左翼的魁北克集团和史蒂芬·哈珀领导的右翼的保守党有机可乘，夺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众多议席。就连对魁北克政治长期介入甚少的新民主党人，都开始成功地说服部分原先忠于自由党的选民。

想要夺回执政权，重获魁北克人民对我们的信任至关重要。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市（Quebec City）、圣劳伦斯航道北岸的小村庄和临近加美边境的农村地区，我每到一处都会提醒当地的党代表，当初接纳了我的俄国家族并给予我祖辈庇护的，正是魁北克。我说，他们就长眠于俯瞰圣弗朗西斯河的墓园里，我多么希望这块土地将永远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对我而言，给予魁北克省以更大的自治权不仅会加大社会分歧，而且似乎也不能解决关键问题。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要展现出这样一种信念，即除非魁北克和魁北克人民是这个国家的核心构成，否则加拿大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2006年6月下旬，正当魁北克人民准备迎接圣让巴普蒂斯特日到来之际，一名记者基于我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血缘与归属》中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问我是否认为魁北克人是一个民

族（nation）。这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术问题。魁北克的分离主义者坚持主张他们是一个民族，并且依其身份，应当获得独立的国家（state）地位。魁北克就这个问题已先后举行了两次公投，分离主义者在1995年举行的第二次公投中仅以6万票之差落败于联邦派。13年前，我在《血缘与归属》中写道："因为我们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所以无法热爱同一个国家。" [3] 然而不同民族，我继续写道，却可以共享 同一个国家，我相信我们永远都会这么做。魁北克当然是一个民族。

刚结束这一访谈，我就立刻意识到一位作者笔下的文字和一名正参选联邦公职的政治家口中的话语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我这句简单的评论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一些专栏作家认为我很勇敢，也有人说我是个白痴学者。与我同台竞争的对手们也都被迫表明自己的立场，有人支持，也有人强烈反对。有一段时间，一些魁北克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会群集在我们的竞选横幅前，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以一种自由党此前从未有过的态度给予了他们某种意义上的承认。

在政治里，把一个事实叫作事实，有时像拉开手榴弹上的保险针那样危险。以我之见，身处法语区的魁北克人民有自身的民族身份本就是一个事实：一直以来，他们都同时视自己为魁北克人和加拿大人。他们对加拿大的忠诚不会因此被削弱，虽然确实会让它变得更复杂。加拿大政治的智慧之处就在于，我们从来不会把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身份强加在任何人身上。我们建国的基础并非合众为一 （*e pluribus unum* ），而是多种互相重叠的复杂的身份认同。在我们创造的这个国度里，"魁北克人"和"加拿大人"这两种身份认同谁先谁后无关紧要。我之所以反对分离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自身处于成为独立国家的状态而自豪，而

是因为他们坚持独立建国的主张，因为他们认为魁北克人必须要在魁北克和加拿大这两者之间做一个存在主义的抉择。这正是大多数魁北克人一向拒绝回答的一道选择题，因为他们对两者都能感到一定程度的忠诚。无论是把哪一种身份认同放在首位，他们都希望自己既是魁北克人，也是加拿大人。分离主义者胁迫人民二选一，无异于逼着他们把自己硬生生地撕成两半，这是一种道德专制的行为。经过一番辛苦陈述，我最后说道，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都建立在归属自由的基础之上。在此之上，我们的联邦主义体制才得以建立。我说，我们无法在这个国家实行中央集权，正是因为我们无法集中地认同同一种身份。

话音刚落，英语区的人民便开始质问我的言论是否正置国家的统一于危险境地而不顾，而部分推崇民族主义的魁北克人则想知道我何时才能在加拿大宪法中承认他们的民族性。我答道，我反对打开宪法这只潘多拉魔盒。我们之前习惯将一切魁北克和加拿大之间的问题都归结到宪法上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啊哈，一些魁北克分离主义者说，那你刚才说的关于民族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我已经把自己的声誉赌在了国家统一的议题上，那现在也是时候要承担后果了。

我们的对手，保守党政府目睹着这一切，总理史蒂芬·哈珀也始终对此保持着高度关注。2006年11月末，当我们的党领袖竞选活动接近尾声时，哈珀突然决定将主动权从我们的手中夺走。他在众议院发起动议，建议承认魁北克人——不是魁北克本身——是构成一个统一的加拿大的一个民族。[4] 这让推崇分离主义的政党魁北克集团沮丧地咆哮，他们宁愿让推崇联邦主义的对手否认魁北克人民所希望获取的民族地位。我们党也只能哀号一番，因为我们本想把这功劳握在自己手里。可他是总理，他想

从我们手里拿走什么，就能拿走什么。当动议被提出的那一刻，我从自己在众议院的位置上站了起来，支持承认魁北克人作为构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一分子的民族身份。这在我们的议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也为促成这件事做出了贡献，但这位以老谋深算著称的总理却把功劳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仿佛这是他自己应得的。

为竞选党领袖而遍访全国的那段时间，我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认识我们的国家。起初，各地争着抢着想要获得身份承认的呼声不绝于耳。联结不同族群的共同纽带看上去既孱弱，又无力。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为了夺取定义作为集体的“我们”究竟指代什么的主动权，不同群体和不同利益集团间持续不断的争斗俨然已让我们的国土化为一片疆场。诚然，人们会有为了国家共同欢呼的时候，然而相比起为国欢欣和对国家的忠诚短暂，大家更多时候都在为了如何阐释那些共享的理念而纷争不断。一个人对其所处族群的诉求，时常会和他人的诉求存在冲突。每个群体都希望自己的独特性可以得到承认，却又都不情愿承认别人的。加拿大国内的不同族群时常给人以互相隔绝、不相往来的印象。移民群体渴望有更多移民进入，工会工人则希望减少移民数量；富人希望减少税赋，穷人却想要得到更多救济。任何形式的控枪，对所有小城镇与农村地区而言都很难接受，但却是赢得城市选民支持的关键政策。所有地方都想得到更多的联邦拨款，却又不愿联邦政府插手干预省内司法。从纽芬兰岛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内陆地区，再到魁北克最闭塞的地方，它们和各省一样有着强烈的防备心理。亲眼目睹了这些事实后，我开始将这个国家视作一个政治的而非自然的产物。一旦将国家视作一个持续不断、夜以继日的意志行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政治家的角色很重要。正是他们把诉求各不相同的人们带进了同一个房间，让

大家一起挖掘彼此共享的事物和共同的愿景。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政治家则是那些将人们共享的一切展现出来，然后在众人各异的诉求间寻求妥协以让人们和平共处的人。[5] 2006年夏日的竞选活动里，我始终都在向人们传递一个“公民身份脊梁”（spine of citizenship）的概念，它让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求同存异。所谓的“脊梁”，指的不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在国家不同地域有大抵相似的公共服务，更意味着政府应尽己所能强化人们共同的经验、共同的历史责任感与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把我们凝聚成同一个民族。只有当你自己亲身从政时才会理解，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的众多分歧，以及对于统一的渴望才是超越差异的存在。政治家们必须想尽方法去阐释人民的共同之处，并将那种公共生活融入国家的制度设计。刚起步时我并不知道这也是自己的一项工作，但我之后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个遍访全国的夏天，让我发现了国家内部悬殊的地方差异，可是这些差异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我所说的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市区与郊区之间的差异、南北差异，以及繁华都会和偏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美边境上的闹市区里，时间过得飞快，大部分人的工作都很忙碌。在乡村、偏远或北方的城镇——国家的绝大部分地方——时光总是慢悠悠地流淌着，站在加油站付款处的姑娘一边读着大城市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一边幻想着逃离脚下这片无聊的地方，这些地方要么没有互联网，要么需要拨号才能上网，镇子边缘铺着石子路，学校很远，最近的医院也要开四个小时的车才能到。我们国家的地域可以被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你生于斯、长于斯，还能在这里谋生的地方；另一种是你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离开的地方。

这样的不平等似乎从来没人提起——但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我开始愈发频繁地谈起它。虽然人们自愿地背井离乡无可厚非，但要是有那么多人除了出走别无选择的话，那似乎就有问题了。诚然，政府仅凭一己之力要想反转偏远农村地区人口减少的趋势并不现实，但政府仍然能有一些作为——对道路建设、教育设施和网络连接加大投资——就能给那些选择留守家乡、养家糊口的人们以更多的机会。毕竟，我国大部分丰富的自然资源都蕴藏在这些偏远的农村或北部的地区。那里有煤矿，有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森林，还有一刻不停工作着的抽油泵。我还曾去过一些极尽荒芜的地方——原住民的保留地、正逐渐消失或已完全荒弃的小镇——大自然丰富的资源馈赠就躺在这些地方的土地里。要想把这些地方的财富留在本地而不被大城市卷走的话，肯定能找出办法来。就这样，看上去不太可能会呼吁缩小城乡差距的我还真就这么做了。城乡间不公正的机会分布正迫使那些最聪慧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寻求出路，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我决心站出来，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分配希望的国家而战，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站在脚下的土地上为创造自己的生活而战。

亲身从政正是有这样的魔力，能让你改头换面，甚至能让你改变开始时抱持的信念。无论是千百次在偏远地区开会，还是数不清多少次同无论贫富、无论老幼的民众交谈，都在让你心中的那份信念慢慢沉淀。你不再记得那些具体的细枝末节，但一层又一层地，一个真理开始在你心里扎根。你开始从心底理解这个国家，熟悉这片土地。这场一开始只为了你自己的冒险，逐渐变成了背负众人寄托的征途。政治会慢慢地让你明白——虽然有时候这个过程十分艰难——你是在为谁从政，又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

---

[1] 国际狮子会（Lion Club International）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非营利服务组织，目前拥有超过46000个分会及140万名会员，分布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译者注

[2] Baldesar Castiglione，The Book of the Courtier（London：Penguin Classics，1967），p. 67.

[3] 参见Michael Ignatieff，Blood and Belonging，p. 212。

[4] 保守党的众议院动议原文为："我众议院承认魁北克人民是构成统一的加拿大的一个民族。"2006年11月27日。

[5]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New York：Verso，1991）.

第五章 金钱和语言

直到2006年盛夏，我仍在角逐党领袖的过程中一路领先，不免会遇到所有领跑者都会遇到的挑战。我成了所有竞争对手联合攻击的目标，他们甚至开始在私下里谈判交易，试图将我挤兑出局以防我最后胜出。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不得不加大宣传攻势的力度，尽量将更多的党代表争取到支持我们的阵营中来。我们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办公室原本设在离央街（Yonge Street）不远的伊莎贝拉大街（Isabella Street）上的一家饭店里，但这里的空间太过局促，显然已无法容纳我们这个日渐庞大的团队。因此，感谢某位地产开发商出手相助，才让我们得以搬进不远处的布洛大街（Bloor Street）的一处更大的房子里。

忙于在全国奔波筹款的我，并没有本末倒置地选择坐镇大本营，亲自掌控竞选活动的运行。然而，每当我现身于竞选总部，并向在场的电话拉票员们致以问候的时候，对我而言全是陌生人的他们都会热情地向我招手，越来越多拉票员的加盟和不断壮大的竞选阵势，让我每次回来时都感到十分惊讶。所有竞选活动由伊恩·戴维和一群尽心尽责的年轻律师把控着，他们都主动辞去了先前的工作，在这里拿着最低工资全职工作。与其要找一群经验老到的幕僚再向他们支付咨询费，我更愿意和他们共事（即便我付得起他们的咨询费我也情愿如此，虽然事实上我并无财力承受高昂的咨询费用）。政治家离不开幕僚的辅佐，离不开他们对民调数据、焦点小组调查和市场战略头头是道的解读分析，但与此同时，政治家也应当明白，这些受雇于你的幕僚不应当成为整个竞选活动的主导。选举政治必须给那些从街头巷尾走来的志愿者们以足够的空间来施展他们的才华与抱负。要是身边没有一群

满腔热忱的志愿者，政治家就不免沦为幕僚手中的傀儡，任人摆布。况且，志愿者们对政治家的忠诚是再多金钱也买不来的。任何政治活动中，领袖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让其周围的人时刻保持对领袖的忠诚，而领袖也必须不负重托、以身作则。在我身边的人一路上与我同甘共苦，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与我成为了挚友。当我在外奔波、遍访全国各地的时候，他们也在游说各地党员，以确保只要某一个选区开始本地党代表的选举，当地党员一定会选出一位支持我的党代表候选人。要知道，这个年轻的团队里没有任何人拥有运营这样一场全国性政治活动的经验，但他们却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不断增长的开支却开始让我们在财务上捉襟见肘。

与美国的标准相比，我们用于党领袖竞选的预算少得离谱，仅有230万美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坐一辆老旧的别克君威，搭普通的民航客机到四处工作，睡在最普通的酒店里，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支持者家中空余的房间里对付一晚上。这就是加拿大政治的运作方式，我们的民主相对而言并不昂贵。2011年，在我们这个国土比美国广袤但人口只有其十分之一的国家，一场联邦选举只花费了2.91亿美元，而2012年美国选举的总花费则直逼6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1] 追根溯源，这悬殊的差距不只是因为我们可花费的事项较少，而是因为加拿大对选举花费有着严格的控制。在加拿大，选举活动的财务状况由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s Canada）这一联邦机构全权监管。与欧洲的做法类似，加拿大各政党可以根据上一轮选举中的得票数量获得相应比例的纳税人所缴税收作为竞选活动的预算[2]，但必须在选区和全国两个层面上都严守对资金使用上限的规定。以2006年的党领袖选举为例，任何捐赠者最多只能为我们的选举活动捐款3300加元，且现金和来自国外的政治献金都不得被接受。另

外，我们必须将每一笔政治献金捐赠者的姓名与地址上报给选举局，再由选举局将这些信息刊登在一个公开的网站上。只有通过官方渠道上报并开具收据，捐赠者才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时至今日，你仍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每一个曾经勇敢地给我捐过款的民众的名字。所有这些规定都对负责上报捐款信息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他们也让我得以从这些繁复的规则里被解放出来。当那些身材魁梧、有钱有势的人穿着一身挺拔的西装在筹款活动上出现并与你勾肩搭背拍下合照的那一瞬间，你会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刚被某个利益集团所挟持，我想任何有过参选公职经验的人都明白这种恐惧感是怎样的滋味。选举局设定的资金规定则让我们得以免于如此恐惧感之扰。我清楚明白地知道每一笔资金的来源和捐赠者的信息，而且对献金上限的规定又能让我免于受任何利益集团挟持。这也让所有支持我的公民松了一口气，因为献金数量的有限让他们不必被人怀疑自己是想试图通过捐款对候选人施加影响。他们只是简单地想要支持这一政治进程，并同我们共享期间的激动与兴奋之情。这次竞选经历让我对于政府对选举资金做出规定的必要性深信不疑——上报与披露的流程规定、献金数量上限规定，以及禁止第三方势力对选举过程施加影响的规定。如果我是选举规定的政策制定者，我会将这些规定再向前推进一步，禁止在非选举期间进行政治宣传，以防没完没了的选战让政治家离选民越来越远，让政府一心只想着赢得下一次选举而不去尽职履责。我希望政治家们能从大金主的压力下解放出来，也希望政治家们能免于第三方造势机构的肆意诽谤和诋毁。政治家们当然可以尽己所能筹得更多的选举资金，但他们绝不能挥舞金钱政治的大棒来逼人们就范。

美国在金钱政治上的态度与做法多少让我有些困惑，尤其是前几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案的判决更

是让我难以释怀。[3] 不管大法官们如何陈辞，金钱始终不能和言论画上等号。金钱代表的是权势。让我惊讶万分的是，财主们对政治进程粗暴的干预竟然受到了第一修正案的庇护，要知道，第一修正案的本意在于保护自由的政治辩论得以开展，而不是为金钱政治开脱。而且，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人们也并不是不知道金钱可以对选举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于代表人民议政的政治家的腐蚀可以有多严重。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例的美国国父，皆十分精通于任何可溯源至罗马共和国时期有关政治道德和腐败的经典共和政治著述。这些著述让他们明晰地认识到政治中的金钱必须被严格管控，以免其腐蚀一个崇尚自由的民族。托马斯·杰斐逊在1816年所写的一封信函中，称自己希望能够“从摇篮里扼杀那些富有企业的贵族们尝试挑战政府权威、拒绝服从国家法律的企图”[4]。在我看来，他所担心的金钱腐蚀似乎已提前到来，政治道德也似乎逾期不归，要想砍断金钱伸入政治的触角，除了强化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职权，并赋予其要求披露每一分一厘政治献金来源的权力，或许别无他法。美国必须让第一修正案的功用回归其被写下时的初衷，即保护自由的政治辩论得以开展。金钱的影响力显然已公然违背这一初衷。加拿大在这一问题上的监管模式或许无法在美国被复制，但它和欧洲模式一样，展现了兼顾管控金钱政治与保障言论自由的可能。

那年盛夏，我和巧兰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以专心起草一份政策宣言。当时正值选举活动的高潮，各位候选人都已陆续表明自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以肯·德赖登为例，他的那篇名为《加拿大雄心》（“Big Canada”）的文章甫一公开便收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他在文中呼吁人们齐心协力促生一个更具雄心壮志的加拿大。读罢该文，我心想，是时候写下我的观

点并带着它们加入全国的政治辩论了。于是，我写下了这份将近八千字的政治宣言——《国家建设日程》（“An Agenda for Nation Building”）。既然史蒂芬·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决心要将国家带入衰退的泥沼，弱化联邦政府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我认为一向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我们应当站出来不遗余力地批评他们的做法：我们的政府应当遵循这样一个核心的宗旨——强化公民身份的国家脊梁以团结所有的加拿大公民。我们的同胞在偌大的大陆上四散而居，彼此的家乡、种族、宗教和语言各不相同，因此，我们的中央政府应当履行这样一个职责，即保证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公民身份条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建立大到令人反感的政府机构才行，因为自由必须是享有公民身份的前提。然而，有这样一个政府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公民便能安心地确保自己不会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债台高筑，也可以确保自己搬到另一省份生活后仍然能够享有与从前大致相同的社会服务、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障。在医疗保障问题上，我们和新民主党人在过去的立场相同，都强调个人财富不应影响人们接受的医疗服务质量。我们因此走到了一起，提出了建立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设想。但是，如今关于这一设想的争议焦点却转移到了接受医疗保障服务的地域限制问题上。我们坚信，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北部地区居民有权和大城市的居民享有同样高质量的医疗保障。设立医疗保障全国标准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确保这一点：尽管我们分散在10个省份、3个地区，整整跨越了49条纬度线，但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公民身份。我们同属一个国家，我们始终坚信，正是这个富有创造力的国家政府将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我们成为了一个共同的民族。

在选举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一些积极有为的设想：在魁北克市——温莎走廊（Quebec City-Windsor

Corridor）建设一条高速铁路，以连接在这条走廊上生活的我国60%的人口；帮助生活在《印第安人法》（the Indian Act）阴影下的原住民摆脱该法案有辱人格的区别对待，重获与他人平等的公民身份；重新恢复联邦政府对科技项目的投资，以抵消私有部门长期以来对研发投入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我们还制定了全新的国家能源战略，包括打通一条横贯东西的电力和油气走廊，以减轻目前南北向电网与天然气管道的过重负荷。在我看来，要想实现以上这些设想，不能仅靠联邦政府一家坐镇首都、指点江山，而要寻求和各省政府、私营部门的通力协作才得以可能。因此，总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仅需要排兵布阵、掌控全局，还要能够厘清各方的轻重缓急，从而找到一个合适的支点下手来撬动全局。

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或许会觉得，这种宏大的设想只有愚蠢到会跑来政界碰运气的知识分子才想得出来，实属痴人说梦。这种观点显然低估了施政理念在描绘候选人形象和拉拢支持者时所能起的决定性作用。政治家在判断属于一个理念的时机何时到来时，必须得有些特殊的天赋，这样才能在恰如其分的理念上做文章从而将民意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在我们发布《国家建设日程》的小红书后，来自媒体和竞争对手的嘘声不绝于耳，可每当我注意到会议结束后来找我攀谈的年轻人手里都会攥着一本已经被翻旧了的小红书时，我就知道我们成功引起了这些年轻人的共鸣。

多亏我们的施政理念深入人心，加上全国竞选活动声势浩大，我才得以在这场党领袖竞选里愈走愈远，而我的竞选对手们恨不得我立马在他们面前摔一个大跟头。

2006年7月，黎巴嫩战争爆发。8月上旬，所有党领袖候选

人都已就加拿大在这场危机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表明了立场。我们有必要在此稍作停留，来看看这件事到底有多古怪。我们这些候选人里没有谁有能力对中东局势的走向产生任何可以预见的影响，我们只是在野的反对党，而不是执政者本人。表明对这场战争的立场，对我们而言，最多会让我们在全国犹太人、黎巴嫩裔和穆斯林族群中获得更多支持，仅此而已。无论黎巴嫩人民正在经历如何切肤的伤痛，作为一个政治话题的黎巴嫩战争在加拿大一个政党的党领袖选举中都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议题罢了。然而，政治就是如此。尽管政治家们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事件毫无影响力可言，他们的立场和看法却能左右普罗大众对其是否能胜任公职的看法。

用政治的眼光来看，这场黎巴嫩战争正是让我给自己定位的好机会。给自己定位不同于在某一议题上选取立场，它不需要你对复杂的局势出谋划策，也毋需任何专业背景。给自己定位，就是要在政治光谱上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独特位置，既要和其他对手有所区分，又不能和大部分人的立场差别太大。定位的目的，便是校准你在公共事务上的立场，从而和你意欲说服的某个选民一致。定位要讲究战略，你不必事事都力求我口说我心，但必须事事都有所准备再开口陈辞。要是定位成功，你便能毫无削足适履之嫌而赢得目标群体的支持；要是失败，你必然会显得婢膝奴颜。

实不相瞒，这场黎巴嫩战争的定位良机被我彻底搞砸了。我在当时的一场访谈中，一个不小心便脱口而出称，我并不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占领区发生的惨重伤亡。其实我的意思是，既然这场战争是由真主党开启的，不管结局有多惨烈，他们都必须接受。可是，我的这番话一经公开便被迅速解读为对

平民伤亡的冷血与无情。这一解读在居住着大量黎巴嫩裔居民的蒙特利尔产生了尤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弥补此前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数日后特地出现在魁北克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大家谈》（*Tout le monde en parle* 或*Everybody Talking About It* ）的嘉宾席上。我在节目中说，攻击黎巴嫩南部小镇加纳（Qana）的以色列军队或许已经犯下“战争罪”。当这番言论被译为英语并在全国的英语媒体中广泛传播后，立刻引来轩然大波。我当时的意思是，面对真主党的炮火，本处于正当反击中的以色列国防军却不加判断地攻击了一片平民聚居的区域。我在哈佛的课堂上曾教过有关《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内容，我当然知道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之间有什么区别。我绝对不相信以色列国防军会蓄意地屠杀平民，但他们确实使用了过多的军事力量未加区分地打击了一处非军事目标，并且造成了众多平民伤亡。然而，支持我的犹太民众显然认为，在我的心中，以色列早已和纳粹画上等号了。

他们耳朵里听到的并非是你的本意。我无意撤回这些言论，因为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早已确认这场战争中滥用武力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我后来还是再一次重申了我对以色列正当防卫的支持。我知道，无论再多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正因为说错寥寥几句话，我便失去了许多犹太裔、穆斯林和黎巴嫩裔的支持者。事件发生后，媒体因此掀起的风暴，犹太支持者对我感到的愤怒和幻灭，以及这一争议对我们的竞选活动产生的灾难性影响接踵而来，无不让我大惊失色。回头来看，这个事件揭露了一个奇怪的事实：在像加拿大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并存的社会中，最能引起国内社会分歧的竟然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国际事件。尽管相距千里，但发生在母国的冲突却有本事让身处加拿大的同胞们严阵以待，这就要求政治家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能

治愈伤痛的神奇魔力，他们必须是平衡各方利益的高手。我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评价都不合格。待这场有关黎巴嫩战争的争论平息，伊恩·戴维安慰我说，政治家都有九条命。加纳事件后，我就只剩一条命了。

至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稍做停顿，从这一事件中反思语言在政治中的角色。如果你在踏入政界前曾是名作家、记者或教师，那你在运用政治语言上势必不会占什么优势，因为它和你此前玩过的所有文字游戏都不一样。或许你曾因为自己出色的沟通能力而感到沾沾自喜，但当你第一次踏上政治的舞台，你也会有这种好像走进了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香蕉》（*Bananas*）里，亲眼看着那个拉美游击队领袖宣布将瑞典语定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一般荒谬的感觉。你离开了那个善良的世界，那个人们总是宽容善良地替你说完未尽的话，还对你的口不对心表示理解的世界。你转而进入了一个疯狂、愚蠢、想象力极度匮乏的世界，人们会逐字逐句地检验你的言语，你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你的为人。同时，你也离开了一个互相原谅和遗忘的世界，一个允许往事随风散去的世界。你进入了一种当下即永恒的状态，你嘴里发出的每一个音节，你指尖敲打键盘发出的每一条推特、脸书状态、报纸文章和令人尴尬的合照，只要存在于网络空间，便等于给了你的竞争对手以攻击你的机会。你要是还因此特地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予以澄清，那你已经在这场选战里输了一大半。在这场加纳之争里，我脑海里甚至出现了这样荒诞的想法，其实我那些没被人发现的评论才是我全部的生活。难道没有人知道我曾在以色列执教和生活，还曾为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赛亚·伯林作传？[5] 怎么会有人认为我只是一个一味批评以色列的人？但这些都不是关键。我确实没能意识到一个族群在感到自身受到攻击后会以何种方式倾听。以赛亚·伯林曾和

我谈论过这个问题。他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20世纪20年代，在他长大的伦敦北部犹太人社区里，人们唯一关注的政治议题便是“这对犹太人是好还是坏？”这种二分法才是人们倾听政治语言的真正方式，不仅对于犹太裔人民而言如此，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承认的族群而言皆是如此。锡克族人民想知道关于他们在印度备受压制的同胞的人权问题上，我所持的立场；泰米尔裔人民也想知道我对正让斯里兰卡面临分崩离析威胁的内战持何种态度；还有，伊朗裔人民也想知道我如何看待伊朗的神权政体。对犹太族群而言，他们能够接受的底线是对以色列享有的自卫权的明确支持。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任何疑义，但我必须就一个被赋予合法自卫权的民主国家是否也有权僭越战争法提出我的质疑。这一点本不应该成为争议的焦点，一个加拿大政治家为什么要就另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是否在战时遵循《日内瓦公约》提出质疑？这不是我的工作。但我在加纳问题上的评论却被犹太裔人民解读为我对他们是否拥有自卫权的质疑。不管我此后再做什么，都无法挽回该族群领导层对我的信任了。自从史蒂芬·哈珀代表加拿大政府在以色列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毫无变通余地的立场后，我便再也无法获得犹太族群间那个坚信两国方案 [6] 才是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最佳路径的一派的支持。此后，我在这一问题上再也没有了昭雪的机会。

政治和生活一样，个中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从过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待这场争议渐渐散去后，我在位于多伦多的圣花犹太教堂（Holy Blossom Temple）做了一场演讲，细数我从这次争议里学到的教训：

> 历经磨难与过失——主要是过失——我终于总结出几条结论。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一句话成了指引我的纲领。他说，政治家不应做一个沙发。我们不能任由最后一个坐在我们身上的人塑造我们的形状，我们应当坚守自己原来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坚守原则。那应当坚守些什么原则呢？

原则一，坚持始终如一。我不应该在这里因为袒护以色列而背叛身处我们这座城市另一端的清真寺里的朝拜者，我也绝不应该在清真寺里为了袒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巴勒斯坦，去背叛我在这座犹太教堂所许下的承诺。我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原则二，不得因言论不当引起纠纷。我必须心口如一，只将我意欲表达的说出口。我绝对不得为了迎合仇恨与不满的情绪而发表言论，我若发表此类言论，便是背叛了自己要将加拿大人民团结起来的使命。原则三，我必须为加拿大发声。我从不代表任何以色列或其他国境内的政治势力发言，只有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可以指导我作为一名选任代表的言行。在处理与中东关系的问题上，为加拿大国家利益代言意味着竭力避免可能进一步拖累以色列的更为严重与致命的冲突。[7]

我从历次过失中吸取的教训，就是认识到了政治可以是一场文字游戏，尽管还不至于是一场纯粹的拼字游戏（Scrabble）。没有任何政坛新人会在一开始就做好了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的准备。你嘴里冒出来的每一个单词都可能成为对手反击你的好机会。初涉政治的人几乎都会不可避免地把他人的攻击放在心上，殊不知这就成了他们政治生涯里犯下的第一个错误。经验老到的专业政治家们早就想明白了，你早晚也得学会：永远别太在

意对手的攻击，这只是大家的工作而已。

眼看党领袖选举的日子一步步逼近，各位候选人间的公开辩论变得愈发剑拔弩张了起来。我记得2006年11月下旬在蒙特利尔举行的最后几场的辩论会上，我的对手之一李博又一次搬出了虐囚的话题，要求我就自身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做出澄清，并且声称要是我拒绝澄清，就表明我无法成为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的坚定捍卫者。看到眼前这位好友也在散播这个陈腐谣言，我不禁怒火中烧。下了台后我俩擦肩而过，他看着我，耸耸肩说："这就是政治。"他说的没错，在政治的舞台上，本就没有良心好坏这一说。

你当然可以就对手的恶意向媒体大吐苦水，但他们终究不是裁判，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当然希望你们打得越激烈越好。正如一位媒体朋友曾经对我说的那样，"我们的工作就是来观察你们之间的战争，待双方开打后再朝着受伤的一方再开一枪"。只要你中过媒体的枪，你从此以往就再也不会怠慢同媒体的一切交往了。你会开始用战略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且从此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形象，就连一根不服帖的头发、一个打歪了的领结甚至是西装上一点点的污渍也不会放过，随时随地准备迎战。同时，踏足政治还意味着你从此必须放弃任何即兴讲话的念头，再也不能享受脱口而出的快感。要想在政治的疆场上存活，就必须在大脑和嘴巴间的通道上装个过滤器，要是你想说的话可能反过来被对手用来攻击你自己，那毫无顾忌的表达自我无疑成了你生活中无福消受的奢侈品。你说的话，正如你的为人一样，都要被保护起来。当然，你仍然可以苦中作乐。实际上，你必须表现得乐在其中，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到一个乐观的武士，尽管每个武士，无论多么乐观，都不得不随时保持警惕。

显然，面对直白的提问只有直白的回答最为恰当，而且，你在回答民众提问时保持率直的态度也是你的义务。毕竟，是他们投票选出了你。然而，和媒体打交道适用的却是另一套不同的规则。记者发布会或采访就好比一场奇怪的歌舞伎表演，不带妆就上场的做法决不可取。必要时，时刻保持战略警惕，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开诚布公。正如一句非洲谚语所说，真相虽好，却并非都适合脱口而出。你会试着永不撒谎，但这并不代表你必须回答别人问你的每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那些你想回答的就好。

当你准备向公职身份的要求妥协时，你的内心便开始被你的公众形象重塑。踏足政界不到一年，我开始感觉自己像是被另一个自我控制了一样。这个完全陌生的自我，常常让我站在镜子前却难以认清镜子里的究竟是谁。我总是穿着哈里·罗森（Harry Rosen）的定制西装（哈里亲自为我量西裤的尺寸），戴着和衬衫颜色搭配的领带出席活动。我这一辈子都没像那段时间穿得那么考究过，我心里却从来没有那么空落落过。回望那段岁月，我真切地认为只要你还存有那么一点表里不一的空虚感，那你的心理起码还算是健康的。当你再也意识不到你面向公众的一面正在侵蚀你的本我之时，麻烦就大了。当你忘记自己原来还有和面向公众的那个自我不同的本我，你的全部生活就会被政治逐渐吞噬。你成了自己那张被政治训练出来的固定的和蔼笑脸。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那便证明你已失去了自我。

随着2006年12月的悄然来临，辅选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开始建议我打安全牌，除了尽量避免口误外，讲话内容还必须保持在安全范围内，绝对不能脱稿发言。这或许是个深谋远虑的建议，却让我松懈了曾经坚守的信念。我能感受到自己言语间鼓舞人心的力量正在流失。优秀的政治家和演员一样，都应该有一套自己

的“永葆青春”的长久之计，他们需要不断革新自己的角色。然而，我在党代表会议和募资活动上的表现却越来越像一场每日重复上演的马戏团表演，连我自己都觉得俗不可耐。随着党领袖选举开始进入倒计时，我的竞选团队此时已达数百人的规模，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给各地党代表打电话拉票，而我却开始反思政治家的身份对我的意义。虽然我已经成功让自己成了一名政治家，但我真的不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

我并不希望把这些想法在他人的面前表露出来，尤其是当巧兰和我在蒙特利尔会议中心的接待套间里、在支持者群集的场合上，还有在和其他候选人秘密会面的酒店套间里。可是，政治正是这样一种浸润在各种无耻的魅力之中的游戏。台面上再怎么针锋相对的对手，走下舞台也会坐下来耐心地听你能给他怎样优渥的条件，来让他呼吁支持者把票转而投给你。这便是政治那令人不耻的魅力所在。事实上，我给不了他们任何实际的利益，但我仍然会慷慨地承诺他们，一旦我当选，便会将某些政府要职委派予他们。这就像是在玩大富翁一样，所有的筹码都不是真的，相互间简单握个手就等于签了合约。我也知道，这个刚和我谈妥握手的人，出了门又会转战下一场闭门会谈，看看其他人是否能够给他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职位。要是我没能成功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压倒性的支持的话，这些握手间达成的秘密交易也就统统作废了。要是我获得的支持甚少，那原本支持我的人也会立马转而支持那些势头正劲的候选人。任何一场结局当场见分晓的大会都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赌你能在台上待多久，这就是游戏规则。我的酒店套间还迎接过包括锡克人、穆斯林、黎巴嫩裔和希腊裔在内的国内各个族群的权力代理人，在和我们秘密会谈并互致敬意后，他们也承诺让本族群的所有党代表在选举中支持我。虽然他们这么说，但我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酒店大厅另一头其他候

选人的套间里头也做过相同的承诺。

党代会开始前，我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去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因此，身处选举现场的我，竟在不知不觉中竟哼起了多丽丝·戴（Doris Day）的那首《世事不可强求》。[8] 我背后那支数百人的辅选队伍仍在大会现场和酒店套间忙碌地工作着，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仍在争取各路党代表的支持，并且把分散在四处的支持者聚拢到一起来，防止有人投敌。他们成了我最后的希望。其实选举开始前，我就知道自己注定不会在第一场投票中胜出。虽然我身后有不少热情的支持者，他们也始终将我看作是革新、改变和国际主义的代表，但也有一批人在不遗余力地坚持诋毁我，把我形容成一个来自哈佛的势利鬼、外来的投机精英和小布什的拥护者。类似地，有人欢迎我称魁北克人为一个民族，也有人痛批我是在出卖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只要有人被我描绘的未来蓝图所鼓舞，就一定有人会质疑我不够资格出任一党领袖。

当我在酒店套房楼上起草大会演讲稿时，我没有让任何一位顾问站在边上给我出主意。我想在这次演讲里摆脱媒体之前所有的负面报道，摆脱任何他们曾对我产生的误解。我也不准备引用任何人的话，不管引用正确与否。我只想站在那4500名同我一样的加拿大公民面前，把我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他们。我渴望有那么一刻，他们之前对我的所有误解能够烟消云散，我能够让他们再次坦然地接受我，一个真实的我。我渴望自己能在他们的承认和接受中赢得这场党领袖的选举。相信我，假如你是我的话，你也会这样想。为了让我的渴望变成现实，我反复地排练，打磨这篇演讲，试着寻找能使听众心头一亮的最合适的词汇。那一刻终于来临了，当我站在舞台上，面朝被挤得水泄不通的会场发表

演讲之时，心中逐渐升起一股解脱的振奋之情：

正如我在此前的竞选活动中反复强调的，我们必须是——我们也正是——一个希望之党。然而，希望始于机会。

让低收入的加拿大人获得更多福利的机会，让原住民能在生活的社区里经营小生意的机会，让人们都能买得起房子的机会，让新移民们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的机会，让女性可以免于贫穷和暴力的机会，让农民能安心地将富饶的农田传承给下一代的机会，让老年人能在生命的尾声有尊严地实现他们的加拿大梦的机会。

既然希望始于机会，那机会就意味着教育。我们的党必须能够有足够的底气向每一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承诺：只要你想接受教育，你就能得偿所愿。

机会还意味着创新。我们必须要让每一位科学家、研究员、商人和投资者心服口服地朝着我们说：这些自由党人确实有点能耐。

我们要让加拿大的未来充满更多机会。我们希望的未来，是华裔和印度裔的国人后代能够助我们征服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和亚洲市场。

我们希望的未来，是我们的下一代不必受我们今日欠下的债务之苦的未来，是一个山青水绿的未来。

只有我们的政府能让污染环境者付出代价，市场才会响应。只有市场响应了，政府也行动了，我们过去的错误才能

得到改正，我们留给下一代的遗产才会是绿色的。

一位优秀的加拿大公民也同时是一位优秀的世界公民。自由党人眼里的加拿大，既是带领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的领袖，也是捍卫全球民主和人权的领袖；既是一个致力于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基本保健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榜样，也是一个坚持提升国防能力以保护弱小的战士。

这就是自由党人为何从政的理由，这就是我们坚持的理念：

希望，机会，环保，国际社会的领袖地位。

此外，我们还始终坚守着这个伟大的使命：国家统一。

看看今晚这个盛大的场合！

英语居民和法语居民，都在一起（*tous ensemble*）！

拥有不同信仰、分属不同种族的男男女女们，都在一起！

第一民族 [9] 的公民们、梅蒂公民们、因纽特公民们，都在一起！

无论你来自东西南北哪个地方，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 我流着泪喊道，台下的支持者们也反复呼喊着这句话。无论你身在何方，只要你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公民，我

们都在一起！

人群中有一众我最早也是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是一支来自怡陶碧谷湖滨选区的队伍。当其他党代表们也纷纷加入开始呼喊这句口号的时候，一位从我的选区赶来的英语居民在一片嘈杂中不断问周围的人："他是什么意思？*Tous ensemble* ？他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在一起。

巧兰和我从套房出来，下楼参与投票。你简直无法想象现场有多热闹，只听见会场四处人声鼎沸，纷乱的闪光灯在你眼前闪个不停，一众记者正等着采访你，会场上奇形怪状的人浪轮番出现，一旁的党代表还在边唱边跳康茄舞，现场蔓延着一种集体疯狂的氛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正准备做出一个严肃的决定。在会议厅举行的投票持续了一整个下午。我沿着正排队等待投票的代表队伍，一一向支持我的代表表示感谢。虽然比我们预想得要糟一些，我们还是顺利地赢得了第一轮投票，并在第二轮投票中占据领先位置。然而，随着对手们开始携起手来，我在第三轮中落后了。李博在先前几轮投票中就已被淘汰，正在犹豫是否要呼吁支持者转而支持其他候选人。得知消息的巧兰和我随即向李博的阵营走去，身边围着一群摄像师和支持者。如果李博站出来呼吁其支持者转而支持我，便意味着我将成为新一任党领袖。我们从孩提时代就已相识，我们的父母也都是挚友。那天下午，我还拥抱了他的母亲，并和他一家围坐在选举现场。我们在大学里曾是对手，他后来拿着罗德奖学金去了牛津，而我去了哈佛。在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他曾在我家沙发上睡了六个月的时间。他加入了新民主党后，一跃成为安大略省省长，直到在后一次选举中惨败。为了重新出山已经谋划了许久的他，确实是个能

力出众的政治家。在他看来，他是靠自己的本事赢来了参选党领袖的机会，而我却不是。

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关键时刻，政治站到了友情的对立面。我们被一群摄影师团团围住，身边的记者们也举起了麦克风准备记录下我们口中的每一个音节，而一旁4500名党代表则在震耳欲聋地呼喊着，准备见证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就在我踏入李博支持者所集结的警戒范围时，他的哥哥约翰·雷（John Rae）挡住了我的去路。他是前总理克雷蒂安的心腹，为他工作了三十余年。我从小便认识他，我们也共同见证了1968年的党代会将特鲁多选为党领袖的历史性时刻。现在，他就站在我的对面。他是否会同我握手，成了决定我命运的关键。如果他伸出手来，就意味了李博的支持者会转而支持我，我将成为新的党领袖。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当时的行为让我目瞪口呆，甚至我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只见他张开双臂，双膝微曲，整个人前倾地挡在我的面前，脸上的表情就像个在守护兽穴的猛兽一般狰狞。他龇着牙向我吼道：“退后！”我从未见过这样一张愤怒、狰狞、急切地想要保护身后人的面孔。这种原始、激烈、充满兽性的想要夺取胜利的渴望以及失败后的表现，在任何对政治的真实记录中都必定会出现。我往后退了几步。看来他们两兄弟得不到的，我也得不到。李博的辅选队伍随后放出了原本支持他的代表选票。第四轮投票结果出炉，魁北克人斯特凡·狄安当选新一任党领袖。他众多胜任领袖职务的品质还包括了这样一条：他既不是李博，也不是我。

结果甫一公布，巧兰和我便立刻穿过会议厅，一路上满是杂物纸屑以及被丢弃的加油棒和标语牌，来到酒店的一间宴会厅，惊魂未定的支持者们正聚集在此等待我们。我随后站到一个椅子

上向大家致谢，但我已记不得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一个自始至终支持着我们的年轻魁北克小伙子马克·根德隆当时趴在巧兰肩头泣不成声的场景，还有我们那一向禅宗般冷静的助理马克·查理福克斯一双噙着泪的眼睛。

至于我们俩，在败选面前并未流泪。政治本就如此血腥、刺激、危险。我们已经尽全力地完成了这场战斗。那天晚上，我们在会议中心楼上的酒店房间里分享了同一份晚餐和同一杯红酒，而此时，党代表们已纷纷登上了回家的巴士、火车或飞机，四散在国家的各个角落。我们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政治的外行人已经尽力了。我们尝试了，但我们仍然没有准备好。如果还有一次机会，我们依然会站在这里，鼓足干劲，在命运女神面前再一次奋力一搏。

---

[1] http://www.elections.ca/content.aspx?section=fin&dir=lea&document=index&lang=e；http://www.elections.ca/content.aspx?section=vot&dir=faq&document=faqelec&lang=e#a15；http://www.fec.gov/press/press2009/20090608PresStat.shtml；http://www.opensecrets.org/news/2012/10/2012-election-spending-will-reach-6.html.

[2] 2006年的法案仍然如此规定，2011年开始哈珀政府逐步取消了按获得选票比例获税收作为选举资金补贴的规定，并进一步下调了政治献金上限。

[3] 参见美国最高法院“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2010，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09pdf/08-205.pdf。

[4] http://www.nytimes.com/2009/08/11/opinion/11tue4.html.

[5] 参见Michael Ignatieff，Isaiah Berlin：A Life（London：Chatto，1998）。

[6] 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实现持久和平共处的方案之一，该方案主张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建立两个不同的国家。——译者注

[7] 参见Michael Ignatieff，“Canada and Israel：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the Ties That Bind”，在多伦多圣花犹太堂的演讲，2008年4月13日。

[8] 歌曲原名“Que Sera Sera”，为希区柯克电影《擒凶记》（1956年）插曲。——译者注

[9] 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指现今加拿大境内的北美洲原住民及其子孙，他们与因纽特人、梅蒂人一起组成了加拿大原住民。——译者注

第六章 责任与代议

从古罗马农民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丢下手中的犁去救共和国于危难之中的那一刻开始，许多局外人便由此踏足政坛，并把自己描绘成一反传统政治家的形象，以拯救政治自居。在这场选举里，我便是那个古罗马农人，只是离当选还差了几百票。选举收尾后，我回到首都继续履行议员的职责，但是这次我不能再表现得像之前那么业余了。如果你以为你比圈内人更好，甚至你真以为业余选手有可能打败专业选手，那你就错了。毕生从政的专业人士之所以能够玩转政治，是有理由的。当今大部分政治家在二十多岁时便踏入了政坛，从幕僚开始做起，在四十岁不到的时候开始参加竞选，几乎一辈子都在政治的世界里活动。我本以为政坛也可以有外行人的一席之地，但事实证明我错了。但这并不是说局外人不可能在政坛取胜，巴拉克·奥巴马就亲身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要知道，他的胜利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是他曾在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工作的经历，其次是初涉政治便敢仅凭此前学到的基本技能同内行竞争的勇气，并成功地将年轻人和少数族裔动员起来，并且通过社交媒体来吸引他们参与竞选，而这两个群体曾经长期被民主共和两党所忽视。当我在2006年参选时，距离奥巴马那场精彩绝伦的选战还有两年。当时，我们还没见过有哪个局外人能够赢。

我们的党始终把我看作是个局外人，并未认真对待过我，所以最后选择了一名经验老到的内行作为党领袖也并不奇怪。新的党领袖斯特凡·狄安从政已有整整10年。他在1995年魁北克独立公投时便已崭露头角，当时他同魁北克分离主义者的激烈辩论让人们被他独到的眼光和信念深深折服。投入党领袖选举前刚刚卸

任环保部长的他，不得不在选战中背负民主党政府没能履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给他带来的压力。在多伦多的一场辩论上，我曾就这一点向他提出质疑："我们确实没做到，斯特凡。"我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所以我们之间也并未太过剑拔弩张。他这次参选，不仅通过大打环保牌吸引来了一大批年轻的支持者，而且还不断劝党内精英们说，选择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对他们而言更为安全，由此才夺得了党领袖的宝座。如今选举已告一段落，曾经的对手现在不得不成为互相的盟友，这也是政治的常态。顺便提一句，这一常态同样常常为媒体和民众所误解。选民们看到昔日互相攻击的对手如今又携起手来共事，或许会在道德上产生一些困惑：这样一来，何来忠诚、信念和原则可言？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s）曾在一本研究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内阁的书中提到，除非来自不同党派的竞争者能够撇开偏见，或者至少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撇开偏见的姿态，并且学会以一种"对手团队"（team of rivals）的姿态运作，否则该执政党必然无法成功掌权。[1] 这么做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丢掉许多傲慢和苦痛，然而有时，就像在林肯身上发生的那样，对手也会少见地承认对方作为众人领袖的角色实至名归。

败选并未给我带来太大的打击，但我知道未来还要在这位其基本政治直觉无法让我立刻点头认同的领袖手下，作为一名在野党议员工作好几年绝非易事。我当时可以选择就此收手，认定自己从政就是个错误。就在我败选后没几天，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继续回去执教。我没想到他比我预想的还要关注我在加拿大的情况。感动和惊讶之余，我向他解释说，自己当初是真心实意下决心回国从政，况且怡陶碧谷湖滨的选民们已经选举我为他们的代表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当

然，我选择留下来还有其他原因。我认为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常在机场碰到有人对我说："当选的应该是你才对。"这让我时常觉得我应该为人民的嘱托留下来继续奋斗。因此，我在党代会之后见了狄安一面，主动要求出任他的副手。党的副领袖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党领袖缺席的状况下替他在众议院出席每日例行的质询时段，带领反对党对政府提出种种质疑。狄安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出，并没有强有力的民意基础，所以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他勉强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总是尽量避免让我知道太多内幕，所以，尽管我们此后屡屡在演讲时提到要建立一个对手团队，但实际上我们从来没能成为一个团队，只是对手罢了。但这就是政治常见的结局，如果我坐在他的位置上，或许也会这么干。总之，我在他面前总是透明的。

我的辅选队伍估计狄安将无法在下次选举中再次获胜，因此力劝我留下，等待属于我的时机。我们知道这次的对手里起码还有一人也会再次参选，那便是李博。我们赞成先将继续参选党领袖的计划保密，因为政党必定会对党内的阴谋分子做出惩罚，或至少是那些阴谋太过张扬的人。像一个出色的战士一样，我刻意掩饰起眉宇间的紧张，神态自若地跟在我们的新领袖身后。我会为他的讲话热烈地鼓掌，也会给他提一些大多会被他无视的建议。我从来不在他面前表现出任何不满，也不会将我对下次选举的企图表现出来。安大略省的冬天寒风凛冽，每天清晨，我都得步履艰难地爬上国会山，经过正等着救世军旅馆开门的瑟瑟发抖的醉汉，再回过头朝站在公寓楼第13层窗边的妻子挥挥手。接下来的一整年，我走遍了全国，在高中的体育馆里、人们的客厅里和教堂的地下室里同各地忠诚的党员亲切交谈，既为了给他们打气，也为了我自己。人们并不知道，其实领袖人物自身的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仰赖基层党员群众的态度，需要仰赖他们坚

持在一个下雨的周五夜晚出现，为你鼓掌的意愿。当你所在的政党成了在野党，能够支撑你继续前行的便只有那些对党矢志不渝的忠诚党员们。你手上既没有权力委派官职，也没有向党员汇报你在议会推动议案通过或在国际舞台上同他国领导人会面的机会。只有信念，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反败为胜的信念，是你手上唯一的筹码。

除了团结人心外，我还得想办法偿还竞选时欠下的超过一百万加元的债务。为了募资还债，我们一位位地拜访各路金主，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还清了债务。这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滑稽的和不那么滑稽的插曲，比如，在蒙特利尔和几名魁梧结实的建筑公司老板们共进晚餐那次，尽管他们身上散发着温暖又粗犷的魅力，可是我的心里仍在不停打鼓，怀疑自己要是在饭桌上惹恼了他们，我的脚会不会被他们灌上混凝土，然后从此无法动弹。另外几次的募资，让我隐约感觉到了家财万贯对于人们个性的影响。有一次，一名靠采矿发家的亿万富翁约我在多伦多的一个被雪覆盖了的停车场见面。12月的多伦多午后，明媚的阳光终究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当我到了约定见面的停车场，试图寻找一辆宾利或劳斯莱斯的时候，却只看到停车场的尽头停着一辆1988年的老款克莱斯勒，我上前绕了一整圈后才决定伸出手去敲窗。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穿着派克大衣的男人推开车门对我说：“走，我们去兜风。”我当时穿着自己最名贵的大衣、西装和领带，脚上是一双刚上了光的皮鞋，而他穿得则像是要去远足一样轻便休闲。我们沿着多伦多当地一个深谷四周陡峭的木质斜坡一路往深处开去，他一路上不断向我厉声发问：“你为什么想做总理？”要是他不喜欢我的回答，就会厉声对我说：“再试一次，你能说得更好。”一路上，他就这样咆哮着问一句，我磕磕绊绊地答一句，直到他对我的答案表示满意才罢休。当我们后来回到

停车场，我已被冻得瑟瑟发抖，而他依然容光焕发、满面春风。这就是政治吧，当我目送他开着那辆老旧的克莱斯勒远去时，心里不禁如此感慨。正是在许多如那次一样古怪的会面中，我还清了所有债务。

除了还债，我还必须对选我上台的民众负起责任。你在国会山众议院附近那个用实木墙板装饰的屋子里宣誓就职的时刻，心中的责任感便会油然而生。让我惊讶的是，我们的誓言里竟然没有只字片语提到投票给我的人民，而是像其他所有英联邦国家一样，全是关于对女王与其子嗣和继承者效忠的话语。我在“子嗣与继承者”这部分停顿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对加拿大而言，现在是时候决定是否要在女王离世后不再尊英国王室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了。就算届时我们决定延续这一传统，也必须在议员的就职宣誓中加上对人民效忠的话语。其他和我们情况相似的民主国家就有这样的做法。虽然我真心实意地敬仰女王陛下，但我不认为我需要效忠的只有王室。我们现行的宣誓制度不但没有拉近作为人民代表的议员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反而疏远了两者。没能在誓言中表示自己对加拿大宪法的拥护和对人权的捍卫，对我而言似乎是一种遗憾。

宣誓就职后，我终于得以在众议院那个属于我的议席就座。在所有民主国家的首都，人民代表所工作的议院都是那样的宏伟壮观。我们的也是如此：高耸的新哥特式屋顶，壮观的彩色玻璃，为300名议员精心雕琢的座椅和书桌被中间一条铺着绿色地毯的走道分隔开来。议事厅最中间摆放着象征议会权威的权杖，而走道的尽头则是专属于众议院议长的座席，后上方挂着加拿大国徽。众议院议事厅四周设有一圈供媒体和民众落座的旁听席，媒体的特定旁听席在议长身后，他们可以观看和报道辩论环节。

还记得我第一次走进众议院时，大厅只有两位在做清洁的女士，一位忙着在绿毯上吸尘，另一位则把一张张议程单丢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我独自坐在偌大的议事厅中看着周遭的一切，回想起1941年12月温斯顿·丘吉尔在此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讲。就在这间大厅里，丘吉尔曾这样说道："我之前就已告诫他们（法国），无论他们做什么，英国都会义无反顾地继续战斗下去。法国人的将军告诉他们的总理，三个礼拜之后，就算英国会像小鸡被拧断脖子一样被摧毁，那也会是难对付的小鸡、难对付的脖子！"[2]

在与众议院一墙之隔的议长室，尤素福·卡什（Yousuf Karsh）为丘吉尔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上，被夺走雪茄的丘吉尔胖乎乎的面孔上写满了被公然违抗的愤怒，这后来成了他标志性的形象。这幅照片至今仍然挂在议长室，常会有议员前来与其合影。

这里也见证了历任加拿大领袖在许多关键历史议题上的唇枪舌战，包括对组织叛乱的路易斯·瑞尔（Riel）的处决（1885年）、使加拿大英语和法语人口决裂的征兵危机（1917年）、是否参加"二战"（加拿大于1939年决定参战，早于美国两年）、是否修建输气管道（1956年），以及如何应对魁北克分离主义（1980年和1995年）等问题。时至今日，他们当年慷慨激昂的陈辞仿佛依然在议事厅上空回荡。除非初出茅庐的议员会带着敬畏与尊重走进议会履职，除非年轻人会憧憬有朝一日能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否则这个国家的民主没有任何健康可言。议事厅外的大堂里，有的议员正坐在沙发上休息，有的正在打电话，有的在接待自己选区的选民，也有的正在背诵讲稿，乍一看就像是来到了一个绅士俱乐部。然而，当你回到议事厅，

便会马上意识到你并非什么俱乐部的成员，而是一名民意的代表。你身处此地就是为了替人民发声。

每次在议会大堂里和民众会面时，我都会告诉他们，这里是属于他们 的议会，是属于人民的议会。我坚信人民才是议会的主人，这不仅是因为人民为议会的运转缴纳了税收，为议员的产生贡献了选票，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由。这个给“我们”下定义的过程，正是在政治的世界里完成的。公民应为他们获得的公共服务纳税多少，如何监管各类市场，如何在不牺牲公共利益的同时满足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等等，通过在这些富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成百上千次的决定，我们才建构了“我们”的概念。议会的走廊见证了上千个这样的决定、妥协或协议的诞生，也见证了这些不同的结果是如何在信息不对称、互相怀疑和欺骗的背景下艰难达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的生活被缝合了起来，构成了让我们得以共存的公共生活。我们都在说服他人妥协，也都在严守曾经向他人做出的妥协。可是，除非你的对手对他人的劝说持开放态度，否则妥协便不可能存在。[3] 对我而言，如果不是民主的浪漫引发了我对政治无边无垠的想象力，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是断然不会放弃原先在学界舒适的生活跑来众议院工作的。

在我从政的岁月里，我确实曾经无数次见证民主劝说发挥作用。在党团会议上，常能看到我的同事们站起身来就他们在选区看到的某个问题与大家进行讨论。有好多次，我在听了他们的阐述后对讨论的问题产生了改观。在工会礼堂、教堂地下室和市厅之类的其他场所，我也亲身经历过民主劝说发挥作用。时常会有民众站起身来拿着麦克风，向我抱怨这个或那个联邦项目的实施过程有多糟糕，如果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也会向人们承

诺他们所说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人们相信政府的工作制度，也希望政府能有效地运作。所以，以我之见，我不认为我们的民主已经病入膏肓，至少依我之见，它正健康高效地在人民的心中运转着。可是，在本应是一国民主神殿的众议院，民主却无法有效践行。我不记得我在任的五年内有听过任何一场真正以说服他人为目的的演讲，可是我却听过不少照本宣科地重述着党所要求的发言重点的讲话。这正是政党纪律中贻害无穷的地方，它时刻威胁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比起用选票亲手把我们送进议会的民众而言，我们更应为自己的政党代言。

在任何和我们类似的议会体系里，党纪对政治行为的掌控都是不容小觑的。我从政时，身边所有的朋友、同事和社会关系都是自由党人，甚至，当我过完周末准备搭飞机返回首都工作时，在登机口前的队伍里和我搭讪聊天的也都是自由党人，就算一位其他党派的议员和我一起站在登机队伍里，我们之间也不会有什么热络的交流。当我后来离开政坛才意识到，原来身边也有不少优秀的保守党人和一大批正派的新民主党人，荒谬的是，当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竟然还有些惊讶。想当初，我们面对面坐在众议院里，从来没想过要浪费任何一丝力气去说服对方任何事情。党鞭 [4] 早已决定了这场投票的票数多少，我们只要能够压过对方的声音，并且冷嘲热讽地尽量灭对方士气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难怪特鲁多总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下了国会山，大多数议员都只是无名小卒而已。 [5] 我一直很讨厌这句话，因为它既傲慢，又对民主嗤之以鼻。可问题是，这句话里也包含了一定的事实成分。至于如何解决，其实不难想象：给议员以更大的投票自主权，各议会委员会可以摆脱政党束缚自由选择本委员会主席、决定本委员会事务，限制总理随意解散或重组议会的权力。这些措施势必会让被“松绑”了的议会和议员们的行为

更加难以预测和控制，但是也可以让议员们更加实实在在地代表人民发言。

在众议院的工作让我观察到加拿大的一大民主特点，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极具加拿大特色，那就是由吉勒斯·都赛佩领导的、支持通过全民公投决定魁北克独立以及加拿大分裂的魁北克集团在议会的存在。如果不是真心热爱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恐怕你很难和一群不愿意承认和你同属一国的议员们同处一室。他们不但拒绝说任何除了法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也拒绝在就职宣誓时向女王效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出色的议员和优秀的同事，也是值得选民信赖的好代表。这个民主的殿堂宽容到可以允许如此极端的分歧存在，却仍然能够彬彬有礼、互相尊重地运转，这一点直到现在都让我引以为傲。

在其他方面，我们的民主恐怕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质询时段总是会让那些特地远道而来旁听的人民大吃一惊。和相扑一样，质询时段是一项被精心设计过的仪式性的对抗活动。每天下午两点一刻，政治家们准时涌入议事厅，随即开始45分钟的质询时段。这45分钟可以成就、也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仕途。一组问与答的时间不得长于35秒，每位议员最多只能额外多问一个问题。议会传统上要求议员的问题起码有一半是以法语提出。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我无数次在议长、旁听席上的民众和电视机前观众的共同关注下同政府对决，有时还要面对总理本人。与美国总统不同，加拿大总理需要每周至少参加一次质询，这样的设计可以在理论上有效制约总理的权力被滥用。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情况和预想的大相径庭，浪漫的代议制民主和残酷的现实在此分道扬镳。经过数代人的运作，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权力已经从立法机构的手里流向行政机构、官僚机构、法院和媒体。加拿大也是

如此，任何一位反对党议员在每日质询一开始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权力的流转。在过道另一边的政府首长，面前总会有一个活页夹，幕僚和属下早就为他起草好了任何可预知问题的答案。可是，对所有反对党议员而言，他们只能仰赖媒体报道、廊间闲话或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才能获得关于某一议题的足够讯息，甚至有时还不得不靠一些不满的公务员故意泄露的、可以表明某位官员未能尽职的资料才行。如此信息不对称，让反对党在质询中总是处于劣势。其实，只要给予他们更多的资源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德国，政党普遍设有属于自己的研究基金——但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哪一任政府有任何实在的动机去提升议会民主制的质量。我们的政党更在意的是，如何在掌权时强化自己的信息优势从而掌控立法议程。这就需要一名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给予负责制约行政机关的立法机关更大的权力。

这个问题到了那位想要施技迫使众议院就范的总理手上就更加严重了。哈珀先生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本就性情多变，喜怒无常的他时常被个人生活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则出于他对形势的战略谋划。他领导的保守党并未在众议院中获得足以使其成为多数党的席次，所以他始终坚信，要想守住总理宝座，就必须在众议院尽可能保持独断才行。因此，他从来不会正面回答他人的质疑，要是有人胆敢质疑他的做法，他就会反过来质疑提问者是否真正爱国。打个比方，我们的反对党同事曾不止一次地就加拿大军队如何转移阿富汗籍被拘留者至阿富汗本土的关押设施的问题，向总理和他的内阁部长提出质疑，但他们每次都会站起身来，指责我们这是在同情塔利班。还有几次，当我们质疑政府为何在犯罪率持续走低的当下，加大监狱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时，内阁部长们反过来指责我们对谋杀犯和强奸犯太过软弱。如此无休无止的党派斗争本不是总理唯一的选择，他明明可

以寻求和我们反对党合作，鉴于我们在2006年选举中元气大伤，两党合作本来可以顺水推舟。后来有那么几次，我们也确实实现了合作。2007年11月至12月间，乔克里弗核反应堆被迫关停，这使全球许多癌症治疗医院一时间无法获得足够的治疗用放射性同位素，我们在议会力促有关方面达成妥协，最终成功使核反应堆得以重启，并恢复面向医院的同位素供给。2008年，当我国驻阿富汗军队服役时限即将期满之时，我帮着起草了一份妥协方案，决定将驻军的首要任务从作战转为训练，并明确了最终撤军时间。妥协在这些案例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议题上有着相同的利益诉求。当时政府也在想尽办法从阿富汗的乱局中撤出，我们也是，而且我们双方都有意不让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加拿大向阿富汗派驻军的新民主党牵扯进来，以免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这些达成合作的瞬间，是我在议会工作时最为享受的时光。可是，我清晰地记得，总理有一次在质询开始前的间隙单独跑来找我，当时我为了解决医用同位素危机已和总理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告诫我，我已经从这次危机中得到能够得到的所有好处了，不应再在这件事上纠缠不清。当我问他是不是在威胁我的时候，他生硬一笑，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在接下来的质询时段，他重新与我兵戎相见，暗示我继续表现出双方往常的敌对状态。

他是一个天性极端好斗的人。狄安正式出任反对党领袖没几个月，哈珀便仗着手上充裕的资金支持，在全国主要商业网络展开了一场以贬低狄安形象为目的的负面宣传攻势。还记得我在党领袖竞选时曾对狄安提出质疑："我们确实没做到，斯特凡"，他回答称当时的领导层也很为难，哈珀便充分利用了我们的这段对话，在所有保守党的宣传广告里都加上了这句话："斯特凡·狄安，他做不了领袖。"一名在位的少数党政府总理在非选举时期

向反对党领袖展开这样的攻击，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尝到永久选战的苦头。这场攻势的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的民调支持率立刻直线下降，这让众议院的保守党籍议员的议席得到了稳固：我们当时还不准备冒险对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把国家拖入一场新的大选。总理残酷的党派攻击大获成功，但成功的代价便是迫使众议院的工作氛围逐渐变质，让议会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加大。

频繁地同总理对质并非易事，但要想故意惹恼他、打乱他的计划、或者给他下套让他犯错，虽然很难，但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说实话，他不是个一无是处的总理：他顽强、自律、做事毅然决然。他时常给人留下意志坚定的印象，虽然你看到的他或许只是在盘算如何摆脱一个对他不利的政策而已。能将表面的意志坚定和内心完全的投机主义结合在一起，实在是个令人咋舌的天赋。做了五年他的对手，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老谋深算。在时机适合的时候，他主张精简政府机构；当经济萧条来临，他又开始大肆扩张财政赤字。在野时，他曾坚决地反对流产和同性婚姻；上台后，他又开始耍小聪明，故意向公众承认自己已在价值观斗争中败北，因而得以顺理成章地转换立场。他每一次转换立场，都能牢牢地抓住背后那一大群包括民粹主义者、宗教极端分子和右派空想家在内的乌合之众的颈背，把这群人锻造成一个给他投票、让他得以胜选的机器。这确实是个不小的本事。他在众议院也开始变得愈发自信起来，因为他知道背后的议员们都完完全全唯他马首是瞻。

偶尔几次，我在和总理或某位内阁部长对质时占了上风，一走出议事厅便有几位议员同事围拢在我身边，在我背上轻拍一下以表支持。要是我大获全胜，当晚的新闻画面或许还会出现我的

身影，而我也会抱着我们而非政府势头正劲的信念而结束这一天。要是我没能给对方以沉痛一击，记者席里的记者和我自己的党团成员便会开始压低声音抱怨我这拳打偏了，让政府这下有机可乘了。每当质询时段结束，我要同从旁听席上下来的选区选民会面时，都能看到他们脸上写满了惊讶，方才问答双方间肆意的侮辱和嘲弄时常让他们感到无法接受。大部分议员早就习惯了议事厅里的各种声响，所以有时只有通过选民的提醒才会意识到质询时段的议事厅有多么刺耳。我的访客们，尤其是女性，时常会在旁听质询时段后不禁对其产生反感。确实，质询进行时，双方的面孔常因互相嘲弄和讥讽而扭曲，整个过程既幼稚又令人不快。如果要我说自己从政的这些年里有什么事是最能彰显政治与人民之间的鸿沟的话，那非人民旁听议会质询时段后的反应莫属了。对于政治家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工作。对选民而言，这就像是一个失控的幼儿园。政治在公众心目中的遥远、残酷、多变又血腥的斗兽场的印象，或许永远都无法改变。但这也情有可原，因为政治看上去确实如此，至少在有的时候。

可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应当明确地知道这条鸿沟究竟有多宽，应当知晓在国会山下的民众即便厌恶又警惕一时的政治斗争，也会很快忘却这种感受，重拾此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如何应对现实政治与普罗大众之间的距离，是对政治家工作艺术的考验。政治家需要在民众对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感到厌恶的情况下，进行协调、谋求平衡，争取他们的信任。在你真正成为人民的代表后，你会发现你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向选民证明你并未忘记他们的嘱托而去投入一场对他们无益处可言的生存游戏上。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你会尽量多地参加选区内举行的各种社区花园派对、家校联络会、剪彩仪式和学校的颁奖典礼，从而向选民释放信号，表明你并未脱离人民而去臣服于一个异化的政治世

界。你之所以可以排出紧凑到不可思议的日程，之所以可以完完全全地放弃自己的私人生活，之所以会夸耀自己每个周末参加了多少场选区活动，都是为了向你的选民彰显你的“存在”（presence），为了证明你只对他们忠诚，并且和在首都上演的纸牌屋划清界限。然而，即便如此，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和选民之间的鸿沟仍然不可能被填补得严丝合缝。你和选民既无法打破信息不对称和时空差异的障碍，你们心中顾虑的事情也不完全相同。我们可以大致把所有的政治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有政治家、某些媒体内部的小团体和关心政治的党派支持者才会关心的议题，另一类在数量上要比前者少得多，却是和普罗大众密切相关的议题。要是弄混了两类议题的差别，你可能会毁了自己。

诚然，众议院是属于人民的，但人民未必总会对众议院内发生的事情那么感兴趣。举例来说，我们曾试图将总理对国会昭然若揭的蔑视公之于众，但并未引起公众的太大兴趣。我们明确指出，哈珀故意将原本应当区分开来一件件讨论的议案一股脑地全部放到同一个财政预算案里提交议会审议，使整个文件长达数百页纸，让针对这一议案的投票成了对政府的信心投票，这意味着如果众议院最终否决该案，他便会即刻宣布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这类“垃圾议案”（Dumpster bills）强行将许多极其琐碎的法律条款变更捆绑到一起，其中不乏一些理应单独经议会充分讨论的重要事项，导致议会无法就其中的所有事项进行充分的辩论、审阅、评估及修改。归根结底，政府的行为已经严重阻挠了我们作为国家立法者的正常履职。政府的行为让议会骑虎难下，我们要么被政府牵着鼻子走，要么就与政府彻底对着干，我们认为这样明目张胆的行为是对加拿大民主赤裸裸的亵渎。另外，总理至少两次在议会休会期间解散议会的做法同样违背了民主制度

的惯常做法。我们自由党人尽最大力量表达我们的不满，为了对抗总理解散议会的做法，大约十万名来自各党派的加拿大人，由自由党牵头，联名请愿抗议总理解散议会，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未能说服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我们的请愿行动中来。选民基本不会理会政治家在当选后的鸣冤叫屈，只会怀疑他们是在无病呻吟，而且选民还会觉得既然他们选了我们作为民意的代表，我们就应该继续撑到下次选举的时候再来向他们汇报。这也是许多奉行代议制民主政体国家的选民们一个共同的理念。[6] 所以最后，无论我们如何挺身而出想要捍卫议会的权威，捍卫议会要求政府递交补充资料与文件的权力，捍卫议会应当拥有的辩论、审阅和修改法律的权力，捍卫议会履行议会民主制规定的职责的权力时，公众充其量只会伸个懒腰，对我们视若无睹。对选民而言，其实他们不仅得不到他们应得的民主，而且最后还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幻灭埋单，公众得到的是由他们选出的政治家强加到他们身上的民主。

只有一小部分的立法过程能看得出议员作为人民代表的身份。大部分时间，出色的代表们都在自己的家乡“耕耘选区”（working the district）。我的选区办公室临街而设在城市主干道，每天都有大量人流进出。我的选区助理玛丽·凯瑟和她手下的团队时常会把我的一整天安排得满满当当，让我有机会和当地社区的各种利益攸关方见面，我也因此听到了各种各样组织团体的呼声，包括兰普社区健康中心（LAMP Community Health Centre）、各类妇女庇护所、“职业起航”（JobStart，一家当地的求职培训机构）和每日面包食品银行（Daily Bread Food Bank）等等。与这些组织负责人的会面让我对现代社会中社会安全网络建构的重要性产生了一定的认识。这一网络从结构上看起来摇摇欲坠，由许许多多体量小又缺乏资金来源的组织构

成，各个单元在互相竞争的状态下维持着网络的动态平衡，每一个组织都在试图获取更多资金，同时适应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和目标客户千差万别的需求。成为一名民意代表就意味着要能够理解这些组织的运作方式，力所能及地为他们筹集更多的资金，并且聆听这些站在第一线的组织，如何帮助移民、失业人员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奋斗故事。每一次从日常的政治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与他们交谈，都会让我对他们产生无上的敬意。正是这一个个意志坚定的个体支撑起了一座现代城市的社会服务网络，正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宝贵的职业生涯倾情投入，我们的社会结构才能得到修补和更新。

作为一名人民的代表，还意味着我必须要代表人民和机能不全又冷漠无情的政府机关对抗，这一点也是我从政后的一个主要发现。作为一名公务员的后代，同时又是一名自由党人，刚发现这个问题时，我大吃一惊，但它同时也点醒了我。每当有民众走进我的选区办公室，向我们倾诉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护照签发延期、签证申请被拒、缴税文件丢失等等，我们会立刻拿起电话试着帮他们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位议员都必须在各自的选区有一支熟悉本市、本省乃至联邦政府官僚机构的团队为其效力的原因。多亏了我背后这支出色的团队，我们才得以在任内解决了上千件选区民众遇到的难题。每当我们为某位乡亲在某个政府机关处解决了一件棘手的难题，对方眼里噙着泪向我们表示感谢。事实上，作为人民的代表，就是时常要扮演民众的咨询师、理财顾问、家庭律师和心理治疗师等各种角色。

建立一个能干的政府始终是自由党人的信念，但我们也时常因为过度迷信我们良好的本意而犯错。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现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政府做事常常过于拖拉、武断且效

率低下。一位想要享受政府服务的公民所要求的并不是什么过分的特权，而是其应得的权益，但我却常常从跑来我们办公室求助的公民脸上看到畏惧的神情，政府机关那些如迷宫般复杂的规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手里总会牢牢地抓着一些他们理解不了的文件，口中不断重复着此前某位公务员向他们表述的某些语焉不详的指南。向我们寻求帮助的人中，有一些人确实束手无策，但大多人数人只是对那个声称为其提供服务的政府之行为感到沮丧。

与此同时，选民们常常对于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有着超出我实际能力的过高期待。作为一名反对党议员，我能做的实在有限。在野的我们面对选民的需求，只能低头向执政的保守党内阁或其手下求助，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高风亮节地出手相助，但也不排除有人拒绝帮助除保守党支持者外的其他选民的情况。我们的团队向政府提出的绝大部分诉求都与移民问题有关。正是在移民问题上，自由党人的理想主义愿景和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现状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加拿大每年都会接收近二十五万的新移民入境，因此常年有着大量的申请积压，我们的公民和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7] 似乎已经因此不堪重负。我时常需要接待一些向我提出签证诉求的选民，他们希望能和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或中东的亲人在加拿大团聚，同他们一起参加亲人的洗礼、婚礼或葬礼等重大仪式。所有有关的签证申请都由签证官自由裁决，因此有关的签证决定时常显得有些武断，甚至不合情理。我们党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便开始打开国门，欢迎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新移民来到加拿大安家，也因此在国内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我们当时却没能简化签证审批中那些令人困惑的繁琐程序，才导致了今日许许多多少数族裔家庭因为签证原因无法实现团聚。对这些群体而言，想

要享有多元文化公民身份，不仅十分昂贵，而且程序复杂得令人难以理解。有这样一对印度裔姐妹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她们两人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希望我们能帮助她们把远在印度的双亲接到加拿大安度晚年。起初，她们准备自行为父母申请签证，因此特地回到印度带着两位老人参加体检和移民面试，可是她们此后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盼来父母的签证。最后，还是由我直接出面向移民局局长陈情才让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拿到了签证，如愿来到加拿大和两个欣喜若狂的女儿团聚。可是，到达加拿大一周后，两姐妹的父亲便去世了。从开始申请到最后拿到签证，他们一家花了整整六年时间。如此悲伤的结局确实怪不到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它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启示却是令人揪心的。后来，两姐妹还给我的同事送来了鲜花，向我们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我们这些一向笃信赋权政府（empowering government）的自由党人，实在难以接受政府对公民如此的苛难。政府怎么可以让公民为了一张签证而向其求乞？怎么可以让公民在政府机关门前大排长龙而漠不关心？怎么可以让公民在政府智能电话系统的那头无休无止地等待？又怎么忍心让公民日复一日守在信箱旁等待一张迟来的退休金或失业救济金的支票？在同政府打交道时屡屡遇挫的选民，开始拒政府于千里之外。要是政府不懂得如何带着敬意面对他们的公民，公民自然会觉得离政府越远越好，毕竟他们和政府纠缠越少，需要缴的税也就越少。在这个螺旋下降的过程中，保守党政府才是唯一的政治受益者。他们除了削减政府服务事项以降低税率外，就从未提出过任何实际的解决方案，何况他们所削减的都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必要服务。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确实注意到了民意变化的风向，而我们自由党人却还没有。

2008年9月，已经掌权两年半的哈珀先生认为他此前针对反

对党领袖展开的舆论攻势足以动摇原先的民意基础了，因此宣布解散议会并将择日举行大选，以期能够一举组建一个多数党政府。虽说这是总理的特权，但他的这一做法已然打破了他当初对于固定大选日期的承诺。我们曾在竞选时试图将他塑造成一个美国右翼空想家的形象，而他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务性投机分子，除了对权力的追求，没有其他固定的立场。在他自己的竞选广告里，他将自己无情好斗的领袖面貌彻底藏了起来，以一个穿着毛衣、热爱冰球、站在壁炉旁满面笑容的慈父形象示人。

大选期间，正值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保险业巨头机构客户集团（ICG）崩盘和全球储蓄、养老金和投资出现巨大亏损的多事之秋。此前早已有人发声，对次贷泡沫的危害和房价高居不下的不可持续做出警告，但人们却把它当作了耳旁风。这场危机让包括我们在内的全球所有政治家们大吃一惊。当我们仍在各自首都乐此不疲地玩着政治游戏、搞权力斗争的同时，殊不知，全球经济已亮起了警戒的红灯。

国际金融危机突如其来，全球股市随之暴跌。总理的政治直觉显然误导了他的判断，他竟然建议人们把握时机捡漏，找些便宜的项目投资，这件事后来被人传为笑柄。不幸的是，我们也并没有比他好到哪儿去。危机来临之前，我们便开始提议要征收碳税（carbon tax），这本身是个好政策，但金融市场在一夜间的崩溃让它沦为了一个政治失误。当我在选区内寻求连任时，我的选民们给我上了一堂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课。有一次，一位正在将车倒出车库的女士见到我，便摇下车窗对我说："我每周三下午五点都要去冰球练习场接孩子，但我们郊区又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可以坐。你们自由党人就知道一个劲儿地抬高油价。"对这位女士而言，高碳的生活方式是她的唯一选择，因为没有任何低碳

的办法可以解决她的实际需求。而且，她很清楚就算你向她承诺会在她所在的社区兴建一条公交车道，要修到她家门前这条街的尽头至少还得好几年的时间。对于政治家而言，民主政治的继续教育正是在和普罗大众接触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位女士的困境让我认识到，要想让人民真正接受碳税，就必须首先为他们找到一个高碳生活方式的低碳替代品，随后才能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得以顺畅地向低碳转变。2008年10月的选举当天，焦虑又困惑的选民通过选票表明了他们各自的态度。显然，我们没能说服他们接受碳税，自由党在众议院的议席从103席落到了77席。保守党则从此前的124席上升至143席，但仍然不足以组建多数党政府，因为民众仍然坚信正是总理的失职导致加拿大没能妥善应对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此外，由杰克·莱顿领导的左翼的新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也多赢得了8个议席。加拿大的政治版图正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进一步地碎片化。

2008年11月，自由党领袖斯特凡·狄安决定直面党在此次大选中的惨败，宣布辞去党领袖的职务，让位于新贤。选举党领袖的党代会将于六个月后的2009年5月在温哥华举行。鉴于党在当时深陷困境，我并未因此感到特别高兴，但我还是在第一时间宣布参选，并着手展开备选工作。这一次，我胜券在握。除了我以外参加党领袖职位角逐的只有李博和一位来自新不伦瑞克省的议员多米尼克·勒布朗（Dominic LeBlanc），他虽然年纪轻轻，却已有了相当丰富的从政经验。

当年11月众议院复会后，总理哈珀又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他居然在议会休会期间没有提出任何可以应对眼下这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他不仅对眼前的经济崩盘无动于衷，而且还借机用一些荒唐可笑的手段大搞政党政治，比如他提出停止

向政党提供任何公共资金支持，这分明就是想给反对党已然十分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一国总理理应是一名战略家，但我们的总理却如此好斗，又屡屡做出如此欠考虑的决定，实在令人心寒。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他在确保保守党已经坐稳此次大选中新增的议席后，便开始对反对党议员出言不逊，这使他对众议院的控制力岌岌可危。两年里，他第一次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反击机会，但我们的党却缺乏领袖。此时，狄安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已经和新民主党的杰克·莱顿和魁北克集团的吉勒斯·都赛佩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准备联合起来推翻保守党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狄安只和身边屈指可数的几名亲信谈起过这件事，因此我们都没能提前知晓。一般而言，大选应该在议会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之后举行，但鉴于前不久刚刚进行了议会选举，几位意欲联手的反对党领袖因而准备直接寻求总督——即加拿大元首——首肯他们另行组建政府的提议。如果这几个在野党在众议院的席次加起来足以构成一个多数党政府，那无需选举即可由一个新的自由党——新民主党联合政府来取代现有的保守党政府。尽管新组建的内阁中将不会出现来自魁北克集团的部长，但联合政府的未来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众议院的支持。此外，多党的联盟协议同时提到了将国家从经济衰退的泥沼中拉出来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狄安宣布这一联盟计划后，即刻收回了此前的辞职申请，转而宣布自己将出任联合政府的临时总理，直到下一次党代会对他正式的党领袖身份再次进行确认。这在加拿大的政治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对我而言也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我是自由党的副领袖，但我却被所有相关的秘密会谈排除在外。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绝望的领袖为了求生而不择手段追寻权力的一场政变闹剧。要是狄安能够在国人面前表现得足够机智和得体的话，或许一切都还有可能，但他在全国电视荧屏上的表现却乏善可陈到了极点，甚至有残忍的玩笑称屏幕上的这段录像好比是

一段“斩首视频”。

政治家的行为总是那么难以捉摸，这个桥段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位曾经在和魁北克分离分子当面对质时那么有原则的并拥有良好声誉的政治领袖，如今却和一个企图分裂国家的政党领袖联手搞起了密谋。这位曾经写下振聋发聩的政治誓言的领袖人物，如今却难以用简单的语言向选民解释为何要支持这次联盟。这位宪法专家最终也没能明白，尽管这样的联盟在理论上可行，但在现实中却连一丝一毫的合法性也没有。问题不在于联盟本身。如果是在胜者之间联盟，那当然没有问题，英国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在2010年5月组建的联合政府充分证明了个中的可行性，尽管该联合政府此后的执政道路充满荆棘坎坷，但也从未有人就其是否合法提出过任何质疑。 [8] 然而，对于我们而言，联盟各方都是在大选中落败的在野党。执政党前不久刚刚在众议院赢得了更多议席，但我们却痛失数个宝贵的议席。我们该如何向人民解释我们准备推翻的，正是两个月前刚刚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要是我们真的这么做了，总理本人也势必会要求总督再次解散议会，重新举行议会选举。到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说服总督允许我们，而非执政一方，重新组建新政府呢？难道她会跳过选民的授权直接答应我们的请求吗？我们是否有任何机会获得选民的授权，来对抗一个严厉指责我们正在策划政变的政府呢？我们清一色是上次选举的失败者，选民怎么会支持一个几个月前还在互相争斗的政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呢？

我和所有明眼人心里都很清楚，除非加拿大各派进步的势力能够拧成一股绳，否则保守党可能还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执掌政权。无论是新民主党，还是魁北克集团都是我们的政治对手，我们在加拿大政界已较量了多年，但我从不把他们当作敌

人看待。说实话，如果我们在这次选举中能得到更多席次的话，我很可能会支持与新民主党单独结盟组成联合政府，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仍然需要魁北克集团在众议院中对不信任投票的支持，但要是让我们这个长期致力于国家团结统一的政党的执政命运被一个企图分裂国家的政党左右，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些问题我想得很清楚，它们并没有让我太过忧虑。正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应对，我反而很享受这场充满戏剧性的联盟风波。

三大在野党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已在结盟文件上签字，狄安也坚持要我签字同意。我一开始拒绝签字，他随后以党领袖的身份命令我签字。要知道，拒绝党领袖所下的直接命令很可能成为政党分崩离析的导火索，我和另外一位同事欧文·科特勒（Irwin Cotler）因此成了自由党议会党团中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的最末两个人。当然，我是在明确表达了我的反对意见后才签下的名字。当时，全党因这份联盟协议闹得兵荒马乱，已然面临四分五裂的危机。李博，我在党领袖角逐中的对手，从政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新民主党效力，所以对他而言，这份联盟协议显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他也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成功把脚踩到了总理的脖子上，那就不妨多踩几脚。然而，支持李博、狄安和联盟协议的议员数量却在不断减少，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对协议持怀疑态度。因此，到12月中旬，经过党内数轮激烈的辩论，狄安终于意识到大势已去，拱手认输。多米尼克·勒布朗也宣布退出选举，转而支持我出任党领袖。李博后来也意识到了情势的变化，放弃了这一协议。不久后，在自由党籍参众两院议员的共同见证下，我出任自由党临时领袖，这一任命后来在5月举行的温哥华党代会上被来自基层的党代表们正式确认。

就这样，我在这样一场宪法危机发生的当口最终成为了党领

袖。然而，我们面前的这场鏖战才刚拉开帷幕，一场由所有反对党共同提议的信任投票即将举行。12月中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总理向总督提出议会休会请求，并获得了批准，由此避免了被众议院弹劾下台的命运。哈珀这一计成功解救了他的政府。这也让我们得以早些回家庆祝圣诞节，也有了时间好好琢磨眼下的形势。

圣诞期间，新民主党领袖和我私下见了一面，他请求我将执政当局推翻下台，然后与他的党联合执政。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当时杰克·莱顿当时那副渴望执政的表情，还有他说起让我们给“新政治”（a new politics）一个机会时的神情。我告诉他，要想说服我们的党员和新民主党联盟或许有些难度。实际上，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要是他口中所谓的“新政治”是在同分离分子的密谋中诞生的话，这又算是什么“新政治”？政治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已经够远了，一次密谋的政党联合只能让形势变得更加糟糕。我很清楚，要是我通过这种手段当选总理，将来只要我出现在公众场合，就一定会有一群公民群集示威，指责我窃取了总理的宝座。我们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或许投机主义在政治中被看成是一种长处，但将这样一场危机作为政治跳板，势必成为我们永生的污点。现在不是考验选民耐心的时候，也不是假设选民和我们一样对当局同仇敌忾的时候。现在是倾听民众呼声的时候：保住我们的工作，停止手上的政治游戏。

我常常会回想起当时的这些情景，也会假想如果我当时答应了杰克·莱顿关于“新政治”的请求的话，现在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众议院的议席数量，就算加起来还是不足以组建多数党政府，这会给之后组建的联合政府带来

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双重危机。数年之后，又会有一次联盟的机会将立场中立的自由党人和左翼的新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让他们得以与长期执政的保守党霸权分庭抗礼。但2008年12月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一个联合政府不能像变戏法一样突然冒出来，然后被强加到加拿大人民的头上，何况议会选举刚刚落幕，人民已经亲手用选票决定让保守党在渥太华占有更多议席，我们显然不能公然悖逆公民的意愿，所以我才拒绝了联合执政的提议。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拒绝的不仅是一个联合执政的提议，还可能是我此生唯一可以出任我国总理的机会。

---

[1] Doris Kearns Goodwin，Team of Rivals：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5）.

[2] http://www.chu.cam.ac.uk/archives/exhibitions/Ottawa_image.php.

[3]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4] 在加拿大，党鞭是各个政党在政党高层会议中负责维持纪律的成员，督导同政党议员在众议院、参议院和地方立法过程中的出席及表决行为，通常是政党中具有威望和影响力的权威议员。——译者注

[5] http://www.hillwatch.com/pprc/quotes/parliament_and_cabinet.aspx.

[6] Jane Mansbridge，“A Selection Model of Representation，”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research paper，2008. 另外参见Hanna 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7）。

[7] 2015年，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正式更名为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mmigration，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译者注

[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coalition-documentation. 另外参见P.H.Russell，Two Cheers for Minority Government（Toronto：Montgomery，2008）。

第七章 资格

2009年1月，在电视镜头的注视下，我和电视喜剧人瑞克·默瑟（Rick Mercer）合力将一张床垫从卡车上搬了下来，运进了我和巧兰在斯托诺韦的新家卧室。这里是加拿大反对党领袖的官方宅邸，隐藏在渥太华郊区一片成行的树木之间。李博也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出了把力，电视镜头记录下全过程，当他帮我们把电视机从车上搬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在各种活动和仪式上，我俩总是在公众面前表现得亲切和睦，起码向观者展现了一幅君子之争的画面。这些年我们之间发生了太多事，多到已让我们破损的友情再也无法修复的地步，然而，工作上足够专业的他知道我们除了在公众面前表现得一团和气外，别无选择。

我和巧兰此前从未在这样一处尊贵高雅的宅邸生活过。1940年至1945年间，因故土被纳粹占领而被迫流亡至加拿大的荷兰女王曾在此下榻，书房里至今还挂着不少女王孩提时代的照片。荷兰政府为答谢加拿大在战时接纳了他们流亡的王室，特地送来一大批郁金香，因而每年春天，便能看到美丽的郁金香在渥太华的大街小巷竞相绽放。壁炉上方的水粉画里那个英姿飒爽的男子，便是曾经主政加拿大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爵士（Sir Wilfrid Laurier），这位相貌堂堂的自由党籍总理，可谓是深谙政治斗争的老手。如今，作为他曾经领导的政党的临时党领袖，我不禁端详起这幅肖像画来，而这位大师仿佛也正从上至下地打量着我。方才坐上党领袖宝座的我如今置身于斯托诺韦的宅邸，让我们夫妻二人感到如在家一般安心。我们确实很喜欢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房子，尤其是那条可以俯瞰后花园又装有纱窗的门廊，当然还有住在底下的那一家子浣熊。夏日夜晚，浣熊一家时常跑

到花园里散步，它们那王者一般不屑一顾的姿态和神情，似乎在控诉我们侵略了它们的地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如此。在任何一个类似加拿大的民主国家中，为政治领袖修建的府邸都应当尽量朴素端庄，尽管如此，斯托诺韦和那些浣熊仍让我们在此的生活十分愉悦。住在这儿的两年半时间里，每当我们经过长途旅行回到斯托诺韦的家中，便会看到在门口迎接我们的乔希·德拉赫、杰里·珀蒂和艾克斯比·卡斯特拉三人和善亲切的面孔，这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心。

在国会山上，我也搬进了转角处那间更大的办公室。正是在这里，我的父亲曾为金总理做过笔录，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和我的幕僚们谋兵布阵。1944年，征兵危机爆发，国内一时众说纷纭，金总理此时说的一句话或许与我眼下的心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必要时可征兵，但征兵不是唯一手段。"对我而言也是这样，必要时可联盟，但联盟不是唯一手段。一天早晨，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到访斯托诺韦和我共进早餐，他在餐桌上竭力劝说我与其他反对党联合起来打倒哈珀政府。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曾在两次大选中蝉联总理，而且他三届任期内执掌的都是多数党政府，他说的话我自然得一字一句听得仔仔细细，但我仍然很讶异，他竟然也没考虑到反对党联盟后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他似乎没有丝毫疑虑就认定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让加拿大民众接受两个曾经剑拔弩张的政党组成的联盟。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可此时，我已然开始意识到，对于一个手忙脚乱的政府而言，反对党间形成的联盟显然是一个可以有力钳制他们的政治工具，对我们而言利大于弊。如果总理猜不透议员们到底会给他的预算案投什么票，他势必会提出一个让我们可以欣然接受的预算案。当年1月，我曾受哈珀之邀参加过一个预算讨论会。当我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领袖如今好似再也

无计可施，只能任由自己被曾经犯下的错误激怒，为自己或许熬不过议会即将举行的信任投票而焦虑。当他问我们是否有什么经济对策的时候，我说这是他而不是我们的预算案，他必须为里面的一字一句负责任。我不想同其他反对党联盟，更不想同哈珀联盟。我更希望自由党能够继续坚定地做加拿大人民欢迎的大红帐篷（the big red tent）[1]，坚持我们在财政政策上的保守和社会议题上的进步。我们的这招奏效了。2009年1月下旬，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含有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政策的预算案，总计将会有400亿加元的资金被用在建设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开展工作共享计划以降低失业率、提升失业救济额度等项目上。在投票同意这项预算案之前，我们坚持要求政府每季度都要向议会报告该预算案的执行情况，经济刺激计划中每一分一厘的去向都需如实进行汇报。我们这样坚持的原因，是担心执政当局会将基建资金的使用政治化，从而只在他们自己的选区内大兴土木。因此，在这项汇报要求得到政府的同意并有一位内阁部长出面保证资金使用将遵循公开透明原则之后，我们才投下了赞成票。但其他的反对党却无一例外都投下了反对票。此前所说的联盟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但至少最初组建该联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政府面对议会发起不信任案的威胁，不得不推行这项救加拿大经济于水火之中的财政赤字方案。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首站出访便选择了加拿大。2009年2月，当奥巴马来到渥太华时，当时这场已纠缠了我们两月有余的联盟危机仍在发酵。我和他在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聊了足足35分钟，他的空军一号就停在玻璃墙背后不远处的柏油碎石路上，我们四周站满了身穿雨衣、戴着黑色墨镜的特勤人员。他一上来就笑着挖苦我说：“我听说你在这里遇到了点麻烦。”他这么说还真是轻描淡写。要是前不久的局势有变，或许现在我就以一国总理

的身份和他交谈了。这位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充满自信和得意，已然手握重权的他，看上去却轻松得让人难以置信。尽管他一上任就不得不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他却似乎并未因此表现得忧心忡忡。看来他在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课，对加拿大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不需要任何提示。他总有办法在你面前表现得既友善又职业。当时，美国国会正竭力推动通过“购买美国产品”（Buy America）采购法案，我因此向奥巴马陈述了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从而坚持加美边境保持开放的种种必要性，他当时全神贯注的神情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时，奥巴马和我们都在各自国内有着很高的支持率。我们的党在全国民调中表现良好，甚至一度爬到35%至40%的高位，这让我们对拿下下次大选组建新政府很有信心，人民此前目睹了自由党在国家危难之时迫使执政党行正确之事。不久之后，还是在那个冬天，当北美汽车业紧急财政援助案（North America automobile bailouts）的加拿大部分被提交至议会等待裁决之时，我们又一次同政府站在了一边。做出这一决定也并非难事，只要到加拿大所有中部城镇的汽车生产供应商那里看看就知道，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睁睁地让这些当地的主要厂商和雇主走向破产。

做决定的感觉很好，做对了决定的感觉更好。在我担任党领袖期间，我很少有犹豫和怀疑的时候，尽管对我而言，领导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管理一大批的职员和党团内所有天赋异禀、享有盛誉的参众两院议员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挑战，但我仍然乐在其中。每当政治风向转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难掩兴奋之情。党领袖办公室里那支年轻的团队成功地把握住了时机，把我们的党带入了21世纪。此前多年执政的经历让自由党多

少有些安于现状，这不仅让我们的竞选造势能力有所退化，我们的筹款机构也逐渐和网络时代的潮流脱节。与此同时，保守党政府却充分利用自身执政党的优势，开始运用高效的网络和直邮服务展开筹款活动。在这一点上，我们甘拜下风。给我们投票的是谁，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又需要什么，我们统统都不知道。就连全国成千上万名党员，我们都不甚熟悉，更不用说选民了。我们在拥有类似的数据以前，就一直这样盲目地运行着。因此，我们派出一队年轻人到华盛顿取经，他们学成后带回来一套奥巴马和美国民主党人用于筹款和管理票仓的软件，这让团队里的“数据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就这样，我们终于拥有了备战大选所需的、足以与他人抗衡的数据武器。

虽然总理仍然在位，但经过联盟危机的他早已元气大伤。尽管他成功地让公众认为反对党的这次联盟无异于一场政变，但无论他如何垂死挣扎，都已无法改变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玩火自焚、咎由自取的形象了——这场危机本就是由他之前那些傲慢无情的党派攻击和应对经济危机不利的无能导致的。我们此前在预算案和汽车业紧急财政援助案上投下赞成票，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党准备好和总理共同合作将加拿大拖出经济衰退的泥沼，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摒弃党派偏见，共同应对当下的困境。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总理，如果他希望我们能在议会中与他合作，就必须让他的人停止对我们无休无止的攻击。他用他那双冷眼盯着我看了许久，什么也没说，但回过头去再看，我大致猜到了他当时在想什么。他所领导的政府刚从面临倒台的危机中走出来，他背后的党团势力也一定因为他对局势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人心涣散，此刻，他必须向众人证明，一切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攻击，反而加大了攻击的力度。5月初，在温哥华召开的党代会正式确认了我的党领袖身份之后仅十天，

保守党人便发起了针对我们的首轮攻击宣传。其中两则后来被证实为加拿大历史上非大选时期发布的规模最大的单个宣传广告，上头的广告词后来也成了街头巷尾人尽皆知的句子。要是你当时也在加拿大，或许这两句话也早已让你烂熟于心："叶礼庭，只是过客"（Michael Ignatieff，Just Visiting），以及"叶礼庭，不是为你才回国"（Michael Ignatieff，He Didn't Come Back For You）。 [2]

从2009年5月开始，直到两年后大选结束，他们在各处播放这些广告，甚至不惜砸下重金在收视最高的节目中播放它们。就连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直播间隙，观众们都不得不看到我在广告中出现的面孔，而我每次打开电视准备享受"超级碗" [3] 比赛的时候，都不免会听到关于我"只是过客"的广告词。他们的舆论攻击其实是钻了加拿大选举法的一个空子，而这个空子早就应该被填上了。选举法对宣布举行联邦选举后各政党的竞选开支上限有着严格的规定，但却没有在非选举时期做出类似的规定。一般而言，两次选举之间的这段时间，加拿大政府都会专注于社会治理，没时间来特地攻击某位反对党领袖。但自从永久选战的新政治气候被搬上台面以来，治理就意味 着选举活动。他们攻击的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的支持率开始一路下滑。对于团结在我周围最为紧密的党员而言，我总能有机会在他们面前为自己辩解，但在党的外围，一阵异常的死寂却突如其来。没人再愿意听我解释。我好像真的变成了过客。

我的对手显然深谙政治攻击的精髓：他们知道要集中火力打击我最强有力的地方，从而让我在优势尽失、弱势尽显的状态下自取灭亡。对我来说，我能吸引加拿大民众支持的亮点无外乎我局外人的身份。我曾经出走大千世界探索自我、最终回归故土想

要为国效力的故事，在保守党人嘴里，竟变成了一个本质完全不同的阴谋：我只是一个来投机的背包客，一个没有固定立场的精英主义者，我的回归为的不是加拿大人民，而是为我自己。要知道，在他们这个攻击广告投放之前，我已经赢得了两次选举，但这对他们而言无足轻重。他们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声称我只是过客，不仅是在质疑我对国家的忠诚，更是在影射我是个把政治当作消遣的精英主义势利鬼。他们的攻击广告聪明地将对我阶级和公民身份的双重质疑黏合在了一起，仅凭这一句话便足以毁了我的整个政治生涯。

照美国人的话来讲，我这是被“快艇”（swift-boated）了。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曾有一群“越战”老兵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击，质疑克里年轻时作为海军上尉在越南湄公河地区担任快艇指挥官的服役记录。 [4] 因为在越南服役的出色表现而被授勋的克里，登上国会山从政后却成了坚定的反战分子。当初让克里成为反战运动英雄的那篇在国会的证词，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因为当初我正身处哈佛。正是因为这篇证词，他才得以在马萨诸塞州走上仕途，但这却让不少老兵心生怨恨。2004年，这群对克里怀恨在心的老兵在一位共和党亿万富翁的资助下，针对当时正在角逐总统宝座的克里曾经的“快船”经历展开舆论攻击。这场攻击效果显著，以致“快船”一词后来真的成为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常用动词。后来当克里到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报到”（report for duty）时，他仍想把曾经的服役记录当作竞选总统的一个筹码，但是这时他已基本没有胜算了。当时，我和一部分人一样，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对这些攻击做出回应，因为回应并不是什么难事。他本可以提出质疑，比如对方为什么要特地拿他的服役记录出来说三道四，毕竟他是真的在越南参加过战斗，而他的对手小布什只不过是仗着他

父亲的影响力加入了空军国民警卫队（Air National Guard），开着飞机在德克萨斯上空装模作样地绕绕圈子就轻松地赚来了一段服役的经历。可是，克里从未回应那些攻击。如今，我也会把这些针对克里和我的“快艇”广告放给我的学生们看。我开始意识到为何这些广告会让克里不得不保持沉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广告中有一定的事实成分，所以才充满了杀伤力，并且让人难以反驳。在针对克里的广告里就有一大段他在国会作证的画面，他在台上竭力控诉和谴责“越战”中美国在丛林中的军事行动，包括所谓的搜索并歼灭任务、滥杀无辜和放火烧毁平民村庄等行为。要是他想将老兵们在攻击广告里对他的种种指责驳斥回去，他就必须变回曾经那个激情洋溢、反复重申着反“越战”言论的年轻人。他或许会这样说——我曾是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也仍然存在在我的心底。我为自己当时那么说感到骄傲，而且我时至今日仍然对此深信不疑。如果你不准备投票给我，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但我绝不会为了得到你的选票就收回我当年就“越战”发表的任何言论。　还记得2008年春天，奥巴马就牧师赖特（Reverend Wright）[5] 的口无遮拦出面回应，他的候选人资格本来正因此面临危机，但他最终却成功地化险为夷。[6] 克里对攻击广告的回应本可以像奥巴马回应赖特事件的演讲一样，成为一场教科书式的自我辩护，但他却没这么做。奥巴马因为牧师赖特勃然大怒，也最终脱离了那个他也曾属于其中的非洲裔美国人常去的教堂。他在回应这场争议的时候，成功地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种族问题本身，质疑为何经过了数十年的民权运动，种族问题在美国仍然是这么一个令人痛心、引来分歧的话题。由此，他成功站到了引导全美种族议题的制高点上，也因此把握住了成为总统的良机。“快艇”攻击其实也给了克里一个同样的机会，一个让他可以引导全美反思“越战”的好机会，但在这场对政治艺术的终极考验中，克里败下阵来。

我曾经在心里反复回忆克里和快艇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因为就算在加拿大政坛这个与美国相比量级小得多的舞台上，对手一句“只是过客”的攻击同样给我带来了和克里曾面对的同样挑战。和快艇广告一样，“只是过客”确实具有足以令人确信的事实成分，因为我无法否认自己在回国从政前已经 侨居国外30年的事实。最要命的是，针对我的攻击广告里还截取了一段2004年我在美国接受采访的视频，我在其中说道，“我们”必须想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对被关押人员实施虐待。当你为了说服观众时，可能一不留神就脱口说出“我们”来，可殊不知你开口的瞬间就犯了个大错。然而，讽刺的是，我始终都知道自己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美国人，这也正是我选择回到加拿大的原因。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是我自己说的话害了自己，也害了我的团队，大家的士气因为这件事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虽然有党团内的其他同事为了安抚我还一个劲地谴责广告内容有失偏颇，可他们作为专业的政治家自然看得清形势，我也知道他们一定觉得我受到的这一击足以致命。

放着对手的攻击不回应越久，它造成的伤害就越大。要是你觉得回击会让对手的攻击“增辉”（dignify），所以拒绝回应的话，那便无异于在这场战斗中举白旗。政治斗争与人的尊严无关。如果你不为自己辩护，人们自然会认为你要么是正如对手所攻击的那样罪恶，要么是软弱到连奋起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毕竟，如果你连站起来捍卫自己的勇气也没有，你也肯定没本事去保护你的人民。如此一来，你很容易就会失去选民的支持。

对我们而言，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开展一场回击，就算我们有，我们又该怎么说？我深爱着我的祖国？要想反驳攻击宣

传对你的指责，就得一一驳斥其中对你的所有否定，但这样做便正中了敌人的下怀，你势必会输了这场仗。除了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我别无选择。2009年夏天，我做的每场演讲无不在反击总理对我的种种指责。难道贵为总理就可以有权决定谁才是优秀的加拿大公民而谁又不是吗？对于近三百万旅居海外的加拿大公民，包括其中近一百万住在美国的公民而言，难道他们就不如生活在加拿大本土的公民更“加拿大”吗？难道人们真的会认为只有那些从不愿踏出国门的加拿大人才是好的加拿大人吗？我坚信我们必须丢掉这种狭隘的地区优越感，我是在为一种更丰富、更国际化的公民意识而奋斗，我是在为下一代加拿大人而奋斗。我时常遇到这样的加拿大年轻人，他们或是我的学生，或在我的辅选团队里帮忙，或是我的朋友。有一天下午，巧兰和我正在多伦多的皮尔逊机场候机，在短短五分钟之内，我们竟然分别遇到四个上前来和我们打招呼的年轻人。第一位准备启程前往孟加拉国为当地农村妇女提供小额贷款，第二位在肯尼亚当地一个农业灌溉项目中任水处理工程师，第三位将要去巴西参加一个热带雨林保护项目，最后一位正准备飞往新加坡为一家商业银行工作。他们让我看到了我所爱的加拿大，我不希望他们将来有一天回到家乡竞选公职时，会像我现在一样被迫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辩解。保守党用这种方式攻击我，实际上也是在攻击任何像我一样曾出国生活最后又回到了家乡的公民。可这里就是 我的家乡，真该死。

然而，任凭我如何将这个问题放大到更多人身上，也还是无济于事。人们依然觉得我“只是过客”。既然媒体不愿意听我的故事，我们的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为我打一场反击战，那我不得不曲线救国，想些其他的办法来让人民听到我的辩解。我们改装了一辆巴士，命名为“自由号快车”（the Liberal Express），2010

年整个夏天，巧兰、我以及一小支队伍坐着这辆车遍访了全国所有的省份和领地。我在各种新奇的场地同大家交谈：一旁有几只猪正肃穆庄严地踱步的农田里，有渔民正将虾笼从水里捞出来的码头上，葡萄正在成熟的农庄里，或是咖啡店门前的停车场上。

置身这些地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无比享受。成为一名政治家最棒的地方便在于你可以体验国民们缤纷的日常生活：在小县城里逛集市，观看撞车比赛或者牛仔竞技会，在龙虾节或在家庭后院烤玉米、开烧烤派对，或者在宗教节日前往犹太教堂、印度教、佛教或锡克教庙宇以及清真寺和基督教教堂。乘着“自由号快车”遍访全国的那个夏天，我尝试了各种有趣的事，我做过棉花糖、尝过印度咖喱角、给汉堡翻过面、开过发令枪，还在游行里骑了马、在球场上掷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球。在同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这种感觉非常美妙。这个夏天也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关于政治和政治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在各种由志愿者和社区团体组织的庆祝活动上，政治家必须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地的人民希望我们能在舞台上出现，正是因为我们作为人民和当地社群代表的身份，但他们绝不会希望我们把活动搞得过于“政治化”。我们可以和大家“互致问候”，但绝不能在这些场合做任何类似竞选演讲或政党攻击的事情。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日常生活远比政治重要，远比激烈的政党斗争重要。这是因为抱团取暖是人的本性。比起单打独斗，人们更乐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毕竟，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才高。

我很享受这场游历全国的旅程，尤其是因为，这趟旅程让我得以像1968年皮埃尔·特鲁多带着我见识全国风土人情时一样，把广袤的祖国介绍给我年轻的团队。很多生活在东岸的加拿大人

或许一生都没到过不列颠哥伦比亚，我手下不少年轻的幕僚就是如此。随着“自由号快车”的飞驰，各地壮阔的美景时常在车窗外呼啸而过，每当这时，他们的脸上总是写满了惊奇，而我也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青年时的自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到访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耶鲁小镇，这个傍着铁轨的小镇一共只生活着250位居民，他们听闻消息后竟全部跑来听我在群山环绕的山阴处演讲。正当我向大家诉说着我的曾祖父是如何在1872年穿越耶鲁小镇，小镇旁的这条铁轨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被铺设起来的，而我们今日又该怎样团结一心重建全国的铁路系统时，一台柴油机车拉着整整90车的矿石从我们身旁缓慢驶过。火车的汽笛声在山谷间回荡，我最后说的几句话彻底被汽笛声淹没了，但我却觉得这声音让这整场演讲变得更加圆满了。2010年8月，“自由号快车”载着我们一行人来到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的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参加在巴德克（Baddeck）举行的党团会议。当时，即便是党团内原本对我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也不得不承认，我为了扭转不利局势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在这趟旅程中的每一次诉说都收获了民众诚挚的倾听，这让我从政以来头一次感觉到，人们真正把我当成了自己人。然而，无论我们亲身拜访了多少国人，也敌不过一个在全国每台电视里反复播放的攻击广告的效果。那年夏天，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但我们惨淡的民调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善，这不得不归功于我们的总理。他不会就我口中的话攻击我，他攻击的是我说话的权利。他否认了我在这片土地上从政的资格。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某种资格的标准，值得我们细究一番，因为资格俨然已成为现代政治最首要的攻击对象。人们不再会就候选人的理念或立场纠缠不清，而是直接对他们的为人提出质疑。

“当事人资格”（Standing）本是一个法律概念，指当事人在法庭上享有某些特定权利。只有法官能够决定当事人是否适格，而他们之所以需要明确当事人是否适格的目的，便在于掌控审判室内的所有活动，并在法律和政治之间划清界限。[7]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这个词来对个人在某种形式上的权威表示尊重。比如，专家在我们眼中具有某些资格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而专业人士具有某些资格是因为他们受到的专业训练。又比如，一个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朋友在我们眼里同样具有某种资格，所以我们才会耐心倾听他们的故事。主观上给某人以某种资格，不是为了彰显差异，而是为了表现平等和尊重。

任何人初涉政治时，最首要的任务无外乎确保自己的资格不受质疑，这样才能有权在各种议题上发表观点并受人关注。当然，这样做并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当选，因为对手的资格可能更加稳固，可如果你不具备资格，你势必连参选的机会都得不到。理论上，每一位公民都有从政的资格，因为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法律赋予的竞选公职的权利。然而，资格不等同于权利，资格是需要你从选民那里一点一点地争取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确是一种特权。而且，资格还是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威。过去的社会地位、专业资质和能力，甚至是成功经验都不会让你天然地享受这种资格。我们身边都有许多品行出众的人，但出众的品行并不代表他们就能获得全国选民的认可。相反，品行存疑的人也有可能坐拥选民支持，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比尔·克林顿或许就是个不错的例子。此外，享有资格也不能和被人喜爱画上等号。想想那些成功的政治家，像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虽然并没有受到人民的百般爱戴，但就算再不情愿，许多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具有执政资格。或许你会觉得一个人越受欢迎就越有资格，但已经有太多名流、歌星、篮球明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向我

们亲身证明，受欢迎程度不一定能转化为政治上的成功。又或许有人会认为金钱能带来资格，可是看看那些时不时跳上台参选的亿万富翁的失败案例就知道，这点也不成立，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 [8] 在总统竞选中的失败便是一个最近的例证。另外，有高学历也不能确保你就有资格为人民代言。诚然，教育上的成功确实代表着一种荣誉，然而，我们却时常目睹某些拥有高学历的精英也被迫面临无法将教育上的成就转化为从政资格的困境。原因很简单：高学历本身便是一种特权，而选民往往厌恶特权。你必须亲手从人民那里争取你的从政资格，而高学历帮不上太大的忙。可是，这条难能可贵的原则却引出了一条悖论。就算没有体面的学历、出众的品行、民众的爱戴、名气、学历或者厚实的钱包，你仍然有可能当选公职，但要是被人剥夺了从政的资格，便无异于此生与公职无缘。鉴于以上这些规则，我们能选出那么多有本事的政治家实属奇迹。

曾几何时，能让有权势的人物或组织为你背书确实可以给你带来从政的资格。但如今，这种认可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在过去，工会对候选人的支持意义非凡，但今日的工会早已不比当年那么有影响力。比起听从工会领导的指示把选票投给某位特定的候选人，现在的工会成员更倾向于基于自己的偏好做出选择。此外，过去妇女团体也会出面为某位候选人背书，但今天的女性似乎更希望能在投票时保有自主权。在我从政的那些年里，曾经接待过各式各样来自移民团体的访客，他们自称是某个团体的权力经纪人，向我承诺会动员自己所在的团体成员将所有的选票悉数投给我，以此从我这里换取一些优待。我始终暗暗怀疑他们只是在装腔作势罢了，因为很可能他们对同一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力。类似地，环保团体、新闻媒体和报纸社论的版面也会时常对某位候选人表示支持，但事实上这些组织的背书

并不会给候选人的从政资格带来什么实际的增益。

在不少民主政体里，比如巴西和墨西哥，握有确认候选人资格大权的仍旧是政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党的正式批准，任何人都不得参选。而在我们这样的民主政体中，无党派人士也可以参加选举，虽然他们大多难以获取选民的信赖。尽管政党对候选人资格的把控能力正在每况愈下，但在决定候选人名单时最具发言权的仍然是政党。以往，个人往往因为家庭、宗教或地区归属的原因不得不通过投票时的选择来彰显其对所属党派的忠诚，但如今，人们更乐于从自我偏好出发决定把票投给谁。对我而言，我必须认清这个事实：我们的党在我上任党领袖前已经连续20年以缓慢的速度不断流失英才。现在，宣称自己是自由党党员的公民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这一点本身便表现出了选民的投票决定正向个人化转变的趋势，而这势必将进一步增加选举过程的不稳定性。由于党员通过投票向党组织表忠心的意愿大为降低，政党动员民众将票投给自己党派的候选人的能力也已被大幅度地削弱。现在，我们党的候选人只有靠自己才有可能吸引足够的选票。至于如何吸引民众的支持，这便是见仁见智了。奥巴马在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参选，都有量身定制的选举策略帮衬，而这些策略对2016年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而言显然不再适用，一切必须从零开始。[9]

和我一样首次参选的候选人，很快就会意识到政党的决定、权威的背书和我们自己那据说令人望而生畏的简历并不会让选民们天然地认为我们有资格为他们代言。你要是以为资格也是一种天然的权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想让人民认可你的资格，就必须走到街上和民众面对面交流，就必须一家一户地去敲门，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和选民打电话。

当选民在心里判断你是否有资格为他们代言时，政党、邻居和家人都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然而，如今的人们正越来越习惯于坐在电脑或电视屏幕前独自做出决定，这不仅没有增强选民们自主判断的能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自主决定权：对于那些愿意一掷千金购买广告时段的广告主而言，他们对选民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这也是为什么那些针对我的攻击广告可以有那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孤身一人坐在屏幕前的选民而言，他们只能看到广告里对我恶言抨击的一面之词，要是他们身边再没有站起来为我辩护的人，这些选民对我的印象也就基本定型了。面对保守党人不遗余力的抨击，孤立无援的我们本想寻求某些第三方的帮助，让他们作为调解人出面向选民解释情况，但我们的请求被无一例外地婉拒了。这些第三方机构本身也面临民众基础薄弱、资金不足的问题，手中资源实在有限，因此难以替我们进行反击。所有的工会组织、妇女团体和大学里的时事评论员都表示不想卷入这场争斗，认为我最好还是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我很理解他们的想法，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负面宣传对于我们的民主政治的亵渎有多么严重。

低迷的民调数据加剧了攻击广告的负面效应，而且正日益成为决定你是否有资格为人民代言的关键因素。要知道，在你的民调支持率骤降的同时，不管你对民众说什么，人们都只会当作耳旁风。不久后，攻击广告的负面效应已然尽显，惨不忍睹的民调几乎等于判了我们死刑，政治记者们也都开始在报道里把我形容为行尸走肉般的存在。而我则下定决心要拼死反抗，我竭力地想要证明那些关于我的政治生涯已经画上句号的传闻全是谣言，但这注定是一场鏖战。

选民们在选举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他们如何判断候选

人是不是有资格为他们代言？要是把选民的决定归结为被政治广告和民调机构绑架的产物，便太过草率了。要是简单地以为投票过程已经降格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冲动消费”，也同样很不合适。诚然，确实有不少政治幕僚都曾试图这样说服他们所服务的政客，操控选民的投票行为就像广告主可以左右消费者要不要买一块肥皂那样简单。然而，如此粗暴地把政治选择和消费者选择做类比，我实在不敢苟同。这不仅是因为选民往往比大部分政客和销售专家要来得聪明，更是因为选民心里时常会赋予投票这件事一个特殊的意义，而这种赋予意义的心理却不会在他们买裙子或裤子的时候出现。投票的那一刻，是展现你归属于某个政治团体的时刻，你在那一刻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也加入了一场决定国家前途方向的集体行动。相比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投票更是一个表现政治态度的良机。大多数选民都知道自己一个人的选择并不会对最终的结局造成多大的影响，但他们仍会坚持参与投票，这正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民主政治中，政治参与至关重要。

[10] 还记得，在2012的美国大选中，许多州的选民都不得不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才能完成投票。他们渴望自己的呼声能被听见，渴望自己能在这场总统竞选中表明立场，要是你不能感同身受，你当然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对于那些参与了投票的选民而言，投票的过程无异于一种社会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就自己的选择向邻居和朋友做出解释。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向任何人辩解自己为什么要买这块肥皂或那身衣服，但为什么要选某位候选人则与之不同。而且，他们知道只有在某些方面做出解释才有可能说服他人。你可以告诉别人说，你是因为喜欢它的颜色才买了这身衣服，但如果你说你是因为某位候选人的长相而把票投给了他，恐怕很难服众。选民认为自己需要就自己的选择向他人说明原因，正是这一主观上认定的义务，将投票的过程和冲动消费区分开来。我说上述这些话的目的便在于阐明这一

点：解释投票选择的义务是让选举过程变得理性的关键。[11]

有太多败选的政治家习惯于把自己的失败怪到选民的头上。败选的政治家会告诉你，他们既不理解为什么选民没有选择他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立场没有通过选举的考验。我也在选举中失败过，我当然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把一切都怪罪到不理性的选民身上。然而，这样做无异于抱薪救焚，只不过是在逃避责任。

短短五年间，我参加了三次竞选，也逐渐理解了选民的投票逻辑。他们深知，国家正面临的绝不是什么简单的问题，如果可以很容易就得到解决，那也不必拖到现在。他们会继而推测认为，任何候选人提出的对策都不可能是一招见效的灵丹妙药，而且在众多对策面前，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哪个对策可能更胜一筹。所以，对他们而言，理性的做法是将关注点从悬而未决或实在难以一时解决的议题，转移到那些他们有信心自行判断的议题上来。正如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结果所示，当人们遇到认知困难时，便会自然将注意力从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上，转移到那些我们直觉认为简单的问题上来。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相信自己可以自主地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这也因此成为选民对候选人的基本评估标准。[12] 为何在政治的舞台上政治家对现实议题的看法不及他们的个性重要？候选人的资格问题又为何会在选举时备受关注？对这两个问题的理性解释是，选民们在决定谁值得倾听、谁又值得信任方面都十分擅长。而在决定谁最值得信赖的过程中，选民们更看重的是谁更像自己。一位公民在判断另一位公民是否可以作为自己的代表，为自己的利益代言的时候，最关注的是这另一位公民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选民们都乐于选一

个熟悉自己的人上台，而候选人为了表现自己对选民的熟悉，也会尽量向选民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是　　你们中的一分子。然而，选民们还会继续追问：“这个人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吗？”正是在这样的责难下，才会有人不遗余力地翻出某个候选人曾经发表过的所有言论，并竭力从中找出能证明其心口不一的证据，再将这些证据做成宣传广告广为传播，从而对这位候选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虽然选民不一定会相信这些宣传广告的一面之词，但他们会因此开始质疑这位在广告中被抨击的政治家是否真的值得信任。于我而言，正是那句“只是过客”的广告词才让选民们开始质疑我是否真的是我口中的那个人，而另一句“他不是为你才回国”则意在动员选民对我回国的动机提出质疑。如果一个政治家无法说服选民自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才从政，他也确实没资格从政。要是一条讯息编辑好了却没有填上收件人，自然不会有人得以知晓这条讯息的内容是什么。

巴拉克·奥巴马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也曾受到过对手无情的攻击，但他的回应却让所有民主国家的政治家都发现他巧夺申诉主导权的才能。2008年春天，他在费城所做的那场以种族为题的演讲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那就是一场关于资格的演讲——奥巴马由此成功地捍卫了自己为非洲裔美国人发声的资格，也表达了对于美国白人因在平权法案中被忽视的愤慨的理解。正是这场演讲，奠定了他日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资格基础。他就职后布满荆棘的仕途说明，即便是在位的政治人物也无法保证就能享有人民的拥戴。甫一上任，奥巴马便饱受“出生阴谋论者”的困扰，屡屡被人怀疑自己并非在美国出生，因此不得不公布自己在夏威夷出生的出生证明。2012年大选时，又有对手想方设法地就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对他百般刁难，但这一次，选民对奥巴马的集体声援成功地压倒了竞争对手的质疑，从此彻底

改变了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对于任何意欲参选美国总统的人而言，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门槛都已不复存在。美国和其他受其鼓舞的民主国家由此朝着马丁·路德·金所梦想的那个遥远国度迈进了一步。在那个国度里，人们不是以他们身上的标签，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受人评价。尽管奥巴马的当选为美国的种族平等带来了巨大的胜利，但那个遥远的国度仍然遥远。尽管许多民主社会已将各种各样的歧视视作非法行为，但在这些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以阶级、教育和公民身份为武器来剥夺他人从政资格、动员公民相互对立的现象仍然存在。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选民仍然是这些争斗的最终仲裁者。只要我们的直觉还能执拗地提醒我们——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需要一点点亲手争取的特权——我们的民主就还有希望。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言："人民是最公正的，我们为什么不对这点抱有最坚定的信心呢？难道在这世上还有什么别的值得我们寄予同等甚至更大的希望吗？"[13]

与此同时，在这个政治完整性几乎已被资格争斗消耗殆尽的当下，我们又不得不蒿目时艰。在一个健康的民主政体里，候选人不会质疑对手参选的权利，也不会因为对方的公民身份、爱国热情、从政动机甚至诚意而对他百般刁难，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对方今后是否会有足够的能力、经验、远见、政纲和想法来展开治理。而我们如今所处的，是一个正在退化的政治环境。政治家之间为了避免在具体议题上展开辩论，为了避免观念上的自由交流而不遗余力地互相攻击，因为一旦成功剥夺了对手的政治资格，也就无须再去反驳他口中说了些什么。因此，政治家们才会一味地诋毁对方。

我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好。此后，我会主张禁止在非选举时期

开展党派宣传。就算要进行党派攻击，也请放过我们可怜的选民们，让我们到议会来进行辩论。此外，我们还要借鉴诽谤法来惩罚用恶意谎言中伤他人的行为。归根结底，全然负面的政治行为对任何人都不利。任何想要在危机时期团结起整个国家的政治家，一旦恶言诋毁其政治对手，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辜负了人民的信任，而这信任正是团结和鼓舞人心所必须彰显的力量。如果你是通过卑鄙的手段才在选举中胜出的，那你上台后也不太可能有什么好的表现。没有人希望我们的民主沦为每一场选举都是关于候选人适格与否的全民公投，也没有人希望我们的民主只能被一些恶言恶语的攻击宣传所左右。要是资格成了政治关心的唯一话题，那我们在选举时也就不必讨论任何社会亟待解决的议题了，人们也无需通过选举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了。我曾参加过的三场选举，无一例外全部充斥着资格问题的争辩，从未提及任何同国家前途有关的事。而且，令人震惊的是，在我从政的五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一位对手曾就我的观点、政纲或者施政计划提出质疑。或许他们太忙了，忙到没空来攻击我。我无意在此抱怨什么，我也永远不会后悔自己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名誉。我只是觉得，这样争斗下去，我们国家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

[1] 大帐篷（big tent）指政党或政党联盟试图吸纳及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从而吸引更多选民的一种现象。一般以红色代表加拿大自由党。——译者注

[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VJ3eSN6MBM.

[3] 超级碗（Super Bowl）是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也称为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胜者被称为“世界冠军”。——译者注

[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gjUkPbGwAg. 另外参见Drew Westen，The Political Brain：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d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2），ch.2。

[5] 杰里迈亚·赖特（Jeremiah Wright）曾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牧师。在奥巴马首次竞选总统时，赖特曾公开发表一些带有种族色彩的煽动性言论，引起各方争议。——译者注

[6] Barack Obama，“Towards a More Perfect Union” speech，Philadelphia Constitution Hall，March 2008，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p-v2tHaDo.

[7] 美国法律中关于“当事人资格”的关键判决有以下五个：Frothingham v. Mellon，262 U.S. 447（1923）；Fairchild v. Hughes，258 U.S. 126（1922）；Bond v. United States，529 U.S. 334（2000）；Allen v. Wright，468 U.S. at 757（1984）以及Lujan v. Defenders of Wildlife，504 U.S. at 562（1992）。感谢布伦特·凯特尔斯（Brent Kettles）和迈克·帕尔（Mike Pal）在“当事人资格”、美国选举法和加拿大在上述领域与美国的差异等问题上向我提出的有益意见与建议。加拿大法律中关于“当事人资格”的关键判决为：Canadian Council of Churches v. Canada（Minister of Employment and Immigration），[1992] I S.C.R. 236。

[8] 威拉德·米特·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美国政治家、企业家，曾任马萨诸塞州第70任州长。2012年曾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当年的选举中败于时任总统奥巴马。——译者注

[9] Sasha Issenberg，The Victory Lab（New York：Crown，2012）；Thomas Byrne Edsall，The Age of Austerity：How Scarcity Will Remake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Doubleday，2012）.

[10] 也有人曾经提出与之相反的观点，参见Russell Hardin，How Do You Know？The Economics of Ordinary Knowled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1] 关于这一话题，我曾在2013年1月4日，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tionality，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埃德娜·乌尔曼·马格丽特讲堂（the Edna Ullmann Margalit Lecture）上在讲座《政治中的理性》（Rationality in Politics）中有进一步的论述。在此，我想特别感谢阿维夏伊·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和摩西·哈尔伯塔（Moshe Halbertal）两位就这一话题向我提的意见。

[12] Drew Westen，The Political Brain（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8）；George Lakoff，The Political Mind（New York：Viking，2008）. 另外参见Daniel Kahneman，Thinking Fast and Slow（New York：Doubleday，

2012）。

[13] 亚伯拉罕·林肯的首次就职演说，1861年3月4日，http://www.nationalcenter.org/LincolnFirstInaugural.html。

第八章 敌人和对手

诚然，对手否认了我在自己祖国从政的资格确实令人愤慨，可是说实话，我自己也犯了不少错。就拿带领党团在2009年1月给政府预算案投赞成票这件事来说，我们党事后如同一个买错了东西的消费者一般懊恼。当时的我们刚刚拒绝了同其他反对党联盟的提议，又不情不愿地和政府站到了同一边，而这正是中立政党在野时不得不忍受的痛处。为了摆脱这一尴尬的处境，2009年9月，我授权在众议院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试图扳倒当权的哈珀政府，然而这一次我又失策了。2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同政府站在一边，到了9月我们却又翻脸不认人，准备打倒政府，这样的做法确实互相矛盾，怪不得其他两位反对党的领袖杰克·莱顿和吉勒斯·都赛佩见势都一反过去和政府对着干的常态，开始乐呵呵地力挺当局，只为了看我身陷尴尬的笑话。对于选民们而言，他们本就厌恶那些喜欢玩政治游戏、立场又不坚定的政客，我看上去两样都占了，理所应当为我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

这场溃败发生后，我将办公室主任伊恩·戴维和其他大部分幕僚悉数换成了党内深谙反对党工作精髓的专家。这又是一次不甚明智的人事变动，尽管我当时非常清楚我必须这么做，但变动初期，仍有不少人因此对我心生愤恨。为求自保的我牺牲了当初辅佐我出任党领袖的一队老将，他们既是在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也是在为我个人的错误买单。就这样，我失去了原本最为忠诚的追随者，再也无法确定身后是否还会有人时刻保护我，那时的我如此孤独。看着民调支持率一路猛跌，我和整个党团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除了上述的战术失误，我们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困境。当初，我们在政府提交的预算案上投了赞成票，也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在经济议题上制衡政府的权利。虽然我们本可以对外声称，如果没有我们的施压，政府不可能拿出这份经济刺激方案；我们也可以提醒人们，是自由党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积极作为才让我国当时岌岌可危的银行和财政体系得以为继，但选民很少记得你过去的功绩，他们更在乎的是你明天将如何继续为他们服务。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处境艰难。我们曾试着和政府就一些边缘的政策领域辩争，比如现行的失业救济金制度里荒谬的地区差异，但全国90%的受雇人口似乎并不在乎剩下那10%的失业人口是否正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度日如年。我每到一处，尤其是加拿大中部的制造业重镇，都会遇到许多因经济萧条而受影响的民众，生活在骤降的订单量、一路走高的美元汇率和高失业率这三重阴影下，他们正是经济危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政府却设法使国人相信加拿大的经济仍然比美国经济要坚挺，以此安抚人心并让人民将一切功劳归结到政府身上。为了确保人民能看到自己的功劳，政府甚至在全国每一处建筑工地的门口都贴上了“经济行动计划”（Economic Action Plan）的标志。诚然，通过重申事实来让选民相信一切功劳属于你，确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不可少的天赋。尽管很不情愿，但我不得不佩服哈珀总理的计谋又一次得逞了。我抱着怀疑的态度目睹了他是如何通过重申事实为自己揽功的，也目睹了他是如何为了粉饰太平，掩盖了社会的不平等和阴暗面，从而在国人眼前营造出一片祥和景象的全过程。换言之，哈珀把自己包装成了解决我们国家所有问题的唯一救星。

难道我们就成不了救星？我们的党在执政时曾主张建立大政府，而在如今萧条艰苦的经济形势下，我们也在设法寻找新的出

路。曾经在财政管理上的成功，至今让我们的施政风格以开支巨大闻名。然而，无数家庭内部面临的经济不确定因素与日俱增，选民们也都希望能够早日解脱沉重的经济压力。为了应对这些深层次的挑战，我将蒙特利尔市内各界数百位主要的专家学者召集起来，组织了一次会议，并同期在线上进行网络直播，吸引了上千名网络观众的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打开党常年紧闭的大门，开诚布公地向现场的学者和专家请教他们是如何看待自由党的公众形象的。 [1] 他们中有的人说话虽然刺耳，但直指痛点。加拿大著名外交官罗伯特·福勒（Robert Fowler）就在会上批评称，我们的党已经失去了灵魂，我们不再为任何事任何人愤愤不平，因为过去多年的执政已经彻底腐蚀了我们。虽然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很高兴他能如此坦诚。重新改造我们的政党文化就意味着我们要谦虚地听取别人对我们的真实看法。

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对于经济艰苦时期政府应当承担的必要职责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我在会上对所有与会者说，有些事情政府可以做，有些事情政府或许可以做，还有几样核心的事情政府不得不做。首先，政府必须保护人民免受系统性风险和市场失灵的过度影响。在这里，个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应当予以区分。在一个好的社会里，人们必须自己承担生命、财产和思想观念上的风险，如果成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失败了，那应当承担责任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政府，这便是所谓的个人风险。系统性风险则有所不同，它带来的损害是个人能力所无法解决和修复的，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它蚕食了全球上百万无辜居民的存款和养老金，迫使上百万居民失去工作。面对这一危机，政府应当成为抵御失控了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应当严格管控市场风险，并让风险的制造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以免让无辜的纳税人和公民去承担损失。其次，政府应

当保证能为人民提供可靠的社会安全网络，让人民在面临任何可能的经济风暴时都能有所依靠。虽然政府无须对个人风险担责，但有义务让人民不在恐惧中生活——对于收入不稳定的恐惧、对于陷入贫困的恐惧、对于巨额亏损和身陷赤贫的恐惧。最后，政府需要坚守岗位，为每一位公民争取平等的机会。理论上，在条件如此艰苦的当下，我们不能损失任何一个可以创造财富的劳动力，然而实际上，全国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口生活在失业之中。我们必须坚持在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以盘活经济，而且我们完全不必扩大预算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下借贷成本低廉，而且我们的赤字水平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以上这些对于政府作为的积极设想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要想获取经济上的成功，就必须为所有公民打开更多的窗口，让他们得以拥抱更多的机遇。接下来的一整年时间，我们为了宣传上述的设想和理念四处奔波，并在各个地方市政厅里与当地的民众分享我们的政策理念，我觉得我们收到了不错的反馈。

我有一位在媒体经营多年的老友曾对我说，反对党领袖是政界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份差事。因为他不仅需要永无止境地揣摩总理的心思，还要始终面对媒体、本党党团和公众的监督，他们恰巧是最吹毛求疵、最难以驾驭的三个群体。我从来不会在私底下同任何记者通气，面对媒体的发问，我也总会以实相告，避免表现出任何个人偏好，而且尽量不发表任何未经深思熟虑的言论，以免祸从口出，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和大部分记者的合作都很愉快，但对某些半夜里给我在英国伦敦生活的前妻打电话并试着从她嘴里套出我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之类的话的记者而言，我嘴里说不出任何好话。我也一向厌恶另一些特地跑到我们位于法国南部的住处蹲守的记者，他们原本希望看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城

堡，从而在报道里把我描述成一个骄奢淫逸的外国侨民，但他们眼前这座简朴的房子却让他们希望落空。另外，更有甚者通过伪造照片谎称我曾和一群美国特种部队官兵在一架美国直升机前微笑合影，这种行为令人嗤之以鼻。我记录下上述这几件事，就是为了警醒人们千万不要低估了一部分媒体无所顾忌的程度，他们甚至可以心甘情愿地沦为政党之间互相攻击的工具。在和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逐渐习惯了自己的私人生活无时无刻不被外界关注的常态，但我仍然会在大部分时候设法避免让巧兰和我的孩子生活在镁光灯下。另外，我也学会了在一个双重世界中适应政治生活：一个是真实的世界，需要我和其中的公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总是那么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另一个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在那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同样一个人，当着我的面他是断然不敢侮辱我的，但一旦到了博客和推特那个肆无忌惮的世界里，他却会想都不想地就参与到各种对我富有想象力的责骂和诽谤之中，这样的事情总让我有惊无喜。媒体总是一如既往地在互联网对传统媒体产业经营模式的冲击面前忧心忡忡，但当他们关注反对党的动态时，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多少还算公正。还有那些新闻日报的记者们，每次党团会议一结束，他们便会立马把麦克风塞到你的面前，但他们的工作很专业，我印象里他们不曾做过类似断章取义地理解我的言论或在私底下做秘密交易的事情。倒是那些专栏作家和报章评论员可以轻易地将人打倒，我也做过一样的工作，所以我知道一个坐在台下的观众要想嘲笑场上的选手有多简单。可殊不知，这却可能给场上的选手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为了广泛接触公众，我和我的团队决定绕过媒体的束缚，直接奔赴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社区中心和高中体育馆巡回即兴演讲。这是个高风险的计划，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转角那个手上拿

着一捆纸、看上去有些怪异的男子会冲到麦克风前面说什么话。然而，既然这项战略已清楚明白地对外公布了，我就应该做好随时倾听公民们的诉求并向他们学习的准备。当时，我也正想摆脱那种照本宣科的讲话，想要活得更“危险”一些。我几乎每周都要参加一次事先毫无准备的即兴问答，从台下形形色色的人民口中，我听到了他们最真实的心声，认识到了国家最真实的面貌，感受到了人民和祖国共同跳动的脉搏。每一场演讲、每一场问答都是一次民主的盛宴，但这却占据了不少我本应在众议院的工作时间，这让新民主党人得以乘虚而入，对外宣称我没有按照职责来议会上班。然而，我始终觉得这几乎每周一次与民众的会面是必须的，我相信这才是填补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鸿沟的最有效办法。

至于和议会党团的相处，起初让我觉得很为难。我的同事们的自尊心本就很强，被迫下野让他们备受挫折，他们每个人都急于向我大倒苦水。在任何有关民调的传闻面前都脆弱不堪的他们，时常会克制不住将某些机密泄露给蹲守在外的政治记者。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开始懂得欣赏党团成员们高超的政治艺术——这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议员，大多有着比我长得多的政治履历，他们富有幽默感，似乎对宿命论笃信无疑，但却始终相信好消息就在下个街角等着他们。这些都是终身职业者才会有的特质。每周三，我们的议会党团都会在议会铁路委员会会议室里碰面。这间屋子有着高挑又壮观的天花板，一旁巨大的壁画描绘的是1917年4月结束了维米岭战役（Battle of Vimy Ridge）[2]的英雄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回家路上的场景。似乎只有当我们在野时，才更能辨认出画中那些颜色灰暗、满身泥垢的人物。每次两小时的讨论，时常有同事在他人发言时自顾自地看报纸、玩手机、窃窃私语或者互相打趣，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会场，就像其

他任何党派开会一样，总是免不了出现些大话空话，可是只要有人接过麦克风后直入主题，随即开启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所有人的注意力便会立刻集中到那人的身上。起初，每周三和党团开会还是件令我恐惧的事情，但逐渐地，我开始对党团会议上参众议员们向我传递的信息愈发依赖起来，像是自己选区的选民最近在热议什么话题、在议会大厅从其他党派的议员口中听到了什么，或者记者们在私下又在议论着什么。我们之中也有那么几个可恶的内奸会时不时故意地将党团内部的消息泄露出去，我们试过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也没能把这几个泄密的人找出来。总体而言，我的党团还是忠诚于我的，也从未有人起身反抗我的领导。就这样，我开始明白自己多么倚重他们。每周三的会议最后，我都会起身对方才的讨论做一番总结，随后像其他任何团队的领袖一样告诫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团结必胜，分裂必败。

和我们对立的政府交手，常让我们感到怒不可遏，但多亏了共同的愤怒，我们才得以团结一心。曾有人打趣地说，他们给人的印象，比起是一个政府，倒更像是一个摩托车黑帮。哈珀先生始终坚信最好的防卫就是主动出击，这一假定在他看来不容置疑。因此，他才会紧紧抓着众议院不放，无时无刻不在挤兑反对党籍的议员们，并且不遗余力地想尽各种方法来维护自身的党派利益。

我们曾一再要求政府告知议会他们用于购买F-35战斗机的真实花费，毕竟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一件采购案。我们党团的两位议员马克·加尔诺（Marc Garneau）和多米尼克·勒布朗，在调查了美国国会发布的超支报告后，一遍又一遍地质问我们的政府，何时才能告诉国人每一架飞机的单价，但他们从来得不到政府坦率的回应。政府的闪烁其辞间接证明了他们为国家

做了桩不划算的买卖。另一位党团成员马克·霍兰（Mark Holland）也曾屡次逼问政府，为何在2010年多伦多举行八国集团（G8）与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政府竟然在安保事项上花费超过10亿加元。讽刺的是，正是在这场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决定推出经济刺激政策，而且，哈珀先生还带领与会首脑提醒西方公众做好准备，迎接财政紧缩的到来。哈珀政府在此次峰会举行期间造成了公共财政的极度浪费，其安保部署也已公然侵犯了基本的公民自由权利，他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我们发现，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被浪费的数百万加元税收中，还有一部分被用到了与峰会举办地相距甚远的某些保守党选区，没有任何和峰会沾边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些花费。我们的党团成员杰勒德·肯尼迪（Gerard Kennedy）则进一步揭露了这些公共资金是如何从2009年由我们投票通过的经济刺激预算被挪用至保守党选区的全过程。又一次，金钱被用在了为政党政治服务的目的上。换言之，在我们履行反对党职责的同时，政府唯一的作为便是拖延、否认和掩饰。要是总理和政府总是这样向议会隐瞒一些关键信息的话，我们的民主政体必然无法正常运行。最终，众议院议长做出裁定，认为政府拒绝向议会提供关于二十国集团峰会开销的相关材料是蔑视议会的行为。[3] 这个对保守党蔑视行为的裁决在加拿大议会史上还是头一遭。

此外，为了迫使政府公布有关加拿大部队转移被关押人员至阿富汗本土的安全和情报机构的信息，我们也向政府发动了一场类似的攻击。我们的阿富汗盟友因虐囚的习惯而举世闻名，而在知情的情况下将被关押人员送回阿富汗接受虐待显然有违《日内瓦公约》。因此，乌贾尔·杜桑吉（Ujjal Dosanjh）、李博和我连续数月要求政府严格履行被关押人员转移协议，以在保全我们的士兵们的荣誉的同时，让被关押人员的安全获得保障。然而，

政府却拿国家安全做幌子，编造了许多令人怀疑的理由，不让我们有任何接触所需文件的可能。当我们随后退一步做出妥协时，他们又开始编造了新的谎言。最后，议长彼得·米利肯决定支持我们，裁决政府又一次蔑视议会，迫使其将相关文件交至一个特殊议会委员会审阅。

或许你会以为政府蔑视议会、蔑视民主的行为势必会伤害到公民们的爱国之心，从而引起议会外的愤怒，可是你错了。当我们试着将我们岌岌可危的民主现状和政府那套变了质的党派偏见公之于众的时候，大部分国人只会满不在乎地朝我们耸耸肩。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大多数选民对议会系统的了解少之又少，也鲜有耐心听我做出任何关于滥用民主的指控，更不用说他们对议会改革的提议有多少兴趣了。掌权的政府比我们更能认识到这一事实，所以才会无耻地利用公众对议会犬儒主义的态度，以党派攻击为由避开了我们的所有指责。

然而，在我担任议员期间，有一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先前认为众议院与公民之间已竖起一座高墙的想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仍有公民在迫切地期盼议会能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议会的位置上来。那便是政府在议会举行的向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受害者郑重道歉的仪式。这类学校在19世纪末以同化印第安儿童为目的建立，由天主教或新教教堂按合约管理。然而，可耻的是，当时在这类学校就读的儿童却在校园里饱受性侵、虐待和殴打的折磨，此后终生都不得不活在这段经历的阴影之中。20世纪80年代时，此类学校已被悉数关闭，但每当我到访任何原住民社区，我们仍能体会到这段可怕的回忆给受害者的身心带来了多么巨大的伤痛。有一次，我和巧兰到访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弗雷泽河（Fraser River）岸边的斯多罗原住民社区（Stó:lō nation），一

位老人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讲述了她当年在寄宿学校的遭遇，她最后无奈地耸耸肩，总结道："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中的任何人会把孩子送出去接受教育？"连续好几届的政府，包括我们都曾试图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直到哈珀总理任内，经过反复磋商，政府最终制定出向寄宿学校受害者提供的财政赔偿方案，并决定在2008年6月于众议院举行仪式郑重向原住民道歉。仪式上，各原住民民族的代表在众议院中央的主走道上落座，楼上的旁听席也坐满了来自全国各个原住民团体的民众，他们中的许多人穿着各自部族最隆重的礼服。仪式开始后，总理和数位原住民领袖相继发言，虽然我记不清他们当时分别说了什么，但我却很清晰地记得旁听席上的民众身体前倾、全神贯注、神情激动的场景。当仪式结束后，我和不少原住民家庭从议会大厦来到门口的草坪，围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方才这一仪式对他们的意义：这是对他们身份的承认，也是对一个崭新的开始的承诺。加拿大原住民长期以来对于自身政治参与身份的矛盾心理，让这场庄严肃穆的仪式既令人动容，又同时让人感到心酸。原住民们直到1960年才被允许参加联邦选举投票，时至今日，他们在全国性选举中的活跃程度仍然远远不及各自部族的选举。可在当时那个场合，人数众多的原住民却向我们主动申明其希望自身的历史伤痛可以在议会得到承认的心愿，这让我们这些早已习惯在此搞残酷政党斗争的议员们猛然陷入深思：议会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天的道歉还有一个讽刺之处在此值得一提。2008年6月，政府在道歉时承诺给原住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但是此后这一承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落实。加拿大原住民和所有国人仍在等待之前在他们面前言之凿凿的政治家能够早日落实当时做出的承诺。

除了那一天外的其他时候，议员们聚集在一起的工作似乎只会拉开公民和政治家之间的距离。党派性（partisanship）正是

这一切的根源。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政党差异的存在正是政治的精髓。加入一个政党，就意味着加盟一个团队，选择一位领袖，发表你的政治观点，然后大步向前和对面的敌人作战。党派性便意味着政党教条第一，个人判断第二。你一旦加入了一个政党，对党忠诚就成为了压倒其他一切的最为重要的道德核心，政治定位的信息泡沫将会充斥你的生活。 [4] 你将彻底与对立的政党决裂，不仅和他们划清界限，还会和他们在任何你反对的议题上势不两立，你的生活将被党派性重新定义，你也会从此对这样的生活习以为常。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在从政期间没有任何来自对立政党的朋友，我们彼此之间从来不会在政府办公楼的长椅上一起吃饭或喝茶，甚至连一句话都不会说。要是你被人发现在议会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和对立政党的某个人聊天，霎时间，议事厅内便会谣言四起，称你正准备加盟其他政党。现在回头去看当时那段经历，简直疯狂至极。要是在当时的少数党政府中，自由党人能和新民主党人走得再近一点，联盟的提议也不会那么快被枪毙，虽然当时，和对手交好确实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曾有前辈告诉我，在过去，如果议事日程被迫推迟，对立党派的党员也会一起喝酒吃饭，而这些党际和睦的表现则会加强议事厅里辩论双方间以礼相待的秩序。如今，议会里的党派性却从过去的群雄乱斗降格为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政治家来说，党派性并不意味着放纵无度和混乱无序的政治，“区分”（differentiation）才是党派性的本质。人民有权在不同选项之间做选择，政治家的工作则是要将这些选项的内容用清晰明了、毫无矫饰的语言展现在人民面前。如果想把选民从一片混沌中拉出来，就必须用戏剧化的手段、黑白分明的方式展现这些选择。如果政治家忘了自己的党派属性，无法坚持自己这一方的立场，甚至开始变成一棵墙头草两头倒的话，那他势必只是个愚人，做不了政治家。

但是，在外界民众的眼里，党派偏见却是荼毒政治的罪魁祸首。党派间的激烈交手似乎和他们以及他们的利益沾不上边。在许多选民看来，政党政治只是政治特权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上演的伪善的戏码。每当我们政治家在剪彩、献堂典礼和其他公众活动上介绍我们的同事时，总是会极尽能事地恭维、吹捧对方，让现场的观众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正置身于一场政治家洋洋自得的大弥撒的现场。为匾牌揭幕、为建筑奠基之后，政治家还会和众人一样争先恐后地站到合影镜头前，生怕自己无法在第二天的当地报纸上出现。正是这些可悲的情形给选民留下了负面的印象，怪不得他们只能摇摇头说道："他们做这些都只是为了自己而已。"

选民也会直白地告诉你他们对虚伪的党派偏见有多厌恶。他们无法相信政治家说的话，因为似乎就连政治家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那套说辞。当然，选民们这样的想法并不错。只是比起诚实，党派性更看重的是党员忠诚的品质，所以政治家有时才会牺牲对自我信念的坚守，选择重复党派的教条。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有过从政经历的人都或多或少做过"虚假广告"的原因。可是，这么做时常是必要的。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一场至今仍难以超越的以政治为题的演讲中说道，那些选择遵循诚实高于忠诚原则的"以政治为业者"，实际上是在践行一种"信念伦理"[5]（an ethic of ultimate ends）。[6]总会有人尊崇这种伦理，但他们的政治生涯往往都较为短暂。照韦伯的说法，与"信念伦理"相对立的是"责任伦理"（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后者更为关注的是"我对谁负责"的责任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是选民的话，那你必然要将他们的利益置于你自己的良心之上，否则你只能一事无成。

我曾遇到过许多认为政治应以信念伦理为纲的选民，尤其是年轻人。我认为，良心确实很重要，但如果是在要夺取执政权的背景下，政党的团结统一则比个人的良心更为紧要。没有执政权，我们做不了任何事。可就算有了执政权，你能做的事情也会有一个明确的边界。遗忘真相会让你付出你无法承受的代价，你也可能会因此沦为一介草夫。这种错误，大多数政治家都不会明知故犯。你会试着保持自己本真的面目，可是在政治迫使你做出各种妥协的时候，要保全自己的本真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和我的幕僚常会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比如面对敌人持续不断的猛烈火力，我们是该继续坚持正确而困难的方式，还是用一种不上台面却非常有效的方式予以反击。说实话，我们有时甚至会一头栽到泥水里，和身旁的对手来一场殊死搏斗。不用说也知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身上不免和对手一样沾满了烂泥。

即便如此，指责政治家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丢弃原则的犬儒主义者，这样的指控也并不是事实。作为党领袖，我会坚持我认为正确的立场，尽管有时这会让我们付出痛失议席的代价。比如，我认为站出来反对石棉出口便是一件正确的事，因为滥用石棉将带来致命的严重后果，虽然这么做牺牲了不少我们在那些石棉储量丰富的城镇的议席，像是魁北克石棉县（Asbestos）。我们也坚信，捍卫枪支管控、反对保守党企图解除管控的做法也是正确的，尽管这一立场让我们失去了不少北部或偏远地区的议席。有一次，来自育空领地（Yukon）的议员、我的好朋友拉里·巴格内尔（Larry Bagnell）在我的劝说下终于同意支持我们在控枪上的立场，最后眼中噙着泪为我们投下了支持票，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么做的代价可能就是自己正坐着的这个议席。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此外，拒绝延长强制最低服刑期限也是我们认为正确的立场。在犯罪议题上，我们坚持证据政治（politics of evidence）

应先于畏惧政治（politics of fear），虽然我们也因此流失了不少选票。所以，即使党派性是政治的精髓所在，政党利益也并非永远都是政党的唯一信条。说真的，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唯政党利益马首是瞻的话，我们或许要比现在成功得多。

从政的经历教会我，要想有所作为，就绝不能躲在纯粹道德的庇荫下。但是，要是你丢掉了所有原则，也就无异于丢掉了自己一开始投身政治的初衷。这样的困境既是政治生活的本质，也是政治之所以激动人心的原因。要想有所作为，难免会让自己感到为难。有时候，我觉得那些对于政治生活里一些必要妥协都不耐烦的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有些眼高手低，他们对政治家的厌恶也只不过是他们为了逃避自己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的借口。

选民时常无法理解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困境是，对于那些真的想要夺取权力的政治家而言，他们不得不同时兼顾两种伦理。正如要喂饱猎犬就必须喂给它们足够的肉食一样，要想巩固自己的选民基础，政治家就必须扛起党派性的大旗。然而与此同时，政治家又必须挣脱党派性的束缚去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这些摇摆不定的选民最需要的并非让你为他们发声，而是你和他们的沟通。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既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又能战场下以理服人。正如一名伟大的苏格兰政坛老手所言："一个人要是无法同时驾驭两匹烈马，就无权在这残暴的马戏团工作。"[7]

如果把政党偏见仅仅看作一个马戏团演员在同时驾驭两匹烈马的戏码，那观众最差的评价也不过是这场表演烂透了。可是，对选民们而言，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党派性既让我们这个已然出现分裂的社会不断走向更深的分裂，也将对手变成了敌人。对手可以被打败，但敌人必须被摧毁。和对手过招，妥协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并且今天的对手也可能变成明天

的盟友。和敌人过招，消灭对方是唯一的选项。从政时，我为“忠诚于女王陛下的反对党”（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效力，“忠诚”一词便代表了反对党在民主政体中的合法地位，所以政府不应质疑反对党人是否对国家忠诚。然而，我所面对的政府却不厌其烦地在这一点上怀疑我们，他们显然把我们看作了敌人而非对手。劝说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通过劝说，你或许能将今天的对手争取为明天的盟友。但在我们如今的政治里，劝说已然奄奄一息。在和我们一样遵循议会民主制、设置共和制立法机构的国家里，议员的投票选择早在正式投票前就已经决定，议员跨越议事厅走道到对立党派的阵营里去说服对方的场景因此也不可能出现。政党在各自的教条中早已剔除了说服他人改变立场的必要，因此议员们也没有任何动力在辩论时以礼相待。当民主辩论中不再存在劝服一说，双方的意见交换也就失去了意义，所谓的辩论不免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恶斗。想必任何选民在目睹两名政客在一个原本空荡荡的议事厅里指着对方的鼻子厉声辱骂后，都会对民主大失所望。可是，类似的场景在当今世界的许多立法机构已成为常态。随着立法机构的权力逐步衰退，行政和官僚体系的权力持续累积，议院内部的辩论开始变得既令人不快，又缺乏实际意义。立法民主在节节衰退而党派偏见却有增无减的双重现象，确实让民主人士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这两者合在一起便会削弱民主政体的一个关键作用：防止将对手变成敌人。

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便在于文明（civility），而这里所说的文明除了礼貌（politeness）以外，还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文明的内涵在于，你会认可对手和你一样忠诚于国家，就像他和你具有同样的信念一样。认可并不意味着排除对手之间的剑拔弩张，也不代表对手间偶尔的一两下重击就罪不可恕。它来源于人们对

民主的一个共同认识：实际上，民主是对手间的政治。然而在现实情况中，敌人间的政治正愈发主导着我们。我们身处在一场扭曲的游戏中，游戏中的政治规则处处效仿战争规则来制定。这场游戏的目的不在于要打败对手，而在于剥夺敌人的参战资格，从而彻底地摧毁对方。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任何只能逞一时威风、轻率不负责任的政治言辞，否则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但政治并非 战争的延续。 [8] 政治是战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我们都关心政治，想要维护政治，也都想让政治时刻保持朝气蓬勃，正是因为政治的目的便在于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我们的保守党对手咄咄逼人的姿态并非首例，但这确是他们连续13年在野的沉痛经历催生的结果。把加拿大的保守党放到美国政治的语境下看待，便相当于美国的共和党，我们的保守党不仅从美国共和党那里借来了一整套关于负面攻击的攻略，而且还全盘接受了共和党将政治看作战争，将对手看作敌人的意识形态。把政治比作战争的做法，暗含着一些严重的隐患，比如让“不留活口”（take no prisoners）的做法得以合法化。而且，这种比喻还会让负面宣传这种歪门邪道的政治手段找到自我辩解的途径。不管负面宣传多么有效，它却可能让普罗大众从此远离政治，让人民和从政阶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让政治领袖愈发难以动员、鼓舞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且，负面宣传更会荼毒政治的本质，扼杀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互信，让善治政府所仰赖的信任根基荡然无存。

把必须打败的对手看作必须摧毁的敌人的同时，在大多数民主国家立法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妥协和协议，变成了叛变和变节。一旦妥协被定性为背信弃义的不义之举，那任何民主体系都无法

继续正常运转。[9] 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能有资本永生永世和别人为敌。只要他在从事民主要求他所从事的工作，有一天他总会需要把对手拉拢过来，成为自己的盟友。

当然，妥协应是有度的，政治领袖必须清楚高尚的妥协和可耻的妥协之间那条看上去有些模糊的边界究竟在哪里。[10] 政治家在原则问题上应当坚守立场，应该知道不是所有原则都可以在交易中作为条件。在某些时候，对手会就一些有损你方关键利益的事情提出要求，还有些时候，他们的举动甚至会让你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尊重游戏规则本身，在这种时候，妥协就等于姑息养奸。

直到2011年初，保守党政府的新预算案才终于现身，此时，议会再次投票支持当局执掌政权显然已不再可能。之前，议长已经两次裁决政府蔑视议会，这在加拿大历史上前所未有。如果我们这次支持通过他们的预算案，便无异于姑息纵容。眼下必须举行一场大选，不管这个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否合适。

2011年3月，总理终于宣布将重新举行议会选举。此时，在我内心深处，那个每一位政治家都应寻得的平静角落告诉我，我已做好了准备。我从政的学徒期必须在此告一段落，眼下是时候秀出自己的真功夫了。记忆里，接下来35天的选战是我政治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们有一架飞机和一支陆空双栖的团队，或许是因为我把后勤工作都交给了一支我信得过的队伍，我们的竞选活动才会运转得如此高效。最关键的是，我炽热的政治信仰化为了我们手上的政纲，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拥有公平的机会正是它的精髓。我们将致力于确保生活在原住民保留地的克里族（Cree）孩子能够真正地读完社区大学，在医院走廊里苦等了六个小时的妇女能够早些看上医生，工薪家庭的孩子们都能负担得

起大学教育，正受阿尔茨海默症折磨的家庭也都能得到看护。一旦当选，我们将逐步取消面向私营企业和持有股票期权的富裕人士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兑现上述承诺。我们认为，无论人们的收入来源为何，只要是个人收入，就都应被公平地征税，何况那些富裕人士已从此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中获益6.5亿加元。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惩罚那些成功人士，而是为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们在渥太华的一个体操馆内和众多热情的人民一道，通过网络直播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政纲。选战打响之初的几个礼拜，我们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那是我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段让我感到自己能够完全掌控自己想要传递的讯息、手下的团队和自己命运的时光。如今，当我翻阅当时一位年轻的摄影师乔治斯·亚历山大（Georges Alexander）在竞选期间为我们拍的照片时，我才发现自己在每一张照片里都是笑脸盈盈的——站在我们竞选专用飞机的旋梯高处向人们挥手致意时，一头扎入人头攒动的礼堂同人们一一握手时，手里握着麦克风大步走上或走下舞台时，我始终面朝着眼前热情的人民，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看着这些照片，想必任何人都想象不到这一切最后又是如何结束的。

竞选期间的每一天都会以一次集会收尾。每一次集会前，我都会先在休息室里做些暖身运动，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还会像个拳手一样前后跳跃，以此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我知道，这和你预想的场景不太一样。当时，我很清楚政治是一个对身体要求多高的工作，也很清楚加速血液流动有多重要。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的身体跟上节奏，才能在礼堂的活动中保持兴奋。当我在后台听到礼堂里开始人声鼎沸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和巧兰单独待在一起，先大喝一口水，再试着让自己兴奋起来。音乐一响起，我们便会迈入所谓的“爱之通道”（the tunnel of love），走在我前面的一支先遣队会弯着腰先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两边手

拿照相机的人们随之退后几步，然后再目送我一路走上台阶，拿起话筒朝众人挥手致意。我的眼前是数百张，有时是数千张欢呼雀跃的面孔，而且我每次都会注意到那些肩上骑着孩子的年轻父母，因为他们的孩子就像是飘在人海表面一样惹眼。

人群里最前面的是那些坐在轮椅上的人们，看护他们的人就站在他们身后。人群中间那些探着头想看得更清楚些的，是我们的志愿者、向家家户户上门游说的工作人员、电话拉票员，还有那些对我们的政党运行不可或缺的基层党员：已经退休的女士、穿着风衣的老先生、当地的大学生、锡克族出租车司机们、印度教徒卡车司机们以及在酒店工作的华裔或菲律宾裔同胞。面朝大家，我有时会说：看看你身边，再看看我们大家，用心感受你们的力量，此刻我们整个国家都聚集在这里 。集会的场地可能是哥伦布骑士礼堂，或者退伍军人礼堂，也可能是百年纪念厅、波兰俱乐部、意大利卡萨俱乐部，有时甚至是哈利酒吧。其他时候，我们会到高中的体育馆，或者天花板低矮的酒店宴会厅里集会，穿着白色衬衫、戴着领结的酒店服务生也会时常站在人群最后听我们讲话。这些都是老派政治的做法。尽管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正在人群末端发着推特，但站在最前面临时讲台上的我却仍然穿着老式的礼服大衣。我们是在维系一个伟大的传统，还是在代表这样的传统向观众谢幕？

只要我站在台上，身后总会有一面旗帜，甚至在一些面积较大的场地，舞台前会设置一条伸向观众席的走道，这既能让台下的观众离我更近些，也能让我得以和更多民众握手致意。在许许多多个美好的夜晚，我都能感受到台下的人们不只是在听我说话，他们也是在给自己加油鼓劲。我们之间好似在共同谋划一个伟大的事业，好像是在为了共同征服下一座高峰而互助互利。那

时，我已不再需要讲台的辅助，可以脱下夹克衫，摆脱专业术语，不再试着表现得聪明机智，而去试着在与民众交流时触碰自己信念里质朴的内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精神、全神贯注地真心交流，让思想和观点在彼此间畅通无阻。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北方城市的礼堂里集会，现场和往常一样人头攒动。就在我谈起政府挑衅的党派攻击行径和对制度的蔑视时，我突然想到一句歌词，来自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我的废墟之城》（“My City of Ruins”）。起来反抗（Rise up），我说。起来反抗，人群中有人回应道。很快，每个人都开始这么说。起来反抗。后来，这样的呼喊和回应成了我们每场集会的必经程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以为自己把握住了某种趋势。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巩固自身的选民基础，点燃他们的热情，这样他们才会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挺身而出，或是给我们开一张支票、帮我们接电话，或是在选举当天替我们挨家挨户地说服人们出门投票。当时，我和选民间的互动十分频繁，频繁到我已经可以认出人群中一些时常出现的面孔，我会站在台阶上举起手指向他们，他们也会向我招手回应，每一次集会结束后，他们还会围到我身边。我能感觉得到，他们相信我们一定会赢。他们这么觉得的时候，我也这么觉得。

有一次，我到访蒙特利尔一家名为《新闻》的报社，向他们阐释我们的政治纲领。莉西安·加尼翁（Lysiane Gagnon），这位影响力卓著的专栏作家，在我发言完毕后用一种威严的口吻对我说：“但是，叶礼庭先生，政治不是做社会工作。”我们的政纲并不等同于社会工作，我们认为，在我们的人民身上投资才是让我们可以走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际巨头前的制胜法宝。

我们的整体设想是：全力以赴打击不平等，确保没有人被落下，这样我们才能一起 前行。而且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影响未来而不被未来左右，我们有能力团结人民而非分裂人民，我们也有能力将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国家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上。

就连那些从没参加过政治集会的人也特地跑来加入我们的集会。还记得在一个北部城镇，我记得是萨德伯里（Sudbury），我刚讲完我们在居家护理上的计划，就有一位又高又瘦、穿着牛仔裤、戴着牛仔帽的六十岁左右的男士站起身来，告诉身边的人们说，他开了三十年的卡车，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他的妻子开始记不得任何事情了。除了他，没有人能看着他的妻子，不让她在不知不觉间走出家门。“我相信，你的计划能帮得了我。”他说完后便坐了下来。这是我整个政治生涯里获得的分量最重的一份肯定。我之所以想要出任总理，正是为了 和这位男士一样的人民。

我们的专机上还有一众跟着我们四处奔波的媒体记者。每一天，我们都会和他们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在他们面前出丑，没有说或做什么会注定让我败选的话或事。其中一位年轻的记者后来告诉我，我们的竞选活动正是她当初进入媒体行业想要报道的那种政治活动。当时的总理总是把媒体拦在警戒线外，牢牢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让他们感到既恐惧又沮丧。他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但在竞选活动里却十分软弱。更加令我震惊的是，他在竞选期间的讲话不仅没有任何积极的、鼓舞人心的成分，而且还试图用一个接一个骇人听闻的凶兆警告人民，如果他们无法继续执政，对经济崩盘的恐慌、犯罪、移民、外国人、侨民和陌生人，以及对未来的恐惧等危机就会降临。这些危言耸听的话让我实在提不起精神来认真回应，虽然我应该这么

做。他们当然知道怎么利用人们愤怒的情绪来攻击我，还特地为此做了一支广告来讥讽我的教育背景。如今，要是你只有一个大学文凭，很可能会面临失业，但这不是他们想要告诉人们的重点。在那些从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面前，他们把我们描绘成自由党的精英主义者，而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面前，他们又把我们塑造成贪图税收的伪君子。人民的愤怒确实是能够痛击我们的一张好牌，况且在我们这个如此不平等的社会里，愤怒是一种四处游走的情绪，只要对手肯花重金在这上面做文章，就几乎可以用它来攻击任何一个人。我并无意发动针对那些“财富和工作机会的创造者”的阶级斗争，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正一步步走向颓靡，他们应当得到帮助。所谓的自由政治，不就是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能击退绝望和恐惧的信念吗？为了照顾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亲人，一家人就必须走向破产是不应该的。一个家庭因为失业、疾病和高昂的药物支出从此一蹶不振也是不应该的。更不应该的是，仍有那么多民众觉得受到优质教育对他们而言只是天方夜谭。“一个好的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便意味着，所有好的事物对于任何人而言，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能得到。自由政治存在的意义便在于，人们可以免于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才是我们主张的精髓。我相信，我们正在引起人民的共鸣，至少那些曾在生活中感受过这种恐惧的人民，会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边。

我错了。不管我们多么真挚地笃信以上这些理念，对局势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如今回想起当时熙熙攘攘的人潮和那一个个美好的夜晚，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罢了。我们的政党早就成了一个回音室：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曾经，我赌人们会矢志不渝地忠于我们，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会和我们团结一心。我赌错了。政治上的忠诚已不再是

一种传统：它只是一种偏好，一种可以变得比眨眼还快的偏好。我本以为我们总人口中三分之一的人民会支持我们，只要能给他们一个像样的理由，他们就一定会把票投给我们。我们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支持者只占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不到。

我们原以为，打选战得要拿得出政策和政纲，得有组织架构和候选人名单，至少我们得露个脸，即便我们知道自己在某些选区的获胜概率微乎其微。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党推举的某位候选人最终输给了一位来自新民主党的年轻女士，这位女士本以为自己没什么机会胜选，所以还在竞选期间到拉斯维加斯度了一段时间的假。

我对任何事的理解，都过于停留在它们的字面意义上。我以为我在参加一场竞选，在录制一场真人秀。我以为要靠内容取胜，要综合考虑政纲里的每一部分才行。我们这么做了，他们没有，可选民不在乎。我们就好像各自身处一个平行宇宙，我们在自己的宇宙里，我们的对手在他们的宇宙里，而选民们在第三个平行宇宙里。谁能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把触手伸到选民的世界里占据他们90秒的注意力，就是胜者。我们所有人最多只能占据选民90秒的时间。我们的对手第一个走进了选民的世界，而且砸下百万重金把这90秒填得满满当当，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人们：我只是过客，我不是为了他们才回国。一个竞选活动永久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显然比我们更早意识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在2011年3月才加入选战，他们比我们整整早了两年。

选举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碰巧遇见了一位议会党团的同事，斯科特·布里松（Scott Brison），他当时仍在竭力保住自己在新斯科舍省乡间选区的议席。他告诉我，他不断遇到自己的支持者这样对他说，虽然自己很想一如往常地把票投给他，但却无

法消除对于我“美国人”身份的顾虑。这就是电视广告的效果。

命运女神对最终出炉的结果也有着决定性的话语权。大选前一整年，新民主党领袖杰克·莱顿都在和前列腺癌勇敢地搏斗。我最后一次在众议院大厅见到他的时候，他的髋骨刚骨折不久，因此整个人脸色苍白，汗流浃背，不得不撑着拐杖才能走动，但他仍然勇敢地笑着。选举初期，谣言四起，称他身体里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他后来亲自出面向媒体和公众澄清，称自己健康状况良好。竞选开始后，他每天都会坚持完成行程。而且，他开始逐渐敞露心扉，让人们看到了他内心洋溢着的魅力、活力、幽默和热情。竞选后期，他开始朝支持者挥舞自己的拐杖，而底下支持他的队伍也愈发壮大起来，越来越多的民众被他充满勇气、永不言败和乐观生活（joie de vivre）的品质所吸引。他在众议院多年为国效力的经历逐步为人们所熟知，似乎有一种魔法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把他从一个普通的政治家变成了所有加拿大人都最喜欢的“杰克”。对于所有曾与癌症殊死搏斗过的人而言，“杰克”就是希望的象征。这一转变对他的参选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虽然我毫无贬低他的意思，但我不得不说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必须要归功于他手法娴熟的政治诡计。在魁北克，他赌上自己在蒙特利尔的家族根基，赢得了当地民众对新民主党的大规模支持。他在魁北克声称，如果魁北克想要寻求独立，他可以接受简单多数的投票方式；但在其他地方，他却说简单多数的投票方式必须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向选民争辩道，像他这样在一个地区这么说，在另一个地区却那么说的做法绝不可取，尤其是对国家统一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而言。但选民仍然朝着杰克蜂拥而去，我们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我不确定我是什么时候才发现大势已离我们远去的。当然，

我的办公室主任彼得·多诺洛肯定知道我们在隔夜民调的表现，但他既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无论如何，现在再想改变我们的战略已经太晚了，而且我也太过享受在那些人头攒动的礼堂里向支持者宣讲的乐趣了。我记得当时自己终于意识到那两场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进行的电视辩论对我而言其实毫无益处。当时，排练和预演这两场辩论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我们都没能在上场前制定出一个基本的战略来。毕竟，这两场辩论是我唯一可以告诉国人我并非只是过客的机会，也是我唯一可以向他们展现魅力和亲和力的机会。然而，我却只顾着没完没了地反击哈珀先生，或许在选民眼里，他们看到的不过是又一个气愤的派系政客罢了。杰克·莱顿此前已经历过三次全国辩论，他更明白该如何应付对手。在辩论现场，他的脸上时常挂着笑容，也会安静地等待合适的时机来加入论战。当我在批评哈珀的做法是在侮辱我们的民主时，他突然跳进来，拿出我在议会的考勤记录，教育我说如果我想竞选一个更高级别的公职的话，那我起码应该在工作的地方现身才行。他知道我当时是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同选民接触，但他仍然毫不客气地抡起拳头朝我打了过来。关于这些辩论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总理在辩论结束后回到就在我们边上的休息室时，他们的屋子里响起了一阵欢呼。杰克对我的批评，在保守党人听来无异于一曲优美的乐章。透过隔墙传来的一阵阵发自肺腑的欢呼，已将方才辩论的真实情况悉数告诉了我。

5月1日，我们在多伦多一家酒店的套房里等待选举结果出炉。鉴于之前的形势，我们心里已然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什么，也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能够预料得到最后的结局。先是魁北克变了天。支持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集团竟在自己的主场惨败，连党领袖吉勒斯·都赛佩也丢了在自己选区

的议席。大量魁北克民族主义者都把票投给了杰克·莱顿的新民主党。无论是支持魁北克独立的选民，还是支持联邦主义国家统一的选民，大家显然仍未淡忘90年代自由党的财政丑闻，后者大量将选票投给了杰克的政党。大选前几周，新民主党在魁北克境内预料之中的大势，也引来了不少担忧新民主党会异军突起的民众的反对。然而，这些对新民主党人心存疑虑的选民也并没有把选票投给我们，而是投给了保守党。在此后一个接一个的选区里，更多原本应该投给自由党的选票流入了另外两个政党手里——新民主党的得票数激增，这导致忧心新民主党的选民转而支持保守党，使原本应当属于我们的选票不断流向保守党。我们原先的议席开始像保龄球一样被接二连三地打倒在地。我和一群大惊失色的工作人员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屏幕上的计票结果，亲眼目睹了我们这个政党一个世纪以来苦心经营的政治地位在一夜间的彻底崩塌。夜还未深，我便知道这次我连自己的议席也保不住了。

那天凌晨，先前集结在酒店宴会厅里的支持者渐次散去，只留下一小群惊魂未定、神情忧郁的选民。我面对着他们，站在讲台上，向过去五年来曾经支持过我的人们表示感谢。你没办法为这种场合的发言做准备，我唯一记得自己说了的话是——失败是位伟大的老师，我会尽己所能地吸取所有教训。

这次失败无疑是对我的一次否定。如果仅仅是如此，或许我还能接受，但事实上这远不止否定我自己那么简单，这还是对许多优秀、忠诚的议员的否定，对许多出色的候选人的否定，更是对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来坚守的政治传统的否定。我深知，就算只是简单地消化这个结果，也要花费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巧兰和我一路穿过已经空无一人的宴会厅，跨过仿佛写满了败选的满

地碎屑，兀自走回我们的房间。一路上，我仍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我同时也很平静。所以这就是政治吧，我心想。要是你不曾懂得政治会让你变得一无所有，你也就从未真正读懂过政治。

第二天清晨的那一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它展现了政治的另一个侧面。当时我们已离开了酒店的房间，正穿过大厅准备坐上前往机场的巴士，我们却在酒店门外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人包着头巾，是一家汽车公司的老板，五年前我从政的第一个礼拜就曾拜访过他公司的调度室。从一开始，他就是我们坚定的支持者，直到如今这最后一刻，戴着另一条漂亮的头巾、优雅如初的他仍然坚定地站在我们身边。只是这一次，巴杰特·西坎德的脸上挂满了泪痕。

---

[1] http://www.liberal.ca/newsroom/news-release/speakers-announced-for-canadaat-150-rising-to-the-challenge/.

[2] 维米岭战役发生在1917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部战线的一次战役，也是加拿大军队第一次独立参与的战争。这场战役以加拿大从德国手中夺过维米岭的控制权结束，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协约国的士气。——译者注

[3] http://www.scribd.com/doc/50397233/Speaker-s-ruling-BRISON-PrivilegeProduction-of-Document. 加拿大一家本土的基金会——萨马拉（Samara）——已将加拿大的民主治理情况列入其工作的中心议题。参见http://www.samaracanada.com。

[4] Nancy Rosenblum，On the Side of the Angels：An Appreciation of Parties and Partisanship（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5] 或译作“意图伦理”“心志伦理”。——译者注

[6] 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 Mills，eds.，From Max Web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 77-128.

[7] Jimmie Maxton，引用自Bernard Crick，In Defense of

Politics（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2），p. 138。

[8]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9]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The Spirit of Compromise：Why Governing Demands It and Campaigning Undermines I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Arthur Isak Applbaum，Ethics for Adversaries：The Morality of Roles in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10] Avishai Margalit, On Compromise and Rotten Compromi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第九章 听出租车司机怎么说

就这样，巧兰和我回到了斯托诺韦，心情沉郁地开始打包行李。这让我想起曾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们在唐宁街10号的后门口，把行李抬上搬家卡车。照片摄于1979年，那一年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刚在选举里败给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搬家卡车的到来，就和一位国家领袖宣誓就职一样，象征着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开始行使权力。现在，帮我们搬家的卡车正在后门等着我们，车上的工人叫我们快点打包东西。这个慢慢被清空的房子曾让我们感到过家一般的温暖，如今我不得不从书架上把我的书一本本地抽出来。一旁画像上的劳雷尔，这位史上最伟大的总理，仿佛始终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在我之前，自由党历史上只有两位党领袖最终未能出任总理。现在，我成了第三个。

一天前，我还有一架专机、一众保镖、上百名工作人员、一辆专车、一位司机、一位主厨和一位管家随时恭候我回家，最关键的是，昨天的我还有政治未来。仅一天之隔，属于我的未来就已烟消云散了。现在的我不仅面临失业，就连退休金也领不了。一般而言，任议员满六年就能领退休金，可我的任期离符合要求还差了五个半月。所以，我一边将行李装箱，一边打着电话想给自己找个工作。最后还是一位与我相识了三十年的老友罗布·普里查德（Rob Prichard）出面救了急。在他分别给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Massey College）院长约翰·弗雷泽、多伦多大学校长戴维·内勒和蒙克全球事务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主任贾尼丝·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打了三通电话后，我又得以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做一名人权和政治学领域的

教书匠。而对于我那些败选的同事而言，要重新开始新生活就不像我那么容易了。

我已经整整五年没有自己开过车了，所以我败选后的第二天就去更新了驾照。那天他们帮我拍了张照片，现在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那上面是谁了。照片上的人愁眉苦脸、眼神失焦，脸上写满了消沉和忧郁。

清理了我在国会山办公室的桌子后，我便出门向仍然心有余悸的议会党团告别，而现在我们的党团只剩下原先一半的成员了。安慰败选的同事同样让人感到沉重，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那么出色，甚至为了党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议席，他们中还有人和我一样仍在挣扎着消化这场惨败。有人发誓要“卷土重来”，但你看得出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其他人则很平静地接受这次失败，就好像这只是自己人生中不得不翻过去的一个篇章而已。至于那些被我称为“冰场老鼠”（rink rats） [1] 的同事们，他们打心底里喜欢这份在众议院的工作，因此不免在告别时悲伤难耐，我看了也觉得于心不忍，尤其因为我感到是自己的失误酿成了这次滑铁卢，我应该为他们的命运负责。这次失败就像一次自然灾害，像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吹倒了森林里的每一棵树。大部分党团同事对我的不幸表示了同情和慰问，那些心里苦不堪言的同事则在一旁一言不发。当天不止一个人上前对我说，我打了一场漂亮的选战。没有任何人对我表示责怪，因为我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失去议席的代价。巧兰陪我参加了最后一次党团会议，当有党团同事发现她独自坐在一边用手捂着脸哭泣时，大家纷纷站起身来，为她热烈地鼓掌。这是她应得的，毕竟在这条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路上，没人比她更加辛劳。随后，我向党团做了最后一次发言。结束后，我向所有的朋友们表示了我由衷的

感谢，没有提到我的政敌一句。最后，我牵着巧兰的手，最后一次迈出了议会的大门。

之后的几个礼拜，我才开始体会到败选这一现实的真正意味。原来，没有什么工作比前政治家（ex-politician）更加属于过去了，尤其是败选了的前政治家。因为再也不会有什么人给你打电话了。我之前在职时，偶尔会有些拒绝接受当下状态的前政治家让我感到困扰，所以当时我就发誓，要是我败选了，我至少不会对自己的继任者妄加评论、随便批评，不管这位继任者是谁。如果你的政治生涯已经确凿无疑地画上了一个句点，那你最好还是尽快接受这个事实比较好。既然选民们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那现在我的任务就是接受他们的裁决，然后继续向前。

当然，所有这些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我还在竭力摆脱败选的伤痛时，我逐渐意识到，人在失败后都会面临这样一个灵魂层面的挑战：如何找回先前的资格。对我来说，当初为了从政，我舍弃了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和思想家的资格。如今，败选了的我又失去了做一名政治家的资格。败选不仅剥夺了我作为政治家的地位，也否定了我作为写作者和思想家的身份，因此，无论是在先前从政时的同事那里，还是在如今大学校园里的新同事那里，我的处境都很难堪。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对别人还有任何价值可言。

庆幸的是，这个自怨自艾的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因为败选其实也有我从未预料到的令人惊喜的一面。过去五年，我一直生活在公众的视野里，见到任何人都希望能俘获他们的支持，得到他们的选票。数不清的陌生人对我的看法，就这样成了我生活中仰赖的全部。如今，他们已决定了我的未来。可让我无比惊讶的是，在我败选后，仍然会有这么多陌生人出手相助。选举结果出

炉后，党总部的邮箱里涌入了许许多多感谢我多年为民服务的电子邮件，总部的工作人员把它们一一打印出来装订成册，送给了我。我所到之处，都会有民众上前来向我道喜，就好像我是个刚刚战胜病魔的勇士一样。“请继续努力”，许多人这么对我说。“干得好”，另外一些人开车从我旁边经过时透过车窗大声对我说。我想他们中有些人可能错以为我是刚刚在真人秀电视节目里被淘汰出局的参赛选手，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

我曾以为，人们都会在我走上坡路的时候称赞我，而在我走下坡路的时候对我指指点点，但我在败选后的生活却并非如此。大选后一周，我出门去干洗店拿洗好的衣服，在返回我们在多伦多的公寓的路上，经过一个消防站，门口有一众消防员正在休息，等待出勤。他们见到我后都纷纷围拢了过来，向我表示慰问。“一场硬仗，”他们中有人说道。我回应道：“不会比灭火更难啦。”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在我们公寓楼对面的干洗店里，在平板电脑上看着韩剧的米歇尔来自越南，她是我们的好朋友，只要是我们送去干洗的衣服，她似乎从来都只收我们低于原价的费用。那天见到我，她也从收银台后走出来，给了我一个拥抱。还有一位锡克族卡车司机开着混凝土搅拌车从我旁边经过时，朝我热情地挥了挥手。这些友好的陌生人的态度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在政治里，不管政治家再怎么糟糕，媒体再怎么咄咄逼人，其实人民都能处之泰然。当这么多善良的陌生人上前告诉我他们把票投给了我的时候，他们好像已经原谅了我，不会再向我追究我们为何会败选了。

当然，你自己还是会因为败选感到自责。你会为自己没能过上理想的生活感到悲伤，也会为自己再也没机会施展宏图伟略而感到忧戚。现在，我终于想明白自己是为了谁才从政的了，可我

再也没机会为他们做些什么了。你会因此伤感不已，正如我当时所经历的一样，各种难过的情绪会不禁涌上心头，然而，渐渐地，这些情绪都会在你的生活里烟消云散。你会发现，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感觉真好，能够重新有时间好好读书的感觉真好，能够尽兴地听一场音乐会的感觉真好。败选不仅让你重获自由，也让你开始洞彻事理。当你在最不期待自由的时候重获自由，你会惊讶地发现此时自己已经能释然面对失败。

我重新开始阅读。随着阅读的深入，此前在乏味的政治生活中慢慢被消磨殆尽的求知欲再一次开始萌动。败选后的三周内，我便开始为秋季学期的课程备课。坐在梅西学院的办公室里，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政治生涯和我即将再次教授的政治理论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

我自然而然地想到，全世界的课堂上布置给学生阅读的政治理论，大都不是那些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人写的，而是剩下的失败者写的。2000年来，西塞罗（Cicero）笔下的《论责任》（*On Duties*）与《论演说家》（*On Rhetoric*）是任何修习政治的学生都必读的书目，但这两本巨著的作者却曾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这样说道："我曾坐在甲板上，手握可以操纵整个国家的船舵，而今就连船的底舱都快没我的栖身之地了。"[2] 当时说这话的西塞罗，这位罗马共和国的杰出捍卫者和曾经的执政官，或许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在后三头同盟下属的屠刀下毙命。至于马基雅维利，他在1512年被废黜一切职务，随后被投入监狱，遭到严刑拷打，出狱回乡后才开始写作。尽管后来他因被排斥和否定而郁悒成疾，但他终究还是写就了《君主论》和《论李维》（*Discourses*）两部著作，成为过去500年来政治课堂上的另一必修内容。如今，当我读起他彼时写给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Francesco Vettori）的信件时，我是那样感同身受。他在信里描绘了一个落败政治家的生活，白天在庄园里捕鸟，去森林砍柴，到客栈里去向朋友们发发牢骚，晚上回到家，在四壁图书的围绕下，穿上他的宫廷服，投入早已消逝的古罗马经典中去，聊以自慰。[3] 另外一位在政治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人物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始终都生活在世人这样的批评之中：作为政治家的他，远不及作为思想家的他来得出色。他在1790年所写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对于人们的革命热情做了最为深刻的保守主义评述，但却被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在一首令人难忘的反讽小诗里嘲弄了一番。[4]

他，为无垠的宇宙而生，却收束自己的思想

为党派利益放弃探寻人类生存的意义

纵然博览群书，到头来还是得声嘶力竭地

求汤米·汤曾德投他一票

为了确保美国修宪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合著的《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至今仍是历史上最为成功和生动的政治宣传手册。然而，麦迪逊在位时却并非一位成功的总统。1812年战争期间，作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曾从白宫出逃的总统，他遥望着被英军肆意蹂躏的首都，只能忍气吞声。至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他笔下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是历史上视民主为举世向

往之文化归宿的最为伟大的政治观察笔记。可是，整个19世纪40年代，他都只是法国国会一个不起眼的众议员，终日只能写些挖苦议员同事愚蠢发言的小文。1848年革命后，他曾短暂地进入内阁担任部长，直到1851年被迫屈辱地离开政界。 [5] 或许是世上最为杰出的代议制政府理论家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65年至1868年在英国出任议员期间，曾对他的议员同事在立法上的无能感到愤恨恼火，可是，他在第二次参选时就落败了。 [6]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是位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在1919年议会选举时，他甚至都没能得到民主党的候选人资格提名。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他饱尝了屈辱与失败的痛楚。但他作为一名理论家，我们每一年仍要求学生阅读他的著作。

为何在理论上敏锐过人的政治学者时常会在实践上失利？这个现象倒是有助于我们了解从政究竟需要哪些独特的天分。在理论研究上不计成败的率直、缜密、意志力，以及对独创性的敏锐探寻——这些都是理论追求道路上宝贵的品质，同时也成了政治实践中累赘的劣势。要想在政界获得成功，谨慎和掩饰才是最重要的制胜法宝。这一点说明，上述的理论家之所以大都在实践上失利，正是因为他们没能按照党派纪律的指示缄默不言，或是没能在应该阿谀奉承的时候张口说话。另外，理论家也可能缺乏以下这些让成功的政治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高尚品质：适应性强，做事灵活，及时抓住命运女神赐予的好运气，对时移势易的敏锐直觉，对变化中的真相的敏感，以及领导众人、施展魅力和鼓舞人心的高尚才能。

思想家三天两头贬低实干家，殊不知这么做对他们并没什么好处。据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在评价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时说，这人只有二等的才智，却有一等的气质。霍姆斯这么说确实有些傲慢。[7] 罗斯福本人曾很高兴地承认，自己除了是一个基督徒和民主党人之外，不信奉任何政治理论。确实，也没有任何理论家可以像他那样，既能使一个现代的自由国度重获新生，又能让深陷大萧条的人们重拾对于政治的信心。同样地，那些天生的实干家也会时不时对那些更善思辨者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所以实干家们才会喜欢说，“能者做事，不能者教书”。但他们说这话时恐怕是忘了，历史书都是那些教书匠们写的。

如果你认为我觉得自己能和上述这些思想家们相提并论，你一定不会对我有什么好的评价。事实上，不管是我的实际经历，还是我的思想成果，都远远无法与他们比肩，我只不过是在力所能及之处寻求一些安慰罢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是，政治上的失败也会赋予人某种权威，当然不同于成功给人带来的认可，但却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威。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已经为自己的获知付出了代价，既然他们已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财富作为吸取教训的代价，那他们就有权发言。

这些写作者在另一个方面又是启迪人心的。他们所经历的无一例外都是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即将走到穷途末路的罗马共和国，落入独裁者手中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肇建伊始的美利坚共和国，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统治下百业凋敝的法国，王室全盛时期的英国议会，1918年后民主便胎死腹中的德国——并将这些特殊的阶段上升到对于政治本质的一般性的反思。他们知道所有的政治都具有地域性的——和我们所说的一样——是由架构起政治斗争的制度和历史背景塑造的，然而与此同时，

他们也在试图揭示政治最核心的奥秘，探寻这种人类最高尚同时又最错综复杂的活动的根基。感谢他们基于自身的经历提炼出普遍理论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些曾在政治一线效力过的人们得以理解他们曾经历的种种遭遇。对那些打算从政的新手而言，这些伟大的写作者可以不加掩饰地让他们看到政治游戏的真实面貌，只要那些新手愿意倾听，总能有所收获。

败选后又过了几周，我特地跑去向彼得·芒克（Peter Munk）致谢。这位富商曾慷慨地资助我参选，后来却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那票投给了我的对手。像他这么友好的老兄为数不多了。如今随着党派偏见愈演愈烈，能够同时为不同政党慷慨解囊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他是个罕见的例外。在午餐桌上，他向我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他亲手创办的克莱尔顿公司是如何走向破产的故事。当时破产清算结束后，他走在金融区的大街小巷，感觉自己成了所有人的众矢之的。后来，他又再次起家，比从前赚的还要多得多，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失败是什么滋味。败选后的好几个礼拜里，我从许许多多成功人士那里收到了大量如何走出失败阴影的建议。“写部浪漫小说，”房产开发商埃尔维奥·德尔赞托建议说，“赚点钱来做些改变。”曾在担任安大略省省长时受到重挫的戴维·彼得森对我说，败选有这样一个好处，你重新拥有了叫别人滚开的权利。彼得森是“好好活着就是对敌人最好的报复”这句话活生生的证明，虽然他也承认，自己花了好几年才终于把失败的痛楚“排解”干净。“激烈的体育锻炼很有效，”他说，“比如砍柴、清理灌木丛、帮你自己建个小木屋什么的。”另一个朋友说，至少我能写一本好书了。他以为他这么说的时候是在安慰我，但我告诉他，我当初并不是为了写本好书才从政的。

让我记得最牢、也是促使我真的　想要写下这一切的，是一

位出租车司机说的一番话。当时我刚坐进他的车里，他就拉下后视镜，想凑近些看清我的脸。

“你是我心里想的那个人吗？”

“我是。”我说。

“我把票投给你了。”

“幸好还有人给我投票了。”

他随后耸耸肩说：“这就是政治啦。”

他就好像是在说：“看，世界本就如此。你以前不知道，你现在总知道了吧。”在随后的交谈里，我才得知他来自黎巴嫩，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20年。他不仅对自己这个新祖国的民主政治有着出租车司机普遍都有的独到见解，而且回忆起故乡黎巴嫩的宗教政治，也不时透露出讥讽的态度。我逐渐发现，在他的认知中，“政治”这个词所代表的正是那个可以塑造生命形态的、混合了意志和机遇的奇怪组合。打个比方，某个城市如何授予出租车奖章，是政治；独裁者如何继续统治他那民不聊生的国家，也是政治；黎巴嫩是如何被内战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同样是政治；还有，正如他所说的，好心、无辜的百姓是如何被暴打的，这同样也是政治。当我付了车钱向他告别后，我心中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想要记录下这种政治，这种残酷的游戏，这种命运和意志充满戏剧性的相遇，还有这种恶毒与高尚共存的状态，因为我和他一样为之着迷。

8月22日，距离获得此生最大的一次政治胜利才三个月不到，杰克·莱顿便因癌症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61岁。我和巧

兰，还有其他上千人，在多伦多罗伊·汤姆森音乐厅（Roy Thomson Hall）参加了他的追悼会。结束后，我们穿过大街小巷步行回家。一路上尽是悲伤的人群，挣扎着面对命运这般尖锐的讽刺。我记得我当时曾与一位女士有过一段对话，她想向我解释为什么媒体不应该在杰克参选期间批评他没能披露自己真实的健康状态。“我也是个癌症的幸存者，”她说，“要想熬过去，你只能说你不得不说的，你也只能信你不得不信的。这和政治没关系。”我只能表示同意。

8月下旬，我去看了红袜队（Red Sox）和蓝鸟队（Blue Jays）在多伦多罗杰斯中心（Rogers Centre）的比赛。我喜欢看棒球，我母亲也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和母亲最享受的欢乐时光就是在我家那台黑白电视上看棒球比赛。就连比赛里那些枯燥无味的部分，我也同样喜欢，因为它让我有了更多遐想的机会。随着脚边的啤酒罐和热狗包装纸越积越多，我开始意识到，和政治最相近的正是体育比赛。两者都有不同的队伍参赛，都会在更衣室里互相打趣，被球打到时都一样疼。问题是，我们总称政治是场比赛，可它并不是。政治里没有裁判，规则是双方边打边定的，你没法抗议对方犯规或者越位，因为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比赛则不同，你必须按规则来。在政治里，你只管打球就是了，因为只有胜者有权更改规则。

这让我想起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里写的一个桥段。当时，安德烈公爵正在准备迎接博罗季诺战役的到来，他在上战场前曾比较过打仗和下棋的区别。在象棋里，象永远比卒大，但在战场上，仅仅一个排的士兵也可能击退对方一个连的兵力。[8] 换言之，战争是没有规则的——只有战略。只有这些无法预测的元素——意志、勇气和机遇——能够决定战

果。这些似乎也适用于政治，一种将技巧、意志力、运气和机会高度融合的产物。

到了傍晚，天色渐暗，一层阴影开始笼罩整个场地。我坐在看台上，反思失败在棒球和政治中的意义。“所有的政治生涯最后都会在泪水里终结”，有人曾这样说道。体育比赛也是一样。所有运动员在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无论多么懊悔，都必须接受自身的肌肉记忆、敏锐直觉和内心的战火正在不知不觉间消逝的事实。然而，失败并不只存在于所有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终结里，它也是那些成功瞬间的一部分。对那些历史上最杰出的棒球手而言，他们每打出十个球，一般也只有三个能够上垒。当天比赛的最后一局，我开始关注那些击球失败的球手们的表现。他们会默默地回到球员席，不会在意周围嘈杂的观众，也不会把头盔扔到一边，而是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去，在脑海里调整姿势，为下一次上场打出一个绝好的全垒打做准备。这些技术纯熟的棒球选手们工作时的自律，让我十分钦佩。等到比赛结束，看台上的人群逐渐散去，我回想起了那个我输掉选战的夜晚，当时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众神色忧伤的支持者讲话时，不断有人在我眼前离去，消失在门外深沉的夜色里。在我的政治生涯里，我自始至终都知道，台下的人群中或者电视前的观众间，一定有着那样一位年轻的少年或少女在看着我的时候，会这样想：我也可以变成他。那个年轻人仍然还在。我希望他或她还会这么想：他没能做到的事，我会做到 。如今，我真诚地希望能够给予他们我所有的鼓励。我没做到，但你可以 。

我想起退休了的政治家埃莉诺·卡普兰曾经对我说的一句真理：你永远不会脱离政治。或许你已经被送回到看台上，但你仍然在观赛。我如今便身处看台，看着和我同处一个年代的人上

场，各自站到各自的位置上。同时，我也在静候一位天赋异禀的好手出现。我笔下的所有文字，都是为了那些曾经对我报以希望又目睹我失败的年轻男女而写的。我希望，在属于他们的时机来临时，我写的这些文字可以在他们的成功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思考我到底是为了谁在做政治。如今，我知道了。我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理解政治到底是什么。如今，我也明白了，这两个问题正是我最后想谈的。

---

[1] “冰场老鼠”指非常热爱冰球，为了能得到打球的机会而坚持在球场打工的年轻人。——译者注

[2] Marcus Tullius Cicero，How to Run a Country：An Ancient Guide for Modern Leaders，ed. and intro. by Philip Freem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 xi.

[3] Niccolo Machiavelli，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ed. and transl. David Wootton（Cambridge：Hackett，1994），pp. 1-4.

[4] Edmund Burke，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burke/.

[5] Alexis de Tocqueville，Lettres choisies，Souvenirs，1814-1859（Paris：Gallimard，2003）.

[6] John Stuart Mill，“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 V. in J. S. Mill，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ed. John Gra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7] 参见Louis Menand，“How the Deal Went Down”，New Yorker，March 4，2013。另外参见Isaiah Berlin，“President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An Anthology of Essays，ed. Henry Hardy and Roger Hausheer（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7），pp. 628-637。

[8] Leo 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l. Richard Pevear and Larissa Volokhonsky（New York：Vintage，2007），Book 10，ch. XXV：

“不过大家都说战争就像下棋。”他说。

“是的，”安德烈公爵答道，“但是有点区别，下棋每走一步，你可以随便想，

下棋不受时间的限制，另外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马永远比卒子强，两个卒子比一个卒子强，而在战争中，一个营有时比一个师还强，有时反倒不如一个连。没有人能弄清楚军队的相对力量。相信我，”他说，“倘若说参谋部的布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就在那儿从事部署工作了，但是我没有那样做，而荣幸地到团里服务，和这些先生们共事，我认为明天的战斗的确取决于我们，而不是取决于他们……胜利从来不取决于将来，也不取决于阵地，也不取决于武装，甚至不取决于数量；尤其是不取决于阵地。”

“那么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士气——我的，他的，”他指着季莫欣说，“每个士兵的士气。”

第十章 召唤

读罢我的故事，或许你会下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政治这个肮脏的游戏和你没有丝毫的关联。我希望，你在读完这本书后能有所改观：政治是一场高尚的争斗，它所要求的自律、明判与内韧远比你以为自己拥有的要多得多。政治的高贵之处在于，你会为了自身坚守的信念而竭力辩护，也会为了维护整个民族公共生活的最高道德而动员他人与你携手奋斗。政治的考验之处在于，你既要试着改变必须改变的事物，又要保留必须保留的东西，还要知道两者的差异在哪里。

从政以前，或许曾有前辈告诫你要事事小心，切勿说或做那些对前途无益的事。他们也会告诫你不要累积心理包袱。当初，我就是背着很多包袱进入政界的，它们让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比起时刻戒备的生活，还是早些付清代价为好。时刻戒备的生活并非真正的生活。如果你把谨慎当作自己的信条，你的勇气就会在你需要崭露锋芒的时候离你而去。所以，除了谨慎，政治还对你有更多的要求。

你无法提前预知前路会遭遇什么，但说真的，缺乏预知未来的能力倒也是上天对生命的一种恩赐。不要害怕冒险，也不要害怕失败。如果你能把自己从失败等于耻辱的执念里解放出来，你就不会被失败击垮，也不会被成功惯坏。当然，你仍然应当竭力争取成功，不为失败找寻任何借口，可是比成败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宠辱不惊。当你踏足政界，你总能控制那些只取决于你自身的变量——你的勇气、意志、决心和幽默感——但你却注定无法控制其余那些会发挥作用的外生变量。既然所有的政治生涯在很

大程度上都是由命运女神决定的，你就没有理由在命运不济时怨天尤人。不要误认为你能控制得了自己的命运，那不过是狂妄罢了。

拥抱政治生涯就意味着摆脱你过去天真的一面。它意味着，就算你尚不知晓做某件事情的代价是什么，你也必须在知晓之前心甘情愿把代价付清。它还意味着，你要认清自己，要坚持你从政的初衷不动摇。除非你能让那些选你上台的选民们相信你是在为他们而战，否则你不可能成功。如果你不是为了他们而战，你一开始就不该从政。或许，你得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想明白自己到底是在为谁从政，因为只有在和陌生人上百次的会面后，你才会逐渐地把他们的事业当成是自己的一样，去为之奋斗。他们从此会成为你效力的对象，你也必须在他们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成为人民的代表，这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将会永远地改变你自己，它也同时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如果他们信任你，他们自会与你同甘共苦。

人民对你的忠诚不是与生俱来的，而需要你每天去努力地争取的。你要坚持言行一致，要向他们证明你始终和他们站在一边，这样才能争取来他们的忠诚。如果你能让他们笃信你的资格，那就算他们有所异议也仍会拥护你的立场。如果他们相信你是在真心实意地坚守自己的信念的话，那他们也会放心地追随你的领导。

公民分辨得出谁需要的是肯定，谁需要的是尊重。你不必总受人民拥戴也能成功。你的人民不必非得喜欢你，但他们必须尊重你，他们必须感受得到你的正直，相信你在为他们拼搏。

你的对手还会试着给你下定义，他们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你会

被打倒，因此你必须掌控好你自己的故事。你要说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关于你理想中的社区和国家的，应该是能将你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你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你的事业和他们的事业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故事。你需要把你准备推行的政策和你个人的背景揉到一起，让整体的叙述足够有说服力才行。你要说的故事无外乎如何巩固人们的公共生活，如何与人民团结一心去对抗那些包括不平等、忌妒、分裂和仇恨在内不断让我们的社会四分五裂的力量，以及如何捍卫所有寻求进步的政治都需要坚守的永恒的立场——我们必须共享命运，公正待人。一个关于命运共同体和正义共同体的故事必定是属于整个国家的，必定来源于所有让我们精诚团结、忠于人民、忠于体制的共同经验。这个故事还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应该比现在的更好。

对抗是政治的本质，你必须要拿出一个战士的气势才能在对抗中获得优势。人民是不会同一个连为自己辩护都做不到的人站在一道的。当然，被别人攻击势必是痛苦的，但你真的不必把它放在心上。长大成人的过程本就是一个学着不让任何事情往心里去的过程——你当然应当想尽方法捍卫自己的荣誉与尊严，但永远别让他人的人身攻击触碰到你内在的自我。别让对手的圈套得逞了。在任何时候，你都必须坚守自己的资格，捍卫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

在政治的格斗场上，你损失了多少就会赢得多少，但一个明智的政治家会知道什么时候出拳才光明磊落，什么时候出拳是乘人之危。或许选民会把票投给那些穷凶极恶的政客，但他们不会喜欢那些人。你从政是为了赢得人们的尊重，而不是畏惧。

你不会想做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但你也同样不会想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而且，你也不会屈服于那些说选民不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也不在乎他们想要什么的嘲讽。你必须对人民的判断保持信心，不管他们是不是把票投给了你，不管你对他们的信心经受了多少考验。如果你对公民基本的理性都不抱任何希望，想必你也不会有推动民主体制运作所需要的信念。只有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民的判断，民主体制的道德优势才能得以显现。有时，接受他们的裁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除了他们，这世上就没有其他裁判了。

为了享受政治并且让政治更完善，你必须相信你是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不管他们有没有投票给你。就算政治现实迫使你必须选择让某个集团的利益凌驾在另一个集团的利益之上，你也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因为你做出的这个选择才让一方付出了利益受损的代价。要想做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就必须为 选你上台的人民负责，也为 你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我们的年代，这份对人民的信念正在经受考验。全世界一半国家的政权都在政治上奉行寡头专制，在经济上遵循市场原则。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的政体，相较于我们这些自由社会所奉行的充满党派偏见、分裂又笨拙的民主政治，要来得更优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民主会在这场政体之争里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我们也无法保证历史会站在自由的一方，更无法确信民主最终可以打败它的这些对手。从这样一个国际视角来看，政治家不仅要承担在本国捍卫民主的职责，更要承担起在全世界维护民主价值的重任。你之所以身处这个舞台，正是因为民主最需要维护的，不在于言而在于行，不在于空泛的理论而在于实际的行动。

你不仅是民主的监护人，也是你与人民之间信任关系的监护人，更是你祖国奉行的制度的监护人。如果你有机会在立法机构

为国效力的话，试着记住你第一天上班时那种奇妙的感受，因为当你一坐进属于自己的议席时就会意识到，这一切正是因为许许多多普通人投给你的选票才得以可能。另外，也试着记住，你不会比这个国家的制度更聪明。这些制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对于传统、规则，甚至是一些愚蠢的规则的尊重，既是对人民主权的尊重，也是对让我们生活在自由之中的民主的尊重。尊重制度意味着你将承担起永远不把对手看作敌人的义务。政治不是战争——它是我们唯一可以仰赖的代替战争的选择。缺失了尊重对手的文化，民主将无法运作。在政治里，你既要对自己、对党派、对投票给你的人民忠诚，你也要对你的国家忠诚。针对不同对象的忠诚之间确实会出现矛盾，但在你真正遇到这些矛盾之前，你必须明白，有时你必须将对国家的忠诚放在第一位。

在整理这些不同的忠诚的过程中，对政治本身表达适当的敬意是有益的。我们常把政治看作一场游戏，可世上恐怕没有任何游戏会像政治一样严肃。毕竟我们都是法律的制定者，可能有一天我们就必须投票决定，要不要把年轻的男女士兵们送上战场，让他们直面死亡。当它的结果可以严重到这种地步，它当然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而已。

政治不是一场“丑人多作怪”的戏码。曾和我共事过的政治家们都不是为了博人眼球或者变得小有名气才从政的。他们无不希望能以某种形式为人民服务，再以是否曾为本选区的选民做了什么实事为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表现。这才是关键的杆秤，才是鞭策自己保持诚实的戒尺。

政治也不是一种职业，因为它不像一般职业那样存在可被教授的标准和技巧。政治是没有技巧可言的：它并非科学，而是一

种克里斯玛式的艺术，取决于一个人的游说能力、雄辩能力，以及血性的毅力，而这些都只能在生活中慢慢领悟，没有任何学校或者咨询师可以教你。从工作的稳定性上来看，政治也不是一种职业。你的政治生涯可以在顷刻间被颠覆，因此你必须要确保你在从政前就有一个可以让你在踏出政界后重新开始新生活的谋生方式。知道自己能经得起失败的打击，才是你能坚守清正廉明的最好保证。

1919年1月，马克斯·韦伯在革命浪潮下的慕尼黑，为当地担惊受怕的学生做了一场演讲。“一战”战败后，德国频现街头暴力，而那些学生们虽然置身其中但仍在努力不让自己迷失方向。韦伯在讲话中区分了两种人，一种人靠 政治生存，另一种为 政治而生存。只有那些为政治而生存的人才能听见政治的召唤。他在演讲最后对学生说的那段话值得我们在此重温：

>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1]

我会劝你把政治看作一种上天的召唤。这个词常为神父、修女和一些神秘主义者所用，但用它来形容一个如政治这般罪恶又世俗的工作却也有些吸引人的地方。它准确地把握住了政治最困难的地方——在背负世俗和罪恶的同时，坚守忠诚和无畏。你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成就了你自负的理想。你希望你能通过工作上的行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个过程里，你会为了追寻本应干干净净的目标而把自己的手弄脏，因为你在用人类的恶习——狡猾和无情——在为高尚的道德——正义和尊严——服务。你所服务的对象——人民——是人世间剩下的唯一具有神性的，因此你必须学习遵从他们的裁决。这些裁决理解起来或许很痛苦也很艰难，但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便没有其他什么可以让我们如此信仰的东西了。

犬儒主义者会对这种视野下的政治不以为然，觉得它不过是一种妄自尊大的错觉，但对我这样曾亲身投入政治的人而言，它便是真理。通过展望政治的理想形态，它让你得以理解政治在当下的真实境况。召唤本身自然是无法触及的，那些听到召唤的人也知道自己配不上如此的召唤，可他们仍会受其鼓舞。所以，把政治看作一种启明星一般鼓舞我们前行、不断前行的召唤吧。我们中回应了这一召唤的人都应明白，成功或失败远远没有我们已然做出回应这一简单的事实更重要。我们现在所希冀的，是将来能有比我们更坚决、更勇敢、更忠诚的人也来回应这一召唤。这本书正是为了这样的年轻人所写的。

---

[1] Max Weber，“Politik als Beruf”［“Politics as a Vocation”］，in H. H. Gerth and C.W. Mills，eds.，From Max Web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 128. 另外参见Max Weber，Political Writings，ed.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Fritz Ringer，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Terry Maley，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al in Max Weber’s Thought（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1）。（此处译文参考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17页。——译者注）

FIRE AND ASHES
by Michael Ignatieff
Copyright © 2013 by Michael Ignatieff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火与烬：政治中的成与败／(加)叶礼庭著；黄天磊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9
书名原文：Fire and Ashes: Success and Failure in Politics
ISBN 978-7-5117-3368-9
I . ①火… II . ①叶… ②黄… III . ①叶礼庭 - 回忆录 IV . ① K837.1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 第181797号

火与烬：政治中的成与败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赵灿
特约编辑：潘梦琦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真： (010) 66515838
字数：159千字
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